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危机故事100篇



出版说明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曲折，有反复，有停滞，有倒退。但总的趋势是逐步迈向科学，迈向文明，迈向繁荣。从古至今，世界上不知发生了多少天灾人祸：山崩地裂、洪水漫野、飞蝗满天、瘟疫流行、政治谋杀、宫廷政变、劫持人质、毒气泄漏……这些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往往危及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这些危机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也就构成了一篇篇令人惊心动魄的危机故事。这里收集的 100 篇故事，有的以历史事件为依据，加以整理；有的以世界名著为蓝本，加以缩写；有的以民间传说为素材，加以改编。每篇故事，都围绕一个曾轰动一时，或为世人所关注的事件展开，叙述它的来龙去脉，揭示它的核心机密，使人们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面对这威胁人类安全的种种危机，平民百姓、政治领袖、英雄豪杰以及歹徒恶棍、战争狂人……他们是如何表现的？“德国国会纵火案”、“古巴导弹危机”、“唐山大地震”、“总统被绑架”……这些精彩的故事，将向你展示一些人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危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更能使人感受到人定胜天，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们有理由相信，任何危机和险恶都阻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世界危机故事 100 篇

埋在死灰中的古城

巍峨争峰的维苏威火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火山。它高耸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东南部。自古以来，维苏威火山一直是个令人恐怖的巨人，经常吐出血红的火舌，吞噬周围的山川田地，肆意报复住在山脚下的桀骜不驯的人们。

但在两千多年以前，从古希腊人手中夺取维苏威火山周围地区的古罗马人却不相信维苏威是座活火山，更不相信它会再次爆发。他们认为，这座昔日的火山因缺乏燃料已经熄灭。山顶的火山口，里面长满了树木杂草，有的树高达十几米，可见它已休眠多年了。于是，古罗马人在山顶建造了一座朱庇特神庙，并将葡萄园一直扩建到山顶。

维苏威山脚下的两座古城，即庞贝城和埃尔科拉诺城，在古罗马人的统治下发展很快，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政中心。由于这里地处那不勒斯海湾，气候宜人，景色秀丽，许多古罗马的达官贵人在城里城外修建了豪华的别墅。旅馆、饭庄、商店和海边浴场更是遍布山丘和海滩，成了远近有名的游览城市。城里的居民人数激增，庞贝城有近两万五千人，埃尔科拉诺城也有一万余人，在当时来说，这已称得上是个繁华的都市了。

然而，维苏威火山这个令人恐怖的巨人，并没有沉睡不醒，公元 79 年它的一次大爆发，竟将这两座繁华一时的古城埋葬在厚厚的死灰中。

公元 79 年 8 月 24 日，庞贝城与往日一样，又迎来了一个酷夏的早晨。天蒙蒙亮，石铺的大道上，川流不息地行驶着从农村和海边来的满载蔬菜和鲜鱼的马车。不久，居民们起床了，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劳动。用现在的计时单位来说，大约在 8 点以后，大道上车马人流，顿时热闹起来。孩子们成群结伙地夹着书本上学校。男人们去面包坊、漂染坊劳动。妇女们上街买东西，圆形竞技场里有角斗士在格斗。大剧院里在上演一出歌剧。……呈现出一派和平安宁的景象。

就在这天中午，维苏威火山突然喷发，前后持续 8 天，火山灰毫不留情地将庞贝城和埃尔科拉诺城淹没，这两座城中近半数居民遇难。

当时罗马舰队的指挥官，以著 37 卷《自然史》而扬名的优秀学者老普林尼，也不幸遇难。他的侄子，年仅 16 岁的小普林尼亲眼目睹了维苏威火山爆发，并将所见所闻和他的叔叔老普林尼遇难的经过写信告诉历史学家塔西图斯，从而使后人对庞贝城的末日情景了如指掌。

这个故事，就围绕老普林尼和他的侄子小普林尼展开吧。

那天，老普林尼率领他的舰队停泊在那不勒斯湾彼岸的米西纳姆镇。这里离庞贝城约 20 公里。小普林尼和他的母亲也同舰队家属住在这个小镇上。上午，一家人一起去海边浴场游泳、晒太阳。中午回来吃过午饭，老普林尼就回书房办公了。下午一点钟左右，正在室外忙碌的小普林尼的母亲，突然发现天上云彩的形状和大小与往日不同，一个劲地往上升。她感到很奇怪，便匆匆忙忙地跑到书房，对老普林尼说：“天上云彩很怪，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了？”老普林尼立即起身，与大家一起爬上一块高地，观看天象。

只见维苏威火山上空升腾起不同寻常的云彩。开始时呈现出高大的柱状，并且迅速地向高空伸展着；后来，圆柱形的云彩向四周扩散，变成了像该地区生长的伞形松那样的形状。这朵树状黑云逐渐铺开，天空变得时亮时暗，但黑暗中也闪现出斑驳亮点。此刻天地都是灰蒙蒙一片，分不清哪是地面，哪是火山灰了。这种奇异的现象激起了老普林尼强烈的好奇心，他决心

去探明究竟。他命令为他准备一艘快艇，并问小普林尼是否愿意暗他同行。小普林尼很想去，但一想到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没做完，就只好留下来做功课了。

老普林尼刚要出门，有人给他送来老友巴苏斯的夫人莱克汀娜的一封求救信。莱克汀娜的别墅就坐落在维苏威火山脚下，她因灾祸临头而惊恐万分，因此，她恳求老普林尼派快艇去救她，从海上逃生。于是，老普林尼改变了原订计划。如果说，开始他还是出于好奇心，而此刻却是出于英雄主义了。他命令整个舰队启航。他自己也登上舰艇。他的目的不仅要营救莱克汀娜，而且要营救别的遇难者。因为沿海滨别墅如云。

舰队快接近目的地了。滚烫的火山灰不停地飘落在舰船上。有些水手害怕了，老普林尼却命令舰艇直接向危险的岸边驶去。他一边叫水手搭救水中的遇难者，一边以极其冷静的头脑，观察、记录着火山爆发的情景。

舰艇离火山越来越近，灼热的火山灰纷纷扬扬，夹杂着黑乎乎的岩石块，铺天盖地地落到舰上。这时，大海突然落潮，从火山脚退回来的巨大浪潮使舰艇无法接近海岸。几个水手向老普林尼哀求道：“我们还是掉转船头，返回米西纳姆基地吧。”老普林尼观察了一会儿，果断地说：“幸运在向勇敢者微笑，我们到斯塔比伊上岸，去看看我的老友庞朋尼安厄斯。”

斯塔比伊离庞贝城 5 公里，隔着一道海湾。老普林尼的舰队顺风行驶，黄昏时分就来到了斯塔比伊。庞朋尼安厄斯是个贵族，尽管斯塔比伊一时还没有危险，但他已将别墅里的行李送到一艘船上。一旦风向改变，立即上船逃离这儿。

老普林尼发现老友极度恐慌，便亲切地拥抱他，鼓励他，安慰他，让他振作起精神。接着，老普林尼神情自若地命令手下人准备好澡盆，让老友洗个澡，以消除惊恐的心情。

洗完澡，庞朋尼安厄斯坐下来与大家一块吃晚饭，情绪大有好转，谈笑风生，好像什么都不怕了。

但就在这时，维苏威火山出现几次猛烈的喷发。夜色愈依使火山喷出的火舌更为明显。庞朋尼厄斯又紧张起来。老普利尼安慰他，断言这不过是乡村人在放火烧他们遗弃的村庄。说完，老普林尼就回屋休息。很显然，他十分沉着镇静，不久就进入了梦乡。

过了一段时间，老普林尼所在的屋前，院落到处都覆盖着一层飞石和火山灰。如果再呆在屋里，也许就出不来了。于是，大伙儿把老普林尼叫醒，到户外一边观察火光，一边商讨哪种办法逃生更稳妥些：依靠房子作掩护吗？可房子在连续不断的震颤中已经摇摇欲坠。撤到空旷处吗？屋外有大量灼热的石块和火山灰溅落时时威胁人们的安全。真是进退两难。但他们权衡利弊后，还是决定撤到空旷处，因为那里相对安全些。有些人由于恐慌，急不可待地要往外跑。老普林尼叫住了他们，让他们用枕头盖住头部，再用头巾系牢，然后才走出去。这可是对付石雨，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最佳方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该天亮了，但天空仍是黑沉沉的，甚至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那不断升腾的火舌和闪光，时而划破那漆黑的天空。老普林尼提议到海边去，以弄清出海是否有危险。

来到海滩，一眼看去，波浪滔天，汹涌澎湃。一个浪头打过来，老普林尼躲闪不及，呛了两口冷水，跌倒在海滩上。就在这时，一股散发着强烈硫磺味的熔岩和火山灰从天而降，把人们熏得直往回跑。老普林尼挣扎着要站

起来，两个水手赶过来搀扶他，可他刚站立，又一股刺鼻的硫磺气体向他袭来，他立刻栽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了。

第二天，云开雾散，天空终于明亮了。人们在海滩下找到了老普林尼的尸体。尸体完整无缺，没有任何遭受外力的伤害的痕迹，仍呈倒地时的姿势，看上去更像一个熟睡的人而不像是个死者。很显然，他是被大量有毒气体呛死的。

留在米西纳姆镇的小普林尼和他的母亲，也处于危险之中。从半夜开始，大地就在强烈地颤抖。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但阳光显得昏暗无力。眼看房屋就要倒塌，小普林尼和母亲以及舰队的家属们都逃到户外的空旷处。空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人人心头都笼罩着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怖感。能够立足的地方越来越狭小。于是，他们决定离开小镇，向安全的地方逃去。其他人也跟随他们离开。对于这些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的人来说，别人的任何建议都比自己的主张更稳妥。

他们刚走出小镇不远，便驻足不前了。道路已被地震波毁坏了，到处都是波浪状的沙石包。他们的马车尽管行驶在平地上，却在剧烈地振动，即使用大石块压在上面，也无法使马车不颠翻倒下。大地在剧烈地抽搐颤抖，大海也在塌陷。海水被吸到大海深处，海滩向前扩展了许多。毫无疑问，这是地震引起了海啸。许多海洋动物因此留在了裸露的海滩上。天边的一团可怕的乌云火光闪闪，巨大的火光时而分成数条蛇状的火带，就像闪电一般，但远比闪电强烈得多。

火山灰开始下落了。小普林尼回头一望，只见一股浓烟像洪水般从后面涌来。他大吃一惊，喊道：“妈，赶紧逃吧，趁现在还能看得见，快点离开大路，不然，你会被人群踩死的！”

他们刚离开大路，眼前立刻就变成一片黑暗。这种黑暗不像是没有月亮的夜晚，也不像是乌云满天的夜晚，而是像房间里突然熄灯后那种黑暗，令人恐怖的黑暗！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到处是妇女们的号陶声，孩子们的尖叫声和男人们的呼喊声。父母在呼唤儿女，妻子在呼唤丈夫，只有在呼唤中才能辨别出自己的亲人在哪里。一些人在死亡面前惊恐而虔诚地祈求众神保佑，但更多的人认为，世界的末日已经降临，它将把众神和人间一起毁灭。

天空出现了一道微弱的亮光，但人们觉得这不像是黎明的曙光，而是有大火逼近了！火流在远远的地方落下来，于是，黑幕又降临了。厚厚的火山灰像下雨似地纷纷落下，人们不得不随时抖掉落在身上的灰尘，要不准会被它掩埋掉。

过了好一阵，黑幕终于像烟云一样慢慢消散了，白天真的回来了，与白天一起出现的还有太阳。不过，阳光昏暗，就像发生了日蚀似的，幸存者开始返回米西纳姆镇，但昔日的家园已面目全非，一切都被灰白色的火山灰深深地掩埋了，就好像天上突然下了一场奇怪的大雪。小普林尼和家人在希望和恐惧中度过了一个焦虑不安的夜晚，第二天终于逃出了这片恐怖的地区。

米西纳姆镇离维苏威火山有 20 公里，已经遭此厄运，由此可知，坐落在维苏威火山脚下的庞贝城和埃尔科拉诺城，又该是何种惨烈的情景了。

维苏威火山爆发的那一天，庞贝城里近 25000 居民，被地震震得东倒西歪，当他们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和看到头顶上空吐着火舌的浓烟在翻卷

时，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孩子们慌忙从学校逃往家中，父母们为寻找孩子，在街道上狂喊乱叫。人们为了躲避火山带来的灾难，在黑暗中拼命向南奔跑。

庞贝城的一大半人逃出了灾区，但至少有近万人丧生。他们有的为了寻找亲人走晚了一步；有的自信能历经大难而不死，不愿离开；有的被黄金珠宝迷住了心窍，舍不得离开。当火山灰遮天蔽日降落时，他们迷失了方向，被灼热的火山灰吞没了。

连续7天7夜，天空都飘洒着滚烫的熔岩块，落下的火山灰有几百万吨。最后一天，出现大量后来证实为有毒的蒸汽，形成一片毒云。毒云扩散了，杀死了所有还没有撤离的人。接着又爆发了山洪。洪水、泥浆、火山灰迅速混合成火山糊。这种炽热的糊状物质顷刻将庞贝城团团裹住，把它掩埋深达14米。

接着，火山糊又沿着山坡流向埃尔科拉诺，封住了该城的北面城墙。惊慌失措的居民有的冲向海滩，企图向大海逃命，有的钻进山腰弯洞中避难。但是，火山糊很快破城而入，冲毁房屋，侵入街道，形成滔滔巨浪向海滩奔泄。

大量的火山糊也把埃尔科拉诺城深埋达20米，躲在穹洞和海滩的人群都未能幸免于难。即使登上船只的，也因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将船只推回岸边，也被火山糊吞没。

这两座繁华的古城深埋在火山糊中，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它们到底在何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到了1592年，罗马人在维苏威火山脚下修筑水渠。工匠们挖出一些大理石碎片和古罗马钱币，但这也未引起人们注意。1689年，又有工匠发现几个刻有“庞贝”字样石建筑物碎片，这同样也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748年；一位名叫阿尔卡比埃尔的西班牙工程兵上校，他听说在庞贝和埃尔科拉诺地下通道里埋有宝藏，便去征得那不勒斯国王的同意，对庞贝遗址进行发掘。不久，庞贝城的圆形竞技场被挖出来了，场内还有几具死于格斗的角斗士遗体，看来，火山爆发时竞技场内正在进行格斗。尽管一千多年过去了，这几具尸体在火山灰的密封下依旧保存完好。

系统的挖掘工作始于1860年，到1960年才接近完成。至此，一座被火山灰封存了一千多年的庞贝古城，终于重见天日了。它的城墙长达4800米，城内有一座能容纳2万名观众的圆形竞技场，一座有几千座位的大剧院，还有几座神庙，两个广场和高大的城堡，以及3座公用大浴池、40家面包坊、20家染坊等，规模十分壮观。

在废墟中还挖掘出700多具遗体，他们临死时的姿态和场景，重现了这一震惊千古的人间惨剧：

在埃西斯女神庙里，发现多具祭司的遗体，这些祭司之所以逃到这里，是以为女神能保护他们不受火山的伤害。

在一所监狱的大门口发现一具骷髅，手里还抓着武器，看来这名全副武装的罗马士兵、在坚定不移地执行着上级命令，站岗站到最后一刻，而他的长官在恐慌中竟忘了让他下岗。

在一座别墅的地下室里，发现18具成年人、一个男孩和婴儿的尸体。别墅大门附近有两具骷髅，一个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和一大笔钱，另一个手里紧握着银制花瓶。很显然，这座别墅的主人带着一家人躲到地下室避难时，两

个仆人企图盗窃钱物后逃跑，但都没逃脱得了死亡。

在一个发掘点，人们找到一具手执宝剑，呈直立姿势的男子遗骸。他脚下踩着一堆金银珠宝。他一直在保护这堆财宝，因为他身边躺着 5 具尸体，这五个人可能是被他杀死的抢劫犯。

对埃尔科拉诺城的考古发掘，则始于两三百年前。

1670 年，人们在城郊的一座树林里打井，偶然发现了一个古代剧场的废墟，并在那里发掘出一些雕像和大理石装饰品。1738 年，喜爱古文物的波旁王朝国王卡洛鼓励人们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他们使用开凿垂直和水平隧道的办法深入到被埋没的埃尔科拉诺古城，挖掘出大量碑文、雕像、壁画等艺术珍品。从 1927 年起，意大利开始采用正规方法进行发掘，终于使这座深埋在地下一千多年的古城重新返回地面。

这座古城街道纵横，店堂林立，花园庭院、温泉别墅傲立其间。别墅内有客厅、卧室，重楼叠宇、曲径回廊……依稀可辨。公共浴室里，既有彩色大理石镶嵌的浴池，又有陈设讲究的休息厅、布局合理的冷热水循环系统。在美丽的海滨浴场，一条石砌的台阶自上而下把峭壁劈开，将街面与海滩沟通。整个城市，设计精巧，充分表现出埃尔科拉诺人的智慧与才干。

在近几年的发掘中，还发现了 140 余具罹难者尸体，当年火山爆发的惨景重又展现在人们眼前：一位母亲蜷曲着身子，护住挂在脖子上的婴儿，下面还接着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很显然，这位处于危险中的母亲正在全力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孩子。一个男人拼命地向后扬着脖子，嘴巴张得很大，肯定是在呼救。一名士兵活活闷死在沙滩边的泥层里，腰间还挂着佩剑。在一个港口穹洞里，有 12 具尸骨，很可能是为躲避火山糊而在这穹洞里藏身的一家人，他们准备搭船逃命，可是还没来得及上船，就被火山糊封埋在洞穴之中。

现在，这两座举世闻名的古城遗址已成为露天博物馆，每天的参观者达数万人之众。古城有沧桑巨变，令人感慨不已。在留言簿上，人们对火山爆发酿成的惨剧深表痛惜，对诸如老普林尼一类在巨大灾变中临危不惧、恪守职责、舍己救人的英雄大加赞赏，敬佩之情跃然纸上。（陈继忠）

最悲惨的劫机案

1985年11月23日，星期六，晚上8点零5分，埃及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机从雅典机场腾空而起，飞往开罗。

客机起飞十五分钟以后，空中小姐正忙于给乘客分送报纸杂志。突然，坐在前排第四号座位上的一个二十来岁的阿拉伯青年站了起来，从塑料包里抽出枪和手榴弹，与此同时，坐在他后面的一个青年也掏出了手枪，两人同时大喝：“所有的人都不许动！飞机被我们接管了！”

接着，这两个人动作非常利索地从口袋里掏出假面具，戴在脸上。这时，第三个阿拉伯青年迅速冲进驾驶室，左手举着开了盖的手榴弹，右手握着打开了保险的左轮手枪，顶着驾驶员的头说：“飞机被我们劫持了，我命令你飞往利比亚！”

“不行，没有那么多燃料，飞不到利比亚就会坠入大海的。”飞行员镇定地回答，又补充道，“飞往雅典或是开罗是可以的，要不就是意大利。”

劫机者恶狠狠地说：“那么就飞往马耳他！告诉你，只要你稍敢违抗，我首先崩掉你的脑袋！”

飞行员只好掉转机头向西飞去。

这时，又有另外两名劫机者从不同的座位上站起来，凶狠地命令乘客交出每个人的护照。没有人敢违抗，所有的人都默默无声地执行他们的命令。当一名劫机者来到一位站起来的男乘客面前伸手要护照时，男人从怀里掏出来的不是护照，而是手枪，对着劫机者就是一枪。那家伙应声倒下。他又向其他劫机者开枪射击，但是寡不敌众，劫机者的子弹从不同方向朝他射来，这位男子以及周围的乘客、空中小姐纷纷倒在血泊中。此人原来是客机上负责安全的埃及保卫人员。“不许乱动！”劫机者狂吼着，接着又朝飞机的舱顶开了两枪，击穿了顶部。

扩音器中传出了空中小姐颤抖的音：“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坐好，不要乱动，他们不想伤害我们中的任何人。”

此时，客机因为机舱顶部的子弹孔漏气，压力减低，有点失去控制，一下子从三万五千英尺高空降到一万四千英尺。驾驶员赶紧同马耳他的卢加机场联系，请求紧急降落。

客机经过2小时11分钟的飞行，于22时16分在卢加机场降落。正当乘客和机组人员稍稍松了一口气，以为灾难已经过去时，却不料劫机者并没有放过他们。飞机在卢加机场刚刚停稳，劫机者就同机场当局进行了联系，他们要求加油，并要机场派一名医生来，说机上有死伤者。

机场当局知道事关重大，拒绝了劫机者加油的要求，但同意派医生登机。几分钟以后，一名医生登上客机，在驾驶员的帮助下，又抬又扶，一下子送下了七名死伤者，其中包括在枪战中被打死的一名劫机者，一名埃及保安人员和受伤的两名乘客以及两名空中小姐。

驾驶员返回客机后，劫机者头目拿下乘客的护照，点了七名菲律宾女舞蹈家和四名埃及妇女的名字，高声说：“我们是朋友，你们自由了，请下飞机罢！”这些女人由于惊喜而兴奋得热泪盈眶，带上自己的行李下飞机去了。其他的乘客则满怀期待地注视着劫机头目一张张地翻看护照。

“索菲·埃迪特。”

一位长着亚麻色头发的以色列姑娘应声站起来，看上去不过二十四、五

岁。她激动地收拾自己的随身物品，踉踉跄跄地走到机舱门口，以为自由就在眼前了。可是她哪里想到，正当她的脚踏上下飞机的扶梯，劫机头目却对着她的后背就是一枪。姑娘大叫一声栽倒，可是她并没有死，仍挣扎着往下爬。劫机头目冲出机舱又给了她几枪。姑娘不动了。

见此情形，所有的乘客都呆若木鸡。

劫机者头目又点了一位以色列姑娘的名：“诺娜·肯斯尔”。

这位姑娘最多只有二十三岁，秀丽的面孔，窈窕的身材，却缩在座位上，吓得浑身发抖，死活不肯出来。两名劫机者走上前去，硬把她拖了出来，然后对准她的脑袋开了一枪。姑娘当即毙命。歹徒们叫几位乘客把姑娘的尸体拖出机舱，尸体沿着扶梯骨碌碌滚下去，景象惨不忍睹。乘客们个个敢怒不敢言。

劫机头目得意地举着手枪，舞着手榴弹，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这明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女乘客们都双手掩面，悲叹哭泣。男乘客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

十五分钟以后，劫机头目又叫起一位男乘客，这是一个28岁的美国生物学家，他刚刚结束在中东的休假，准备返回美国。他的头发有些蓬乱，但态度镇静，他默然起立，微微弓着腰走向门口。劫机头目持枪跟在他后面。这个年轻人可谓精明之至，就在那家伙对准他后脑开枪的一刹那间，他就势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虽然血流满面，其实只不过是子弹擦伤了头皮。当他被人抬着扔出机舱之后，头脑仍是清醒的。他等了一会儿，感觉劫机者回到机舱里去了，这才悄悄地爬起来，然后撒腿狂奔，终于捡回一条性命。

二十分钟以后，又有一名美国妇女被叫出来，她可没有刚才那位幸运，脑袋被子弹打得开了花，也被扔出机舱。这时，歹徒们才发现刚才扔下去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为此，他们又叫出一名美国妇女，这位妇女也很顽强，她坚决不出来，并与前来揪她的歹徒扭打。最后，劫机者将她反绑起来，强迫她跪在地上，对着她的后脑打了一枪，子弹从她的右眼穿出。这位妇女被扔出舱外时，面部先着地，侥幸的是她居然又没死。

此时已是11月24日凌晨2时20分。

劫机者通过无线电向机场指挥塔咆哮：“我们已经杀了五个人！一个半小时内再不给加油，我们还要继续杀人！”

马耳他政府得知被劫的埃及客机降落在卢加机场后，马上同有关国家进行了联系。埃及政府明确要求马耳他政府不要给客机加油，不要让客机离开马耳他。他们担心客机一旦离开马耳他，就无法对它再加以控制。希腊外长打电报给马耳他政府，表示“无条件支持埃及关于不给加油、不让客机离开的要求”。美国、英国和意大利也表示支持这种立场。巴解组织领导人则发表声明，谴责劫机者的行径。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耳他政府总理邦尼奇赶到卢加机场，开始同劫机者进行谈判。邦尼奇通过机场指挥塔敦促劫机者向马耳他保安部队投降，“马耳他政府同情阿拉伯事业，你们会受到公正的对待和谅解的。”但劫机者除了一再要求给飞机加油之外，不做任何回答，使得谈判难以进行下去。

马耳他总理在与劫机者最后一次对话中告诉他们：“即使让你们飞离了马耳他，你们在空中也会受到拦截，被迫降到其它地方。那样的话，情况就更糟了。”

“要是我们在空中受到拦截，我们就炸掉客机！”劫机者态度非常坚决。

在马耳他总理与劫机者进行谈判的同时，美国、希腊、以色列、埃及、利比亚和巴解组织官员纷纷赶到机场，试图从中斡旋，使人质获释。但是，劫机者不愿同任何人对话，甚至与巴解组织代表也不愿对话，只提出要利比亚驻马耳他大使与他们对话。但利比亚大使只是在机场指挥塔通过无线电对劫机者讲了利比亚政府的态度：由于发生了流血事件，利比亚政府不愿接受这架客机。然后这位大使就乘飞机飞回利比亚去了。

中午时分，劫机者提出要往客机上送午饭，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送饭者同时捎去了马耳他政府的口信：请劫机者考虑释放客机上的九名巴勒但儿童和一名加拿大婴儿，并准许机场人员抬走被他们扔在客机外面的死伤乘客。

劫机者拒绝考虑这些要求，扬言：“谁敢靠近客机就向谁开枪！”“谁要袭击我们，我们就炸掉客机！”

面对这种情况，马耳他总理决定：“决不能向恐怖主义屈服。在残暴、不讲人道的劫机歹徒面前，决不能给人们留下马耳他是软弱的印象。这件事该由我们的保安部队来处理了，现在看来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突袭，尽可能多地解救入质。”

这时，埃及方面传来消息：埃及政府决定对客机采取突袭行动，这场危机将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征得马耳他政府同意之后，埃及军队的两架 C—130 运输机在卢加机场的另一头降落，运来了 25 名埃及突击队员和有关装备。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一得知客机被劫持的情报便十分恼火。六个星期前的“阿基利·劳罗”号游船被劫持事件，曾搅得他彻夜不眠。所以他一听说客机被劫的消息，就马上指示正要出访西欧的外交部长马吉德推迟动身日期，与利比亚进行交涉。

马吉德立刻打电话给利比亚外长奥贝迪：“我们认为贵国是这次劫机事件的后台。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我不能接受你这种指责。”对方回答，“不过我需要进一步弄清情况，请你十五分钟以后再来电。”着召开紧急会议，到会者有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武装部队高级军官和情报官员。会上，情报官员介绍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

会议一直进行了九十分钟，最后穆巴拉克总统亲自拍板决定对客机进行突袭，他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严惩这帮恐怖分子。他命令埃及突击队司令卡迈勒·阿蒂亚少将全面负责实施突袭计划，并指示将埃及的这一决定通告美国。

美国立刻表示坚决支持。位于地中海美国第六舰队的“珊瑚海”号航空母舰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严密监视地中海上空的动向，同时派出数架 F—2 预警雷达飞机进驻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北约空军基地，以防运送突击队的埃及运输机在飞往马耳他途中受到利比亚飞机阻截时紧急出动。

下午 6 时 45 分，卢加机场指挥塔的扩音器里，突然传来客机上埃及驾驶员急促的声音：“客机机舱的前后门里面都锁着，要进客机只能通过货舱门。”

原来，这位具有十多年飞行经验的驾驶员意识到马耳他政府或埃及政府决不会这样坐等下去的，预感到一场攻击就在眼前，他乘监视他的劫机头目上厕所之机，及时地送来这一极为重要的情报。这时，突袭行动已准备就绪，只待天黑下手。

晚上 8 点 15 分，穆巴拉克正式下达了进行突袭的命令。

五分钟以后，卢加机场的灯光忽然熄灭，机场顿时一片漆黑。突袭行动开始，12名埃及突袭队员分四路向客机上的货舱门和机翼上的三个紧急出口冲去。一路突击队员冲到货舱门口，弄开了货舱门，小心翼翼地爬了进去。

这时，驾驶室里仪表盘上的一个小黄灯亮了，驾驶员意识到货舱门已被人弄开，为了不使劫机头目发现，他关掉了那个小黄灯，同时，为了转移劫机头目的注意力，主动与他攀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我呀，肯定就投降……”

谁知货舱里的声音还是惊动了劫机者。那个头目转身从驾驶室冲入客舱，投出了手中的那颗手榴弹，其他劫机者也跟着投出了两颗手榴弹。随着几声猛烈的爆炸，机舱里起了火，灯光熄灭，浓烟一片。劫机者接着又是一阵射击，乘客们在手榴弹爆炸和手枪的射击中纷纷倒下，幸存者急忙趴在地上，但又被浓烟呛得透不过气，当时就有许多乘客被浓烟窒息而死。

这时，劫机头目忽然想起了驾驶员，他返身冲回驾驶室，对着驾驶员脑袋就是一枪。谁知驾驶员早有防备，脑袋一歪，子弹擦着头皮而过。随手举起已准备好的斧头，转身就是一斧！劫机头目应声倒下。

从货舱门攻入的突击队员上尉穆斯塔德·海克莱维被劫机者投出的手榴弹炸断了一条腿，但从三个紧急出口攻入的突击队员迅速向劫机者射击，枪战进行了一分多钟。几名劫机者先后中弹身亡，但乘客中也有人死伤。

接着，突击队员搜索幸存的乘客，帮助他们撤离客机。

整个解救人质的突袭行动持续了约十分多钟，随后埃及突击队员乘飞机回国。可是卢加机场上所遗留下来的一大摊事情却忙坏了马耳他医护人员。在飞机被劫持的24小时里，共有60人死亡，28人受伤，成为有史以来最悲惨的劫机事件。

（孙晓）

凯撒遇刺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 44 年 3 月 20 日罗马帝国的罗马城。这座城市就是今天的意大利首都罗马。这一天，城内宽广的人民大会广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连许多抱着孩子的妇女也参加了。人群中充满着悲哀、紧张和愤怒的情绪。就在五天前，即 3 月 15 日，罗马的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官凯撒，被一帮共和派贵族杀死了。

罗马执政官安东尼，站在广场高高的演讲坛上，用嘶哑的喉咙，向坛下的人群叫喊着，还不时地挥舞拳头，竭力争取感动坛下的听众。罗马共和国的最高官职由人民大会选举，每期选出两名执政官，任期 1 年。安东尼执政官现在是作为死者的好朋友以双重身份来向人民发表演说的。他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人民对凯撒的同情以及对共和派贵族的憎恨。

在安东尼脚下搁着凯撒的尸体。尸体用一件大红斗篷裹着，下面满是被匕首和短剑划破的洞。虽然斗篷是红色的，但是还看得出上面一片片的紫褐色血迹。

安东尼声泪俱下地说：“公民们，那帮阴谋者为了替自己卑劣的谋杀行为辩护，硬把凯撒说成暴君。还说什么他们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杀死凯撒的。但是，我现在要用铁一般的事实向你们证明，凯撒绝不是一个暴君，他对人民是仁慈的，甚至是非常仁慈的！下面，我把凯撒的遗嘱念一遍，你们就会明白了！”

凯撒的遗嘱中有两条，最使广场上的人群激动。一条是，凯撒吩咐从自己的财产中提出一部分来，分给罗马最贫苦的公民。另一条是，凯撒把自己在台伯河对岸的一个公园献出来，供给罗马公民游览。

安东尼在念完遗嘱后，又继续讲道：“公民们！难道这样一个生前为我们伟大的罗马立下了不朽功勋，死后又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一笔遗产的人是一个暴君吗？”人们高呼着说：“不是，凯撒决不是暴君！”安东尼说：“是的，凯撒确实不是暴君，他是罗马的英雄！但是，他却死了！他不是死于疾病，也不是死于衰老，更不是死于战争。而是死在罗马，死在元老院里，死在你们身旁的那帮阴谋者手里！国外的敌人没有能够伤害他，可是那些自称高尚的罗马贵族却杀死了他！”

在这里，安东尼特别提到了元老院。元老院是什么？在当时，元老院是古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它有权监督全部国家生活。元老院中的元老一般有 300 名，绝大部分是以前任过职的高级官员和贵族。元老院参与了刺杀凯撒的阴谋。

安东尼的话把人群的狂怒引到了最高点。震天动地的“报仇！报仇！”的呼喊声响彻广场。不多一会儿，激怒的人群团团围住了凯撒的血迹斑斑的尸体，他们要按罗马的风俗为死者举行火葬。烈焰腾腾，火光闪闪，长长的火舌吞没了凯撒的尸体。不多一会儿就变成了灰烬。

一位脸上带着伤疤的老兵喊道：“公民们，我们现在应该去惩罚凶手啦！”狂怒的人们响应了老兵的号召，顺手抄起凡能拿到手的东西，高声呼叫着，寻找阴谋者报仇去了。

这个古罗马的独裁者的被杀，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骚动呢？今天常常被称为“凯撒大帝”的人，那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凯撒为什么遇刺身亡的？这个故事就得从头讲起罗。

凯撒出身于罗马的名门贵族，年轻时就渴望取得最高权力。公元前 60 年，凯撒和庞培、克拉苏结成了联盟，这就是罗马历史上有名的“三头执政。”庞培和克拉苏曾经以残酷镇压斯巴达克起义而闻名。第二年，凯撒被选为执政官。又过了一年，凯撒在庞培的支持下，就任高卢行省的总督。

凯撒到达内高卢后，立即将势力渗入外高卢。他一方面以武力讨伐，一方面唆使高卢各部落自相残杀。不到 10 年时间，他共征服了 300 个部落，占领了 800 多个城市，歼灭和俘虏了 200 万人，使高卢全境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

凯撒的胜利，引起了庞培的嫉妒。这时克拉苏已经死去，庞培利用独任执政官的身份，颁布法律，不让凯撒继续担任高卢总督。于是，凯撒和庞培的联盟分裂了。

公元前 49 年初，凯撒返师意大利，庞培逃离罗马。第二年的夏天，凯撒和庞培在希腊决战。凯撒击败了比他多一倍兵力的庞培。庞培乘船逃到埃及，但一上岸就被杀死。

三年后，凯撒胜利返回意大利。罗马举行了空前的凯旋仪式。还在圆形剧场里安排了残酷的娱乐：几千角斗士的角斗和大规模的斗兽。

人民大会和元老院赠与凯撒无比荣誉的称号：“祖国之父。”凯撒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终身保民官以及为期 10 年的执政官。在广场上、神庙里树起了他的雕像；他的头像被铸到钱币上。他的身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令规定，他坐在黄金象牙的宝座上处理公务。罗马的每个城市，都必须在他历次取得胜利的日期举行庆典。最高长官在就职时，就该宣誓决不反对凯撒的任何命令。元老院成员扩大到 900 人，这些成员全是拥护他的……这一切，都是罗马历史上没有过的，它意味着罗马的共和制度已经遭到完全的失败。凯撒成了一个不挂名的皇帝，贵族共和制度实际上已经垮台了。

凯撒是靠平民支持上台的，可是他一掌握了最高权力，刺背弃了平民：大量减少免费获得面包的公民人数，取缔了工匠行会组织。此外，他还准备了一次新的大规模的远征。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他自己的灭亡。

公元前 44 年 2 月 15 日，这一天是罗马的传统节日——“罗泼凯利亚”节。这是纪念传说中的一只母狼的。据说，古代罗马城的建造者是一对双生兄弟，他们是靠吃母狼“罗泼凯利亚”的奶长大的。所以后来的罗马人每年都纪念这只母狼。

凯撒坐在椅子上，穿着执政官的紫红袍，观看这次盛大的年会。这时候，另一个执政官安东尼拿着一顶皇冠走上来，给凯撒戴到头上，说：“人民要求我给皇帝戴上这顶皇冠。”凯撒立刻扳起面孔，严厉地回答说：“罗马人没有皇帝，只有神！”说完，就坚决地取下皇冠，让人把它送到丘比特神庙去。

皇冠的事件过去了。但是对于凯撒想当皇帝的议论和猜疑却越来越多。人们说，凯撒并不是不想当皇帝，他只是暂时不敢当皇帝。凯撒的反对者——元老贵族派看到有机可乘，就借着“反对独裁、维护共和”拉拢了一批人，阴谋对付凯撒。

确实，凯撒最近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荣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颂。他被称为“祖国之父”、“解放者”、“最高统帅”、“无敌之神”。罗马人为凯撒建立了神庙，还把凯撒的塑像供奉在神庙里。

在这些歌颂者中间，多数人是出于对凯撒的爱戴。少数人却别有用心，

他们希望这些不切实际的称号被人民所厌恶，使凯撒最终脱离人民而遭到失败。不幸的是，凯撒接受了大多数的吹牛拍马，因此，更给了阴谋者以可乘之机。

阴谋者集团由 60 名元老组成。它的实际组织者是卡西乌斯，这是一个气量狭窄，但又野心勃勃的人。为了争取舆论支持，卡西乌斯又去动员布鲁图参加他的阴谋集团。

布鲁图先前属于元老派，他曾追随庞培跟凯撒打过仗。法尔萨利亚战役后，布鲁图逃走了。但是凯撒在得知他的下落后，就写了封信给他。这使布鲁图很感动，于是投奔了凯撒。公元前 44 年，他还当上了罗马的行政长官。

这样一个人，起初是不愿意参加阴谋集团的。但是卡西乌斯自有一套说服他的办法。在反对罗马古代的一个暴君时，布鲁图的一个远祖是第一个抽出宝剑来的人，因而创建了罗马共和国。为了纪念这一功绩，在卡匹托尔还立有他的铜像。铜像手持宝剑，严肃而坚决。卡西乌斯鼓励布鲁图说：“现在凯撒试图恢复专制独裁统治，难道你不应该仿效祖先，抽出宝剑来吗？”卡西乌斯的话打动了布鲁图的心。他毅然参加了阴谋集团，并且成了为首分子。

谋杀凯撒的行动在加速进行，他们最后确定：在 3 月 15 日召开元老院会议时动手。

但是，时间一长，就有些风声泄露出去了。几天来，罗马城内谣言四起，气氛紧张。有的朋友劝凯撒多多提防，说目前外面有很多不吉祥的预兆，一些占卜者也向他提出了警告。然而凯撒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他坚信自己的权威和命运。

3 月 14 日晚上，阴谋者们聚集在卡西乌斯的家里，详细地讨论了第二天的行动计划。他们知道，15 日，凯撒会像往常一样，不带武器来到元老院，而没参加阴谋集团的元老们也不会带武器的。他们自己则每人在身上暗藏匕首、短刀等武器一见信号立即行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们还在会议厅旁边的房间里，埋伏了一队武装人员，在必要时可以出来助战。另外如果安东尼伴随凯撒一起来，那么就派人假装和他谈话把他拦在门外。

就在同一天晚上，凯撒还到骑兵统帅雷比图的家里去赴宴。宴会上，朋友们又劝告凯撒，叫他小心些，他们列举了许多“不祥的预兆”。凯撒虽然表面上装得满不在乎，可是心里却感到不安了。

回到家里，凯撒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突然之间，走廊里“哗啦”一声，凯撒急忙起身，出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塑像倒在地上摔碎了。这使凯撒更加闷闷不乐。后来才知道，这是仆人为了警告凯撒而故意摔坏的。

第二天清晨，凯撒的妻子从噩梦中惊醒。她告诉凯撒说，她梦见凯撒的雕像上有许多孔，而且还往外喷着鲜血，有不少人在用这些血洗手。凯撒安慰妻子说，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缘故，不必大惊小怪。但是妻子却说什么也不让凯撒去元老院开会了。在她的哀求下，再加上一夜的疲劳，凯撒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所以他这一天不准备出门了。

元老院的议事厅里挤满了元老。阴谋者们暗藏着武器在等待凯撒的到来。但是消息传来说，凯撒因为身体不舒适，今天不来了。这对阴谋者来说，真是当头一棒。他们想，凯撒可能是真的身体不好，但也可能是知道了这件阴谋。但无论如何，事情再也不能拖延了。否则，阴谋就可能败露。于是，阴谋者们派了一个人去请凯撒。

凯撒终于被来人的花言巧语说服了。他披着那件日常穿的红色斗篷来到了元老院。

凯撒刚走到元老院的门口，就有一个陌生人拦住了他。陌生人把一个纸卷塞到凯撒的手里，并且恳求凯撒必须在这儿打开来看。他说：“这事和你关系很大，请立刻就看。”可是凯撒却回答说：“和我个人关系大的事就应该最后办理。”说完就毫不介意地把纸卷放进了口袋。凯撒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一封揭发即将刺杀他的阴谋的告密信！

陪伴凯撒的安东尼走到元老院议事厅的门口时，就被一个元老拦住了，并和他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

凯撒一个人走进了议事厅，坐到一把安乐椅上。阴谋者们跟了进来，把凯撒团团围住。有人向凯撒诉说自己不幸的遭遇；有人要求凯撒恩赐田产；还有一个元老要求赦免他的被放逐的兄弟，他甚至跪了下来，苦苦哀求。其他人也纷纷挤上来，有的吻凯撒的手，有的吻凯撒的胸，要求凯撒答应。

这种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凯撒的疑心。凯撒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这时候，一个阴谋者扯了扯自己的衣角，发出了行动的信号。

立刻，站在凯撒背后的一个人迅速地从衣服下面抽出剑，一剑刺了凯撒的肩膀。凯撒转过身来，喊道：“你，你这是干什么！”一把握住了剑柄。就在这时，另一个人用匕首刺中了凯撒的头颈。随着一声惨叫，凯撒的胸脯上又挨了重重的一击。阴谋者们一拥而上，向着凯撒猛刺。

受了重伤的凯撒环顾四周，希望有个友好的人来解救他。当发现在刀光剑影中站着手执利刃的布鲁图时，凯撒绝望地大叫了一声：“布鲁图，连你也这样了！”说完，他不再挣扎，用大红的斗篷裹住了脸跌倒了。就这样，凯撒带着 23 处伤痕死去了。这时他才 56 岁。

元老院里顿时乱作一团。屋里的人吓得逃得到了演讲台上，屋外的人也纷纷逃到街上去了。安东尼一看情况不妙，就立刻逃出去躲了起来。阴谋者们挥舞着血迹斑斑的刀剑，高呼着。“暴君死啦，罗马自由啦！”随即，他们冲到街上游行去了。

阴谋者们本来以为人民会感谢他们“杀死了暴君，解放了罗马”，会把他们称为“共和国的救星”的。可是情况完全相反，全城除了惊恐的气氛之外，就是一片沉默。

尽管布鲁图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不是我不爱凯撒，而是我更爱罗马，”但是人民还是拒不拥护他们。因为人民虽然对凯撒的某些政策不满，可是他们更不愿意恢复腐朽的贵族寡头统治。

人民的态度迫使寡头集团让步，他们同意不称凯撒为暴君；让安东尼办理遗留问题；并且在 3 月 20 日为凯撒举行火葬。

3 月 20 日这天，正如这个故事开头看到的那样，安东尼发表了演讲。他利用自己的演说天才，利用了凯撒在平民中的威望，热烈地赞颂了凯撒，猛烈地抨击了阴谋者，发起了一场反对元老贵族的暴动。

凯撒死了，但是贵族的寡头共和统治却恢复不起来了。凯撒为未来的罗马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罗马又前进了一大步。凯撒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公元前那样的时代里，他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贺兰）

荆轲刺秦王

经过五百多年的诸侯混战，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后期，中国大地上逐渐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局面，在激烈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中，地处函谷关以西的秦国的力量逐渐占据了优势，并开始实施它统一中国的雄图大略。

公元前 316 年，秦国灭掉了巴、蜀两个小国，势力从陕西一带发展到四川。公元前 256 年，秦国灭了西周，7 年后又灭了东周，函谷关以西已成了秦国的一统天下。公元前 246 年，嬴政登上了秦王的宝座，更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不断向东扩展，攻击函谷关以东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山东六国”。

首先受到威胁的，是地理位置紧邻秦国的韩、赵、魏三国。因为秦国采取的策略，叫做“远交近攻”，也就是说，对距离它较远的齐国和楚国，采取友好交往的办法；而对靠近的邻国，采取武力侵略和占领的办法。这样既破坏了“山东六国”共同抗秦的统一战线，又便于它的军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君臣天天提心吊胆。打吧，韩国远不是秦国的对手，投降吧，又不甘心。后来，他们发现秦国的君主很喜欢搞大规模的工程，就想出了一个计谋，就是设法用一个浩大的工程绊住秦国的手脚，大量耗费秦国的人力和财力，使秦国无力再向东扩展，韩国也就可以避免灭亡的危机了。于是韩国把一位名叫郑国的水利专家派往秦国，向秦王建议，在陕西泾阳境内开凿一条灌溉渠，把西边的泾阳水向东引进洛水，这样可以使秦国的大片盐碱地得到改良，土地得到灌溉。秦王觉得郑国说得有道理，接受了这个建议，投入大量人力和物资来开挖这条渠。工程进展很顺利，但是郑国的身份和韩国的用意却暴露了。秦国的官员逮捕了郑国。在审讯时，郑国申诉说：“一开始我是作为韩国的间谍到秦国来的。但是，如果这条灌溉渠能够修成，对秦国的好处不但很大，而且是长远的。”秦王权衡利弊，作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让郑国继续主持修渠的工作。

这条长达三百余里的灌溉渠修成后，灌溉面积达四万余顷，大大增强了秦国农业抵抗旱、涝灾害的能力，提高了粮食产量，使关中平原成为秦国的一个大粮仓。秦国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经济实力也由此得到一个大发展，为它后来吞并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了纪念这位水利专家，这条灌溉渠被命名为“郑国渠”。

而韩国却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公元前 233 年，韩王在秦国的军事压力下，向秦国称臣。但是秦国还是在公元前 230 年攻下了韩国的首都，俘虏了韩王。接着，秦国又用反间计，使赵王杀害了赵国的名将李牧，夺了名将司马尚的军权，自己削弱了自己的军力。公元前 228 年，秦国灭掉了赵国。赵公子嘉率领残兵败将逃到北方的代地，自立为代王，依靠与燕国联合，苟延残喘。

韩、赵灭亡后，燕国便直接面临着秦国这个强国了。燕国在“山东六国”中，原来就是最弱小的，这时就更加惶惶不可终日。燕国的太子丹，决心同秦国作最后的拼搏。

太子丹同秦王嬴政有过一段友好的交往。当时太子丹在赵国作人质，以表示燕国同赵国交好的诚意；而嬴政的父亲也作为秦国的人质住在赵国，嬴政就是在赵国出生的。所以太子丹和嬴政当时相处得很不错。后来嬴政当上

了秦王，太子丹又被燕国派往秦国充当人质。这时嬴政就完全忘掉了同太子丹过去的友谊，对太子丹的态度很恶劣。太子丹受不了虐待，更怨恨嬴政的薄情，便在公元前 232 年逃回了燕国，从此暗暗地招兵买马，搜罗天下的英雄好汉，准备对付秦国。太子丹厚待英雄的名声传出以后，各国的一些亡命之徒，纷纷投奔到他这里来，这样一共招募了二千多人。

眼看战火就要燃烧到燕国的土地上了，太子丹找他的老师鞠武商议对策。鞠武劝太子丹不要因为秦王待他无礼，就主动去触犯秦国，要他慢慢想办法。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秦国的将军樊于期，因为得罪了秦王，逃到燕国投奔太子丹。太子丹收留了他，并且热情地款待他。鞠武知道后，连忙去劝太子丹不要收留樊于期，因为秦国早已对燕国虎视眈眈，如若抓住这个作为借口，秦国一定会马上来攻打燕国的。鞠武为太子丹出谋划策，让他同山东各国加强联络，同时把樊于期送往匈奴，并同匈奴联合，一起进攻秦国，认为这样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燕太子丹说：“这个计谋虽然好，可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办到，只怕来不及了。另外，樊于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靠我们，我们因为害怕秦国，就不收留他，太对不起人！”鞠武叹息地说：“做危险的事而希望平安，用闯祸来求福，见识短浅而又碰上怨恨很深的敌人，不顾国家的利害而只顾一个人的友情，这都是足以断送一个国家的呀！更何况我们面临的是强大的秦国啊！”

太子丹坚持要鞠武另想对付秦国的办法。鞠武只好向他推荐田光，说田光有勇有谋，是一个能担当大事的人。太子丹大喜，马上请鞠武为他做介绍。在鞠武的盛情邀请下，田光来到王宫见太子丹。太子丹很恭敬地接待他，倒退着为他引路，跪着侍奉他入席，又命左右的人都退出，才向田光说道：“燕国同秦国是势不两立的，请先生多留意这方面的事情！”

田光感慨地说：“我听说骏马在最强壮的时候，一天能跑一千里；但到衰老之后，连一般的劣马都跑不过了。你以为我正在壮年，其实我已经衰老了，不能为你的国家谋划大事了。不过，我有一位好朋友叫荆轲，可以为你效劳！”

太子丹马上请田光为他介绍荆轲。田光答应了。田光告辞时，太子丹直把他送到门口，又叮嘱地说：“我同你说的，都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万万不可泄露！”

田光点头笑着答道：“好！”

田光来到了荆轲的住处，对他说：“我们俩是好朋友，燕国没有人不知道。现在太子丹以国家大事托付我，而我精力已经衰退了，不足以担当这个重任了，所以我向太子丹推荐了你。希望你能去见太子丹。”

荆轲不好意思推托，就答应了。

田光又说：“太子丹一再叮嘱我不要泄漏这件事，说明他对我不够信任。一个人的行为不能为别人所信任，这个人是不能算英雄的。请你去告诉太子丹，就说田光已经死了。再也不会泄漏太子的机密了。”说完，田光就拔剑自刎了。

田光一死，荆轲也就无法改变他对田光许下的诺言了。他去见太子丹，转达了田光的遗言。太子丹放声大哭，说：“我叮嘱田先生不要把事情讲出去，是希望大事能够成功，怎么会是希望田先生自杀呢！”

荆轲入座之后，太子丹详细地向荆轲说明了燕国所面临的局势，并且告

诉荆轲，他希望能有一个勇士，充当燕国的使者进入秦王宫，设法接近秦王，劫持住秦王，迫使他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如果秦王答应了，秦国的力量就会大大削弱；如果秦王不答应，干脆就杀掉他！这样秦国就会发生混乱，山东各国就可以乘机击败秦国。太子丹希望用这样的办法，来挽救燕国，摆脱危机。

荆轲听了这番话，沉思了很久很久，才说：“这件事太重大了！我的能力不够，恐怕担当不起这样的重任。”

太子丹跪下，恳求荆轲，希望他能够承当这件重任。荆轲终于答应了。

荆轲的祖先是齐国人，是后来移居燕国的。荆轲喜爱读书和剑术，有勇有谋，为人深沉，从不为小事同别人争斗，即使受了侮辱，也是自己悄悄离开。在燕国，他同一个叫高渐离的乐师很要好，常常一块在闹市中喝酒。高渐离演奏一种叫“筑”的乐器，荆轲慷慨高歌，有时又一块放声大笑，完全是旁若无人的样子。然而了解荆轲的人，都很敬重他。

燕太子丹把荆轲尊为上等宾客，让他住最豪华的房屋，每天去看望他，用最好的美酒美食款待他。凡是荆轲想要的，太子丹都尽力满足他。有一次，太子丹同荆轲在池边散步，荆轲抬了块瓦片去掷池中的乌龟，太子丹马上叫人送来了金弹子。他们一块乘千里马出去玩，荆轲随口讲了一句：“听说千里马的肝味道很好！”太子丹便杀了千里马，用马肝做菜给荆轲吃。在一次宴会上，太子丹让美人鼓琴助兴，荆轲称赞说：“美人的手真漂亮！”太子丹便把美人的手斩下来，用玉盘送给荆轲。荆轲常常说：“太子对我真是太好了！”

秦国灭亡赵国后，大军已经逼近燕国南边的国界。可是荆轲仍然没有行动的意思。太子丹有些着急了，便对荆轲说：“秦国的军队早晚之间就要渡过易水，攻入燕国。我虽然很想长久地侍奉你，只怕也办不到了！”

荆轲答道：“太子你不来，我也要去拜见你了。只是，如果没有能够让秦王相信我的东西，我就是去了，也无法接近秦王，更达不到我们的目的。现在有两件东西，能够取得秦王的信任。一是樊于期将军的头，秦王曾经悬赏千金和一万户的封地要得到它；二是燕国督亢的领土，是秦王垂涎已久的了。如果能把这两件东西带去，秦王一定会很高兴地接见我，我就有机会报答太子的恩情了。”

太子丹说：“樊将军穷途末路来投奔我，我不忍心为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他。希望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荆轲知道太子丹不忍心下手，就悄悄去见樊于期，对他说：“秦王对将军可以说残忍之极，你的父母亲戚都被秦王杀了，现在秦王还悬赏千金和万户封地要你的头，你打算怎么办呢？”

樊于期仰天长叹，流着泪说：“我每想到这些，都痛入骨髓，只恨没有报仇的计策啊！”

荆轲说：“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燕国的危机，报将军的深仇大恨，你想知道不想知道？”

樊于期急切地问：“什么办法？”

荆轲于是说出了自己的计策。樊于期以手扼腕，咬牙切齿他说：“这正是我日日夜夜铭心刻骨的啊！今天到底有了报仇的办法！”于是毅然拔剑自杀了。

太子丹听到这个消息，急忙奔来，伏在樊于期的尸体上大哭。痛哭之后，

他也只好按荆轲的办法，把樊于期的头放在盒子里封好。太子丹又以百金之价，从赵国人手中买下一柄极锋利的匕首，命工匠在匕首上淬上毒药，并用活人做了试验，只要匕首将人刺出血丝，那人就一命呜呼。

太子丹又为荆轲挑选了一个助手，此人名叫秦舞阳。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路上的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可是荆轲却有自己的打算。他另约了一个朋友；这位朋友住得比较远，一时没有赶到。太子丹却等不及了，怀疑荆轲是不是反悔了，便故意激他说：“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你是不是又有新的想法了？我打算先派秦舞阳去了。”

荆轲大怒，斥责他说：“太子为什么要把一个有勇无谋的莽撞人派往有去无回的险地呢？！我要做的，是提一柄匕首，进入凶险难测的强大秦国，之所以迟缓几天，是为了等我的朋友一块去。既然太子等不及，我就同你告别吧！”

太子丹和知道此事的人，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慷慨高歌：“萧瑟的风啊吹寒了易水，壮士一去啊再不回还！”送行的人被荆轲的气势感染，从痛哭流涕的哀伤中昂扬起来，个个怒发冲冠。荆轲登车驰向秦国，连头也不回。

公元前 227 年年底，荆轲到了秦国首都咸阳，先以重金贿赂了秦王宠信的大臣蒙嘉，谎说燕王已决定向秦王投降，所以派使臣送来了樊于期的头和燕国督亢地方的地图。秦王大喜，于是下令在咸阳宫召见燕国的使者。荆轲捧着装了樊于期头的匣子，秦舞阳捧着装地图的匣子，进了咸阳宫，秦舞阳毕竟只是一个市井无赖，看到咸阳宫中威武的气势，吓得脸都白了。秦国的大臣都产生了疑心。荆轲一边取笑秦舞阳，一边向秦王解释说：“我们燕国是个偏处北方的小国，从来没见过大王这样威严的气势，所以他有些害怕。希望大王不要介意，使他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秦王对死人头不感兴趣，急着要看督亢地方的地图。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过地图，走到秦王面前，慢慢地展开，一边指点着为秦王讲解。地图完全展开时，裹在地图中的匕首也就露出来了。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操起匕首，猛地向秦王刺去。秦王大吃一惊，一跃而起，扯断了衣袖，转身就逃。荆轲在后边紧追不舍。秦王身上虽然佩有长剑，可是危急中却难以从剑鞘中拔出来。秦国的法度是很严厉的，大臣上朝不许带兵器，而殿外的卫兵没有秦王召唤又不许进殿；秦正在惶急的奔逃中，又顾不上对卫兵发号施令。所以咸阳宫中一片混乱，却没有人能救助秦王。秦王只好狼狈地绕着宫中的大柱子兜圈子。有的大臣冲上去，可赤手空拳哪能阻拦得住荆轲！眼看秦王的性命已危在旦夕，秦王的医生夏无且把药罐子掷向荆轲，荆轲闪避药罐子的瞬间，有人提醒秦王：“大王把剑拉到背上！”秦王忙把剑拉到背上，手臂抽动的余地大了，一下就把剑拔了出来。有剑在手，秦王转身迎战，一剑就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坐在地上，用力将匕首向秦王掷去，却没有掷中秦王，只击中了宫殿中的铜柱。秦王连刺了荆轲八剑。荆轲知道自己不行了，勉强倚着铜柱，傲慢地坐着，笑着骂道：“事情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我想活捉你，逼你签订条约，以报答燕太子啊！”这时卫兵们才一拥而上，杀死了荆轲。秦舞阳也死于乱剑之下。秦王被荆轲的勇武无畏所震动，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荆轲刺秦王，不但没能挽救燕国的危机，反而加速了燕国的灭亡。公元前 226 年，秦国军队攻下了燕国的首都。燕王在逃跑途中，杀了太子丹，把

太子丹的头送给秦王。可是，秦王对太子丹的头不感兴趣。四年后，燕王被俘，燕国彻底灭亡了。

这位后来统一了全中国的秦王嬴政，就是史书上所称的秦始皇。

（薛小勇）

押上断头台的国王

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发生了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到了十七世纪中期，资产阶级和封建专制的斗争，首先在英国激化起来。

1640年10月，英国国会突然逮捕了国王查理一世的亲信斯特拉福伯爵和洛德大主教，并且宣布要对他们进行审讯。这件事把国王惹恼了。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查理一世亲自来到了国会大厦，要求国会首领立即释放伯爵和大主教。可是对方毫不让步，说这两个人犯了叛国罪，国会有权处决他们！国王听了更加火冒三丈，要国会立刻放人。此时，国会门前拥挤着成千上万手持棍棒刀斧的群众，吼叫声震耳欲聋。他们是支持国会的。查理一世见情况不妙，转身匆匆走了。

国会在工人、水手等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后来终于迫使国王在处决斯特拉福伯爵和洛德大主教的死刑书上签了字。但是，查理一世怎会甘心呢？因为这等于砍掉了国王的左右臂膀。这两个家伙是维护国王封建专制统治的帮凶。

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国会总想限制国王的权力，国王却不把国会放在眼里。国会处决了两名国王的帮凶后，国王和国会的矛盾已是水火不相容了。

1642年初的一天，查理一世经过一番策划，亲自带领卫队闯进了国会，要逮捕皮姆和汉普顿等五名议会首领。

不料，他扑了个空，五名议员已经躲起来了。查理一世垂头丧气地离开国会，而武装起来的群众已在外面等着他了。当他穿过人群的时候，听到的是一片怒斥声：“特权！打倒特权！”

第二天，查理一世又指挥卫队进城搜捕。卫队刚进入城区，聚集在街道上的数万武装群众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大家愤怒地注视着他们。这时候，远处又传来了一阵喊叫声，原来是外地的农民进城支持国会了。人民的力量使卫队无法搜捕，伦敦市长也拒绝交出五名议员。查理一世十分懊丧，他知道自己在伦敦已经孤立了。三天以后，查理一世带着随从离开伦敦，到了英格兰北部的诺定昂，宣布要讨伐国会。

公元1642年8月22日，在英格兰北部的诺定昂城堡，一阵“嘟嘟——”的军号声响彻云霄。在城堡前高低起伏的山坡上，几百名卫兵在那里列队，看上去高高低低，参差不齐。

国王查理一世挺了挺胸膛，昂首下令道：“升旗！”

一面英格兰皇家军旗徐徐升到城堡上空。

查理一世高声宣布说：“现在，我以国王的名义颁布命令：向议会开战！”

卫兵们齐声地呼应着国王的命令：“向议会开战！”但是，毕竟人数太少，在偌大的山坡上，声音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时，一位大臣用手轻轻拉了拉国王的衣襟，低声说道：“陛下，请您留意，可能在一个美丽的夜晚，有人赤手空拳把您抓住！”因为那位大臣看到国王只有这么一点兵力，所以胆怯地向国王提出了警告。

查理一世根本不予理睬，依然昂首大呼着：“我们一定胜利！明天向南进军，直捣伦敦！”

当时，议会武装十分强大，仅仅受过良好训练的民兵，就有18000多人。

查理国王只有数百名卫兵，力量要弱小得多。查理一世所以敢发动内战，主要是看准了议会内部的不团结。果然，内战一开始，国王军的人数愈来愈多，不到两个月就超过了议会军。议会军节节败退，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国王军的前锋部队离伦敦只有 7 英里了，议会军的处境非常困难。

1644 年 7 月 2 日下午 7 时，在英格兰北部的马士墩大草原上，国王军与议会军展开了血战。

议会军的炮弹“轰隆！轰隆……”像长了眼睛似的直向国王军的阵地飞去，频频击中目标。国王军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正当他们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又传来一阵喊杀声。

“天兵杀过来了！”“天兵杀过来了！”一支骑兵突然冲了过来。这支骑兵个个身骑高头大马，人人手举雪亮马刀，朝着国王阵地猛杀过来。国王军吓得转身就逃，可是没走多远，就陷入骑兵的重重包围之中。虽经左冲右突，他们仍旧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仅仅一个晚上，国王军就有 4000 多人被杀，1500 多人被俘，许多大炮及其它各种武器，都落入议会军手中。

议会军为什么会扭转战局、转败为胜的呢？原来，议会军骑兵的指挥官，是足智多谋的奥利佛·克伦威尔。克伦威尔于 1599 年出生在亨丁郡的一个乡绅家庭。他的祖先是新教徒，因在宗教改革中夺取了天主教教会的土地而富裕起来。

1616 年，克伦威尔进入了有名的剑桥大学读书，以后又到伦敦学习法律。1628 年被选入议会，是“长期议会”里一位抗议国王暴政的活跃分子。在国王悍然发动内战的时候，他组织了一支部队。两年来，克伦威尔仔细观察了双方的战术特点，研究了双方胜负的原因，认为建设一支英勇善战的骑兵，是作战胜利的关键。

原来，在 17 世纪的欧洲，步兵已经使用了一种短管的火枪这种火器。但是，这种火枪使用十分不便，它必须从枪口装进子弹，并且要用引火线点火发射，遇到大风大雨，就很难着火。打了一发子弹以后，必须重新从枪口装进一发子弹才能发射。而且，这种子弹的杀伤力不强，遇到身穿铠甲的骑兵，就更难有杀伤力。而且骑兵行动迅速，能直接冲入敌阵砍杀。所以，当时作战中最重要的机动部队仍然是骑兵。

克伦威尔就从他的家乡开始，组织自耕农参加骑兵队。自耕农吃苦耐劳，十分痛恨封建制度，又大多信仰新教，反对封建教会，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加上他们自己备有马匹，善于骑射，便于训练。因此，克伦威尔的骑兵队一上战场，就能以少胜多，愈战愈勇，人称“铁骑军”。

1642 年，克伦威尔刚组成骑兵队时，只有 60 人，他的军衔也只是大尉；到了 1644 年，他已是一个指挥万人大军的中将司令了。

克伦威尔在马士墩大胜了国王军，但是，国王军的势力并未削弱。查理一世利用议会军内部的不团结，连打了几个胜仗。议会军决定派出克伦威尔和曼彻斯特等几支军队前后夹击，彻底消灭国王军。然而当把国王军包围的时候，曼彻斯特却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去截断国王军的去路，反而把查理一世放跑了。

克伦威尔见到曼彻斯特后，怒气冲冲地问：“阁下，您为什么要放走国王？”曼彻斯特嘿嘿一笑，摇了摇头说：“请您注意，国王陛下是上帝的意志，他是不可战胜的。”

克伦威尔压住了怒火，沉着地说：“是的，战胜国王有许多困难，不过，

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进攻……”

曼彻斯特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讲话，说：“克伦威尔将军，您必须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打败国王 99 次，他仍然是国王；而国王只要打败我们一次，我们都将被处绞刑，我们的子孙将永远沦为奴隶！”

克伦威尔反过来责问道：“请问阁下，当初为什么我们要起兵呢？是不是根本就不应该同国王打仗？您为什么不去同国王讲和，哪怕是最可耻的和平？”

其实，当时议会里确实有人去同国王谈判，只是没有成功罢了。经过这番争论，在克伦威尔等人支持下，议会军正式改组，曼彻斯特等将领全部退役，由克伦威尔就任副总司令。议会军兵力共为 21000 多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克伦威尔原来统率的“铁骑军”。克伦威尔给它制订了严肃的军纪：士兵骂人罚十二便士；喝酒要受压腿的刑罚；禁止盗窃、奸淫，否则给予最严厉的刑罚。

由于克伦威尔军队纪律严明，居民们都自愿地报名参加。同时，克伦威尔打破门第界限，大力提拔英勇善战的平民担任领导职务。他手下有两个上校，一个原来是铜匠，一个原来是马车夫。他还用宗教作为鼓舞士兵的精神武器，作战时高呼“天兵来了”。经过一个时期的整顿，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获得“模范军”的光荣称号。

1645 年 6 月 14 日凌晨，英格兰中部纳斯卑村附近大雾茫茫，国王军与议会军的决战开始了！查理一世想用闪电式的攻击突破议会军的阵地。然而，正当他的突击队追击议会军副将的时候，克伦威尔的骑兵已经击破国王军的右翼，直接攻入国王军的后方。

查理一世见敌军抄了他的后路，两边夹击，自己的部队死伤惨重，纷纷缴械投降，吓得面如土色！眼见大势已去，他连忙命令身边一名仆人将衣服脱下让他换上。“上帝保佑！”查理一世混过议会军的哨兵逃出重围时，深深叹了一口气。国王军全军覆没，被俘的有 5000 多人，军事物资统统被议会军缴获。最重要的是缴获了查理一世私通外国的许多信件，暴露了他的叛国罪行。

查理一世逃到了苏格兰。1647 年 2 月，英格兰议会以 40 万英镑的代价，把查理一世从苏格兰“买”了回来，投进监狱。

以后，查理一世虽然从狱中逃出，并勾结苏格兰人发动了第二次内战。但是，在克伦威尔和新军的打击下，第二次内战也以回王军的垮台而告终。经过审判，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

1649 年 1 月 30 日，英格兰王宫人山人海，人人都来观看处决国王。

广场的中间特意设置了一个断头台，断头台旁站着一行威武雄壮的铁骑军。

人们突然高呼起来：“看！来了！来了！”只见王宫的侧门打开了，里面押出一名囚犯。他，就是自命力不可一世的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

最高法院法官当庭宣判：“查理，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和人民公敌，判处死刑！”

人们一片高呼：“好！好！”挤在后面的人纷纷往前挤。有的踮起了脚尖，引颈翘首观望着。一些士兵张开双臂把人们往后撵着，满头大汗地维持秩序。

法官以最宏亮的声音宣布：“现在执行处决！”

查理一世已经丧魂落魄，往日那趾高气扬的模样再也看不到了。只见他双腿颤抖，步履艰难地被行刑士兵押上了断头台。全场顿时静了下来。一名军官手向下一挥，行刑人手起刀落，一颗戴过多年王冠的头颅立即滚落下来，鲜血顿时喷了一大滩。

人们鼓掌欢呼，声浪经久不息……

处死了国王，英格兰宣布为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贺声）

萨拉热窝暗杀事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波黑的首府萨拉热窝，由于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加上民族纠纷和国外政治势力的介入，使得塞尔维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三个民族之间，刀枪相见，战火纷飞。虽经联合国多方调停、国际维持和平部队也一直驻在那里，但问题总得不到解决。

谅读者们都知道，就是这座萨拉热窝城，早在 80 年前，即公元 1914 年，曾发生过一起震惊世界的奥地利皇储腓迪南大公夫妇遭暗杀的事件，并因此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欲知那次暗杀事件始末，请听我详细道来——

公元 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地利皇储（即皇太子）腓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米尔卡河上的拉丁桥头，被一位名叫普林西比的青年男子击毙。

普林西比为什么要刺杀腓迪南大公？这得先介绍一下腓迪南这个人物。

1863 年 12 月 18 日，腓迪南出生于奥地利的埃斯特。他的父亲是奥地利皇帝约瑟夫的侄子。

1889 年，皇储鲁道夫意外地去世，腓迪南被选为皇储。他像其他王公子弟一样，从青年时期就接受军事训练。他一生中主要兴趣就是打仗和打猎。

塞尔维亚是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人的独立国家，长期以来受到奥匈帝国的威胁。奥地利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弗兰茨·腓迪南大公被选为皇储后，一直鼓吹对塞尔维亚进行所谓“预备性的战争”，企图征服塞尔维亚，把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巴尔干半岛。这自然引起了塞尔维亚爱国人士的注意和仇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腓迪南大公准备对萨拉热窝进行一次访问。

1913 年 9 月 16 日，腓迪南大公在波希米亚举行奥军的军事演习时，就向总参谋长康拉德男爵提出，第二年在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并且访问萨拉热窝的想法。9 月 29 日，康拉德与波斯尼亚总统波梯雷克将军，在维也纳讨论了这件事，决定腓迪南大公以皇储的身份，去检阅两个集团军的演习。

腓迪南大公的这次访问，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想抵消俄国方面“大塞尔维亚”的宣传。因为斯拉夫人和俄国是一个种族，语言也很接近，而奥地利人则说德语。正是因为他的访问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他这次不愿采用让军警戒备森严的保卫手段，而选择乘坐敞篷汽车随意巡行的形式。他多次对 1909 年访问匈牙利时卡罗尔国王的做法不满。因为匈牙利当局在那次出动了大批军警，把车站和沿途戒起严来，使那些蜂拥而至的农民只能在远处向大公夫妇举帽挥手。

因为腓迪南大公的访问是军事检阅后的安排，行程是由军方会同康拉德男爵和波梯雷克将军拟定的，所以没有通过行政部门，也没有登报。腓迪南大公经过卓姆和亚德里亚海，然后通过麦科维克和摩斯达，到达萨拉热窝附近的伊利兹，与乘火车从维也纳经过布达佩斯到达那里的妻子会合，一同前往萨拉热窝访问。

腓迪南大公和妻子各自的旅程都很顺利。6 月 25 日下午，大公夫妇相会于伊利兹附近一座美丽的小别墅，离萨拉热窝约十余公里。那天，尽管大雨滂沱，演习仍然顺利进行。大公心情很好，对波梯雷克大加赞扬，第二天下午，大公检阅演习部队回来后。还和夫人乘汽车去萨拉热窝市区买东西。

这时，市长已经发出了通告，表示对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派皇储访问波斯尼亚感到欢欣鼓舞，并代表市民表示忠心。市民们在住宅和商店门前张

旗帜花，橱窗里处处可见他的肖像。身穿军装的腓迪南在不断高呼“万岁”的群众密密层层包围中艰难地从一家商店走进另一家商店，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大公夫妇回到伊利兹后，还在为受到的欢迎感到高兴。6月28日清晨，大公给留在克伦梅兹的孩子们打了电报，告诉他们一切顺利，希望星期二见见面。他没有想到，一个刺客群正在萨拉热窝奔向各自的岗位，静静地守候着他。

即使腓迪南大公逃过了普林西比的枪弹，也难有生还的可能，因为还有许多人至少在十处地点等待着刺杀他。

1908年，奥地利悍然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吞并了这两个省，这下斯拉夫人被激怒了。好几个民族主义激进派组织，其中主要是“国防会”、“黑手党”和“青年波斯尼亚”，早就在预谋刺杀这个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

19世纪末，一批从事革命活动的塞尔维亚人聚集在瑞士。他们受到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主张采用暴动和恐怖主义手段，来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统一。其中有一个名叫尼可拉·巴希齐的青年，于1881年组织了“塞尔维亚激进党”，宣布该党的纲领是“国内人民的福利与自由，国家的独立，与国外其它塞尔维亚民族地区的统一”。1903年，激进党发动宫廷政变，但失败了，他们便逐渐停止了活动，等待新的时机。在1908年奥国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那天晚上，塞尔维亚的外交大臣米罗万诺维奇召集包括巴希齐在内的几名大臣和重要人物，考虑应如何采取行动来应付奥地利的进一步挑衅。他们决定由贝尔格莱德市长在第二天召集一个范围更广泛的代表会。就在这次代表会上宣告成立“国防会”，目的是招募和训练志愿军，加强塞尔维亚各方面的力量，阻止奥地利执行吞并计划。

激进党的领袖基本上加入了国防会。国防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贝尔格莱德，各主要城市分别设立区委员会。

国防会把各地的许多爱国组织吸收进来，开始征集游击队员，进行军事训练，并筹集经费，支持波斯尼亚革命运动，建立通往波斯尼亚的“隧道”和“地下铁道”，把宣传品、武器和游击队员越过边境送到波斯尼亚。但是，到1911年，国防会中的领袖与一些激进的军官之间出现了分歧。后者不满前者的温和政策，主张立即行动。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秘密团体，起名为“黑手党”。他们的口号是“不统一，毋宁死”。

黑手党的目标首先是实现民族统一，主张采取恐怖行动来达到目的。

黑手党的成员彼此不认识，各人以一个秘密的号码为标志。章程规定，凡加入组织的成员必须认清，他一旦加入，便丧失了个性，没有个人的荣誉或利益。新成员必须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举行仪式，只点燃一支蜡烛，小桌上铺着一块黑布，上面放着一枚十字架、一把匕首和一支手枪。入党人举起右手宣誓：“从此刻起直到我死为止，永远忠诚于本组织的法律，并始终不渝为本组织牺牲！”黑手党的印章上绘有一面飘扬的旗帜，旗帜上是一个骷髅头和一副交叉的枯骨，旁边是一把匕首、一枚炸弹和一瓶毒药。

幕后策划指挥这次刺杀腓迪南大公行动的，就是黑手党领导人提米特利也维奇上校。他是塞尔维亚参谋部的情报主任。他的代号为“6号”，是一位勇往直前，慷慨大度，受人尊敬，又充满稚气的传奇人物。他的助手，“7号”唐科西基少校，也是个重要人物。他创办了一所“游击队”学校，在贝尔格莱德训练波斯尼亚的侨民革命者。他表面上安静温和，为人谦让，甚至有些羞怯，实际上却是“游击队”的领袖，是个英勇不屈，沉着镇定，诚恳

正直的爱国者。

黑手党内还有个神秘人物名叫西甘诺维奇，代号为“412”号，是从波斯尼亚来的侨民，原为唐科西基手下的游击队员。据说他是黑手党和塞尔维亚激进党首领巴希齐之间的联络员。由此可以看到，黑手党和国防会这两个秘密组织，有着共同的目标。黑手党的经费和宣传品主要由国防会提供。不同的是，国防会声称从“文化”方面为争取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而奋斗，黑手党则主要采取刺杀等恐怖行动。而且正是与国防会和黑手党都有联系的唐科西基和西甘诺维奇，直接安排了刺杀腓迪南大公的计划，并且为刺客提供了白朗宁手枪、炸弹和自杀用的毒药。

直接参与刺杀腓迪南大公计划的，还有一名黑手党成员，名叫加钦诺维奇，代号217号。他是黑塞哥维那一个牧师的儿子，受到俄国革命文学的深刻影响。

1909年，他到贝尔格莱德会见了国防会的领袖，但觉得他们太软弱，于是加入了刚刚组织的黑手党。实际上，他从这两个组织都得到经费，到洛桑和维也纳去读大学，曾经会见了俄国的一些革命者，其中有托洛茨基。

加钦诺维奇回到波斯尼亚后，又组织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青年波斯尼亚”。他们认为，革命恐怖主义是最好的办法，既可以在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一种恐怖气氛，又可以提高群众的民族精神，为新的南斯拉夫民族开辟新的前景。青年波斯尼亚崇拜的“第一号烈士英雄”是杰拉基齐，杰拉基齐也是一名黑手党成员，

1910年曾在萨拉热窝刺杀波斯尼亚总督伐雷沙宁将军，连开五枪，然后开枪自杀。加钦诺维奇曾经赞扬杰拉基齐是一个鼓舞人民斗志的人。他号召塞尔维亚青年应追随他的模范行动，为他的牺牲而复仇。

加钦诺维奇在波斯尼亚各地开展革命活动、用黑手党的方法把各地的成员组成行动小组。他在萨拉热窝的伊利齐家中成立了指挥部。就是这个伊利齐和另外三个人，其中包括故事开头提到的普林西比，具体执行了刺杀腓迪南的计划。

1914年3月，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公告：奥地利军队将在波斯尼亚举行夏季演习，腓迪南大公将指挥这次演习，并访问萨拉热窝。萨拉热窝的民族主义青年地下组织认为这次军事演习，是对塞尔维亚民族的示威，他们同时也感到，这正是一次政治暗杀的好机会。他们于是把这一消息通过秘密联络员，透露给普林西比。

普林西比是何许人也？他是波斯尼亚格拉哈佛市的一名中学生，此时他已参加了加钦诺维奇和伊利齐的地下行动小组。1912年，他名义上是前往贝尔格莱德念书，实际上是加钦诺维奇派他去同黑手党联系。普林西比曾经到土耳其边境某地的游击队学校接受训练。可是，游击队领导人嫌他年纪大小，才16岁，身体又瘦弱，将他打发回家了。以后他一直来往于萨拉热窝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同加钦诺维奇和伊利齐商量刺杀计划。这次回到贝尔格莱德是1914年2月间。这时，黑手党已经作出决定，刺杀腓迪南大公，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充当刺客。

格拉培兹也从报上看到了腓迪南将访问波斯尼亚的公告，他将公告剪下交给普林西比看。普林西比和西甘诺维奇商量的具体的刺杀方案。黑手党的“7号”表示愿意提供武器和炸弹，并训练他们的射击技术。考虑到他们携带武器过境很不安全，“7号”便告诉他们，可以通过“地下铁道”，在塞

尔维亚官方的帮助下前往萨拉热窝，那里的自己人会把武器交给他们。

6月初，普林西比、查布林诺维奇和伊利齐这三个人离开贝尔格莱德，乘船沿撒夫河到达沙巴兹。边境当局按照国防会的指令，为他们提供了通行证和半价车票，越过了边境。在波斯尼亚一侧，一位税务员奉命准备好了汽车，他们在当地农民的掩护下，到了卜里波镇，然后安全地乘火车到达萨拉热窝。几天后，他们按照事先约好的接头方法，带一包打开半边的斯捷凡牌香烟，做出敬烟的样子，从当地地下联络员家中，取来一个用来包装白糖的纸箱，里面装有他们需要的炸弹和手枪，还有一点毒药，以备不测时自杀。

就在腓迪南大公正式访问萨拉热窝的那天清晨，三名年轻的刺客，普林西比、西甘诺维奇和伊利齐，在一家点心店后面会齐，各自取好武器，埋伏在腓迪南大公将要经过的适合位置上。

上午10时，腓迪南大公乘车到达萨拉热窝，他身穿礼服，佩戴着整套勋章，检阅了当地军队。然后，前往市政厅参加欢迎会。波斯尼亚总督波梯雷克将军面对着大公夫妇。坐在车上，为他们解说沿途的建筑和风景。前面一辆车里有市长和警察局长引路，后面两辆大汽车，载着随行人员。

正当车队行近肯麦雅大桥时，埋伏在那里的西甘诺维奇敲开炸弹，冲向大公的汽车，向车内扔去！司机一发现情况不妙，立即加速，炸弹扔到了折叠车篷上，落到了车后。“轰！”的一声，后面的汽车被炸坏，几个保卫人员和负责警卫的麦里齐中校受了重伤。西甘诺维奇立即越过矮墙，跳入河中，不幸被警察逮捕。腓迪南大公脸上只擦破一点皮。他命令汽车停下，检查了汽车的损伤情况，把伤员立即送往医院。他说：“我们还是按原来的计划进行吧。”

车队继续向市政厅行驶，起初速度很快，后来大公叫开慢些，以便围观的市民可以看清楚些。在市政厅，腓迪南大公接见了市政官员。市长宣读欢迎词，表达对大公来访的欢迎，并表白他们时奥皇的忠心。可是腓迪南大公粗暴地打断了他，大吼着说：“够了！够了！什么话！难道你们就用炸弹来欢迎我吗？”就这样，欢迎仪式草草地结束了。

按照原定的安排，欢迎仪式之后就去约瑟夫街参观博物院。波梯雷克和警察局长认为，同一天再发生刺杀的可能性很小，但为保险起见，还是改变原定的路线，迅速通过亚帕尔码头，直接前往博物院。腓迪南大公的高级随员哈拉基伯爵亲自站在大公汽车的左踏板上，预防来自河边的可能袭击。

当车队行至拉丁桥时，由市长领路的汽车却改变原来的向左的行车计划转而向右转入约瑟夫大街。后面腓迪南大公的司机也跟着转了弯。波梯雷克总督急得直嚷：“错了！错了！直接沿着亚帕尔码头前进！”大公的司机刹住车，准备后退。汽车停下来的片刻时间，给了埋伏在拉丁桥头的普林西比一个极好的机会。普林西比原先站在拉丁桥的一侧。在大公回来的途中，他刚刚越过马路站在拐弯处。这个偶然发生的情况、正好把大公的汽车停在他的埋伏位置上。

普林西比从容地走上前去，举起白朗宁手枪，连发两枪。一枪打中腓迪南大公的脖颈，只见鲜血立即从口角流了出来。另一枪原来是瞄准波梯雷克总督的，可是忙中有错，误中了大公夫人莎菲·佐德的腹部。

汽车立即转过头来，迅速越过拉丁桥，向总督官邸驶去。腓迪南大公对妻子说：“莎菲，莎菲，不要死，要为孩子活着……”几分钟后，死神带走了他们夫妇。时间是1914年6月28日，星期天，上午11点30分。

萨拉热窝一声枪响，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因为这时候，欧洲列强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到 1907 年，欧洲就已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德、奥、意同盟集团和英、法、俄协约国集团，这两个集团的开战是时间问题。所以当奥地利皇储腓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传来，德国皇帝威廉就兴奋地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两个集团的统治者终于找到了一个既可以把欧洲拖入战争，又可以避免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的借口。这场灭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战祸波及人口达 13 亿以上，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造成了约 3000 万人的伤亡。

（何金）

“泰坦尼克”号沉没记

1992年12月，法国政府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的主要报纸上刊登了一则醒目的招领启事：

80年前在北大西洋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巨轮，1985年被法国海运研究所打捞队发现。经长达7年的水下搜寻，现一共打捞上来价值4百万英镑的工艺品1800件，请这些工艺品的主人或其家属前来法国认领。许多遇难者家属及少数至今尚健在的幸存者闻讯后，纷纷赶到为工艺品恢复昔日光彩的法国电气公司，认领这些沉睡海底达80年之久的珠宝、手表、钱币、发夹等。他们睹物思人，不禁潸然泪下。年迈的幸存者更是打开记忆的闸门，人类航海史上那最为悲壮的一幕重又浮现在他们的眼前……

1912年4月10日，英国昆士顿港人山人海，乐队高奏欢送曲，英国银星航运公司的巨型客轮“泰坦尼克”号一声长鸣，缓缓驶离喧闹的港口，开始它那前往纽约的处女航。“泰坦尼克”号是大英帝国的骄傲，它长达882.5英尺，宽92.5英尺，排水量为4.5万吨，堪称当时最豪华、最巨型的客轮。由于船体底部隔成30多个防水密封舱，它的安全系数很高，即便船体扯开几十米长的裂口，轮船也不会就此沉没，因此，被誉为“永不沉没的超级巨轮”。

“泰坦尼克”号的首航，引起世人瞩目。许许多多人都把能参加“泰坦尼克”号首次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当作人生幸事而炫耀。船票早就预订一空，1500个舱位挤得满满的，加上船员1700人，船上共有2235人。

船长E·史密斯站在船桥上注视着远方。这位胡须苍白、面目祥和的老人，在银星航运公司任职已达38年，航海经验相当丰富。几年来，公司所有的新客轮都由他指挥首航。这次“泰坦尼克”的处女航又由他挂帅，他更加感到自豪。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公司服务，准备此行归来便荣归故里。

这是一个近来少有的暖冬。凭着多年经验，他知道从极地漂来的流冰比往年多，因而他根据有关流冰的报告，特意为“泰坦尼克”号选择一条偏南的航线，而且严格执行新船务必慢速的规定，以每小时22海里的速度航行，但最终仍在劫难逃。

4月14日，航行进入第5天，“泰坦尼克”号已接近加拿大的纽芬兰岛。从早上起，天气开始转坏，太阳蒙上了一层薄雾。据无线电报告说，纽芬兰附近是一片雾区。这儿又是零星冰山的出没地区，船长和大副整天都站在船桥上，不时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傍晚时分，接到一份有关流冰的报告，其中离“泰坦尼克”号最近的流冰也在250海里以外，对“泰坦尼克”号的航道毫无威胁。同时天空开始放晴，雾气也开始消散。劳累了一天的史密斯船长，吩咐部下多加小心，增加监望人员后，便回舱休息了。巨轮以每小时22海里的速度前进。整条船灯火辉煌，大厅里乐队演奏着优美的音乐，旅客们正在参加抵达纽约前的最后一场舞会。

晚上10点，大副默多克到驾驶室接二副莱托勒的班。他们在驾驶室朝外望去，天空繁星闪烁，海面平静如镜，从地平线上射出一道半明半暗的银光。他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经常有可能出现冰山，便增派了水手远望监视。

不幸的是，这时海面上一丝风也没有，站在远望台上的水手很难发现远处的冰山。如果有风，冰山处就会掀起汹涌的波涛，人们就能及早发现。

更为糟糕的是，有一封生死攸关的关于流冰的电报几十分钟前就扔在发报室的桌子上，而没有及时上报。9点40分，发报室主任约翰·菲利浦就收

到一封发自“麦萨巴”号轮的电报。这艘在“泰坦尼克”号正前方航行的轮船，电告“泰坦尼克”他们已发现冰山，并再三强调：“所发现的冰山和流冰群巨大，望多加注意/菲利浦这里正忙于替船上富豪向纽约拍电报，联系接船事宜，而无暇将电报送交驾驶室。何况，他在一天中这类有关冰山的电报已接到多份，“麦萨巴”号的这封电报也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而且，菲利浦并不知道“泰坦尼克”号此刻所在位置，也就不能意识到“麦萨巴”号所发现的冰山近在眼前，非常危险。他顺手把这封电报扔到旁边的桌子上，又埋头拍发旅客电报。他打算等有时间再去送这份电报，可是，他永远也等不到这个时间了。灾难正凶猛地向着“泰坦尼克”号袭来。

这天晚上，大副默多克格外警惕，深夜 11 点 30 分，他依旧站在船头栏杆旁，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海面。他甚至命令管理员熄掉前舱口的灯光，因为从那里透出的灯光有碍他的观察。

水手弗里德利克·弗利特在桅楼守望台直视前方。突然，一座小山似的巨大冰块。凸出海面足有四五十英尺高，赫然出现在轮船前方。弗利特毫不犹豫地冲向警钟，连续敲响三次，通报船员有险情。接着他又抓起守望台的电话，向驾驶舱大声惊呼：“冰山！就在正前方！”

与此同时，默多克也看到了这个横在船前的庞然大物，他迅即扑向传令钟，发出“停车”信号，同时还朝舵手罗伯特大声喊道：“右满舵！”

罗伯特使尽全身力气旋转舵轮，并瞅了一眼瞭望台上的大钟，时针正指向 11 点 40 分。冰山离船还有 400 米，而巨轮仍以每小时 22 海里的速度前进着，用不了 40 秒钟就会同冰山迎头相撞。

默多克再次下令：“停车，全速倒车！”但这艘超级巨轮反应太慢了，一时不能停下来。转眼间，船头已从斜里冲向冰山。巨大的船体紧紧地挤着冰山，擦身而过。一阵轻微的震颤从船头传向船尾。冰山在水里的突出部分像一把利刃，借着轮船巨大的碰撞力，刺入船体，划开一道长达 300 英尺的口子，发出一声如同划玻璃的咝咝声。裂缝贯穿 3 个底舱和两间锅炉房。

眼望着甩在船后的冰山，默多克惊魂稍定地说：“也许躲过去了吧？”头等舱的旅客还不知道灾难已经降临，他们扶着栏杆好奇地观看着冰山从船旁擦过。二等舱的旅客听到了轮船与冰山的撞击声，那声音就像撕开一条长布条。大块的冰渣掉进开着的舷窗口。在统舱的主要是一批移民，他们完全感觉到碰撞的影响：一个个被震得东倒西歪，顿时变得惊恐不安。

这艘巨轮的设计者托马斯·安德鲁也在船上，他听到撞击后，马上来到驾驶室，正好碰到闻讯赶来的船长史密斯。他们商量了一下，安德鲁就带着一名修理工匆匆赶到底层甲板去检查。虽然所有的防水密封舱门都关得严严实实，但安德鲁发现轮船已毫无希望了。右舷至少有 6 个防水密封舱裂开了大口子，海水像瀑布一样灌进舱里，水深已达 14 英尺。

安德鲁设计师向船长汇报，说有 300 英尺长的船舷遭破坏，防水密封舱正一个接一个地崩裂，抽水已无济于事。船长不禁大惊失色，不相信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安德鲁解释道：“从‘泰坦尼克’号的吨位和速度看，与冰山冲撞时所达到的力量等于 73 列火车运载力的总和。……”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水手长报告说：“船长，所有的抽水机都淹没在水中，防水密封舱的隔板已经崩裂，统舱的旅客可能已无法救出来了。”

船长放下电话，立即下令：“全体船员到甲板上集合！”于是，能离开岗位的船员都上了甲板。船长果断地向部下发出一连串命令：“现在情况十

分紧急。水手们立即分头到各个缺口和锅炉房堵漏。救生队赶紧准备救生艇。其他人要通知所有旅客穿上救生衣迅速到甲板上来。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要告诉旅客，这只是应急演习，千万不要说出真实情况。如果人们都失去理智，充其量只能救出三分之一的人。”船员们立刻奔赴各自的岗位。有 325 名船员和 50 名高级船员都恪守职责，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随轮船一起沉入海底了。

除统舱的旅客乱作一团，正在不断涌入的水中挣扎外，三等舱以上的旅客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过，轮船机器突然停止工作，锅炉中的蒸汽从排气管中骤然喷出，发出爆炸般的呼啸声，这也着实使人们开始惊恐起来：难道这艘超级巨轮也会沉没吗？

上层甲板的大厅里，舞会还在举行。客舱部主任冲进来，向乐队指挥示意停止演奏，高声宣布道：“女士们，先生们！遵照船长指令，我宣布应急演习开始，请各位赶快穿上救生衣到甲板上，请大家务必保持镇定！”

彬彬有礼的服务员们捧来一叠叠救生衣，轻声细语地请大家穿上，到甲板上去。这时，蒸汽的轰鸣声还在敲打着人们惊恐的神经。服务员们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只是临时停车，船需要小修一下，几小时后我们会启航的。”

旅客们有的穿着毛衣，有的穿着睡袍，有的穿着晚礼服，陆陆续续聚集到甲板上。他们凭借着探照灯光好奇地注视着吊在铁杆上的救生艇，有几艘艇已放到海面上了。女士们扶着栏杆往下看，是黑漆漆的波涛起伏的海面，吓得她们浑身颤栗。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站在船舷，犹犹豫豫地对帮助她上艇的船员说：“这真的是演习吗？能不能把孩子留在船上？下面太冷啦！”船员语气温和地劝说道：“太太，把他们带上吧，下面更安全。”

一艘又一艘救生艇放到海面上。男人们都站在甲板上向它们挥手告别。大副默多克站在船桥上，以恐怖的心情目睹着这一切。他对船长说：“船长，我们应该把真相告诉他们。”史密斯船长摇了摇头：“绝对不能说出真相，否则，会出现混乱局面。我们的救生艇不够，不可能大家都上艇。我经历过这种场面，没有比人们争相逃命更可怕的了。”

“泰坦尼克”号左右两舷各有 8 艘木制救生艇和两只可折叠的帆布筏。站在甲板上忧心忡忡四处张望的乘客们，他们并不知道，这 20 艘救生船，如果满载，也只能乘坐 1178 人，而船上却有 2235 人。英国运输部没有规定客轮要备有能装载所有人的救生艇，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尤其像“泰坦尼克”这类超级巨轮，足可抵御海上的一切风险。

与此同时，报务室主任飞利浦正按照船长的命令，一刻不停地向附近所有轮船发出求救信号 CQD。电报说：“‘泰坦尼克’号在北纬 41°46′、西经 50°14′ 遭到冰山撞击，船体破裂，紧急求救！”

这是一条震惊世界的电文！当晚，大西洋洋面过往船只很多，但不少船只没有来营救，它们不是因为收到“泰坦尼克”号的求救信号，就是因为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

“泰坦尼克”号的姊妹船“奥林匹克”号正在 500 海里以外向相反方向航行。当它收到电报后，立即回电询问，要求报告具体情况。飞利浦再次电告：“‘泰坦尼克’号致电‘奥林匹克’号：情况非常危急，我们正把妇女送上救生艇。”

“奥林匹克”号船长叹了一口气：“上救生艇了。看来它正在下沉。”他一面叫报务员回电，一面下令掉转船头，点燃每一只锅炉，不顾一切地向

“泰坦尼克”号赶去。但是，不管“奥林匹克”号作出多大努力，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离“泰坦尼克”号最近的美国轮船“加利福尼亚人”号，在从伦敦开往波士顿的途中因遇冰山而停在距“泰坦尼克”号仅5英里之处，可是它的报务员在晚上11点钟就停止工作而没收到求救信号。

丘纳德轮船公司的一艘旧船“卡帕西亚”号离“泰坦尼克”号80海里。报务员拿着收到的呼救电报叫醒船长亚瑟·罗斯特伦，罗斯特伦睡眼朦胧，压根儿不相信：“‘泰坦尼克’号遇难？这不可能。它可是一艘超级大船呀！小伙子，你没弄错吧？”报务员立即回电飞利浦要求证实，事实确实如此。罗斯特伦船长于是命令“卡帕西亚”号掉转方向，以每小时24海里的速度前往营救。即使“卡帕西亚”还是条新船时也没以这么高的速度行驶过。进入冰山区，罗斯特伦也拒绝减速。“卡帕西亚”号左避右闪，绕过一座又一座冰山，全速向“泰坦尼克”号冲来，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马拉松运动员在作最后冲刺一样。

再说“泰坦尼克”号上的信号员乔治·桑姆斯·罗欧，当船撞冰山时，他正站在船尾担任观察哨。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仍坚守自己的岗位，对轮船即将沉没的危险竟毫无觉察。后来，他偶尔发现有艘救生艇在海面上，急忙打电话告诉船桥，才知道轮船出事了。史密斯命令他立即带上信号火箭到船头来，向附近的“加利福尼亚人”号发信号。乔治把装火箭的箱子翻了个底朝天，怎么也找不到一支表示遇难的红色火箭，只有庆典用的白色火箭。他向船长请示怎么办，船长沉吟了一下说：“把白色火箭都放了吧！放总比不放好。”

耀眼的白色闪光在“泰坦尼克”号上空倏然升起，每隔两三分钟放一支。“加利福尼亚人”号上的两位船员远远地看见了信号，但他们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叫醒船长罗德。罗德看了看那白色的闪光，认为是这艘豪华客轮上举办晚会而放出的焰火，便掉头回舱房睡觉去了。他的这一举动，使他永远背上了见死不救的坏名声。

随着救生艇一只只地放下海，人们逐渐意识到“泰坦尼克”号真的出事了。甲板上开始出现混乱的场面，有的人不听水手指挥，要强行登上救生艇，有的旅客却又爬下救生艇，去取放在船舱里的贵重物品。但二副莱托勒，这位在海难中唯一幸存的高级船员，立刻率领船员有力地制止了混乱。他不讲情面和身分，严格执行只有妇女和儿童才能上救生艇的规定。乘坐这艘豪华巨轮的百万富翁有十几名之多，但都只是妻子和儿女上救生艇，本人则留在船上。法国金融家阿斯特，他怀孕的妻子上上了救生船，自己却最终葬身鱼腹。纽约梅西大百货公司老板的妻子舍不得离开老伴，结果夫妇俩双双遇难。此外，瑞士铜矿巨头古根海姆，以其名字为哈佛大学图书馆命名的大亨魏登纳也都葬身海底。因此，乘坐救生艇的工作一直井然有序地进行着。除有几名装扮成女人的男子混在其中外，救生船上坐的都是妇女儿童和随船水手。只是由于时间紧，大多数救生船并没坐满。

凌晨2点05分，最后一艘救生艇放到海面上。1500多人，绝大多数是男人，绝望地站在甲板上，眼望着他们的妻子儿女坐在救生船上，消失在冰原之中。

飞利浦拍发起新的呼救信号：“SOS，SOS，SOS，‘泰坦尼克’号船头迅速下沉……SOS……”“泰坦尼克”号是世界上第一艘发出SOS信号的轮船，

从此，海上呼救信号便改成了 SOS。

船上的管弦乐队一直站在甲板上，若无其事地演奏着乐曲，始而演奏爵士乐，后转而演奏“伦敦德里的空气”和赞美诗“秋天”这两首曲子。

“泰坦尼克”号显然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冰冷刺骨的海水漫上船头，冲进舱室。人们纷纷跳下甲板，游向在周围徘徊的救生艇。还有许多人跑向翘起的船尾，只有这个地方还没有被浪打湿，聚集在这儿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想在这毫无生还希望的甲板上再多活几分钟。

2点10分，“泰坦尼克”号的船头已沉入水中，船越翘越高，又有一些人跳入海中，但大多数人依然留在船上，勇敢地面对死亡。史密斯船长把船旗卷起来，塞进口袋，坚定不移站在远望台上，誓与轮船共存亡。这时，乐队改奏起圣歌。至此，船上仍然灯火通明。

2点15分，菲利浦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泰坦尼克’号致电各船：发动机房进水，锅炉被淹没……CQD—CQD—SOS—SOS……”

突然，一声巨响，锅炉爆炸了。“泰坦尼克”号猛烈地震动着，船尾几乎直立于海面。一分钟后，船上乘客和船身一起迅速地滑入平静的大海。百万富翁和贫苦移民一道葬身大海，最终成了平等的人。“泰坦尼克”号从撞上冰山到最后沉没，一共历时2小时40分钟。

救生艇上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泰坦尼克”号沉没。海面上到处都是呼救的人们，其中一些人被救生艇救起。船沉前来不及放的那两只帆布筏，此时与船脱开了，有些人幸运地爬上来，在海面上漂浮着。

一小时后，“卡帕西亚”号出现了。船长命令发射火箭，用信号告诉幸存者，它即将赶到现场。这艘勇敢的旧轮船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及时赶到出事地点，救起了713名幸存者。这一英雄业绩将名垂航海青史。

最终醒悟的“加利福尼亚人”号在天放亮时才赶到。“卡帕西亚”号将遇救者送往纽约市，让“加利福尼亚人”号留下来继续寻找幸存者，结果却一无所获。

在这个悲惨的夜晚，一共有1522人丧生，绝大部分男子汉都表现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但也有一些贪生怕死之徒。陆军少校阿奇博尔德·巴特在一些男子企图挤上救生艇时，掏出手枪，大喝一声：“谁敢上就毙了谁！”他后来是高唱歌曲沉入水中的。法国人纳瓦特利尔没告诉妻子就独自带两个小儿子上了“泰坦尼克”号，遇难的当晚，他把两个儿子送上救生艇，自己却与“泰坦尼克”同归于尽。两个孩子得救后无人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孩子。他那住在巴黎的妻子，并不知道丈夫把孩子带到哪儿去了。直到后来从报纸上认出两个孩子的照片。几个星期后，孩子们才回到母亲身边。这无疑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可是，银星轮船公司总经理布鲁斯·伊斯梅却是个怕死鬼。当最后一艘救生艇放下水时，他不顾一切地跳上去。他虽然从死亡中逃了出来，却永远生活在人们对他的羞辱与咒骂之中。

超级巨轮“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新闻媒介争相报道与此有关的线索和背景材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早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发生前14年，就有人极为详细地预言过。一位名叫摩根·罗伯逊的美国作家，在1898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泰坦》的小说。书中讲述了一艘被人称为永不沉没的超级巨轮“泰坦”号，满载富翁，在4月份从欧洲前往美洲的处女航中，撞上冰山，沉入大西洋海底。同“泰坦尼克”号一样，小说中的“泰坦”号也没有足够的救生艇救下船上的2000多名乘客。“泰坦”号有

24 艘救生船，“泰坦尼克”号只有 20 艘。罗伯特虚构的这艘船长度为 800 英尺，“泰坦尼克”号则是 882.5 英尺。一切都是惊人的相似。于是，一些神秘的占卜家，把事件的发生归于伟大的预言。

而二副莱托勒事后却分析道：“一切都在和我们过不去。”的确，假如不是发生在如此暖和的冬天，假如不是一个无风的夜晚，假如报务员及时送交冰情电报，假如冰山没有特别锋利的突出部分，假如邻近的“加利福尼亚人”号上的报务员深夜不停止工作，或者船长能正确理解火箭信号，这场大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至少也不至于如此惨重。

“泰坦尼克”号巨轮是那个时代的一座丰碑。它的沉没，对当时的航运业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然而，人们在灾难中所表现的悲壮精神，却在人类灾难史上树立起另一座丰碑。那是何等惊心动魄而又催人泪下的场面：在生死存亡之际，人们既惊慌又秩序井然，既胆怯而又英勇忘我；船员们恪守岗位，电气工程师始终让船上灯火通明，水手们始终在设法堵塞漏洞；男人们站立在甲板两旁，让妇女儿童登上救生船，而自己则冷静地等待着死亡；乐队演奏着优美乐曲，直至与巨轮一起被大海吞没……

80 年过去了，这座丰碑仍将在死难者家属及幸存者心中永存，在全人类心中永存，并将永远激励人们在大灾大难面前临危不惧、英勇抗争，直至夺得最后胜利。

（陈石）

日本大化革新

公元 645 年 6 月 12 日，日本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从此，日本国内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天清晨，皇宫的太极殿内鼓乐齐鸣，文武百官身穿朝服缓缓走进殿堂，按官阶分立两旁。皇极天皇在宫女簇拥下登上了宝座。文武百官纷纷俯伏在地，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皇极天皇赐他们“平身”。侍立着的百官中，有人偷偷朝殿门口张望一眼。原来，今天天皇接见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使臣的日子。这三个国家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是近邻，所以礼仪非常隆重。

大贵族奴隶主苏我入鹿也参加了接见。他一身将军打扮，腰佩长剑，立在天皇的左侧；他的父亲苏我虾夷是个驼背老头，此时正半闭着眼坐在天皇右侧。父子俩傲视着台阶下的文武群臣，可见这父子俩的权势之大。

在苏我虾夷和苏我入鹿父子眼里，天皇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原来皇极天皇本来就是虾夷立的。所以天皇在朝廷上有什么决定，总要先问问虾夷父子，否则一概无效。满朝文武百官都知道，真正的天皇是虾夷；而他的儿子入鹿，则是实际上的皇太子、摄政王。平时，虾夷根本不把上朝当回事，因为他早就把自己的府宅叫做“皇宫”，把他的儿子称为“皇子”。朝廷掌实权的文武官员，常出入虾夷家向他请示、汇报工作。

今天，因为要接见外国使臣，碍于礼仪，苏我虾夷父子才不得不陪同天皇接见。

苏我虾夷半闭着眼，是在清点文武百官的人数，他见大中兄皇子不在百官队列中，微微睁开眼，朝天皇瞟了瞟，问道：“大中兄皇子今天怎么不来参加接见啊？”

天皇连忙回答：“噢……我实在不知道，他应该来的。”天皇并不知道虾夷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奸巨猾的虾夷见大中兄皇子下来，心里有些狐疑。他知道，大中兄皇子对他父子操纵皇室是怀恨在心的。就在前两天，他豢养的密探向他报告说，大中兄皇子在一个寺院训练军队。他叫儿子亲自去那座寺院看了看，儿子回来说，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大中兄皇子只是在那儿跟几名宫中侍卫练习剑术。

可是今天满朝文武大臣都集中在这里，唯独大中兄皇子不来，虾夷觉得此中必有蹊跷。于是，他干咳了两下，说了声“我身体有些不适”，便让人抬走了。临走前，他向儿子入鹿丢了个眼色，意思要儿子注意。但入鹿没有注意到他父亲这个眼神，站在那里不动。

“使臣到！”

随着一阵喊声，鼓乐声大作，殿上百官纷纷肃立，天皇也端坐在宝座上，挺了挺身子，坐得更直了。

三个国家的使者缓步走进宫殿，他们的随从抬着珠宝、人参、貂皮等贵重礼物，跟在后面，鱼贯而入。三国使臣分别向天皇献上礼物单子，代表他们国王说了些问候的话语。天皇乐呵呵地频频点头，命令宫中侍者将礼物收下。

这时，大中兄皇子忽然跟在使臣后面进了大殿。他一进殿，便下令宫中侍卫把官门关上。站在天皇左侧的入鹿见大中兄的举动反常，正要责问；大

中兄早已一个箭步，飞奔到他面前，举剑直刺过去！入鹿见他来势凶猛，慌忙拔剑还击。

天皇见势不妙，慌忙离开宝座，在侍卫的搀扶下避进了后宫。几名宫女吓得尖叫着，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钻。在场的外国使臣早已吓得退缩一旁；满朝文武大臣也吓得魂飞魄散，不知所措，乱作一团。入鹿的几个心腹欲拔刀相助，又怕伤了入鹿，只好在一旁干瞪眼。

叮叮当当……刀剑的撞击声响彻大殿。战了好多回合，不分胜负。大中兄卖了个破绽，虚晃一剑，入鹿扑了个空；大中兄双手握剑竭尽全力往下劈，只听“当”的一声，入鹿的剑被击落在地。大中兄接着顺势一剑，刺入入鹿前胸。这一剑来势迅猛，将入鹿刺了个穿心过！大中兄拔出剑来时，入鹿大叫一声，气绝而死。

大中兄杀了入鹿以后，把剑一挥，早已埋伏在宫殿旁的卫士立即一拥而上。有几个入鹿的心腹正要反抗，大中兄跳上天皇宝座大声喝道：“谁敢反抗格杀勿论！”卫士们将虾夷、入鹿手下的文武大臣逮住，一个个押了下去。大中兄又告诉吓得瑟缩发抖的三国使者，说这是日本国内的事，让他们受惊了，他命人将使者们安顿休息。

大中兄又来到后宫，叩见父皇说：“父皇陛下，儿臣已将逆臣入鹿处死了……”天皇脸色苍白，颤声说：“你竟然把……入鹿杀了？他父亲虾夷不会善罢甘休的，那老家伙可不好对付啊！”大中兄哈哈一笑说：“儿臣早已派军队把他家围了个严严实实，只等瓮中捉鳖啦。”大中兄说罢，要天皇继续接见使臣。

入鹿的尸体已被人抬走，地上还洒着一滩血迹。三国使臣被人请了来，抖抖索索地完成了未进行完毕的礼仪。

这时候，大中兄指挥的大队人马已冲进宫中，同时迅速地占领了全城主要据点。大中兄率领一支精锐人马，将苏我虾夷的家包围得水泄不通。大中兄威武地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挥剑吆喝着：“虾夷老贼！不出来受死更待何时！”大中兄的部下也吆喝道：“我们只要虾夷首级，别的人放下武器可免一死！”虾夷见侍卫和亲信家丁纷纷放下武器，打开大门，大中兄的士兵已一拥而入，便长叹一声，举起短剑向腹部狠狠刺了进去……

除掉了虾夷父子，第三天，大中兄皇子拥立他的舅舅为孝德天皇，仿效中国建年号为“大化”，并且迁都到难波——就是今天的大阪。

第二天，孝德天皇颁布了革新诏书，按照中国隋唐封建制国家的形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土地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废除过去贵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奴隶）的制度。天皇成为全国土地最高所有者，部民归属国家，称为公民，过去的贵族，成为政府官吏，从国家那里得到俸禄。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

建立新的授田制度。政府对年满16岁的良民，每隔六年授田一次；土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国家；受田人须负担国家的租税和劳役。

确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实行征兵制，军权归属中央。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

这场革新虽然是通过宫廷政变自上而下实行的，但不是偶然事件。因为长时期以来，苏我氏专政，社会混乱不堪，人民早已不满，朝中一些有识之士，都想模仿中国强大的唐朝，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

大化革新对日本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抑制了旧贵族的特权，解除了旧贵族对“部民”的奴役，使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独立性，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化革新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开端。

但是这次改革是不彻底的。农民从旧贵族奴役下解脱出来，却又在新的土地制度下受到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分得的一点土地，不能养活一家，还要缴纳沉重的赋税，承担庄园主的劳役。正如后来一位日本诗人所写的那样：

“天地虽然宽广，穷人只感到狭小；
日光虽然明亮，照不到穷人身上。
村长夹着棍子来了，板着脸孔站在身旁。
厉声催我交纳租子，天哪，
这样的日子怎么度过！”

（贺兰）

鸿门宴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好大喜功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公元前 215 年，他派大将蒙恬率领 30 万军队去攻击匈奴，夺取了黄河河套西北的 34 个县。第二年，又征兵进攻南越，并派 50 万人前去驻守。同时，他又征召了大量民夫修筑长城。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又派蒙恬率领民夫、士兵修筑从九原到云阳的大道，由于工程险峻，直到秦始皇死时还没完工。此外，秦始皇还征召了 70 万人修筑首都咸阳的阿房宫，以及为他自己准备的陵墓。这些浩大的工程沉重地压在老百姓的肩上，老百姓承受不起，心里都开始怨恨秦始皇。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在出游的路上病死。他的小儿子胡亥与大臣赵高、李斯等人密谋，篡改秦始皇的遗诏，杀掉了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由胡亥继承了皇帝的位置，史称秦二世。

秦二世上台后，听信赵高的话，用严酷的刑法治理国家，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混乱，而老百姓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公元前 209 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全国各地的老百姓纷纷响应，到处有人举起义旗。其中有两支起义军队伍逐渐壮大起来，一支是沛县人刘邦领导的，一支是宿迁人项羽领导的。

公元前 208 年，陈胜兵败被杀，起义军出现群龙无首的状况。项羽的叔父项梁，便召集各地的起义军首领，在山东薛地开会。刘邦也参加了这次聚会。有一位 70 岁的老人范增，平时很喜欢研究奇谋巧计，这时也来到会上，对项梁说：“当初秦国灭了‘山东六国’，其中楚国是最无辜的。楚怀王因为受骗到了秦国，便被扣留在秦国不能回自己的祖国，所以楚国的居民到现在还很怀念楚怀王。当时就有人说，‘楚国哪怕只剩下三家人，灭亡秦国的必定是楚国人！’陈胜起义后，不立楚国君王的后代为王，而自立为王，所以得不到拥护，以至战死。你现在刚刚起义，楚国的将士就纷纷响应，是因为你的祖先是楚国的大将呀。大家都希望你能立楚怀王的后人为王，以兴复楚国。”

项梁认为范增的话很有道理，就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名叫心，将他立为楚怀王，以顺应老百姓的愿望。

楚怀王同各位义军首领约定，将来哪一个首先攻入关中，占领咸阳，哪一个就可以称王。

不久项梁战死，项羽便代替叔父成为这支军队的领袖。这时秦国的大将章邯率领秦军进攻起义军，同项羽的军队发生激战。项羽在渡河接近前线时，便把船底都砸破，把饭锅都打碎，“破釜沉舟”，以此表示要同敌人决一死战，不留退路。结果项羽军九战九胜，杀了秦将苏角，活捉了秦将王离。这一战使项羽的威望倍增，各路起义军都情愿接受项羽的领导，项羽当了“诸侯上将军”，成为各路起义军的统帅。

秦国大将章邯在前线作战，可是在朝廷中，却受到了赵高的猜忌，使他进退两难。在朋友的劝说下，章邯终于同项羽签订了投降的协议，率领秦军主力 20 余万人一起投降了起义军。

可是，投降的秦军士兵军心却不稳定，很多人怕被起义军带到远离故乡的东方去，也有人怕秦二世危害自己的亲属。项羽担心这些士兵影响自己的军事行动，便趁夜间发动突然袭击，把这 20 万投降了的秦军士兵全都杀死了！

就在项羽与秦军主力艰苦作战的同时，刘邦已率军队逼近了秦国的首都咸阳，很快攻克了武关。秦军又在峽关集结兵力。抵挡刘邦的进攻。刘邦本打算硬攻，谋士张良对刘邦说：“秦军还有战斗力，不可草率进攻。听说秦军守将是屠夫的儿子，可以用重金去收买他。请你派人在周围山上多竖旗帜，使他认为我们的军队很多；另外再派能言善辩的酈食其带着财宝去收买他。”

刘邦依张良的建议做了。秦将果然动了心，情愿和刘邦联合起来，一起向秦国首都咸阳进攻。刘邦非常高兴，准备同意秦将的要求。张良又劝刘邦说：“现在只是秦将想叛变秦国，士兵不一定都听他的号令。如果士兵不听他的号令，事情反而麻烦了。不如乘秦将打算投降、秦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攻打他们。

一定可以取胜。”刘邦又接受了张良的建议，向秦军发动突然袭击，秦军果然大败。刘邦乘胜一直追到了咸阳城下。

这样，刘邦就在各路起义军中最先到达了咸阳城外的霸上。

秦二世胡亥已被赵高杀死，继位的是他的侄儿子婴。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便乘着白色的车子，驾着白色的马，用绳子系在脖子上，带着皇帝的玉玺符节，来向刘邦投降。刘邦没有杀子婴，交给部下看管起来。

刘邦进入咸阳，看到秦王朝豪华富丽的宫殿，很想住进去。张良和大将樊哙都劝刘邦不要住在秦朝皇宫中。刘邦也同意了，把秦宫中的珍贵宝物、财产都加上封条，然后仍回到霸上驻地。他把关中各县的乡民代表召来，对他们说：“我同各路诸侯有约定，谁先进入关中，就可以做关中王。现在我应当做关中王了。

秦朝用严酷的法律统治，老百姓都受了很多苦。我只同大家约法三章：杀人的人，要处死；伤人的人，要抵罪；偷盗者也要抵罪。此外一切旧法全部废除。我军驻在霸上，就是要等各路诸侯到来，大家一起订个条约，以求安定百姓。”秦国的老百姓都很高兴，纷纷带着牛羊酒食，献给刘邦的军队。刘邦还不肯接受。秦国的老百姓更加高兴，都盼望刘邦做关中王。

这时有人就劝刘邦：“秦国这一片土地非常富裕，财富是天下的十倍，地形又非常有利。现在听说秦国大将章邯已投降项羽，项羽封他做雍王，分给他的就是关中这一块土地。章邯如果来做关中王，你就做不成关中王了。你应该早作打算，赶快派兵把守住函谷关，不许各路诸侯军进入，并且让你的部队作好战斗部署，抓紧招兵买马，以抵御各路起义军。”

刘邦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就派兵去守住了函谷关。

到了这年的11月份，项羽果然率领各路诸侯军队向西进发，要进函谷关，可是函谷关却被刘邦派来的军队封锁了。项羽听说刘邦已抢先一步平定了关中，大为恼火，当即派人攻破了函谷关。

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见项羽势力大，便悄悄派人向项羽告密说：“刘邦已打算在关中称王，并且让秦王子婴担任宰相，秦王宫中的金银财宝，都已被刘邦据为己有。”他想以背叛刘邦为代价，获取项羽的好感，求项羽封他一个好官职。

项羽听了曹无伤的密报，更加愤怒，下令说：“明天一早，让士兵饱餐一顿，然后去消灭刘邦的军队！”

这时，项羽军队有40万人，驻扎在新丰的鸿门。刘邦只有10万军队，驻扎在霸上。项羽的谋士范增对项羽说：“刘邦过去是个爱财如命、生活腐化的人，现在进入咸阳，却什么好东西都没拿，看来他的志向不小啊！你要

赶紧把他消灭掉！”这句话，更坚定了项羽消灭刘邦的决心。

刘邦和他 10 万军队，都面临着灭亡的危险，而刘邦自己还没有觉察。

幸亏项羽的另一个叔父项伯，早年同张良是好朋友。项伯为朋友的命运担心，便连夜骑快马飞驰到刘邦军中，私下里拜会张良，把项羽明早就要攻击刘邦军的计划，泄露给了张良，并要张良立刻随他离开刘邦的大营。项伯对张良说：“你可不要白白同他们一起被杀啊！”

张良说：“我在危险的时候背着刘邦逃走，是不够朋友义气的。我不能不报告刘邦。”

项伯只好答应了。

张良立刻去见刘邦，批评他不该听信别人目光短浅的话，派兵封锁函谷关。刘邦也知道自己的军队不是项羽的对手，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张良让他自己去向项伯求情，说自己决不敢背叛项羽。

刘邦见了项伯，用对兄长的礼节对待他，亲自举杯为项伯敬酒；并且与项伯约定，让他们的儿女结为婚姻。刘邦对项伯说：“我入关以后，什么好东西都不敢动，登记造册，贴上封条。就是等项羽来接收。派士兵守住函谷关，是怕有别的盗匪乘机混进来。我在这里日夜都在盼望项将军到来，怎么会反叛呢？请你千万向项羽说明我的心意。”

项伯答应代刘邦向项羽做解释，并且叮嘱他说：“你明早。定要亲自来向项王谢罪！”

刘邦答应了。项伯又连夜赶回项羽军中，把刘邦的话，详细地转达给项羽，并且说：“如果不是刘邦先消灭关中的秦军。你又怎么能这样顺利地直达咸阳呢？现在刘邦有破秦的大功，而我们出兵攻击他，这就不义了。倒不如好好地对待刘邦。”

项羽觉得项伯讲的也有道理，便点头称是。

第二天一早，刘邦只带了一百来个随从，从霸上来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说：“我和将军，合力攻秦。我也没想到能够首先攻入关中消灭秦国。现在我们在这里见面，却因为小人的挑拨，产生了一些误会。”

项羽马上说：“这都是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

当时，项羽留下刘邦，设酒宴招待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刘邦孤身进入项羽军中，虽然说项羽表示谅解他，但他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因为项羽的谋士范增一心想杀掉刘邦，为项羽除掉这个厉害的对手。

刘邦在鸿门宴上，时刻面临着杀身之祸！

在酒宴上，项羽和项伯坐在西面，范增坐在北面，刘邦坐在南面，张良坐在东面。范增一再暗示项羽杀掉刘邦，项羽却一直默不作声，好像没有看到一样。

范增见情况不对，便起身走出宴会营帐，找到了勇士项庄，对他说：“项羽为人心肠太软，不忠心亲自下手杀刘邦。你进营帐去，先向刘邦敬酒；然后就要求席间舞剑，为他们助兴；在舞剑时找机会杀掉刘邦。如果今天杀不了刘邦，将来你们都会成为他的俘虏！”

项庄于是走进营帐中，向刘邦敬酒，然后，项庄说：“大王和贵客饮酒，军中没有什么可以供娱乐的，请准许我舞剑，来招待贵客。”

项羽说：“好！”

项庄于是拔剑起舞。项伯很快看出项庄的企图，便也拔出剑来，与项庄

对舞。在二人舞剑的时候，项伯经常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刘邦，使项庄没有机会刺杀刘邦。

张良见情况十分危急，也急忙起身出帐，到军营门口，找到了大将樊哙。樊哙问张良：“事情怎么样了？”张良说：“十分紧急！现在项庄拔剑起舞，但是他的用心是想刺杀刘邦！”

樊哙说：“这可太紧急了！我进去，与刘邦同生共死！”他带了宝剑，拿着盾牌，闯进了军营大门。守卫的项羽军士用武器拦阻他，他用盾片护着身体，向卫兵冲去，把卫兵撞倒在地，自己就进入了营帐。樊哙分开营帐门，脸向两边站着。瞪圆眼睛，怒视着项羽，头发都一根根竖了起来，眼角都睁裂了。

项羽见了大吃一惊，按住剑，大声问：“来客是什么人？”

张良说：“这是刘邦的随身护卫，叫樊哙。”

项羽说：“真是壮士啊！赏他一碗酒。”

手下的人送过去一碗酒。樊哙拜谢之后，站起身来，一饮而尽。

项羽说：“赏给他一只猪蹄！”

左右送过去整整一条猪腿。樊哙把盾覆在地上，拔出剑来切开猪腿，狼吞虎咽。项羽看着这副情景，大为赞赏，说：“真是壮士啊！你还能再喝酒吗？”

樊哙大声说：“我，连死都不怕，一碗酒还有什么可推托的呢！因为秦王残暴狠毒，心肠像虎狼一样，杀人如麻，用刑最重，天下人苦痛不堪，所以都起来反秦。楚怀王同各位将领有一个约定，先打破秦国攻入咸阳为王！现在沛公刘邦先打破了秦国的防线，进入咸阳，封闭了秦王的宫室，驻军在郊外的霸上，专等大王来接管。现在大王不仅不说一句好话，反而听信小人挑拨，还要害沛公。这实在是不讲道理啊。”

项羽听了樊哙这一通教训，不知是害怕樊哙的勇武，还是内心确实感到惭愧，竟没有应答，只对樊哙说：“请坐下。”

樊哙于是在张良身边坐了下来。

酒宴虽然表面上还在举行，但气氛却比樊哙进来前更加紧张，现在不但刘邦，连项羽也都感到危机四伏！大家都在默默地盘算，这场宴会将怎样结束。

这时，刘邦站起身来，说要出去小便，便向营帐外走去。他暗中向樊哙做了个手势，樊哙马上跟了出来，紧紧地守护着刘邦。

张良也不声不响地走出了营帐。

项羽见客人都离席了，便让陈平去请刘邦再进来喝酒。

刘邦和樊哙商量说：“现在这种形势，我应该赶快离开。但是我出来时，没有向项羽告辞，这是有失礼貌的，怎么办呢？”

樊哙果断地说：“做大事的时候，不必太顾虑小的细节。现在人家是刀和砧板，我们成了鱼和肉，正是任人宰割的危险关头，还讲什么告辞不告辞！”

于是刘邦决定脱身逃走，而让张良留下来向项羽道谢、告辞，张良问刘邦有没有带礼物来，刘邦说：“我带来一对白玉璧，想献给项羽，一双玉斗，想送给范增。但是宴会上气氛一直不好，我不敢随便拿出来，你帮我献给他们吧！”

刘邦大军所在的霸上，离鸿门 40 里，但从小路走只有 20 里。刘邦把带来的车马随从都留在项羽的军营门口，只同樊哙等几个人悄悄地骑马从小路

逃离了鸿门。

过了一会儿，张良估计刘邦可以到达霸上，项羽已无法追上刘邦了，这才回到宴会的营帐中，向项羽赔礼说：“刘邦酒喝多了，醉得很厉害，所以不能亲自向大王告辞，他让我把这一双白玉壁，献给大王；一双玉斗，献给范增大将军！”

项羽问：“刘邦现在在哪里？”

张良说：“刘邦听说大王有责备他的意思，很是害怕，故而先回去了。这会儿大概已经到军营中了吧！”

项羽没有再说什么，接受了玉壁，放在桌子上。范增接过玉斗，扔在地上，用剑把它击得粉碎！他又气又恨，叹息说：“唉，你们这些没有见识的年轻人，真没法同你们共商大事！将来夺取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刘邦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刘邦的俘虏啊！”

刘邦回到军中，立刻杀了曹无伤。

后来，刘邦经过五年的征战，终于打败了项羽，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汉王朝，他就是史书上经常提到的汉高祖。

（薛兵）

林肯遇刺

1865年4月14日，是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四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被刺的日子。这一天也是耶稣殉难日。南北战争进行了整整四年，战火席卷了全国，这时，正是北方联邦政府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南方联邦军队即将投降的时候。

早晨，总统和平时一样，七点钟动身前往白宫的办公室。伏案工作一个小时，研究停战以来从前线发回的报告。然后和家人一起用早餐。餐后，总统又回到办公室，接见来访的众议员、参议员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

在上午接见客人的间隙中，总统想起了妻子交给他的任务，于是派人到第十大街“福特剧院”通知剧院经理，今天晚上，他将借夫人和一些朋友前往观看演出。格兰特将军也将同去。

格兰特将军完成了在阿波马托克斯村的受降谈判后，已和夫人一起回到了华盛顿。上午开内阁会议之前，格兰特私下告诉总统，晚上他将失陪。他要和夫人去新泽西州的伯灵顿看望在那儿上学的女儿。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格兰特夫人不愿见到林肯夫人，这位第一夫人很任性，曾多次当着她的面大发雷霆。

会后，总统陪夫人乘马车遛了一会，路上，总统谈到未来的四年，以及四年以后的岁月。他打算离任以后要回到伊利诺州的春田老家去，重新干他的律师。他还打算经办一个农场，地点最好是在流经家乡的桑格蒙河畔。末了，他长叹一声说：“啊，我一生中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快乐！”

夫人像预感到什么似地，说：“还记得吗？维里死的那一天，你也说过这话。”她指的是三年前死去的小儿子。

后来，当总统和卫兵威廉·克鲁克走向作战部时，他大概还在想着妻子的话，对克鲁克说：“你知道，我相信有人想要我的命，而且我丝毫不怀疑他们会成功的。”

总统和作战部长史丹顿谈了一会关于前方残余敌军投降的消息，然后，要求派一个人陪同他和夫人前往“福特剧院”。他觉得爱克特少校比较合适。史丹顿说少校晚上另有任务。他劝总统晚上最好不要去剧院。不过，他最终还是派了作战部的雷斯波恩少校执行这项任务。

当天下午，华盛顿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总统夫妇和格兰特将军将去福特剧院观看演出的消息。剧院将上演汤姆·泰勒的流行喜剧《我们美国的表兄弟》。由于最近罗伯特·李将军投降，加之总统光临，人们预料福特剧院将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

那天中午，一个面容苍白、留着短须的青年演员来福特剧院取邮件，当他得知总统晚上要来剧院看戏时，便激动得浑身颤抖。此人名叫约翰·威尔克斯·布什，26岁，是著名的英国演员米尼叶斯·布鲁特斯·布什之子。约翰·布什的野心比他的实际能力大得多，他在舞台上不能像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一样成功，便想成为一个英雄。原先，他的立场是站在北方的，但后来却又转向南方。作为一个演员，他那种浮夸的表演在南方更能赢得观众。不过，他从未参加南方军队。战争期间，布什在华盛顿、纽约和其它东部城市演出。从1864年底到1865年初，他一直呆在华盛顿。有一次，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看戏，恰巧布什在那出戏中扮演一个恶棍，于是他乘机对着总统吐出那些恶毒的台词，张牙舞爪发泄内心的仇恨。

林肯总统和他的随员都感觉到这个演员好像对他有故意，却并没有十分在意。

早在一年之前，布什就纠合了一班亡命之徒，企图绑架总统，曾经有过两次机会，但都没有得逞，总统临时改变了原定计划。1865年3月4日，在林肯总统第二次就任的宣誓大典上，布什和他的同伙距离总统只有数英尺之遥。从当时记者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见，这个阴谋者就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

后来，由于布什的主张，他们决定改绑架为刺杀总统。

今天，他终于找到机会了，这个亡命之徒认为他终于可以成为英雄了。他浑身颤抖着跑到第七大街的一个马房，让人把他的独眼马牵到福特剧院后的一个马厩去。接着又到附近的一个马房租了一匹栗色牝马，吩咐四点钟为马备鞍，供他使用。然后，他回到寄宿的旅店。旅店主人萨拉特太太的儿子约翰·萨拉特是南方联邦军的信差，也是他们这个阴谋团伙的成员之一。此时，约翰·萨拉特出城去了。

随后，布什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他在一家酒吧间喝了些白兰地，然后找到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官邸，问门房副总统是否在家。门房的回答是“不在”。于是，布什在一张名片上写道：“不想打扰你。你在家吗？威尔克斯·布什。”门房随手把名片放在约翰逊秘书的文件盒里。

布什到普姆福雷马房牵出栗色牝马，试了试马的速度，然后回到寄宿店独自策划晚上的行动。

六点左右，布什把栗色马牵到剧院后的马厩，拴在他自己的独眼马旁边。他给舞台道具管理员和守门人带来一瓶威士忌，趁他们痛饮之际，溜到总统包厢的入口，在门上凿了个洞。从这个洞里既可以看到包厢内的人，又可以看到舞台的情景……

吃过晚饭以后，布什回到旅店楼上休息片刻，八点左右才动身。临出门时对看门人说，“今晚福特剧院有好戏看哩！”他找到自己的同伙刘易斯·佩因、大卫·霍罗德等人，给他们分派了任务：一个去杀国务卿，一个去杀副总统，还有一个接应自己……事毕后，四个人在海军部大桥碰面。如果不能及时赶到那里的话，便到萨拉特村去。之后，他们将骑马穿过弗吉尼亚州，以英雄的姿态奔赴南方……

这天晚上，林肯一家早早用过晚餐。十二岁的泰德因获准一个人去格罗夫剧院看儿童剧而兴奋得喋喋不休；刚开始服兵役的罗伯特感到疲惫，去卧室休息了。

总统和夫人在男仆佛布斯及车夫的陪同下登上马车。两名骑兵跟随车后，护送他们去剧院。马车先在参议员哈里斯的住处停下，接了雷斯波恩少校和克拉拉·哈里斯，又继续前进。他们来到第十大街的福特剧院门口，总统等四人在路人的注视下下了车。人们很少看见总统晚间外出消遣。

负责总统安全的卫兵约翰·帕克已经先到剧院，他先到总统包厢外面自己的岗位上看了看，发现从那里看不到演出，便到旁边的花楼给自己找了一个位子。这个帕克，向来是个极不负责的家伙，既不可靠，又不诚实，原在华盛顿市警察厅工作，曾因玩忽职守和违反纪律受到十四次处分，但他不知用什么办法赢得了林肯夫人的好感，竟把他调到白宫来当卫兵。当总统一行8点25分到达剧院时，戏已经开始了。

帕克正在看戏。看见总统来了，他起身来到前厅，将他们领到总统包厢，

然后又回到花楼自己的位子上去。这时，演出暂停，乐队奏乐向总统致敬，之后，演出又继续进行。

9 点钟过后，布什来到剧院后台，他穿着骑服，足蹬高马刺皮靴，戴一顶深色软边帽。让西班牙格勒拉住马，布什穿过舞台下面一条通道，走进隔壁“明星”酒吧，要了一杯威士忌，边喝边和其他人交谈。其中有几次离开酒吧到前厅窥视，显得神情紧张。

当第三场第二幕将近结束的时候，布什决定开始行动了。他穿过花楼，进入通向总统包厢的那条走廊，随手关上门，在预先挖好的榫眼里插上一根木棍，把门拴牢。接着，他憋住气，从小孔里窥视总统和台上的演员。当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大笑时，布什立刻推开包厢的门，拔出一支口径为 44 毫米的大口径短筒手枪，对准总统的左耳上方开了一枪。

林肯总统的身体稍稍前倾了一下，接着就仰面倒下了，不省人事了。

包厢里其他人都惊呆了。雷斯波恩少校首先跃起扑向凶手。布什扔掉手枪，拔出一把大猎刀，对着少校猛砍下去。少校后退一步，鲜血从他的左上臂涌出。布什跨过栏杆，企图往下跳，少校紧抓住他的衣服不放。栏杆上的国旗缠住了凶手右脚上的马刺靴，他失去平衡，从距下面 11 英尺高的包厢摔到舞台上，双膝着地，左腿一根腿骨折断了。他顾不得疼痛，从地上跳起来，摆出盖世英雄的姿态，挥舞着手里的猎刀，用法语对观众嚷道：“这就是暴君的下场！”尔后，他冲过舞台跑出剧院后门，在小巷里跳上栗色牝马，仓皇逃走，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剧院里的观众先是给搞懵了，许多人以为那枪响和持刀跳到舞台上的人都是剧中情节的一部分。接着，他们听到林肯夫人的尖叫，又听见雷斯波恩少校大叫“抓住那个人！”这才开始乱作一团。

观众中有两位年轻的外科军医，他们不顾一切地冲进包厢，为已经失去知觉的总统进行抢救治疗。他们让林肯平卧在地，用小刀割开他的衣领，露出脖子和双肩，这才发现总统左耳后的弹孔。脉搏已经非常微弱。而总统夫人却在一个劲地哭喊。

经过全力进行人工呼吸，总统的脉搏才又开始跳动。但是，两位军医都意识到像这样部位的严重枪伤是没有治愈希望的。因为，直径半英寸的枪弹已经嵌入颅脑，只差一点就要从右眼穿出来了。

之后又有两名医生加入了抢救，他们采取了一切办法来延长总统的生命，又把他转移到一间比较安静的房间里，放在一张床上。正当医生们商议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时，林肯夫人突然又闯进屋，边哭边问：“我亲爱的丈夫，他在哪儿啊？”人们把她关进前厅的起居室，她仍整夜不停地哭泣叫喊，有时还突然闯入总统躺着的房间，很令人厌烦。

总统的家庭医生罗伯特·斯通博士和军医局局长也来了。所有人都竭尽全力地企图抢救总统的生命，但由于子弹射入太深，无法取出，能做的都做了，他们只能坐着静候总统临终的时刻到来。

就在布什开枪的那个时间，另一起刺杀案也在进行。刘易斯·佩因被派去刺杀国务卿威廉·西沃德。

西沃德正在家里养伤，胯骨还带着铁夹板。10 点多钟，他的女儿芬妮和军护乔治·罗宾逊听到楼梯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却没有想到灾难已经临头。国务卿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也听到脚步声，走出来看看是什么人。佩因手里拎着一个小包闯进来，自称是西沃德的医生让他给国务卿送药来的。

弗雷德里克不让他进屋，两人争执了一会，突然，佩因拔出左轮手枪对准弗雷德里克扣动扳机，枪却没响。他立刻举起枪向弗雷德里克头上砸去。接着拔出刀冲进病人房间，刺倒罗宾逊，又挥拳打倒芬妮，跳到病人床上，挥刀向西沃德的脸部和颈部猛戳。罗宾逊从地上爬起来与凶手扭成一团。后来，佩因挣脱逃了出去。在外面接应他的赫罗德已经不知去向，只有独眼马还拴在树上。他跳上马飞奔而去。

罗宾逊等人把血迹斑斑的西沃德抬回床上，幸亏由于胯上的铁夹板保护，国务卿未受致命伤。他还清醒，告诉儿子：“我没有死，快去请医生，叫警察，封锁这间房子。”

作战部长史丹顿赶来了，他就住在附近。紧接着传来总统遇刺的消息。史丹顿立刻作了全面部署，发布通缉令，并命令所有通往马里兰州的路上都设置路卡，严密搜捕凶手。

史丹顿派人给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送信，让他准备代理总统。约翰逊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也是被暗杀的对象之一。被分派刺杀他的那个人叫乔治·阿特才诺特，这是个胆小而又嗜酒如命的家伙，一想到刺杀政府高级官员，他就吓得要死，扔了刀子，找一个地方喝得酩酊大醉。

约翰逊副总统去向林肯总统作最后的告别，看见躺在那里垂死的总统，默默地立了几分钟便离开了。原因是他不想见林肯夫人，她一会儿还要来。

黎明时分，总统开始呻吟，呼吸变得急促而微弱，皮肤也变得冰凉。凌晨7时22分，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四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与世长辞了。

4月14日夜里，杀害总统的凶手布什骑着那匹栗色牝马，顺利地通过了海军部大桥，午夜以前在马里兰州一个村子里与另一个同谋者大卫·霍罗德相逢。两人在萨拉特村的一个小饭馆取了卡宾枪、威士忌和一只望远镜，然后继续逃亡。

在此后的五天搜捕中，刺杀国务卿的刘易斯·佩因和原被派去刺杀副总统的乔治·阿特才诺特先后落网，另外还有几个阴谋集团的同伙也陆续被捕。但是主要凶手布什仍逍遥法外。

根据被捕者提供的线索，北方士兵骑马紧紧追赶猎物。他们在博林格林的一家旅馆里逮捕了一个叫杰特的家伙，逼着他交待了布什和霍罗德的下落。接着，他们来到加勒特的农场，包围了两个罪犯藏身的烤烟棚。

士兵们向布什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五分钟之内不走出棚子，就要放火烧了。

布什企图拖延时间，在里面回答说 he 需要考虑考虑。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提出一个荒唐的要求：“我是一个瘸子，只有一条腿。如果你们撤到一百码以外，我就出来和你们决斗。”

要求遭拒绝。他又提出另一个类似的要求，但同样遭到拒绝。布什决定拼命了，他大声叫着：“那么，勇敢的孩子们，为我准备一副担架吧。”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布什叫起来，“慢着，这里有个人想出去。”接着听见他对霍罗德说：“你这该死的懦夫，你要在这时候离开吗？去吧去吧，我才不愿和你呆在一起呢！”

士兵命令霍罗德先交出武器，然后，让他打开棚门走了出来，立即被带走了。

史丹顿曾有命令，一定要活捉凶手。指挥官让士兵点燃一根绳，扔到棚子边的一堆干草上，棚子立刻烧起来。布什仍不出来，他要像一个英雄一样

享受最后的光荣。只见他在棚子里跳来跳去，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端卡宾枪对准外面的士兵。

中士科别特在墙缝里看见了布什，朝他开了枪，子弹击中了凶手的后脑勺。

布什一倒下，士兵们就冲进燃烧着的房子，把他抬了出来。这个垂死的家伙断气以前说：“告诉我母亲，我是为祖国而死的……我认为我做了一件最好的事。”过了一会，他又低声问：“是杰特出卖了我吗？”

4月29日清晨，罪犯死去，那天上午，林肯总统的灵柩正停放在纽约州奥尔班尼城的州政府大厅内供人们瞻仰。

现在，所有的罪犯均逮捕归案，八个活着的是：佩因、阿特才诺特、斯班格勒、霍罗德、劳林、阿罗德、马德医生和萨拉特太太。约翰逊副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指示立即成立九人军事委员会，对罪犯进行审判。

作战部长史丹顿在总统遇害的那天晚上及时地控制了局势，在审判八名罪犯的过程中，他也始终是决策人物。他决心要狠狠地惩罚这些阴谋者，而不愿受那细致的法律条款约束。他认为，一位伟人被暗杀，每一个与此案有牵涉的人都应该尝尝这杯苦酒。他并不认为抓住八名罪犯就可以了结此案，而确信南方的上层集团乃至联邦总统杰佛逊·戴维斯都与此案有关。

5月9日，军事法庭开庭。一些享有盛名的律师愿意免费为被告辩护。

审判持续到6月底，有四百多名证人出庭作证。数周前已死去的布什也受到审判。佩因的律师企图证明他的当事人患有精神病，这样就可以免于—死。他请了一位精神病专家到庭作证。可他却没想到精神病专家却以有力的事实证明佩因决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决没有一个精神病患者会说出“我疯了”这样的话；当佩因从西沃德家逃出来时，有人听见他这样大声叫嚷。佩因的律师也正是抓住这一点做文章的。他显然大错特错了。

萨拉特太太的辩护人认为虽然她的儿子是阴谋集团的成员，萨拉特太太和他们却没有直接牵连。法庭认为，她的寄宿店是阴谋者的碰头地点。而且有两位证人发誓证明是她把卡宾枪、威士忌和望远镜放在萨拉特村旅馆的。时间就是总统遇刺的那个星期五的下午。

6月29日，审判结束了。法庭决定判处佩因、霍罗德、阿特才诺特和萨拉特太太绞刑；马德医生、阿罗德和劳林被判服苦役六年（萨拉特太太的儿子约翰·萨拉特逃往欧洲）。由于约翰逊总统生病，判决结果直到1865年7月5日才宣布。绞刑定于7月7日中午执行。

7月6日上午，犯人们得知判决结果。萨拉特太太老泪纵横，霍罗德和阿特才诺特丧魂落魄，只有佩因不动声色。后来，不断有人为萨拉特太太求情，要求给她减刑。甚至连林肯总统过去政敌的遗孀史蒂芬·道格拉斯夫人这样有名望的人都出面了。但是，约翰逊总统绝不为之所动，坚持维护军事法庭的判决结果。

7月7日天气炎热，下午两点钟，犯人押到刑场，四个人头上都蒙上了头套，绞索套上了他们的脖子。行刑信号一发出，刑架下面的支撑架就被推倒，他们的身体随之快速坠落，悬在了空中……

一切都结束了，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孙石夫）

真假沙皇

沙皇伊凡四世没等上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就于 1584 年死去了。他留下两个儿子，大的叫费多尔，是第一个皇后生的；小的叫季米特里，是最后一个皇后生的。

按照规定，大儿子费多尔继承了皇位。小儿子季米特里当时才两岁，由他的母亲带着，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去了。

费多尔是个有病的人，而且愚蠢不堪。登上沙皇宝座后，整天在教堂里祈祷，还不停地敲那里的钟闹着玩；或者观看讨好他的大臣们表演滑稽和互相厮打。老百姓们都讥笑皇帝是个傻瓜。

傻瓜怎么能治理国家呢？慢慢地，皇室大权落到了他舅父波利斯·戈东诺夫手里。

波利斯很能干，又善玩弄权术。他把自己不满意的权贵大臣们统统排挤掉，将自己的家当作俄国的宫廷，自行接待起外国的使节来。国家的大事都由他说了算。

在波利斯掌权期间，俄国颁布了一个法令：政府有权帮助地主追回逃亡不满 5 年的农民；一个自由的人只要给地主工作 6 个月以上，就成为地主的奴仆。这样一来，农奴制加强起来，农民所受的压迫也更加深重了。

1598 年，多病的傻瓜沙皇费尔多终于死去。因为他没有儿子，弟弟季米特里也在 7 年前死去，所以皇位就空缺了。这下波利斯遇到了好机会。经过王公大臣们的选举，波利斯当上了沙皇。

波利斯上台两年，俄罗斯国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由于这一年多雨，加上秋寒早早就降临了，大片大片的秋熟作物都被冻坏了。秋天地里播下的麦子，第二年又没有发出芽来，农民们连重新播种的种籽都没有。饥民们靠啃野草和树皮度口。接着是整村整村的人饿死，就连首都莫斯科的街上，每天都有上百个饿死的尸体。

波利斯生怕饥民们起来造反，下令分发仓库里的粮食。但是，官吏们从中渔利，能分到饥民手里的为数很少；而商人、地主和寺院的仓库里，却堆积着大量粮食。可怕的饥荒从 1601 年一直延续到 1603 年。大批饥民实在活不下去，便和奴仆们结成队伍袭击地主和商人。波利斯下令武装镇压，“罪犯”们成百上千地被绞死在树上，而且不准收尸。但残酷的镇压并没吓倒走上绝路的饥民，他们对波利斯的统治更加仇恨。波利斯为此坐立不安。

正在这时，又有一件事使波利斯心惊肉跳，茶饭不思。原来民间到处有这样的传说：

“你听说吗？伊凡四世的小儿子季米特里没有死，他还活着呢！”

“是呀，听说他在立陶宛（当时俄罗斯人称波兰为立陶宛），马上就要回俄国！这回波利斯得把皇位让给他啦！”

传说越来越多。后来有人说，季米特里已经带着波兰军队来莫斯科继承皇位了，因为只有他才是真正合法的沙皇。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季米特里同他的哥哥费尔多一样，是个多病的人。1591 年他 9 岁的时候，有一次在宫廷里玩刀，正好羊痫风发作，全身痉挛，口吐泡沫，跌倒时正好尖刀刺穿了咽喉而死去。当时没人在场。季米特里的母亲听说儿子死了，她匆匆赶来，抱着尸体痛哭流涕，大喊大叫，说她儿子是当时掌管朝

政的波利斯派人刺杀的。波利斯连忙赶到宫中，尴尬地说：“别忘了，我是沙皇的舅父，我怎么会派人杀害他呢？”但无论他怎么解释，季米特里的母亲就是不信。

后来，波利斯派了一个以瓦西里·叔伊斯基王公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件案子。经过调查，由叔伊斯基签署证词，确认季米特里是自己丧命的，与波利斯无关。结果季米特里的母亲被迫去了修道院，算是对诬告摄政大臣的人的惩罚。

既然季米特里已经死去，那么怎么会又冒出一个季米特里？现在这个季米特里，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跟波兰又有什么关系？

原来，这跟波兰有莫大的关系。当时的波兰贵族地主正想并吞俄罗斯，可是又不宜使用武力，于是尽力利用俄国老百姓对波利斯的不满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放出谣言，说季米特里还活着，他是沙皇的合法继承人，这样波利斯就得被迫下台。

果然，一个冒牌的季米特里应运而生。此人原来是一个逃亡的僧侣，却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季米特里。他说自己9岁时没有死去，而是得救了，后来往在波兰，现在是公开自己身份的时候了。

波兰国王喜出望外，马上召见“季米特里”。波兰国王知道此人是个冒牌货，态度傲慢地坐在宝座上不动弹，只略略点了点头，问道：“你就是季米特里？”假季米特里也故作傲慢地挺着肚子说：“难道还会是假的吗？哈哈……”

波兰国王令左右侍从们退下，示意假季米特里在他身边坐下，说：“戏就演到这里吧，闲话少说，我们来做一笔交易：我出钱帮助你，准许你在贵族中招募军队；你得答应在你取得俄罗斯皇位后，把俄罗斯的两个省割让给我。”

假季米特里连连说：“可以，当然可以。”

波兰国王命人取来一张事先写好的协议，递给假季米特里说：“那就请‘陛下’签个字，如果你违背诺言，你不但当不成沙皇，连你的性命也难保的！”

假季米特里毫不犹豫，拿起鹅毛笔签上了他的真名事情办得非常顺利。不多久，波兰贵族中就有上千个冒险家投奔假沙皇。一个破产的市长，还主动把女儿嫁给这位未来的沙皇。

1604年秋，冒牌的季米特里带着军队侵入俄罗斯。农妇、农民们都天真地以为，这个沙皇肯定比波利斯好，所以都支持他进军莫斯科。仇视波利斯的贵族，也站在假季米特里一边。最可笑的是那位叔伊斯基王公，他曾经亲自调查过季米特里的死因，并且作了肯定的证词，现在竟也跟着说皇子还活着，正在来首都的途中。波利斯眼看众叛亲离，心急如焚，不久突然去世。

1605年6月，假季米特里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就进入了莫斯科；一个月后，正式加冕，当了沙皇。

这个假季米特里登上皇位后，马上暴露出波兰走狗的真面目：逃亡的农民都被弄回到原先的地主那里受折磨；波兰贵族到处发号施令，胡作非为；大量的金银珠宝被装运到波兰去。

第二年春天，假季米特里的未婚妻来到莫斯科，同“沙皇”举行了盛大豪华的婚礼。接着大摆筵席，滥吃狂饮。喝得醉醺醺的波兰贵族和士兵，又干出许多无法无天的勾当。莫斯科的老百姓忍无可忍，纷纷要求采取行动。

叔伊斯基王公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进行了精心的策划。5月17日凌晨，响起了预定的钟声，接着警钟响遍首都。全城到处在呼喊：“去打波兰人！打死波兰人！……”

人们一边呼喊，一边向克里姆林宫奔去。没过一会儿宫前广场上挤满了人。直到这个时候，冒牌的季米特里才知道大祸临头了。他赶紧跳窗逃跑，结果摔成重伤，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人们找到了他，一阵乱棒，当场把他打死了。几天以后，假季米特里的尸体被焚毁。有人愤恨地说，应该把这个假沙皇送回老家去。于是人们又把他的骨灰装进炮筒，朝波兰方向发射出去。民众们打死假沙皇后，又去寻找欺压他们的波兰贵族报仇。

他们攻击那些坏蛋们的住宅，一下子打死了2000名波兰贵族和士兵。

首都的领主们惟恐民众们当政，赶紧推举叔伊斯基王公为沙皇。正是这个叔伊斯基，一会儿证实季米特里已经死去，一会儿又说皇子仍然活着。现在，他又宣布刚被打死的是假沙皇。

为了表明自己现在说的话千真万确，还特地把真的季米特里的骨灰，隆重地移到莫斯科的教堂里，防止假沙皇再次出现。叔伊斯基当上沙皇后，丝毫也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各地农民又纷纷发动起义……

（贺景闻）

慕尼黑奥运村惨案

1972年9月5日，联邦德国慕尼黑奥林匹克大运动场上的圣火在晨曦中熊熊燃烧，迎来了第20届奥运会的第11天赛程。

凌晨4点，整个慕尼黑城还在沉睡中。奥运村附近的大街上时不时跑过几个为当天比赛进行热身的运动员，“沙沙沙”的跑步声为这座万籁俱寂的城市更增添了几分宁静。然而，现代奥运史上第一次大灾难，却在这黑暗中孕育、爆发，并闪电般地划破了慕尼黑的黎明。

8名身穿黑色紧身衣的蒙面人，正一步步地逼近地处康那利大街31号的奥运村。他们借助随身携带的登高器具，悄然无声地越过了6英尺高的电网，潜入奥运村营地。

一个蒙面汉从黑提包里掏出几支苏制AK—47型冲锋枪。分发给同伴们。这种冲锋枪能自动连发，一分钟可吐出上百发子弹。子弹射离枪口的瞬间速度，每秒达2330英尺。如果近距离射击，一连串子弹就可把人劈为两截。这种枪是当今国际恐怖活动中最流行的一种武器。由此可知，这几个蒙面人必定是从事恐怖活动的职业杀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在这黑漆漆的夜晚，这伙不速之客窜进奥运村，肯定要出事了。

4点25分，这群恐怖分子扑向奥运村内以色列代表团的宿营地。他们用万能钥匙插入一号公寓大门的锁孔，试图把门打开，发出咔嚓咔嚓声。

公寓内，以色列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德从睡梦中惊醒，他最先觉察到门外的动静。这位体重275磅的壮汉，稍稍迟疑了一下，以为这响声是室友摔跤教练摩西·温伯格发出来的，这家伙也许外出玩乐回来了。但是，他突然听到门外有几个人在嘀嘀咕咕说阿拉伯语，便意识到大事不好了。他霍地跃身而起，扑向大门。一面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死死抵住正在开启的大门，一面用希伯来语向同伴大声报警：“有危险，赶紧逃！”

几个蒙面汉一拥而上，企图推开古特弗罗英德顶住的大门。一方在门里拼命地抵，一方在门外使劲地推，两股巨大的力量，把门框都顶弯了，连门上的铁条也变了形。古特弗罗英德以生命赢得的这几十秒的时间，却为同室的举重教练舍克创造了逃生的机会。他破窗逃走了。

毕竟恐怖分子人多力大，古特弗罗英德抵挡不住，大门连同门框一起轰然倒地，把古特弗罗英德压在地上。一号公寓内的其他4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田径教练夏皮勒、击剑运动员安德烈、射击教练舒尔和举重裁判斯勃林慢了一步，刚出房门，就被黑洞洞的枪口堵住。蒙面汉对他们拳打脚踢，威逼他们说出其他以色列运动员的住处。为首的恐怖分子挥舞着AK—47型冲锋枪，恶狠狠地吼道：“谁为我们带路，找到其他以色列人的公寓，我们就给他自由。否则，就休想活命！”可是谁也不理他。他气得哇哇乱叫，一拳将古特弗罗英德打翻在地。几个歹徒拥上去，一顿毒打后，又将古特弗罗英德五花大绑起来。

恐怖分子从这几个以色列人嘴里挖不到什么东西，便留下两人看守，其余的人开始在康那利大街31号营地内四处搜索。根据情报，他们知道营地内还住着乌拉圭和香港代表团，就放过了二号、四号和五号公寓。其实，那里还住着8名以色列运动员，他们也因此而幸免于难。恐怖分子径直扑向三号公寓。他们知道那里住着以色列运动员。

这时候，以色列摔跤教练温伯格在康那利大街的娱乐中心玩了个通宵

后，正跌跌撞撞地回来，恰好与恐怖分子狭路相逢。透过路上的灯光，歹徒们一眼就认出温伯格是他们所要捕捉的目标。两三个蒙面汉从暗处一下子窜到温伯格面前。可温伯格并不是好惹的，他与古特弗罗英德一样，是个大块头。他猛地挥拳击倒一个家伙，接着又将另一个歹徒打得连连后退。第三个蒙面人吓慌了，扣动了冲锋枪扳机，子弹打穿了温伯格的脸颊，温伯格捂着脸跌倒在地。几个恐怖分子扑上去，把他抓起来。

到了三号公寓，恐怖分子故伎重演，用万能钥匙打开大门。正在房里熟睡的6名以色列运动员，全都没有逃脱厄运。他们是摔跤运动员哈尔芬、斯拉温和佐巴利，以及举重运动员马伯格、霍里德和鲁曼诺。为便于看守，恐怖分子把三号公寓的以色列运动员赶往一号公寓。在经过一片树丛时，轻量级摔跤选手佐巴利，瞅准机会，撒腿钻进树丛。恐怖分子慌忙开枪，但这位个儿小又灵活的运动员，早已七绕八拐地逃得不知去向了。身负重伤的温伯格此时乘机猛击一个歹徒的下巴，将他的上颌骨击碎，接着又一拳把他击昏在地。另一名恐怖分子端起冲锋枪，对准温伯格的胸膛就是一梭子，温伯格像堵墙似地倒了下去。

剩下的5名运动员被押到一号公寓。举重选手鲁曼诺和队友马伯格被关在厨房里，他们趁看押的家伙打瞌睡，便挣脱捆绑，想翻窗户逃出去。可是不小心碰倒了一只酒瓶，发出了响声。那家伙惊醒后冲过来。鲁曼诺从桌上抓起一把菜刀，砍中了那家伙的前额。歹徒痛得哇哇叫，瘫倒在地。这时，另一个歹徒闻讯冲进厨房，扣响了扳机，一连串的子弹射在鲁曼诺的身上，他应声倒下。后来当救护人员来搬尸体时发现鲁曼诺被子弹打得齐腰断为两截。

再说温伯格被击倒后，并没有死，一阵清风使他苏醒过来。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朝一号公寓走去。正在门口望风的蒙面歹徒，见一个血淋淋的庞大身躯跌跌撞撞地直朝他走来，不禁大吃一惊，竟吓得忘了开枪。温伯格一眼认出蒙面仇人，愤然跃起，一拳就将歹徒击倒。另一个歹徒从屋里冲过来，随着一阵枪响，温伯格头部中弹，倒地身亡。

此刻，时间已到了清晨5点。恐怖分子最初的行动持续了大约45分钟。他们杀死了两名以色列运动员，抓获了9名。两名运动员挣脱了魔掌，还有8名选手没被恐怖分子找到。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以色列运动员驻地一片混乱，但离康那利大街31号仅200多米的慕尼黑警方设立的奥运会“危机处理中心”，却尚未弄清事件的真相。他们只得到诸如“康那利街31号营地有人打闹”之类含混不清的报告。这或许并不奇怪。当时，大部分人都在酣睡之中。而恐怖分子整个行动进行得时断时续，几声呼救和清脆的枪响过后，一切便又重归平静。即便有人听到这些声响，也不会认为有什么。因为在奥运村，这几天几乎夜夜都有各种名堂的狂欢活动，时常有人燃放鞭炮焰火，高声喧闹取乐，所以对大多数睡在以色列人隔壁的代表团成员来说，这次绑架行动发出的声响，听上去与平日的吵闹声、鞭炮声相差无几。

4点55分左右，有一名治安警察来察看情况。他看见一号公寓前面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以为是小偷，便大喝一声：“你在干什么？”原来这家伙正是放哨的恐怖分子。他没敢吱声，拔腿溜到屋后去了。那警察绕着屋子兜了一圈，没见到什么异常情况，也就转回去了。

他刚返回不久，“危机处理中心”就接到那两名逃生的以色列运动员分

别从南朝鲜和意大利代表团的营地打来的电话。警方这才得知事情的真实情况。

5点30分，慕尼黑警方收到恐怖分子一封英文信。恐怖分子把温伯格的尸体抛在康那利大街上，一把短刀将这封信插在尸体旁边。从信末的署名，联邦德国警方才得知这伙绑匪是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黑九月”的突击队。

“黑九月”是赫赫有名的恐怖分子头目阿布·尼达尔创立的。

1967年6月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人退守约旦，在那里设立了训练营地，向以色列开展武装斗争。1970年，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已超过本国国民的半数。约旦当局极为忧虑，生怕引火烧身，在约旦出现“国中之国”，便制造事端与巴勒斯坦人产生摩擦。

1970年9月，约旦当局的军队在安曼街道上向巴勒斯坦人开枪射击，在难民营里大开杀戒，死伤达几万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黑九月”事件。

为了反对以色列，同时也为了打击“反动的阿拉伯国家”，以怨报怨，以牙还牙，一个名叫“黑九月”的恐怖主义组织于1970年年底成立了。它选择的第一个报复目标，就是指派军队屠杀巴勒斯坦人的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尔。

1971年11月28日，塔尔在访问开罗时被4名恐怖分子击毙。从此，恐怖事件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现在，“黑九月”又将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无辜的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它的报复目标。此次行动的代号是“比拉姆和伊克拉特行动”。比拉姆和伊克拉特是被以色列人占领的两个村庄的名字。很明显，其矛头所指仍是以色列当局。

在那封英文信中，“黑九月”提出了他们的要求：立即释放234名被以色列当局关押的巴勒斯坦人，释放被联邦德国当局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的成员，上述要求满足后，才与联邦德国当局谈判，然后再派三架飞机把8名突击队员送到安全地点，在那里，他们将释放9名以色列人质。如果在上午9点以前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们就要“将人质全部或逐个儿地处决”。

这一重大绑架事件，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顿时震动了慕尼黑，震动了奥运会。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联邦德国政府迅即进行磋商，总理勃兰特特地从波恩飞到慕尼黑，亲自处理这一事件。他委派慕尼黑所属巴伐利亚州政府出面，向“黑九月”提出一项和平建议，探讨用金钱赎回人质或用联邦德国人质换回以色列人质的可能性。巴伐利亚州的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慕尼黑前任市长以及市警察总长等高级官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纷纷表示愿以自己去换回人质。但恐怖分子断然拒绝接受这一建议，只是把最后期限延长到中午12点。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电话里与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紧急磋商了10分钟，其结果不出所料，这位以色列女总理态度极其强硬，宣称对恐怖主义绝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作让步。尽管如此，梅厄还是作了努力，她立即请求国际奥委会暂停奥运会的比赛，以便联邦德国政府全力解决绑架事件。同时，她表示不干预联邦德国政府为营救人质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此外，她立刻派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头子扎米尔飞往慕尼黑，协助处理这一棘手的事件。

联邦德国与绑架分子谈判伊始，德方就表示满足“黑九月”的要求，释

放关在狱中的暴力团伙头目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恐怖分子较为满意，在上午8点时答应降低要求，只需一架飞机分批将他们和人质运往开罗，到那时，如果以色列还不放人，就在开罗处死人质。这无疑是一种妥协，他们原来曾扬言，如果到时不放人，在飞离慕尼黑之前便当场处死人质。

上午9点，联邦德国当局给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去了食品。勃兰特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对这一事件深表痛心。他希望此事能得到妥善解决。同时他提议本届奥运会将继续举行，不要因此而取消。尽管“黑九月”态度强硬，联邦德国当局仍未放弃和平努力，他们请出突尼斯驻联邦德国大使当调停人，劝说绑架者。但大使游说的结果，只是又将最后期限延长了5小时。恐怖分子扬言，下午5点之前如下放人，就开始杀死人质，然后自杀。

看来和平谈判难以奏效，联邦德国政府别无选择，开始考虑用武力解决问题了。

这时，以色列的代表扎米尔已经飞到慕尼黑，他仔细地阅读了联邦德国方面送来的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警方佯装答应恐怖分子要求，在他们最新提出的半夜12点这一最后期限之前提供飞机。由边防警察部队（后来改建为反恐大队）埋伏在机场，准备在恐怖分子上飞机之前发动突然袭击。老牌特工扎米尔表面上没对方案提什么意见，内心却很担心。他知道联邦德国警方在反恐行动上没什么经验，准备工作又过于匆忙，神枪手太少，武器装备不很先进，结果很可能凶多吉少，但既无权干涉德方的行动，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听天由命了。

晚上8点，联邦德国内政部长根舍和奥运村村长特勒格尔来到扣押人质的一号公寓，向恐怖分子转达了联邦德国政府的答复。双方会谈了45分钟，决定在10点钟开始将绑架者和人质转赴机场。

“黑九月”随后发表了第二个声明，声称8名突击队员和人质将分3批乘飞机离开联邦德国，只有当前一批人安全抵达开罗后，后一批人才会离开慕尼黑。声明最后警告说，联邦德国当局任何动武的企图都将导致9名人质的死亡。

晚上10点，警方准时将一辆大众牌客车开到康那利大街31号的奥运村营地。绑架者将全部人质押上客车，然后开到附近的一块草坪，两架直升飞机正停在那里。8名恐怖分子把9名人质分作两批押上两架直升飞机，用冲锋枪抵住驾驶员的后背，命令他赶快起飞。15分钟以后，直升飞机飞抵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在机场探照灯的照射下，一架波音727喷气式客机正静静地停在跑道上。这就是联邦德国政府为绑架者提供的飞机。

这时，扎米尔在德方军官的陪同下，正坐在机场控制塔里。不久前，他看见了500多名军警乱哄哄地进入机场周围的埋伏地点时，心里就非常后悔，没在从奥运村到上直升飞机的途中动手，因为在那里营救人质相对要容易得多。扎米尔对军警准备不足甚为担心。德方军官在一旁安慰他说，警方已精心挑选了5个职业狙击手，就隐蔽在波音飞机旁，他们奉命在多数恐怖分子走下直升飞机后开火。既然是神枪手，在这么近的距离击中目标是不会有问题的。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几个所谓的“神枪手”身上。8名绑架者见当局果然“信守诺言”，不由大喜过望，很快就有4名恐怖分子跳下直升机。他们用枪押着一名直升机驾驶员，准备去检查那架将飞往开罗的客机。那5名狙击手竟不会使用红外线瞄准器，只能通过普通瞄准器观察对手。机场灯光也造成众多阴影。狙击手模模糊糊地看到有许多影子，误以为大多

数恐怖分子下了直升飞机，便认为时机已到，慌慌忙忙地开了火。

扎米尔在控制塔上用红外线望远镜观察着这一切。他清楚地看到狙击手至关重要的第一排子弹竟没有击倒一个绑架者，气得拍着桌子大叫：“糟透了！这些家伙太无能，事情要败在他们手里了！”

枪声一响，恐怖分子知道中计了，立即举枪还击。直升飞机上的4名驾驶员见事不妙，跳下飞机就逃，其中两人安全脱险，另两人被流弹击中，负了重伤。以色列人质在直升飞机上动弹不得，他们手脚被绑，双眼蒙着黑布，只能坐以待毙。

但出乎意料的是，恐怖分子没有立即打死人质。也许他们正忙于应战，无暇顾及。也许他们是想为谈判留下一条后路，不到万不得已不处死人质。

双方对射了一个多小时。恐怖分子几次拒绝了联邦德国方面的劝降，尽管他们很清楚，顽抗下去只会死路一条。因为考虑到直升飞机内还有人质，警方的火力大受限制。于是，便决定由6辆装甲车掩护军警进攻。

就在装甲车逼近直升飞机时，一名恐怖分子向载有5名人质的那架直升飞机里投了一颗手榴弹，直升飞机立刻爆炸，化作一团火球。紧接着，另两名恐怖分子窜上第二架直升飞机，枪杀了机内的另外4名人质。

令人痛惜不已的是，如果装甲车的进攻推迟几分钟，那么，第二架直升飞机里的4名人质或许可能幸免于难了。趁着混战的当口，这4名以色列运动员已在设法挣脱绳索。人们后来发现，在粗大的绳结处，留下了他们的齿痕，绳结有所松动。这表明，他们用不了多久就能挣脱绳索，去袭击守在直升飞机外的两名恐怖分子，夺取武器而自救。至于第一架直升飞机上的以色列人质，则无法判定他们有无采取行动，他们的躯体被烈火烧得缩成一团，难以辨认了。

军警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冲到直升飞机前，5名残存的恐怖分子，有3名被生擒，另两名还在负隅顽抗。

15分钟后，一个叫依萨的恐怖分子被击毙，就是他向直升飞机扔进那颗致命的手榴弹的。最后一名恐怖分子叫托尼，他曾作为一名建筑师参加过修建慕尼黑奥运村，因此，对绑架现场极为熟悉。他在机场边打边躲，使军警很难靠近他。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枪战，他陷入绝境，手一扬又击中了一名警察的颈部。一阵乱枪射过来，终于将他击毙。此刻已是凌晨一点半了。

在机场交火中，9名以色列人质无一生还；8名恐怖分子，5名被击毙，3名投降；还有两名联邦德国军警被流弹打死，多名受伤。

奥运史上这一惊心动魄的悲剧，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全球有5亿多观众通过电视转播，亲眼目睹了奥运村绑架现场以及联邦德国当局与恐怖分子周旋，直至最后在机场狙击、交火的全部场面。

9月5日，奥运会因这一事件而被迫停办一天，次日继续举行。到9月11日奥运会结束时，苏联赢得55块金牌，名列榜首，美国获33块金牌，位居第二，而以色列则运回去11具尸体。

（陈中）

汉宫冤魂

汉代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65岁的汉武帝已经做了将近50年皇帝。尽管他年轻时曾经做过许多大事业,这时也已年老体衰,明显地感觉到了精力的不足,对于自称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神仙法术”,就格外感兴趣。汉武帝的皇宫里,便常常有许多“活神仙”来来往往。

这年冬日的一天,汉武帝没有什么事,就在上林苑建章宫里闭目养神。他在恍恍惚惚中,仿佛看到一手持长剑的男子,快步闯入中龙华门内。汉武帝大吃一惊,喝道:“谁?谁敢闯入宫来!”可那男子顿时没了踪影。汉武帝急忙命令宫中护卫捉拿这个男子,然而护卫们把宫中翻来覆去搜了个遍,也没发现丝毫可疑之处。

汉武帝不肯相信。他一边下令把监门官推出宫门斩首,一边又调集驻守在京城郊外的骑兵部队大搜上林苑。骑兵们纵横搜索,把个上林苑像梳头发一样梳了一遍,还是毫无结果。汉武帝还不放心,又下命紧闭长安城,挨家逐户核查人口,闹得鸡飞狗叫,人人不安,一连折腾了十几天,也没找出个可疑分子来。汉武帝这才只好罢休。然而,汉武帝心中的疑惑并没有消失。他想,明明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怎么会搜查不出来呢?莫非是有妖魔在作怪?这样一想,汉武帝就格外紧张起来,整天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在谋害他。

恰在这时,京城里又出了一件大事。汉武帝朝中的丞相公孙贺,仗着自己的妻子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一贯胡作非为。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也因为有一个皇后姨妈和一个丞相爸爸而当上了大官,他更加目无法纪,竟挪用国家军事款项达1900万钱之多,罪行败露后被捕入狱。公孙贺为了救儿子,便请求汉武帝让他去捉拿劫富济贫的大侠朱安世,以功劳抵赎儿子的罪过。汉武帝同意了。公孙贺调集大批军马,布下天罗地网,没几天果然把朱安世抓住了。朱安世得知公孙贺兴师动众捉拿他的原因后,就在审讯时揭发公孙贺唆使巫婆使用妖法谋害皇上。本来就疑神疑鬼的汉武帝,得到这报告,立刻信以为真,下令逮捕公孙贺,交给杜周去审问。杜周是当时有名的酷吏,用刑非常狠辣。他知道汉武帝的心思,所以千方百计罗织公孙贺的罪名,不久就把公孙贺父子都整死在狱中,把他们全家都抓起来杀了,而且一直株连到汉武帝的两个亲生女儿和卫皇后的一个侄子,连他们也都被杀掉了!

这样一来,皇后卫子夫和她所生的太子刘据,也就大祸临头了。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夏天,汉武帝又添了许多病症,更觉得整天心神不宁,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为了养病,他住到了甘泉宫中。这天晌午,汉武帝倦倦地躺在床上休息,不一会儿,就发现有许多木偶向他涌来,而且越聚越多,只见前后左右,头上脚下,奔跑飞腾的全是木偶,密密匝匝地把他围得严严实实,而且个个手握棍棒,口中喊打,吓得汉武帝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惶急之间,突然惊醒过来,原来是场恶梦。

正在这时,汉武帝宠爱的大臣江充进宫来看望汉武帝。汉武帝便向江充诉说了梦中的情景。江充皱着眉头,认真地说:“恐怕还是有巫师作怪,才搞得皇上龙体欠安。”那时候科学不发达,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便以为世界上另有不可捉摸的“鬼”、“神”作怪;而一些巫师巫婆乘机造谣惑众,更加深了人们的迷信程度。巫师们有种说法:只要根据仇人的模样刻成一个小木偶,用针锥刺心钉眼,埋到地下,或者到庙宇里去向鬼神祷告,这

个仇人就会遇到灾祸甚至死亡。江充这么一说，汉武帝马上相信是有人做了他的木偶在谋害他，所以委任江充专门来查办这件事。

江充大权在手，马上调集了一批人马，在京城到处巡查。一旦发现可疑迹象，或者挖出木偶，这家的主人就会被当场逮捕，押送到官府去严刑逼供。然而，许多挖到的木偶都是江充事先派人去埋下的。江充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扩大事态，以证明确实有人在谋害皇上，一方面也是试探皇帝对他的信任程度。被他逮捕的人中，有普通百姓，也有高官贵族，甚至皇亲国戚。汉武帝一概不问，完全交给江充去处置，以至大批无辜者遭受残害，死于非命；汉武帝还认为这是江充对他的忠诚。

江充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汉武帝的充分信任，于是又开始策划另一个大阴谋，就是陷害太子刘据。江充要陷害太子刘据，也是为了讨好汉武帝。原来，皇后卫子失的外甥霍去病和弟弟卫青，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为汉武帝立下过不朽的功劳，他们在世时，卫家在朝廷上的势力非常大，刘据的太子地位也十分稳固。可是在霍去病与卫青相继去世后，卫家的势力就大大减弱了，再加上又出了个不争气的公孙贺，汉武帝对卫皇后的态度越来越疏远了。太子刘据性格温和宽厚，与汉武帝的勇武好战大不相同，也使父子间产生隔阂。更重要的是，太始三年

（公元前94年），汉武帝宠爱的妃子钩弋夫人又生下了皇子刘弗陵，他很想把皇位传给弗陵，但是太子刘据并没有什么大过错，汉武帝也不好平无故地取消他的继承权。江充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陷害太子刘据。

江充在京城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见汉武帝对自己更加信任，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指使一个巫师向汉武帝报告，说皇宫中妖气太重，有碍皇帝的健康。

汉武帝果然深信不疑，又派江充到皇宫里搜查。江充带了一班亲信，先在别的宫室中装模作样地搜了一回，很快来到太子宫中。在这里，江充一伙到处挖掘，挖得宫中坑连坑、沟连沟，几乎没有一块平地。然后，江充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木偶对太子说：“这些木偶都是在太子宫中挖出来的。事关重大，我不能不向皇上报告！”

太子刘据本以为自己没做过亏心事，所以根本不在意江充的所作所为，现在听江充说出这种话来，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一时竟不知怎么办才好。正好少傅石德在太子宫中，刘据便请石德帮他想个办法。石德说，“江充蓄意伪造罪证，陷害太子。皇上不了解他的险恶用心，又看到所谓的‘真凭实据’，肯定会相信他的话。我看不如先把江充抓起来再说。”

太子沉思了好一会，说：“我是皇上的儿子，没有皇上的命令怎么能自己做主张伤害皇上的使者呢？我应该到父皇那里去请求宽恕，就没有事了。”石德见太子这样说，只好让他去见汉武帝。可是江充似乎猜到了太子的心思，早已派人把守住路口，不让太子去见汉武帝。

太子回到宫中，想来想去，终于决定采用石德的办法。第二天，太子派一个亲信冒充汉武帝的使者，假传圣旨，带了许多武士去逮捕江充。江充虽然奸诈阴险，却没有料到太子会这样干，毫无防备，被武士们轻而易举地捉住带回了太子宫。刘据指着江充大骂：“你这个奸贼！竟敢搅得我们父子不和睦！”当即命令把江充推出去斩首。

处死江充之后，太子刘据知道危机还没有消除，马上派亲信去报告母亲卫皇后，并且借用了皇后专用的车马去运载武士，又开了武器库发放兵器，

组织一支武装力量进行自卫。

这时，江充家一个漏网的爪牙，逃到了甘泉宫，把太子假传圣旨捉走江充的事，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说：“太子一向为人宽厚，这回一定是因为害怕，又愤恨江充，才闹出事来的。”他还说想亲自同太子谈一谈，便派了一个使者去召请太子。哪知这个使者胆小如鼠，跑到外面转一圈，听了一些传闻。就赶紧跑回甘泉宫来，编了一个谎言报告汉武帝，说：“太子真的造反了！我奉命召请太子，太子说要把我斩了，我才不得不逃回来。”汉武帝听说太子果然造反，面色大变，连声催促刘丞相去捉拿太子刘据。

不一会儿，又有人来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已经发布文告，通告百官，说是皇上在甘泉宫病危，有奸臣乘机作乱，所以太子才诛杀了江充等人。汉武帝马上意识到，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便带病赶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亲自把京城附近的军队都调集起来，去支援刘丞相。

太子刘据面临生死危机，只得铤而走险。他把监狱中关押的囚犯全都放出来，让他们充当他的士兵，又沿途强拉老百姓当兵，居然也组织起几万人的部队。这时刘丞相的军队已经杀到，双方恶战了五天五夜，打得昏天黑地，长安城中尸横满街，血流遍地，惨不忍睹。

刘据的乌合之众毕竟抵挡不住刘丞相正规军的进攻，结果一败涂地，太子刘据只身逃出了长安城。

汉武帝回到皇宫中，马上派人去逼皇后卫子夫自杀。卫家的亲属朋友，甚至与太子比较接近的人，全都惨遭杀害。被迫加入太子部队的老百姓，也都被流放到荒僻的边疆去了。

太子刘据逃亡在外，汉武帝一时难以查获，只得派重兵把守长安城的十二个城门，唯恐太子再领兵杀回来。一些老臣都劝汉武帝饶恕太子，认为太子调兵是为了自卫，并不是造反；最好是让太子回到京城中来。汉武帝虽然觉得老臣们讲的有道理，但仍然不想宽恕太子。

当时，刘据隐藏在河南灵主县一个穷人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只得冒险去向一个有钱的朋友求助。这一来走漏了风声，当夜就遭到官兵的围捕。太子刘据走投无路，只得自杀。太子的两个儿子也相继遇害。

汉武帝的后患消除了。然而，想到失去的儿子和两个孙子，他又觉得很伤心。第二年，他查明江充的所作所为，才明白太子刘据实在死得冤枉，特地在太子遇害的地点，修建了一座“思子宫”，并在宫前筑了一座“归来望思台”。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公开承认自己做皇帝以来的一系列错误和失策之处，并且采取种种措施，补救过去的失误，使得西汉的社会，又一次走向繁荣和兴旺。

（薛兵）

日本关东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是立春以后的第210天。这第210天，就如同西方人视13日和星期五为不吉利一样，许多相信迷信的日本人也将它视作不祥之日。果不其然，这天正午时分，一场人类历史上极其惨烈的地震灾害，袭击了日本关东地区。

这天是星期六。日本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依照多年习惯，凌晨4点半起床后，便做体操、洗澡、换衣，然后在6点整吃早餐。此刻，他深感重任在肩，摄政王裕仁皇太子已经授命他组织新内阁。因为首相刚刚去世，内阁已循例总辞职，全国政务处于新旧交替间的停顿之中。

吃完早餐，他把准备去觐见摄政王时穿的大礼服放进皮箱里，然后便叫司机将他送到东京闹市海军俱乐部“水交社”。在那里，他一刻不停地忙了一上午。就在他和不愿出任阁员的大审院长平沼骐一郎促膝商谈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轰隆巨响，屋内地板晃动，吊灯也开始剧烈摆动起来。整幢房子都在摇晃，天花板上的泥灰咣当一声坠落在地，弄得满屋都是灰。很显然，是地震了。

日本是个多地震国家，每年都有15000次左右强度不等的地震，因而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山本大将掸掉衣服上的尘土，安详地向俱乐部的花园走去。一群新闻记者围拢过来，他泰然自若地对他们说：“今天你们可有新闻写了。”话音刚落，又一阵恐怖的震动接踵而至。花园水池里的水四下飞溅，屋子里则叮当一片，到处是电灯、瓷器和玻璃砸碎的声音。

山本最关心的是摄政宫的安全，他立刻穿过砖瓦遍地的走廊，从屋里皮箱拿出礼服换上，便吩咐司机：“到皇宫去。”

此次地震是东京最厉害的一次，皇家学院的地震仪显示出的震级为8.2级，但到目前为止，财产损失和市民伤亡情况似乎还不太严重。除刚落成不久的东京最高建筑，十二层的东京塔像火柴棍一样拦腰折断外，主要的大楼都还没有震塌。市内约有5千幢住宅倒塌，或许有上千人死亡，但东京有3百万人口，这点伤亡便难以觉察了。

山本大将在去皇宫途中，居然发现道路还畅通无阻。除了断裂的墙壁，塌陷的屋顶，和人行道上挤满了从房子里跑出来的人群之外，几乎还看不出发生重大变故的迹象。然而，年已七十一高龄的山本是个有经验的行政首脑，他猜想这个大都市的煤气管和自来水管一定会多处断裂，电话和输电线路也会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地震发生在中午11点58分，那时家家户户都在烧午饭，这很容易引起火灾。事实证明，他并非杞人忧天。当汽车经过银座商业区和狭窄的小巷时，他看到有六七处屋顶上已冒出浓烟。不久，这场关东大地震就演变成人类有史以来危害最烈的天灾了。

这次地震震中在东京南面50公里的相模湾海底，但剧烈的震波震撼了整个关东平原——包括东京、横滨以及东海岸几十个城镇村落，广袤近一百公里人烟最稠密的地区。

震波所到之处，地面像海水一样起伏，平原、山丘和大山都在发疯似地震动。在根府川车站，一列满载周末游客的火车刚好进站，车站设在距海面150英尺的陡坡上，危如累卵。地震震塌了车站上面的一座山头，千万吨的泥石和树木，挟着震耳欲聋的巨响倾泻而下，把车站、火车和车上所有乘客一起冲入相模湾海底。一座大森林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从田沪山塌落下

来，坠入山谷，碾过一个村庄和一条铁路，带着一大堆肢解了的人体尸首注入相模湾，把海水都染成了血红色。

镰仓海边胜地高达 50 英尺的巨型青铜佛像，从基部断裂，倒向一方，全镇 85% 的住房也被地震摧毁。逃到街上的居民惊魂未定，新的威胁又出现了。首先发现大难临头的是青年陆奥，他父亲是退休的外交官。祖父是著名的日本外相。当时他奔到海滩，去寻找他母亲，突然间他发现海水急速下退。他惊讶之余，猛然想起这或许就是海啸来临的先兆。正当他呆呆地望着怪现象出神时，一堵水墙以每小时五六百英里的速度疾奔而至。他拔足狂奔，爬上海滩边的山坡，又攀上更陡的山丘。穿过公路，发现一辆抛了锚的汽车停在那里，他急得拼命向司机打手势。

他一直跑到比海岸高出 50 英尺的地方才停下来。回头一看，海啸掀起的潮水已扑到海滩，足有 3 个人高，像小山一样压在岸上。海潮卷过山坡，直上公路，掀翻了刚才看到的那辆汽车，海水窜到镰仓镇的街道上，几乎漫没屋顶，困在屋内的两百余人，全被溺死。

这场惊天动地的海啸，伤人毁物，令人惨不忍睹。但在北方，虽然没有海啸，也不是震中，却遭到更恐怖的灾劫。

地震洗劫相模湾沿岸之后几秒钟，震波便到达人口 50 万的日本第一大海港横滨。整个城市立刻瑟缩一团，几乎每幢大楼都轰然塌下。

停泊在横滨港的澳大利亚“帝王号”轮船正准备启航，突然地下发出一声巨响，码头两端都陷在水下，把正在相互道别的人群围在当中，幸好是低潮，惊恐的人们飞奔上岸。船上的甲板剧烈地震动，几乎要将这艘一万四千吨巨轮的龙骨折断了。

紧随着这场浩劫而来的是到处无法控制的大火。所有的大水管都断裂了，救火车也埋在消防站的废墟中，而且因为横滨是港口，整个市区都在海岸边，猛烈的海风没有遮挡，更助长了火势。海滩附近的仓库和房屋很快便冒出巨大的火龙，把在码头上送别的人们赶下了海，而且逼近了“帝王号”。船上的水手们赶紧用消防水龙喷射码头和船舷，才幸免于难。而不远处的汽艇和几百条小船都烧毁了。海湾里挤满了成千上万边喊救命边游泳的人，有 2000 多人被救上“帝王号”。

在港区，庞大的煤堆着了火，整整烧了两个月。市内几十处汽油库爆炸，溢出的汽油泛滥于街道港口，整个横滨成了火海。大火焚毁了市内的商业区和最漂亮的“山手”高级住宅区，许多美国和英国的侨民都住在那里。这个外侨区灾情惨重，有 250 人死于非命。美国领事科加索夫被火烧死，他与太太以及小女儿的烧焦的尸体，事后才在领事馆花园里发现。美国人凯柏女士是费莉丝女子学校校长，地震时她被学校倒塌的房子压在下面。几位死里逃生的教职工刚想把她救出来，但未等挖到她面前，房子已被大火吞没了。只听见凯柏女士在火海中大喊：“不要管我，火已烧起来了，你们快逃吧！各位，永别了！”然后她开始高唱圣歌，营救的人几次想冲进火海都未成功，只好眼看着她被活活烧死。住在横滨大饭店的欧洲人则比较幸运。大楼塌了，但塌得很慢，来得及逃出来。最惊险的要算得上史密斯太太了，地震时她正在二楼套房里沐浴。有水管撑着的浴缸缓缓地震落到街上，躺在浴缸里的史密斯太太丝毫无损。

在地震中幸免于难的人可以避开大火的地方有 3 处。一是纵横交错的运河，当人们奔到那里，却发现地震使东京湾水位下降，运河中的水只有平时

的一半，仅两英尺深。结果使千千万万的人都困在那里，一方面受到运河两岸烈火的夹攻，一方面又被顺流漂下来的着火舢舨所包围。

第二处避难所是横滨公园。公园占地 20 英亩，离海岸一英里。人群跑到那里，发现破裂的自来水管已经使公园成为沼泽，不禁大为庆幸。那些挤在中央的人，用烂泥涂满全身，终于逃过劫难。但是，从四面八方逼来的热气实在太厉害。站在外围的成千上万人，都被活活地烤死了。

第三处是海边，这算得上是最安全的地方，因此有几万人都逃到那里等候救援。他们躲进水里，只露出一个头，随时准备避开那一滩滩着火焚烧的汽油。横滨市警察局长森冈二郎也在其中。他在水里泡了 3 个小时，才被一艘船救起。他匆匆吃了一点饭，就要求让他拍个电报去求救。惊慌混乱之中，船上的人居然也没想到这件事。森冈的求援电报说：“本日中午，此间发生剧烈地震，继之以大火，全市已成一片火海。交通工具破坏无遗，电讯全部中断。务请火速救援。”电报是拍往东京的，但结果如石沉大海。因为东京也自身难保。

再说山本大将驱车穿过人潮汹涌的东京大街小巷，来到赤坂离宫，见摄政王裕仁皇太子安然无恙，才放了心。

地震时，裕仁正在皇宫内准备用餐，他赶紧跑到院子里躲过这场灾难。山本大将向裕仁报告组阁进展情况。裕仁告诉山本，在山本就职前，暂由内阁重要成员内田康哉担任代理首相。当然，这只是个临时过渡政府。

山本深知这也不是对付目前危机的办法。他向裕仁表示，要加速完成组阁工作，以组织好震后救灾。离开皇宫返回海军俱乐部的途中，山本发现不少十字路口，有好几批自称是镇压抢劫和暴动的民众自卫团在检查过往车辆。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在一个路口，他的汽车也被悍然喝住。有一个人手执竹竿，猛地刺进车窗，在司机的眉毛附近划出一道血痕。这人要求检查他们的身份，直到听到山本报出名字，才惶恐后退，并一再为没认清山本大将而道歉。

山本见这些自发组织的人这样耀武扬威，无法无天，心里深感不安，但也无可奈何。内田的临时政府也没有办法维持秩序。因为地震造成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东京已经成了一片火海，情势很难控制了。

开始，只是有六七处烟柱，很快就增到十几处。烧了一个钟头以后，据中央远望塔值勤人员报告，一共已发生了 134 处火警。由于电话不通，消防署长只好派人去通知 30 个消防分署的负责人，让他们各自为战，分头去灭火。但因为自来水管已大都破裂，加上道路不通，他们也只能望“火”兴叹。

大火无情地在东京蔓延开来。流过市中心的隅田川两岸都是一片火海。到了下午 4 点半钟，火情已无法控制。一群群逃难的人，推着堆满什物的手推车，惊慌地从两岸涌到河边。当他们到了横跨隅田川的 5 座大桥前时，才发现对岸也是一片大火，桥那边也是涌来的难民，但想回头也不可能，只好纷纷往桥中央挤。随着两岸火势的逼近，桥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到了傍晚，大家都挤得透不过气来，不少人跳河，有些被挤下桥。不会游泳的就在河里淹死了，会游泳的也只好在水里呆着，因为岸边都燃起烧着的大火，一上岸就会被灼热的气流活活烤死。

留在桥上的人也难逃厄运。火星和烈焰如同暴风雨般地向他们袭来，点燃了他们随身带的什物，活活地把他们烧死。到了第二天早晨，5 座桥竟有 4 座被烧焦，死尸堆积如山。只有一座桥幸免，这得感谢一位有先见之明的警

察，他不准任何人携带什物上桥，因此救了近 12000 人的命。

浩浩荡荡的难民群，除了逃往隅田川上几座大桥外，更多的是在消防队员和警察的指挥下逃往那看来似乎空旷的地方。在隅田川西岸，最理想的是上野公园和皇宫前面的大广场。而在人烟稠密的隅田川东岸，唯一可以避免的地方是陆军被服厂。这个厂已经废弃了，厂房拆除后留下约莫 15 英亩的临河空地。

到了傍晚，陆军被服厂废址上已经聚集了约 4 万难民。此刻，难民们对地震已不太害怕，尽管地面又颤动了一百多次，但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余波而已，绝不会像开始的一次那么厉害。于是，许多人从肩挑车运的家具什物中，取出垫褥草席，准备在露天过夜。

然而，这些躲过了地震、火灾的难民们，万万没有想到，又一场灭顶之灾，正悄悄地向他们袭来。

东京这片浩瀚火海，方圆六千英亩。烈焰形成的上升气流，一遇到高空的冷空气，就形成一大片白云。但这种云并不含水蒸汽，却蕴藏着可怕的狂风——龙卷风。那天下午，东京上空共形成了大约 50 股巨大无比的龙卷风，许多龙卷风刮过以后，几乎没有几个幸存者，更谈不上有谁来描述它肆虐的情形了。只有东京名医池口荣吉先生，他作为难得的一位幸存者，事后叙述了这场劫难的经过。

当时池口夫妇和他们的 3 个孩子，与难民一起逃到陆军被服厂附近的安田花园里。下午 4 点刚过不久，池口一家正准备在花园草地上吃野餐。突然一阵轰隆巨响，天渐渐变得漆黑。池口抬头望去，一股旋风从白云堆里杀出，就像一根巨大的黑烟柱。它以 150 英里的时速向左旋转，沿隅田川西岸移动，强大的吸力竟把好几艘小艇卷到离水面近 10 米处，然后狠狠地掼下来。接着，旋风又横扫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把正在燃烧的校舍连同烈焰一起吸到空中。不久，它又突然转向，越过隅田川，杀到东岸，笼罩了陆军被服厂和整个安田花园。池口医生想喊自己的妻子，可震耳欲聋的风声使他本人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从旋风里飞出来的火焰开始撞击在树木上。

他连忙背起大儿子，又抱起女儿。他妻子背上绑着小儿子，与他一起迎风挣扎，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在安田别墅前，有一条长长的老式停车走廊，池口一家和其他一些难民，在旋风的半推半就下一齐挤进走廊里来了。谁知这是一条死路。旋风中心到达时，走廊变成了风洞。风中夹杂的火焰以及沸腾的河水呼啸着灌进走廊。刹那间，人们被烫烤烧焦得哇哇乱叫。几分钟后，狂风暂息，呻吟声渐止，四周一片死寂。清醒过来的池口医生可顾左右，发现他的妻子儿女和难民们全都死于非命。狂风再起，他赶紧把头贴在地面，拼命爬出这个死亡风洞。他终于爬到一棵树下，把脸埋在树根的松土里，想喘口气。这时炽热的狂风从他身上盘旋而过，他的手背烧焦，露出了骨头；头顶的发肤全烧光了；两只耳朵也烧掉了。幸好身上的衣服不知怎地没有着火，而没烧到身体。他很快就昏迷过去了。这股龙卷风又刮到陆军被服厂，夹带的火球把服装厂商店点燃了，大火迅速吞噬了库存的服装。棒着，旋风又把一堆建筑材料卷起，铁皮、木料、门窗的碎片齐飞。一个男子被飞过来的电线杆子砸断了双腿。一个警察看到一个女孩像皮球一样滚到他身边。另一个人看到有上百个人像小树干一样被风卷到半空，不禁目瞪口呆。龙卷风除了燃起大火，毁物伤人外，还潜伏着更大的祸害。旋风过处，烈焰很快耗尽了周围空气中的氧气，成千上万躲开烈焰的人结果却因窒息而死。

在陆军被服厂肆虐的龙卷风终于停息了。一批批营救人员赶到了灾区，目睹凄厉恐怖的惨景，无不瞠目结舌：被服厂空地上满是横七竖八叠了好几层的尸体，整个地区只有两百人死里逃生，其中包括池口医生。躲在这儿的4万难民都死了。

山本大将在9月2日凌晨获悉陆军被服厂的空前浩劫后，彻夜未眠，连夜完成了他的组阁工作。到天亮时分，他匆匆赶往赤权离宫，把内阁名单呈递给摄政王裕仁，当即便获得批准。

当天晚上7点半，新内阁的亲任仪式在离宫外的御花园的茶室里举行，身着大礼服的阁员逐一奉召入室，听候站在屏风前的裕仁宣布任命。

新内阁成立后，摄政宫立刻从宫廷费中拨出1000万日元捐款救灾。山本也立刻召集首次内阁会议，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秩序。

从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起，东京及其他地区都是由某些狂热分子和青年组成的民众自卫团控制着，这给震后地区的社会安定造成了后患，尤其是他们对朝鲜侨民的暴行，更使当局头痛。

1910年，日本以武力占领了朝鲜。旅居日本的朝鲜侨民与日本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深重。地震后，东京普遍流传着一个恶毒的谣言，说朝鲜侨民趁地震混乱之机在抢劫杀人，甚至说他们正纠集在一起向东京进军。这个谣言，虽然荒谬，但不少人信以为真。于是在别有用心者的煽动下，民众自卫团便纷纷以长矛大刀、木棍武装起来，在交通要道布岗，拦截搜查朝鲜人。

在体貌上，朝鲜人与日本人并无多大区别。自卫团便以念日语中5个假名的口音来甄别朝鲜人。他们要求可疑者念这几个音，凡发音不准者，就被认作是朝鲜人，立刻就会惨遭杀戮，不是被剁成肉酱，就是被活活打死。在地震发生的最初两天，遇害的朝鲜人达数千人。虽然山本立即对这些自卫团加以约束，但后果却相当严重，朝鲜侨民对日本政府纵容暴行的作法始终耿耿于怀。当然，屠杀朝鲜侨民的可耻罪行，只是少数日本人干的，一般老百姓对朝鲜人还是同情的。

山本内阁发出了一连串的救灾命令，但由于音讯不通，最初的救济工作大都是自发去做的。全市的医护人员日以继夜地拯救了千千万万受伤难民。商店老板免费提供糕点茶水。在东京中央车站，工人们从大火中抢救出一百多列火车，保证了疏散难民的需要。东京帝国饭店的经理犬丸彻三，更是了不起的救灾英雄。地震开始时，饭店正在设宴庆贺饭店开业。虽然饭店没有震倒，却受到大火的围攻。犬丸派了一百人守在屋顶，另外一百人用水桶从饭店前的荷花池里提水，送到屋顶居高临下灭火。就这样，使帝国饭店和邻近的建筑物没有被火烧掉。

东京陆军总部与大阪和其他地区间的通讯，全靠4百只信鸽来维持。不久就有35000名士兵赶赴满目疮痍的首都，担负起市区巡逻、抢修通讯线路和运送粮食的重任。

地震后，抢劫行为很少发生，除了因为军队及时赶到外，还因为抢劫犯很快发现，从烧焦的死人身上抢劫的现金珠宝会发出强烈的刺鼻臭味，很容易被军队和警察发现，一旦发现，就会当场处死。

东京的多数市民，被安置在露天的避难区里，没两天也都住进了搭起的帐篷和棚屋里。与家人离散的儿童，经当局收容的总共有好几千，其中大多数都与家人重新团聚了，但也有好几百儿童的父母始终没有找到，只好安置在孤儿院里。

最令人心酸的是处理死者的尸体。市内的每个区都设立了太平间，凡面目可辨的尸体，就先停在那里放两天待领，无人认领就送到火葬场集体火葬。火葬连燃料都没有，只好从乡下抢运来大量的松木。有一个火葬场就设立在陆军被服厂空地上，汽油浇在占地数英亩的尸体堆上，一连烧了5天5夜，才完成这桩伤心惨目的事。

关东大地震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球，世界各地都掀起救援浪潮。从震灾发生的第一天傍晚开始，许多国家的救灾物资就已经启程，赶运日本。

地震发生的当天，美国亚洲舰队正停泊在大连港。舰队司令安德森上将收到了横滨发出的那个呼救无线电报，知道日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浩劫，便立即组织救灾物资，派船只和舰艇火速送往日本。不到两天，救援物资就抵横滨，当时，灾后废墟上还在冒着袅袅青烟，横滨港内浮在海面的汽油还在燃烧。

历史上发生的其他地震与关东大地震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美国最厉害的旧金山大地震丧生的人数不过700人，而关东大地震及其引起的山崩、海啸、大火和龙卷风，则吞噬了十几万人的生命。据日本地震研究所今村明恒教授的调查，仅东京一地的死亡和失踪人数就有107519人，受伤的有42135人；加上横滨和其他灾区的伤亡数字，共死亡或失踪142807人，受伤103733人。此外，仅是东京一地被地震和大火毁掉的房屋达375000座以上，而横滨市80%的房屋被毁，这两座大都市都成了一片废墟。

当时有传言称，政府将放弃这两座毁灭的城市，另辟新址。

山本首相为澄清事实，特地请枢密院草拟一道诏书，宣布东京和横滨将在原址重建。重建计划也随之制定实施。

东京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和一条条现代化马路，还新辟了几座公园。其中，隅田公园就建在灾情最惨重的陆军被服厂附近。而在被服厂原址，则盖起了商业大厦。但政府在震后没几天就宣布在那里保留一个角落，建造起一个公园，来纪念在大火中丧生的人。公园纪念馆里保存着与地震有关的纪念品：一片嵌在安田花园树枝上的铁皮，一辆挂在树梢的破自行车。墙上陈列着震灾孤儿的绘画。在公园中央，矗立着三层楼高的慰灵堂，里面安放5800名罹难者的大骨灰坛，中央祭坛上点着一盏不灭的长明灯。

每年的9月1日，是日本震灾纪念日。在慰灵堂都要举行隆重的慰灵祭典。参加者总在千人以上，皇室每年都派亲王或公主参加。人们鱼贯而入，皇宫内厅乐师吹奏起传统的雅乐。宗教仪式由30位佛教僧侣主持。上香之后，东京佛教协会理事长致词说：“悼念大地震中的死者，是我们每个活着的人的神圣义务。”然后，在上午11时58分的时候，也就是当年地震发生时，钟声响了，全体参加者为死者默哀一分钟。

（陈济众）

戈德里主教之死

故事发生在公元 1100 年初的法国。

法兰西朗城教区的主教戈德里从英国回来了。这回他是为了向英国国王请求捐款才去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他回到朗城区的时候心情很好。

不过，前往城外去迎接戈德里的两位副主教，心中却是忐忑不安。向戈德里问候过后，他们小心翼翼地说：“主教阁下，请宽恕我们在您不在的时候，代表您，朗城的主宰，跟市民代表缔结了一项相互信守的协定。”

主教很有兴趣地问：“什么协定？”

副主教陪着笑脸说：“是这样，市民代表们请求，让他们每年交纳一大笔钱给我们，而我们则把城市交给他们自己管理。今后，城里的赋税谣役、司法行政，我们就全不管啦，主教阁下您也可以清静多啦，省去许多麻烦。”

原来，在 12 世纪初的法兰西王国，城市隶属于领主，城内的市民则是领主的农奴。主教同时也是领主，城市由他管辖。领主为了增加收入，不择手段地榨取市民的财富，所以市民宁愿向领主缴付一笔巨款，建立一种社会组织——城市公社，来取得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这种使中世纪封建城市转变为中世纪自由城市的斗争，对城市发展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在戈德里主教看来，这件事简直是无法无天，极大地损害了他的体面和利益。副主教刚把话讲完，他就脸色一沉，勃然大怒说：“你们好大的胆子，这样重大的事情，你们竟敢趁我不在的时候擅自作主！我将禀报大主教，追究你们的责任！”

副主教不示弱地说：“主教阁下，请息怒。这事情当然重大，但让平民建立公社，自治城市，已有先例，并非本城首创。康布雷、圣康坦等城市不也是这样吗？再说，国王也已同意宣誓保障他们这些权利。听说他们孝敬国王的礼物非常丰盛……”

戈德里主教听说国王也同意朗城自治，愣了半晌。最后，在另一名副主教向他禀报了市民为赎取自由而缴付的那笔巨款的数额后，他终于不再怒容满面了。接着，他跟国王一样，宣誓维护公社的一切权利。

然而，戈德里主教不仅有着贪得无厌的欲望，而且是一个不守信义的人。不久，在挥霍尽了平民交纳给他的金钱以后，他就着手实行破坏公社的阴谋，以便进行新的勒索。

这件事当然必须经过国王的同意。1112 年春，戈德里主教邀请国王来参加基督受难周（基督教纪念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周）的仪式，怂恿国王破坏先前的那个誓言，取消公社，把城市的权利缩小到从前的范围。市民们知道后，派人禀告国王，愿意再给他一笔巨款，请求他继续履行誓约。但是，主教和领主们答应给国王更多的钱。贪婪的国王当然是谁给的钱多就答应谁。结果国王宣布废止以前的协定。

领主们都很忧虑如何偿还清给国王的那笔巨款，但是，主教拍着胸脯叫他们不必担忧。他说：“如果我不能履行诺言，你们就把我送到国王的监狱去。”主教还说，谁为建立公社拿出了多少钱，那为它的取消也要拿出同样多的钱！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了平民那里，城市立刻骚动起来：所有公务人员停止了工作，各个店铺都紧闭了大门。大家决定用暴力把主教和他的同谋者置于死地。

复活节（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前一天晚上，朗城市长把平民准备暴动的消息告诉了戈德里主教，警告他明天不要去教堂做早晨祷告。狂妄的主教挥舞着拳头大嚷道：“呸！我会死于这批家伙手里吗？”不过，第二天他还是不敢到教堂去。

复活节第五天后，戈德里主教正在家里同副主教讨论如何向市民征收钱款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夹杂着“公社！公社！”的喊声。不久，拿着剑、双刃斧、弓矢、木棍和矛枪的市民队伍，逼近了主教的庭院。主教的一个护院人一手抓矛，一手执盾，试图阻挡市民，但当他刚跨出庭院门槛，就被双刃斧砍倒在地。一个领主想进入庭院，背上被矛头戳了一个洞；另一名卫士边战边退，遍体鳞伤，最后在主教的餐桌旁被利箭射中倒地。武装的平民队伍放了一把火，这些忠于主教的牺牲者的尸体，立即被投入到熊熊大火之中。

保卫戈德里主教的人纷纷反击，用石子和木棍掷击那些进攻的人，但很快就被人多势众的平民们消灭了。主教见势不妙，马上把自己乔装为奴仆躲到地下室，隐藏在一个放满酒桶的小房间里，并让一个伺候他的奴仆把门口堵塞起来。

平民们怒不可遏地高喊着，到处寻找他们的仇敌，可是连主教的影子也不见。

群情激愤的人们找到了那个伺候主教的奴仆，但他没有说出主教隐藏在哪儿。

正在这时，一个已经站到公社平民们一边的主教奴仆提议，到地下室找一找。他一进地下室，就一只只地打开酒桶，终于在一只酒桶里找到了戈德里主教。当主教的奴仆揭开桶盖的时候，戈德里主教早已吓得脸色苍白，颤抖着说：“俘虏在这里。”接着他狠狠地瞪了那奴仆一眼说：“你这只狼！”

人们纷纷拥了过来。一位平民举起点燃的蜡烛照了照戈德里的面孔说：“是他！主教大人在这里呢！”

主教被揪住头发从桶里拖出来，一直被拖到门外的小路上。尽管主教苦苦哀求，并向大家许愿发誓，今后永远不再做他们的主教，愿意拿出一笔巨款，并且离开朗城，但他的农奴们决定不饶恕这只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恶狼。一个农奴举起双刃斧，狠狠地砍破了主教的头颅；另一个用利剑割断了主教的手指，把他的戒指取了下来。这个曾经是朗城最尊贵的人物的尸体，现在被剥光了衣服丢在地上。

戈德里的尸体龇牙咧嘴地躺在路边，凡是走过这躺着尸体的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不投掷泥块和大声辱骂的，不少妇女朝他“呸呸”吐唾沫，而且谁也没想到要埋葬他。

后来，朗城的平民还是遭到了国王的镇压。新任主教在布道时说：“圣徒彼得（基督教圣经故事中耶稣 12 门徒之一）说，奴隶应该诚惶诚恐地服从自己的主人。农奴不顾上帝和人类的法规，在公社中用强力使自己摆脱主人的合法权力，都要被开除教籍，接受惩罚！”

但是，朗城平民并不理会新任主教的话，他们继续发动起义。最后，新主教被迫让步，同意城市由平民自治，只是把“公社”的名称改为“和平的机构”。

国王也认识到，城市自治有利于反对领主独立，加强王权集中，这对巩固他的统治是有好处的，因此在 1128 年批准了新主教被迫同意的让步；直到

两个世纪后，城市“和平的机构”才被法兰西国王取消。

(贺兰)

总统被绑架

在南美洲的西海岸，有个国家叫厄瓜多尔，它面临太平洋，面积 45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六百多万人，大部分居民分布于中部山地中的盆地内，多数居民信奉天主教，西班牙语为国语。

1988 年 1 月 16 日上午 8 点 48 分，厄瓜多尔总统费夫雷斯·科尔德罗乘坐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在位于瓜亚基尔市郊的陶拉空军基地着陆。他是应空军总司令的邀请，来为基地军官举行授勋仪式的。

井然有序欢迎仪式结束后，总统在国防部长、空军司令以及荷枪实弹的卫队的簇拥下，开始对基地作短暂的巡视。他们边走边说，一直来到铺着猩红地毯的检阅台前。

基地全体官兵列队整齐，向总统行注目礼。9 点整，空军总司令豪尔赫·安德拉德宣布：“授勋仪式现在开始！”

军乐队奏起了厄瓜多尔国歌。科尔德罗总统神情肃穆，身板站得笔直，目光中透着自信。他并没有感觉到潜在的危险。

侍从副官乌塞洛·德尔加多却已经感觉到了。在陪同总统对基地进行巡视的短暂十分钟里，他觉得整个基地寂静得有点让人感到窒息。一些在建筑物附近和树丛间走动的伞兵突击队员手里的枪支也没有关上保险，整个气氛中有一股隐隐的杀机……他没有告诉总统，因为这仅仅是他的感觉而已。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靠近总统，寸步不离。

9 点 15 分，国防部长萨拉萨尔在国歌奏毕之后致辞，并向身旁的总统表示祝福。当国防部长伸出手臂与总统握手的一瞬间，只听见侍卫副官大喊一声：“总统，卧倒！”随即一个猛扑将科尔德罗总统按倒在地。

与此同时，一排密集的枪弹飞蝗一般射向检阅台——是从附近的树丛那里射来的。列队的士兵立刻乱了套，有的四处散开，有的举枪乱射……只有军乐队的乐手们呆立不动，但接着就扔下手中的乐器跑开了。

混乱中，已有六名总统卫士倒在血泊中。乌塞洛身上已中了两枪，他顾不得伤痛，把总统压在身下，他只能这样保护他。

总统趴在地下高声叫喊：“别开枪，我是总统——”

枪声停止了，一位身穿伞兵作战服的军官挥舞着手里的手枪，带领伞兵突击队员们冲进来。当检阅台上下的总统卫队被解除武装之后，一名粗野的伞兵突击队员用枪托对准总统的后背狠狠一击，命令他站起来。另外几个则对保护着总统的副官乌塞洛大打出手，副官昏过去了。

费夫雷斯·科尔德罗总统的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从地上爬起来，拾起眼镜戴上，大声抗议：“我是总统，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这时，他看见国防部长萨拉萨尔也正遭到伞兵野蛮的殴打。一个下级军官居然当众抽了国家军队最高长官的耳光，并用枪管戳他的胸口和背部。总统用力挣开拧着他胳膊的那双大手，继续喊叫着：“放开，不要碰我，我是总统！”

“是，总统先生——”一个身材高大的伞兵阴笑着，对准总统脸上狠揍一拳，将总统的眼镜又打落在地。直到一辆大轿车从营房里开过来，士兵们让开一条路，这才停止了对总统等人的殴打。

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只有空军司令豪尔赫·安德拉德没有被打，大概叛军觉得应该对本兵种的最高首脑稍微客气点，才手下留情。空军司令既没有对哗变的下属给予谴责，也没有及时制止他们的暴行。他深表悲哀地凝视着

眼前的这一幕，然后默然地第一个钻进汽车。三名被吓得心惊胆颤的当地记者也被押来，士兵勒令他们将照相机里面的胶卷当场扯出来曝光作废，然后才准他们和总统一道上车。

伞兵头目对他们宣布：“你们现在已被当作人质。如果谁敢违抗命令不肯合作，就一枪崩了他！”

大轿车向陶拉空军基地内的一座小教堂开去。信奉天主教的叛军士兵竟不顾触犯天主的禁忌，将教堂作为临时监狱。

在车上，一个面目可憎的军官洋洋自得地对总统说：“我是这次事件的主谋和总指挥特里西奥·冈萨雷斯中校。如果您愿意保全自己生命的话，就请立即下令释放费兰克·巴尔加斯将军。如果到下午四点钟得不到准确的答复，那么，对不起，我们只好用这玩艺儿——”他摆弄了一下手枪，“以及你们的尸体来和政府对话了。”

此时，被关押在首都基多市东郊一座监狱里的另一位囚犯——前空军总司令巴尔加斯将军还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一切。

下午，巴尔加斯开始感到外面的动静有点异常，他的囚室外突然加了双岗。看守们的表情也显得有点与往常不同。“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心里揣摩着。

他是去年3月11日被软禁的。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空军在落后的厄瓜多尔历来以“天之骄子”自居，骄气十足的空军司令巴尔加斯为一件小事与国防部长路易斯·皮涅罗斯发生了冲突，竟然拔出枪来威胁。国防部长的警卫慌乱中开枪掩护部长，因而发生了枪战，引起一场混乱。事后，巴尔加斯躲到心腹众多的曼塔空军基地。

面对巴尔加斯将军的威胁，费夫雷斯总统发表了公开电视讲话，表明自己对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的信任。要求巴尔加斯立即停止煽动，回首都听候处理。同时郑重宣布：巴尔加斯犯有叛乱罪，已被解除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兼空军总司令职务。

巴尔加斯则回敬总统：“我拒绝这个命令，我将战斗到底！”随后率领自己的亲信部队完全占领曼塔基地，并加紧与支持他的陆、空部队指挥官取得联系，进行政变的准备。

局势非常紧张。为了防止事态蔓延，经费夫雷斯总统耐心说服，3月11日，国防部长皮涅罗斯和陆军总司令阿尔布哈同意宣布辞职。

这样，巴尔加斯才走出曼塔基地，乘车前往首都接受军事审判。他被软禁在首都东郊的苏克雷元帅空军基地。两天过去了，巴尔加斯发现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并没有真正交出手中的权力，政府的许诺只是为了把他骗出来，以便囚禁。他自然十分恼怒，便又串通苏克雷元帅空军基地的大多数官兵起来跟他造反。巴尔加斯决心背水一战，他这次将攻击的主要对象换成费夫雷斯总统本人，在电台广播中称总统是“暴君”、“独裁者”，号召军队组织起来，推翻政府。

对于巴尔加斯明目张胆的挑战，费夫雷斯总统采取了强硬措施，派遣陆军攻打苏克雷基地。叛军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却因为缺乏支持，不得不全部投降。

巴尔加斯第二次被捕。军事法庭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判处他12年徒刑。

巴尔加斯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由特里西奥·冈萨雷斯中校率领的精悍的伞兵突击队身上。这支部队是他亲自组建的，部队的指挥官全部是他一手提

拔的。这些军官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很快地，巴尔加斯从看守那里证实了这一点。他感到非常振奋。

总统在陶拉空军基地被绑架的消息，是由叛军头目特里西奥中校在瓜亚基尔电台向全国发表公告时透露出来的。立刻，全国都震动了。这位中校言辞尖刻地对总统进行了一番指责，然后提出五点要求：1、立即释放空军总司令巴尔加斯。2、罢免费夫雷斯总统的职务。3、罢免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职务。4、维护宪制进程，保证在1988年1月进行全国大选。5、建立广泛的人民阵线。

厄瓜多尔副总统布拉斯科·佩尼亚埃雷拉立即召集内阁成员和军队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讨论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

副总统和军队将领们都觉得这件事很棘手，叛军的条件是无法接受的；如果来硬的，不仅总统的生命将有危险，还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动乱。最后，他们决定还是先和叛军进行谈判。一来可以争取时间，稳定局势，同时也可以保证总统等人的生命安全。

此刻，在陶拉空军基地，特里西奥中校也正在与总统谈判。费夫雷斯总统坚决不同意释放巴尔加斯，他说：“就是我死了，也不能放掉他。”

中校说：“那么，总统先生，你将要为这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负责。你最好再认真考虑一下。”

总统沉默了。尽管他不时抚摸身上的伤痛，内心充满了对叛乱分子的鄙视和厌恶，但他也明白，如果自己拒绝了他们提出的条件，那将意味着更多的人要流血。

想到这里，他的心颤抖了。于是对中校说：“好吧，请准备让我对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你愿意妥协？”特里西奥中校顿感惊喜。但他很快就失望了，费夫雷斯总统在电话里只对副总统说停止军事总动员，避免流血冲突。希望人民保持平静，相信政府有能力解决这一突然事件……于是，他打断总统的讲话：“关于我们所说的五点条件呢？”

“我只考虑了其中的第一点。”总统异常镇定地回答。

特里西奥中校迫不及待地问：“其它四点呢？”

“我坚决不同意接受。”费夫雷斯慢慢地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盯着中校，“其实，就连第一点，我也没有下决心。”

“那好吧，您可以回到您休息的地方去了。”中校摆摆手，让两个伞兵将总统押下去。然后，他亲自跟副总统通过电话谈判。谈了很长时间，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夜幕悄悄地降临了……

在首都，副总统接到总统的电话以后，国防部也同时接到被绑架的国防部长从陶拉基地打来的电话，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暂时停止了。

对于叛军的五点要求，经过在首都的大多数政府要员和军队高级将领磋商，仅对第一条即释放巴尔加斯，认为勉强可以接受。但他们觉得这还得再跟总统商量。在陶拉基地的教堂里，扣押总统达七个小时之久的伞兵突击队官兵的耐心似乎已经到了极限，他们对外界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政府将采取什么手段来对付他们，多少感到担忧。

少数下级军官悄悄地找到特里西奥中校，提出一个需要总统亲自签署的书面保证，作为解决问题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对全体参与绑架的人员，今后

不得追究法律责任和进行报复。如果总统能够给予这种保证，他们认为可以放弃其它四点要求。

特里西奥中校思考再三，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况且，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因此，他又来到关押总统的房间，这一次，他的态度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了。他说：“总统先生，假如您保证不对我们进行报复，那么，我们现在只坚持一点：立即释放巴尔加斯将军。其它四点要求，我们可以考虑放弃。”

费夫雷斯总统见叛军的谈判条件有了较大调整，觉得解决问题的时机到来了，他说：“让我先和国防部长商量一下，然后再和首都通话。”

中校似乎还有点不放心：“如果政府同意，请将巴尔加斯将军送我们这儿来，然后，总统先生，您就自由了。这对大家都是件好事。”

晚上，双方达成了协议。紧张激烈的谈判终于结束了。

此时，陶拉空军基地的气氛是又惊又喜又忧。喜的是，他们这些参与叛乱的伞兵突击队员们将不会被政府起诉；忧的是，在双方交换人质的时候，政府会不会发动突然袭击……

中校派人对基地的防护警戒加强了部署，制定了在紧急情况下可能采取的种种对策。然后看着总统签署了书面保证以及释放巴尔加斯的命令，他这才乘吉普车来到机场。晚上九点，一架大型飞机徐徐降落在机场跑道上。

特里西奥中校等人神情紧张地注视着机舱门，直到看见巴尔加斯将军沉着地走下舷梯时，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四周一片黑暗，只有跑道灯发出耀眼的光亮，叛军与政府的交换人质行动就在这充满火药味的气氛中默默地进行。

当疲惫不堪、脸上血肿的总统等人一个跟着一个踏上飞机舷梯时，总统在钻进机舱门的瞬间，回过头来，仿佛是向一场恶梦告别。他看见特里西奥中校正在一辆巡逻车旁与巴尔加斯将军紧紧地拥抱。

总统悲哀地叹了口气，然后扭头跨入机舱……

（孙化）

玄武门之变

隋朝末年，群雄并起，经过多年的征战角逐。李渊父子取得了最后胜利，建立了唐王朝。李渊当了皇帝，史称唐高祖。

李渊有四个儿子，这时三儿子李玄霸已经死了，只剩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人。按照封建社会的传统，大儿子李建成被确立为皇太子，也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二儿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四儿子李元吉被封为齐王。

但是，在建立唐王朝的过程中，功绩最大的却是秦王李世民。最初提出起义反抗隋王朝的，就是李世民。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说：“大事如果成功，天下如果到手，全都靠你，我一定让你当太子！”李世民一面感谢，一面表示谦让。到李渊坐上皇帝的宝座，他手下的文武功臣都表示应该立李世民为太子，可是李世民再三推辞不肯接受，一定要把太子的位置留给大哥李建成。李建成是个性情宽厚爽直的人，可是喜欢喝酒、玩乐、打猎，没什么本领；李元吉却是个机警狡猾的人，可他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断犯些小错误。所以，李渊对这两个儿子都不大宠爱。随着李世民在南征北战中的功劳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李渊常常想让李世民代替李建成继承皇位。李建成也觉察到自己的太子地位不稳固，于是就同李元吉联合起来，一心打击李世民，培养自己的势力。

李渊当了皇帝之后，渐渐地腐败起来，整天只顾享乐，纵容皇亲国戚在首都长安城中胡作非为，强夺人民田产房屋，真是无恶不作。长安的地方官员根本不敢过问他们。

李世民却不肯附和这批皇亲国戚。他攻下洛阳后，李渊派几名贵妃带人到洛阳去，清查隋朝皇宫中的宫女和金银财宝。这些贵妃私下里向李世民要贿赂，并替自己的亲属要官职。李世民回答说：“金银财宝已经登记造册，上报皇上，我没有什么可以送你们的；至于官职，应该任命有德有才、能为国家办事的人，我怎能随便给人官职？”结果，李世民就得罪了这一批人，她们回到长安后，纷纷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而李建成、李元吉投其所好，不断送礼给她们，她们就常在李渊面前说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好话。

每次宫中举行宴会，看到那一些欢娱的场面，李世民总会想起自己的生身母亲，因为她死得早，没有能赶上过这样的好日子，不免有些伤感，有时甚至暗暗落泪。李渊看在眼里，很不高兴，贵妃们乘机攻击李世民，向李渊说：“现在天下太平，皇上年纪又大了，正应该快快活活地过日子，才能延年益寿。可是秦王却看到皇上快活就流泪，真不知他安的是什么心！”李渊更不痛快，也就打消了让李世民代替李建成当太子的念头，渐渐疏远了李世民。而对善于讨好卖乖的李建成、李元吉，却越来越亲近了。

这样到了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双方矛盾怨恨越来越深，李元吉决定杀掉李世民。他对李建成说：“我为了大哥，要亲自动手，除了他！”在李世民陪李渊到李元吉家中的时候，李元吉便在卧室中埋伏下刺客，打算伺机刺杀李世民。可是李建成临时变卦，出来制止了李元吉。李元吉很不高兴，埋怨道：“我是为你打算呀！杀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

实际上，不但李世民个人的安危面临着危险，唐王朝的兴衰也面临着危机。因为，李世民无疑是弟兄之间最有治理国家才干的一位。杀了他，必定会引起内乱。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李渊打算去西安郊外的仁智宫去避暑，命令

李建成留守京城，李世民、李元吉随他一起去。这时，李建成招降纳叛，已颇有势力。他以组织太子宫卫队的名义，招募了二千多名勇士；又让过去当过太子宫卫士的杨文干到处招兵买马。李建成暗中嘱咐李元吉找机会除掉李世民，并说：“是安是危，就看今年！”

但是，李建成派杨文干招兵买马的事情，被人报告李渊。李渊大怒，找了一个借口，召李建成到仁智宫来。李建成知道大事不好，不敢前去。有人劝李建成干脆占据长安，自己当皇帝；也有人为李建成出主意，叫他单人匹马去见父亲请求宽恕。李建成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他见到李渊后，拼命叩头，请求宽恕，由于用力过猛，几乎气绝身死。李渊仍然怒不可遏，当晚把李建成软禁在帐篷里，只给他吃粗麦饭。随后李渊又派司农卿宇文颖到庆州去召唤杨文干回长安。哪知宇文颖却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了杨文干，于是杨文干干脆起兵造反。

李渊得到消息，急忙召见秦王李世民，要他亲自去镇压杨文干，并又一次许诺：回来后就让李世民当太子，而把李建成派到四川去当蜀王。

然而，李世民率军出征刚刚离去，李元吉以及李建成的亲信，就轮流不断地在李渊面前为李建成辩解。李渊的态度很快来了个急转弯，他让李建成重新回到京城去留守，不再追究他谋反的问题，而只责备他们兄弟不能和睦相处。到李世民平定了杨文干的叛乱回来，李渊已完全忘掉了改立太子的诺言。

此后，李建成和李元吉一伙，不断在李渊面前造谣中伤李世民。李渊对李世民十分恼火，仅仅因为突厥人不断入侵，他还需要李世民带兵抵御，才没有对李世民下毒手；然而，每当李世民建立了新的功绩回来，李建成，李元吉对他的忌恨就更加深了一层，而李渊对李世民的戒备心也更重了。

父子兄弟之间，渐渐酿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局面。

面对着这样的局势，李世民一直采取容忍退让的态度。因为对方毕竟是他的父亲和兄弟啊！

这样到了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真的下毒手了。一天晚上，李建成请李世民到他家里去参加宴会，却在酒中暗暗下了毒药。李世民饮了酒后，突然心痛如绞，吐了几大碗鲜血。幸亏部下赶紧把李世民送回了家中。李渊得到消息后，亲自去看望李世民，又对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喝酒，今后更不可以在晚上让他喝酒。”

后来，李渊同李世民单独谈话，说：“当初，是你第一个主张起义，平定天下时，你又立了大功。我本打算封你为太子，是你坚决辞让；我想想建成是大哥，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现在你们兄弟不能相容，大家挤在京城里，难免发生冲突。我想让你住到洛阳去，东边半个国家的事情由你作主，我特许你使用天子专用的旗帜礼仪。”李世民听了，痛哭流涕，表示不愿离开父亲。李渊说：“天下本是一家，洛阳与长安又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时候，就会去看你的。你不用伤心。”

李世民听从李渊安排，准备出发去洛阳。李建成、李元吉在一起商量说：“如果让秦王前往洛阳，掌握了那一大片土地和大批军队，以后谁都没法控制他！还是把他留在长安好对付。”他们派了几个人去向李渊告密，说李世民的部下听说要去洛阳，都高兴得手舞足蹈，看样子，他们这一去，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李渊对李世民的猜忌之心，又超过了爱子之心，结果又改变了主意，不许李世民去洛阳了。

李元吉还不罢休，请求李渊干脆杀掉李世民，以绝后患。李渊说：“他有平定天下的大功劳，又没有明显的罪状，有什么借口杀他呢？”

李元吉说：“李世民势力越来越大，他总有一天会谋反的。父王要杀他，还怕找不到借口吗！”可是李渊不愿下手。

这时，李世民的秦王府的官员们，都已预感到内乱迫在眉睫，每天都在担心自己的命运。终于，李世民的心腹谋士、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去找比部郎中孙无忌，对他说：“现在双方的怨恨已经根深重，无法化解。一旦大难爆发，恐怕不只是秦王府要血流满地，而且会百姓遭殃，国家遭难。为国为民，不如劝秦王抢先动手。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不能再耽搁了，必须今天就干！”孙无忌说：“很久以来，我就有这种想法了，只是不敢说出来。你的话很合我的心意，我这就去找秦王。”说罢，就去见李世民。

李世民听了孙无忌的话，便召房玄龄去商量。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然应该继承帝位。今日却危机四伏，大王不得安宁，大王只有奋起反击，才能救国家，救百姓，请大王不要迟疑。”于是又召来了谋士杜如晦。谋士共同建议李世民杀掉李建成、李元吉。

李世民还是犹豫不决。他征求灵州大都督李靖的意见，李靖不肯回答；又问行军总管徐世 的意见，徐世 也不肯回答。李世民后来对这两个人一直很尊重，因为他们明知李世民迟早会同李建成、李元吉发生冲突，却不随意迎合李世民的心意。

这时，李建成、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他们认为秦王府能出谋划策的是房玄龄、杜如晦，于是在李渊面前加以诬陷，终于把这两个人调出了秦王府。李世民的亲信大将尉迟敬德，因为不受李建成的拉拢，遭到诬陷，被捕入狱。李世民竭力营救，才救下他一条命。另一位大将程知节也被从秦王府调出，派到甘肃去了。程知节临走时警告李世民说：“大王的四肢和翅膀，都被剪除了，身躯还能活多久呢？我愿冒死罪的危险，留在京城里，请你早定大计！”

正在这时，东突厥人又一次侵犯唐朝边境。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率兵北上迎敌。李渊同意后，李元吉便请求调用李世民的亲信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并挑选秦王府精锐部队，编入李元吉军中。

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现在，你已经控制了秦王的精兵猛将。我准备拉了秦王在昆明池设筵为你运行，就在筵席上派勇士把他杀掉，告诉父亲就说他是得急病死的，父亲也不会不相信。我再让人去劝父亲把大权移交给我。至于尉迟敬德那班人，最好也全部杀掉！”

李建成、李元吉经过一番密谋，准备动手了，但他们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有人把这机密透露出来，传到了李世民那里。李世民忙告诉孙无忌。孙无忌再一次劝李世民抢先下手。李世民叹息说：“兄弟手足之间，互相残杀，无论古今都是最大的罪恶。我当然知道，早晚之间，灾难要落到我头上，但我总希望对方先行下手，然后我以正义之军，加以讨伐。这样不是更好吗！”

尉迟敬德说：“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大王就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也应该为国家的安危考虑呀！如果大王不接受我的建议，我只好逃走，不能坐在这里等人来杀我！”孙无忌也说：“一旦失去时机，大局就将无可挽救。尉迟敬德要逃走，我也只好跟他一起逃。”

李世民坚持说：“我的话也不能全推翻，你们再商量一下！”

尉迟敬德说：“大王今天一直犹犹豫豫，没有了过去的智谋；面对危难，不能迅速决断，也失去了往日的勇气。我已经把大王平时训练的八百名勇士，全部调进来了，他们全身披甲，手拿武器，正在待命。事态已到了这一步，大王怎么能够中止呢！”

李世民又询问秦王府其它谋士们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李元吉凶狠暴戾，决不甘心臣服李建成，迟早也会杀害他。那样国家必定大乱，只有秦王出来，才能收拾局面。现在不如抢先一步，除掉李元吉。而李世民还是不能下决心，又命令用卜卦来决定。正巧谋士张公谨从外面进来，抓起卜卦用的龟壳扔到地上，说：“事情无法决断时，才需要请示神明，现在已经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还卜什么卦？卜卦的结果如果不吉利，难道就束手待毙吗？”

经张公谨这一说，李世民才下定了决心。他叫长孙无忌去请房玄龄、杜如晦一块来商量如何行动。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皇上有规定，我不能再听秦王的命令，否则要被处死，所以我不能去见他。”长孙无忌回来一说，李世民大怒，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杜如晦，难道也要背叛我？你拿我的佩刀去，他们如果真不肯来，就砍下他们的头来见我！”尉迟敬德同长孙无忌找到房玄龄，对他说：“大王已经下决心动手了，你最好快点回去，共同策划。”为了不引起怀疑，房玄龄和杜如晦改换了道士服装，几个人分头进入了秦王府。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开始行动，他先去见李渊，控告李建成、李元吉种种罪行，并且说：“我对兄弟，没有一点对不起的地方。可是他们却在谋划杀害我！这简直是为我们的敌人报仇。如果我被冤枉害死，鬼魂到了地下，简直没有脸去见我杀掉的那些盗匪啊！”

李渊听了大吃一惊，但他还没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政变，安慰李世民说：“明天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你最好早点上朝来。”

六月四日，一大早，李世民就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入朝，在皇宫的北门玄武门埋下伏兵。这时皇宫内已经有人把李世民控告李建成、李元吉的消息，透露给了李建成。李建成忙找李元吉商量。李元吉说：“赶快下令我们所控制的军队集合待命，你就借口生病，不要入朝，先看看形势的变化再做决定。”李建成说：“我已经命令护卫军出动，现在沿途戒备森严，我们还是一块上朝去看看事情会弄到什么程度吧，”于是两人一块入朝。

这时，李渊已召集了几个大臣。在研究怎么处理李世民对李建成的控告。

李建成、李元吉向玄武门进发，走到临湖殿时，就发现情况不妙，两人立即拉转马头，向太子宫奔逃。李世民在后边拍马追上，高呼：“大哥！”李元吉转身搭箭拉弓朝李世民射去，他因过度紧张，三次都没把弓拉满，结果箭只射到半途就落地了。李世民却瞄准了李建成，一箭就把他射死了。尉迟敬德也领着70名骑兵赶来，从左右射击李元吉。李元吉从马上栽了下来，却把李世民的马吓得狂奔，结果被树枝挂住，李世民摔倒在地，一时爬不起来。这时李元吉却冲了上来，夺过李世民手中的弓，打算勒死李世民。幸亏尉迟敬德飞马赶到，李元吉掉头逃命，但还是被尉迟敬德射死。

这时，太子李建成府中的部将，已经率领二千精锐部队，攻到了玄武门，同守卫玄武门的禁卫军发生战斗，双方死伤惨重。太子军见一时攻不下玄武门，便扬言要去攻占秦王府。正巧，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李元吉的人头赶到了。太子军见李建成已死，便一哄而散，逃到终南山当土匪去了。

这时，李渊正在皇宫中的人工湖海池里乘船游玩。李世民派尉迟敬德进

宫“保护”，实际上是监视李渊，看他对今天事变的态度如何。尉迟敬德头戴铁盔，身穿铠甲，手拿长矛，威风凛凛地一直走到李渊面前。李渊大吃一惊，忙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叛变，秦王出动军队，已经把他们杀掉了。因为怕有人惊动皇上，所以派我来保驾！”

李渊知道大势已去，对身边的大臣说：“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现在该怎么办呢？”

大臣们都是见风使舵的好手，谁不害怕尉迟敬德的长矛？于是纷纷劝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李渊也连忙表态说：“你们说得对，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李渊在李世民的武力威胁下，不得不交出政权。

李世民得到尉迟敬德的汇报，才进宫来见李渊。李渊抚摸着李世民的头发，说：“这些日子，我几乎犯了大错！”李世民不好回答，他既不能说父亲犯了错误，又不能说父亲庇护李建成一伙是正确的，便跪在那里大哭了一场。

六月四日当天，李渊便下了一道圣旨，说：“朝廷事务，向秦王请示，由他裁决。”

六月七日，李渊正式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下诏说：“从今以后，不管事情大小，均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

国家政权实际上已落到李世民手中。又过了几天，李渊便干脆自称“太上皇”，去颐养天年了。

唐王朝的一场危机，能有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李世民很会治理国家。他继位后的一个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贞观就是李世民当皇帝时的年号。

（薛之文）

疯狂的代价

1930—1931年期间，日本受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也进入萧条的困境。日本海军和陆军不得不大幅度地裁军，这引起了昭和军阀和少壮派军人的极大不满。

1931年相继发生了陆军阴谋政变的“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陆军企图通过武力胁迫原内阁垮台，让陆军领袖担任首相，成立陆军政府，从而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由于阴谋暴露，他们没有成功。为首分子虽然被软禁，却没有得到严厉惩治，且待遇十分优厚，这无形中等于给右翼青年军官打了气，他们集中在主张以强力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皇道派”头子、陆军大臣荒木的周围，一个个蠢蠢欲动。所谓“皇道派”，就是提倡“皇道精神”，主张军队的任务在于维护、宣扬皇德，“实现真正以天皇为中心，有生气的明朗的国政”。

和皇道派相对的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他们主张维持军队的统制，实行合法的国家革新，争取合法地掌握国家政治实权。在实力方面，皇道派占绝对优势。

1934年11月，发生了一件加深统制派和皇道派矛盾的事件。统制派中有人揭发皇道派的几名军官阴谋发动武装政变，于是，那几名军官被免职。这一事件被看作是统制派为了陷害皇道派而策划的。皇道派青年军官极为愤怒。

1936年初，议会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政府下令解散议会。右翼少壮派军官开始酝酿发动政变。此时冈田首相已有所闻，为防不测，他决定瓦解皇道派力量，将其主力部队第一师团派往远在中国的满洲。不料，这一来反而促使少壮派军官加快了政变的步伐。

皇宫卫戍部队军官香田清真大尉是这伙极右翼少壮派军人的“灵魂”，此人身材不高，性格刚毅残忍，而且不怕死。他纠集了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等几个志同道合的亡命之徒秘密磋商，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抢在统制派前面下手，武力解决冈田内阁。为此，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份表明他们法西斯军国主义立场的“崛起宗旨书”。

1936年2月25日傍晚，鹅毛大雪突然停止了。香田清真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等人召集各联队长到第一师团兵营尾部紧靠着护城河的一间屋里开会。

“人都来齐了吗？”香田清真大尉用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目光向人群扫了一眼，然后站起来，大声说：“明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吗？”

“知道！”军官们齐声回答。

香田清真说：“没有别的选择了，陆军省的野村少佐已向内阁告密，我们的行动开始受到监视。只有这一条路了！与其让我们的生命无谓地牺牲，不如用我们的血去祭祖国！明天，等待明天的到来吧，我祈求神助我们成功！”

接着是步兵第二联队第六中队长安藤辉三发言。他毕业于军官学校，皮肤白皙细嫩，说话彬彬有礼，但是很有煽动力：“我们的计划是周密的，我们的行动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只要我们按计划行动，我们就一定成功！”

“不能让那些统制派的蠢驴们掌握政权，国家必须进行改革！”一个军官大声说道。

“嘘，轻点！”香田清真大尉站起来，“请记住，明天，2月26日，才

是我们高声大喊的日子。”接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宣读行动计划：“昭和11年2月26日凌晨2时整开始行动。兵力由步兵第一联队、步兵第三联队、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的一部分组成，共1400余人。袭击第一目标为首相官邸，刺杀冈田首相，兵力300名，由栗原中尉指挥。第二目标为藏相官邸，刺杀高桥藏相，兵力120名，由中桥基明中尉指挥。第三目标为内府私邸，刺杀斋藤富内大臣，兵力120名，由坂井直中尉指挥。第四目标为渡边私邸，杀掉渡边锭太郎教育总监，兵力30名，由高桥太郎少尉指挥。第五目标为侍从长官邸，杀掉铃木贯太郎侍从长，兵力150名，由安藤辉三大尉指挥。第六目标为牧野宿舍，杀掉牧野神显伯爵，兵力200名，由河野寿大尉指挥。第七目标为占领陆相官邸，停止其工作机能，兵力为170名，由我亲自指挥。第八目标为占领警视厅，兵力500名，由野中四郎大尉指挥。此外，对西园寺公望元老私宅兴津的袭击，由坂垣中尉指挥……”

香田布置完任务之后，仰起头来，朝天吁了一口气，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似乎陷入了沉思。叛乱军官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次日凌晨2时，第三联队的第一、三、七、十中队相继紧急集合。

30分钟以后，第一联队的栗原安秀中尉命令机枪中队和步兵炮队集合，把下士军官们召到中队办公室宣读了“崛起宗旨书”。宣读后，他带着部队，乘车向首相官邸进发。

白雪覆盖着沉睡的东京，夜色惨淡。一群疯狂的野兽出动3时30分，安藤辉三大尉指挥步兵第三联队直奔铃木侍从长官邸。另外，袭击藤斋富内大臣的坂井队，袭击高桥藏相的中桥队，制压陆相官邸的香田队，以及占领警视厅的野中队也差不多在凌晨4时30分左右出发了。4时45分，成四路纵队的安藤队到达铃木侍从长的官邸并开始进攻，叛乱部队很快就解除了护卫警官的武装，冲进大门。

铃木贯太郎——这位年迈的前海军提督被女佣叫醒后急忙跑到储藏室去拿剑，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切腹自杀。然而，没等他迈出房间，已被叛乱军人团团围住。

铃木坦然地问：“你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安藤辉三不耐烦地说：“阁下，为了昭和维新，请您把命赐给我们！”没等铃木再说什么，安藤将枪对准他连击两枪。侍从长倒下了，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呻吟道：“再给……给我一枪！”一个下士将枪对准他的脑袋，正要扣动扳机，这时铃木贯太郎的夫人披头散发地惨叫着冲了进来，伏在奄奄一息的铃木身上呜咽着哀求：“别……别再打了……”

安藤辉三大尉料定铃木必死无疑，就低声说：“别打了，让他静静地躺着死去吧。”随后带着士兵走出官邸。没料到，铃木后来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另一路叛军冲进高桥藏相的官邸，高桥还在二楼寝室里睡着，虽然已经惊醒，但他决心豁出去了，闭着眼睛不动。中桥基明喊着“天诛”，揭开被子，手枪对准高桥胸口连打两发，又举起军刀砍断了高桥的右臂，断口露出白惨惨的骨头。断臂落在地上，手指还微微地动，藏相仍没断气。中桥又将军刀捅进他的肚子，乱搅一气，这才了结。

对斋藤官邸的袭击也是非常可怕的。斋藤富内大臣被枪声惊醒，一出来就挨了几枪，接着又被战刀砍了几十下。

清原少尉和野中四郎率领的部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警视厅。

最后遭到袭击的是渡边教育总监。总监用手枪应战，但很快就身中数十枪，后脑又被刀砍而死。

此时，由河野寿大尉带领的叛军小队，则在山区休养地搜捕闻讯出逃的天皇顾问——牧野神显伯爵。只是由于这位老人的孙女和子小姐不顾一切地用自己的身体挡在老人前面，感动了士兵，才使得伯爵幸免于难。

在这场屠杀中，只有一个人是依靠他本人的威望而使叛军生畏，因而安然无恙的。这就是西园寺公望公爵。他是日本政界的元老，早在1889年，他就协助明治天皇起草帝国宪法；1916年被选进日本元老院。明治天皇驾崩后，他极力辅佐大正天皇；现在是裕仁天皇的实际监护人。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信。当叛军奉香田大尉之命令去杀害西园寺公望时，却遭到大部分士兵和军官的抵制。这使得带队的坂垣中尉十分为难，其实，他本人对此也是持犹豫态度的。他打电话到叛军占领的警视厅，却没有找到香田大尉。

此刻，香田大尉正在陆相川岛义之的官邸，逼着陆相与他们签署城下之盟。这是少壮派军官举行这次叛乱最关键的一步。杀害那些内阁官员，是为了清除他们实施法西斯政治纲领的障碍，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迫使陆相屈服，向天皇启奏同意并支持他们的政治观点。

香田大尉向川岛陆相宣读了“崛起宗旨书”，接着又提出他们的八项具体要求，其意图非常明显，无非是要排斥统制派军官，以确立皇道派的陆军。面对盛气凌人的军官们，陆相只是眨着眼睛不知如何是好。

香田大尉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逼问：“川岛阁下，您看怎么办？是我们继续这样对峙下去呢，还是请您为我们服务一趟？”

陆相好不容易开口了：“明白了，不过你们的要求，我不一定能办得到，不得陛下下的批准，我什么也不能说。”

香田大尉斥责道：“讲这样的混帐话不行！”

这时，山下奉文少将和真崎大将接到电话也先后来到陆相官邸，这两位都是皇道派军官崇敬的人物。对于这次叛军的行动，他们事先是有所闻的。对此，他们表示理解，并劝川岛陆相立即进宫参见天皇。川岛在这样的形势下，只好服从，和山下奉文一道去皇宫。

这时，一个军官来报告：去兴津的那个小组，士兵拒绝行动。香田大怒，命令矶部从敢死队里再派三十名军官去兴津，一定要杀死西园寺公望，决不能心慈手软！

矶部浅一大尉是个凶残的家伙，他立刻去安排。

联络军官又报告一个情况：栗原中尉的部队占领了首相官邸，可是没有抓到冈田首相。香田低头看了看手表，自信地说：“冈田他走不了，会抓到的。我完全相信栗原中尉的能力！”

果然，不出半个小时，又有一位联络官气喘吁吁地来报告说，冈田首相已经在他的官邸被击毙，栗原中尉正在做善后处理。香田闻讯哈哈大笑道：“首相死了，可我们还活着！帝国的未来是我们的！”

川岛迫于叛军的压力，进宫参见裕仁天皇，向天皇念了叛军的“崛起宗旨书”，并诉说了他们的要求。天皇听后非常生气，尤其是听说叛军已经杀害了冈田首相，并企图加害他的恩师西园寺公望时，更是怒不可遏。天皇下达旨意：迅速镇压叛军，决不允许这种野蛮的行为继续下去。

然而，由于皇道派军人集团的阻挠，天皇的旨意并没有能立即执行。首先是山下奉文少将奉军事参议官荒木大将之命，用陆军大臣告示的形式起草

了一个劝告书，敦促“崛起部队”各自返营。劝告书词意含混：1、关于崛起宗旨已上达天皇听取；2、认为尔等之行动乃基于显现国体之至情；3、关于显现国体实态的现状，不胜惶恐；4、各军事参议官已达成协议按以上宗旨努力去做；5、此外一切均待天皇旨意。

劝告书由山下少将到陆相官邸向叛军作了传达。此后荒木、真崎大将等军事参议官又根据叛乱军官的要求，来陆相官邸会见他们。荒木大将说，为了不给天皇增加烦恼，要退兵。这样也好作善后处理。

矶部、栗原等叛乱军官说，他们此番义举是为了形成真崎内阁，回营前一定要看到实现愿望的证据。真崎大将回答：“因为我不在其任，用这种方式推举总理，这会成为向皇上强求。”

裕仁天皇对叛军毫不让步，他对前去为叛军申辩的本庄武官长斥责道：“杀戮朕之股肱老臣，如此凶暴军官等，其精神有何可恕！”敕令陆军参谋总长负责镇压叛军。

28日清晨，天皇召见了侍从武官长本庄大将和陆相川岛义之，劈头就问：“自从戒严以来，陆军为什么迟迟按兵不动，为什么不迅速地解决事端！”裕仁天皇动怒了，他感觉到他的部下和政府官员果然在欺骗他，并一再向他谎报军情。

川岛陆相赶紧解释：“天皇息怒。敕令已于早晨向叛军发出，命令他们迅速撤离所占地区，回到各部队去。否则，陆军部将采取最严厉的制裁。”

“请记住，今天12点之前，必须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让每一个叛乱分子都看到敕令，并把他们的态度告诉朕。你们如果怠慢的话，那么，朕就亲自率领近卫师团去进攻叛军。难道你们以为朕就那么无能，听任你们的摆布吗？”裕仁天皇说罢拂袖而去。

这一来，没人敢怠慢了。遵照天皇的旨意，第49、第57联队已作好讨伐的准备，从外地调来东京。日本联合舰队也奉命开进东京湾。与陆军相比，海军要积极得多，海军官兵们恨不得立刻向叛军开火，为三名被害的海军老前辈——斋藤、铃木和冈田报仇雪恨。他们把军舰上所有的炮口对准了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

此时此刻，东京城充满了火药味，形势越来越严峻。

荒木、真崎大将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们到戒严司令部去交涉，希望暂缓使用武力，但遭到断然拒绝。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如果叛军违抗命令的话，负责讨伐的香椎浩平中将将最迟于下午一点下令攻击。

至此，皇道派将领只得重新退到幕后，不再露面。这犹如一股突然改变方向的寒风，使得叛军士官感到震惊和愤怒。

29日早晨，镇压叛军的坦克挂着劝告归顺的标语来回开动，飞机撒出大量传单，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送“告士兵书”，空中悬起了挂在气球上的标语：“不要反抗军旗。”在强大的舆论和军事压力下，叛军中开始人心涣散。中桥队首先吹号向皇宫行致敬礼。随后清原队、坂井队、野中队……一个接一个地归顺了。下午1时，安藤辉三也投降了，他开枪自杀未遂，被部下阻止。

这时，山下奉文少将准备了十八口棺材，放在陆相官邸的大门口。他命令归顺的军官们都到官邸里来，问他们：“你们今后怎么办？”他叫他们愿意剖腹自决的站到右边，坚持“昭和维新”的站到左边。军官们受野中大尉、栗原中尉的劝说，都选择了法庭斗争的道路，没有一个自决。

这场历时 84 小时的骚乱就这样平息了。然而，这些参与叛乱的军官们并没有逃脱死亡的厄运。四天以后，河野寿大尉剖腹自杀。7 月 12 日上午，香田清真、安藤辉三、村中孝次、高桥太郎等十三名军官和包括北一辉在内的四名文官，都被绑在东京代代木卫戍监狱一角的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额画了标靶，枪击处决。

令人吃惊的是，冈田首相并没有死。那天晚上，叛军杀死的是冈田的妹夫松尾传藏。因为两人长得十分相象，叛军没有识别出来。后来借着办丧事的机会，冈田在福田秘书长和小坂曹长的帮助下，化妆成吊唁的人，竟安全逃脱了。

2 月 28 日晚 6 点半，正当陆海军部队调集完毕，一切准备就绪时，冈田首相进入皇宫，求见裕仁天皇。天皇又惊又喜，立即召见他，并鼓励他继续干下去。

然而，后来天皇的许诺并未兑现，也许是由于皇道派军人集团的压力，他不得不改变初衷，同意冈田内阁总辞职，批准了原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为总理的广田内阁确立。

了解日本政治内幕的人都知道，广田弘毅与右翼集团中的好战分子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竭力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广田弘毅执政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扩军备战的计划。叛乱军官所要求建立的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最后由统制派来实现了，日本开始了进一步的军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1936 年 6 月 30 日，参谋本部制定了一个“国防国策大纲”，这个大纲主张与英、美结为友好，另一方面专心对苏联备战。打垮苏联以后再向南进，夺取英国地盘，进而侵占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最后与中国协力准备与美国大决战。

以后，虽然近卫文磨为总理的内阁代替了广田内阁，但近卫内阁的内外政策仍置于法西斯军人集团的影响之下，并为其所操纵。内阁开始工作仅一个月，侵华战争就全面爆发了。

（孙化）

拿破仑之死

拿破仑·波拿巴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狂热的政治野心，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并自行加冕称帝，亲率铁骑纵横驰骋四出征战，不仅使法国腐朽的波旁王朝土崩瓦解，也令欧洲大陆的封建政体望风披靡。

1815年10月，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大败后，根据巴黎和约被囚禁于英属圣赫勒拿岛。他的身体本来是很健康的，自从被囚禁以后，身体就越来越差，仅六年时间，就在“刀扎般的疼痛”之中去世了。拿破仑临终以前嘱咐部下，一定要解剖他的尸体，查出他致死的病因。

尸检由英、法两国的医生共同进行。拿破仑的遗体安放在“长林”住所的弹子房内，医生们个个神色凛然，局促紧张。他们十分清楚，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尸检，他们做出的结论，将远远超出医学的范畴，具有波及世界的影响，因而也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利害安危，不能不谨慎从事。

医生们的担忧绝不是多余的。拿破仑在流放圣赫勒拿岛之初，就写信向英当局提出抗议，抱怨“长林”是岛上最荒芜的地方，经常雨水泛滥或大雾弥漫。他还受到英国军官的虐待。而英国当局则声言这不是事实，说“长林是非常有益健康的岛上最赏心悦目的地方”。后来，当拿破仑结实的身体一天天浮肿虚弱的时候，法国流放者与英国当局的争执更趋激烈。流放者指控英国政府蓄意让拿破仑困死孤岛。圣赫勒拿岛的英国总督竭力辩解，为了推卸有损名誉的责任，竟把诊断拿破仑患肝炎的一名英国医生送上了军事法庭。

按照拿破仑生前的要求，尸检由他的同乡安通马尔基医生主持。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折腾，八位医生小心翼翼地呈交了四份尸检报告，这些报告都没有明确的诊断结论，意见也有分歧，但是他们对拿破仑的胃出现溃烂这一点却都是肯定的，认为像是胃癌的症状。

英国总督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而了结，法国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的皇帝是病死的。当法国流放者离开圣赫勒拿岛，在开赴英格兰的船上，帝国的将军蒙托隆和贝特朗拿出了拿破仑的遗书。这两位将军都是拿破仑的亲信，在艰难的流放岁月中，他们朝夕陪伴着皇帝，可谓尽职尽责，忠诚不渝。而贵族出身的蒙托隆将军表现得更为忠心，深受皇帝的赏识。拿破仑在遗书中否认他是死于疾病，认定是英国政府及其雇用的人谋害了自己。

之后的一百三十年中，各持己见的人们围绕拿破仑的死因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讨论，但却毫无结果，没有令人折服的结论。

1955年秋天，瑞典哥德堡市郊有个叫斯坦·福舒特的牙科医生悄悄地加入了这场论战的行列。这人五十来岁，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颊，神情古板执拗。当牙科医生是他的职业，他的真正爱好却是生物学和药理学，更爱阅读有关拿破仑的文献专著，他崇拜拿破仑，也喜欢研究他的生平。

这天，福舒特吃过晚餐，拿起一本当年拿破仑的内侍长路易·马尔尚的《回忆录》开始阅读。读着读着，他眼前仿佛看见了拿破仑患病时的情景：面色蜡黄、两颊膨胀，脚踝关节浮肿得肉往下垂……动作艰难迟缓，以致于他想站起来时都不得不一手撑桌面，一手扶着内侍的肩膀……剽悍英俊的身躯变得像头笨熊。看到这里，福舒特放下书，默默地思索起来；他知道，胃

癌患者到晚期，无一例外是骨瘦如柴。拿破仑却是浑身浮肿，可见他绝不是死于胃癌！但福舒特感到费解的是，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争论中却无人提及，这，难道是人们的疏忽大意吗？夜里，福舒特失眠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思考，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出现了：他决心搞清拿破仑真正的死因。

从文献中看得出，拿破仑初到圣赫勒拿岛时，身体是相当健康的，虽然情绪忧愁，精力却很充沛。他每天坚持学习英语，并想方设法与法国取得联系，梦想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最初，跟随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的有四位帝国侍臣，但这四个人为了向皇帝表示自己的忠诚而闹起了内部纠纷。不久，最为得宠的拉斯卡斯将军被英国人遣送回国；另外一个曾经舍生忘死保卫拿破仑的古尔戈将军也因在争宠中失利而不得不挥泪离开圣赫勒拿岛。这样一来，拿破仑身边的高级侍臣就只剩下贝特朗和蒙托隆两位将军。这两位都是贵族出身，他们甘愿舍弃巴黎的豪华生活来大西洋中的孤岛上侍奉落难的君主，也是很不容易的，拿破仑格外垂青于这两位。然而，他们俩之间仍继续着争夺皇帝恩宠的较量。后来，贝特朗败下阵来，没有随拿破仑从“荆园”别墅迁往“长林”，而是与他的夫人范妮居住在一英里外的“哈茨门”别墅。这时，皇帝身边的高级侍臣就只有蒙托隆和他年轻漂亮的夫人阿尔宾了。蒙托隆独揽了皇室内务大权，甚至不惜让自己的夫人当拿破仑的情妇，为皇上排遣寂寞。

圣赫勒拿岛的囚禁生活和层出不穷的内部倾轧，造成拿破仑极大的精神重负，无疑对他的身心大为不利，但仅仅是这些还不足以威胁他的生命。根据资料表明，1819年下半年至1820年下半年。他的身体是健康的，经常身着单衣，戴阔边帽，在“长林”的庭院里散步；有时心血来潮，敲铃集合所有的随员排列成队。他站在队列前面，神采飞扬地用手比划，教导随员们如何以连续齐射的火力，把敌方的骑兵打垮……这些活动，对他的身体是有益的，也证明他这一时期确实还健康。然而，自1820年下半年起，拿破仑就开始日渐虚弱，“常常筋痛，脚站不起来；牙齿松动，不能嚼东西，一碰就出血”。医生认为是恶劣气候引起的不适。拿破仑却忧心忡忡，想起古尔戈将军曾经提到过的“酒中毒”。早在两年前，有一次拿破仑赏赐给古尔戈一瓶康斯坦茨酒，这是一种出产于南非的高贵名酒，拿破仑每餐必饮两杯。岂料将军喝了酒以后，肚子非常难受。为此，他提醒拿破仑当心酒中毒。拿破仑当时并没在意。可是，不久之后，又有一个叫西比亚尼的仆人在用晚餐的时候忽然倒地，痛得直滚，不到两天就死了。这种迹象表明，拿破仑的死可能与酒或食物有关。

牙科医生福舒特运用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他设想，假如拿破仑真是因饮酒而中毒，也不会是因酒精中毒。拿破仑饮酒并非没有节制。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酒里被人投入了毒药。按照他临死前的症状，福舒特再三思量，得出一个初步的论断：酒里可能含有三氧化二砷——即人们常说的砒霜！

福舒特看过一本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816年7月11日，拿破仑与古尔戈去看望刚刚生过孩子的蒙托隆夫人阿尔宾。当他们走进卧室的时候，看见这位高贵可爱的夫人正在专心地阅读一本小说。小说写的是1676年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有一个叫马奎斯的贵妇人用砒霜毒死她的丈夫和弟弟的故事。由于马奎斯的精心策划，她的罪行不露

痕迹，连法医也难查出原因。但她的罪行终于败露，被判死刑。临刑之前，她交待了用微量砒霜长期让被害人服用的罪恶行径。作品描绘了被害人中毒的症状：胸痛、呕吐、腿软、浮肿、虚脱……这与拿破仑的症状何其相似！

自从福舒特认定拿破仑是死于砒霜中毒以后，他对此研究更是如痴如醉，到了无以复加的忘我境地。为了寻求有说服力的论据，他不惜勒紧腰带省下钱搜集更多的关于拿破仑的资料，用一切空余时间研究他所定名的“拿破仑案件”。整整四年过去了，福舒特的研究日见成效，他写出不少关于拿破仑的通俗传记作品，发表了一篇篇学究式的论文，再三阐述他对拿破仑死因的最新见解，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是，习惯和偏见使人们对无名之辈的声音充耳不闻，直至 1959 年秋天，国内外报刊所有关于拿破仑死因之争的论著还没有一篇稍稍提到福舒特的观点，人们仿佛根本没有看过他的文章，不知道他的存在。这真叫福舒特伤心不已。

福舒特恼怒之余，又冷静地思索，意识到要冲破历史形成的偏见和习惯，在论战中独树一帜，光靠纸上谈兵是不行的，必须拿出震撼人心的铁证。而要拿出铁证，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检尸。这可能吗？

拿破仑的尸体早在 1840 年即从圣赫勒拿岛运回法国，葬于巴黎残老军人院；墓上覆盖着重达三十五吨的大理石，铁铸铜浇般地严密封盖。一个普通的瑞典牙医要想查验法国人视若圣贤的民族英雄是否死于砒霜中毒，这岂非白日做梦？想到这里，连福舒特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

凭福舒特的医学知识，他知道虽然不能复验拿破仑的遗骸，却可以通过化验死者的头发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在拿破仑所处的时代，头发是伟人死后常见的遗物。毫无疑问，当年伴随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的大臣内侍，怀着对皇帝的耿耿忠心，一定也会剃下拿破仑的头发，当作稀世之宝珍存，代代相传。福舒特相信，这些大臣内侍的后裔至今还有人珍藏着拿破仑的遗发，他可以不惜代价地求取。不过，照当时的技术，作一次化验需要五克头发，也就是说约需五千根拿破仑的头发，这样看来，其难度似乎又不亚于揭开拿破仑的墓盖。但是，福舒特并不灰心，为了找到铁证，以证实自己的论断，他不仅倾家荡产，即使跑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拿破仑的头发。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福舒特到哥德堡市图书馆翻阅新出版的科技杂志，在一本《分析化学》中，突然看见一篇介绍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汉密尔顿·史密斯教授检验毛发的文章。按这位教授的方法，仅需一根毛发即可达到预期的检验目的，这是毛发检验史上新的突破。这消息使得正一筹莫展的福舒特大力振奋，欣喜若狂。

福舒特迫不及待地给拿破仑的后嗣某王子写了一封长信，恳切地要求恩赐一根“先帝”的头发。不久，王子复函约福舒特面谈。1960 年 5 月，福舒特偕同他的妻子从瑞典来到巴黎。一下火车，他就打电话与王子联系，可是王子已经改变了主意，避而不接电话，他不想跟一个出身微贱的牙科医生交往。这样一来，福舒特就很狼狈，进退维谷，踟蹰街头。无可奈何之中，只好转求“拿破仑专家协会”的会长亨利·拉素克。拉素克曾是巴黎残老军人院军事博物馆的董事，也是路易·马尔尚所著《回忆录》的编辑之一。他在自己的寓所里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瑞典的客人。福舒特开门见山他说明了来意。会长也很干脆地告诉他：“我的博物馆里有他的遗发”。

会长把福舒特引进了他的私人博物馆，从琳琅满目的陈列品中，拿起一

只制作精细的小木盒，盒盖上一行已经褪色的字迹：“先帝圣发，马尔尚珍藏。”显然，这就是拿破仑的内侍长马尔尚的盒子。马尔尚在《回忆录》里提到过这只盒子：当年，在拿破仑停止呼吸以后，他的头发被剃下来，由近臣内侍们分别保管。马尔尚也分得一份，他把皇帝的遗发珍藏在这个小木盒里，作为永久的纪念。至于这个木盒怎样到了拉素克的手里，时经 139 年，恐怕是一言难尽。

盛情的主人打开木盒盖子，取出里面的锦包，一层层揭开，露出一绺柔软微红的头发。他慷慨地对瑞典牙医说：“你需要多少，自己取吧！”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福舒特喜出望外，激动得双手直颤，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根头发，放入白色的塑料袋里。

“您别客气，多取几根吧！”拉素克会长恳切地说。

福舒特表示感谢，他说：“这是千金难得的珍宝，有一根就够了！”

福舒特带着一根拿破仑的遗发，回到瑞典，立刻用电话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史密斯教授联系，要求协助检验遗发。史密斯不等福舒特讲明情由，便一口答应了。于是，福舒特把拿破仑的遗发用挂号寄往苏格兰。

1960 年 7 月，他收到史密斯教授的回信：“根据我的新方法检验分析，该样品含砒霜 10.38 微克。它说明所检验的对象曾服用过大量的砒霜……”

福舒特知道，人的头发正常含砒霜量大约是百万分之零点八微克；而拿破仑死时头发的含砒霜量竟是正常人的十三倍。经过史密斯教授的化验，福舒特的论断得到证实。对于一个热切追求科学真谛的人，还有什么比肯定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值得高兴的呢？

但是，福舒特并未让喜悦冲昏头脑，他清楚地看见，距离胜利的终点还有漫长崎岖的征程。他仿佛听见四面八方的质问：这仅仅是一件样品的试验，也许，这头发已经是受了外界的污染；或者根本不是拿破仑的头发，谁能证明这一点呢？他知道，要证明拿破仑确实死于砒霜中毒，必须得到更多的遗发，作更多的化验。为了求得帮助，他决定先找史密斯谈谈。

1960 年 8 月，福舒特乘客机飞到英格兰的格拉斯哥市。在史密斯的实验室里，他聆听教授讲述最新的毛发检验方法，他的感觉是，检验结果无可指责，但是，仅有的一根毛发已经毁掉，在没有得到第二根遗发之前，是不可能再作进一步的化验了。

史密斯教授问：“福舒特先生，你能否告诉我，谁这根头发的主人？”

时至今日，福舒特才告诉他：“这根头发，是拿破仑·波拿巴的。”

刹那间，史密斯教授的脸变得苍白，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这位有名的英国教授想到拿破仑的死因可能归咎于他的祖国，而自己正是站在审判台前的证人，内心惶惶不安了。

“教授，请您放心，”福舒特宽慰他，“我有十足的凭证，证明贵国政府与拿破仑之死无关。”

不料，史密斯教授却勃然而起，满脸怒气地说：“我不管这些，我是一个苏格兰人！”

或许他们都意识到自己过于敏感了，稍停一会，忽而纵情大笑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福舒特再次向巴黎的拉素克会长求得几根拿破仑的遗发。但就在史密斯教授正要继续进行化验时，拉素克会长又急如星火地将遗发索回。法国政府担心类似的化验会被认为是对英国当局的怀疑和谴责，引起不必要的国际争端。

化验不得不暂时中断。可是，格拉斯哥的会晤，使福舒特和史密斯教授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决心携手合作，要千方百计地把化验进行到底。

福舒特与史密斯和瑞典病毒学家安德斯·沃森合作写了一篇题为《拿破仑之被害》的论文，详细阐述了对拿破仑遗发单项化验的情况，发表于1961年10月14日英国的《自然》杂志。这篇论文激起了许多拿破仑研究专家的强烈斥责，认为纯属“无稽之谈”。但是，时隔不久，福舒特接到一个叫克利福德·格雷的瑞士纺织品制造商打来的电话，说他有五十根拿破仑的头发，是拿破仑的内侍让·阿布哈姆·诺韦拉兹在皇帝逝世的当天剃下来的。格雷为自己能助福舒特一臂之力高兴，并说要亲自把头发送到格拉斯哥，供史密斯化验。

就在史密斯专心地进行化验的同时，福舒特根据安通马尔基医生、马尔尚和另一个内侍的记录，把拿破仑生命最后七个月的病况逐日排列成表，这张表足有好几尺长。从表上的情况看，拿破仑的病情呈起伏状，每次刚好一点的时候就又突然恶化，这说明他在七个月中曾六次服用砒霜。

而史密斯用那五十根头发中两根较长的进行化验的结果也表明其中砒霜含量呈起伏状，正好与福舒特所列的病情表相符。这就证明，拿破仑死于砒霜中毒是确定无疑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早在1840年春天，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迫于波拿马分子的压力，决定把拿破仑的遗体迁回巴黎。当人们启开墓穴，打开棺盖之后，却惊异地发现，在地下沉睡了十九年的拿破仑遗体竟然完好无损，仿佛刚刚睡着似的。如何解释这一奇怪现象？一直没有答案。此刻，福舒特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他认为，这正是由于砒霜的作用，砒霜毒害了拿破仑的生命，却又反过来保护遗体不受腐蚀。许多博物馆保藏和制作标本不正是用砒霜作抗腐剂的吗？用砒霜杀人，是拿破仑那个时代最常见的杀人方法。可是，人们又不禁要问：为什么以前就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呢？福舒特认为，这是由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当时人们很少知道慢性砒霜中毒的症状，只是到1930年以后，医学界才认识到这一切。其次是，在汉密尔顿·史密斯教授发明和运用毛发分析技术以前，是不可能取得拿破仑被毒杀的证据的；而且，那些详细记载拿破仑临终岁月的回忆录，如贝特朗和路易·马尔尚的回忆录都是过了很久之后，甚至到本世纪中才得以出版，所以也就没有人想到可能是因为砒霜中毒。

不久，福舒特又收到澳大利亚女作家梅布尔·布鲁克斯寄来的信和一绺拿破仑的头发。这位女作家是贝特西·巴尔科姆的侄孙女儿。她在信中说明，这些遗发是贝特西于1818年3月16日去“长林”告别时，拿破仑亲自送给他的。经过化验证明：女作家寄来的头发砒霜含量在百万分之六点七微克到二点六微克之间。这，不仅进一步证明拿破仑确实死于蓄意谋杀，也免除了在1818年3月以后去圣赫勒拿岛上的人谋害拿破仑的可能性，其中特别是排除了安通马尔基。这位拿破仑的私人医生是1819年到圣赫勒拿岛的，时间证明他不是谋害拿破仑的凶手。

那么，谁是凶手呢？

现在可以根据回忆录来推断了：福舒特认为，首先，不住在“长林”别墅的人不可能是凶手。因为，如果是他们投毒，那么毒死的就决不止是拿破仑，他身边的人都可能中毒。由此就排除了英国人和贝特朗是凶手的可能。另外，根据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五年半的岁月里，一直处于砒霜中毒的状态，这就可以免除那些不是自始至垂居住“长林”的人投毒的可能性，这些人

先后离去的拉斯卡斯、古尔戈、奥马拉、阿尔宾、西比尼亚和安通马尔基医生。

最后剩下只有两个人——内侍长马尔尚和蒙托隆将军，这两位也是拿破仑最忠实的追随者。真是太具讽刺意味了！

使用砒霜杀人，一般都是将毒药拌在食物和酒中，这二位都是直接照料拿破仑生活的，完全有机会投毒。福舒特认真地查了这两个人的背景：马尔尚整个成长阶段都一直侍奉拿破仑。他的母亲很早就是宫廷的侍女，在拿破仑第一次流放期间，她还去维也纳照料皇太子。不管是马尔尚还是他的家庭与波旁王朝都毫无关系。而且，就他在《回忆录》一书中那样详细地描述拿破仑的病情症状这点来看，也基本可以排除他是凶手的可能。理由是，假如他是投毒者，一定会意识到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导致最终的败露。他决不会这么傻。

如此看来，唯一的怀疑对象就是蒙托隆了。这位将军出生于旧贵族，从没有打过仗。拿破仑为此曾拒绝提拔他，并对他和阿尔宾的婚事进行过阻挠，但未成功，便借故把他开除。当拿破仑退位流放厄尔巴岛时，蒙托隆投靠了波旁王朝。通过他继父在朝廷竭力疏通，他几乎被任命为波旁王朝的将军。但是，未等他上任，就被指控盗窃军饷六万法郎，罪行非常严重。可是蒙托隆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滑铁卢战役后，他又以宫廷侍卫官的身份，第二次出现在拿破仑的随行人员当中。为什么这个贪图安逸的年轻贵族会突然投奔败北的拿破仑，甘愿尝受流放的艰苦生活呢？

福舒特想起那些回忆录中提到蒙托隆的某些令人费解的行径，他对自己的夫人阿尔宾和拿破仑明来暗去毫不介意；甚至当古尔戈以此嘲笑他时，他也装聋作哑，置若罔闻。作为帝国的将军，蒙托隆为何如此忍辱含垢？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蒙托隆是被波旁王朝指派来暗杀拿破仑的。

从蒙托隆所处的地位来看，他是“长林”的管家，掌管贮藏拿破仑专用“御酒”的房间钥匙，完全有机会在酒中投入适量的砒霜。每投一次毒，就可以保证拿破仑中毒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而且还可以保证药的均衡剂量，使之缓慢中毒而死亡。

毫无疑问，毒害拿破仑的凶手就是这个两面三刀的蒙托隆。

蒙托隆 1821 年回归法国，投靠了波旁王朝；但不久又反叛，摇身一变又当了拿破仑三世的将军。由于率军进击失利，全军覆没，他被俘，判刑二十年，终于饱尝铁窗的滋味。也算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孙石夫）

旧金山大地震

位于美国西部的圣弗兰西斯科，原本是个风景宜人的小渔港。1848年因发现黄金而逐渐发展成大都市，得名叫“金山”。后来，为区别澳大利亚墨尔本附近的新金山，而改名旧金山。然而，本世纪初的一场大地震和随之而起的大火，却彻底摧毁了

这座大城市，除城郊几栋残垣断壁外，整个都市已荡然无存。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遭到如此惨烈的破坏，在历史上是前无先例的。

1906年4月18日子夜时分，旧金山市消防署署长丹尼斯·沙利文和妻子正在朋友家参加聚会，突然接到市内有两处起火的报告。他迅即与妻子一起奔赴这两个火场。沙利文是美国著名的消防署长。他积26年消防经验，为旧金山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灭火方案。今晚，他身先士卒，与消防队员一起投入到灭火的战斗中，直到凌晨3点才将两处大火扑灭。由于离家远，他与妻子就近在消防站三楼住下来。

清晨5点13分，强度为8.3级的大地震从200英里外的海底深处向旧金山袭来。随着一声巨响，海边的峭壁，一劈两半，裂缝长达400多公里，吞噬地面的一切后，又重新合拢。地震持续了75秒，第一次震动长达40秒，间隔10秒钟后又发生第二次震动，持续了25秒。

地震发生时，杰西·库克警官刚刚巡逻到华盛顿大街和戴维斯大街的文汇处。突然，遥远的天空闪现出一片粉红色的光，地底下传出一阵深沉的轰隆声。他骇然发现，整个华盛顿大街上下起伏，犹如大海波涛朝他奔涌而来。周围的房子似乎也在翩翩起舞，忽左忽右，时凸时凹，不断地变化着。他顿时失去平衡，跌倒在地。

在消防站三楼，消防署长沙利文被震灾到来时的第一阵喧嚣声吵醒，他睡眼蒙眬地跃身而起。这时，周围的房屋已纷纷倒塌。他猛然想起住在隔壁的妻子，就跌跌撞撞朝房门口摸去，但房门已歪斜变形，怎么也打不开。他拼命砸开门，冲了出去。然而，破门而出的他，并未能去救妻子，反而使自己送了命。原来门外楼道被对面大楼倒塌的烟囱砸了个大洞，他一脚踩在洞里，从三楼一直跌到楼下。他多处摔伤，昏迷中被送进医院，几个小时后便离开了人世。这位勇敢而又有才能的消防总指挥之死，使震后的灭火工作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不然的话，他很可能有办法对付大火，使旧金山的绝大部分地区免遭毁灭。

此刻，旧金山市内无论是住在豪华旅馆的富人，还是住在贫民窟的穷人，都惊醒了。著名的意大利歌剧演员恩利科·卡鲁索昨晚在大剧院首场演出歌剧《卡门》，深夜才归，住在宫廷饭店的将军套房里。地震发生时，他从床上滚落到地板上。这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惊慌地狂呼着男仆，但男仆不知去向。他赶紧穿上衣服，跌跌撞撞地冲到衣柜前，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照片。这是他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合影照，上面还有罗斯福的亲笔赠言。他把这张珍贵照片揣在怀里，不知所措地在房间里奔来奔去。屋顶上的枝形吊灯砸下来摔得粉碎。窗上玻璃“咣当”一声震落在地。屋外灾民们惊恐绝望的叫声不绝于耳。卡鲁索昨天刚到旧金山，就听说维苏威火山又在爆发，喷发的熔岩奔涌到他的家乡那不勒斯市。当时他还庆幸自己躲过了那场灾难。而现在，他却在绝望地大叫：“上帝啊，这难道是你的旨意，灾难终究要降临到我的身上？”他惊恐极了，突然哑然失声。他开始担心地震毁掉了

他的声带。

就在这时，他的音乐指挥赫兹冲进他的房间，见他两眼发直。双手不停地拉扯着衣衫，呆若木鸡地站在窗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赫兹吓坏了，他急中生智，打起拍子，指挥卡鲁索唱歌。卡鲁索的神志突然清醒了，自然而然地随着节拍唱了起来。饭店外穿着睡衣蜂拥逃命的人群，听到他那高亢而美妙的歌声，纷纷停住脚步，抬头望着歌唱家的窗口。人们深受慰藉和鼓舞，竟一时忘却了震灾带来的痛苦和恐惧。这无疑是卡鲁索一生中最伟大最有意义的一次演出。

城里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海湾沿岸，在沙质地上建造起来的木屋都坍塌了。在奈恩斯街和布伦诺街，楼房整排整排地震倒。东倒西歪的房屋，就像一群步履踉跄的醉汉一样。

旧金山市政大厦完全被毁。这座耗资 600 万美元，历时 20 年建造起来的巨大建筑，震后只剩几根钢筋铁骨，孤零零地斜插在瓦砾堆中。许多豪华精致的大旅店也毁于一旦。

在这地动山摇、大难当头之际，多数人都是不顾一切地忙于逃命，有些人却泰然处之，依然按常规办事。

地质工程师桑德斯一向做事认真，有板有眼。当圣弗兰西斯饭店即将倒塌之前，他还在不慌不忙地收拾行李，然后最后一个走出房门。在饭店大厅，他遇到一个惊慌失措的侍者，便拦住问：“喂，年轻人，我要走了，请结下帐。”这个侍者目瞪口呆地望着他，隔了半晌才说，“你疯了？现在什么时候了，还结帐？”说完夺路而走，向服务台的办公室跑去。桑德斯紧迫不舍，跟了进去。他掏出钱来，递给侍者：“住宿岂能不给钱，我一定要付帐。”侍者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地说：“您肯定是疯了，好吧，我就按您的要求办。”他接过钱，又耐心地开了张收据给他。桑德斯这才放心地离开满地瓦砾的大厅，向外走去。

詹姆斯·霍珀是旧金山广播电台的新闻记者，他被卧室外煤气管吱吱的漏气声惊醒之后，立即冲到大街上。面对一片恐怖的震灾景象，他想起新闻记者的职责，便转身向广播大楼奔去。这无疑是一条重大新闻，一定要迅速写出报道。一路上，他边跑边记下每幢楼房毁坏的情况和所在位置。过了一段时间，他才猛醒过来，自己这么做真是愚蠢至极。毁坏的楼房数不胜数，怎么能记得过来呢？他扔掉本子，环顾四周，自言自语地喊道：“天啦！全城所有的楼房都倒了，我总不能把它们都记在这个小本子上吧？！”

同那些惊恐万状纷纷逃离圣弗兰西斯饭店的百万富翁和小姐太太们正好相反，青年话剧演员约翰·已里摩尔却始终表现得若无其事，冷眼静观这场可怕的大灾难。震灾发生时，他正与几个朋友在房间里饮酒狂欢。初震过后，他走出房门，身上依旧穿着笔挺的夜礼服。他郑重其事地告诉侍者：“给我来杯酒。”侍者向他解释，所有的酒瓶都震落地上摔碎了，没有酒了。他才掸掸礼服，不慌不忙地向外走去。他穿过乱石，旁若无人地与仓皇逃命的人流迎面而行，来到宫廷饭店门前，这里已是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他猛然看见著名歌唱家恩利科·卡鲁索正坐在一辆破马车上发愣。原来，卡鲁索跑出饭店后，依旧感到恐惧，茫然无措，不知该到何处避难。这时，正好遇到一个好心的警察，他让卡鲁索坐在这辆破马车上，并答应一有机会就安排他离去。

巴里摩尔走过去，向这位神情沮丧的歌唱家打招呼：“喂，老朋友，这

里的一切都很有趣，是不是？”

卡鲁索也认出了巴里摩尔。他注视着这位小有名气的年轻演员，只见他身着夜礼服，佩有考究的黑领带，裤子笔挺，皮鞋锃亮，似乎眼下并未发生什么灾难。他发现巴里摩尔的举止打扮未免太不合时宜，便笑了起来：“巴里摩尔先生，您知道吗，您是旧金山，也是全世界唯一穿着礼服温文尔雅地迎接地震的人。”

在加利福尼亚土生土长的欧内斯特·弗莱明医生，是一位几经震灾的人，但他一生中还未遇到过如此巨大的灾难。

1868年，第一次遭遇地震时他才10岁，但同这一次相比，那次地震不过是像摇篮在晃动而已。

大地震不仅使正常人感到恐惧，也使上千名精神病患者躁动不已。圣约瑟有所疯人院，住着1100名精神失常的病人。地震摧毁了疯人院的楼房，87名患者和11名护士当场遇难。几百名精神病人从倒塌的房子中蜂拥而出，其中有56人跑进附近的树林，迷失了方向，两星期后才被找回来。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病人砸开自己的镣铐，奔到废墟中，救出一名警卫人员，然后狂笑着朝山上跑去。他那宝贵的片刻清醒，已使他足以成为一名英雄。

100名桑塔·克莱拉学院的学生闻讯赶来，帮助疯人院的管理人员追回那些逃走的病人。疯人院的大楼已经倒塌，没有地方收容这些狂躁的病人。他们四处狂奔，对阻拦他们的人拳打脚踢。学生们好不容易才稳住他们，像对待婴儿一样一口一口地给他们喂饭。几个小时后，管理人员才将病人送到几间临时搭好的木棚里安顿下来。

在短短70秒之中，旧金山大部分房屋都被这前后两次大震动摧毁了。但随后而起的大火却给了这个城市毁灭性的一击，价值数亿美元的财产都化为灰烬。

地震刚发生一分钟，熊熊大火便燃烧起来。先是从市场街以南的十几个街区，以及贫民住宅区和工厂区烧起，随后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四周蔓延。由于消防署长沙利文遇难，没人出面组织大规模的灭火工作。震后不到一小时，整个旧金山都在燃烧，火光冲天，一百英里外都能看见。

值此危难之际，却有一个人主动担当起组织灭火和维持治安的重任，他就是陆军准将弗里德里克·芬斯顿。他当时住在马基特街以北的诺伯山上一幢豪华公寓里。自己的房屋侥幸未毁，但这并没有减轻这位将军的忧虑。他站在阳台上，透过双筒望远镜，看到城内的大多数房屋都相继燃起大火。这时，值班军官跑来向他报告，一伙暴徒正从巴巴利海岸向城里袭来，一路上趁火打劫、伤害无辜。

芬斯顿将军闻讯大怒，等不及与市政官员商议，便下令从附近的普雷西迪奥军营调派军队，开往旧金山市，实行军事管制。面对如此惨烈的大地震和大火，他毫不畏惧。以往他在中美洲、古巴和菲律宾多次率军激战，屡获荣誉勋章，未满35岁就当上了准将，什么生死场面都经历过。这一次，他当然绝不会被这场浩劫所吓倒。

芬斯顿的副官首先跑到梅森堡叫醒熟睡的沃尔克上尉，命令他率领一连工兵，携带炸药进城，用爆破的方式遏制火势的蔓延。然后，副官又来到普雷西迪奥军营，传令莫里斯上校派兵进城。可是，莫里斯身穿睡袍，揉着惺忪的双眼，怒气冲冲地叫道：“你回去告诉将军，最好先去翻翻陆军条例，只有总统本人才有权下令正规军进入城市！”

莫里斯说完仍旧回到卧室睡他的觉。副官未被吓倒，他依然坚决执行将军的命令，亲自下令号令兵吹号集合。几分钟后，他带着整个军营的士兵向旧金山急驰而去。大约早上7点钟，也就是地震发生后不到两小时，部队到达城里。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开始在大街上巡逻，他们得到授权，一旦发现趁火打劫者，格杀勿论。

旧金山市长尤金·施密茨闻知芬斯顿的部队开进了城，才迫不得已同意军事管制，并发表公告，宣布联邦正规军、警察和特种警官有权处决任何抢劫犯和其他罪犯。

实际上，施密茨市长此刻关心的却是自己侵吞来的私人财产的安危。他的同僚艾布·鲁夫则根本没出席过特别救灾会议，只是忙于个人财产的保护与转移。据估计，在这场震灾和火灾中，鲁夫损失的个人财产达75万美元，他与施密茨市长在灾后均因敲诈勒索罪和读职罪而锒铛入狱。

旧金山市消防署共有585名消防队员，他们全部出动奔赶往灾区灭人，结果却徒劳无功。因为全城的供水系统受到极大的破坏，消防队的救火工作受阻。在意大利侨民居住区，由于没有水，只好用昂贵的葡萄酒来灭人。人们从酒窖里搬来一桶桶陈年佳酿，用被酒浸透的麻袋、毛毯、被褥等来扑灭屋顶、木板墙上的大火。

大火以不可阻挡之势吞食了一个又一个街区。巴巴利海岸首当其冲，其次是唐人街，都遭到彻底的毁坏。

大地震颤，屋毁人亡，大难当头，许多人沉着坚定，救死扶伤，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然而，也有一些人趁乱为非作歹，暴露了内心世界的丑恶。在巴巴利海岸，数百个穷凶极恶的无赖，疯狂地公开抢劫，他们冲进酒店喝得烂醉，然后砸碎附近商店橱窗，把货物掠夺一空，他们还推倒银行大门，抢走所有的钱。有一伙暴徒甚至企图抢劫国家铸币厂，那里存放着3900万美元现钞，结果没有得逞。警察及武装的职员和自卫队队员，以及闻讯赶来的正规军击毙了34名歹徒之后，这帮匪徒四下逃窜了。

在马基特街，有一个混蛋企图从一具女尸的手指上取下戒指。3个巡逻的士兵发现后，便下令他举起手来，但他拒不服从，从口袋里掏出手枪负隅顽抗。又有6名士兵赶来增援，大家一起开火，歹徒应声毙命，身上中了11发子弹。在斯托克顿街的地下室，士兵们发现有3个家伙正在翻箱倒柜，抢劫财物，便把他们拖出来，在墙边就地枪毙。在宫廷饭店门口，有一个恶棍正在剥取一具死尸佩戴的贵重宝石，很快被士兵抓住，吊起来在饭店门口示众。

夜幕降临，烈焰吞食了大半个旧金山。全城38.3万居民面临一个恐怖之夜。成千上万陷于绝望的难民开始逃离该城。逃难的队伍中，有不少人裹着毛毯，背着包袱细软；有的举家坐着马车，有的用婴儿车、玩具马车来拖运行李。但是，背对熊熊火焰和一片废墟，大多数人却出奇地冷静，彼此恭谨礼让。在旧金山的历史上，人们似乎从未像这个夜晚一样表现得如此善良、如此友爱。

在联邦广场，挤满了难民。数以万计的人躺在草地上睡觉。政府提供的帐篷搭了起来，晚饭正在准备中。难民们排起了队，准备领取免费提供的晚餐。突然，大火向广场袭来，难民们只好又转移他处。

当时，美国著名的小说家杰克·伦敦正在广场上，他亲眼目睹了大火烧向广场的惨景。一个男人急得高声叫喊，愿以1000美元的代价雇几匹马，把

他负责照管的堆满皮箱的马车拉走，可怎么也找不到一匹马。一小时后，那辆马车便在烈火中焚毁了。一个拄拐杖的老人告诉杰克·伦敦：“今天是我的生日，直到昨晚我还有价值3万美元的财产。为了给自己过生日，我买了5瓶葡萄酒、6条美味的鲜鱼和别的一些食品。不过，还没等我吃上生日晚宴，我的财产就只剩下这副拐杖了。”

旧金山的商店和市场被震灾和火灾摧毁殆尽，只剩下一些小商小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却利用灾难大发横财，成了最冷酷无情而又贪婪无耻的诈骗犯和暴发户。马车夫拉一车家具走几里路竟索要1000美元，汽车司机开车送伤员到医院开口就要500美元。有的小贩将自来水摆在街头卖，一杯水要卖到50美分。一家面包店老板平时10美分一块的面包卖到75美分。一位军官闻讯后，带领士兵冲进面包店，把枪顶着老板的脑门，厉声喝道：“你的面包卖多少钱？”老板吓得撕下75美分的牌价，结结巴巴地说：“5美分一块。”军官警告他：“就按这个价格卖，直到卖完为止，否则明天我就要你的命！”

经过一夜的奔波，到第二天，难民们都陆续离开了旧金山，有7万5千人越过海湾逃到奥克兰，还有几万人逃到附近的山里。

大火直到第三天夜里才被百折不挠的士兵和消防队员们扑灭。但此刻旧金山大部分地区已成了一片废墟。

联邦政府终于控制住了灾区的局势。由于全国各州采取了紧急救援行动，运来了大量救济粮和其他救灾物资，数十万难民没有闹饥荒。留在旧金山附近的十几万难民被安顿在帐篷里。许多人也慷慨解囊，鼎力资助。美国新闻巨子威廉·赫斯特，闻知自己家乡遭到浩劫后，尽其所有给予援助。他组织了救援车队，把医务人员和急救物品从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送往旧金山。他以众议员的身份在国会呼吁政府拨款450万美元重建灾区民房。他还提高报纸的售价，筹集到20万美元救助伤员，并亲自将这笔巨款送到旧金山。美国南部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长爱德华·哈里曼，为难民提供免费火车，把他们送到想去的任何地方。结果在他的资助下，逃难的灾民全部免费离开了旧金山。

地震和随后的3天大火，毁掉了旧金山520个街区，近3万幢楼房，有700多人丧生，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达5亿美元。

古老的旧金山已经毁灭了。事隔不到3年，一个现代化的崭新大都市又在废墟中诞生了。然而，雄伟的金门大桥和热闹的阿拉伯夜市已难寻往昔的风采。它就像一位俏丽的少女，在经历一场巨大灾变之后，虽然有些憔悴，但却似乎变得成熟稳重多了。

（陈中）

元首屋大维

公元前 43 年，也就是罗马执政官凯撒遇刺身亡的第二年。年方 20 岁的屋大维当上了罗马执政官。

这年秋天的一个早晨，罗马城突然戒起严来。全城所有的城门、街道、广场、河口码头和山头，都布满了手执武器和军旗的士兵；就是城外的港口、沼泽、湖泊等一切能通过或隐藏人的地方，也都派了岗哨。一队队骑兵耀武扬威地到处巡逻着，马蹄声得得，黄尘滚滚，更增添了城里的恐怖气氛。

罗马的居民们见这情景，悄悄地私下议论说：“可能又是出什么事儿了……”

一些士兵沿街挨巷张贴宣布公敌的布告：凡是杀死被宣布为“公敌”的人，可以凭割下的头颅，领取到一笔巨额奖金；如果奴隶杀“公敌”，除了领奖外，还可以恢复自由。谁要是窝藏“公敌”，将与“公敌”同样惩处。

一个老人听人读完了文告，连声叹道：“唉，又要杀人啦，杀人啦！去年刚杀了凯撒……”另一个中年人低声插话说：“这太可怕，太可怕啦！”

站在电年人身后的一个老妇人摇着头说：“真是多灾多难 173 元首屋大维呀！听人说，两天前城里出了许多怪事哩，牛发出人的声音，初生的婴儿会说话，豺狼曝叫着穿过广场……这些都是凶兆哪！看样子神明又要惩罚咱们啦！”

一个乡下人模样的中年男子问道：“那签发文告的两名执政官，安东尼是知道的，另一位屋大维是谁呀？”

乡下人身旁的老人惊奇地说：“你连屋大维都不知道？他是凯撒的侄孙！凯撒把大部分遗产分给了他，还立他为养子呢。他今年才 20 岁，可已经当上执政官啦！”

正说间，一个百人队长一手持剑，一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匆匆向前走去。看布告的老百姓吓得纷纷往后躲闪，那老妇人失声尖叫起来：“啊，天哪！”

百人队长扬了扬滴血的人头，招呼他身后的士兵说：“快走，别让公敌溜了！割了头颅好领奖！”他抬头看见另一支队伍正跑步前进，为首的军官手里提着两颗人头，连忙叱喝他的部下快速前进。

被列入“公敌”的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屋大维这一派的政敌和刺杀凯撒的元老派贵族，还有一些则是屋大维的私敌和普通的富豪。的确，这些“公敌”插翅也难逃脱，到处都有士兵把守和巡逻。想获奖的人到处在搜寻他们，“公敌”的脑袋在他们眼里就像是黄金做的，即使“公敌”们躲藏在水井里、阴沟里、烟囱中、瓦堆下，或者是痛哭流涕地俯伏在自己奴隶们的脚下，也一点没有用。有些“公敌”不愿受到凌辱，便绝食、自缢、溺毙、自焚，或者自卫而死。还出现了儿子告发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或者奴隶因保护主人而一起殉难的事例。

在这场残酷的屠杀中，被处死并且没收财产的，有 300 名元老和 2000 名骑士！

公元前 42 年，安东尼出任罗马东部行省总督，到了埃及。后来，从那里传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安东尼总督迷恋上了埃及女王，并且同她结婚啦！”“听说总督封他的老婆为‘万后之后’，甚至宣称自己一切听从尼罗河的蛇——女王的话！”

还有传闻说，安东尼总督已经宣布，要把罗马在东方的许多行省赠给埃及女王这个妖婆的儿子哩……

这一切，激怒了罗马的显贵。他们决定拥护屋大维而反对安东尼。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宣布剥夺安东尼的权力。并且决定讨伐他和埃及女王。这支讨伐大军就由屋大维来统率。

公元前 31 年 9 月，浩浩荡荡的讨伐军舰队从罗马扬帆出发了。屋大维身披红斗篷，手握剑柄，立在旗舰的船头，遥望着一望无际的地中海。他浓眉紧锁，暗暗发誓，不大败安东尼决不收兵。

屋大维的舰队与安东尼的舰队在希腊西北部的一片海域相遇了。屋大维数了数挂着埃及女王旗号和安东尼旗号的战舰，约有 160 艘，双方实力相当。两军相遇勇者胜，只见屋大维拔剑朝空中一挥，躲在船舷一侧的弓箭手们万箭齐发，箭簇如飞蝗般地射向敌舰。敌舰也不甘示弱，纷纷还击。有几艘战舰贴在了一起，于是舰船上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刀枪撞击声。被砍翻的士兵掉落水中，尸体随波逐浪而去。

双方战斗正酣之际，埃及舰队突然接到女王命令：立即返回埃及。接着，安东尼也指挥自己的战舰向埃及方向逃去。安东尼抛下的许多舰船，因失去指挥而战败投降。

第二年夏天，屋大维率大军攻击埃及京城，安东尼率部下负隅顽抗，埃及军队协助他死守城池。屋大维命令士兵用燃烧着的箭矢向城内射击，城内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一批士兵刚爬上城堡，就被守军砍翻跌落下来，接着又冲上去一批……屋大维骑在马上，挥剑在后面督战。城堡终于被攻破了，安东尼的士兵纷纷跪地投降。

安东尼在绝望之下用剑割断了自己的喉管自杀了。

埃及女王躲进王宫，听到罗马士兵的吆喝声和叮叮当当的砍杀声，吓得浑身发抖。这位美貌无比的女王眼见敌人杀进了内宫，又听内侍说安东尼已自刎，她知道一切全完了！她打开了神龛下的一只铁笼子，闭着眼把手伸了进去。宠里的眼镜王毒蛇嘎嘎叫着张口就咬！女王踉跄着跌倒在地，气绝身亡。

屋大维征服了埃及，回到罗马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同凯撒一样的伟大人物。屋大维决定把和平赐给罗马人，号召公民们第二天到雅努斯神庙去。

第二天黎明，罗马人从四面八方涌向雅努斯神庙。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屋大维在侍卫的簇拥下，来到了庙前。

屋大维站在一个土堆上，挥着双手，让向他欢呼的人安静下来，然后大声喊道：“公民们！你们知道，在雅努斯神庙里，供奉着我们的马尔斯战神。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把庙门洞开，以便让伟大的战神来保佑我们取得胜利。整整 200 年来，神庙的大门一直敞开着。现在，战争结束了，和平来到了。因此我下令，从此关闭神庙的大门，让我们罗马人永远过和平的生活吧！”

屋大维话音刚落，人们就欢声雷动。在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后，雅努斯神庙沉重的大门缓缓地关上了。屋大维要让罗马人“永远过和平的生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雅努斯神庙里的“马尔斯战神”好久没有出来，罗马的和平延续了 200 年之久。

元老院把曾经给凯撒的荣誉都授给了屋大维。屋大维成为执政官、大祭司和保民官，享有“祖国之父”的光荣称号。公元前 27 年，他又接受了元老

院奉给他的“奥古斯都”的尊号。“奥古斯都”在拉丁文中是“神圣的”、“至尊的”意思。后来它又成为西方帝王的一种头衔。屋大维还被授予“元老院首席公民”（即元首）和元帅的荣誉称号，独揽了罗马的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元首”这个词，从此就正式在世界各国使用了。当时他才 36 岁。

屋大维统治了罗马 43 年。这是古罗马经济上最富庶的时代，又是古罗马文学上的“黄金时代”。屋大维开创的元首政治，实际是罗马帝制的开始。他虽然没有称帝，但实际上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这种披着共和制外衣的独裁，一直延续到公元 3 世纪后半叶戴克里当政时，才公开地变为君主专制。

（贺何文）

土木堡事变

明王朝第四代君主明仁宗朱高炽，只当了一年皇帝就死了。他的儿子明宣宗朱瞻基，也只做了不到十年的皇帝，37岁就死了。朱瞻基的大儿子朱祁镇，9岁就当上了小皇帝，全亏他的祖母太皇太后有见识，主持朝政，重用仁宗和宣宗朝的旧臣，坚持仁宗和宣宗朝的好政策，才使这位明英宗在继位的最初几年，过了段太平日子。

到了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几位辅政的旧臣，也是死的死，老的老，朝廷的大权，渐渐落到了太监王振的手中。

在众多太监中，王振是一个阴险奸诈的人，他利用英宗的年幼无知，经常哄着他玩，使英宗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英宗正式登基，就提拔王振执掌司礼监，成为宫中太监的高级领导。因为王振常常带着英宗做一些不上规矩的事，太皇太后曾想杀掉他，英宗跪下求情，才救了他一命。此后，王振势力越来越大，多次同辅政老臣发生冲突，并且收买亲信，收受贿赂，朝中大臣也管不了他。太皇太后一死，王振更是肆无忌惮。皇宫门前，原立有一块铁碑，上面刻着明太祖朱元璋关于永远禁止太监干预朝政的诏令，王振公然将它移走。后来，朝廷大事，竟是由王振说了算。文武百官凡有得罪了王振的，常常被迫害至死。至于王振生活的奢侈，更令人瞪目了。他在皇城东边修建了一座宅第，宏伟程度可以同皇宫相比！

与此同时，中国北部一个叫瓦刺的蒙古部落，渐渐强盛起来。到明正统四年（1439年），部落首领也先掌握了部落大权，他不满足于安居在蒙古，常常向南方侵略，骚扰明王朝的领土。

王振为了粉饰太平，把这重要的军情隐瞒下来，不向皇帝汇报。他暗地里同瓦刺也先做交易，送给他们大量金银财帛，求他们退兵。他并用大量铜、铁箭头，去同瓦刺也先交换马匹，实际上是以军用武器支援敌人。瓦刺也先得到了甜头，也就更加频繁地来骚扰明王朝的边疆。

这样到了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的七月，也先又派了一批人到北京来，名义上是进贡马匹，实际上是想发一笔横财。他们来了二千人，却要求按三千人给予赏赐。王振也被也先的这种欺诈行为激怒了，下令按实际人数给赏，虚报的一律不给；赏赐的数目只有也先所要求的五分之二。

也先对此大为不满，于是指挥瓦刺军队兵分四路，大举向明王朝发动进攻。也先亲自率领的一路，从山西大同攻入，到猫儿庄，明军参将吴浩迎敌，战败身死。到阳和口，明王朝的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同知石亨迎战，却因为王振的亲信、监军太监郭敬横加干涉，致使明军大败。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单骑退走，郭敬钻进草丛中，才拣了一条性命。明王朝边境的守军纷纷瓦解，向内地逃生。

瓦刺入侵、边境失利的战报不断传入京城，王振也慌了手脚。他想出一个孤注一掷的办法，就是由皇帝亲自率领全国的军队出征。他以为把皇帝弄到前线，就能将瓦刺大军吓回北方去。明英宗朱祁镇这年已经23岁，却完全不懂得军国大事，一切听任王振摆布。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竭力劝阻英宗出证，却遭到王振反对。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尽力劝说，王振也不理睬。于是明英宗发布诏令，由他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城，他亲自率领50万大军去征讨瓦刺。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却完全没有做准备工作，两天后就仓促出发了。士兵们连这次进军的任务都没搞清楚，松松垮垮如散兵游勇。一

路上，英宗照例是每天享用山珍海味，王振一伙则乘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命令沿途官府进贡名贵特产。由于后勤粮草供应跟不上、士兵们缺少军粮，饥饿难忍，一路骚扰百姓，百姓们怨声载道，纷纷逃走。加上连日来阴雨绵绵，士兵生病的越来越多，还没走多远，就死了不少人。

大军经过居庸关时，文武百官请皇帝就驻扎在居庸关上，以这里做大本营。王振仍不同意。大军又向前到达宣府，此时又遇狂风暴雨，而边境各处的告急文书又纷纷传来。大臣们都要求皇帝停留下来，不要再盲目贸进。王振大发雷霆，吓得成国公朱勇等人有事向他汇报，只敢跪着用膝盖走到他面前。

眼看军心动摇，形势危急，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人，再次恳请皇帝暂时回师。从长计议。哪知王振一听就恼火，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还没见到一个敌人，就想逃跑吗？”

邝野耐心解释道：“这不是逃跑。用兵的方法，要像流水一样，避实击虚，进退自如，万万不可不顾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条件去死拼硬打。”

王振骂道：“你们这些书呆子，只会纸上谈兵，哪里懂什么军事！”竟下令罚邝野、王佐跪在荆棘丛中，以威吓别人不敢再违背他的意图。一直到天黑，还不许他们爬起来。

王振的亲信彭国清也觉得形势下妙，悄悄对王振说：“我观察天象，天象显示，我们再前进，恐怕对皇上不利。”王振却说：“要是真的这样，我们也只好认命了。”

大军继续前进，到了阳和，这儿也就是宋瑛、朱冕战败身亡的地方，荒野里到处是明朝士兵的尸体，看得官兵个个胆战心惊。但王振仍然坚持北进，直到进入大同，还不肯罢休。王振的亲信郭敬也害怕了，暗中劝说王振，王振这才同意回师。

明朝的皇帝率领五十万大军，游行一样转了一大圈，损失无数，却连一个瓦剌士兵也没见到，只好灰溜溜地往回转了。

这时，大同总兵郭登提出退兵的路线，应由大同向东南走，经过蔚州，进紫荆关，就是北京的地界了，这条路既安全又便捷。王振恰好是蔚州人，他突发奇想，要把皇帝带到他家乡去做客，以显示他的威风，于是欣然同意了。可是大军走了40里，王振忽然又想到，这50万大军从蔚州走一趟，一定会踏烂大片庄稼，家乡的人难免要怨恨他，他又改变了主意，不许再往蔚州进发，命令50万大军掉过头来，仍然从来时的路线，由宣府回北京。

这时，瓦剌也先已经掌握了明朝大军的行动情报，打算乘机从后面袭击，再捞一些便宜。明朝大军这么一兜圈子，刚好让瓦剌军队追了上来。明朝大军一片恐慌。邝野再上奏章，要求大军赶紧向紫荆关进发，王振大怒，说：“再胡说八道就杀了你！”邝野但然抗争道：“我是为了大明江山直言上疏，死吓不倒我！”王振根本不睬他，下令将他赶了出去。

眼看瓦剌大军逼近，王振命恭顺侯吴克忠和他弟弟都督吴克勤留下断后，吴家兄弟奋勇苦战，双双战死，明军纷纷溃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爵绥又领四万人去支援，经过鹞儿岭时，中了瓦剌的埋伏，也全军覆灭。

第二天，明军退到了土木堡，这时太阳还没落山，大军离怀来县城只有二十里，众将领要求赶紧向怀来县城前进，只要进了城，就便于坚守了。可是王振却因为运粮草和他搜刮的财宝的后队还没跟上来，坚持要在土木堡宿营。土木堡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地方，尤其是没有水源，士兵挖井挖到两丈深

还不见水。它的南边十五里有一条河，但已被瓦刺军队抢先占领了。这一夜，瓦刺军队完成了对明军的包围。而明军因为缺水，人饥马渴，都无力再行动，更不要说作战了。

天亮之后，瓦刺军队收紧了包围圈。但是，明军毕竟有数十万之多，而瓦刺军队不过二万人，所以也先也不敢轻易发起进攻。结果他想出一条诡计：派使者来，要求同明军议和。王振当然求之不得，马上让皇帝发下诏书，同意议和。瓦刺军队假意后退，王振也不探听敌人虚实，马上命令明朝大军向怀来进发。数十万军队急急忙忙行动，顿时乱了阵势，而也先已命令骑兵冲杀过来，一面狂砍滥杀，一面大叫：“投降者不杀！”明军纷纷丢下刀枪乱窜，互相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真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明英宗在亲兵护卫下突围，连冲几次都冲不出去。这位皇帝只好认命，干脆下马，坐在地上，等待敌人来俘虏他。结果，明英宗被瓦刺军队掠走，王振死在乱军之中，英国公张辅等五十几位大臣战死，明军死伤数十万！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也先押着明英宗，来到了宣府，叫守城的明朝官员开城门出来迎接皇上。守城的人回答说：“我所守卫的，是皇上的城市，今天天太晚了，我不能随便开城门。”也先没达到目的，又把明英宗押到大同，向守城的明朝官员索取金银财宝。结果广甯伯刘安、总兵郭登、侍郎沈固等人，一齐出城来见俘虏皇帝，伏在地上痛哭失声。他们把二万多两金子连同宋瑛、朱冕、郭敬等人的家产，一齐献给皇帝，让明英宗用来送给也先。这一天，瓦刺军队在大同城西安营，郭登打算派勇士杀进敌营救出皇帝，但没有成功。也先也不敢再在内地逗留，押着明朝的皇帝回蒙古去了。

明英宗被也先俘虏的消息传到北京，顿时在京城引起恐慌。皇帝就是国家的标志。皇帝成了敌人的俘虏，国家存亡，迫在眉睫。这时宫廷内外，一片混乱。皇太后和皇后，连忙搜刮宫中的宝物，送往也先的军营，希望也先把皇帝放回来。

文武百官得到消息，聚在皇宫里大哭，哭够之后，才想到该计议下一步的打算。当时明王朝的精兵强将，都已被明英宗带走了，留在京城里的老弱残兵，还不满十万人。文武百官都惶惶不可终日，唯恐也先打到京城来。有个叫徐有贞的侍讲，自以为精通天文、地理、兵法、方术，他到处宣扬，说他夜观星象，明朝的气数已尽，只有向南方迁都，才可以维持下去；他并且匆匆忙忙把自己的妻子送到南方去了。但是他这套装神弄鬼的把戏，并没能吓住明朝正直的大臣。尚书胡 当即出面驳斥他，说：“当年明成祖决定把陵墓修建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子孙后代，北京是不能放弃的！”侍郎于谦也义正辞严地说：“宣扬南迁的人应该杀掉！京城是国家的根基，京城一动，国家的根基也就动摇了。宋朝南渡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么？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调动全国各地的军队到北京来，誓死守住北京！”连太监兴安也厉声说：“我们逃走了，祖宗的陵寝将由谁来看守？”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把徐有贞轰了出去。

太后问太监李永昌，是迁都好还是不迁都好？李永昌回答说：“历代皇上的陵寝在这里，皇宫在这里，粮食国库、文武百官、亿万百姓都在这里啊！”太后恍然大悟，断然决定留守北京。

过了三天，皇太后和皇后派去用珍宝换皇帝的使者还没回来。皇太后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她的意旨，说：“皇帝领兵亲征前，已命令让郕王代理国

事。今后国家大事，一律向郕王汇报，听他处理。”不久，皇太后又决定立明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可是朱见深这时才两岁，当不得皇帝，所以还是由郕王朱祁钰代理国家政事。

郕王在皇宫午门的左门接见群臣。右都御史陈镒等人哭着说，国家遇到如此大难，皇上落入瓦剌之手，都是因为太监王振专权造成的，现在一定要清除王振的党羽。王振的党羽马顺大声斥骂陈镒等人，要他们退下去。大臣王竑气得扯住马顺的头发咬他的肉，骂道：“你依仗王振作威作福，今天还敢这样猖狂！”恨透了王振一伙的百官一拥而上，当场把马顺打死了。郕王见朝廷上一片混乱，吓得爬起来想跑。于谦上前拉住郕王，请他向百官宣布，说：“马顺罪有应得，打死就打死了，不再追究责任。”文武百官都安定下来。于是大家议定，把王振的党羽都抓起来斩首，又抄了王振的家，抄出金银珠宝难以计数。不久，太监郭敬从大同跑回京城，也被抓了起来。

于谦在安定朝廷的大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吏部尚书王直拉着于谦的手说：“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啊！像我王直这样的老朽，就是有一百个，又有有什么用呢！”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更加敬重于谦。于谦也当仁不让，以挽救国家危难为己任。他向郕王提议，一方面，要严令边境守将，尽力防守，不让瓦剌军队侵犯边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北京城的防卫，又征召兵勇，修造盔甲武器，严守各个城门。他又向郕王推荐了一批足以信任的大臣。郕王都接受了。

当时，北京附近的通州粮仓中，储存着大量军粮。有人担心这批粮食会落到瓦剌军队手中，建议把它烧掉。应天巡抚周忱不同意，说：“这么多粮食，够守卫京城的军队吃一年的，完全可以命令军队自己前去搬运充作军粮，何必烧掉呢！”于谦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然，没有几天，通州粮仓的粮食全部运空，而军队的粮草都得到了补充。

到了这年的九月，于谦和各位大臣，向皇太后汇报说，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成年的皇帝，总是不行的。现在英宗一时回不来，不如就让郕王继位当皇帝，免得瓦剌也先总拿英宗来要挟我们。

皇太后同意了。

就这样，郕王当上了皇帝，史称代宗，尊称被俘虏的皇帝英宗为太上皇。

明王朝的政局，渐渐稳定了。

不久，也先又故伎重演，押着英宗到了大同，想把守大同的明朝官员骗出来抓住，趁机攻取大同。大同总兵郭登却不上这个当，派人通知也先说：“亏得天地祖宗保佑，明朝已经有皇帝了！”同时连夜派人向北京朝廷报告，提醒京城加强防卫。也先见此计不成，知道大同守军已有准备，便没敢贸然进犯。也先在边境上没捞到便宜，便转而南下，一直攻打到了北京城下。于谦领兵出城列阵，命令北京各城城门都紧紧关闭，以断绝官兵后退的念头。同时，于谦又公开宣布：“与敌军对阵时，将领不顾士兵先退的，士兵可以杀掉这个将领；士兵不顾将领先退的，后队的士兵可以杀掉退却的士兵！”于是官兵都能奋勇杀敌。明朝军队同瓦剌军队一连恶战了五天，瓦剌军队开始动摇了。到第七天，瓦剌军队战败而退。明军在后追杀，也先只得再次押着英宗，逃回去了。

明王朝终于转危为安了。

（薛兵）

布哈林之死

1938年3月18日清晨，破晓前的昏暗笼罩着莫斯科城，沙皇时代的前贵族俱乐部大厅里灯火辉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经过十一天的审讯，今天将宣布对右派和托洛茨基反苏联盟案的判决。突然，大厅的正门开了，全场顿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几百双眼睛投向被带上场的被告。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走进设在一道简陋板壁前的被告席。有些人显得心绪不安神色紧张，另一些人则若无其事镇定自如，等待着对自己的宣判。其中有个身材不高但却粗壮的中年人漠然盯视着座前的地板，看得出他已经精疲力尽。他，就是这个案件的主要被告——苏联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布哈林。

宣判是无情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进行恐怖、破坏和间谍活动等罪名，判处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十八名罪犯极刑，予以枪决。另外三名被判处长期监禁。被告们的眼中流露着绝望，喷射着愤怒，明知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诬陷，他们却无力反抗。这些曾经在苏联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含冤被押上了刑场……

时隔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乌云终于被驱散，正如布哈林在他的遗书中所说的那样：“历史迟早必然会清除我头上的污秽。”这个天大的冤案是怎样造成的，现在已经完全水落石出了。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理论阐述者和贯彻者之一，一度成为斯大林的左右手。他积极支持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所开展的斗争。可是，到1928年以后，在许多政策问题上，布哈林与斯大林产生了分歧。于是，布哈林被宣布为“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是一个新出现的“反党集团”的头领。先后被撤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消息报》主编的职务，并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据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为斯大林的表里不一所激怒，当众抖出斯大林过去为拉拢他而私下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布哈尔奇克（布哈林的爱称），你我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全是些可怜的小苍蝇！”听了这话，斯大林脸色突变，厉声喝道：“造谣！布哈林编出这种话是要煽动政治局委员们起来反对我！”

但是他忘记了，类似的恭维话，他私下里几乎对每一个政治局委员都讲过。

此后不久，布哈林和李可夫，托姆斯基曾主动拜访斯大林，表示和解。即使是这样，斯大林也没有原谅他们。紧接着，在1930年苏共十六大时，托姆斯基被开除出政治局；同年12月，李可夫也从政治局清洗出去，第二年又撤掉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过了些时候，政治空气有所缓和，布哈林被任命为《消息报》的主编和最高经济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研究部主任。他学识十分渊博，又有长期办报的经验，因此把报纸办得十分出色，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张报纸。在这期间，他和一位叫拉林娜的姑娘热恋上了，这是他在艰难岁月中的一大安慰。拉林娜对布哈林的思想品德有深刻的了解，对他十分钦佩，所以才能在他身处逆境、前途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和他结为夫妻。

他们总算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但却是短暂的……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遇刺，

斯大林借此掀起了一场“肃反”的高潮，逮捕了季诺维也夫等一大批原来的反对派。此时，布哈林暂时还没有被触及。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举杯为布哈林敬酒。他说：“我们都了解他和热爱他，谁要是老记着过去，谁就从我眼前滚开！”然而，与此同时，他的调查机关却在准备一份布哈林“过去”情况的档案材料。

布哈林当然不会被斯大林的甜言蜜语蒙骗，凭着他的政治敏感性，他意识到斯大林绝不会放过他的。

1936年春，为了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手上买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布哈林奉命带领一个小组赴巴黎。但是，他是以“心里想着自己的讣告”的心情去进行他的最后一次旅行的。回国后不久，有些被卷入基洛夫案件的人突然作了“补充交待”，供出他们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拉狄克等一大批人的“罪恶关系”。一个星期后，加米涅夫的供词竟然在布哈林主编的《消息报》刊出，声称1932年至1934年期间，他曾与托姆斯基及布哈林“保持联系”，布哈林“和我想的一样，不过他的策略不同”。

第二天，报纸发表了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命令，宣布开始就加米涅夫对布哈林等人的指控进行调查。这样一来，上呼下应，全国各企业和机关都举行群众集会，强烈要求严惩这些背叛祖国的人。很多集会还通过了决议，要求“彻底搞清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罪恶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之间的关系”。

当布哈林看到报纸上审讯的消息，尤其是那两段供词，简直像晴天霹雳击中了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和他的同事们如何用拷打和折磨的方法从被告口中得到这些失实的口供。于是，布哈林在远离莫斯科的伏龙芝给斯大林拍发了一份急电，要求暂缓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宣判。他想与被告当面对质，澄清事实，以驳回那些不实的指控。可是已经晚了，被告已被迅速处决。

布哈林预感到死神正在向他走来。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吉尔吉斯，乘飞机飞回莫斯科。第二天，有人给拉林娜打电话，叫她去接丈夫。这些日子里，她一直被报纸上连篇累牍指控她丈夫的消息所困扰，凭着她对布哈林的了解，不相信这些指控是真的，却又无法跟他联系。

她迫不及待地乘车赶往机场。

布哈林早已到了，他心神不定的坐在大厅的一角，为了不让人家认出他来，把脸埋在两只手掌里。拉林娜疾步向他走去：“喂，尼古拉，我们回家吧。”

布哈林抬起头：“回哪儿去？”

“克里姆林宫，眼下他们还让我们住在那里。”

“那么，帮我掩蔽一下，我不想让人看见。”布哈林说着就朝汽车走去。他显得有点愤愤然。“要是我能料到会发生一切，我就会离开你去让炮火炸死。”

布哈林到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斯大林打电话。一个不熟悉的声音说：“斯大林在索契。”于是他便写了一封长信，申辩自己无罪。以后几天，布哈林足不出户，整天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随时可能降临的横祸。一天，《消息报》的一位编辑来电话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布哈林回答得很干脆：“只要报纸上不纠正对我的恶劣诽谤，我的脚就不会再踏进报社。”拉林娜问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会杀害基洛夫吗？”布哈林说：“他们

不正是要用这两人的供词来杀害我吗？”

被认为是布哈林同党的托姆斯基在这之前自杀了。斯大林假惺惺地带着一瓶酒去托姆斯基的寓所看望他，没讲几句话，托姆斯基就怒吼着：“给我出去！给我从这里滚出去！”当斯大林悻悻地走出去之后，屋里就传出一声枪响。

布哈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心想，托姆斯基的自杀会视为畏罪自杀，这必然会把他们全毁了。后来知道，李可夫也想自杀，但是在亲戚的强力制止下没有成功。现在，布哈林改变看法了，在一次审问他们的中央全会上，他对李可夫说：“托姆斯基显然是我们当中干得最漂亮的人！”

“调查”很快有了结果。9月10日，中央各大报纸都发表了苏联总检察长的一份通报，结果是“未能确立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起诉的司法根据”，言下之意是虽然他们做了坏事，但暂时还没有抓到证据，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不过布哈林已经顾不得这些，没有给他定罪，这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福音。11月7日，布哈林和他的妻子按照惯例去红场参加十月革命19周年庆祝活动。这以后约一个月平安无事，他仍天天去报社上班。

警报并没有解除。不久，布哈林发现自己的名字已从宪法最后起草委员会的名单中消失了，《真理报》的文章又开始暗示他和“人民的敌人”有牵连。空气再度紧张起来。布哈林再也无法安心工作，他像一头被追逐的野兽一样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每天翻阅《消息报》，看看上面主编的名字是否已经更换。他不知道大祸何时降临。

在这段时间里。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撤了职，接替他的是对斯大林更忠诚、性格更残忍的叶若夫，他也是恐怖活动的狂热支持者。叶若夫接任不久，布哈林就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开始同那些已经被捕的前托洛茨基分子和所谓“布哈林学派”中自己的信徒进行一系列的对质。这些人在谈到自己的罪行时，竟都不约而同地把布哈林扯上，一口咬定仍然存在一个反革命恐怖活动中心，而为首的就是他布哈林！有一个叫叶菲姆·柴特林的人，过去曾是布哈林的得意门生和崇拜者，他在与布哈林对质时，竟说布哈林曾经给他一支左轮手枪，要他在斯大林可能路过的一条街道拐角打伏击，企图刺杀斯大林。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陷！

所有这些供述都被复制后送到每一个中央委员的手中……

布哈林几乎承受不了了。他回到家里，拿出伏罗希洛夫赠送给他的那把左轮手枪，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他觉得除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这种感情冲动经常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风暴终于来到了。12月初的一天，布哈林被召去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新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在会上猛烈指责布哈林，指控他阴谋组织并参与了刺杀基洛夫。

“胡说！”布哈林吼叫起来，他的神经再也控制不住了，无法忍受这荒唐的编造。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一言不发。斯大林走了过来，把烟斗点燃后说道：“不要急于做出结论，应当继续调查。”又说，“布哈林过去的功绩谁也不能抹杀！”说完就离开了会场。

为了抗议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布哈林开始绝食。

1937年2月，苏共中央委员召开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

问题，尤其要解决所谓“反党的绝食行动”。斯大林在会上指责布哈林：“尼古拉，你向谁绝食呀？向党中央吗？你看你成了什么样子，瘦得皮包骨头。”停了一会，他翘了翘胡子，说，“就为你的绝食行为，向全会道歉吧！”

布哈林回答：“如果你打算开除我的党籍，还有这个必要吗？”

斯大林说：“谁也没有开除你的党籍。”

布哈林是个轻信的人，他相信了斯大林所说的话，于是，他要求党原谅他的行为。会上还作了关于布哈林、李可夫问题和其他原反对派的“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报告，不少人发言谴责了这些“为法西斯效劳，受人雇用的凶手和破坏分子”，要他们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面对大家的声讨，布哈林作了表白：“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关于我自己的情况，我决不说谎。”

莫洛托夫指着他说：“如果你不交待，那就证明你是法西斯的走狗。因为这样敌人就会在自己的报纸上说我们的审讯是搞阴谋。我们要把你抓起来，到那时你就会交待了！”

布哈林以他自己和李可夫的名义宣读了一个声明，说关于他们俩的那些材料都是诬陷不实之词，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需要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调查清楚。可是孤掌难鸣，到会者一边倒地认为应该“逮捕、审判、枪决”他们。轮到斯大林表态时，他主张：“交给内务部门去处理。”

布哈林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捕，回到家里就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他在信中申述了自己的无辜，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并向来一代党的领导人发出呼吁：“你们的历史使命将包括这样一项义务：清除在这些吓人的日子里像越来越浓密的阴云，像燃烧着的熊熊烈火使党窒息的滔天罪行”。“在或许是我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确信，历史迟早必然会清除我头上的污秽！”

他估计被捕以后将会被抄家，就要求妻子一字不漏地背下来，然后把信烧掉。果然，几天以后，斯大林的秘书来通知要布哈林出席全体会议。他明白最后的时刻快要到了，他跪在妻子的面前，含着眼泪请求她宽恕自己毁了她的生活；请求她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一名布尔什维克；请求她不要忘了他遗书中的每一句话，为他以后平反昭雪竭尽全力。

妻子发了誓。他从地上站起来，吻抱了她，然后用颤抖的声音说：“不要抱怨，历史上常有可怕的错误，但真理总有一天会恢复的！”拉林娜悲痛地哭了。他们都明白，将要诀别了。布哈林穿上皮外套，戴上帽子，向门外走去。

布哈林终于被投进了监狱。被捕的头两个月，他一直拒绝交待“罪行”，也拒绝在那些早已为他准备好了的供词上签字。但是后来，内务部的人以斯大林的名义告诉他，只要他愿意承认他的“罪行”，他的妻子和儿子就可以平安无事，他自己也能保住性命。布哈林当然不会相信斯大林的许诺，但为了妻子和儿子，同时他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了，他终于被迫承认从1918年起就打算杀害列宁。

然而，两天以后，当布哈林看到经斯大林亲自审阅和修改的“审问笔录”时，他突然翻供，拒绝在上面签字。因为那上面写的是，很久以前布哈林就发现列宁与德国人相互勾结，便产生了刺杀列宁、成立有反对同德国人讲和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新政府的罪恶念头。这就是说，斯大林要把已经

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

这是一个更大的政治阴谋。布哈林当然是宁死也不能签字的。

后来，斯大林只好作出让步，在法庭上不提列宁勾结德国人之事，也不提布哈林为此产生的怀疑。但布哈林必须承认打算刺杀列宁，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而且参与过对高尔基和基洛夫的刺杀活动。这样一来，布哈林才在“笔录”上签字。

布哈林企图暗算斯大林的神话终于制造出来了，既然他承认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他准备逮捕的人中自然也就包括“列宁的亲密战友”斯大林，这还有什么可分辩的呢？

尽管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布哈林不顾审讯人员的威胁和恫吓，又改变了自己的供词，只泛泛地承认“对一切事情都要负政治上的责任”，在具体问题上却断然否认。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布哈林已经为他自己立好了十字架……

1937年6月，也就是布哈林被捕后的第四个月，拉林娜也被投入监狱，从此和刚满两岁的儿子分离了。以后的二十年，她是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在集中营和流放地度过的。

1956年，斯大林死了三年以后，在西伯利亚一个边远的小村子里，拉林娜与儿子尤里团聚了。在俄罗斯中部的孤儿院和教养院长大的尤里已经二十岁了，当他得知妈妈还活在世上时，便长途跋涉来寻找亲人。从1961年起，他们母子重新回到莫斯科定居，并开始申诉，要求为布哈林平反昭雪。

六十年代初，当时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曾把布哈林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也准备给布哈林等一批人恢复名誉。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牵涉到对斯大林的评价，事情就变得异常复杂，赫鲁晓夫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猛烈攻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亲自飞往莫斯科对平反的事进行干预。赫鲁晓夫不得已暂时将这事搁置下来。

虽然拉林娜母子的处境有所改善，但赫鲁晓夫没有能为布哈林平反，反倒由于这件事，成了他最终被赶下台的口实之一。此后，十多年里，拉林娜母子一直在为布哈林的平反问题奔走呼吁，却没有能得到解决，无数次申诉和请求都石沉大海。

尤里走投无路，只好向国际社会求援，在布哈林被处决周年纪念之际，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收到尤里寄来的一封信，请求他支持为布哈林恢复名誉而呼吁。尤里知道，长期以来，意共一直是坚持反斯大林立场的。

反应是积极的，6月16日意共《团结报》发表长篇声明，指出“要求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位杰出代表和三十年代审讯的其他受害者伸张正义，不仅涉及他们的历史功过问题，而且也是出于道德和政治上的需要。”不久，有十六个国家一百个知名人士应尤里的要求共同签署的呼吁书交到了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手里。

由于意大利共产党和英国罗素基金会的推动，为布哈林平反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运动。但是，当时的苏共中央仍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一拖再拖。直到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前不久，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重新研究30至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迫害材料委员会”。在一次纪念大会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正式肯定了布哈林在苏联十月革命中的功绩和他的历史地位，赞扬了他在反托洛茨基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主席团会议就这一案件作出了决议。指

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当时所承认的这些错误本身并不构成犯罪成份。很明显，当时一切诉讼和判决都是出于斯大林在党内树立自己无限的统治权的需要。因此，苏联最高法院主席团取消了五十多年前军事审判庭对布哈林等十人所作的判决，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6月21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党籍。10月20日，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撤销了1937年5月21日关于将布哈林开除出科学院的决定，恢复了他科学院院上的称号。

乌云终于驱散了，事实证明历史是最好的审判官。

（孙石夫）

暗杀希特勒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德国法西斯总头目希特勒，曾遭到过数十起暗杀，均被他侥幸逃脱。最惊心动魄的一幕，要数 1944 年 7 月 20 日“狼穴”大本营炸弹谋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 1944 年初夏，几乎每一个德国将领都不得不承认，战争失败了，在东线，苏联红军已经反攻到德国本土附近；在南线，英美部队已汗进了意大利首都罗马；在西线，美英部队已经作好在法国西海岸登陆的准备。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 37 岁的受过勋的军官施陶芬贝格伯爵，决心尽快结束这个已经失败的战争。因为他已认识到，这场战争给德国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灾难。在此之前，施陶芬贝格先后出战过波兰、法国和北非。1943 年 4 月，他在北非前线时，因车于压响了一颗地雷，使他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指头。他被送回德国，后来被安排在柏林陆军部办公厅当参谋长。这个职位，使他有可能经常见到希特勒。这时候，施陶芬贝格早已成了希特勒的坚定反对者。他以精辟的论点加入了密谋分子的行列。

施陶芬贝格决心利用“女武神”计划来接近希特勒。所谓“女武神”计划，是用来借口镇压千百万外国劳工暴动的。希特勒审阅计划报告后很是欣赏，于 1944 年 6 月 7 日，在元首山庄接见施陶芬贝格。这位独眼，独臂的上校通过这次接见，搞清了一点：在元首身边有随便活动的可能。

7 月 7 日，他再次去汇报工作。这一次，他的公文包里除了装着“女武神”计划外，还有一颗英国造的定时炸弹。但是他未让炸弹爆炸，因为他计划同时要炸死希特勒的左右手戈林和希姆莱，而这天这两个家伙偏偏不在场。

参与暗杀希特勒行动的，还有陆军军需司令瓦格纳将军、通讯处的费尔吉贝尔将军、参谋总部的林德曼将军和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长施蒂夫少将等人，他们为此已密谋多次了。

7 月 15 日，施陶芬贝格进行第二次暗杀尝试。希特勒在希特斯加登逗留了较长时间后，又回到了此时正在改建的“狼穴”大本营。他准备在那里接见“女武神”计划的设计人。施陶芬贝格这次也不是空手去的。当天上午，他在离“狼穴”7 公里远的拉斯滕堡机场降落，然后由元首大本营警卫司令的通讯官接进二号禁区。里面已在露天铺好了元首餐桌，于是他有机会看到了希特勒周围的设施和活动情况。

“狼穴”，始建于 1940 年 11 月，当局动用了几万人在那里施工了几年。这里的保安措施是极为严格的，但细心的施陶芬贝格仍发现了一些漏洞。

中午一点钟，希特勒准备接见后备军司令及其陪同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元首堡垒的入口处，他们和陆军元帅凯特尔聊了几句。军官们进去后，希特勒向他们挥手致意。这次军事会议时间很短，从一点十分开始到一点四十分结束。接着开其他会议。

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来出席这次会议，不过即使他今天在场，施陶芬贝格也无法进行这次谋杀。炸弹虽然放在他的公文包里，但是他没有机会夹破引起爆炸的酸液信管。这事至少需要 10 分钟。在会议室，在希特勒眼皮底下，他没法这样做。就这样，他的第二次尝试又失败了。这位连连失败的刺客却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他还有 7 月 20 日一次见希特勒的机会。

7月17日,施陶芬贝格获得一个情报:密谋分子之一的格德勒即将被捕。他们预料,生性夸夸其谈的格德勒万一被盖世太保拘留,万一希姆莱的打手们撬开了他的嘴巴,那么其他人只得全部逃跑,整个谋杀计划也将全部失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施陶芬贝格7月20日必须在“狼穴”不惜任何代价采取行动。

7月19日晚上,施陶芬贝格派他的不知密谋计划的司机卡尔,去波茨坦兰肯中校处,取回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这颗炸弹平时就放在那里。

与此同时,近30名密谋军官在开最后一次会议。大家都知道炸弹明天爆炸。会后,施陶芬贝格由司机卡尔送回家。在此期间,内装炸弹的5磅重的公文包已经取回放在他的卧室隔壁。

7月20日早晨6点刚过,他就动身去朗斯多夫机场,和施蒂夫将军及其副官黑夫滕中尉会面,然后一起飞往拉斯滕堡。黑夫滕中尉是行刺助手。10点50分,三人抵达拉斯滕堡。同谋者陆军军需司令瓦格纳将军已提供飞机,作好中午飞回的准备。

元首大本营派来的一辆汽车,带着这三位军官进入禁区。他们先到军官食堂用餐。他们和通讯处的费尔吉贝尔将军的谈话也很自然。一旦谋杀成功,他将把消息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并切断这里同外界的一切联系。

希特勒还在睡觉。陆军元帅凯特尔告诉施陶芬贝格,由于墨索里尼将在同一天来访,会议要推迟半小时,到12点30分左右开始:另外,由于天气闷热,会议改在地面上的“施佩尔营房”举行。

会议快要开始时,施陶芬贝格向凯特尔的副官打听厕所在哪里。黑夫滕早已带着那只公文包在那儿等他。由于厕所里经常有人进进出出,所以他无法在这里启动起爆装置。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施陶芬贝格急中生智,问这位副官他可以在什么地方换一件衬衣。这位副官把他带进一间舒适的卧室。施陶芬贝格在里面用镊子匆匆忙忙夹破了酸液信管。

他还没来得及启动另一颗备用炸弹,这时,一名上士开门进来,请上校快些换衣服。他急忙把炸弹放进公文包,这位上士肯定看到了施陶芬贝格慌忙藏什么东西。炸弹爆炸后,他回忆起了这件事,但是他当时没有怀疑的时间。

这时,凯特尔的副官在走廊上喊道:“施陶芬贝格伯爵,请快一些,元首正等着!”他甚至还想替这个独臂人拿这个沉重的公文包。他们并排走向会议室,边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保卫希特勒安全的卫兵们非但没有检查公文包,反而向他们立正敬礼。

凯特尔元帅不耐烦地在走廊门口等他。会议已经开始了。凯特尔走在这位上校的前面,他们经过电话总机室进入会议室。由于中午暑气逼人,室内的十扇窗户都敞开着。与会者围坐在一张橡木桌子旁。桌面特别厚,两头用同样厚的底座支撑着。希特勒一人背朝门,坐在桌子中央。地图上放着一副眼镜,他一边玩弄着放大镜,一边听他身边的豪辛格将军汇报东线局势。

当施陶芬贝格踏进会议室时,希特勒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并回答了他的问候。施陶芬贝格在豪辛格身旁就坐,把棕色的公文包放在桌子底下,并尽量把它推向希特勒一边。公文包就在桌腿旁,离希特勒只有两米。

时针指着12点37分,离爆炸还有5分钟。施陶芬贝格趁大家专心致志听报告时,悄悄地离开了会议室。他经过长长的走廊,走出这座建筑物。豪辛格是反希特勒密谋圈的边缘人物,但是他不了解这一谋杀计划的全部细

节。他的副官俯身到桌面上来，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地图，但是那只棕色的公文包碍事，他想用脚把它踢到旁边去，没踢动，他就用手把它放到了桌子底座的另一边。

军官们的反叛只有两个前提得到满足才能成功：一是杀死希特勒；二是立即在柏林采取武装夺权行动。施陶芬贝格在整个行动中既是“导演”又是“主演”，这里离不开他，柏林也需要他指挥。他在启动炸弹时就已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他没有其他选择了。他认为，冒险的谋杀总比不进行谋杀好，否则，德国人民和世界大部分国家，将会继续蒙受难以想象的灾难。

12点41分，希特勒正伏在地图上，豪辛格将军已经讲到贝帕斯湖周围的军事形势。这时，施陶芬贝格正在向他的停在8—13号房的汽车走去。他的勤务官和费尔吉贝尔将军已等在那里。

12点44分，炸弹骤然震耳欲聋地爆炸了！刺眼的黄色烟雾冲天而起，会议室共有24人，都被气浪掀翻在地。爆炸过后，人们企图爬起来向外逃窜。几乎所有的人耳朵都被震聋，其中很多人的耳膜被震破，裤子被炸成碎片，头发被烧焦。凯特尔陆军元帅把希特勒拉到外面。此时的施陶芬贝格心想，会议室里不会有人幸免了，于是钻进汽车企图立即脱离禁区。

和所有在现场的人一样，希特勒对这次爆炸只感到一股地狱般的耀眼烈火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他的脸被烟雾熏黑，后脑的头发略微被烧焦。当他从浓烟滚滚的瓦砾堆中站起时，凯特尔正喊着：“元首在哪里？”他急速向希特勒走去，把他扶出了会议室。

希特勒的裤子已被撕成碎片，浑身上下都是灰上，然而却几乎没有受伤。他的右胳膊有轻微淤血，左手掌有几处擦伤，双耳膜虽然被震破，但只是短时期失去听觉，受伤最严重的是两腿，大量木头碎碴刺进了肉里。

爆炸时正在会议室的24人，只有4人受重伤。希特勒本人恰恰受到了这张沉重的厚桌面的保护，爆炸时他正伏在桌面上。他很激动，但又很快令人奇怪地平静下来了。后来，他对周围的人说，他早已意识到有密谋在进行之中，现在他终于可以揭露这些叛逆了。他到处让人看他的破裤子和背后有一个洞的破上衣，就像显示什么奖品似的。

一切都仍处在极大的混乱之中，会议室已被炸毁，房顶倒塌，墙皮剥落，窗框炸飞，破椅散乱，像一块盾牌一样保护希特勒的桌面被炸成两半，施陶芬贝格放公文包的地板上，有一个直径半米的弹坑。

再说施陶芬贝格顺利地通过了一号禁区的西南出口。那里的卫兵肯定听到了爆炸声，本应加以阻挡，但是这位上校推说有元首的命令，站在横木旁的卫兵就让他通过了。施陶芬贝格的汽车向南部检查哨飞驰而去。这里已经拉响警报，设置了路障，不许车辆通行。施陶芬贝格下车，走进哨所给元首禁区里打电话。接电话的骑兵上尉命令哨兵放行。按规定，施陶芬贝格是逃不出去的，因为，发生了爆炸事件，即使他借口有公务。卫兵也不应放行的。但一切都是那么凑巧，他逃出去了。

施陶芬贝格来到机场后，那架He—111型飞机立即起飞，而此时，“狼穴”还无人想到他，希特勒还未下达立即逮捕这位伯爵的命令。等到逮捕令下达，施陶芬贝格早已逃之夭夭了。双方的通讯联络都有困难。柏林班德勒大街的密谋分子后来获悉。谋杀已经进行，但是希特勒还活着。

柏林谣传纷纷，谁也不知道确切消息。施陶芬贝格在这里的同谋者像瘫痪了一样，白白丧失了很多无可挽回的时间。而施陶芬贝格将在空中飞行三

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无法和同谋们联络。当飞机在伦格斯道夫机场降落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会受到同谋者欢迎呢，还是被希姆莱的秘密警察逮捕？他估计着两种可能，走下飞机。使他感到惊奇的是，机场上竟空无一人。

这位上校始终认为希特勒已死。现在是下午3点45分。他终于和柏林班德勒大街的密谋者们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施陶芬贝格要求他立即行动。他的精力和决心再大，也不能挽回这几个小时的时间。一切都还未做。在柏林，还未做好占领广播电台和盖世太保总部的准备。他们也没有去逮捕柏林大区党部书记戈培尔，尽管警察局长黑尔多夫伯爵早已深深陷入密谋集团之中，并急待做些工作。

4点钟左右，密谋者之一、柏林驻军司令冯·哈泽将军，终于下令出兵占领政府驻地。他派前希特勒青年团首领雷默尔少校率领“大德意志”警卫营出发。但是，深孚众望的维茨勒本元帅却根本不适应密谋活动，他耽误了几个小时，徘徊观望，虽然他曾全副武装出现在政变现场，但已经迟了，最终被盖世太保逮捕。

在“狼穴”也是一团糟。希特勒的武将们非但没有采取行动，反而在互相指责。海军上将邓尼茨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和空军的无能；戈林元帅称外长里宾特洛甫是外交上的低能儿……希特勒听着，默默地吞服着各种药片，然后突然跳起来大发雷霆，扬言要把这些罪犯的老婆孩子统统斩尽杀绝。

这时候，在柏林，班德勒街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办公室里，政变军官们的马拉松会议还没结束。有人报告施陶芬贝格已到达院内，大家才看出一丝希望。

这位从“狼穴”归来的刺客显得很轻松、兴奋和如释重负。他安慰同谋们说：“按正常情况判断，希特勒必死无疑。”五分钟后，班德勒街的所有进出口都已被封锁，只有持施陶芬贝格亲自签发的桔黄色通行证的人方可进出这座建筑物。

5点30分，密谋分子向武装部队各部发了一份由陆军元帅维茨勒本签署的电报：“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去世……在这一危急关头，帝国政府决定实行军事管制，以维护法制，并委托我以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

施陶芬贝格要求也曾加入密谋行列的弗罗姆上将公开加入叛乱。这位后备军司令回答说：“我已经和凯特尔通过电话，希特勒没有死。”施陶芬贝格说：“凯特尔在撒谎！”弗罗姆这位骑墙派一改往日的态度，说：“施陶芬贝格伯爵，行刺已经失败了。你立即自杀吧。”

这时，奥尔布里希特也敦促弗罗姆上将立即行动起来。但是这个善于耍两面派的家伙却宣布逮捕在场的军官。弗罗姆和奥尔布里希特扭打起来，上将占了上风。施陶芬贝格上去拉架时挨了一耳光，他不得不拔出手枪，弗罗姆被制服，卸下枪后被带到办公室旁边一间房子里。这时，城防部队司令哈泽将军指挥的部队，已取得了节节胜利。他们的部下雷默尔少校，已开始封锁政府大楼，用冲锋枪和机关枪装备的部队，已出现在总理府周围，并在继续向政府各部进发。雷默尔和施陶芬贝格一样，也是一个武功赫赫的军官，在前线作战时曾多次负伤。但是，两人在出身、教育、智慧和道德观念上却绝然不同。雷默尔少校习惯于执行命令，不提任何问题。他英勇无畏，处在骁勇和没头脑之间。

雷默尔忠实地追随希特勒，但是，“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这句话铭

刻在他的心里。雷默尔一会儿听说希特勒遇刺了，一会儿又接到去宣传部逮捕戈培尔的命令，临走前他对副官说：“现在是要我的脑袋了。”

戈培尔的宣传部里一片混乱。戈培尔知道，波茨坦和其他邦的驻军部队正在向首都挺进，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已经开始。当雷默尔前来逮捕他时，他就开门见山他说：“少校，你要好好想想对元首的效忠宣誓。”雷默尔说：“可是元首已经死了。”戈培尔反驳说：“元首还健在，几分钟之前我还和他通过电话。”

雷默尔又说：只有他亲自听到希特勒的说话声，他才会相信。戈培尔奸笑着拍拍雷默尔肩膀说：“你要注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注意已经落在你肩上的历史重任。”戈培尔又说，命运很少为一个人提供这样的良机，利用它或抛开它，现在就看你自己了。

戈培尔见雷默尔还有些犹豫，就使出最后的绝招。他说：“我现在要同元首通话，你也可以在电话上同他谈谈。元首会给你下达命令的，这样不就撤消了你的将军下的命令了吗？”戈培尔说着，叫通了拉斯腾堡的电话，宣传部的电话总机有一条直通元首大本营的专线。不一会儿，希特勒接了电话。戈培尔把情况稍作介绍后，就把听筒交给了雷默尔。雷默尔立即听出这是传说已经死去的元首的声音，他不由马上“叭”地一个立正，不断地重复说：“是，我的元首……是！”

随后，戈培尔接过听筒，希特勒把谈话的结果告诉了他：雷默尔少校已接替哈泽少将，军衔升为上校，雷默尔将服从戈培尔的一切指示，执行将在柏林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就是这条唯一而保全的电话线，导致了起事的最终失败。

雷默尔上校开始着手镇压将军们的暴动。他首先撤回了警卫营。雷默尔手下有八个人握着冲锋枪和手榴弹，闯进了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这位将军企图阻挡，这时施陶芬贝格走进房间，这些军官立即向他打了一排子弹，施陶芬贝格受了伤，急忙退到旁边一间房间。后来他和贝克、奥尔布里希特等密谋分子，一起被拉到已被反政变分子救出的弗罗姆上将面前。

弗罗姆上将这个两面派，以自封的临时军事法庭庭长身份。告诉密谋分子们，每人可以给家属写一封简短遗嘱书。五分钟后，他即宣布：判处总参谋部的默茨上校、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施陶芬贝格上校和黑夫滕中尉死刑。弗罗姆以前的上级贝克上将掏枪自杀未遂，一名上士在他后脑勺补了一枪。

处决是在班德勒街的院子里进行的。施陶芬贝格临刑前高呼祖国万岁口号。零点过后，雷茨也被处决。弗罗姆上将站在大楼阴影之中，作了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三呼胜利万岁后，他离开凄楚的现场，回到办公室，拟了个电报给希特勒，电报说：“不负责任的将军们的叛乱已被平息，全部首领已遭枪决。”

弗罗姆接着去戈培尔处邀功，戈培尔将他逮捕。这个骑墙的两面派并没受到什么优待，1945年3月他也被枪决了。

希特勒声嘶力竭地发表了广播讲话。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数以千计的人包括元帅和将军被逮捕，受尽酷刑后被处决。施陶芬贝格等人的尸体被挖出焚烧成灰，撒进了田野。他的一家上自85岁的堂伯父下至3岁儿童，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其他几个主要密谋分子也被“株连九族”。

丧心病狂的独夫民贼希特勒并没能挽救自己的灭亡。就在这次谋杀事件过后不久的第二年，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美英法盟军也向莱茵河挺进，希特

勒全军覆没，他躲在柏林的地下工事里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贺文希）

总统即将遇刺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故事。

法国保安部年轻有力的巴里·格尔德中校，应邀来到梅朗将军的办公室里。将军把一份电报递给格尔德，上面写的是：“母患癌症，见电速归。”

梅朗将军告诉格尔德，发电报的人名叫阿克迪，现在葡萄牙，是一个有经验的间谍，曾经搞到不少很有价值的情报。按照规定，阿克迪总是把情报交给里斯本红玫瑰地下餐厅老板亚丁，由亚丁转送到法国保安部。这一次，阿克迪却用暗语直接向法国联络点发出联络电报，说明有非常紧急的重要情报；而且，很可能，他的行动已经受到监视，已不便与亚丁联系。

格尔德明白了将军的意思，爽直地说：“我去取回情报。”

将军赞许地点了点头，同时警告他说：“你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就是阿克迪已经被敌人控制，设下圈套引诱我们上钩。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你很可能要冒牺牲的危险！”

“请相信我！”格尔德向将军保证道，“为了祖国的安全，我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将军赞许地握住他的手，说：“祝你一路顺风！”

格尔德顺利地到达了里斯本。他慎重行事，没有直接去找阿克迪，而是先同红玫瑰地下餐厅经理亚丁取得了联系。

亚丁证实说，阿克迪已经有一段时间没露面了。而且，过去亚丁同阿克迪联系，都是由阿克迪指定时间、地点，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亚丁才可以打一个电话，给阿克迪的女朋友克莉纳，接头的暗语是：“先生，您订的法国菜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送去？”克莉纳的回复是：“现在用不着了，我会有钱给你的。”克莉纳会把亚丁的要求再转给阿克迪。

亚丁没有见过克莉纳，他也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

离开红玫瑰餐厅，格尔德找了一个僻静的街头电话亭，拨通了亚丁告诉他的电话。果然，话筒里响起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格尔德说出了接头暗语：“先生，你订的法国菜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送去？”

年轻姑娘回答：“现在用不着了，我会付钱给你的。”

格尔德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挂断电话。年轻姑娘顿了一下，又说：“他病了。”

格尔德忙问：“什么病？”

姑娘回答：“感冒。”

格尔德又问：“您怎么样？”

姑娘回答：“谢谢你的关心，我很好。”

格尔德紧张地思索着，不管阿克迪出了什么事，他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于是他表示要来看望阿克迪。姑娘似乎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出一个地址。

格尔德化装成一个修暖气管道的人，穿一身脏工作服，满脸胡子，一头乱发，驼着腰背，看上去有50岁了。他拉响了门铃。门一打开，他就立刻走进房里，然后才仔细审视着面前的姑娘，说：“好像没有见过您？阿克迪呢？”

姑娘却很警觉，查看了格尔德的证件之后，才告诉他，阿克迪有急事去非洲了，临走时让她把一本书交给来接头的人。格尔德接过书就走了。

然而，格尔德并没有离开里斯本。他仔细地回忆着这次接头的经过，觉

得其中漏洞太多。他对这个克莉纳毫不了解，但是他注意到，克莉纳的右手有长期使用手枪的痕迹；而且，这个克莉纳太像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人员，可是阿克迪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一点。在没有弄清克莉纳的身份之前，他无法相信克莉纳交给他的情报。

第二天一早，格尔德悄悄地钻进了克莉纳的小轿车，当克莉纳驾车外出时，格尔德抓住了她，逼着她把轿车开进了路边的树林。克莉纳对格尔德的举动十分愤怒，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格尔德决定把克莉纳带回法国去。他的助手弗恩代尔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去法国的国际列车的车票，他顺利地押着克莉纳进了预定的包厢。国际列车开动了。格尔德让克莉纳在床铺上休息，自己坐在沙发上监视着她。

半夜，格尔德忽然听到包厢的门有响动，他刚刚拔出手枪，门已被弄开了，五条大汉冲了进来，五支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他。克莉纳高兴地叫起来：“开索，干得太好啦！”

被叫作开索的大汉不理她，让人把格尔德捆起来：又去捆克莉纳。克莉纳大吃一惊，说：“开索，你昏了！连我都不认识了！”开索冷笑道：“你既然肯跟他一起去法国，这就是叛徒！对叛徒我们决不手软！”他们取出准备好的大布袋，把两个俘虏装了进去。接着，他们拉开了车窗，准备把装着俘虏的布袋扔下车去。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格尔德的助手弗恩代尔赶到，在一场混战中，开索受了伤，领着他的部下匆匆退走了。

弗恩代尔放出了格尔德和克莉纳。克莉纳这才承认，自己是一个恐怖组织的成员，真名叫拉齐雅。阿克迪和克莉纳均已被害。恐怖组织头目艾伦发现阿克迪曾经拍过电报给法国保安部，才安排拉齐雅冒名顶替，想用一份假情报把法国保安部的人哄回去。

格尔德敏锐地感觉到其中还有问题，他问拉齐雅：“他们这样做，一定是为了掩盖一件真实的阴谋。他们打算干什么呢？”

拉齐雅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格尔德没有再追问。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返回法国。开索一伙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不能再乘这趟国际列车。这时列车已接近加贝托尔车站。正在减速。格尔德抓住时机，和弗恩代尔领着拉齐雅跳下了火车。三个人在漆黑的道路上猛跑了一阵，直到遇上一辆顺路的卡车，把他们带往巴特勒。可是半路上，开索的部下乘一辆小轿车追了上来。格尔德和弗恩代尔出其不意发动袭击。击毙了追踪者，夺得了小轿车，一直开到附近的港口代尔津，雇下了一艘叫菲尔号的快艇。小艇乘风破浪，眼看法国海岸已经在望了，这时天空传来一阵马达声。弗恩代尔扑到窗前，发现是一架国籍不明的直升飞机，在快艇上空盘旋。

格尔德抓起一枝冲锋枪，冲到了舷梯上。直升飞机上的机枪立刻向他猛烈地扫射。格尔德一边闪避，一边用冲锋枪还击。直升飞机好像中了弹，干脆把一串串的炸弹向船上扔下来。格尔德被爆炸的气浪从舷梯上冲下来，他顾不得伤痛，在最后的瞬间猛地抱住拉齐雅，奋力跃进海中。几乎就在同时，“轰”的一声快艇被炸成了碎块。弗恩代尔被炸飞了。格尔德和拉齐雅也被震昏了。

幸亏这场爆炸引起了法国海军的注意。格尔德和拉齐雅得救了。拉齐雅被格尔德在危急关头舍身相救的行为感动了。她一苏醒过来，就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格尔德，我告诉你，他们要杀科里希亚总统！”

这个消息立刻报到了梅朗将军那里。整个法国保安部都紧张地行动起来了。原来，科里希亚是一个靠近赤道线的非洲国家，过去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在科里希亚人民的英勇斗争下，终于取得了独立。法国政府表示，愿意同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科里希亚总统西蒙·马斯丁是第一次到法国来进行友好访问。如果他在法国惨遭杀害，不仅将严重破坏法国和科里希亚的关系，而且将破坏法国同其它原殖民地国家的友好关系，并影响到法国的国际声誉！

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还是比较容易的事；平安地度过危机，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而且，时间又实在太急促了，离西蒙马斯丁总统到达巴黎的日子，已经只剩下短短的两天！

谁也没办法在两天内把巴黎城清查一遍。

梅朗将军仍然不失幽默风度，他同格尔德开玩笑说：“也许，我们该把西蒙·马斯丁总统放在防弹玻璃罩里吧？”

格尔德说：“这次暗杀行动的总指挥是艾伦，一切都是她在亲自部署。拉齐雅是她的秘书，也不清楚具体的行动方案。阿克迪也许知道得多一些，可惜他死了，他的情报没能送出来。”

梅朗将军说：“是啊，事情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只靠消极的防卫是不行的，我们应该主动出击，把艾伦派来的杀手控制住！”

格尔德认真地说：“拉齐雅很愿意帮助我们。她虽然不知道究竟谁是具体实施暗杀计划的人，但她把文伦手下几员干将的情况都说了。我们已经发现，其中一个叫瓦琳纳的女人，在巴黎露了面。我们的人已经在严密地监视她。”

两天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今天已经是西蒙·马斯丁总统来访的日子。清晨四点半钟，一夜未睡的格尔德，请来了睡眼蒙眬的拉齐雅，取出几张照片给她看，第一张正是瓦琳纳，艾伦眼中的大红人，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角色。另两张照片上的男人，拉齐雅都不认识，也就是说，他们是瓦琳纳为了这次行动专门收买雇佣的人。格尔德告诉拉齐雅，这张照片上风度翩翩的中年人，是法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名叫克里沃，直接负责西蒙·马斯丁总统的接待工作。如果由他动手，机会是很多的，但据他们了解，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器。而那个相貌凶恶的叫巴特雷，是个职业刺客，早已为法国警方所熟悉。格尔德估计，瓦琳纳是想通过克里沃掌握西蒙·马斯丁总统的行动时间表，然后指使巴特雷行刺。关键的问题是，巴特雷会选择什么地点下手。

拉齐雅知道这些照片肯定都是偷拍来的，她对法国保安人员的工作效率十分佩服。但她猜不透瓦琳纳会叫巴特雷怎样下手。她只是觉得，仅仅做这两手安排，似乎太简单了些，不像瓦琳纳一贯的狡猾作风；很可能这两个人都是瓦琳纳有意暴露的幌子，目的是掩盖真正的杀手行动。

格尔德不禁陷入了沉思。后来他问拉齐雅，艾伦手下会不会还有别的身份更为隐秘的爪牙？

拉齐雅沉重地摇了摇头。

清晨六点半钟，克里沃从瓦琳纳所住的宾馆中出来，驾车前往外交部。现在离西蒙·马斯丁总统专机抵达的时间，只剩五个小时了。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呢。到了外交部的停车场，他刚打开车门，便看见两个穿着西服的青年走了过来，问：“是克里沃先生吗？我们是保安部的，格尔德中校请你去一趟。”

克里沃有礼貌地回答：“对不起，我今天很忙。”

青年人同样有礼貌地告诉他：“对不起，中校已经同外交部联系过了。”
克里沃只得重新上车，同两个青年一起到了保安部。

格尔德看着克里沃苍白的脸，说：“克里沃先生，请您谈谈瓦琳纳女士的情况。”

克里沃的心怦怦直跳，嘴上却强硬地回答：“我不了解她，十分遗憾！”

这时，一位上尉进来报告：“中校，克里沃的汽车检查过了，没有……”

格尔德微笑着说：“也许，克里沃先生的身上会有我们感兴趣的東西。”

中尉开始搜查克里沃，把每一件物品都掏出来放在桌上，可是没有一件是值得怀疑的。克里沃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冷冷地说：“我要控告你们！”

这时，站在一边的拉齐雅突然走了过来，一把抓住克里沃的手腕，摘下他的手表，贴近耳边听了听，交给了格尔德。格尔德一看就明白了，他微笑着说：“这是一枚烈性定时炸弹。而且，它在炸死西蒙·马斯丁总统的同时，也一定会炸死你。你对此做什么解释呢？”

克里沃大吃一惊，他再也没想到瓦琳纳的心肠竟如此狠毒，用这种杀人凶器作为送给他的“礼物”！他的头上渗出了汗珠，无力地瘫在了椅子上。

一位中尉急匆匆地跑进来，附在格尔德耳边报告：“巴特雷失踪了。”

格尔德不动声色地对克里沃说：“你先好好想想吧，我想你一定会回忆起许多有趣的细节的。”然后；他赶紧带人赶往瓦琳纳的住处。

只有瓦琳纳才会知道巴特雷的去向。

八点四十五分，格尔德敲响了瓦琳纳住房的门。

瓦琳纳一听到敲门声，便预感到出了意外。她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悄悄退进了卫生间。宾馆服务员用钥匙打开了门，几位保安部军官一拥而进。瓦琳纳抬手一枪，打中了一名军官。几乎在同时，格尔德的子弹也击中了她的手腕。手枪从她的手中掉了下来。冰凉的手铐立刻铐住了她的双手。

格尔德严厉地看着她，说：“你还有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巴特雷在哪儿？”

瓦琳纳连声冷笑，说：“在科里西亚总统身边！”

一长串小轿车开进了科里西亚总统下榻的宾馆。为贵宾接风的国宴刚刚结束，时间已经是午夜了。宾馆内外，彩灯齐明，闪烁着迷人的色彩。

然而，陪同贵宾的官员，特别是保安部的人，心弦都越绷越紧。巴特雷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这决不是一件好事。

梅朗将军和格尔德都明白，仅仅抓住克里沃和瓦琳纳，是不足以使艾伦一伙的暗杀行动停止的。不但巴特雷随时会打出致命的一枪，将这一片灯红酒绿的欢乐聚会变成生死场，而且还一定会有别的杀手存在。西蒙·马斯丁总统的生命，法国的国家荣誉仍然处在危机之中。

当然，西蒙·马斯丁总统并不知道这一切。或者说，他并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他相信法国保安力量会负起保卫来访贵宾的责任。

宾馆服务员拉开了车门。西蒙·马斯丁总统从车中走出来。他长着一头浓密的褐发，粗眉毛下是一双坚韧不拔而又机敏的眼睛。虽然上了年纪，他的精神仍然很好，谈笑风生，而且一点不摆总统架子。

西蒙·马斯丁总统放慢了脚步，呼吸着寒冷而清新的空气，用法语说：“嗨，这空气都像结了冰。虽然上帝创造了一块块绿洲，但却赋予了它们如此不同的气候。”

陪同的法国官员说：“总统先生，也许您不太适应这寒冷的气候吧？”

西蒙·马斯丁总统摇了摇头，说：“不，人是世界上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不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都能设法生存下去。爱斯基摩人住在雪窝里，而我们却在赤道的边缘，大家生活得很好。我不喜欢寒冷，就像我不喜欢战争一样，但我并不怕！”

像几乎所有的大人物都显得很自信一样，科里西亚总统也流露着那种自信的神情。

总统走进了宾馆的大厅。几个经过特许的记者拥过来给他拍照，闪光灯令人眼花缭乱。场面虽然不大，但是相当热闹。

谁也没有想到，杀手巴特雷正守候在宾馆里。他是由瓦琳纳通过不少关系网，才安排在这儿的。可以说，将巴特雷埋伏在这儿，是瓦琳纳这次暗杀行动的关键，所以她不惜重金，收买了许多人才达到目的。

巴特雷此刻站在走廊一侧的一尊巨大铜塑像后面，既能看清大厅里的一切，又不易引起别人注意。他穿了一套白色的服务员服装，脸上经过精心的化妆，还戴上一个黑色的假发套，乍看上去完全是一个粗笨的服务员。在宾馆里，像这样的服务员是不会派去直接为总统服务的，但他在一旁看看热闹，是十分正常的，谁不想看一看外国总统呢？就算保安人员发现他，也不会产生怀疑。

瓦琳纳为巴特雷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他自己又反复察看了现场和逃走的路线，觉得这计划是万无一失的。尽管如此，他仍然有些不安。在这么多人的前呼后拥下，杀死一个总统也许还是可能的，但再想安全逃脱，那简直比登天还难！他可不想在这里断送了性命，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大富翁了。为了这个暗杀行动，瓦琳纳答应付给他五十万美元，并且已经预付了三十万。巴特雷不会蠢到背着三十万美元钞票四处潜逃的程度，他去买了一粒珍贵的钻石。钻石虽然放在贴身的内衣袋里，他却仿佛时刻能看见它晶莹夺目的光彩。

但是，如果他现在不掏出枪来，干掉这个总统，他不仅必须交回这些钱，而且很可能还会搭上一条命。瓦琳纳这个女人，是不会喜欢别人同她开玩笑的。巴特雷没有别的路可走，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去想高兴的事情。他的枪法毫无问题，只要食指一扣动扳机，一切就都解决了。瓦琳纳还告诉过他，当西蒙·马斯丁总统走进大厅时，大厅里会发生爆炸，他完全可以利用那个混乱时机干掉总统，并安全逃走。

然而爆炸却没有发生。

巴特雷当然不会知道，携带着炸弹的克里沃早已进了保安部的牢房。他只是觉得，暗杀的时机正在逝去。西蒙·马斯丁总统已经走上了楼梯。他一边走，一边兴致勃勃地说话，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楼梯上。这也许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巴特雷果断地拔出枪，向总统瞄准……就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握枪的手震颤了一下，剧烈的疼痛使他的手松开了。枪掉了下去，“当”的一声，打在铜像的底座上。与此同时，几条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抓住了他，堵住了他的嘴，将他死死地压倒在地上。

西蒙·马斯丁总统敏捷地回过了头。大厅里非常平静。总统看见身穿军服的格尔德中校背靠铜像站着，脸上带着微笑。总统也朝他笑了一笑，继续走上楼去。

格尔德长长地吁出一口气——从总统的神色上看，也许他什么都没有发

觉。这可太好了，太好了！

格尔德事先并没料到巴特雷会隐藏在这里。安排科里西亚总统居住的宾馆，当然进行过彻底的检查；每一个可能接近总统的人，都受到过严格的审查，真不知道巴特雷是怎样混进来的。格尔德是在总统进入大厅的刹那间发现巴特雷的，当摄影记者的闪光灯弧光闪烁的时候，格尔德觉得那铜像的阴影好像晃动了一下。责任心使他高度警觉，立即带人来检查这个地方——他来得正是时候！

接下来的几天，西蒙·马斯丁总统在法国各地访问，没发生任何意外。一切事态都表明，艾伦的计划已经破产，法国的危机已经度过。

但是，格尔德不相信事情会这样顺利。梅朗将军也不相信。拉齐雅更不相信艾伦会就此罢手。

在科里西亚总统的专机平安离开机场前，他们决不能掉以轻心。他们懂得，当祖国面临危机的时刻，一个战士该怎样做。

西蒙·马斯丁总统将在机场举行一个小范围的记者招待会。应邀出席的记者，都经过了严格的身份审查。但是，会不会在这些记者身上出问题呢？

格尔德决定对进入会场的每个记者，都要进行检查。一辆辆小轿车驶进了机场，西蒙·马斯丁总统进入了贵宾候机室，这里临时作为记者招待会的会场。经过检查的各国记者也陆续到来。下一位是巴黎《每日晨报》国际专栏记者斐丽文，一个年轻有为的漂亮女人。但是格尔德并没有放松对她的检查，她随身携带的物品很简单，而且绝对没有问题。斐丽文正打算离开，格尔德又拉住了她，说：“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看看你的照相机。”

斐丽文皱起了眉头，说：“中校先生，已经装好胶卷了！”

格尔德说：“我会小心的。”他抓住那只有—英尺长的镜头朝里看着，突然紧张起来，轻轻拧下了照相机上的长镜头，指着里面一个长圆形的黑色金属块，问：“小姐，这是什么？”

斐丽文仔细看了看，摇了摇头。这架照相机是她的男朋友为她准备好的。她根本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她也不认识这种黑不溜秋的玩艺儿。

格尔德冷冷地说：“小姐，这是一枚威力强大的定向炸弹。

在您拍照的时候，它就会爆炸……”

斐丽文惊叫一声，猛地坐到了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是他！一定是他！上帝——中校先生，我什么也不知道！”

格尔德镇静地问：“他是谁？”

斐丽文回答：“希格生。”

格尔德又问：“他的住址、职业？”

斐丽文机械地回答：“他住在共和国大街三百六十二号，十六层，九室。他是西班牙一家《时代》周刊的记者。”

格尔德点了点头，吩咐他的部下：“去‘请’希格生先生。”

斐丽文迟疑地问：“中校先生，我现在可以去采访了吧？”

格尔德微笑着回答，“对不起，小姐，您的这次采访也许应该取消了吧？”记者招待会顺利结束。

西蒙，马斯丁总统地登上了总统专机。他站在舱门口向法国朋友挥手致意。送行的法国政府官员也向他频频招手。

总统进了机舱，机舱门关上了。飞机沿着长长的跑道飞跑。渐渐离开了地面，升到了空中。格尔德长长地吐了口气，啊，现在，危机总算完全过去

了！

（薛公旦）

血战山海关

明代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宣告了明王朝的灭亡。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已经胜利。一方面，明王朝的大批武装力量，并没有被消灭，尤其是明朝勇将吴三桂，领着数万精兵，正在离北京近在咫尺的丰润，伺机而动。另一方面，已在东北兴起多年的清王朝，由摄政王多尔袞率领大军十四万，正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乘虚而入。

这三股力量都面临着存亡兴衰的严峻局面。

当时，最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局面的，是吴三桂。吴三桂是辽东人，他的父亲吴襄、舅父祖大寿等，都是明王朝的大将。由于吴氏家族世代镇守辽东，在为明王朝抵抗东北新兴的清王朝的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劳，实际上成为明王朝的一根重要支柱。吴三桂自幼就练出一身好武艺，少年时就领兵上阵，与清兵作生死搏杀，以勇猛善战闻名于天下，28 岁时就当上了明王朝的团练总兵。在明王朝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全仗吴三桂固守宁远城，才挡住了清军入山海关南侵的步伐。而他的父亲吴襄，更被崇祯皇帝委以北京最高军事指挥官的重任。清军对吴三桂是既畏惧又尊敬，清王朝领袖多次感慨地说：“如果我手下有吴三桂这样的将领，取得天下还不是易如反掌么！”可是，由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逼北京，崇祯皇帝不得不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退入山海关，保卫北京。吴三桂在退军之前，还考虑到当地人民的处境，动员他们随军撤迟入山海关内，结果有 50 万老百姓情愿跟随吴三桂行动。吴三桂一边部署精锐部队阻止清军的追击，一边沿途安置老百姓，直到三月二十日才抵达丰润。这时恶耗传来，说北京已在头一天失守，崇祯皇帝自杀了！吴三桂此时不了解敌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便暂时在丰润驻扎下来。但他清楚地知道，丰润不是久留之地。一方面，李自成起义军不会容忍他在这里威胁北京的安全，另一方面，他多年的对手清朝，已经进逼长城一线。吴三桂如处理不当，便会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中。

再说东北的清王朝，自从明代中期逐渐强盛起来，就不再安于偏处边疆的地位，多次试图进入中原，取明王朝而代之。清朝政府始终把明王朝作为主要对手，甚至曾打算同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联合，共同推翻明王朝。这个计划没能实现。眼看李自成起义军攻破了北京，天下大乱，清王朝君臣自然不肯放过这个好机会，决定乘虚而入，混水摸鱼。但清军仍然对吴三桂军队的战斗力心有余悸，不敢直入山海关，而打算绕道蒙古，从蓟州密云方向越过长城，攻取北京。对于清王朝来说，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一旦李自成起义军站稳脚跟，天下渐渐平定，那清军进入关内的计划，不知道又将推迟多少年！

面对着这样两支强敌，攻占了北京的李自成起义军，仍然沉浸在盲目的陶醉之中，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早在李自成率领着 40 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他就向部下许愿，说攻下北京后，皇宫内的财富归李自成，明朝皇亲国戚的财产和文武官员的财产归各路将领。而富商大户的财产就由起义军战士瓜分。结果在攻进北京之后，农民军就到处抢掠，搜刮民财。李自成这时才感到，如此军纪败坏，后果不堪设想，赶紧开始重申军纪，可是竟然有部下当面质问他：“皇帝让你做了，连金银财宝都不分点给我们吗？！”

李自成被问得张口结舌，整顿军纪的事也就不了了之。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干脆说：“我们现在只怕军队叛乱，不怕老百姓闹事。军队如果心怀不满，我们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老百姓闹事，只要手中有军队，就一定能镇压下去。”这实际上纵容了士兵的纪律败坏，让他们“心满意足”。同时，李自成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严重的敌情视而不见。他根本不相信清军会乘机进入中原，将吴三桂也不放在眼里，认为山海关不过是弹丸之地，比不上北京城的一只角，他动动鞋尖就能踢倒了！而农民军内部又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刘宗敏公然同李自成分庭抗礼，不甘心由李自成本来做皇帝。李自成对保持清醒头脑的李岩心怀疑忌，生怕李岩会夺了他的帝位。这些情况传到吴三桂耳朵里，吴三桂断定李自成起义军成不了大气候，也就不再考虑与李自成合作的可能了。

三月二十日，吴三桂在丰润给他父亲吴襄写了第一封信，询问北京的情况。信刚送走，他派出的侦探已经返回，确证北京已落入李自成起义军之手。吴三桂当即又给父亲写了第二封信，表示打算仍然退守关外，征求父亲的意见。这时，吴襄的第一封回信到了，告诉吴三桂，他已投降了李自成。吴三桂在三月二十五日发出第三封信，对父亲的投降表示理解，“只希望全家老小能够平安无事；并表示自己也有投降李自成的意思。

然而，三月二十六日，事情发生了剧变。从北京逃出来的吴三桂亲属告诉他，全家都被李自成军抄光了，吴襄被李自成抓起来了，连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刘宗敏抢去了。

吴三桂终于下定决心，要与李自成为敌。这时，李自成部下两万人，原已占领了吴三桂放弃的山海关。吴三桂在三月二十七日发动突然袭击，重新夺回了山海关。李自成的二万部队全部溃散。

三月二十九日，吴三桂袭取山海关的消息传到北京，李自成才接受了李岩、宋献策等人的建议，打算招抚吴三桂，利用吴三桂父子为新政权效劳。李自成派人给吴三桂送去两封信，一封是他以“大顺国王”名义写的，表扬吴三桂等明王朝将领“响应归附”大顺政权，赐给他们彩缎和黄金。另一封是李自成部将牛金星，强迫吴襄写的，要他以父亲的身份，劝诱吴三桂投降。此外，又派人送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帛千匹到山海关，慰劳吴三桂的军队。

吴三桂见信后，勃然大怒，命令杀掉李自成派来的使者。他的部下连忙阻止了他，对他说：“不如收下这些财宝，分给士兵。一方面鼓励士气，一方面也可以麻痹李自成，使他不防备我们。杀掉一个使者，有什么意思呢？”

吴三桂接受了部下的建议，立刻召见使者，对他说：“听说崇祯皇帝的太子还活着，我只要能见太子一面，马上就投降！”

使者见吴三桂这么爽快，喜出望外，连忙赶回北京去报告李自成。然而他还没到北京，吴三桂已经又一次发动突然袭击，歼灭了山海关附近的另一支李自成部队。

同时，吴三桂也给父亲吴襄写了一封信，责备他不该那么快丢掉北京城，又忍辱偷生，投降李自成。吴三桂明确表示，既然父亲不能做明王朝的“忠臣”，那么他也就不能做吴家的“孝子”了。他声明从今以后同父亲断绝关系！随后，吴三桂又发布了《讨闯贼李自成檄》，向普天下宣布了自己坚决反对李自成的立场，树起了反李自成的大旗。

吴三桂当然预料到，李自成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发兵前来征讨。他

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一方面，加固山海关的防御设施，另一方面以“报君父之仇”为号召，招集附近的明朝流散部队，几天之内就招到了一万八千人。这样，吴三桂的兵力达到了五万八千余人。然而，要同号称百万的李自成起义军较量，五六万人马未免显得太少了；更何况，他的五六万人马还不能全部投入战斗，因为一着棋走错，他就将陷入敌众我寡，腹背受敌的险境而无法自拔！

吴三桂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眼看李自成步步进逼，吴三桂急得整天吃不下睡不安。

吴三桂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方光琛，另一个叫胡守亮，他们向吴三桂提出一个建议：“不如请清兵入关，共同歼灭李自成，然后重谢清兵。”

吴三桂听了，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只能这样办了。”作为久经沙场的军事统帅，他早就想到过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的策略，但迟迟拿不定主意，因为这局势实在太不同寻常了。一方是清兵，是他吴三桂几十年来的敌手，吴三桂清楚地认识到清兵侵占中原的野心。他也认识到，尽管李自成起义军逼得崇祯皇帝自杀，又抓了他的父亲，抄了他家的财产，但他并不认为这些是阻碍他同李自成联合的障碍。他相信只要他一归顺李自成，父亲就会被释放，家产也会被发还。但是，李自成起义军内部的急剧腐败，却让吴三桂寒心了，他因此判断李自成是不能依靠的。这样，作为吴三桂的最佳选择，只有联合清兵共同消灭李自成起义军了。

方针既定，吴三桂迅速派出特使杨坤、郭云龙前往清王朝借兵。

这时，清兵已在摄政王多尔袞的率领下，绕道蒙古向长城进发。四月十三日，杨坤和郭云龙来到多尔袞军前求见，呈上了吴三桂请求借兵的信。

多尔袞立即召集谋士和将帅们商议对策。大家都以为，不应该放过这个良机，也不必听从吴三桂的指挥，而是趁此机会发兵直取山海关。多尔袞当场决定，大军改变前进方向，转向山海关进发。但对吴三桂要求借兵，多尔袞却不敢贸然答应。他怀疑这是吴三桂同李自成串通了来骗他上当的，一旦他钻入圈套，就难免全军覆灭了。为此，他决定借兵的事到山海关后，待摸清情况再说。于是，多尔袞派清朝学士詹霸和来袞为使者，同郭云龙一块到山海关去见吴三桂，却把杨坤扣留在自己军中，名义上是做向导，实际上是当人质。

几天后，郭云龙和清朝使者到达山海关。吴三桂急忙打开多尔袞的回信，看罢不禁一愣，原来，多尔袞并没答应借兵给他，却反过来劝他归顺清王朝，并且以将来可以封王为诱饵。吴三桂读完回信，反复思考，觉得多尔袞与自己的意图虽有不同，但在共同对付李自成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这就是联合的基础。恰在这时，有侦探前来报告，说李自成已亲率大军20万向山海关杀来。形势紧迫，吴三桂不再犹豫。他又给多尔袞写了第二封信，避而不谈自己“归顺”清朝的事，只要求清兵赶快进驻山海关，并表示消灭李自成起义军之后，明王朝一定会重重地酬谢清军。

多尔袞原以为吴三桂在腹背受敌的险境中，一定会很痛快地投入清王朝的怀抱，没想到吴三桂仍然坚持借兵，不谈归顺的事。但多尔袞也是个聪明人，他想只要清军进入了山海关，这个战略要地就再也不会还给吴三桂了，这样便宜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也就不再说同吴三桂讨论什么归顺的事，挥师直下山海关。

再说李自成率军出北京征付吴三桂，也是四月十三日的事。在这之前，

李自成一直在忙着登基做皇帝，命令农民军将士演练拜见皇帝的礼节。可是将领们忙着相互请客庆贺，士兵们忙着抢掠钱财，对于“三跪九叩首”一套臭规矩根本没有兴趣。直到吴三桂反李自成的檄文传入北京，李自成才大吃一惊。他想到近在咫尺的山海关还有一个吴三桂。而更让李自成吃惊的是，京城中明朝的旧臣，和吃尽了起义军抢掠搜刮之苦的老百姓，已纷纷行动起来，散布谣言，搅乱人心，准备接应吴三桂进北京。李自成立即召集刘宗敏、李过商讨征伐吴三桂的事，哪知刘宗敏和李过已经过惯了享乐日子，根本不想打仗了。李自成只好决定亲自率军出征。然而经过一个月的抢掠搜刮，起义军都发了横财，好多人抢到了千余两银子，如今只想回老家过安稳日子，一听说要去打仗，一个个唉声叹气，有的人甚至放声大哭。李自成下令杀了几个动摇军心的士卒，但还是没法重振军威。折腾了几天，才算聚集起20万人马。四月十二日，李自成下令把明朝的旧臣都杀掉，防止他们乘机作乱。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全家三十多口也全部被杀死。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领大军出北京。四月十七日，李自成兵至永平。这时吴三桂为了阻止李自成东进山海关，组织当地一些老百姓，伪装成士兵，在山海关外安营扎寨。这些老百姓当然挡不住李自成的军队，双方刚一交战，老百姓就溃散逃走了。李自成大为高兴。军师宋献策却怀疑这不是吴三桂的精锐部队，劝李自成不要轻敌。李自成哪里听得进！当即下令：“包围山海关！”

这时，多尔袞统率的清军，也已到达山海关外的欢喜岭。但多尔袞直到这时，仍然不肯轻举妄动。他同吴三桂作战多年，深知吴三桂智勇双全，他唯恐吴三桂又使什么计谋骗他上当。同时，他对李自成起义军也怀有惧心，多尔袞对部下说：“我曾经三次领兵包围北京，但一次都没能攻进城去；李自成却一举攻下了北京，他一定有过人的智谋和勇猛。我们不要惹火烧身，引得他再打到东北来！”

多尔袞在欢喜岭安营扎寨，只派些士卒到前线打探虚实。而吴三桂可急坏了。他一连派了八位使者，到欢喜岭去请多尔袞进入山海关，哪知他越是请得急，多尔袞越是不敢动！

这时，李自成的军队已将山海关团团围住。为了防止吴三桂向东逃跑，李自成又调兵两万，占领了山海关东面的一些要地，截断了吴三桂的退路。

吴三桂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四月十九日，吴三桂把全军召到演武堂，向众将士讲明形势，决心血战到底。第二天，吴三桂的部下捉住了李自成的一个侦探，吴三桂又乘机举行“祭旗仪式”，杀了这个侦探，同各将领一起发誓，同心协力抵抗李自成。尽管吴三桂想尽办法鼓舞士气，但兵力实在悬殊太大，众人心中都明白，如果没有清军的支援，吴三桂必败无疑。

这时，吴三桂只好亲自去见多尔袞了。四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带领部分精兵，在炮火掩护下杀出重围，飞马驰往欢喜岭，在威远台同多尔袞见了面。多尔袞一见面，就质问吴三桂：“你约我来，我来了，你怎么用炮向我军轰击呢？”

吴三桂解释说：炮火不是向清军轰击，而是向李自成军轰击的，否则他无法杀出包围圈。

误会消除了，但多尔袞仍然想趁吴三桂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胁迫吴三桂投降清朝。但遭到吴三桂拒绝。

多尔袞不死心，挥挥手说：“将军先回去吧，我们明天再商量！”

吴三桂白跑一趟，心中更加着急。加上李自成起义军不断地向山海关炮轰和攻击，搅得吴三桂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吴三桂披麻挂孝，又到威远台去见多尔袞。多尔袞见吴三桂这一副装束，知道他是想表白自己“为君父报仇”的决心，连死也不在乎了。多尔袞情知再对吴三桂施加压力，也未必会有什么结果，于是索性痛痛快快地答应出兵。接着，两人饮血酒立誓，然后才坐下来策划山海关之战的部署。双方约定，以吴三桂军为前锋，清军由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各统领一万人马，分别从东西水关进入山海关。多尔袞亲率大军为后队。

临分别时，多尔袞一再叮嘱吴三桂，要他让自己的士兵都在胳膊上系上白布为记号，以免清军误杀。

吴三桂这才急忙赶回山海关。

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战役全面打响。吴三桂率领部下同李自成起义军一场血战。吴三桂东冲西闯，匹马单刀，没有人能抵挡得住。他的部下也知道这一仗关系自己的生死存亡，个个英勇拼杀，以一当十。但是李自成起义军毕竟人多势众，双方殊死奋战，损失都很惨重。

这时，多尔袞却在一边坐山观虎斗，他有他的如意算盘：让吴三桂与李自成先拼个两败俱伤，他则可以顺顺当地拣个便宜。同时，他亲眼看见吴三桂与李自成两军交战，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吴三桂是不是在玩花招，也可以更准确地判断李自成起义军的战斗力。

直到二十三日午后，李自成与吴三桂两支军队都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多尔袞才下令让清军从吴三桂军的右侧突然杀出。李自成正在指挥作战，忽然见一杆白旗，引着一支军马，狂风一般冲进了自己的阵地，起义军根本无法抵挡，李自成完全没有想到，是清军加入了战斗，直到有人向他报告，他才大吃一惊。李自成一直认为，吴三桂同清军作战多年，清军决不会援助吴三桂的；就是清军肯支援吴三桂，等他们从满洲赶来，也要很长时间。哪知道清军竟突然杀到了自己面前，而且来势如此凶猛！毫无思想准备的李自成急忙拨转马头逃走。这一下兵败如山倒，李自成起义军自相践踏，死伤数万人。李自成只带着几千败兵，退回永平。待到刘宗敏、李过率领残兵败将一齐集中到永平，20万人只剩下几万人。

这时，吴三桂已经兵临永平城下。

李自成面对极为不利的形势，只得退而求和，派张若麒去同吴三桂谈判议和。吴三桂召集部下商量，有人主张趁李自成新败，乘胜追击，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也有人觉得自己兵力损失也不小，需要休整，议和也好。吴三桂反复掂量，觉得李自成虽败，手下还有数万人，逼急了，拼死一战，自己未必有好处。况且自己手下只剩下二万人了，并没有必胜的把握。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就是被请进山海关来的清兵，实力雄厚，定在一旁伺机而动！在这种形势下，吴三桂接受了张若麒带来的和谈建议，提出了谈判条件：要李自成起义军交出崇祯皇帝的太子和两个王子，并退出北京城。

李自成觉得这个条件可以接受，将崇祯皇帝的三个孩子送给吴三桂，对起义军没什么损失；而在山海关大败之后，北京已很难保得住了。这样，经过双方再次磋商，终于达成了协议，李自成答应在五月一日退出北京；并约定，如果清军侵害百姓，双方应合力对付清军。

吴三桂撤退了包围永平的部队。李自成在四月二十六日安全撤回北京。

但是，李自成还是想过一过当皇帝的瘾，在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地举

行了一个登基的仪式，算是当上皇帝了，然后便狼狈地向西撤退。自此之后，李自成起义军急剧衰落，不久就完全失败。李自成也不知下落，据说在败退途中战死。

然而，吴三桂也没能按照自己所预想的恢复大明王朝。五月二日，北京城内纷纷传说吴三桂护送太子入城了，官员百姓都前去欢迎，哪知迎来的却是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

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在血战山海关的刀光剑影中，进入了北京城。

（薛兵）

莱茵河的悲哀

风光明媚、景色宜人的莱茵河是欧洲三大河流之一，它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流经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法国、联邦德国和荷兰，流程1320公里，最后从鹿特丹港附近注入北海。这条古老而美丽的大河，是欧洲大陆的生命线。碧绿清澈的莱茵河水，像甘美的乳汁，滋润着两岸千万顷沃土，哺育着欧洲大陆的人民。

然而，1986年11月发生在莱茵河上游的一场大火，却使碧波滚滚的莱茵河水一夜之间变了模样，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悲剧。这是继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在欧洲发生的又一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

1986年11月1日凌晨，位于莱茵河上游的瑞士巴塞尔城渐渐从白天嘈杂的喧闹中沉静下来。大街上，除了街灯和高大建筑物上的灯火依旧辉煌明亮之外，几乎见不到行人，只是偶尔有一两辆小汽车急驶而过。

巡警戴维斯驾驶着一辆夜间巡逻的警车，沿着巴塞尔附近的高速公路疾驶。突然，他发现前方的夜空中透出可疑的红光，红光越来越亮，渐渐映红了四周的天空。他赶紧测试一下方位，确认那是瑞士三大化学公司之一——桑多兹化学公司的仓库所在地。他立即打开无线电送话机，向总部发出紧急警报：“桑多兹化学公司956号仓库失火！”这时，时针正指向零点19分。

急促的警报声像闪电划破黑夜长空，把睡梦中的巴塞尔城惊醒。消防站的警铃骤然响起，160名消防队员，跃身而起，套上消防服，分乘十几辆消防车，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失火现场。

956仓库位于莱茵河左岸巴塞尔以东10公里的地方。那里储存着1250吨剧毒化学品。火势借着大风，越烧越旺，熊熊火舌直窜五六十米的高空，大火燃烧的范围足有1.5公顷。在高温的炙烤下，装满剧毒化学物质的钢罐，像炸弹一样一个接一个爆炸，发出巨大的响声和强大的冲击波，滚滚浓烟载着大量有毒气体逸向远方。

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火灾。消防车一到，立刻将吸水管伸到莱茵河里，以每分钟泵起3000加仑的速度抽取河水，企图以河水制服熊熊燃烧的大火，阻止大火向周围其他仓库蔓延。就这样，含有剧毒化学物质和灭火溶剂的污水，迅速填满了仓库周围的下水道，最后外溢到莱茵河里。

消防队员们虽然奋力扑救，还是没能完全控制火势。到清晨3点30分，地方当局不得不一面派人四处报警，一面通过电台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顿时，不断鸣响的警笛声和报道事态的广播声使熟睡的居民从梦中惊醒。广播车沿街行驶，向市民发出警告：“市民们请注意！桑多兹化学公司的仓库起火爆炸，施放出大量有毒气体，请大家关好门窗，呆在家里千万不要外出！”随着紧急呼吁的播出，当地陷入一片混乱。

历时4小时的大火终于被英勇的消防队员扑灭了。卫生部门的环境监测仪器测出大气中有毒物质含量并不足以损害人们的健康，便通知当局解除了紧急状态。但是，他们未曾料到，仓库中有30吨烈性杀虫剂、硫化物以及18吨水银已经连同灭火剂和污水一起流入了莱茵河。天刚亮，人们就惊讶地发现，火场附近的莱茵河已面貌全非，河面上泛起一片片红色、黄色、褐色的漂浮物，好像一个受伤的巨人在流血。

从桑多兹化学公司仓库流出的祸水，载着水银、农药等剧毒物质泻入莱茵河后，形成了一股长达70公里的浊流，它的含毒量超出正常标准的一百

倍。它以每小时 4 公里的速度向下游缓缓移动，进行着一场传播死亡的毁灭性旅行。毒流所到之处。鱼类死亡，水生物也遭到灭绝。广阔的河面上漂浮着许多死去的鳗鱼、鲟鱼和鸬鹚、野鸭。离出事地点不远的的一个养鱼场，几千条毒死的鱼白花地漂浮在河面。浊流继续向下游漂去，从瑞士的巴塞尔到联邦德国的美因茨，在长达 200 英里的河道内，大大小小的生物几乎毁灭殆尽。据估计，由污染直接造成的损失达 6000 万美元，单是与瑞士接壤的联邦德国巴登——符滕堡州，仅渔业一项就损失 500 万美元。污染使莱茵河上游的鳗鱼全部死绝，整个莱茵河有 50 万尾鱼被毒死。生态专家认为，今后数年莱茵河里将无鱼可捕。

桑多兹化学公司为减轻损失，特地向莱茵河巴塞尔到鹿特丹港这段 850 公里长的沿岸各城镇的供水部门发去急电，请他们迅速查清当地河水受污染的情况。

沿岸各国政府也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以防不测。

法国政府下令禁止本国渔民下莱茵河捕鱼，牧民们不准在沿河地带进行放牧。联邦德国切断了沿河地区的供水系统，有好几个城镇不得不靠消防车运水来维持生计。

荷兰有关当局立即下令关闭所有与莱茵河相通的河口，以保证国内的支流不受污染。接着又宣布用井水和储存水来供应居民，有些居民甚至靠用瓶装的矿泉水来救急。

英国农业和渔业部派出船只去北海待命，准备随时跟踪和监测有毒物质对北海的污染。

就在沿岸各国对这次污染大加防范之时，瑞士的某些化工厂却将桑多兹火灾事件视为可乘之机，把本厂存有的有毒垃圾也倾倒入莱茵河，使莱茵河的悲剧雪上加霜。古老的莱茵河，在呻吟，在呼救；沿岸国家公众群情激愤，舆论一片哗然。

巴塞尔居民连日来举行集会，举着“我们不愿做明日之鱼”、“鱼类沉默，我们不能沉默”、“救救莱茵河吧”等标语牌，谴责桑多兹化学公司的犯罪行为。在桑多兹公司所在的巴勒市，数以万计的市民在大街上游行，要求政府公布事故真相。一些游行戴着象征死亡的骷髅面具，以示抗议。还有些人边游行边在沿街墙上书写着“又一个切尔诺贝利”的字样，向人们发出警告。绿色和平组织则向法院起诉，要求桑多兹化学公司承担法律责任。法国、联邦德国和荷兰要求瑞士赔偿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损失。颇具权威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评论莱茵河的污染事件时指出：“现在是全欧洲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无论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还是瑞士的化学品仓库火灾，这类危机远远超出所发生国家的范围，整个欧洲大陆成了受害者。”

11 月 12 日，莱茵河沿岸 6 国的环境部长们在苏黎世附近的格拉特布吕格开会，讨论怎样对付这次严重的污染事故。会议最后达成一项总协议，要求沿岸各国加强国际合作，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各种措施。尽力减轻事故造成的危害。

12 月 19 日，环境部长们又来到荷兰的鹿特丹，再一次开会研究，共同制订清除莱茵河污染的目标。他们决定，邀请有关专家制定一项净化莱茵河的长期规划，并同意受到桑多兹事件危害的国家，通过莱茵河国际委员会向桑多兹公司提出索赔。

作为肇事者，桑多兹化学公司更是忙得焦头烂额，他们把世界上最优秀

的生态、生物和动物学方面的专家请来，一起会诊莱茵河的污染问题。这家公司决定采取一系列中、近期措施，对事故现场进行大规模清污消毒，用混凝土墙把仓库围住，整个覆盖起来。公司又设置了报警系统，修改了化工产品存仓条例。当然，更为大量的工作是对莱茵河本身的清污。该公司会同莱茵河国际委员会和沿岸各国环境部门，制定了一项庞大的莱茵河清污计划。漂浮在河面的有毒物质的清除，需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而最麻烦的是沉积在莱茵河底的污物。据科学家们测算，至少有 300 多公斤的剧毒化学物质淤积河底，只要洪水泛滥，这些化学毒品又要沉渣泛起，给两岸人民带来新的威胁。为此，生态学家正考虑把河中的有毒污染抽吸上来，但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巴勒市环境保护官员瓦尔特·埃尔曼预计，至少要在 10 年之后，莱茵河的生态系统才能复苏，而要使河中原来的 30 多种鱼类恢复正常的繁殖循环，则需要更漫长的时间。

桑多兹化学公司的严重事故，已经引起整个欧洲社会对公害的关注，被人们称作一起新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在遍及欧洲的抗议浪潮中，一些污染最严重的化学工厂被迫停产或关闭，各国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制止污染的扩散和蔓延。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人们逐步意识到：人类在改造自然、创造文明的同时，必须注重环境保护，否则，必将受到自然的报复。八十年代中期连续发生的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桑多兹火灾这 3 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它提醒人们：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护地球，如果我们不关注人类唯一的生命摇篮——地球的生态环境，就无异于用利刃割断人类的生命线。

（陈齐）

马丁·路德·金遇害

1968年4月，美国争取黑人公民权运动和提倡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伟大领袖，学识渊博、备受尊敬的马丁·路德·金牧师来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积极支持环卫工人举行的一次罢工斗争。4月4日晚，他正站在洛兰停车场旅馆的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额角，然后穿透脖子，打伤了他的脊椎。送往医院后不久就停止了呼吸。

金牧师被杀激起了美国几十个城市黑人区的大规模骚乱，黑人居民纷纷涌上街头，抗议自己最优秀的儿子被杀害。警察、国民警卫队和军队都出来平息抗议和示威行动。为此，美国总统约翰逊不得不在4月5日下令，首都华盛顿实施紧急状态。总统同时推迟了赴檀香山的行期。电影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仪式原定于4月8日举行，现在只好推迟到金牧师的葬礼后举行。葬礼定于4月9日，这一天宣布为全国哀悼日，国家机关奉命下半旗致哀，为金牧师举行了全国性的祈祷。

同时，对此案的侦破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就在凶杀案发生的当时，在现场的孟菲斯市警察当即打电话报告了联邦调查局孟菲斯市分局，分局长罗伯特·G·詹森立即上报给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胡佛下令赶紧调查。

据住在对面贝西·布鲁尔公寓的一位房客查尔斯·斯蒂芬森说，他听到一声枪响，而后他打开自己房间的门，看见一个男子跑过过道，手里提着一个大包袱。斯蒂芬森记得此人曾和公寓的女主人布鲁尔太太在一起。他回忆那人大约35岁，身高有5英尺10英寸，体重约165磅，穿一套整洁的深色衣服。

另一名旅客威廉·G·安库兹说他也听到了枪声，当时他正在看电视。他打开房门，恰好看见一个男子提一个大包袱朝他跑来，边跑边用手捂着脸。安库兹对他说：“我好像听见一声枪响。”

“是呀，是一声枪响。”那人也这么说。

几分钟以后，与布鲁尔公寓相隔不远的卡尼普游艺场门外传来“扑通”一声。游艺场经理和两个游人走出来，看出了什么事。他们在游艺场凹进去的入口处发现一个包袱。与此同时，他们看见一个身穿深色衣服的男子沿街向南走去。不大一会儿，他们就看见一辆白色小汽车（大概是“野马”牌的）飞快驶过他们身边，朝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询问了公寓女主人布鲁尔太太，据她说，那个人是当天下午三点半左右来她的公寓登记住宿的，署名约翰·威拉德。身材和长相与两位房客所说差不多。她安排他住二楼8号房间，室内有电炉和电冰箱。那人告诉她只要一间卧室就行，于是她租给他公寓后部的5-B号房间。那人朝窗外瞥了一眼，对过就是洛兰停车场旅馆的阳台。

斯蒂芬森于当天下午曾听见5-B房间和公用浴室之间有人走动，脚步声反复响了几次，他想进浴室，但发现里面已经有人。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检查了那个包袱，发现里面有一对雷明顿公司制造的760型“打猎能手”步枪，这是一种穿透力很强的步枪。包袱里还有一架望远瞄准镜和一个拉链式手提包，包里装着洗漱用品、带洗衣签的一条男式短衬裤、一具望远镜、两罐啤酒、一个纸袋（标有田纳西州孟菲斯约克机械公司字样）及一张约克机械公司的发票，发票日期是1968年4月4日。分局长

詹森派飞机把这包袱送往华盛顿，交化验室鉴定。

在此期间，联邦调查局命令全国各分局：要优先安排金牧师被刺案的调查工作。这就是说，获得一切线索均须立即充分重视，这些线索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均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加以充分利用。在华盛顿，这架机器已开动起来，与负责种族、保安和犯罪方面的耳目联系，要调查三 K 党和其它种族歧视团体。还下达了要查对人名的指示，主要查阅美国征兵局档案、城市姓名地址录和电话簿；查阅驾驶执照局、机动车辆处和金融机构的卷宗，信用卡档案、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记录、结婚登记证存根、公用事业卷宗、工会会员花名册以及运输业旅客名单。

不出几天，联邦调查局便查出了这支步枪及其它物品的来源。特工人员发现，有人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航空航海用品公司购买了这支步枪和望远镜。一个自称“哈维·洛迈耶”的男子在 3 月 29 日（也就是谋杀案发生前六天）购买了这支步枪和这架望远镜。售货员所描述的“洛迈耶”和联邦调查局所了解的这名嫌疑犯体貌特征相符。根据纸袋和约克公司的发票，特工人员找到出售这副望远镜的孟菲斯商店。一名售货员说，他在金牧师遇刺的当天下午四点左右把这副望远镜卖给一名男子，那人体貌特征也与特工人员掌握的情况相符。而两罐啤酒则是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家商店购买的。

特工人员在孟菲斯各家旅馆和饭店查寻投宿者有无家住伯明翰的。他们估计，在布鲁尔公寓用“约翰·威拉德”名字登记住宿的男子可能比较早就到了孟菲斯。查寻结果，唯一来自伯明翰的旅客是住过雷伯尔汽车旅馆的埃里克·斯塔沃·高尔特。这个人 4 月 3 日在那里登记住宿一夜，他驾驶一辆亚拉巴马州牌照的“野马”牌汽车。

在伯明翰，特工人员了解到，高尔特与“约翰·威拉德”的体貌特征很相似。他曾经买过一支 33 口径的左轮手枪，并曾在大陆舞蹈俱乐部学习舞蹈。俱乐部经理说，这名学员学习很认真，在假日里，他常开车到墨西哥去。

后来，联邦调查局有了很大的收获，亚特兰大的一名家庭主妇见过一辆白色的“野马”牌小汽车在金牧师遇刺后的第二天下午一直停在附近的一个街区。经过证实，她所说的正是高尔特的那辆小汽车——由于这发现，联邦调查局追查至加利福尼亚州。有证据表明，这辆车在洛杉矶地区加油两次。他们派出三百名特工，集中力量搜寻洛杉矶地区。终于有了收获，在洛杉矶全国舞蹈室的档案中，发现了高尔特的名字。然而，他们仍没有找到高尔特的下落。

在亚特兰大，特工们在高尔特住过的一间公寓里找到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东西：一本小册子《锁匠行业有您的机会》，还有一张亚特兰大市街图，上面标出了金牧师的住址。金牧师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总部所在地也划了圈。看来，这个高尔特就是杀害马丁·路德·金的凶手。

联邦调查局的指纹专家仔细地在那份地图上寻找指纹，仅发现一个指纹。而他们的档案库里保存着八千二百万人的指纹，每个人十个指纹，也就是说共有八亿二千万个。在如此庞大的数字中寻找一个指纹，这简直是大海捞针！他们只好缩小寻找的范围，只限于在逃犯人的指纹卡，而且是二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白人男性逃犯，这样，需要查对的指纹卡就不到两千张了。

最终查明，这个指纹是一个叫詹姆斯·厄尔·雷的人留下的。他是一个轻度惯犯，以前常犯有偷窃和抢劫罪，最后一次犯案被判了二十年徒刑。1960 年和 1966 年，雷曾两次企图越狱逃跑，结果都未成功。

1967年，他终于藏在一辆运面包的车中逃出了杰斐逊监狱。他事先知道这个面包箱要放到卡车上，送往附近的一座监狱农场。在卡车开往农场途中，雷爬出大面包箱跳车，从此销声匿迹。

调查局又对雷越狱后的行踪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从1967年5月起，雷一直流窜在外，时而靠打工糊口，买廉价小汽车，自己开着，到过加拿大住了两三个月。后来又买了辆白色，“野马”小汽车，从伯明翰去墨西哥住了段时间，最后，他于1968年3月24日到达亚特兰大。雷在加德纳公寓一直住到3月28日。在那里住宿期间，他购买了一张美国邮政汇票，是寄给锁业学会的，汇票上签名是高尔特。

雷化名哈维·洛迈耶在洛杉矶购买了那支步枪和望远瞄准镜。4月1日他回到亚特兰大，后来，开车到孟菲斯，在雷伯尔停车场旅馆住了一夜，次日搬进简陋的贝西·布鲁尔公寓。金牧师被刺的当天下午5时左右，雷在约克机械公司买了那副望远镜，随后返回5—B房间。

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推测，凶手在开枪打死金牧师后的45秒钟内，无疑是穿过走廊，跑下楼梯，逃到大街上；然后在15秒钟内把包袱丢在卡尼普游艺场门口，走到那辆“野马”牌白色小汽车那里，只有这样，在公寓里的证人才可能有时间仔细瞧他一下。

通过进一步调查，特工人员发现，发案后的第二天，雷在亚特兰大取出送洗的衣物，然后扔掉汽车，只身到了加拿大，一个月后又拿着加拿大护照去了伦敦。这是他第一次伪造证件躲避追捕。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买的是往返机票。

在伦敦，新伦敦警察厅发现，雷已退了返回的机票，换了5月7日从伦敦飞往葡萄牙里斯本的班机客票。而在葡萄牙里斯本，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发现，雷5月7日到达里斯本后，又于5月17日飞回伦敦。新伦敦警察厅刑事部发出扣留这名逃犯的通知。6月8日，联邦调查局人员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将他逮捕归案。

对金牧师遇害一案一直争议颇多。证据表明，这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谋杀所有争取黑人公民权运动领导人计划中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说联邦调查局也卷入了暗杀案，而雷只不过是一只无足轻重的替罪羊罢了。谁也无法证明这个说法是否正确。不过，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无疑有一部分人对金牧师的死毫不可惜，甚至还有幸灾乐祸之嫌。一个后来退休的联邦调查局官员说，当时在他们组织内部普遍存在着深深的厌恶金牧师的情绪，并且说，有一个调查局特工人员在听说金牧师暗杀的消息后，高兴得差点蹦了起来。

联邦调查局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曾在金牧师的家中安装过窃听器，并曾给他的妻子写过一封匿名信，告诉她，她的丈夫与另外好几个女人有关系。1964年马丁·路德·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联邦调查局的头子埃德加·胡佛气得几乎发了狂，他们的行为越来越出格。联邦调查局甚至给金牧师送去了一封恐吓信，要他在拿到奖金之前必须自毙以谢国人。其中有一部分这样写道：“金——现在只剩下一件事你可以做了，你知道那是什么，你只有三十四天去做这件事。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你是完了，不过你只有这一条出路……”

胡佛还曾以官方的名义命令他的手下对金牧师的私生活进行调查。在他的授意下，联邦调查局采取了许多不合法的手段，制造各种事端以骚扰金牧师，并称他为“全国最最臭名远扬的大骗子”，他甚至还授意编造了一个可

能发生的暴力事件的新闻报道，结果使得金牧师不得不从已经选定的一家白人开设的旅馆中退出来，改住到洛兰停车场旅馆。而正是在这儿，雷向他开了致命的一枪。

这件案子中最令人起疑的一点是，像詹姆斯·厄尔·雷这样一个十足的笨蛋参与了暗杀金牧师这样的重大事件，似乎太不合情理。他曾经被军队解雇过，因为他“太不敏捷，缺乏对军事活动的适应性”。他的犯罪记录也是二流的。他一生尽管作案累累，但干得巧妙的并不多，此案可算第一次。他曾在洛杉矶盗过一台打字机，逃跑时，他的银行存折掉在地上，他停下来拾存折，结果被擒获；他在圣路易斯逃避一名警长追捕时，躲进电梯间，但一时疏忽，忘记关电梯间的门，被捉住了；他抢劫一家食品杂货店后驾车逃跑，却在急转弯的时候被甩出车外。有两次他从密苏里州监狱越狱，均被当场抓获。他的档案材料表明，他的智力商数仅为105。

雷起初对暗杀金牧师一案表示服罪，结果被判了三十九年徒刑。但不到24小时，他又企图反悔，并坚决要求更换他的律师。此后他就一再说他是无辜的。是那个只有他一人知道的鬼一样的人物“拉乌尔”派他到孟菲斯做枪支走私买卖，“拉乌尔”给了他钱和订单，他根本不知道是谁杀害了金牧师。

1978年，由众议院议员成立的一个暗杀问题小型特别委员会就金牧师被杀一案召开了听证会，一个圣路易斯人拉塞尔·拜尔斯说，有人答应给他五万美元，让他置金牧师于死地。那两个答应给他钱的人名叫约翰·考夫曼和约翰·萨瑟兰，他们是为一个商会做事。据拜尔斯说，这笔交易是在萨瑟兰家里一间悬有联邦政府旗子的小书房里进行的。萨瑟兰是一个富裕的律师，迎接拜尔斯时，他穿着联邦政府官员的制服，并戴着一顶上校军衔的帽子。

那时候，无论考夫曼还是萨瑟兰都已离开了人世，他们的遗孀坚决否认自己的丈夫参与了这种暗杀阴谋。实际上，早在1973年联邦调查局就听说过对拜尔斯的指控，但消息一直未传到负责这个案子的人那儿去。当局的一个发言人批评对这一消息的处置“违反了调查局一贯的原则和程序”。但联邦调查局的人声称，这不过是行政管理上一个小小的疏忽（即没有留档）罢了。因为那位处理这部分材料的官员从那以后退休了。

拜尔斯告诉众议院调查员们，他怀疑萨瑟兰和考夫曼事实上是把他当作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招了去，好叫他担负杀害金牧师的罪名。不过他们没有得逞。这使得调查员们开始加紧调查这三个人是否与雷那次成功越狱有关。

经调查得知，1955年，雷因伪造邮政汇票而被判刑。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斯监狱服刑期间，他曾拒绝转到荣誉监狱去，因为那里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雷在密苏里州监狱的一个同案犯告诉联邦调查人员，雷曾经说过，这座监狱的黑人囚犯统统应该被杀掉。还有一些犯人说，雷曾表示，如果赏金优厚，他愿意去杀死金牧师。他还曾被怀疑在1966年的一次监狱暴动中参与杀害三名黑人。据雷的另一名监狱伙伴讲，雷曾就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一事发了一番议论，他引用雷的话说：“击毙了一个爱黑鬼的杂种”。

还有一些犯人向调查人员提供，在金牧师领导民权示威运动期间，雷在报纸上看到有关金牧师的消息十分不安，他咒骂金牧师和一切黑人。据说，雷曾发誓出狱后一定要“干掉”金牧师。

这就描绘出一个种族歧视者的形象。他仇恨黑人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雷在监狱中虽然被视为“一头孤独的狼”，但私下里他还是对其他人透露过，

他出狱后打算“捞一大笔钱”。雷说这笔钱来自一个“工商业家协会”。据他讲，该协会已出十万美元赏金，要杀金牧师。一个犯人问雷：“是哪家工商业家协会？”雷回答说：“我不知道，可是我肯定能问到。”

一个与雷同牢的囚犯对其他人讲，听说一名商人出一百万美元赏金买金牧师的人头，这个消息显然是人所共知的。雷曾讲：“如果有人悬赏要肯尼迪的脑袋，我就会去杀掉肯尼迪。”

不仅如此，雷还是一个自命不凡，好夸夸其谈的人。这样一个人有可能认为把马丁·路德·金式的人物从世界上消灭掉是自己的义务。

根据以上情况，调查委员们判定，雷是为了得到巨额赏金才搞这次暗杀的。这笔赏金是分期付款，第一次付款供他1967年4月或5月到1968年4月期间在三个国家穿梭旅行；杀死金之后的第二次付款是作为他流窜的盘费，直至案发后两个月他被捕时才停止。

众议院暗杀问题委员会的这一判决澄清了事实，排除了所有关于联邦调查局参与暗杀金一事的可能性。但他们谴责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署犯了滥用它的合法权利，对金牧师进行粗俗下流的监视活动的罪行，并指责最高法院法官没有对这一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

所有的调查到此全部宣告结束。詹姆斯·厄尔·雷是金牧师遇刺案中唯一的一个服刑者。自1969年以来，他一直在监狱中度过他的后半生，仅在1977年有三天逃了出去。在这短短的一点自由时间里，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老谋深算以及像金牧师被杀后他乘飞机旅游那样的慷慨挥霍，不久他就被重新投入监狱。

（孙石夫）

一部《明史》千人冤

明朝天启年间，有一位名叫朱国祯的大学士。此人博学多才，尤其留心搜集史料，写出了《明书大事记》、《明书大政记》、《明书大训记》等专著；并且仿照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写出了一部《明书》，但在他生前没有能够问世。

明朝灭亡后，朱家也就败落了。朱国祯的孙子们住在故乡浙江湖州南浔镇上，因为生活贫困，靠变卖家产过日子。后来值钱的东西卖完了，就把祖父的手稿拿出来卖钱。这部《明书》的手稿，也就这样卖掉了。

谁也没料到，就因为这部书稿，后来竟害得近百人断送了性命，上千人蒙受冤屈，成为清朝初年轰动一时的“明史案”，提起来至今仍让人毛骨悚然。

花一千两银子购买《明书》手稿的，也是南浔镇上的人。这是一个姓庄的大富人家。当时镇上有“庄氏九龙”的说法，就是指的庄胤城及其两个兄弟和他们的六个儿子。庄胤城的大儿子庄廷鑑，自小就有才气，名声在外，可惜不到20岁就双目失明了。庄廷鑑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他想到《史记》中所记载的故事，说是有一位叫左丘明的古人，双目失明后著作了一部《国语》，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于是庄廷鑑也雄心勃勃，要著一部史书来流芳百世。但是庄廷鑑并没有史学上的才能，如今正好买到了朱国祯的手稿，庄廷鑑让人读给他听，他灵机一动，认为只要稍做一些增删修补，就是一部现成的史书，于是同父亲商量，要组织人来做这件事。

庄廷鑑的父亲庄胤城，在明代曾经入选过贡生，又是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团体复社的成员，同他的儿子一样，喜欢出名。他听了儿子的建议，立刻积极赞成。好在家里有的是钱，于是便重金聘请了当时二十个名士，共同修订这部书稿。这些人不但对朱国祯的原稿改头换面，而且增补了原书所没有的明代天启、崇祯两朝史事。这班人临时凑集，组织松散，又没有周详的提纲和统一的体例，所以这部《明史》在史学上的价值并不高。书编成后，庄廷鑑沽名钓誉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列名参加修订的有二十多人。不久，庄廷鑑就病死了。

庄胤城雇了刻字雕版的工人，把这部书稿雕成木版，印刷成书。经过五年时间，耗费大量资金，直到清顺治17年（1660年）冬天，这部书才全部刻印完毕，每部装订成100多册，洋洋大观。庄胤城一边赠送给当地的名流，为儿子扬名；一边让书商运往各地去卖。

一场家破人亡的大灾难，这时已渐渐逼近了贪慕虚名的庄家。

首先闹起来的是列名风波。原来，庄胤城为了抬高《明史》的身价，自作主张，把浙江一带著名的知识分子，都列入修订名单，结果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位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才子，都被写了进去。这三家人发现之后，都很惊讶，因为从来没有人就这件事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待到看了书的内容，他们就更紧张了，因为书中有不少触犯清王朝的地方。这三个人唯恐将来受连累，就联名向浙江学道胡尚衡举报了这件事。学道胡尚衡就命令湖州府学教谕赵君宋去核查。赵君宋花六两银子买了一部《明史》，果然从中查出了一百来处“诽谤”清王朝的地方，并且向胡尚衡做了汇报。

这件事被庄胤城知道了，也很害怕。因为他的学问本来不高，对于这部《明史》根本无法做出一个确切的评价，完全由着请来修订的人想怎么写就

怎么写，哪知道留下了这样大的祸害！这时，他只有花钱消灾了。其中有个叫张武烈的官员接受了贿赂，便去向赵君宋打招呼。赵君宋得了好处，也就不再作声。庄胤城又赶紧采取补救措施，收回已印好的《明史》，把其中有触犯清王朝内容的书页抽掉，重新改正补刻，印刷装订，看上去天衣无缝，再照旧发往各地去卖。

为了避免再惹麻烦，庄胤城又亲自跑了一趟北京，用大量金银买通有关官员，把修改后的《明史》呈交给礼部、都察院、通政司三大衙门审查。这三大衙门都得了他的好处，而且书中现在已没有问题，所以都未加批驳，将书留下作为参考资料。这实际上等于是允许这部书刻印发行了。庄胤城虽然水淌似地花掉了大笔银钱，但总算换来了一张护身符。

然而，更大的灾难已经在等着他。

这一回，是一个叫吴之荣的人在兴风作浪。

吴之荣是个下台的贪官。他在清顺治七年（1650年）担任一个小县的知县时，三年任期中贪污搜刮了六七万两银子，事发后被革职查办，关入大牢，判了绞刑，缓期执行。到顺治十六年，蹲了6年牢的吴之荣遇上了大赦，被释放出狱，但仍必须退出赃款。吴之荣身无分文，于是想出个无赖的办法，来到浙江湖州，一家一家地去找当地的有钱人，要人家出钱帮助他。人们早就知道他心狠手辣的恶名，但怕他有官复原职的一天会来报复，所以不得不送钱给他，于是成百上千的银子滚滚地流入吴之荣的腰包，累计达几十万两银子。但是吴之荣还不满足，眼睛盯牢了湖州的豪富庄胤城和朱佑明两家，伺机敲榨他们。

朱佑明是个木匠的儿子，经商发了大财，又勾结官府，在地方上横行霸道，积累了上百万的家产。但他出身寒微，虽然暴发，还是被当地的大户人家看不起，他在南浔镇上花几万两银子造了一幢豪华住宅，却没有名人肯为他写一块匾额，使他很恼火。正巧他的外甥买到了朱国桢家的一块旧匾，是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的手笔，写的是“清美堂”三个大字，上面的题款还写明是送“朱老年亲台”的。这个“朱老年亲台”当然是指朱国桢，“清美堂”是朱国桢的书斋名，朱国桢刻印的《明书大事记》等书，版心都雕着“清美堂”三字；庄胤城刻印《明史》时，为了与朱国桢所刻书版式统一，版心也雕有“清美堂”字样。朱佑明哪里知道这些事，高高兴兴地把这块匾挂在了自己家的大厅上。

就是这块匾，为朱佑明一家带来了杀身之祸。

这时先出场登台的是吴之荣的儿女亲家李廷枢。李廷枢原来担任浙江督粮道，也是个大贪官。在吴之荣贪污案被揭发后，这两个贪官狗咬狗，互相揭发，结果李廷枢也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后来与吴之荣一块遇大赦被释放。大约是“生死与共”了一回，两个人化敌为亲，结成了儿女亲家。李廷枢听到庄廷鑑《明史》出事的消息，已是两年以后的康熙元年（1662年），他想方设法，买到了一部未经修改的《明史》。当时的湖州知府陈永命，是李廷枢的学生，李廷枢便把这部《明史》送到陈永命那里，对他说：“这部书里有名堂啊！”陈永命心领神会，暗中叫人把自己有一部初版《明史》的消息透露给庄胤城。庄胤城连忙又给陈知府送来一份厚礼。陈知府欣然笑纳，却根本没想到要分出点去孝敬老师。李廷枢左等右等没有消息，就又到陈永命府上来问。陈知府态度很冷淡，告诉他此事已做处理，将庄家的《明史》刻版没收来封存了。然后便把李廷枢的《明史》还给了他。

李廷枢无可奈何，便去同亲家吴之荣商量。吴之荣喜出望外，当即去找朱佑明，说朱家大厅上“清美堂”匾，与《明史》版心“清美堂”有分割不开的关系，借此敲诈朱佑明。可是朱佑明根本不买他的帐。吴之荣又去敲诈庄胤城，庄胤城认为自己已经找到靠山了，也不理睬他。

吴之荣怎肯罢休！他当即写了揭发信，告到了镇浙将军松魁那里。松魁是满族人，对江南的汉族知识分子本有成见，一听说这《明史》有反清内容，顿时大怒，要奏报皇上。他的幕僚程维藩很有心计，知道庄家是湖州有名的富豪，便建议先让他去同庄家“商量商量”。松魁同意了。程维藩找到庄胤城，把事情一说，庄胤城感激不尽，马上送了程维藩一份厚礼，又托人给松魁送去一千两银子。松魁收下后，也就不再过问此事。

庄胤城怕吴之荣再节外生枝，便向巡道衙门告发了吴之荣在湖州敲诈勒索的种种不法行径。巡道勒令吴之荣限期出境还乡。吴之荣又羞又愤，可还不死心，临走时厚着脸皮到朱佑明、庄胤城两家去告别，指望能捞到点油水。庄胤城和朱佑明此时更不把他放在心上，自己不出面，让家里的丫环女仆出去，把吴之荣臭骂一通。这时巡道衙门的押解士兵也到了，不由分说就把吴之荣赶出了湖州地界。

吴之荣恼羞成怒，发誓报仇。他是满族人，在北上途中，千方百计又弄到了一部初版的《明史》。吴之荣为了集中打击庄、朱两家，便将书中“反清”的内容一一注明；又动手把书中的序言和参订人列名都撕掉，只留下庄廷鑑的名字，却擅自加上了朱佑明的名字。然后，他才将这部做过手脚的《明史》和检举信直接送呈给康熙初年最有势力的四个大臣。其中最专横凶暴的大臣鳌拜，当即决定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镇压江南汉族知识分子。

鳌拜派了一位特使匆匆赶往浙江，追查这件事。

特使一到湖州，立即把庄胤城抓去，一顿毒打，逼他招供同谋，披枷戴镣打入死囚牢中。特使又命令湖州知府取出库存的《明史》书版供查证。这时没收书版的前任知府陈永命已被罢官，新任知府谭希闵到任刚半个月，还没来得及查点仓库，所以不知道有这套书版。特使便直接把管仓库的人叫来问，管库人说有。特使便借机要挟谭希闵，说这是个严重渎职，暗示谭希闵只要弄点“好处”给他，他便可以帮谭希闵遮掩过去。谭希闵为官比较清廉正直，又觉得这实在不是自己的过错，断然拒绝了。特使怀恨在心，后来竟刻意陷害，以至谭希闵被判绞刑，死于非命。

康熙元年（1662年）十月，庄胤城被押解到北京，由于备受折磨，已经喉咙暗哑，不能出声，不久就死在狱中，死后还被分尸！

康熙二年（1663年）正月，鳌拜又派人到杭州，会同当地总督巡抚，把与此事有牵涉的人，统统抓起来审讯，连将军松魁也没放过。后来因为松魁是满人，不认识汉字，才算逃得一条性命，革职回家。程维藩也落了一个杀头之罪。

吴之荣指着那部《明史》上他加上去的朱佑明的姓名，一口咬定朱佑明也参预了此事。朱佑明有口难辩。正巧朱佑明与湖州府学教谕赵君宋关在一起，朱佑明哀求赵君来说：“你是最早查出《明史》罪状的，将来肯定会受重赏。假如你能救活我一家，我情愿用一半家产酬谢你！”赵君宋贪图朱佑明应许的百万家财，拍胸脯答应下来。第二天，赵君宋报告说：“大人们看到的那部《明史》不全，姓名也不准确：我藏有一部完整的原刻本。”清兵押着他回家取来原本，上面果然没有朱佑明的名字，但列名其上的几十位知

识分子，顿时都遭了殃。查继佐、陆圻、范骧三人虽然曾经举报过此事，并已被证明与此事无关，仍然被抓起来再审讯，并且将查家、陆家、范家三家老小共 176 人全部关入狱中。尽管这三家人最后是无罪释放了，但在监狱中已经大吃苦头。最倒霉的是赵君宋，本应是无罪的，这时却因为“收藏逆书”，断送了一条性命。

朱佑明的名字被证实不在修订名单内，本可以度过难关了。

哪知吴之荣咬住他不放，硬说他参加了雕版印刷工作，《明史》版心的“清美堂”就出在朱佑明家，现有朱家大厅上的“清美堂”匾额为证。朱佑明不管怎么解释，审讯官员也不相信。朱佑明只好再花钱行贿，他让心腹亲信去买通了浙江巡抚朱昌祚，求他定案时只判朱佑明一人流放，不要连累家人亲属，事成以十万两白银酬谢。朱昌祚贪财，已经答应了他。不料朱佑明有个亲戚，直接买通了从北京来的官员，不但花钱少，而且更加保险。朱佑明知道后，就决定丢开朱昌祚那一头。审讯时，北京来的官员有意从宽处理本是无辜的朱佑明，朱昌祚却跳了出来，不阴不阳地说：“朱佑明富可敌国，外面盛传他愿拿出百万银子行贿，以求保住性命。我们如果从轻判处，被阴险狡猾的吴之荣再告上去，只怕我们自身都难保呢！”北京来的官员大吃一惊，于是判定朱佑明“凌迟”处死，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他的三个儿子一个侄子杀头，家属流放，百万家产全部抄家没收。

庄胤城虽死，他的一家老小也没能逃过这场浩劫，兄弟子侄列名于修订名单中的十来个人，全都满门抄斩。连已死了多年的庄廷忧，也被从棺材里拖出来分尸。

列名于《明史》修订名单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不少也同查继佐、陆圻、范骧一样，根本不知道内情，名字是被庄廷鑑借用来提高这部书的身价的，尽管审讯中已证实他们确实与此事无关，但审讯此案的官员们，为了邀功请赏、贪财索贿，却决意不放过他们。这些人面对生死，既没有像某些官员那样摇尾乞怜，也没有像庄胤城、朱佑明那样行贿求饶，还是处之坦然。在狱中，他们身披枷锁，镣铐银铛，还相互赠诗，写出不少感人肺腑的佳作，对于清政府滥杀无辜的文字狱，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不仅如此，在鳌拜的授意下，《明史》案的株连范围越来越大，凡是参加雕版的刻字工人、参加装订的人，以至卖书、买书、收藏有这部书的人，甚至知道有人买过这部书而没有揭发的人，全都被判处死刑！

那么，被清政府借以大作文章、疯狂镇压知识分子的《明史》，究竟是怎样“反清”的呢？说来也真是可悲，只因为其中部分篇章里，提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直呼其名，犯了“不敬”的罪；有的篇章中还提到努尔哈赤曾担任过明朝的地方官，这也是清朝统治者所不愿提起的；有的篇章中歌颂了明朝官兵抗击清军的事迹……就是这样一些问题，竟造成七十多户家破人亡，一千多人蒙受冤屈、流离失所！

康熙二年（1663 年）五月廿六日，《明史》案审判结束，有关“罪犯”在杭州处决，一时间腥风血雨，惨不忍睹；而他们的亲属也在这时，被分装在十几条船中，运往流放地点，那悲状同样令人心碎！

震惊天下的《明史》案就这样结束了。

（薛兵）

“兴登堡”号飞艇爆炸

飞艇，最初由德国人在 1897 年首创。从本世纪初到三十年代，飞艇曾多次大显身手，尤其是在远距离、大规模运输方面，它明显优越于当时的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艇主要用于反潜巡逻任务，被称为“水上飞机”。在二、三十年代，欧美许多国家竞相研制飞艇，使飞艇的发展达于巅峰。可是，飞艇毕竟不同于飞机，它不仅需要大马力的发动机，而且有一个充满氢气的气囊作浮力，因此事故频频。“兴登堡”号飞艇的爆炸，最终宣告了飞艇时代的结束。

在飞艇与飞机的竞赛中，是飞艇首先环球飞行成功。

1929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29 日，德国的大型飞艇“齐伯林伯爵”号以美国的莱克哈斯特为起点和终点，完成了航空史上第一次载客环球飞行。这一成功使德国航空工程师、飞艇事业的先驱埃克尼尔备受鼓舞。他决心建造一艘最大的载客飞艇，并以此来建立欧美之间的空中走廊。

1931 年，这艘新飞艇开始设计，并以当时德国总统的名字命名为“兴登堡”号。历时 53 个月，费工 156 万个小时，耗资 360 万美元“兴登堡”号终于在 1936 年 3 月 24 日完工。

这条空中“巨鲸”长 245 米，高 44.8 米，最大直径 41.4 米，总重 195.5 吨，可载重 19 吨。气囊总体积达 20 万立方米，配有 4 台 1100 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巡航速度为 121 公里/小时，可连续不间断飞行 200 个小时。艇内设有旅客包舱、淋浴室、餐厅、休息厅、吸烟室，豪华客厅里还放着一架供旅客演奏消遣的大钢琴，飞艇的货舱很大，足可以容纳汽车和小型飞机。

“兴登堡”号问世不久，德国人便启用它开辟了横越大西洋的德国—美国航线。在 1936 年一年中，它 10 次飞到美国。其中在 10 月份，还特地安排了一次所谓“百万富翁”航班，邀请了几十位美国社会名流，包括美国切斯国立银行总裁埃杰克、汽车大王福伊和全国广播公司副总裁洛埃尔等贵宾。长达 10 小时的飞行给这些大亨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兴登堡”号从此名声大噪。

这时的美国，对发展飞艇的兴趣极其浓厚。

1931 年建成的纽约大厦，还特意在楼顶设有一个飞艇系留塔。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大厦，高 1250 英尺，共有 102 层。在纪念大厦落成而发售的明信片上，画着“齐伯林伯爵”号系留在培顶的景象。一般的飞机只能在市郊机场起落，而飞艇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停系在市中心上空的任何场所。这种特点，正是当时纽约人梦寐以求的乐趣。

1937 年 5 月 3 日，“兴登堡”号飞艇离开德国法兰克福，开始了本年度第一次越洋飞行。它花了 76 个小时，慢悠悠地飞越了大西洋。飞艇内载有 61 名机组人员和 36 名乘客，飞行的目的地是美国的莱克霍斯特。

5 月 6 日下午，飞艇平安地飞临纽约市上空。虽说它并非第一次经过纽约城，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市民仰首观看，停泊在赫德森河上的船只纷纷向它鸣笛致敬。飞艇鱼尾形尾翼上，那令人不快的“卍”字符号从地面上可看得一清二楚。飞艇上的乘客则透过玻璃窗，鸟瞰曼哈顿岛的全景。

飞艇快要着陆了，艇长马克斯·普鲁斯和副艇长恩斯特·列曼为降落作了最后安排。经过漫长旅行的乘客，悠然自得地坐在宽大的游廊式的休息厅里。乘务员在走廊里来回奔忙，正从 25 个舱房里往外搬行李。

当乘客离开休息厅时，都需接受一位乘务员的检查，主要是不准他把吸烟用的火柴带走。由于客舱上方有700万立方英尺的氢气，故此防火措施极其严格，临近气囊的所有设备都覆盖着橡胶，在附近工作的人员均穿着石棉衣服，连发动机也是特制的，不用点火装置起动。

受大西洋逆风和暴风雨的影响，飞艇的速度有所减慢。飞艇抵达莱克霍斯特海军航空港的时间，从原订早晨5点延至下午3点，晚点近10个小时。这可苦透了在机场等候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他们一大早就赶到机场了，现在，一个个都愁眉苦脸，怨声不迭。况且，远离城区，人们无所事事，更觉得枯燥无味。

下午3点12分，“兴登堡”号飞艇终于在莱克霍斯特北面上空出现了。

然而，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乌云滚滚。普鲁斯艇长不禁担心起来，他立刻通知机场：暂缓着陆，请再等2小时。机场控制塔的负责人查尔斯觉得这位艇长未免太谨慎了，但他也深知德国飞艇公司一向注重安全，从不鼓励冒险，所以没有坚持要飞艇马上降落。于是，等在机场的人们眼睁睁地望着飞艇一掠而过，继续朝南飞去了。突然，天空一声炸雷，下起了大雨，人们东奔西跑，纷纷找地方躲雨。

下午6点刚过，查尔斯用无线电通知普鲁斯艇长，天快转晴了。此刻“兴登堡”号已飞临费城南部上空。接到信号后，飞艇马上调头回飞。飞艇内，乘客们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乔治六世在伦敦举行加冕典礼。乘务员们乘机将乘客床铺上的被单统统收起来，为在午夜再次起飞返回德国提前作好准备。

在莱克霍斯特海军机场上，又聚集了1000多人，翘首仰望着夜空。250名地勤人员已各就各位，只等飞艇降落。7点刚过，飞艇飞回机场上空，在空中盘旋。此时倾盆大雨已减弱为毛毛细雨。在查尔斯的导航下，飞艇从500英尺的高度开始徐徐降落。

飞艇上的乘客们纷纷拥在窗口，向下张望，一个个神情愉快，喜笑颜开。他们每人为这次单程飞行花了400美元，但都觉得非常值得。杂技团小丑演员约瑟夫·斯潘德扫视着机场上欢迎的人群，寻找着来接他的妻子和儿女，他们居住在美国长岛。斯潘德是法国人，他经常来往于美国和德国之间参加演出，希特勒当局早就认为他有间谍嫌疑，一直派人盯梢。为防范他在“兴登堡”号上搞破坏，党卫军的特工人员受命跟踪监视他，也乘上了这次航班。

等待已久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们终于抓住了飞艇上抛下来的降落索。此刻，时针指向7点23分。飞艇正式着陆了。这时，飞艇尾部突然颤动了一下，似乎气囊漏掉一些气体。为保持飞艇的平衡，普鲁斯艇长命令放掉1000加仑的尾部压舱水。

由于飞艇驶近停泊塔时速度过快，普鲁斯又命令倒开尾部的两台柴油发动机，没想到发动机在排气时火花飞溅，而酿成了随之而起的悲剧。

在机场现场的新闻记者中，有一位是来自芝加哥WIS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赫伯特·莫理森。他与技术助理查利·尼尔逊一早就赶到这里，搭起了临时播音棚。他们将为“晚餐钟声”专题节目制作飞艇着陆的现场录音。当莫理森手持话筒走出播音棚进行现场报道时，他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播音竟成了世界广播史上最著名的新闻报道之一。

莫理森抬头望去，飞艇似乎一动不动悬浮在离地面一百多英尺的空中，他可以清楚地看见挤在飞艇窗口的乘客在招手致意。海关、移民局和“公共

保健中心”的官员们正陆续赶到现场。德国飞艇公司的美国代表帕特·多灵先生也一早就赶到这里。

当地勤人员将3根降落索固定在系留柱上时，莫理森开始向听众现场播音了：“女士们，先生们！人们盼望已久的飞艇来了，真的到来了！这个空中的庞然大物真是妙不可言！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多么蔚为壮观的场面！在夕阳的辉映下，飞艇就像镶嵌在湛蓝天幕上的一块宝石，熠熠闪光……”

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犹如晴天霹雳划破晴空。“兴登堡”号尾部冒出一团火焰，红白色的火焰迅即覆盖了整个鱼尾形昆部，那令人讨厌的“卍”符号转瞬间被烈焰吞没。

莫理森目睹这可怕的情景，播音的音调骤变：“哎呀！不好，我们的飞艇着火啦！……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简直太可怕了，我的上帝！不好，飞艇上的火烧得更厉害了，它到处都在燃烧，而且还在坠落！……”

“兴登堡”号在爆炸声中断为两截，尾部下坠，腹部和头部却冲向半空，在炽热的空中停留片刻后，又摇摇晃晃地坠落下来，到处都吐着巨大的火舌。

这惨景斯潘德的妻子也看得一清二楚，可一开始她还以为那喷发的火焰是飞艇着陆而燃放的焰火呢。不料紧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所有在现场的人都目瞪口呆。摄影师劳里·肯尼里当时正站在地勤人员中间，事后他心有余悸地回忆道：“爆炸发生后，飞艇就像纸糊的一样，裂成碎片。飘飘洒洒，坠落在我们周围的都是着了火的篷布片。”

普鲁斯艇长开始只感到一阵轻微的震动，他还以为是一根降落索断了，而接下来的爆炸声和人们惊恐的尖叫声使他顿时明白过来。“飞艇失火了！”报务员大声喊叫着。突然，飞艇尾部猛地下坠，顷刻间，人、用具以及所有没有系缚住的东西全都翻滚着，一起倒向尾部。

此刻，莫理森冒着被飞艇坠落的残片砸伤的危险，继续以悲痛语调现场播音：“这太可怕了！这将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灾难之一。飞艇上有那么多人，他们该怎么办呀！……我不忍心再目睹下去了，我、我……听众们，我不得不暂停一下播音，因为我的声音已经嘶哑。这是我生平见到的最悲惨的灾难！”

摄影记者墨利·贝克十分老练沉着。爆炸发生时，他把镜头迅速地对准了飞艇。实际上，他难免也有点紧张，当他摄下灾难发生瞬间的照片后，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连续按动快门，过了好久才清醒过来。然而，他摄下的这一连串照片，却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照片。

7点25分，即飞艇起火后一分多钟，飞艇尾部便撞落到地面。在现场目睹爆炸惨景的人们，很难想象飞艇中会有人侥幸活下来。实际上，有为数不少的人居然逃过了这场灾难。

爆炸刚一发生，有二、三十名很快醒悟过来的机组人员和乘客，立刻从各个舱房里往外跳。可惜当时飞艇离地面尚有七、八十英尺，因此他们多数都跌落在沙滩上丧命。尾翼装配工汉斯·弗兰德是机组人员中幸免于难者之一。当时，他刚把降落索从飞艇腹部扔向地面，就突然被大火围困了，而接着的爆炸又将他震昏，可他却下意识地抓住降落索滑落地面，结果幸运地得救了。

服装商菲利普·曼戈恩一下子被甩到了舱板上，他尽力爬了起来，试图打开一扇窗户，可怎么也打不开。他搬起一把椅子，硬是将窗子砸开，钻过

去纵身跳了下来。紧接着燃烧着的飞艇残骸纷纷掉落他的身边，挡住他的逃路，他急中生智，在沙地上挖了个洞，从残骸底下爬了出去。

飞艇的机械师尤格恩·史切伯尔爆炸时正在尾翼的一个吊舱内工作，他还未明白怎么回事，就被震落的硬物砸昏。几分钟后，他苏醒过来，却发现自己已在地面上，竟奇迹般地没受什么伤。

有一个名叫伦纳德·艾德特的乘客，他乘坐飞艇的目的，是为写一本有关飞艇的书收集素材。第一声爆炸传来，他还毫不在意，直到16个气囊一个接一个地爆炸，大火蔓延到他的舱房门口时，他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他一把拖住妻子，一起爬上窗台，跳了下去。结果，夫妻俩都幸存下来。

一位名叫麦瑟尔德的乘客，一家都在飞艇上，出事时她大声呼叫丈夫，但丈夫却不知去向。她意识到只有自己去救她的3个儿女了。她把儿女一个个抱到窗前，先奋力举起10岁的女儿，可女儿太重了，她只好放下。接着她抱起两个儿子，竭尽全力把他们塞出窗口。两个小孩子得救了，她也在两名机组人员的帮助下，脱离了险境。而她的丈夫和女儿始终没有救出来，被大火活活地烧死了。

杂技团小丑斯潘德好不容易从舱内爬到舱外，毅然从离地面约40英尺的高度跳了下来。跳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尽快离开此地，因为不时有飞艇的残骸飞落地面，在他周围着火燃烧。他艰难地匍匐爬行，终于逃离险境。

当飞艇的头部摇摇晃晃地向地面坠落时，美国总统格兰特的后代、63岁的乔治·格兰特异常冷静地站在窗前，直至快逼近地面时，才奋力一跃，跳离飞艇，结果仅受了些轻伤。

然而，并非所有的乘客都能做出理智的反应。有一位退休的德国商人，他一边绝望地喊着“完了，完了”，一边像没头苍蝇一样跑进了大火熊熊的过道。另有一些人则不知所措，在舱内东奔西窜，到处寻找自己的家人。船王约翰·潘尼斯在寻找妻子时被大火吞没，他的妻子也葬身火海。

艇长普鲁斯和副艇长列曼是最后一批跳离飞艇的。当时，飞艇头部向地面坠落的速度已经加快。他们二人从飞艇腹部的窗口跳下，衣服和头发都在燃烧，就像是两只从天而降的火鸟。他们着地后，又不顾自己的伤痛，多次来回帮助营救乘客和机组同事，他们由于烧伤严重，最终被人抬上救护车，送进医院。

飞艇残骸轰然落地后，上面的幸存者都争先恐后地往外冲，他们或跑或爬，或由他人背着搀着。许多人被严重烧伤，浑身一片焦黑。

营救人员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敬佩。几十名地勤人员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冒着烈火冲进“兴登堡”号残骸，从中搜寻尚未离去的幸存者。他们在火势较弱的控制舱内找到一些无力逃离的老弱乘客。其中一名年老乘客，全身无一块好皮肤，只是从他微弱的呼吸里，营救者才知道他还活着。这些人即刻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

爆炸发生后仅几分钟，大批消防人员和医务人员就火速赶到现场。在机场还临时设立了医疗室。机场的停车库则成了临时停尸所。到晚上10点45分，“兴登堡”号遇难的人数统计出来了：死亡34人。加上后来在医院去世的普鲁斯艇长和列曼副艇长，共36人。在如此大的空难中，艇中的97人，约有三分之二的人生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这主要是因为失事时飞艇离地面不很高，而艇舱并没有直接硬撞到地面。这大概与庞大的艇架和气囊很自然地起到降落伞和缓冲器的作用下无关系。

“兴登堡”号飞艇失事的新闻震动了全世界。这次惨剧的全部照片和众多目击者的叙述，使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飞艇事故。莫理森的现场录音报道在次日下午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出。在以后的几天中，美国各大影剧院又放映了有关的新闻纪录片，令观众们看得惊心动魄，毛骨悚然。

出事当天，人们就在乱七八糟的飞艇残骸和碎片中着手调查事故的原因。有一支鲁格尔手枪引起人们种种猜测。因为它显然发射过一发子弹，但谁也无法断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久，美国和德国都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美国方面认为，飞艇的起火爆炸，很可能是当时暴风雨所产生的球形闪电所引发的。德国方面则认为，飞艇尾部的抗剪力钢丝将尾部气囊划破，致使氢气外漏；又由于飞艇是在雷云区盘旋几个小时后才着落，艇体带有静电，而被雨淋湿的降落索与地面接触后便产生电火花，使外漏的氢气点燃爆炸。

双方的调查都基本排除了人为破坏这一点，这也许是考虑到免得使德国政府尴尬。但很多人都认为，是混在乘客或机组人员中的反纳粹分子在飞艇上放置了炸弹。

有不少人认为，假若飞艇使用的是氦气而不是氢气，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惨剧了。据说，“兴登堡”号飞艇的副艇长列曼在医院弥留时，嘴里一直在嘟囔着：“氦！氦！”然而，当时氦的主要生产国是美国。美国担心德国把飞艇用于军事目的，坚决拒绝出口氦气。因而从历史角度看，可以说是德国法西斯希特勒葬送了“兴登堡”号的光明前途。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兴登堡”号这一希特勒自鸣得意的空中巨物，终于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这无疑对德国法西斯是一沉重打击。

就在“兴登堡”号失事的时候，另一艘巨大的德国飞艇“齐柏林伯爵”号正从巴西飞往美国。艇长从无线电广播里获悉了“兴登堡”号失事，但他没把这一消息告诉乘客，以免引起恐慌。这次飞行成了“齐柏林伯爵”号飞艇最后一次载客飞行，从此它就退出航空舞台，仅供人们参观了。“兴登堡”号飞艇的爆炸，标志着飞艇作为一种空中公共运输工具的时代的结束。人们对飞艇从此失去了兴趣与希望，尽管它在舒适性方面远胜于飞机。此后，空中运输逐渐为飞机所取代。

（陈继忠）

亨利四世卡诺莎之行

正是隆冬季节，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显得比往日更加寒冷。刺骨的寒风在高空呼啸着，鹅毛般的雪花纷乱地飘落在坚硬的冰地上。

在这连野兽也不愿出来觅食的日子里，却有十几个骑马的个，在艰难地翻越这座欧洲最高的山脉。那些马儿都张大了鼻孔，马蹄铁上沾满了白沫和冰雪，两肋不停地起伏着。显然，它们已经行走了很长的路程。

骑在一匹高大的白色骏马上的，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尽管天气这么恶劣，他却不住地脱下皮帽，任凭风雪朝自己头上袭来。这青年人就是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

亨利四世的侍从劝阻道：“陛下，这样要冻伤你的鼻子和耳朵的。”

亨利四世光着头，沉着脸说：“你们别再罗唆了。要是我能。抵住阿尔卑斯山的风雪，那么我就能在卡诺莎城堡教皇宅第门前光着头站上一一年！”

1056年，亨利四世即位时，才不过六岁。那时，天主教主教的授职权，实际上操纵在国王手里，罗马教廷对此一直不满。后来，教廷乘国王年幼无知，便提出教会独立，反对主教由国王授权，借以削弱国王的权力。1073年，新当选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敕令中明确提出：教皇的权力高于一切，不仅有权任免主教，而且可以废除君主，审判和惩罚国王，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审判教皇。这时亨利四世已经23岁了，他当然不能忍受教皇对他权力的限制，于是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1075年，亨利四世不顾教皇敕令，委派了许多空缺的主教。教皇得知后，写信威胁亨利四世，要他立即忏悔，并且向他作出书面报告。亨利四世不服，于1076年1月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教皇。一个月后，教皇也在一次宗教会议上宣布：剥夺亨利四世的国王权力，并将他开除出教。

教皇这一处置，对亨利四世构成了严重威胁。蓄意反对亨利四世的公侯和高级教士，于1076年10月作出决议：亨利四世应暂时放弃国王权力，宣布效忠教皇，并必须在一年之内获得教皇的赦罪令，否则废黜王位。同时定于次年2月，在德意志中部的奥格斯堡举行会议，请教皇出席，同时裁判亨利四世。

在这种情况下，亨利四世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被迫签署了服从教皇权力的保证书，表示愿意对自己的严重罪行作忏悔。不久他又获悉，教皇已从罗马启程北上，到达了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卡诺莎城堡，等候德意志公侯派来迎护的军队，前去参加裁判他的会议。亨利四世意识到，这一次非当面向教皇屈服不可啦，因此，他脱下王冠御袍，换上普通服装，只带少数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南下，赶到卡诺莎城堡，准备当面向教皇乞求赦免他的罪行。

1077年1月下旬，亨利四世一行赶到了卡诺莎城堡。在进入城堡之前，他跳下马来，脱下御寒的皮帽和靴子，把一条忏悔罪人用的毡毯披在身上，冒着风雪，缓步走进城堡，来到教皇的府第门前。

当时，罗马教会对逐出教会或违反教规的人，允许他们举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忏悔仪式，来赎取自己的罪过。其时间有长达几年的。比如，有的赤脚露头，在教堂门前向所有进入教堂的人恳切哀求，请他们代为祈祷；有的用木杖打自己或由忏悔师来打，以3000杖抵一年的忏悔；有的赴圣地朝拜，或捐纳巨款等等，一直到教会满意他的忏悔为止。亨利四世为了表示自己真诚忏悔，直接来向教皇哀求。

第一天过去了，尽管亨利四世整天站在雪地里痛哭流涕，哀求教皇赦免他的罪过，可是连教皇的影子也没见到。第二天、第三天也是这样。直到第四天，有许多教士被他的真诚忏悔所感动，一再为他向教皇去乞求，教皇才勉强传见他。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这年 57 岁，是个意志坚强、手段毒辣的人。当选教皇前的 25 年中，他一直在罗马教廷中供职，对教廷事务非常熟悉，权欲极强。一见到俯伏在他面前的亨利四世，教皇眼里就闪烁着怒火。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说：“我已经以上帝的名义革除你的教籍，剥夺你的国王权力，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亨利四世噙着泪水，诚惶诚恐地说：“教皇陛下，我的主人，我已经认识了您的罪过，这次特来向您忏悔，祈求您对我的宽恕和慈爱。”

教皇冷笑一声，说：“啊？教皇？哼，你不是写信给我，说我现在不是教皇，而是假僧侣吗？你不是命令我滚下来，接受万古的咒骂吗？”

亨利四世连忙说：“不，不，我已经撤消了冒犯您的法令，并且写了服从您权力的保证书。这两个文件已经发布出去啦。”说着从怀中拿出几张纸，双手递给教皇。

教皇早已知道了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他没有伸手去接，而是沉着脸继续说道：“上帝是非常忍耐和宽容的。我们曾经期待，随着你年龄和知识的日益增长，你终于能遵奉上帝的诫命。我也曾经用父亲般的慈爱警告过你，希望你今后不要滥用上帝给你的尊荣和权力，来阻碍教会的自由。可是你不仅不感谢上帝的恩典，反而固执己见，不肯返回到你所遗弃的上帝面前来，而且一再分裂教会。为此，我不得不遵照上帝的意志，对你进行惩罚。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亨利四世听了教皇的严厉训斥，只是伏在地上痛哭，不敢再辩解。

在教皇身边的红衣主教，以及随同亨利四世前来的大主教和贵族，这时纷纷代国王乞求教皇赦免罪过。最后，教皇终于松下口气说：“看来，你的痛悔是真诚的。我已经说过，上帝是永远忍耐和宽恕的。为了他的慈爱，我将松开驱逐你出教的锁链，让你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中来。但是，我不能立即恢复你国王的权力。你必须在上帝面前立下誓词，并且由在场人员作出保证。”

教皇挥了一下手，亨利四世马上起立，谢过教皇的恩典，当场写了一份誓词，表示愿意遵照教皇的意旨，改正以前的过错。主教们随即在誓词上签名作证。

教皇又招了一下手，把他的红衣主教叫到面前说：“马上起草一份文件，叙述亨利四世在这里忏悔的经过，并且附上他的誓词。这份誓词要迅速发给德意志王国的所有公侯！”

亨利四世获得教皇赦免后，带了随从离开卡诺莎城堡。后来，“卡诺莎之行”，便成为屈辱投降的同义词。

但是，国王跟教皇之间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亨利四世在卡诺莎的屈辱，并没有给他带来权力和安宁。当他回到德意志的时候，反对他的公侯们宣布他已被废黜，并且选出一个新的国上来代替他。新国王立即派专使去谒见教皇，表示要在各方面服从他的指导，甚至愿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那里作为人质。

亨利四世得悉后，一方面调动忠于他的军队讨伐新国王，一方面请求教皇协助他反对新国王。后来，教皇借口亨利四世不听从他的命令，继续采取

军事行动，因而于 1080 年 3 月第二次下令对亨利四世革职革教。这一回，亨利四世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军事力量，不再向教皇屈膝投降。他于同年 6 月，唆使支持他的宗教会议相应通过决议，第二次废黜教皇；10 月中旬，又在一次战役中彻底击败了新国王。从此，亨利四世权势大增，教皇反而失势，处境不妙。

不久，亨利四世率军进攻意大利，以报曾经屈辱于罗马教皇之仇。虽然教皇得到意大利南部酋长的援救，但亨利四世兵多势众，终于在 1084 年 3 月攻陷罗马，随即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教皇仓皇南逃，于 1085 年死于意大利南部。1106 年，亨利四世也死去了。但是这场权力之争还是没有结束。

直到 1122 年，双方的继承者才在德意志西部的沃尔姆斯城，订立了一个宗教协定。双方同意，德意志境内的主教不再由皇帝直接任命，而由教士选举产生，但这种选举必须在皇帝或他的代表监督下进行。主教在领地上的政治权力由皇帝授予，宗教权力也由皇帝授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至此，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之间长达 40 多年的权力斗争，才暂时告一段落。

（贺文沙）

鸦片引起的战争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因为鸦片贸易而引起的战争，史书上称它为“鸦片战争”。

中国古代，是把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用量十分微小。到17世纪初，台湾有人开始把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作镇痛药使用，由于长期服用这种镇痛药，有的人就成了瘾，再也离不开鸦片了。后来，这种镇痛药也传到了东南沿海一带，不过，总的来说，当时服食鸦片的人是非常少的。

鸦片在中国大肆泛滥，完全是因为英国有意地向中国倾销鸦片。英国这样做，是为了用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白银、茶叶和其它商品。

世人皆知，茶叶本是中国的特产。16世纪初，西方的海员和传教士把茶传到欧洲，最初是在药店当作贵重药品出售的；然而饮茶习惯却很快普及开来，特别是在英国，到19世纪初，饮茶已成为英国人普遍的习惯，茶的需要量急剧上升。

可是，当时英国人却没有合适的商品同中国交换茶叶。虽然英国的羊毛织品可以大量出口，但中国人却不习惯穿这种衣服：至于钟表和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只有皇帝、官僚和大富翁才会使用，所以需要量也不大。因此，英国不得不用大量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茶叶。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财富不断增加，而英国财富却减少了。

中国的清政府对此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他们一向认为，中国物产丰富，没有什么需要求助于洋人的；不过为了照顾洋人，才赏一点东西给他们。然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却对这种资金大量外流感到了威胁。他们要想办法把流入中国的白银再挖回去！

英国人找到的是一种毒品——鸦片。

特别是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量种植鸦片后，向中国输出的鸦片，开始成百倍地增长，从乾隆年间的每年二百箱，发展到嘉庆年间的三四千箱。道光五年（1825年），已达到九千多箱，道光九年（1829年）达一万四千多箱，道光十三年（1833年）超过二万箱，道光十八年（1838年）高达二万八千多箱！如果再加上其它西方国家倾销的鸦片，总数大约在四万箱以上！

当时，鸦片一般都装在一个像垒球大小的球体中，球体的外壳是用下等鸦片汁熬成的，一种像硬橡胶样的物质。每个球体重3斤，一箱装40个鸦片球，即120斤，售价是七八百银元。这样，道光十八年，中国为购买鸦片付出的银元，高达二千万以上。那时，中国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出口茶叶收入约二千万；进口商品主要是棉花，每年进口棉花支出约一千万。如果再支付二千万的鸦片款，则中国每年的银元外流就高达一千万以上！

更为严重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吸上鸦片，就难以戒除：吸食的结果是麻痹人的神经，使人的体质越来越弱。据估计，当时四亿中国人中，吸鸦片烟的至少有百分之一；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更高于这个比例！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变成一个鸦片烟鬼的国家，再没有人种田、做工、打仗……

中华民族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反对英国对中国倾销鸦片的罪恶行径。许多人向皇帝上书，要求禁止鸦片贸易，严禁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对国内贩

卖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对吸鸦片的人处以流放的惩罚。

中国政府对于鸦片，一直是严格禁止的。清朝的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多次发布过严惩鸦片交易和吸食鸦片的命令。然而，好像是对这些禁令的嘲弄，鸦片涌入中国的数量却有增无减！这其中的奥秘，在于鸦片并不通过正常渠道买卖，完全是一种走私活动；而腐败的清朝地方官员、缉私人员，在收受贿赂后，对这种走私活动居然给予保护！

当时，中国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只允许在广州一个城市，同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在广州城西约 200 米的西关一带，修建了一个外国人居住区，这里有十二座西洋式建筑物，中国人称为“夷馆”，实际上是各国的商行。其中最大的商行是英国的查顿·马地臣商行和颠地洋行。除了美国的一家商行外，所有的商行都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它们不敢公开地把鸦片弄到店堂里卖，因为那样随时可能被查获没收，商人也会遭到驱逐。西方商人想出的办法，是建造一种“趸船”，作为海上仓库，专门存放鸦片。这种怪模怪样的船长年停泊在香港和虎门之间的伶仃岛附近。在洋行里买卖的则是提货单。买下提货单的走私商人，必须自己到“趸船”上去提货。为了不让清政府的巡逻船抓住，他们专门雇佣一种“快鞋船”，这种船挂着三张帆，左右有 50 支划桨，船员有 100 人，船侧张着铁丝网，用来防御炮火。这种船速度非常快，据说“来往如飞”。不过，真正让巡逻船追不上“快鞋船”的，还是走私商人的贿赂，他们同缉私官员约定，提交走私鸦片的百分之二给缉私官员。这些官员把一半揣入自己腰包，另一半上缴作为自己缉私功绩！

在这种腐败的制度下，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狂。道光年间，鸦片商人为了获取更大利润，竟然收买官员向皇帝上书，要求不再禁止鸦片贸易，让他们的罪恶勾当能公开化、合法化。

这种论调当即引起了正直官员们的批驳。一位叫黄爵滋的鸿胪寺卿，也就是掌管朝廷典礼机构的长官，他的奏文写得最好，不但列举了鸦片贸易的种种危害，而且提出了果断、具体的措施，要求把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死刑。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人敢吸，自然不会有人再卖，外国人的鸦片自然不会再流入中国，中国的白银也就不会再流向国外。

道光皇帝被这篇奏文打动了，命人把它抄写了多份，分送给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征求他们的意见，打算把提出意见最好的人派往广东，作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烟工作。

然而，在全国二十多位总督、巡抚、将军中，完全赞同黄爵滋意见的只有四个人，即：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河南巡抚桂良。其它人虽然也表示应该严禁鸦片，但认为对吸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太过分了。

道光皇帝选中湖广总督林则徐担当禁绝鸦片的大任。

这一回，道光皇帝是发了狠心的。他亲自处分了一批吸鸦片的皇亲国戚，并且严令各省切实惩办鸦片犯人。地方长官慌忙开始抓捕鸦片犯。那时吸鸦片是半公开的，抓起来并不困难；于是地方官正好又营私舞弊，只把没有后台又无钱行贿的人抓来交差，真正的鸦片“大户”却逃脱了惩治。

道光十八年（1838 年）11 月 10 日，林则徐到达北京郊外长辛店，第二天就参见皇帝。皇帝特许他坐在毡垫上，同他讨论了一个半小时。次日，皇帝又召见林则徐，两人讨论一个小时。11 月 14 日，皇帝宣布特许林则徐在紫禁城中骑马，这是十分难得的恩宠，由此可见皇帝对林则徐的信任程度。

一连八天，皇帝天天召见林则徐，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两人交谈的结果，使道光皇帝十分振奋。他对自己选中林则徐这一点十分得意。最后，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并要求广东的海军也归林则徐指挥。

11月23日，林则徐离开北京去广州。但是，他并没有被皇帝的特别恩宠冲昏头脑，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前途是十分艰难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朝廷重臣，对严禁鸦片的冷淡态度，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在给好朋友龚自珍的信中，林则徐含蓄地透露了一点信息。

同时，他也知道，广州的官员大多同鸦片走私有牵连，他去广州，很可能会孤立甚至遭到谋害；再说，英国人武器精良、兵船坚固，也不是好对付的……

但是林则徐决心为严禁鸦片作一次拼搏。

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正月，林则徐到达江西境内，便派信使向广东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重要命令，要他们立即逮捕一批走私鸦片的罪犯。尽管列入逮捕名单中的17人大多是下级官吏和士兵，但逮捕活动显然造成了很大影响，达到了林则徐先声夺人的目的。

半个月后，林则徐到达广州，住在越华书院里。越华书院是主张禁烟的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林则徐在这里接触了許多人，听取了许多重要意见。九天以后，林则徐发布了两道命令。一道是给中国买办公行的，限他们在三天之内，通知督促外国商人出具汉文、外文保证书各一份，表示从今以后永不走私鸦片，否则人犯处死刑，货物没收；如果办不到，则证明这些中国买办一贯与洋人串通，将从中挑出罪行最严重的处死并没收财产。另一道是给外国商人的，谴责他们把本国不吸食的鸦片大量走私到中国来，“骗人财而害人命”；并通知他们，清政府已决心根除鸦片，凡贩卖鸦片，开烟馆以至吸鸦片的人，都要处以死刑；同时要求他们交出趸船上的全部鸦片。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由此点燃。战争的危机一步步迫近。

当时，中国和西方各国，没有外交关系。因为清政府认为，只有中国是“天朝”，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同中国平起平坐，所以当然不能有平等的外交关系。这样，清政府也就无法直接同外国人打交道，它的办法是一切通过买办公行，由当时的公行总商伍绍荣去同外国商人打交道。这种不正常状态，在平时做生意，公行由于可以垄断对外贸易，大有好处；但碰上这种外交纠纷，要去充当使节，命令外国商人交出全部鸦片，并且保证永不走私鸦片，这样的重任，对实际上没有外交使节职权的公行，就大伤脑筋了。

外国商人把林则徐的要求，当成索取贿赂的手段，根本不予理睬。三天的限期过去了。伍绍荣没拿到一份保证书；但是洋人们决定给钦差大臣一点“面子”，于是同意交出1037箱鸦片，企图蒙混过关。

林则徐不吃这一套，下令逮捕最大的两个英国商人查顿和颠地，因为他们多年来大规模地进行鸦片走私活动。可是查顿已在五天前回英国去了，逮捕的目标便只剩下了颠地。逮捕令当然也是下达给公行的，然而公行却不敢照样向外商传达，他们将逮捕令改头换面，说成是钦差大臣招颠地进广州城。外商方面认为颠地进城会有危险，拒绝了这个命令。

当时英国驻中国的商务监督是海军大校义律。他本来住在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澳门，这时匆匆赶到广州“夷馆”。义律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公行，表示他可以陪颠地一起进广州。但要林则徐出具正式文书，保证他们二人不受隔离。

消息传到林则徐那里，却促使林则徐采取了下一个步骤。他本已打算派兵围困“夷馆”，只因义律这个外商首脑不在夷馆内。才延缓了几天。于是，他当即下令，派了千余名士兵包围“夷馆”；对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商商船实行“封舱”，禁止他们装卸货物；不许他们雇佣中国工匠、船员，不许他们租用中国船只和房屋，“夷馆”中的买办和雇佣人员要全部撤出……

“夷馆”中的存粮和储水都很少。48小时之后，义律屈服了。他保证交出英国商人所有的鸦片，共二万多箱，按销售价格计算约值一千五百万银元。林则徐每收到一箱鸦片，便给予五斤茶叶作为嘉奖；共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这批鸦片完全接收过来。

根据道光皇帝的命令，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上销毁这一大批鸦片。

林则徐研究过鸦片的性质，知道用火烧的办法，还不能彻底销毁鸦片，熔化的鸦片会渗入土中，把土挖起来熬，还可以再制成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鸦片。最能破坏鸦片成份的是盐和石灰。所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稍高的地方，挖了两个五十米见方的池子，四周钉上木板，池底铺上石块，以防鸦片渗漏；然后引进海水，把鸦片球切成四半，扔进海水池中浸泡半天后，再加进生石灰；石灰溶于水时会产生大量热量，把池中的水都煮得沸腾了；许多民夫站在池边和跳板上，用长木棒搅和，使鸦片完全溶解；到海水退潮的时候，再把溶解分化的鸦片水放进海中。这样一直用二十天时间，才把二万多箱鸦片全部销毁。

林则徐和广东的高级官员，每天都到海滩上去监督，以防有人从中捣鬼。

这时，义律和英国商人为了表示他们的抗议，全部退出广州，好像要同中国断绝贸易往来。但是美国和其它外国商人拒绝参加英国人的抗议活动，所以许多英国商人暗地里还在通过别国商人同中国做生意。而且，中国根本没有注意到英国商人的这种抗议表示，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提倡自给自足，一向不重视商业；按照皇帝的意思，同外国人做生意本是“照顾”外国人的，英国人来不来做生意，并不放在心上。

严重的危机来自清政府内部。尽管道光皇帝积极主张禁烟，但不少大臣却用各种方法软磨硬抗，破坏禁烟，反对对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其实林则徐并没有说立刻把吸食鸦片的人都处死，而是给他们一个戒烟改过的期限，过了期限仍不改悔的人才处死，实际上是以死刑威逼吸鸦片的人尽快戒烟。直隶总督琦善却向皇帝提意见，故意夸大其词，说吸鸦片的人至少有几十万，一起杀掉，势必引起他们反抗和暴乱，甚至会导致清政府的倒台。在制定具体的“禁烟章程”时，他们把禁烟完全交给官府去办；其结果，腐败的官府往往把严格的禁令变成一纸空文；何况有的官员自己就是鸦片鬼！

广州的形势却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鸦片虽已销毁，但义律禁止英国商人在永不走私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道光十九年（1839年）5月27日，五个英国水手在一个叫尖沙嘴的渔村酗酒，然后抢劫了一所庙宇，并且杀害了一位叫林维喜的中国村民。

林则徐当即要求在澳门的义律交出杀人凶手。义律却借口不知道谁是杀人凶手，拒绝了林则徐的要求。林则徐当即指出，事件发生后，义律曾两次到尖沙嘴查讯，如果还不知道凶手是谁，那么这个义律就连木偶都不如了，还当什么官？如果查出犯人而不处理，是包庇罪犯，也就犯了同罪犯一样的罪！面对义律的蛮横态度，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禁止向澳门的英国人提供食物，并命令中国的买办和民夫退出英国商馆。当时的澳门，虽然有葡萄牙

派驻的总督，但也还有清政府派驻的地方官，所以林则徐的命令得到有效的执行。五十天后，义律和英国商人不得不撤出澳门，住到商船上。义律再一次用信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五小时后，英国军舰“窝拉宜”号及武装的英国商船朝中国海军在九龙的兵船开火，打死中国士兵二人。在中国海军的还击中，英军有四人负伤。

到这时为止，林则徐仍然表示，只要英国商人签署不走私鸦片的保证书，并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他们随时可以回到广州做生意。新从孟买运棉花来广州的英国商船“汤姆士·葛”号偷偷地在保证书上签字后，就顺利地进入广州，卖掉了所载的棉花，买到了所需的货物。但是，当运大米来的英国商船“罗伊娅·撒克逊”号也打算这样做时，却遭到义律的阻挠。

道光十九年11月3日，英国军舰“窝拉宜”号和“海阿新”号在川鼻海面与中国海军发生激烈战斗。中国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督战，经过两小时的恶战，英舰“窝拉宜”号受伤退走。但中国海军参战的29只兵船几乎全部受伤。

鸦片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

第二天，英国武装船队又向中国官涌要塞开炮，此后接连袭击中国的炮台、要塞，但大规模的海战没有再发生。义律在等待援军。林则徐也在巩固充实沿海的要塞、炮台和兵船。

在他们的背后，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皇的态度也都非常强硬。都希望通过战争达到自己的目的。

1840年2月，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向中国派兵。清道光二十年正月，又有16艘军舰和武装商船先后开到中国海面。

英国人采用了一个狡猾的战略。他们知道，林则徐已把广东的防务搞得比沿海任何地方都要坚固，所以英国军舰只对广州进行军事封锁，主力却继续北上，攻击中国沿海其它港口。

道光二十年6月，英国舰队到达浙江定海，勒令定海炮台的中国守军在6月6日前投降。尽管定海炮台装备陈旧，战斗准备极不充分，二千名守军几乎是赤手空拳，但中国官兵誓死不投降。结果，定海总兵张朝发受伤后死去，知县姚怀祥在定海失守后投水自杀。

英国舰队继续北上，向天津进发。舰队的总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乔治·义律少将，是商务监督官义律大校的堂兄。这支舰队一到天津附近的海面，就在北京城里引起了极大恐慌。道光皇帝和文武百官，本来以为鸦片问题只是广东的事情，没想到竟闹到自己眼皮底下来了！

天津属直隶管辖，而直隶总督琦善和军机大臣穆彰阿正是朝中保守派的头目，他们对林则徐的禁烟一向持反对态度。现在，琦善不得不去同英国侵略者打交道了。

英国方面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信中要求赔偿林则徐在广东没收、销毁的鸦片价款；对英国商务监督官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侮辱他的行为；指定沿海若干岛屿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经商的场所；偿还中国公行欠英国商人的全部债务，如此等等。

琦善一味推托，说：“这是在广东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广东谈判吧！”最后双方终于商定，把谈判的地点改到广东。

道光皇帝改变了原来的强硬立场，转而斥责林则徐禁烟“办理不善”，将他免职。

琦善成为广东中英谈判的中方代表。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一到广东，就把林则徐过去所采取的措施全部推翻。他解散了林则徐和关天培苦心组织起来的海军志愿兵，还彻底清除了漂浮在水面上阻碍英国军舰进攻用的船笊。他把大部份军队撤退到广州城附近，留在虎门等要塞的军队仅剩二千人。然而不管琦善怎么讨好英国人，英国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仍然十分苛刻，实际上要求中国无条件投降。除了提出开放天津以外，又要求在福建、浙江、江苏，直隶等省，为英国人开放六处以上的贸易商港，并要求割让领土。

这些条件，连琦善都不敢轻易答应，尤其是割让领土一条，琦善居然为英国人谋划，提出可“暗割”，而不要“明割”实质上是割让，但不要写在正式条约上，这样就可以瞒住皇帝而获得批准。然而英国人不领他的情，坚持要正式写入条约文件。琦善都不敢把英国人的蛮横要求全部如实地向皇帝汇报，他含糊糊糊地向皇帝报告，说英国人要求在广州之外，再开放福州、厦门两个通商口岸；并说英国人曾要求割让香港，已被他拒绝。

这时，英国舰队已离开天津，返回广东沿海。道光皇帝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就连琦善报告上来的条件，都感到大为愤怒，他大笔一挥，批了八个字：“愤恨已极，无可再谕”。意思是像英国这样的“蛮夷”，竟提出如此让人愤恨已极的条件，简直没办法再教导他们了！

谈判至此破裂。

道光二十年（1840年）12月5日，英军以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为借口，突然发起军事攻击，目标是虎门要塞第一关口水道的两个阵地：东边的沙角和西边的大角岛。由于岛上原有的二千守军，被琦善削减为六百人，根本抵挡不住英军的炮火和近一千五百人的登陆军队的猛攻，两处阵地先后失守，沙角指挥官陈连升副将阵亡，阵亡的官兵近三百人！

琦善慌了手脚，连忙在口头上全部接受英国方面提出的条件。英军这才停止了进攻。然而条约的正式签字，必须报经皇帝批准。琦善当然知道皇帝不会批准，于是一再拖延正式签约的时间。英军决定再次施加军事压力，向水师提督关天培所在的靖远炮台发动进攻。同样由于琦善的削减，靖远炮台的守军只剩下二百人。关天培亲自督战，在战斗中，关天培曾向琦善求援，然而琦善置之不理，最后，关天培以身殉职。

但是，琦善私下答应英国方面条件的事，终于被皇帝发现。道光皇帝大怒，又将琦善撤职，改派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和杨芳到广州来处理善后事宜。

杨芳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将，20年前就担任过直隶总督。然而他对现代科学一窍不通，听说英军的炮击十分准确，他就认定英军中有会使妖术的人，而破除“外夷妖术”的法宝是妇女的尿桶，只要将尿桶正冲着敌舰就行了。所以杨芳到达广州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妇女的尿桶，越多越好。在这样的将军指挥下，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5月24日，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英军选中这一天再次发动进攻，在广州登陆，占领了城西的外国人居住区。

广州城危在旦夕。

奕山慌忙派出代表，与英军签订了“广东和约”，宣布无条件投降，四万多清军不战就退出广州，并且付给英军六百万两“赎城费”，以换取英军不进攻广州的保证！然而奕山在向皇帝汇报时，却谎称因为广东天气炎热，士兵病倒甚多，才移驻广州城十里外的白云山，以便居高临下控制广州……

登陆的英军到处烧杀抢掠，残害中国百姓。清军不战而退，更激怒了
中国百姓。广州三元里的二万名居民挺身而出，打起了“平英团”的大旗。他们
用锄头、铁锹、木棍为武器，奋不顾身地包围了一千多英军。恰巧当时天下
暴雨，英军的火药枪被淋湿后无法击发，所以冲不出重围。义律忙向广州
知府告急。广州知府余保纯竭力劝中国百姓放走被包围的英军。劝说无效后，
无耻的余保纯居然威胁“平英团”说，如果不放走英军，六百万元的“赎城
费”将由三元里的百姓负担！结果“平英团”被迫放走被围困的英军。

正在这时，英国方面又发生了变化。英政府还嫌义律不够强硬，改派了
亨利·璞鼎查为特命全权大使，来代替义律。

亨利·璞鼎查一到广州，就命令英军舰队再次北上，占领舟山群岛。于
是厦门、定海、镇海等地相继失陷。五月初，英军攻陷长江口的吴淞要塞，
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上海守军在两江总督牛鉴率领下仓皇逃走。英国舰队
溯长江而上，六月初又攻占镇江，进逼南京。

北京的清朝君臣再次陷入慌乱之中。道光皇帝的强硬立场彻底崩溃，匆
匆派伊里布到南京与英军议和。英军提出的条件，皇帝也一概应允。道光二
十二年（1842年）8月29日，中国和英国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
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
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保证偿付没收的鸦片价款600万元、公行负债300万
元和英军远征费用1200万元，合计2100万元；在广州已交付的600万元还
不计算在内。

历时两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从此，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薛兵）

圣雄甘地之死

在印度，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被誉为国父和圣雄，他是印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1947年8月15日，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当时的印度处于一种分裂的局面：一块是印度教统治的广大国土，另一块是穆斯林统治的巴基斯坦次大陆，历来宗教战争不断。穆斯林无端屠杀印度教徒，而印度教徒又反过来毁灭了一个又一个穆斯林村庄。在城市里，异教居民也是相互仇视，宗教狂热分子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横施暴虐，光天化日之下滥杀无辜，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失去生活根基，贫困和饥饿迫使他们毫无指望地在全国各地流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6年11月，甘地为谋求民族和解，冒着生命危险到宗教冲突严重的孟加拉东部游说，呼吁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们握手言欢。“爱你的敌人吧！”他向所有的人这样说。他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步行数英里，到农村访问伊斯兰教徒的家，恳求他们与他做朋友；

可是，伊斯兰教徒们却不大理睬这个异教徒，经常向他投以白眼，长期的宗教仇恨太深了。七十八岁高龄的圣雄甘地并不灰心，仍旧挨门挨户访问。他认为，这不仅是为了单纯的政治说教，也是一个宽容的印度教徒应尽的义务。他很少穿鞋，通常都是赤脚走路。有时，伊斯兰教徒们在路上撒下许多碎玻璃片和荆棘，给他制造麻烦。但为了调解两大派之间的矛盾，他仍坚持干下去。

陪同他游说的共有五个人，圣雄甘地让他们到偏僻的部落中住下，尽量接触当地居民。那些地方的生活条件都是非常艰苦的。有一次，一位叫皮亚雷拉尔的妇女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要求回到甘地身边，甘地却不同意，他叫别人转告她：“得了病，要么在那里治好，要么就死在那里。”皮亚雷拉尔流着眼泪接受了。当地伊斯兰教村民也不忍心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这么死去，他们找来草药给她治疗。皮亚雷拉尔后来居然转危为安，痊愈了。

还有一位崇拜甘地的伊斯兰教姑娘，为了劝说自己的同伴消除对印度教徒的仇恨，竟采取了绝食行动。这都是受了甘地精神力量的感召，对缓解宗教矛盾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7年6月15日，印度国民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印巴分治方案，大势所趋，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这个决议也使甘地统一印度的梦想破灭了，他无限感慨地说：“我已经失去活到一百二十五岁的希望，在印度已经没有我的家了。”于是，他又到两大派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去游说，甚至连8月15日的独立盛典也没有参加。

8月31日晚，他正在加尔各答寓所睡觉，一群疯狂的印度教徒抬着被伊斯兰教徒杀害的同伴尸体闯了进来，对他骂不绝口，说这是圣雄甘地对伊斯兰教徒容忍放纵的结果。他们叫嚷着要杀死他。

圣雄甘地从床上爬起来，对愤怒的人群进行劝解，可是没有一个人理睬他。石块飞进了窗子，棍棒从他头上掠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演讲。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伊斯兰教徒保护着他。

印巴分治以后，有一千五百多万难民在两国之间流窜，到处是暴力和杀戮行为。印度出现了空前的混乱，首都德里也笼罩着一片不安的气氛。

1948年1月13日，圣雄甘地为了争取首都两大教派和解，开始绝食，

除了饮几口清水之外，什么都不吃。连续几天下来，其健康状况日渐恶化。全世界五大洲的人民都满怀同情地关注着老人孤身反对亿万宗教狂热分子的抗议行动。在印度，要求结束同胞相煎的呼声也如风起云涌。但骚乱并未停止。到1月18日，尼赫鲁总理为表示对甘地的同情，也开始绝食。消息见报后，首都各派代表集会，宣誓要恢复平静，并请圣雄甘地停止绝食。中午，在甘地的参与下，两派代表签署了停火协议，这时他才饮下第一口桔子汁。

当天晚上，他呼吁，德里的停火应当扩展到整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上，巴基斯坦的代表高兴地宣布：圣雄甘地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友谊和平的时刻已经降临，印度次大陆的安宁有了保证！”

然而，这样的断言太乐观了，极端分子并没放下屠刀。

圣雄甘地住在德里一个朋友的宽敞别墅里，这座私邪高墙深院，绿草成茵。他的两个孙女——玛努和阿瓦照料他的生活；有武装卫队保卫他的安全。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圣雄是神的化身。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当夕阳西斜，棕榈树的树影布满别墅前的草地时，这里总聚集着许多甘地的崇拜者。这是一种介于宗教仪式和群众大会之间的聚会形式，由于广播电台定时对这种集会进行转播，圣雄甘地便利用这个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印度公众对此已习以为常。

1月17日下午，正当甘地向教徒们讲话的时候，从墙外飞来一颗自制的炸弹，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不过并没有伤着他。甘地不动声色，继续演讲。

扔炸弹的那个年轻人被当场抓获，扭送到警察局。此人叫马但·拉尔·帕维，他承认自己是“印度圣战者”组织的成员。这是个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恐怖组织，他们的首领是孟买的百万富翁维奈亚克·萨瓦尔卡尔。而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则是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有教养的婆罗门。策划这次行动的负责人纳拉扬·阿普杰是《印度民族报》的经理，另一个叫纳胡拉姆·戈塞，是该报主编；此外还有一个叫达汗巴尔·巴盖德，他专门负责提供武器，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

警察带着帕维去他的同伙藏身的那个旅馆，但犯罪分子们早已跑光了。

按理说，警察局对这场阴谋已经很清楚了，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圣雄甘地的安全。然而事情却不是这样，他们除了在甘地住所外加了双岗，并没有采取什么更有效的行动。这使得密谋分子仍可以从容准备下一次暗杀。

极端分子的目的是除掉这个绊脚石，同时，他们也很清楚，甘地在印度教徒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甘地一死，可以激起印度教徒对穆斯林更大的仇恨。

在此期间，甘地自己也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他不同意警方对参加傍晚集会的信徒进行搜身，还公开表示宽恕马坦·拉尔·帕维。他向记者说，这个携带炸弹的年轻人并不是一个坏人，是别人把他推上犯罪之路的。圣雄甘地也并非不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但他对自己的命运是抱着印度教典型的宿命观点：凡是命中注定的，便不可避免。

恐怖分子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了。

1月30日，圣雄甘地为了调解尼赫鲁总理和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达尔·帕特尔的关系，用英文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然后约帕特尔下午四点钟来自己这里谈话。这个帕特尔，原来是甘地的亲密战友，如今却是最激烈的反对

者。同往常一样，甘地在露台上迎接他，然后进入室内谈了一个多小时。

这天下午，花园里等候着大约一千名印度教徒。但圣雄甘地迟迟没有露面。他的孙女玛努朝屋里望了一下，提醒祖父该出来了。帕特尔部长这才起身告辞。

甘地身材矮小、瘦削黝黑，他披着一件白色亚麻罩衣，缓缓走向露台，并不时停下来答谢群众的问候。聚集的人群给他让开一条路。这时，混在人群里的纳胡拉姆·戈塞用力挤到甘地身边，迅速地弯下腰去，仿佛要按古老的习惯从圣雄的草鞋上拂去尘土，以表示尊敬和恭顺。有那么一瞬间，他跪在老人脚前凝然不动，突然，他飞快地从怀里掏出手枪，对准甘地胸口连射两枪，又朝他的腹部打了一枪。

“啊，天哪……”圣雄甘地嘟哝着垂下胳膊，两腿一软栽倒在地。这位印度人民最崇拜的圣哲倒在了血泊中。

凶手戈塞被当场抓获。因为英国 BBC 电台记者就在现场，事件发生仅 25 分钟后，这消息就传遍了全世界。

正如阴谋者所希望的那样，起先人们不知道凶手身份，都以为是穆斯林派来的。孟买立即发生了许多暴力行动，抢劫、纵火和凶杀事件层出不穷。后来，又传出凶手属于“印度圣战者”组织的消息，戈塞的全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家乡散格利的印度教徒不仅杀死了戈塞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同时放火焚烧了房屋，这场火也殃及周围的大片居民，共烧毁五十座民房。

杀害圣雄甘地只是印度教狂热分子策划的第一个行动，然而，他们已经无法实现其它的政治谋杀计划了。警察当局仿佛突然从梦中惊醒过来，对极端分子进行了空前的大搜捕。第二天，他们在浦那逮捕了主犯纳拉扬·阿普杰和巴盖德等人。大富翁萨瓦尔卡尔在孟买的公馆受到了搜查；“印度圣战者”组织的武装部队被勒令解散，数以千计的成员锒铛入狱。

甘地遇难两天后，十多万人在德里为他们的圣雄送葬，队伍长达八公里，一路上有士兵保护，路口地带还停放着装甲车。

甘地的遗体上覆盖着印度国旗。他躺在一辆汽车上，在四千名步兵、一千名空军战士、一千名海军战士和一千名警察的护卫下，缓缓驶向拉兹·哈特的一堆篝火前。整个殡仪行列行进了五个小时。下午 4 时 45 分，圣雄的儿子拉姆达斯点燃了他父亲身体下面的檀香木篝火。

对凶手和其他密谋分子的审判是在德里的红堡举行的。同年 8 月 22 日，所有介入这次谋杀事件的人都被送上了被告席，其中包括不久前还声名显赫的百万富翁萨瓦尔卡尔。

纳胡拉姆·戈塞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其他的密谋参加者则心存侥幸，希望借助律师的能言善辩来逃脱制裁。凶手戈塞声明说：“我尊敬圣雄，他的被害对我绝不是一件乐事。但是，我觉得我应当这样做，因为他包庇了穆斯林。”

纳拉扬·向普杰说：“我同甘地的分歧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他捍卫的原则。我从不从肉体上消灭他。他的死使我深感悲痛。”

花言巧语、支吾搪塞却不能掩盖他们的罪行。

1949 年 2 月 10 日，法庭作出了最后判决：富翁萨瓦尔卡尔以证据不足宣告释放。凶手纳胡拉姆·戈塞和主犯纳拉扬·阿普杰判处死刑。其他参与者判无期徒刑，在监狱中了此残生。

两名死刑犯在安巴拉的监狱里度过了最后的时日。1949年11月15日，他们在监狱大院里走上了绞刑架。

许多人对法院释放萨瓦尔卡尔的决定十分不满。这场密谋无疑有幕后支持者，是谁给杀人犯付酬金以及给武装别动队提供经费的呢？有人指控萨瓦尔卡尔与内政部长帕特尔有瓜葛。很可能是这两个人在幕后策划了这一场阴谋。

时光荏苒，到了1964年秋，谋杀案的几名在押从犯被释放出来，他们在那清受到印度教狂热分子的隆重欢迎。据透露，在谋杀案发生之前，印度官方就掌握了准确情报，但却把它隐瞒了下来。凶手临死前曾宣称：“我不过是萨瓦尔卡尔命令的执行者，而他则听从帕特尔调遣。”一语道破了天机。

这一说法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内政部长理应在第一次谋杀未遂后关心圣雄甘地的安全问题，但他并没这样做，这难道是疏忽大意吗？印度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组织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重新调查圣雄甘地遇刺真相，但后来没有结果。事情不了了之。

（孙石夫）

教徒集体自杀内幕

1978年11月20日清晨，世界各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刊登着一件骇人听闻的特大惨案：11月18日，人民圣殿教的近千名教徒，在圭亚那密林中神秘地集体自杀。

人们在震惊和惋惜之余，又感到纳闷：人民圣殿教是什么组织？怎么会有近千名教徒自愿集体自杀？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块毒蛇侵扰、蚊蝇丛生的密林生活呢？而且在一年多以后，又神秘地集体自杀？要解开这些谜，则需从头说起。

195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有个叫吉姆·琼斯的年轻牧师，一时心血来潮，自创了一个宗教组织“人民圣殿教”。他在贫民窟和下层人物居住区到处游说鼓动，打着所谓社会主义的旗号，鼓吹建立乌托邦式的公社，自称专门维护穷人利益，反对种族主义。没过几年，吉姆·琼斯就赢得了许多追随者，人民圣殿教也从一个小小的乡村宗教组织变成了颇有名气的全州性组织，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的两处分部里也都有几千名信徒。

吉姆·琼斯不仅是个巧舌如簧、口若悬河的演说家，还是个善于同各式人物打交道的活动家。他尤其重视与政界、新闻界有影响的人士交朋友。人民圣殿教在旧金山的选举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旧金山市长乔治·莫斯科恩和市警察局长都是靠琼斯的支持才得以当选的。旧金山市长则任命琼斯为旧金山住房管理委员会主席作为报答。琼斯与新闻记者交往甚密，报纸上时常出现关于人民圣殿教的报道。

1976年颇具影响力的《洛杉矶先驱调查报》将琼斯提名为“本年度的人道主义者”。

随着人民圣殿教及其教主的声望不断提高，前来“圣殿”听琼斯讲道的人络绎不绝，捐赠的钱财也滚滚而来，多得琼斯自己都很吃惊。琼斯并不满足，在美国庆祝建国二百周年期间，专门带上几百个信徒，乘坐12辆大汽车，列队在全国周游一个月，以扩大影响。车队所到之处，就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在教堂讲道，吸收新会员，然后定期地用一辆大轿车把新会员送回旧金山。这么一来，几乎全美国都知道有“人民圣殿教”这回事了。而吉姆·琼斯最值得自豪的一次政治性活动，就是率领众教徒支持了吉米·卡特的总统竞选。卡特获胜后，不仅写信给“尊敬的吉姆”表示感激，还特地邀请吉姆·琼斯出席为卡特大选获胜而举办的招待会，将他奉为座上客。

正当人民圣殿教的影响力达到登峰造极，教主琼斯声誉鹊起之时，一个名叫马歇尔·基尔达夫的记者，采访了十几个从人民圣殿教叛逃出来的教徒，以《人民圣殿教内幕》为题，在1977年8月1日出版的《新西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述了叛逃者的大量谈话，揭露了他们在“圣殿”中亲眼所见的种种罪恶行径：教主琼斯灭绝人性的传教政策，肉刑、残酷的人身摧残，吸毒，强奸，贪污、勒索，无所不为，令人发指。

这篇文章震动了美国朝野，人们纷纷写信、打电话要求查清惨无人道的人民圣殿教的暴行。叛逃的前“圣殿教”成员也成立了一个名为“有关亲属委员会”，向报界和国会议员发表一份宣言，谴责琼斯“穷凶极恶残酷无情地漠视人权”，以死亡威胁“圣殿教”成员，在公社周围设置岗哨，不准社员离开，以及剥夺社员的私生活权利，剥夺言论、集会自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伊夫利·扬格收到对人民圣殿教内幕的揭发信达1000余封。国会

众议员利奥·丁·瑞安挺身而出，决心查清人民圣殿教的问题，成了国会中要求惩办人民圣殿教及其教主的首要政界人物。

然而，这一切为时已晚，琼斯在《新西方》那篇文章发表前几个月，已经率领他的 1200 名信徒，迁到南美洲圭亚那的琼斯城。琼斯城是“圣殿教”在圭亚那租用的一块面积为 3843 英亩的丛林地。这片未经开发的丛林地带，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琼斯认为它远离现代文明 1000 英里，是世界上能逃避核毁灭的地方之一，同时又是建立乌托邦式公社的理想之地。于是，在 1976 年 3 月与圭亚那政府签订了这块丛林的长期租约。

1977 年初，由于叛离“圣殿教”的成员越来越多，人民圣殿教中黑暗的内幕越来越被外人知晓，琼斯生怕受到惩办，便加快了将圣殿教活动中心迁移到那片圭亚那热带丛林的进程。3 月上旬，第一批 380 名“圣殿教”成员开始奔向南美丛林隐蔽地。在随后的三四个月中，琼斯及其忠实的信徒都陆续转移到这片“希望之乡”了。

众议员瑞安不肯善罢甘休，决心去琼斯城作第一手调查。瑞安向来不惧怕到敌对环境中去作观察。他以好斗著称，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他的国会议员生涯中，曾多次冒险亲临现场。他曾装扮成一名犯人，了解福尔监狱的情况；他用链子把自己与一头幼海豹系在一起，以调查纽芬兰的偷猎海豹问题。而今，他又将去作一次新的冒险。

1978 年 10 月 24 日，瑞安得到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批准，同意他去圭亚那。于是，他很快便通知琼斯，他将在 11 月中旬到琼斯城访问。琼斯原想将他拒之门外，后考虑到拒绝一个国会议员来访，会招致一场对外交往上的灾难，他只好勉强同意了。

1978 年 11 月 14 日，瑞安从华盛顿出发，同行者共 17 人，其中包括他的助手斯皮厄。全国广播公司的摄像人员、旧金山各家日报的记者，还有几名“有关亲属委员会”的成员。11 月 17 日，瑞安一行在圭亚那的乔治墩登上两架小飞机，飞到离琼斯城仅有几英里的凯图马港机场。然后乘一辆卡车，于黄昏前赶到琼斯城。

面临大敌而惶惶不安的琼斯，勉强堆起了笑容，欢迎瑞安一行的到来。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已构思出他最惊人的作品——《梦的结束》，它将是一出悲剧，其结果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琼斯彬彬有礼地告诉瑞安，绝无虐待信徒之事，并安排了一场欢迎舞会，使来访者先有一个好印象。

但是，圣殿教的成员们似乎有些躁动不安，每当来访者走近，试图找他们谈话时，他们就慌忙溜走。而且，瑞安一行也被禁止在没有圣殿教护卫的陪同下，就擅自到居民区游逛。几名好奇的记者曾因此被挡了回来。尽管如此，瑞安众议员还是接见了三十几名居民。第二天上午就有十多人表示希望随瑞安离开琼斯城。琼斯对这些叛变者软硬兼施，仍无法改变他们的决定，只好怒气冲冲地与助手们商讨对策。

当瑞安一行带着 14 名叛离者正准备上卡车回凯图马港时，一个名叫西蒙的人，拖着两个孩子，也要上车离开。西蒙的妻子追过来，拽住孩子不让走，于是引起了争吵。瑞安在一旁进行调解。就在这时，一个壮汉突然向瑞安冲过去，从背后一把抓住瑞安，掏出刀子便刺。瑞安奋力转身，朝旁边一躲，两个助手扑上来将那家伙制服。那人被自己的刀划伤了胳膊，鲜血喷溅到瑞安的衬衫上。

琼斯闻讯赶来，他不无担心地问瑞安是否因行刺事件而改变了对琼斯城

的印象，瑞安承认有所改变。殊不知，瑞安的这一回答无异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琼斯惊恐的眼睛射出一丝凶光，他喃喃自语道：“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显然，他正是在这个时候，下了最后的决心，必须采取某种极端的行动。

瑞安惊魂未定，慢慢地走向等着他的卡车。卡车刚要发动，一个名叫拉里·莱顿的男人追上来跳上卡车。他称自己“厌恶”琼斯城的生活，也要求随瑞安离开。别的叛离者见此大吃一惊，但又不敢吱声，因为他们都知道，莱顿的外号叫作“琼斯的机器人”，他叛逃的借口肯定是虚假的，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卡车颠簸了45分钟，终于开出丛林，来到凯图马港。他们在机场等了半个小时，才等到接他们走的两架飞机。但两架飞机只能乘24人，而现在要走的人有31个，所以得有7人留下来等飞第二趟。

瑞安立刻决定叛离者先走，自己与几个记者留下。一架色斯纳小飞机上安排了6个叛离者，并没有拉里·莱顿，但莱顿却拼命吵着要上，瑞安拗不过，只好让人检查一下他身上有没有武器。但实际上，莱顿已事先溜上飞机把武器藏在机舱里了。一名记者对他检查一番后，便让他上了这架飞机。余下的叛离者则被安排上一架大一些的奥特飞机。

色斯纳飞机的发动机响了起来。站在沥青跑道边的瑞安和几个记者向机上的叛离者挥手告别。而奥特飞机正在上客。就在这时，突然，从跑道尽头开来一辆农用拖拉机，后面的拖斗上坐着6个人。很显然，这辆拖拉机来自琼斯城。

拖拉机越来越近，拖斗上的6个人突然从车内摸出枪来，对准人群扫射。站在跑道上的瑞安和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摄像人员都被弹雨射中，瑞安和其他3名记者几秒钟内就被打死了，还有3名记者则受了伤。正在爬上奥特飞机的叛离者也遭到枪击，帕蒂·帕克斯站在舷梯上，身上中了两枪，当即死亡。站在飞机下的另外六七个人也受了伤。

琼斯城的枪手们，似乎还不放心，从拖斗上跳下3个人来，走到已经倒地的瑞安和3个记者跟前，对准他们的脑袋又是一阵平射，然后才跳上拖拉机扬长而去。仅仅过了一分半钟，这次袭击就跟开始时一样突然地停止了。

坐在色斯纳小飞机里的莱顿也在飞机起飞前动了手，他打伤了一名男子和一名妇女，另外两个男子好不容易才制服了他。

这次袭击一共打死5人，伤12人。站在飞机边的3名圭亚那警卫却袖手旁观，他们事后解释说，这是美国人之间的战斗，双方都好像发了疯，他们看不出该支持哪一方。

凯图马港机场上的惨剧，不过是琼斯精心策划的大屠杀的前奏，虽然袭击没完全按计划进行，但琼斯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他原来的计划是叫拉里·莱顿登上头一架起飞的飞机，他预料瑞安也会上这架飞机。飞机一起飞后，莱顿便开枪打死驾驶员，让飞机在丛林中坠毁。但他也深知，莱顿是个“机器人”，不会随机应变，所以又派了拖拉机上的这伙枪手作为后援队。结果，后援队成功了，瑞安被打死了。

对于琼斯来说，干掉瑞安，不仅是出于自尊、出于报复，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一年多来，他屡次对他的追随者讲，公社的敌人一直在准备摧毁琼斯城；当敌人付诸行动时，与其让敌人摧毁琼斯城，不如琼斯城先

毁掉自己，这样，敌人就得不到胜利，相反会受到惩罚。他一直以这种自欺欺人的逻辑。来鼓动教徒以身殉教。在众叛亲离、陷于绝境的今天，琼斯意识到自己失败了，唯有死路一条。但要蛊惑近千名追随者与他一起殉身，一起摧毁琼斯城，尚缺少迫近大门准备进攻的敌人。杀掉了国会议员瑞安，敌人便肯定会来，因此，瑞安之死就证实了琼斯的预言。众教徒在这个所谓的“上天”的启示下，也就会心甘情愿地与他一起殉教。

前往凯图马港的暗杀组出发之后，琼斯立刻开始着手导演这场举世震惊的惨剧。他首先召集卫生人员和保安人员开会，布置了任务。卫生人员将事先准备的氰化钾和安眠药调和好，装在半加仑的大瓶子里，再用55加仑的大桶调好人造水果汁，准备与瓶里的毒药混合使用。保安人员围绕中央大帐篷设了两层警戒线，内层以弓箭和大刀为武器，外层则手持步枪。

然后，琼斯拿起有线广播话筒，召集全体社员集合。几分钟后，中央大帐篷里就坐满了人，还有几百人挤不进帐篷底下，就坐在掀起的帐篷沿外。不久，除了少数几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外，所有的教徒都来了。

下午5点左右，大约与飞机场上的袭击同一时刻，琼斯开始讲话。长达45分钟的会议情况，都记录在录音带上，这是历史上最可怕、也是最荒诞的自杀记录。

琼斯以平稳而又略显疲倦的声调开始了他最后一次讲话：“为了你们能过上好日子，我一直在努力，但在我们当中出了一小撮叛徒，到处讲假话，使我们无法生存下去了。现在我们是坐在火药桶上。再过几分钟，那个国会议员就要死了，他乘坐的飞机上有人开枪打死驾驶员，飞机就要栽进丛林里。今天发生的事我们甩不开了，他们不会放过我们，我们无路可走，没办法活了。我们只有像古代希腊人一样，每人喝上一杯，安安静静地去死。我们不是自杀，而是革命行动！……”

琼斯翻来覆去他讲着这些话，这也是他以往重复过多次的话。以前类似的会也开过，甚至抬来“毒药”桶。一个护士喝了一杯，马上就“昏倒”在地，舒舒服服地“死”去。不过，那都是自杀演习，表演给大家看的。而今天却是玩真的，真的要“为革命集体自杀”了。

在他的蛊惑下，绝大多数人民圣殿教徒都神魂颠倒地表示愿意照他的要求去做。琼斯每提到一次“去死”，台下就爆发出一阵喝彩声。只有少数几个人感到怀疑，认为这样去死不值得，就想悄悄地往外溜。可刚一出大帐篷，便看见保安人员凶神恶煞地手执武器站着，不禁打个寒噤，又退了回来。

一个名叫克里斯廷·米勒的老太婆站起来发言，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她直率地说：“离开圣殿而出走的人并不多，为了少数人的出走，不值得让这一千多人都去死。”琼斯却大加驳斥，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明情况的严重性：莱顿和别的几个人已经去杀瑞安和那些叛徒了。瑞安一死，敌人就有借口了。他们等的就是这种借口，他们就要向我们进攻了。我们现在开的是革命性的自我牺牲的会议，我们并不是自己毁灭自己，我们是没有别的出路了……

可是，克里斯廷还是不肯信服：“我们自杀了……不就是让他们，让我们的敌人打败了吗？”

“不，”琼斯竭力辩解道，“我们赢了。我们倒下的时候就赢了。那些叛徒们没有仇恨对象了，他们也会毁掉自己。我不是以牧师的身份说这话，我是以失知的身份说的。”

台下的一千多个人都朝着克里斯廷喊，叫她听先知的話。克里斯廷有些

紧张，但还是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万能的先知，你不能把我们这些人都救出来吗？”

“我救过你们，”琼斯疲倦地回答，“我讲了我的愿望，也运用了我的能力。可是现在这个世界不行。我们生不逢时，我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证明就是离开这个该死的世界！”

他的最后一句话淹没在群众的吼声之中。当欢呼声平静下来的时候，克里斯廷说了声“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便坐了下来。她终于愿意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行动了。

就在这时，暗杀组乘着拖拉机从机场回来了。暗杀者报告说：“议员死了。”台下一片嘘吁声。琼斯叹了口气，激动地说：“果然不出我的预料，这事完了，仇恨太大了……敌人侵犯了我们的生活，闯进了我们的家。我们躲进这丛林之中，远离他们1千英里，可他们还是紧追不舍……国防军很快就要来了，他们会折磨我们的孩子，折磨我们的老人。因此，得赶快把药拿来……”琼斯声调越来越高，越来越变得歇斯底里：“快点、快点、再快点，别怕死，这种药不会引起痉挛，毫无痛苦……马西琳，你得快点，我们只有40分钟了。”

于是，琼斯按所谓“上天的启示”，在全体教徒面前描绘出一幅“末日来临，唯有殉教”的惨景，一场空前的惨绝人寰的集体大自杀就这样开始了。

两名护士把果汁粉、氰化钾和安眠药的混合物抬上了讲坛，放在一张矮桌上。这一回可不是表演。一个坐在前排的年轻母亲，抱着婴儿，走上讲坛，从桌上拿了一杯毒药，直接灌到婴儿喉咙里，余下的她自己一饮而净。这种药不会马上就死，她还来得及走到外面去。接着是第二个抱着孩子的妇女，重复着前一个人的动作。护士在一旁用扩音器发号施令：“请大家站在过道里排好队，一个接一个上来。这种药，又不痛，只有一点苦。”

头一批人，即怀抱婴儿的母亲们，就这样走向死亡。在母亲拿起一杯毒药自己喝的时候，一个护士干脆拿起没装针头的注射器，将毒药射进婴儿的嘴里。

随着喝毒药的人越来越多，人群变得乱哄哄的。有人在叫喊，有人在找自己家的人，有人在相互拥抱告别。

在大帐篷里，有个名叫麦克韦恩的教徒，他接过话筒，自称是“有来世体验”的专家。他安慰社员们，说“在那一边”还会见面的。他说，死，不过是“休息一会儿，很舒服，什么也没有死舒服”。

但是，许多信徒毒性暴发而死的时候，却完全不像他说的那么轻松。尽管药里混有安眠药，仍压不住氰化钾引起的猛烈痉挛，很多人死的时候，简直抽搐得奇形怪状。

人们目睹先死者的惨状，不禁恐怖起来。琼斯为安抚大家，安排了许多“铁杆”教徒，一个接一个地在广播里现身说法。有老有少，有黑人也有白人，发言都一致赞成死亡，内容都差不多，感谢琼斯把他们带到“这块自由的土地”，感谢他给了他们“跟兄弟姐妹一起死的机会”。

发言间隙，琼斯不时拿过话筒为信徒们打气，催促他们快些死。他说：“我们希望我们死得体面些，躺下的时候不要带着痛苦和眼泪。要忍耐……不管听到什么叫声，不管有多少痛苦的啼哭声，这样死去总比再活10天要好一百万倍。……我们要快点、快点、再快点，我们千万别落在敌人手里，我们不能让敌人来夺去生命，而应由我们自己献出生命。”

就这样，从婴儿和母亲到半大的孩子，从老人到残疾人，从妇女到男人，从黑人到白人，人们一批接一批地喝下毒药，走出帐篷，躺在草地上死去。

但也有个别人逃了出来。罗兹和克林尔就是其中之一。罗兹乘岗哨不注意，藏在石阶边的墙角，而躲过了这场劫难。克林尔则连续骗过几道岗哨，躲进了丛林。正是有了这两个幸存者，世人才知道了琼斯城末日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罗兹在躲藏地听到广播喇叭里通知所有的警卫人员到电台房间集合的通知。这是琼斯城最后死的一批人。这些保安人员和琼斯的参谋人员都服毒死在中央帐篷里，接着死亡的是琼斯的两个情妇和两个儿子。吉姆·琼斯在确信他的信徒都死亡后，自己坐在帐篷中央他的座椅上，用手枪照着自己脑袋开了一枪。最后一个自杀的，是琼斯的私人护士安妮·穆尔，她拾起一分钟前琼斯结束生命用的那支枪，也朝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倒在琼斯的身边。

直到深夜，罗兹听到周围再无任何声音后，才从躲藏地跑了出来，没命地奔出地狱般的琼斯城，连夜穿过丛林，沿着大道奔到凯图马港，报告了当地的警察局。

第二天下午，圭亚那军队在罗兹的带领下开进了琼斯城，呈扇面形搜寻幸存者。他们除找到几百具尸体外，还意外地找到另两个幸存者。一个是耳朵不好的老人戴维斯，他爬进一口干井里，躲过了这场灾难。另一个是半瘫痪的残疾人海辛斯，集体自杀时，人们把她忘了，她一直熟睡在房间里，几百码外发生的事她完全不知道。

10天后，一支美国陆军殡葬队开进了琼斯城，他们一具一具地搬走尸体。这才有了准确的死亡人数：一共死了914人，其中912人死于氰化物毒药，两人死于枪伤。

人民圣殿教的教主和九百多名教徒连同琼斯城一起自我毁灭了，但事情并没结束。在世界各地还有几千名琼斯的追随者。圭亚那惨案发生后仅10天，旧金山市市长莫斯科恩和市政府监察员米尔克斯，就被圣殿教的残余分子暗杀了。因为他们生前与琼斯均有着亲密的个人关系。他们的死似乎在向住在美国的前人民圣殿教教徒宣布：11月18日吞噬了圭亚那琼斯城的死神，是不会饶恕那些尚在美国偷安的前教徒的。

顿时，恐怖气氛笼罩着全美国，尤其是那些叛离者，纷纷如惊弓之鸟，东躲西藏。“返教还俗康复中心”的迈尔斯主任透露，琼斯留下了大约200名刺客，以便在他本人死后处死那些离经叛道者。这200人分成10个“暗杀小分队”，由一个多年追随琼斯的白人姑娘苔丽指挥。苔丽的任务是：一旦琼斯出事，便指挥各小分队杀死所有参加过人民圣殿教的教徒。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许多报纸都刊出骇人听闻的“琼斯留下暗杀组织”的大标题。许多脱离圣殿教的人都躲进“人类自由中心”，全副武装的警察在那座建筑物周围层层设岗，严加保护。

联邦调查局和警方在全美调集大批警力，逮捕了一个又一个潜藏的圣殿教暗杀队成员，这才使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逐渐平息。

人民圣殿教教徒集体殉教的惨案，无异于给那些喜欢标新猎奇，热衷于参加各种邪教的美国人敲起了警钟：千万不要随便加入那些邪恶不轨的宗教组织，不然，弄不好会丢掉自己的身家性命的！

（陈中）

戊戌变法

清朝末年，国家越来越衰弱，政治越来越腐败。清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全歼清王朝的北洋水师。中国惨败之后，第二年又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更加严重而紧迫！

这时，国内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寻求探索富国强兵的办法，以各种方式向清政府提出建议。其中卓越的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早在光绪十四年十月，康有为就曾经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变法，这也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王朝正式提出变法的建议。但是由于一些大臣的胆小怕事，不敢呈交皇帝，康有为的这份建议没能让光绪皇帝看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好又是各地举人到北京考进士的年份。康有为趁这个机会，联合各省前来参加考试的举人一千多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请愿，反对《马关条约》，要求清王朝变法维新，富国强兵，并且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措施。尽管清政府仍然拒绝接受知识分子们的上书，但这次行动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第一幕。

在进士考试中，康有为也借答卷的机会，大谈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给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龢留下了印象。

不久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他在5月29日第三次上书，提出变法的步骤。这次上书光绪皇帝看到了。不久康有为又第四次上书。

康有为的这些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与赞赏。在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曾经主张坚决抗战；对于签订《马关条约》，也是不情愿的，但由于慈禧太后的牵制和压力，他不得不这样做。他也意识到除非变法，否则无法挽救中国。要想不做“亡国之主”，就必须改革图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十七日，他颁发了一个要求“因时制宜”治理国家的圣旨，提出一系列变法改革的新问题。然而又因为慈禧太后一伙把持朝政，反对变革，使光绪皇帝的圣旨，变成了一纸空文。此后，光绪皇帝又曾几次提出要实行“新政”，但都因为慈禧太后一伙的阻挠而无法实施。光绪皇帝只得一面等待时机，一面悄悄地做提拔改良派、排斥顽固派的工作，逐渐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权力。

这样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也就是戊戌年）的6月，时机已渐渐成熟，改良派大臣纷纷上书，要求皇帝下诏，明确国家的方针大计，也就是变法维新。6月11日，光绪皇帝根据大臣们的建议，由他的老师翁同龢起草了一个诏书，向内阁大臣宣布，决定实行变法。诏书中详说了变法自强的道理，分析了多年来变法未成的诸多原因，并明白地告诉大家，今后各级大臣，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都要学习有实用的知识，培养变法改革的人才。

光绪皇帝希望，从此之后，全国上下一心，实行变法维新，挽救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中国。

紧接着，改良派大臣又上书皇帝，推荐“维新救时”的人才，请皇帝“破格委任”。被推荐的有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光绪皇帝亲自召见了康有为和张元济。康有为首先陈述了中国面临的险恶形势，在外国帝国主义的逼迫和分割下，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除非完全改

革过去的政策法令，否则就不能重新富强起来。

光绪皇帝当即表示赞同。

康有为接着指出，所谓变法，首先要把制度法律完全改订，否则只是“变事”，而不是“变法”。他请求光绪皇帝统筹全局，先设立“制度局”，改变制度法律。康有为又指出，现在朝中的大臣，大都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又不学习，要靠他们来变法，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一定要提拔有真才实学的年轻官员和知识分子，来办理新政。至于原来的老臣，可以采取养起来的办法，只要他们不干扰新政，就保持他们原来享受的待遇。

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意见都很欣赏。但是就在谈话过程中，他还怕慈禧太后派人偷听，并且叹息慈禧太后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大权，干扰太大。康有为希望他把现在能做的事情先做起来再说，而且回答了光绪皇帝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提问。经过这次召见，光绪皇帝打算重用康有为，可是却遭到了保守派大臣荣禄、刚毅等人的反对，结果只给了他一个在总理衙门上行走的职位，准许他直接向皇帝上书奏事。

康有为抓住了这个特殊待遇，在变法维新的一百来天中，几乎每天都有专门的奏折给皇帝，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建议。而光绪皇帝对他的建议也十分重视，采纳了很大部份，在这一段时间中，光绪皇帝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新政的政令颁布。

但是，变法维新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顽固派的反对。

慈禧太后最初能允许光绪皇帝实行新政和变法，是有原因的。一是由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她不得不暂时退往幕后；二是由于她还没抓住光绪皇帝的把柄，没有做好发动政变的充分准备；三是主张变法的改良派同英、美传教士有联系，她怕得罪外国人。但是，慈禧太后也决没有放弃干扰破坏的努力。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后的第四天，她就借故罢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翁同龢是主张变法的中坚人物，光绪皇帝接到慈禧太后发来的命令，顿时脸色大变，浑身颤抖，好像折断了一条胳膊。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又任命她的心腹亲信荣禄兼任直隶（河北省）总督，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支军队，实际上掌握了北京及其周围的军事大权，为他们后来发动政变打下了基础。

慈禧太后一派的保守派大臣，不断向康有为等改良派发动攻击。虽然由于光绪皇帝的保护，康有为暂时没有遭到罢免；但光绪皇帝也深深感到变法难以推行。

而各省的大臣，多半是慈禧太后扶植起来的，对变法维新都抱消极态度，或者借词推托，或者阳奉阴违，不干实事。尽管光绪皇帝三令五申，他们自然不放在眼里。朝中的顽固派大臣，公然同光绪皇帝争执吵闹，并且动不动就说：“希望皇上去请示太后！”光绪皇帝虽然不满，也无可奈何。在变法期间，他曾十二次到颐和园去拜见慈禧太后，请示重大问题：对于顽固派的大臣，光绪皇帝也不敢放手处罚罢免，时时要对他们做出让步。

到了这年8月下旬，慈禧太后认为发动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开始一步步行动起来。8月23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去拜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就通知他，计划在9月份举行阅兵活动的日程。光绪皇帝就已预感到大事不妙了。9月4日，光绪皇帝又同顽固派大臣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事情的起因是礼部的一个主事王照，写了一份奏折，请光绪皇帝游历日本和西洋各国，并请建立商部和教部。王照的官职小，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书，必须由礼

部负责人代转。可是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是保守派，不肯代递，认为皇帝出国考察是不可行的。王照坚持要求代转，怀塔布、许应骙仍然不肯。王照便又写奏折揭发怀塔布、许应骙的行为，请皇上处分他们，并扬言二人如再不代他转奏，他就到都察院去控告他们。怀塔布、许应骙只好代王照转了奏折，但同时也写了奏折，攻击王照。哪知光绪皇帝不但表扬提升了王照，而且罢了怀塔布、许应骙等人的官。第二天，光绪皇帝又提拔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人。这是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一伙保守派的强烈反击。

怀塔布等人被罢官后，纷纷到天津去找荣禄，阴谋筹划军事政变，推翻新政。

到了9月中旬，形势已经十分危急。9月14日，光绪皇帝再去颐和园见慈禧太后，第二天回到官中，便写了一封秘密诏旨，让杨锐偷偷地带出皇宫，交给康有为。在这封秘密诏旨中，光绪皇帝明确地指出，慈禧太后“不愿将法尽变”，也不许罢免顽固派老臣、起用改良派知识分子。他深感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权力实有未足”，如果一定要硬干下去，则连他的帝位只怕也保不住！他急切地问康有为，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至于违背慈禧太后的“圣意”？并希望康有为与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人迅速筹划商量后报告给他，由他考虑实施。

然而，光绪皇帝的最后努力，已经不可能产生效果了。仅仅两天之后，9月17日，光绪皇帝又让林旭传出第二封秘密诏旨，命令康有为到上海去办报，并强调要他“迅速外出，不可迟延”。同一天，光绪皇帝又颁发了一份公开的圣旨，叫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显然，光绪皇帝已经看到了变法的失败，只想让康有为等人逃出北京，争取多保留一点改良变法的力量了！

康有为等人读了光绪皇帝的秘密诏旨，痛哭流涕，发誓宁死也要救护皇上。为了挽救变法失败和光绪皇帝失权的危机，他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去动员袁世凯发动政变。

他们为何会看中袁世凯呢？一则因为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拥有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新军”；二则因为尚未识破袁世凯惯于玩弄两面派手法，认为他一直支持变法维新。袁世凯对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争权的斗争十分关注，他脚踏两只船，骗取双方的信任。9月16日，光绪皇帝刚刚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所以，到了光绪皇帝处境危急的时候，康有为便认为拥有兵权、能够救护皇帝的，只有袁世凯了。

9月18日，袁世凯已经听到一点风声，知道朝中的局势将有大的变化，当天夜里他就赶写奏折，想提前回天津去。正在这时，谭嗣同来拜访他。袁世凯立刻意识到，重大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他连忙迎出来见谭嗣同。谭嗣同对袁世凯说：“你最近刚刚受到皇上破格提拔的恩遇，一定会想报答皇上。现在皇上有大难，除了你，就没有人能救了！”又告诉他：“荣禄最近向慈禧太后献计，打算废掉皇上并且杀害他。你知道吗？”袁世凯摇摇头，说不知道。这时，谭嗣同就要求袁世凯领兵杀掉荣禄，清除顽固派，保卫皇上！袁世凯见谭嗣同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又见他腰间好像带着武器，料想自己如不答应，谭嗣同一定不会放过自己，便哄骗他说：“你拿我当什么样的人了！我家三代人都受皇上的恩典，决不会耽误皇上的大事。只要能对皇上有益，我就是死也要干！”

谭嗣同放心地走了。

袁世凯却放不下这颗心。他反复思考，感到光绪皇帝已没有实权，慈禧太后却根深蒂固。自己如果投靠皇帝，只怕自身难保；而投靠太后，一定可以得到高官厚禄！

于是，在9月20日上午，袁世凯去见荣禄，把谭嗣同的话都报告了荣禄，出卖了改良派。当天晚上，荣禄就赶到北京颐和园，把一切情况都报告了慈禧太后。

9月21日，慈禧太后不声不响地出了颐和园。回到了皇宫里，突然出现在光绪皇帝的面前，宣布光绪皇帝的种种“罪状”，把光绪皇帝软禁在中南海里的一个小岛瀛台上，一直到死都没有再放他出来。

仅仅维持了103天的戊戌变法，以顽固派的政变而彻底失败。

康有为逃进了英国大使馆，后来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从北京逃到上海，又逃到香港，十月里逃往日本。梁启超也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流亡到日本。

政变发生时，有人劝谭嗣同赶紧逃走。谭嗣同拒绝了。他说：“各个国家的变法，没有不流血能成功的；现在中国还没听说有为了变法而流血的，所以我们的国家不能繁荣昌盛。我愿意做为变法而流血的第一个人！”9月25日，谭嗣同被顽固派逮捕，9月28日遇害。同时遇难的还有积极参与变法的杨锐、林旭，刘光第、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以及赞成变法、反对慈禧太后政变的杨深秀。这6个人，被人称为“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失去了最后一个转危为安的机会。仅仅十三年后，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就寿终正寝了！

（薛兵）

水门事件

美国总统是通过四年一次的竞选产生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是两大竞争对手。

1972年，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经过一番苦斗，大选获胜，连任总统。然而，历史却跟他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他的第二届任期未滿就被迫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任的40位总统中第一个享此“殊荣”的总统。接任总统职务的杰拉尔德·福特在就职时说，美国“这场漫长的恶梦已经过去”。这场恶梦，指的就是震惊世界的“水门事件”。

事件发生在竞选期间。1972年6月17日，有五个身份不明的人悄悄潜入在华盛顿的“水门”大厦。这里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这五个人行动诡秘，引起了警卫人员的警惕，对他们进行了监视。发现他们原来是在安装电话窃听器，并偷拍资料，警卫人员当即将这五人抓获。经查实，这几个人中有一个是共和党争取尼克松连任总统委员会的安全顾问詹姆斯·麦科德。显然，这件事与尼克松有直接关系。接着，又逮捕了前白宫助理戈登·利迪和霍华德·亨特。应该说，这件事对尼克松是非常不利的。正好被处于劣势的民主党竞选对手乔治·麦戈文用来大做文章，他还列举了大量事例，证明尼克松政府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政府。

水门事件披露以后，前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表声明，说被捕者的行动不代表该委员会，是未经他同意擅自行动。之后在各派势力呼吁和敦促的压力下，尼克松于8月29日发表声明，宣布在现政府雇用的人员中，没有一个卷入这件稀奇古怪的事件。他完全可以相信米切尔对此一无所知。

可是，事过不久，忽然节外生枝，米切尔的夫人由于被水门事件冲击得神经失常，竟然告诉记者，说她有一本记载水门事件具体步骤的手册，并讲述了她本人所了解的全部细节。尼克松总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让米切尔辞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麦戈文竭尽全力想掀起一股反对政府腐败的浪潮。但大多数选民只将这种事看作是政治斗争中勾心斗角的表现，不久就置之脑后。1972年9月15日，司法机关宣布了对水门闯入事件的起诉书，其中只提到利迪和亨特及在民主党总部被捕的五个人。大选前，水门事件就这样暂时搪塞过去了。

尼克松终于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他兴高采烈、满怀信心地进入第二任期。然而，使他意想不到的，到了1973年春，一度熄灭的水门事件之火却又燃烧起来。前一年夏天被政府官员们轻轻一笔带过的窃密事件，由于更多的事实被揭露而变成美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丑闻。最终导致了他灰溜溜地下台。

1973年3月，那个潜入民主党总部被抓获的麦科德为免于被判长期监禁，向法官作了坦白交待，说有人对他施加压力，要他保持沉默，答应日后给他宽大处理。他还秘密会见了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塞缪尔·达什，向他交待白宫律师约翰·迪安事先知道闯入水门大厦的计划。接着，迪安也向法官交待了他所知道的一切。这样一来，掩盖真相的堤坝终于冲破了。

大量事实表明，水门事件是竞选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尼克松总统争取连任委员会的领导及其他与白宫有关联的人物策划并指挥的。目的在于破坏民主党的竞选活动。闯入水门大厦的首要目标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劳伦斯·奥布赖恩。此人的政治技巧和他与各方面的联系使得对手认为有

必要对他的电话进行窃听。实际上，在那之前，奥布赖恩的办公室里已经被安装了窃听器。6月17日的那次行动已经是第二次了，目的是安装更多更好的窃听器。

随着真相被揭露，无情的追查使得牵扯范围不断扩大。有许多迹象表明，自从1969年起，白宫一直用秘密竞选资金雇用一部分调查人员，他们的任务是收集政敌个人生活习惯和财政情况的情报。白宫曾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下令对几名记者和政府雇员的电话安装窃听器。尼克松的助手们编有一份“黑名单”，并力图指使国内收入署调查这些人的纳税申报书，以困扰他们。1970年，尼克松亲自批准一项收集情报的计划，要求大规模使用非法邮件检查、窃截电话电报和盗窃资料，以便取得被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和集团的情报。尼克松争取连任委员会从1971年夏天起，就雇用人书写和散发一些非难民主党候选人的诽谤信件，编造假电报和报纸广告以制造民众支持尼克松的印象。并且破坏对方的集会，使其威信扫地。正如尼克松的辩护人所说，尼克松之前的一些政府也从事过这种活动。但尼克松政府所作所为，与以往的政府相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着真相一步步被披露，这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就是尼克松有没有直接参与这件事。1973年夏天，在“水门事件”听证会上，参议员们向每一位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电视也作了实况转播。参议院为此成立了“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调查中，尼克松的前助手亚历山大·已特菲尔德证实，尼克松在1971年初曾下令在他的白宫办公室里安装窃听系统，记下电话和他与别人的谈话。白宫律师迪安和其他人试图从记忆或笔记中间回想起来的许多高级秘密谈话，估计都录在这些磁带上。

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白宫所有录音带的内容。

7月16日，尼克松得知巴特菲尔德已向“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泄露白宫装有录音系统的消息，顿时如雷轰顶，异常震惊。舆论反应也非常强烈，《纽约每日新闻》的大字标题是：“尼克松窃听他自己的各办公室。”

1973年7月17日，参议员小萨姆·欧文代表“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写信给尼克松总统，要求交出这些录音带中的五盘和其它有关白宫文件。这个要求被尼克松粗暴地拒绝了。

7月23日，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发传票传调录音带和其它材料的决定，认为这些东西直接或间接地同1972年总统竞选中的“犯罪行为”有关。

也就在同一天，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发出传票，传调九盘谈话录音带。结果同样遭到拒绝。这样一来，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又去找法院，要求法院作出裁决，迫使白宫交出这些录音带。尼克松的律师匆匆忙忙提出反驳。政府的三个部门都卷入了这场冲突之中：

尼克松强作镇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提出了广泛的“行政特权”的要求。他把行政特权的理论与三权分立联系在一起，争辩说，如果国会传讯或法院命令能迫使总统公开秘密情报，那总统的职位就会受到致命损害，而国家的安全也就没有保障。

法官约翰·赛里卡否决了尼克松的论点，并命令他交出录音带。他还规定，这些录音带要先送到他这里，他会删去享有特免权的部分，然后按照特别检察官的要求送到一个特别大陪审团去。

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仍然决心保住这些录音带，只向法官提供一些编辑过的文本，除了那几盘已被传调的录音带之外，坚决不再交出任何东西。他们

逼着特别检察官同意，否则就要撤掉他。

考克斯认为他有权继续要求并得到与庭审有关的任何材料。而且，法庭有绝对的权利审查那些录音带，而不是什么文本。他还在 10 月 20 日通过电视发表公开声明：他不能服从总统指示，只有任命他的司法部长才能给他下达在法律上有义务的指示。

检察官与总统之间的鸿沟太深，难以弥合。尼克松却大胆地往前冲，决心解除考克斯的职务。就在考克斯发表公开声明几个小时之后，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副部长威廉·拉克尔肖斯由于拒绝白宫关于撤销考克斯职务的命令，先后提出辞呈。位列第三的副部长罗伯特·博克执行了白宫的命令，他的理由是，如果大家都辞职，司法部便无法正常工作。

考克斯被解职引起了舆论大哗。各电视网在正常节目中竟然插入公报，并在当晚发表专题评论，认为尼克松政府是发动了一场压制反对派的政变。全国广播公司著名评论员约翰·钱塞勒说：“今晚是我国处于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之中，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有的新闻报道称之为“长刀之夜”，或者叫“星期六夜晚大屠杀”。

掩盖活动的继续，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愤慨和不满。尼克松此时已名誉扫地。那些被揭露出来的事件本身，以及尼克松对待调查所采取的抗拒态度，使人们对他非常怀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疑云与日俱增。尼克松发动一场他称之为“坦率行动”的群众运动，企图驱散疑云，恢复自己的地位和平息人们对他的指责。他四处游说，在经过选择的听众面前诚恳地保证，说他是无辜的。

但是，在公众的心目中，有两颗直接与水门事件有关的“炸弹”，其影响比尼克松精心设计的坦率陈词要深刻得多。一颗在 1973 年 10 月爆炸：民众已经得知被传调的九盘录音带中的两盘已经不存在，这两盘录音带涉及最重要的两次白宫谈话。法院的听证，未能解开这些录音带是经谁的手，又是怎样消失的这个谜，白宫的解释不一致，而且不能令人满意。另一颗是在 11 月份爆炸：白宫被迫透露，1972 年 6 月，尼克松总统与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一次关键性谈话曾录了音，然而，现在这段长达十八分钟的内容已被从录音带上洗掉。公众对白宫不信任和厌恶感大大增加，要求对尼克松总统进行弹劾的呼声四起。”

1974 年初，是水门事件如何走完剩下路程的决定时刻。此时，尼克松总统被蜂拥而起的批评浪潮所刺痛，竟孤注一掷地采取了更大胆的对抗姿态。他拒绝与新的检察官利昂·贾沃斯基合作，继续硬顶。2 月份，众议院以 441 票对 4 票通过授权司法委员会传调任何人和物，包括总统在内。这就意味着弹劾尼克松的活动已正式开始。

尼克松面临特别检察官和司法委员会的双方传讯，因而被迫在 4 月 30 日公布根据那两盘录音带编辑而成的文字本。各大报纸全文登载，并由两家出版商匆匆印成平装书。司法委员会用这个文字本对照他们已掌握的总统以前发表少数几次讲话的录音带，发现有些不符之处，标有“听不见”或“无情报价值”的空白有近 1800 处。分析人员指出，这些空白有三分之二是出现在总统自己说话时。而在他与霍尔德曼和前白宫助手埃利希曼的谈话中，则出现最为频繁。这结果使公众舆论掀起反对尼克松的轩然大波，要求他辞职或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明显增高。

尼克松举步维艰，但仍面临着必须再交出一些录音带的要求。否则他简

直无法过关。贾沃斯基通过法院进攻，于4月18日传调64盘录音带。尼克松请求法院宣布这一传调无效。7月底，水门事件发展到了顶点。7月24日，首席法官宣读了对于贾沃斯基要求得到64盘传调录音带一案的裁决。最高法院复审案件目录上写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控诉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法院以八比零一致裁决总统败诉。

在全国的注视下，司法委员会7月30日向众议院呈送了弹劾总统的条款。头两条很重要：第一条指控总统给司法工作设置障碍；第二条指控他滥用职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两条得到对立两党的一致支持。弹劾问题已摆在众议院面前。

尼克松的辩护人企图以总统没有具体罪行为理由来挫败弹劾的一线希望，也于7月24日被最高法院粉碎。法院命令尼克松交出剩余的录音带，特别是要他交出被称为“冒烟的枪”的那盘录音带，其中一盘录有总统在1972年6月23日与霍尔德曼的一次谈话，尼克松明白指示他的助手让中央情报局制造一次“国防安全”行动，并让联邦调查局插手水门事件。这是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发生六天之后下令进行掩盖事实真相的证据。

在水门事件真相大白之后，尼克松度日如年，但他仍表示不愿辞职。他说：“唯一的方针是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分钟。”与尼克松的意愿相反，弹劾总统的议案已由众议院付诸表决，甚至连尼克松最坚定的支持者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尼克松不可救药。

形势急转直下，尼克松陷于绝望。他面临着痛苦的选择：辞职或被弹劾。如果被弹劾，他将在参议院接受至少六个月的审讯，在政治上便全然无能为力了。并且最后必将遭到失败和屈辱，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并被判犯刑事罪的总统。一年多来，他不知有多少个不眠之夜，而1974年7月30日晚上更是辗转反侧，举棋不定。

尼克松的助手们在听了那个被称为“冒烟的枪”的录音带后，也得出与尼克松同样的结论：局势已完全没有希望了。这时，尼克松才清醒地认识到，再抵抗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他决定辞职。

1974年8月8日，是尼克松当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天。他与副总统福特会晤，举行一次全面的情况简介会。下午九时，尼克松在白宫通过电视向全国民众发表辞职演说。人们清楚地在电视屏幕上看见这位卸任的总统流下眼泪。次日，他再一次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向他的白宫班子告别。根据规定的程序，尼克松的辞职在8月9日中午正式生效。

这位当了一任半的总统怀着十分沮丧的心情，不情愿地离开了总统的位置，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位普通公民。随着尼克松的倒台，轰动世界的水门事件所掀起的一场轩然大波终于平息。风波虽然平息了，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怀疑远远没有消除。也许政治丑闻永远都会有的，人们对此从不盲目乐观，只希望尽可能少一些。

（孙晓）

德雷福斯大冤案

十九世纪末，法国发生了一起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大冤案——德雷福斯案件。被告德雷福斯于 1894 年蒙冤后，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到 1906 年才彻底平反。这期间，许多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人士受到株连，遭到种种迫害。法国当局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长期知错不纠，甚至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掩盖真相，终于激怒了人民，使一起冤案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此案的群众运动。

当时法国从上到下，包括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体，几乎都分裂成为赞成重审和反对重审的两派，斗争异常激烈：亲朋之间争论翻脸；有的夫妇因此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一桌，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

整个法国因为德雷福斯案件，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之中，导致了几届内阁的倒台。要求重审此案的运动三起三落，历经十二年，最后才以德雷福斯恢复名誉而告结束。

德雷福斯是怎样蒙上不明之冤的呢？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法国和德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双方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一直没间断过。法国陆军总参谋部反间谍部门发现一系列机密文件被窃，这些机密文件包括：军事地图；新炸药性能说明书；法国的作战计划；和俄国签订的军事同盟合作细节等。种种迹象，引起法方对德国驻巴黎武官施瓦茨的怀疑。于是，法方便派间谍对施瓦茨暗中监视。

1894 年 9 月 26 日，安插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充当仆役的法国间谍，获得一张寄给施瓦茨的“便笺”。“便笺”没有署名，上面开列了送交此人查收的法国国防机密情报的清单。这张便笺很快被送到法军情报头头桑德尔上校手中。

这张便笺是谁寄给施瓦茨的呢？

经办此案的桑德尔等人，推测这是陆军参谋部的军官或是在参谋部有内线的人所写。后来又推测此人可能是炮兵军官。同时，从参谋部另外掌握的线索中，曾提到过一名“姓氏第一个字母为 D 的家伙”。于是，他们便在实习军官名单中，一个个往下找姓氏第一个字母为 D 的人。结果，找到了犹太人实习军官、新教徒德雷福斯上尉。办案人员对照了德雷福斯的笔迹，认为和那封便笺相似，便以此为由，于 1894 年 10 月 15 日，根据陆军部长签署的命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将德雷福斯逮捕。

德雷福斯何许人也？德雷福斯于 1859 年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其父是当地纺织业大老板。德雷福斯家定居此地已有几百年了。1870 年的普法战争，使法国被迫与德国订立丧权辱国的《法兰克福条约》，将阿尔萨斯割让给了德国。条约规定阿尔萨斯居民可以选择法国国籍，但必须离开当地。德雷福斯父亲毅然决定选择法国国籍，只留其长子照看家业。

德雷福斯自小抱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后来考入了高等军工学校，毕业后到炮兵连任中尉。再后来他又考入军事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被选派到陆军总参谋部实习。实习表现良好，曾得到总参谋长布尔瓦的好评。

德雷福斯被控犯有间谍罪，这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事实上，那张

便笺根本不是他写的。向德国出卖情报的真正罪犯另有其人。德雷福斯之所以蒙受不白之冤，是与当时法国的政治、社会情况分不开的。

十九世纪末期，法国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国内矛盾重重。社会上的反犹太势力随之抬头。反犹太主义者甚至危言耸听地声称，如果犹太军官一旦掌握军权，犹太人便将成为法国的主宰。又因为犹太人信奉新教，所以天主教报纸也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煽动反犹太人的情绪。

当时法国极右翼势力代表是反动的君主派，他们和天主教派、复仇主义者相互勾结，时刻企图推翻共和制。在军队高级领导层中，上述势力占主导地位。由于他们强烈的反犹太情绪和宗教偏见，犹太军官备受歧视和种种限制。当时得以进入陆军参谋部的仅德雷福斯一人。而且德雷福斯刚进参谋部时就受到参谋部军官们的敌视。前面提到的法军情报头目桑德尔上校，当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德雷福斯作为犹太人，是“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

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主办此案的军人带着强烈的种族偏见和宗教偏见，不分青红皂白，认定罪犯就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特别是另一个经办此案的军官亨利，更是心怀鬼胎。他一开始就认出了便笺上是他的朋友埃斯特拉齐的笔迹，不禁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生怕牵连自己，误了前程。这家伙阴险狡诈，善于察言观色投上级所好。当桑德尔出于偏见怀疑德雷福斯时，亨利大喜过望，庆幸找到了替罪羊。

但是，鉴定那张便笺笔迹的专家们，却没有能得出一致意见。其中法兰西银行字迹专家戈贝尔，坚决认定便笺上的字并非出自德雷福斯之手。专家们最后作出了“物证根据不足”的结论。这时，军方也觉得逮捕德雷福斯过于轻率。但是，由于逮捕的决定是陆军部长梅西埃将军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队和首长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既不愿轻易释放，又迟迟未能开审。

在这骑虎难下的尴尬时刻，军队中的一些人为了摆脱困境，并利用这一案件达到他们反犹太的政治目的，想方设法要给德雷福斯安上间谍罪名。他们不惜违反国家法律和军队纪律，公然把军队里尚在秘密侦查中的“案情”，向反犹太的报纸《自由论坛报》等透露。梅西埃部长甚至在审讯前，就公开向报界确认德雷福斯就是罪犯。这些报纸如获至宝，借此大作文章。因为德雷福斯既是“可恶”的犹太人，又是“里通德国”的间谍，这正是煽动反犹排犹的绝妙材料。甚至还有人造谣说：犹太人正用金钱赎买“卖国贼”德雷福斯的自由，扬言应对他判处死刑。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法庭不顾被告方面的抗议，于1894年12月举行了秘密审讯。第一天审讯下来，连军事法官们也认为证据不足。亨利见势不妙，便在法庭上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后，用手指着德雷福斯说：“奸细就是他！”

正当军事法庭经过四天审讯，暂时休庭以讨论判决的关键时刻，陆军部长梅西埃将军竟编造了一份德雷福斯的“秘密档案”。在这份“密档”里，塞进了他们经过精心篡改的“罪证”。

既然是陆军部长的旨意和命令，军事法庭便不顾案情真相，全体一致判定德雷福斯有罪，判处无期徒刑，革除军职，流放到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要塞终身囚禁。随后，被告的上诉也被驳回。

1895年1月，在法兰西军事学院操场中央，举行当众革除德雷福斯军职的仪式。对军人来说，最大的羞辱莫过于当众革职了。德雷福斯的肩章被扯去，帽徽被摘掉，勋章统统被除下。最后，他的军刀也被一折两段，扔在地

上。同年4月，德雷斯福被押往魔鬼岛服刑。

当时，法国舆论不明其中冤屈，还赞扬军队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有人甚至对德雷斯福未被判处死刑而感到愤慨。

德雷斯福在这突如其来的诬陷打击下，坚贞不屈，他在一切场合，始终表白自己无罪。审讯判决前，当局曾软硬兼施地要他认罪，并许诺：如他供认了，就可从轻判处，但遭到了德雷斯福的严词拒绝。德雷斯福的哥哥不惜倾家荡产，四出营救；他的妻子深信丈夫无辜蒙冤，一次次写信鼓励他、安慰他。

尽管德雷斯福一家人到处奔走，要求伸张正义，以营救无辜的亲人。但是，由于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猖獗，巴黎的犹太人士和某些报纸明哲保身，舆论也渐渐把此事淡忘了。德雷斯福冤案眼看山穷水尽，伸冤无日了。

德雷斯福究竟犯了什么罪？定罪的根据是什么？总参谋部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要知道，德雷斯福一家毕竟不是一贫如洗的老百姓，就连他妻子也是巴黎大钻石商的女儿。德雷斯福一家决心花费巨额金钱，采取各种手段设法弄清真相，这对官方是有一定压力的。参谋部理亏心虚，不得不进一步搜集“证据”，以进一步证实德雷斯福的“叛国”罪行。

自德雷斯福被捕后，军事情报仍不断走漏。负责德雷斯福案件的皮尔卡中校，在一次查阅档案时，看到埃斯特拉齐要求调动工作的书面申请，觉得字迹十分眼熟，和德雷斯福案件中的那张便笺极为相似。于是，他从案卷中取出便笺，两相对比，发现笔迹果真一模一样。儿名字迹专家也一致肯定这两份材料是同一人手笔。至此，皮尔卡确信，埃斯特拉齐不仅同德国武官有着十分可疑的关系，而且他就是写那张“便笺”的人，从而可以断定德雷斯福是受冤枉的。

皮尔卡为人正直。他立即将这一案情的重大发现向总参谋部长官汇报，敦促军队争取主动，重审此案。

照理说，皮尔卡发现了真正罪犯，一场冤案至此可以真相大白了。然而法国军队中的当权者们却与皮尔卡的想法完全不同。在他们心目中，军队作为国家的支柱，在公众面前应该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改变原判，就给军队脸上抹了黑。因此，总参谋部长官拒绝捉拿真正罪犯归案，并下达指示，不得把真相外传，不能把两起案件混为一谈，并且强调，德雷斯福案件已经了结，不能翻案。

皮尔卡坚持真理、伸张正义，被军队上层领导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掉而后快。1896年11月，皮尔卡被长期调离法国本土，派到突尼斯边境去同阿拉伯人作战。军方的险恶用心是想让皮尔卡身死疆场。

皮尔卡意识到上司的险恶用心，提高了警惕。他估计进一步的打击陷害可能接踵而来，甚至说不定还会遭到暗算。为使真相不致湮没，他便于1897年4月2日，在突尼斯写了一封信给共和国总统，作为遗书的附加书，上面注明：“万一本人去世，请交共和国总统，此件内容惟有他应该知悉。”

两个月后，皮尔卡费尽周折，获准回巴黎休假几天。他把此信托付给他的好朋友、巴黎第七区区长勒布卢瓦律师，嘱咐他万一自己身遭不测，便代他把此信寄交总统。

后来，随着案情的发展，他又授权勒布卢瓦，将事情真相告诉关心德雷斯福案件的议员，条件是不透露他的真名和身份。

与皮尔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亨利。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为了迎合上司

的政治需要，为了保全自己的功名利禄，千方百计要给德雷福斯强加间谍罪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甚至一而再地篡改皮尔卡的信件，以造成皮尔卡的仗义行动是受人指使的假象。他又将篡改后的信件呈送上级，装进了皮尔卡的档案。

亨利的所作所为，正中上级下怀，而上级坚持原判的立场，又进一步鼓励了亨利继续栽赃害人。此后几年，亨利一直别出心裁地不断伪造“罪证”，其中最耸人听闻的是所谓德雷福斯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七封信，以及威廉皇帝给德雷福斯的回信。大意是：德雷福斯要求德国皇帝让他到德国军队中服役；而威廉二世通过德国驻法大使转告德雷福斯，他作为德国间谍留在法国军队中更能为德国效劳。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真相终于透露出来并张扬出去了。法国著名作家左拉说：“真理在前进，什么也阻挡不了它！”自德雷福斯被判罪以来，经他的哥哥和妻子想方设法全力营救，终于争取到了一些重要人士的支持。这些人士有众议院议员雷纳克、参议院副议长休雷、犹太血统的政治家拉扎尔等。

德雷福斯的妻子马蒂厄与拉扎尔一起，广泛印发“便笺”照片，希望找到真正的罪犯。1896年11月，银行家卡斯特从“便笺”照片上，认出埃斯特拉齐的笔迹，他立刻把这一重要发现告诉了马蒂厄。11月16日，马蒂厄写信给陆军部长，正式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并对埃斯特拉齐提出指控。

与此同时，参议院副议长休雷也在进行调查。他从勒布卢瓦处获悉了案情的内情，还从埃斯特拉齐的表妹处，看到了埃斯特拉齐的很多信件。这些信件，不仅笔迹与“便笺”相同，而且流露出对法国的强烈仇恨。有力的旁证获得了。于是，休雷先在《时代》报上公布了他几个月来的调查情况，接着，他于1897年7月在议会要求政府重审此案，纠正错判。

一时间，法国舆论轰动，议会两院向政府提出好几次质询。从此，德雷福斯案件突破军队的范围进入了社会。一场争取重审此案的社会运动开始了。

重审运动序幕揭开时，军队、政府、司法机关、教会以及各界人士中，赞成重审的只是极少数。当时谁要是敢怀疑原判，谁就会遭到种种打击，被安上“破坏军队荣誉”、“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甚至会受到暴徒的袭击，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尽管如此，随着事实真相的陆续披露，正直的人们逐渐认识到，既然军队错判无辜者，就应该伸张正义，纠正错误。他们纷纷站到了赞成重审派的行列，他们当中包括著名知识界人士左拉、法朗士、佩居伊；政界知名人士克列孟梭、饶勒斯。

要求重审的运动远非一帆风顺，最大的阻力来自军队。按照传统，军队自成体系，自行其是。军队自有一整套独特的晋升制度和司法裁判规章，不受政府机关干预。军队的上层军官中，很多是君主派子弟。君主派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军队身上。军队上层领导与社会上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决意死顶硬抗。

早在皮尔卡把重大发现汇报上级时，当时的陆军部长比约、总参谋长布尔瓦等就主张维持原判不动。然而他们心里都清楚，真正的罪犯是埃斯特拉齐。他们私下授意埃斯特拉齐以身体不好为由，提出离职休养的申请。埃斯特拉齐当然就一切照办了。就这样，这个真正的间谍罪犯，就在陆军总部和参谋总部的包庇下，长期逍遥法外。

而现在，要求重审的呼声日益高涨，马蜂窝捅开了。要是确认埃斯特拉齐是真正罪犯，那么德雷福斯就是无辜受冤了，这就必然会影响上至将军下至办案人员的地位和前程，所以军队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原判。他们后来又玩弄花招，把两案截然分开，决定避开德雷福斯案件，单独就埃斯特拉齐是否有罪进行审讯，以搪塞舆论。他们生怕埃斯特拉齐干出畏罪自杀或潜逃国外这类蠢事来，因为这样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有罪，从而打乱军方的如意算盘。于是，为了稳住埃斯特拉齐，亨利等人事先向他透露了军方的意图，连审讯时的辩护词都代他拟好了。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审讯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把戏了。

政府本该根据案情的新发展重审此案。但是，当时右翼势力占主导地位的梅利那内阁同军队一鼻孔出气，拒不考虑重审德雷福斯案件。1897年12月初，梅利那总理竟然在议会郑重表示：1894年对德雷福斯的判决是正确的。

在军队、政府、司法各方串通密谋、策划停当后，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开始审理埃斯特拉齐被告。法官和陪审员们根据长官事先下的旨意，竟然在三分钟内，全体一致通过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释放。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庭作证的皮尔卡中校，反被法庭判以“诬告罪”而遭逮捕，押往军事监狱。

当晚，暴徒们在街上聚众闹事，狂热地煽动反犹太情绪，高呼“埃斯特拉齐万岁！军队万岁！处死犹太人！”等口号。审讯后，议会拒绝召开任何有关此案的辩论。支持德雷福斯的参议院副议长休雷，也在议会改选中落选。

然而，真理和正义的声音是压不住的。审讯后两天，平地一声惊雷，敢于伸张正义的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以醒目的“我控诉！”几个大字为通栏标题，在《震旦报》头版头条，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他以犀利的笔锋，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指名痛斥陆军最高领导陷害无辜者，有意开脱真正的罪犯。这封信把德雷福斯案件的内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家在信的结尾写道：“我的行动纯粹是一种革命手段，目的在于使真相和正义早日大白于世……我在等待着。”

刊登有左拉致总统公开信的《震旦报》，30万份销售一空。在国内外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几天内，在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等倡议下，各界知名人士3000人联名请愿支持左拉。当时旅居法国的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于1898年1月从尼斯发出的信中写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站在左拉一边，相信德雷福斯无罪……每个法国人都感觉到，人间毕竟还有正义。”然而，果不出左拉所料，左拉多次被暴徒凌辱，险遭毒手。

梅利那总理在军方催促下，施展以攻为守的伎俩，悍然对左拉起诉。为了使审讯不涉及德雷福斯案件，他们煞费苦心单挑“公开信”里的三行文字起诉。这年2月，军方以“诽谤罪”在巴黎对左拉提出公诉。在审讯中，总参谋长布尔瓦等公然以全体将军集体辞职作为要挟，要求法庭对左拉判罪。下到一小时，法庭便判左拉一年徒刑，罚款3000法郎。法院的走廊里挤满了暴徒，他们狂热地高呼：“军队万岁！”“打倒左拉！处死犹太人！”当晚，一群暴徒砸了左拉的家。

左拉被迫流亡到英国去了。出庭作证的皮尔卡中校被开除了军籍。总理梅利那在议会宣布：谁要是继续为德雷福斯翻案。他就要行使“严格的法律制裁”。许多支持德雷福斯的官员、教授、军官、律师都被免职并受到不同

程度的处分。一时间，反动浪潮席卷全国。巴黎、里昂、马赛等地发生多起暴徒示威；在法属阿尔及利亚还发生了屠杀犹太人的血腥事件。刚刚打开的通往重审的大门再次关闭了，左拉公开信燃起的一线希望又黯然消失。

争取重审的斗争，从少数德雷福斯的至亲好友，发展到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德雷福斯个人命运的范围。它对法国政治局势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98年4月的议会选举，总理梅利那宣告下台，由布里松继任总理。

布里松总理任命卡芬雅克为新的陆军部长。卡芬雅克一贯鼓吹军国主义，顽固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1898年7月7日，卡芬雅克在议会发表长篇演说，为扼杀重审运动大造舆论。他当众出示亨利篡改伪造过的“罪证”说：此案铁证如山，替德雷福斯翻案的人应该就此罢休。

但是，当权者们的倒行逆施恰恰是火上加油，反倒使要求重审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因仗义执言而受陷害被开除军籍的皮尔卡，于7月10日写信给新总理布里松，表示愿意在任何法庭上作证，证实1894年的两份文件与德雷福斯无关，而1896年的那份文件则纯系伪造。

恼羞成怒的新陆军部长卡芬雅克，于7月13日下令逮捕了皮尔卡。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他仍不得不下令对文件进行核实。承办此案的是过去没有插手过此案的基涅上尉，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在确凿的事实面前，先是死不承认。最后不得不交待了作伪罪行，当场被捕。第二天，他在尚未彻底交待全部栽赃害人罪行的情况下，用剃刀割破喉管自杀。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杀人灭口。

一场丑剧就这样突然被戳穿，形势急转直下。9月4日，陆军部长卡芬雅克、总参谋长布尔瓦等三名将军狼狈辞职。真正的罪犯埃斯特拉齐，在军方的蓄意包庇下原已离职休养，这时见势不妙，也畏罪潜逃英国。

亨利的自杀，在社会舆论中引起极大震动。重审运动掀起新高潮。德雷福斯的妻子写信给司法部长要求重审。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同意将此案提交最高法院。至此，声势浩大的重审运动对政局产生了直接影响。10月，布里松内阁垮台。11月1日，迪珀伊当选新总理。新政府面临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处理重审问题。

时局对德雷福斯越来越有利：1899年2月16日，顽固反对重审的富尔总统突然去世，赞成重审的卢贝当选为总统。同年6月，最高法院终于撤销对德雷福斯的原判，由军事法庭重新审讯。监禁在魔鬼岛近五年之久的德雷福斯被押回国出席庭审。被关了近一年的皮尔卡获得了释放。在英国流亡了11个月的左拉也回到了法国。

人们满以为军事法庭会很快宣布德雷福斯无罪，可是全然没有料到，在真相已经大白的情况下，军队上层领导仍一口咬定德雷福斯有罪。审讯中，德雷福斯的辩护律师被一名暴徒开枪击伤，以致法庭被迫临时休庭。当了参议员的前陆军部长梅西埃，把全部伪造文件改头换面后又拿了出来，还恬不知耻地声称，这是道义责任和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他这样做的。7名法官以5票对2票，作出了一项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判决：仍判德雷福斯有间谍罪，但“情有可原，从轻处理”，改判十年苦役。

这项判决激起了法国各界人士的极大义愤，世界各国的反应也很强烈。在审讯后的短短几天内，法国和世界各地给德雷福斯发来了几千份函电，对这项不公正判决表示抗议。在20多个国家中还发生了反法示威游行。

德雷福斯案件的曲折进程，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虚伪性，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性。这时，要求重审的社会运动，已经导致了全国性的政治危机，甚至有爆发内战的可能。面对这种危急局势，法国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意识到危机如果进一步发展，将会动摇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主张在处理德雷福斯个人命运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以渡难关。1899年6月，持这种主张的卢梭出任总理。仅当了半年多总理的迪珀伊下了台。

卢梭任命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里费担任陆军部长。卢梭政府出面打圆场，提出一项折衷方案，在维持对德雷福斯的原判的前提下，以总统名义赦免德雷福斯，以便保全军队上层领导的面子，又堵住重审派的口。接着陆军部长加里费宣布“案件已经了结”。

德雷福斯案件果真就这样草草了结了吗？

赦免本身并没有否决判决，它仍然意味着确认德雷福斯有罪，仅仅表明政府当局予以“宽大”处理而已。而且，受株连的皮尔卡、左拉等继续背着黑锅。皮尔卡虽已获释放，但仍未恢复名誉，对左拉的判决还没撤消，对他的迫害还在继续。真正的罪犯和包庇罪犯的人并没受到追究。

1899年9月19日，德雷福斯第一次作为一个自由人，走出了监狱。但是，争取恢复名誉的斗争还是遇到了许多障碍。从1899年到1906年，德雷福斯和他的家人以及所有支持他的社会各界人士，一直为此而斗争。

1906年1月，坚决主张重审的法里叶尔当选为总统。同年6月，和总统持相同立场的克列孟梭当了总理。克列孟梭当年曾给著名作家左拉出主意，并把左拉的《我控诉》一文在《震旦报》发表，克列孟梭这次能上台执政，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他在重审运动中赢得的政治威望。

前后延续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案件，终于由最高法院重审，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并恢复名誉。议会也通过了恢复德雷福斯和皮尔卡在军队中的名誉的议案。德雷福斯晋升为少校。因仗义执言而受株连的皮尔卡中校，晋升为准将，并在克列孟梭内阁中任陆军部长。著名作家左拉已于1902年9月逝世，他虽然没看到德雷福斯案件的最终结局，但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骨灰被隆重地放进巴黎“先贤祠”。

（贺稳）

暗杀女王的阴谋

十五世纪下半叶，英国红白玫瑰战争进行了几十年。所谓红白玫瑰战争，是指两大王族——兰加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王位在两个家族之间转移了多次。红白玫瑰战争，以 1485 年由兰加斯特家族的远亲都铎·亨利七世登上王位而告终。不久，亨利八世继承了王位，他同罗马教皇断绝了关系，自封为英国教会的领袖。他解散了教堂，没收了教堂的大片领地和许多信仰天主教的贵族的田庄。这笔巨大的财富绝大部分落到了亨利王朝贵族手里。因此，他们最担心天主教复辟，一旦复辟，那么土地将复归原主。

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做了几年国王，而后就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姐姐玛丽。玛丽虽恢复了天主教，却不敢叫那些新贵族将占来的土地还给罗马教会。

1558 年，玛丽死后，伊丽莎白·都铎即位，她又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伊丽莎白是亨利八世和妃子安娜婚后所生的女儿。而安娜是被亨利八世杀掉的。既然妃子被国王杀了，在天主教徒眼里，他们的婚姻是非法的，这样，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就值得怀疑了。与英国王室有远亲关系的苏格兰女王玛利·斯图亚特宣称自己应该继承王位。娶她的妹妹为妻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也参与了争夺英国王位继承权的斗争。

正是在这种一触即发的社会环境里，正是在这种面临最后冲突的疾风迅雷般的气氛里，伊丽莎白和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为首的天主教反宗教改革派之间，展开了残酷的秘密斗争。参与这场秘密斗争的，还有罗马教皇庇护五世。在他们的策划下，十六世纪 80 年代初，耶稣会教士又一次搞了一个旨在杀害伊丽莎白女王、扶助玛利·斯图亚特登基的阴谋。这项阴谋的代号为“英国事务”。但是，这次谋杀由于英国当局逮捕了西班牙大使手下的一名间谍、在搜查时发现一面小镜子后面藏的文件而失败了。

这时候，欧洲已经建立起一个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为中心的组织，它不断想用谋杀、宫廷政变或新的天主教暴动的办法，来搞掉伊丽莎白女王。女王陛下的两名谍报头目贝尔利和沃辛海，在刺杀女王的阴谋已经很多的情况下，特意制造了一个假阴谋，将计就计，试图让敌手钻入圈套，从而一举摧毁他们。

沃辛海手下有个间谍，名叫朱福特，是一位天主教绅士，这次，他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个人表面上拥护玛利·斯图亚特登基。人们很难看出，他是忠于伊丽莎白的极为狡猾的间谍。1585 年，朱福特在巴黎住了几个月，会晤了玛利·斯图亚特党的主要领导人彼哲特大主教和摩根。朱福特表示，他有办法解救已被囚禁的玛利·斯图亚特。彼哲特和摩根把朱福特派往伦敦，热情地把他推荐给法国大使沙特涅夫。沙特涅夫对朱福特将信将疑。朱福特经常表示矢志于苏格兰女王玛利·斯图亚特；沙特涅夫对他的怀疑渐渐打消了，把一封给玛利·斯图亚特的信交给了他，让他设法转交。

朱福特拿了信以后，就到故乡斯塔福德郡去，住在他叔叔那儿。他的房子离那座囚禁玛利·斯图亚特的恰尔特利城堡只有几英里。这里还得交待一下玛利·斯图亚特的为人：她在法国读书时嫁给了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二世，不久国王去世，她回到了祖国。她出于偶然的奇怪念头，嫁给了外貌漂亮但地位低微的英国贵族达恩列。然而不久，她伙同情夫博斯维尔伯爵暗杀了他

的丈夫。玛利宣布和博斯维尔结婚，并坚决表示要跟苏格兰贵族断绝关系。但是她在同苏格兰贵族的公开斗争中失败了，被捕入狱。后来她越狱逃往英国，仇视她的伊丽莎白很快又把她监禁起来。由于她一再策划谋杀伊丽莎白的阴谋，英国政府又把她转押到恰尔特利城堡；以前她可以在附近骑马散步，现在却成了女囚，完全失去了自由。

恰尔特利城堡离那些天主教贵族领地不远，这就使女囚玛利·斯图亚特重又产生了一些希望：想跟拥护她的人取得联系，重新开始她那多次以失败告终的、冒着生命危险的政治赌博。

朱福特考虑和观察了当地的情况后，决定采取行动了。

附近的一座小城巴尔顿以生产优质啤酒而远近闻名。当地的一个啤酒酿造商每星期要送一桶啤酒到恰尔特利城堡去。啤酒酿造商姓名不详，他们管他叫“老实人”。朱福特和那位监禁玛利·斯图亚特的埃米斯先生，都同“老实人”挂上了钩。

在一只双层底的大桶里放着一个藏着信件的水壶。管家拿到了木桶，就把里面的啤酒倒出，把看来是空的桶交给玛利·斯图亚特的一个秘书。这个秘书再从那儿取出材料，交给玛利·斯图亚特。第二天，用同样的办法，送出了玛利·斯图亚特给她的拥护者的信。但是，所有这些密信都毫不延误地落到了朱福特手中，并由他急速送往伦敦。信都是用密码写的，但是谍报头目沃辛海手下有一位破译密码的专家托马斯。这个托马斯用不着费什么时间，就把信的内容翻译出来了。

“老实人”曾提醒过那位深知敌方手法的玛利·斯图亚特，要她注意戒备，但是彼哲特和摩根非常热情地推荐朱福特，说他很忠诚，因而使玛利·斯图亚特对他的怀疑解除了。与此同时，法国大使沙特涅夫也完全相信了朱福特的忠诚，并开始通过他传递从国外寄给玛利·斯图亚特的全部秘密信件。现在，苏格兰女王玛利·斯图亚特所有的信件，都经过沃辛海之手了。

朱福特把事情安排得妥妥贴贴，即使他不在时，也有人做。为此，他跟自己的一位朋友、天主教徒托马斯·倍恩斯约好，让倍恩斯收受“老实人”的纸包，然后赶快转交给另一个住在通往首都的大路旁的约里克郡的人。而那个人则用各种办法，把信送到法国大使馆（当然是在信件到过沃辛海的谍报机关之后）。两头的接头工作安排得无懈可击，这时，朱福特就回巴黎朱福特回到巴黎后，利用他成功地充当玛利·斯图亚特的联络人这个有利条件，进一步打入了伊丽莎白的政敌的核心。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主张把沃辛海和伊丽莎白的其他谋士搞掉；还有人主张把玛利·斯图亚特劫出来。朱福特解释说，再想使玛利·斯图亚特越狱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只要有一点儿风吹草动，监视玛利·斯图亚特的人就会立即把她处死的。他说唯一的出路是暗杀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一死，玛利·斯图亚特就能登上王位，国内是会有人出来反对的。朱福特还巧妙地利用了西班牙驻法国大使孟都斯。孟都斯对伊丽莎白怀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热烈地支持暗杀伊丽莎白女王的计划，因为这个计划为英国臣服于西班牙腓力二世打开了一条通道。

朱福特又回到伦敦，物色刺杀伊丽莎白的适当人选。他物色到一个名叫巴宾顿的年轻人，这个人是个天主教徒，非常富有，他曾表示过尽忠于被囚禁的玛利女王。然而，事情并非像所希望的那样一帆风顺。巴宾顿同意参与密谋解救玛利·斯图亚特，却惊恐地拒绝谋杀伊丽莎白，因为他怀疑，这样做是不是符合天主教教义？

不管愿意不愿意，朱福特只得再次前往法国，把天主教神父巴拉特请来，让他消除巴宾顿的疑虑。不久又出现了一个志愿者——自告奋勇去谋杀伊丽莎白·斯图亚特的冒险家赛凡奇。这时候，巴宾顿的疑虑已经打消，积极参与了密谋。他向他的新朋友们说，为了保险起见，要几个人同时搞暗杀。于是选定了六个人。要知道，再拉几个急性子的人参加已不是什么难事了。与此同时，还找到一些人准备去劫持玛丽·斯图亚特。

密谋进展到这种地步，幕后策划者之一的托马斯·摩根，这个老练的秘密工作者就想到，把暗杀伊丽莎白的计划告诉玛丽·斯图亚特的话，对她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一旦失败，她将被作为同谋犯而送上断头台，摩根为此写了两封密信给玛丽·斯图亚特，提醒她处事要谨慎。但使人吃惊的是，玛丽·斯图亚特接着又收到了第三封密信，信的内容截然相反，建议玛丽·斯图亚特跟那些密谋者建立联系。原来，这是混入密谋者之中的伊丽莎白的间谍们搞的圈套，第三封信是伪造笔迹高手费列普斯的杰作。

费列普斯还伪造了巴宾顿给玛丽·斯图亚特的密信，信中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暗杀伊丽莎白。“巴宾顿”在信里说，包括他在内的六个贵族将要杀死伊丽莎白，同时他又写道，谋杀之后他将在远离伦敦的恰尔特利附近。他在信里还谈了其他许多近乎叛国的计划，如请求外国干涉、煽动英国天主教徒暴动，如此等等。

7月12日，“老实人”把“巴宾顿”的信交给了玛丽·斯图亚特。她的秘书通知说信收到了，回信三天后寄出。一天，苏格兰女王玛丽在特许骑马出游时，遇到了一个目光低垂、满头火红头发的小伙子，这个人的外表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个人就是费列普斯。

7月17日，玛丽·斯图亚特写了封回信给巴宾顿。这封回信又让伪造笔迹能手费列普斯在上面做了手脚：添上了暗杀伊丽莎白女王的内容。而斯图亚特原来的信中，只有赞同促成外国干涉和赞成天主教暴动，没有暗杀伊丽莎白女王的片言只字。玛丽·斯图亚特同一天也写了信给摩根和孟都斯，也只字没说即将发生的暗杀伊丽莎白的事。

第二天，费列普斯就给沃辛海寄去一份用密码写的复本。费列普斯和沃辛海这么暗做手脚，是为了以后在逮捕审判玛丽·斯图亚特时，提供足够的“证据”。而玛丽·斯图亚特还蒙在鼓里呢，她不知道绞索已套牢在自己脖颈上了。

密谋者之一的巴宾顿，有时恍恍惚惚地预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收紧他们送命的网。他于是决定去巴黎找孟都斯先生商谈。孟都斯劝巴宾顿不必多虑，并通过沃辛海的秘书普利，让普利带他去见沃辛海。孟都斯和巴宾顿都以为沃辛海是自己人，哪知道沃辛海是忠于伊丽莎白女王的间谍头目。巴宾顿竟把玛丽·斯图亚特的密信给沃辛海的秘书看了，还洋洋得意地说，英国很快会发生三件大事：外国入侵、伊丽莎白遇刺和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登基。沃辛海听秘书报告后阴险地一笑。巴宾顿给秘书看的那封密信，就是他的密探费列普斯做过手脚的那封。

但是，巴宾顿却迟迟拿不到去法国的护照。

8月里，密谋者得到消息：天主教神父巴拉特的一个掌握了他们全部内情的仆人，是伊丽莎白女王政府的密探……

巴宾顿听到这一惊人消息后，吓得六神无主。他企图挽救自己。他给沃辛海的秘书普利写了一封信，请求以他巴宾顿的名义转告沃辛海，说是发生

了一件阴谋案，他准备向他禀报全部案情。他打算出卖同谋者换取自己的生命。几小时过去了，没有回音，他急得如坐针毡。

第二天早晨，巴拉特和另外几个密谋者被捕。通宵未眠的巴宾顿又直接写了封信给沃辛海。他接到通知说，过一两天再答复他。

晚上，巴宾顿同沃辛海的一个助手一起吃饭，他发觉有人递张条子给这个助手。巴宾顿用眼梢瞄了下纸条，看见上面写着：“不要让巴宾顿溜掉，看住他。”

事不宜迟，巴宾顿悄悄走出了房间，佯装上厕所，为了迷惑看住他的人，他把斗篷和宝剑留下了。他看看四下无人，溜出了饭店后门，急急忙忙逃到他的一个朋友那儿。那朋友见他神色慌张，问他出什么事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找些工人和仆人的服装来，事情败露了，我们得赶快逃离这儿！”……

门外响起皇家骑警队得得的马蹄声和吆喝声。一些士兵在张贴通缉令。

几天之后，巴宾顿等人全部被捕。与此同时，皇家骑警队包围了哈尔特利城堡。玛利·斯图亚特一看大事不好，连忙返身去书房，打算焚毁那些密信，但是已经迟了，警察们已经破门而入，逮捕了她。城堡被查抄，屋里屋外被翻了个遍，一片狼藉。秘密信件都被抄了出来，她的秘书、仆人统统受到监视。玛利·斯图亚特被转押到另一座监狱，关进一间密不透风的牢房里，门口有哨兵昼夜站岗。

巴宾顿等人身陷囹圄，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是上了朱福特的当了。于是他们纷纷写交待材料，供认是朱福特唆使他们叛国和企图暗杀伊丽莎白女王的。但这些材料都被英国警察当局严严实实地隐瞒了起来。此刻朱福特和费列普斯都在法国。费列普斯半是友好半是嘲弄地警告朱福特说：“老兄，你有可能受到参与阴谋的怀疑啊……”朱福特一听慌了，要知道间谍头子沃辛海有可能在利用过他之后，借法国当局的手杀他灭口。

朱福特慌忙回到了英国。在英国，他隐姓埋名躲藏了起来。他生怕自己落到司法机关手中，指控他是密谋分子之一，而沃辛海故意不为他作证。这样，司法机关就会以挑唆谋杀伊丽莎白罪，将他处以死刑。幸好，并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

9月18日，特别审判委员会审讯了巴宾顿和他的六个助手。过了两天，其他密谋者也相继受审。在法庭上，全体被告都承认有罪，并当堂签字画押，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提供有关阴谋活动的罪证了。

在中世纪的英国，刑罚极其残忍。最重的刑罚有割舌头、挖眼珠、掏心等等，而且处死后尸体将吊在树上，让所有的肉和内脏自行脱落。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女王还问有没有更重的刑罚？司法大臣贝尔利说：“陛下，已经规定的刑罚对任何一个罪犯都是够受的啦。”

处死六名阴谋分子花了许多小时，用刑手段残酷之极，竟使那些看惯这种场面的伦敦居民们，神经也支持不住了。于是有的大臣恳请仁慈的女王陛下，第二天处死的七个人改用绞刑。女王恩准了，同意绞死后再砍下他们的脑袋和四肢。

接着就轮到玛利·斯图亚特了。1587年2月8日，年轻美丽的苏格兰女王玛利·斯图亚特，被刽子手们押上了断头台，在刽子手的利斧之下结束了生命……

（贺兰）

“多纳·帕斯”号关事

菲律宾是个岛国，拥有大小岛屿7千多个，渡轮自然成了人们在岛屿间往来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这些船只大多吨位小、设备差，超载严重，加上航道拥挤，缺乏安全措施，致使菲什宾成为世界上海难事故最多的国家之一。在1987年前的54年中，菲律宾共发生728起海难事件，共有1632人丧生，其中仅1984年就有138艘船只沉没。然而，1987年12月20日发生的一起撞船事故，遇难人数近3000人，远远超过了过去54年的总和，成了本世纪世界航运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海难事故。

菲律宾绝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圣诞节显然成了全国最为重要的节日。圣诞前夕，因故外出的菲律宾人归心似箭，谁都想尽早赶回去与家人团聚，共度佳节，因此客流量大增，使得原本已超载的客轮更加拥挤不堪。

1987年12月20日清晨5点30分，停泊在菲律宾南部海滨城市——塔克洛班市的莱待岛的一艘白色客轮，发出一声长鸣，在晨曦中缓缓离开港口，朝首都马尼拉方向驶去。

这艘客轮名叫“多纳·帕斯”号，排水量为2300吨，1963年在日本建成下水，按原设计只能载608人。1975年被菲津宾苏尔皮西奥航运公司买下后作了改建，载客量才猛增至1518人。可这次的载容量已远远突破这一最高限额。除了1562名登记乘坐的旅客外，还有许多持客运公司通行证的人和数百名没有购票的儿童，加上临开船前强行冲上船的数百名无票者，载客人数已近3000人，大大超载。

船舱里，任何人都休想挪动半步。平日坐一个人的吊床，这次都坐了三、四个人，连过道上、甲板上也挤满了人。为了给乘客找空位、补票，船上53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

虽然大多数乘客没有足够的地方舒适地安身，但他们却处在圣诞前夕的节日气氛之中。船舱里回旋着优美动听的乐曲，到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即将与家人欢度节日的喜悦，旅途的劳累早已抛在九霄云外。

在阳光的照耀下，客轮平平稳稳地前进着。渐渐地，夜幕降临了。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乌云遮住了月亮，天上一点星光也没有。客轮开始静了下来，大多数人回到自己的客舱，在灯光下静坐或小声地聊着天。夜深了，有些旅客不堪疲劳，蜷曲着身子，慢慢地进入了梦乡。只有在甲板上和餐厅里，还剩下一些谈兴不减的乘客，他们依旧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圣诞节要买的礼物，在马尼拉码头将有亲朋好友在迎接他们，等等，天南海北地乱聊一气，以消磨时光。

夜里10时许，客轮已行驶到马尼拉以南160海里，位于民都洛岛和马林杜克岛之间的海域。这是一条宽约30海里的海上交通要道，是菲律宾南部船只通往首都马尼拉的必经之路。再过5个小时，客轮就要抵达目的地了。

甲板上的乘客还未散去，看来他们是不准备在拥挤的船舱里睡觉了。就在这时，突然有人高喊一声：“看，前面海面上有亮光！”人们立刻将注意力集中到“多纳·帕斯”号前方隐约出现的亮点。亮点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当人们看清前方是一艘油轮时，两船已近在咫尺。有人惊叫起来：“不好！”话音未落，只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船身猛烈地震动起来。“多纳·帕斯”号客轮被那艘油轮撞在了左船舷的中间部位，几乎将它劈成两段。

油轮叫“维克托”号，它载着 8300 桶原油，正全速驶向马斯巴特岛。

刹那间，客轮上的灯全灭了，主机也停止了转动。紧接着，一片火光冲天而起，船舱中浓烟滚滚，呛得人透不过气来。惊慌失措的人们乱作一团。船舱的出口被夺路而逃的人群堵死，后面的人不断拥上来，大多数人还未来得及爬上甲板，便被无情的海水淹没了。

“大量原油从撞裂的油轮中溢出，海面上燃起的熊熊大火包围了这两艘轮船。“多纳·帕斯”号甲板上的乘客顷刻间变成了火人，衣服烧着了，皮肤烧焦了，走投无路的人们只有跳入燃烧着的大海。

42 岁的奥萨尔，和他的姐姐以及 3 个外甥女一起乘船去马尼拉度圣诞节假。当轮船相撞爆炸时，他正与姐姐谈天。他赶紧跑到舱窗口，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见船周围已变成一片火海。在短短几秒钟之后，火焰便窜上了甲板。他急忙呼喊他的家人，可听到的却是大人孩子们的惨叫声和噼里啪啦的大火燃烧声。他冲上甲板，不假思索地纵身跃入海中。慌乱中，他抓住一块木板，随波逐流。水面上到处是火，还漂着许多尸体，有的尸体还在燃烧。他看见有一百多人跳进大海，但绝大多数仍葬身在火海中。他在海上漂浮了一个多小时，才被路过的船只救起。

44 岁的渔民巴克萨尔，看见甲板上燃起大火，连忙拉起 18 岁的女儿阿洛蒂亚，一起跳入海中。他凭着一身好水性，背着女儿在茫茫大海中拼命地游着，游着，最后终于获救。阿洛蒂亚是唯一幸免于难的女性。

25 岁的莱安达，由于这两天太劳累，晚上 9 点就上床睡觉。爆炸发生时，他还在熟睡中。是他的女朋友哈丽达叫醒了他。他见周围一片火光，情知不妙，就拉着哈丽达来到甲板上。面对四周熊熊燃烧的大火和烧焦的尸体，哈丽达吓坏了。莱安达紧紧握着她的手，鼓励她与他一起跳海。但她看到水面上漂来几具尸体时又害怕了。就在莱安达往下跳的那一刹那，极端恐惧的她猛地从莱安达手中挣脱，留在了甲板上。莱安达在海水中疯狂地叫着女友的名字，不顾一切地又向船游去。忽然，海面上一道烈焰蓦地蔓延过来，拦在他和船之间，就像一只无情的手将他与女友隔开。

他泪眼模糊，向燃着大火的“多纳·帕斯”号望去，他隐约看到混在惊恐人群中的女友，一动不动，脸色苍白。突然又一片燃烧的浮油向他袭来，他赶紧潜到水中。当他再露出水面时，周围海面仍然是火，他只好把鼻子露出水面，向外游去。

水面上漂着的尸体越来越多，大部分是妇女、儿童、老人。他在尸体的夹缝中，只偶尔看到几个幸存者在海水中挣扎。莱安达渐渐没有力气再游下去了，便任凭自己在海面上漂流。就在他陷于绝望之际，他听到一阵马达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一艘客轮驶来，把他搭救上船，他终于死里逃生了。

这艘客轮名叫“唐·克劳迪奥”号。两船相撞时，它正在 13 海里远的地方航行。腾空而起的大火被船上的一名水手发现了，他立刻向船长梅莱西奥·巴兰科报告了这一情况。巴兰科命令舵手火速驶往现场。

22 点 30 分，即撞船发生后约半个小时，“唐·克劳迪奥”号到达了火场。他们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两艘船及其周围海面都在燃烧，空气中散发出浓烈的石油气味，由此可知其中一艘是油轮。巴兰科船长下令打开探照灯，搜索海面。水手们惊讶地发现，海面上漂浮着一层尸体，有的残缺不全，有的还在燃烧，令人惨不忍睹。

“唐·克劳迪奥”号在现场反复搜索，寻找幸存者。经过 3 个多小时，

他们一共救起了 26 名幸存者，其中包括巴克萨尔及其女儿阿洛蒂亚，奥萨尔和莱安达，以及两名“维克托”号油轮上的船员。在午夜时分，“多纳·帕斯”号终于沉没，“维克托”号也很快燃烧殆尽。

随后赶到出事地点进行营救的还有 5 艘在附近行驶的商船，它们缓缓地搜寻着，结果却未发现一个幸存者。

天亮了，大海依旧那般平静，出事海域似乎没留下任何痕迹。两艘出事船只的残骸已静静地躺在 530 米深的海底，救援船再也没发现什么幸存者。“唐·克劳迪奥”号客轮只好掉转船头，将那 26 名烧伤的幸存者火速送往马尼拉。

21 日清晨 6 时，即海难事件发生 8 个小时后，菲律宾政府才获悉“多纳·帕斯”号客轮与“维克托”号油轮相撞沉没。又过了 8 个小时，政府派出的各方营救人员才赶到现场。军用直升飞机、海军舰艇在出事地点搜寻。科·阿基诺总统也派出自己的私人游艇参加了救援工作。

由于缺少先进的潜水工具，救援般的潜水员无法潜到 500 米深的海底去打捞沉船上的尸体，因而搜寻工作一直都在海面进行。虽然搜索范围一再扩大到 100 多海里，但直到夜里，仍没有发现一个幸存者，只打捞上数十具尸体。

22 日，政府当局命令救援搜索队继续进行搜寻，但忙碌了一整天，也未见生还者。救援专家认为，这片海域时有鲨鱼出没，看来不大可能找到幸存者了。于是，有关当局在当天傍晚宣布，停止大规模的救援搜寻工作。

然而，却有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这天上午传开了：一架菲律宾直升飞机将一个遇难的男孩送到马尼拉治疗，这个 5 岁男孩抱着一块木头在海上漂流两天后，被一位渔民在事故现场以南约 15 公里的海面救起。男孩的神志很清醒，他还记得“多纳·帕斯”号客轮沉没时，他的父亲给了他一块木头，让他抱住，使他成了第 27 个幸存者。这一奇闻首先由一些西方记者报道出来。

实际上，这一消息是虚构的，是菲律宾一家地方广播站为激励救援工作而编造出来的故事。

截至 12 月 26 日，共打捞起 410 具尸体，他们有的被烧焦，有的仅剩下半截身子，这很可能是鲨鱼吞咬的结果。其余 2000 多名死难者，或者连同他们乘坐的客轮一起沉入 500 米深的海底，或者烧成了灰，或者葬身鱼腹。

科·阿基诺总统 22 日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她说，在圣诞节前夕发生的这一海难是全民族的悲剧。她下令要彻底调查这起海难事故。

圣诞节的马尼拉市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之中。连日来，数千名“多纳·帕斯”号死难者家属，聚集在客轮所属的苏尔皮西奥航运公司门前，他们有的嚎陶大哭，有的昏死在大门前，还有的则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无论是死是活，都让我们见一见”、“圣诞节是死难者的祭日”。对死难者家属而言，盼望已久的圣诞节团聚，竟成了同亲人的永久别离，怎么能不令人悲痛欲绝呢？

客轮“多纳·帕斯”号出事后，苏尔皮西奥航运公司在菲律宾数家报纸上登载公告，表示愿意承担此次撞船惨剧在法律及道义上的责任，并表示对每名遇难乘客付出 2 万元菲币赔偿。

对造成这次海难的原因，菲律宾政府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并于 28 日起开始调查。

据幸存者说，那天晚上虽然有薄雾，但两船相撞时，都开着航行灯，按理是能避开的。而今，两位船长都死于非命，要弄清失事原因，确是一个难题。

但根据调查情况分析，超载是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而玩忽职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生还者说，当两船相撞时，“多纳·帕斯”号船长正躺在他的铺位上看录像，而大副和三副在船舱里饮啤酒，在驾驶台上值班的，只是一名没有经验的驾驶员助理。

苏尔皮西奥航运公司负责人否认了上述说法，他强调说，根据船上的记录显示，出事时，船上的航行工作由二副负责，即使是驾驶员助理在掌舵，二副也会在旁边看着。至于船长、大副及三副，当时在休息，这是不应指责的。

在遇难者亲属的要求下，菲律宾政府已决定对未被认领的尸体举行公葬。政府还决定在首都马尼拉建造死难者公墓，并建一座纪念碑，把全部遇难者名字刻在碑上，以示纪念。

（陈中）

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中国的帝王封建统治到此也就结束了。

但是，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却费尽心机，妄图复辟帝制，让他也来过一过做皇帝的瘾。

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复辟倒退的大危机。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生于1859年，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的后代。他23岁就投身军伍，立下战功，逐渐升迁。甲午战争中，中国大败，暴露出旧军队的腐败无能，使清政府意识到重新编练武装力量的重要性。1895年，清政府开始着手筹建新式陆军，设立军事学校，并选派青年出洋考察军事。袁世凯积极投入了这项工作，终于取得清政府的赏识，被委派以训练新军的重任。

这是袁世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他逐渐掌握了一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以这支“新军”为资本，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大危难中，不断飞黄腾达，终于进入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

袁世凯练新军的地点在天津和大沽之间的小站镇，最初只有七千人，但袁世凯的心腹干将，这时都已聚拢在小站的新军中。后来当过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以及被称为“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基本力量。此外还有段芝贵、王占元、曹锟等一大批骨干分子。

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袁世凯先是大耍两面派，以支持变法的面目出现，取得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信任。但在改良派与顽固派斗争的关键时刻，谭嗣同希望袁世凯发动兵变，支持变法，打击顽固派时，袁世凯却向顽固派出卖了改良派的行动计划，使慈禧太后抢先发动宫廷政变，导致“戊戌变法”失败，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中国失去了一次改革图强的机会。

袁世凯却因此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赏识，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

1900年，山东、直隶爆发了声震中外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袁世凯却抱定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宗旨，在他担任山东巡抚期间，血腥屠杀义和团，保卫外国传教士和教徒。而当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直逼天津、北京之际，袁世凯却对清政府的命令阳奉阴违，一再延误战机，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并暗中同帝国主义勾结。同时，对于逃到山西的慈禧太后，袁世凯一再送去巨款和武器弹药，讨取欢心。不久，袁世凯又一次投机成功，被提拔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进入了最高统治层。

袁世凯成为北洋军阀的总头目。此后数年之中，他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迅速膨胀，成为实力最强大的封建军阀。同时他又身兼清政府的多种要职，直接掌握了许多重要部门，还操纵了维持国内治安的巡警部，实际上已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人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又大耍两面派手法，指使北洋军按兵不动，一方面借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向清政府讨价还价，使自己登上了“内阁总理”的宝座，独揽清政府军政大权；一方面又同革命党人“和谈”，以逼清王朝皇帝退位为条件，要谋取新中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职位。1911年12月

25日，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他在宣誓就职时就表示，一旦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中华民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就将让位于正式选举产生的大总统。这实际上是为袁世凯的上台留下了一个机会。经过反复谈判，袁世凯得到保证，只要清王朝皇帝退位，就可以让他当大总统。于是袁世凯又耍弄手腕，逼得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第二天，孙中山即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接着中华民国参议院召开总统选举会，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目的达到了，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登上金銮殿过一过皇帝瘾。他的政治立场一直是站在反动顽固派一边的，推翻清王朝不过是他谋取最高权位的一种手段。然而，当总统要讲民主，个人不能为所欲为，同时别人对总统的作为可以评头品足，这些都是袁世凯所无法容忍的。他的内心深处，总想个人专断独行，并想把这一份荣华富贵，子子孙孙不断地传下去。所以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复辟帝王专制的基本方针。

但是，当皇帝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且这些准备工作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只要一被揭露出来，立刻就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当上总统的最初几年，表面上不动声色，高举共和的招牌，暗地里却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清除可能反对他复辟帝制的力量。

1913年3月22日，袁世凯指使爪牙暗杀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辛亥革命的功臣宋教仁。

1913年7、8月间，袁世凯又大动干戈，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

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致使国会无法召开会议。

1914年2月，袁世凯又解散了内阁。紧接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召开了一个所谓的“约法会议”，炮制出一个《中华民国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总统制，并且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无限，实际上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中华民国”只剩下一个徒有其名的外壳。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国务院，把过去由国务总理处理的事项，也全部改由他这个大总统来处理。

同时，袁世凯大力鼓吹尊孔复古，以孔孟之道为武器，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加强专制独裁；提倡“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宣扬效忠于大总统，也就是“效忠于国家”。此外，袁世凯还改革官制，将民国的官员都改用封建制度时的官名。1914年的冬至日，袁世凯又仿照历代封建帝王，煞有介事地搞了一个“祭天”的活动，以显示他是“天子”。

袁世凯采取的这种种复辟措施，尤其是起用大量前清遗老遗少，使不少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袁世凯是在打算让宣统皇帝复辟。少数复辟狂利令智昏，竟公开叫嚷要“还政于清”。袁世凯清清朝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出山主持修清朝的史书。赵尔巽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清史馆馆长后，猖狂地宣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还有人绞尽脑汁，拟订从中华民国“过渡”回清王朝的措施，为清王朝复辟大造舆论。袁世凯对这些人不但不惩罚，反而大加重用。一时间谣言四起，传遍全国各地。

1914年底，袁世凯又指使爪牙炮制出一个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

大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而且由现任大总统“推荐”下届大总统的候选人。这样，不但保证了袁世凯可以终身担任总统，而且可以保证袁世凯的继承人是袁家的后代，因为袁世凯只要把下届大总统的候选人写成他的儿子就行了。

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已经越来越像皇帝了。

这以后，袁世凯就多了一句口头禅，时时念叨“共和办不下去”。他的一班爪牙心领神会，慌忙提出恢复君主制度的问题。袁世凯也就干脆地说：“你们看着办吧！”这班爪牙个个想当“开国元勋”，于是赶紧开始筹划复辟帝制的勾当。

正当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蛮横地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充分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丧心病狂的袁世凯竟无耻地承认日本的无理要求，以换取日本对他复辟当皇帝的支持。

袁世凯大肆出卖国家民族权益的罪行，激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慨。面对着中国即将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机，全国人民群起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严厉质问，坚决反对“二十一条”。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和反对卖国的怒潮。然而，卖国贼袁世凯则采取种种镇压手段，破坏人民的爱国运动。但是，在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终究未能得逞。

袁世凯开始组织一个领导复辟帝制的核心集团。他的儿子袁克定热衷于当“太子”，到处奔走，用威胁利诱的手段，拉拢了一帮人。同时，他又分别征求各省军阀的意见，并争取日本、美国、德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

在这个基础上，袁世凯授意杨度出头组织一个团体，鼓吹复辟帝制。杨度当即拉了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筹安会”。杨度从袁世凯那里领取了20万元活动经费，于是便以“筹一国之治安”的名义，公开提出“废民主而立君主”、“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的复辟倒退口号。

袁世凯到这时，仍然假惺惺地不肯承认他要做皇帝，但却派出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去保护“筹安会”的活动。“筹安会”又组织所谓的“公民请愿团”，“请求”袁世凯出来当皇帝。袁世凯也就装作无可奈何地说，他这个大总统是国民选举的。如果国民要“公举”他当皇帝，他也只好当皇帝了！

尽管全国人民纷纷起来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袁世凯却视而不见，授意他的爪牙们制造一个“人民拥护”他当皇帝的假像。于是“筹安会”又组织起更大的请愿活动，袁世凯在各省的爪牙党羽也纷纷致电，要求复辟帝制，拥戴袁世凯当皇帝。他的心腹梁士诒纠集一批狐群狗党，成立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收买各种各样的人组织“请愿团”，甚至组织起“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闹得北京城里乌烟瘴气。

接着，由袁世凯的心腹爪牙出面，又是收买又是威逼，让“国民代表”在武装士兵的刀丛枪林之中投票决定恢复帝制和拥戴袁世凯为皇帝。

1915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的参议院举行全体会议，竟一致决定推戴袁世凯为皇帝，并在上午11点半向袁世凯呈上了“推戴书”。袁世凯假惺惺地推辞了一回，让参议院再议。参议院在下午五点钟开会，到五点十五分，就通过了长达2600字的第二封“推戴书”。

15分钟的时间，连抄出这样一份“推戴书”都来不及，可见一切都是袁世凯一伙事先安排好了的。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当仁不让”地接受了“国民”的推戴，决定上台做皇帝了。

此后几天，袁世凯大肆封官许愿，收买人心。同时，“登极大典”的筹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重新油漆故宫中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制作皇帝的龙袍和服饰，雕刻玉玺，准备各种“御用品”，总共花费达二千万之多！

“登极大典”的时间，定在1916年元旦。

然而，全国人民的反复辟斗争已经不可阻挡地爆发了。

1915年12月23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发电报要袁世凯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并限令袁世凯在24小时内给予答复。25日，蔡锷、唐继尧、任可澄、戴戡等宣布独立，并发电报声讨袁世凯的复辟倒退，并且组织起中华民国护国军，当即北上，讨伐袁世凯。

护国军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袁世凯的丧钟敲响了。但他不思悔改，一边下令讨伐护国军，一边宣布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但他毕竟没敢在1916年元旦明目张胆地举行“登极大典”。

袁世凯称帝，不仅得不到全国人民承认，连他的弟弟袁世彤和妹妹张袁氏也登报与他断绝关系。各国帝国主义也对此不满，纷纷警告袁世凯不要改变共和政体，并拒不接受袁世凯使用“洪宪元年”的外交文书。袁世凯只好在外交中仍用民国年号和总统身份，结果被外国报纸称为“总统皇帝”。

这时，云南护国军已攻入四川。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1月28日，袁世凯军与护国军在四川发生激战，袁军大败。广东、山东、湖北、湖南各地革命党人也纷纷起义。袁世凯迫于内政外交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在2月23日宣布，暂时延缓实行帝制。

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反袁战线进一步扩大。连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动荡，袁世凯的亲信徐世昌警告他赶紧悬崖勒马；冯国璋、靳云鹏等五将军请他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安定人心。袁世凯内外交困，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在3月22日宣布撤消帝制，第二天又宣布废止“洪宪”年号。

袁世凯从改用“洪宪”到废止“洪宪”年号，前后只有83天。他做了一场皇帝梦，“登极大典”还没来得及举行，就被全国人民赶下了台。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一命呜呼。

（薛兵）

希特勒血洗冲锋队

1934年6月30日，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天。希特勒及其亲信血洗冲锋队，给第三帝国的历史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刀痕，也加速了希特勒的独裁和恐怖统治的进程，从而建立了戈林——希姆莱轴心，并预示着对未来的一个凶讯：纳粹党的权力大厦内部绽开了一道裂痕，即党卫队和冲锋队彼此已成为死敌。

冲锋队本来是纳粹党主席希特勒的私人卫队，由一群拳大臂粗的退伍军人组成，最初称为“纠察队”。1921年10月5日正式定名为冲锋队。冲锋队队员身穿褐色制服，因此又称褐衫军，他们的头目是当时的国防军第四军（驻巴伐利亚）新闻和宣传部政治第一处处长罗姆，此人脸上疤痕累累，红光满面，剃光头，虽是五短身材却显得十分精干。他曾经参与希特勒发动的啤酒馆政变，为希特勒夺取政权起过很大的作用，可以算是纳粹的第一功臣了。

冲锋队后来吸收了许多流氓无赖和打手，专门负责捣乱其它党的集会。希特勒曾亲自率领冲锋队去袭击一个叫巴勒施塔特的巴伐利亚联邦主义者召集的集会，使巴勒施塔特挨了一顿揍。希特勒因此被处三个月徒刑，但结果只关了一个月。出狱以后，他反而似乎成了一个志士，比以前更加受到拥护了。他对警察当局吹嘘：“那没关系，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巴勒施塔特没有能发表演讲。”

1929年秋的经济危机，促使冲锋队爆炸性地扩充起来，大批失业者和犯罪分子参加了冲锋队。希特勒自任冲锋队最高领袖，希姆莱的党卫队也隶属于冲锋队。

1932年，冲锋队成员已发展到40多万人，成为纳粹党制造白色恐怖、夺取政权的重要工具。

1933年1月，纳粹党上台执政，希特勒和罗姆在冲锋队的地位和宗旨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在罗姆看来，冲锋队不仅是纳粹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是未来军队的核心。希特勒则一直主张，冲锋队应该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事实上冲锋队的成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并不具备军人的素质。希特勒的大权已经在握，冲锋队的作用已经过时了，从今以后，必须很有策略地使它退出政治舞台。罗姆和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难以调和，因此，从1933年夏天起，这两个纳粹运动的元老又是亲密的朋友之间，便开始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希特勒上台执政后，抛弃了原先提出的带有欺骗性的《二十五点纲领》，并没有实现把垄断企业收归国有等许诺，这也在冲锋队员们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失望情绪。他们大多数属于失业大军，原以为他们为“革命”作出了贡献，“革命”就一定会给他们报酬，可以在企业和政府里得到优厚的差使。如今希望破灭了，冲锋队犹如开了锅的沸水，一片怨声。在他们集会的酒店里，充斥着对希特勒的怨言。罗姆利用这种失望情绪，打出了第二次“革命”的旗号。此时他手下的冲锋队员已有200万左右——几乎是陆军的二十倍。罗姆在1933年6月间发出警告：“对推动德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决不允许革命在半途被出卖……我们将继续斗争……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不可腐蚀的保证者。”过后不久，他又说，“今天仍有担任官职的人对于革命的精神毫无了解。如果他们胆敢把他们的反动思想付诸实践，我们将毫

不留情地要把他们干掉！”

希特勒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只不过是任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争取群众的宣传手段而已。现在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这些口号就必须抛弃。他现在需要时间来巩固他的地位，至少在目前，他心须巴结企业界和陆军。他不想动摇德国的经济基础，那样必然会危及自己政权的生存。因此，也就绝不允许有什么第二次革命。

为了安抚怒气冲冲的罗姆，希特勒拉他进入内阁，任命他为不管部部长。又写了一封热情友好的信给他，承认冲锋队的任务是确保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存在，还说冲锋队的功绩应主要归于罗姆。

但是，罗姆却不听希特勒这一套，他继续走自己的路。他现在手里拥有一支号称 450 万人的大军。1934 年初，他向仅有 20 万人的国防军提出一份措词强硬的备忘录：要求以全部国防领域作为“冲锋队的地盘”，叫国防军只是抓抓训练工作。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大将随即将这一备忘录提交希特勒裁决，逼迫他作出过去一直回避的抉择。

希特勒将国防军和冲锋队双方的领袖都请到国防部协商，在他的督促下，勃洛姆堡和罗姆不得不达成一项协议，确定国防军是第三帝国唯一的武器持有者，并同意由冲锋队抓新兵入伍前的军事训练工作。在罗姆的柏林总部举行的一次早宴上，冲锋队和国防军头目戏剧性地言和。

但是，国防军军官们刚刚离席，罗姆就骂开了：“可笑的下士（指希特勒）宣布的那一套，同我们不相干。”他咆哮道：“我才不会按协议办事呢。希特勒言而无信，少说也得去休假。”并扬言，“要是他不愿一起干，我们就撇开他来干。”

尽管如此，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却并没有打算背叛希特勒，只是想对希特勒施加压力，迫使他答应他们的要求，给予他们想要的地位。为此，他举行大规模的战斗演习，拉开嗓门发表演说，声称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二次革命”即将到来。

希特勒一直畏惧跟冲锋队正面交锋，他长期以来玩弄的是两面三刀的手法。一方面，他给褐衫大军打气，另一方面，他又对国防军取消冲锋队的主张频送秋波。利用双方搞力量平衡。他几乎无力驳回罗姆越来越狂妄的要求，感到自己非常虚弱。

罗姆太轻率了，他差不多同纳粹政权内所有的实力集团都闹翻了。各个集团无不希望罗姆垮台，并从中捞到好处。在执政的纳粹党内部，当时正在进行着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罗姆的两个最有势力的敌人戈林和希姆莱联合起来反对他。尤其是戈林，他时时感到罗姆的威胁，虽然他已经是普鲁士总理兼中央航空部长，又经兴登堡总统批准晋升为步兵将军，但罗姆及其冲锋队安插在各部门的势力却威胁着他，同时阻碍着他充任国防军统帅的路子。为了形成自己的势力，他组织了个人卫队，驻扎在柏林郊外的战略要冲。并任命当时尚在罗姆手下的党卫队头目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立即开始建立自己的盖世太保王国。他真正感觉到与戈林缔结新的同盟的必要性，没有戈林，他就无法掌握秘密警察。他决定背叛罗姆。

国防军也把罗姆看作死敌，这个粗汉控制着国防军，传统的军官阶层便无法存身。因而干掉罗姆是国防军高级军官们的一致呼声。

这时，兴登堡总统已是风烛残年，希特勒政权的反对派想把一个霍亨佐伦王朝的亲王扶上总统的宝座。希特勒必须抢在前面。1934 年 6 月 21 日，

他顶着炎炎烈日去谒见兴登堡，他要亲眼看看这位 87 岁高龄的总统还能活几天。在那里，他遇到国防部长勃洛姆堡。这位平时卑躬屈膝的国防部长突然态度强硬地对希特勒说，他奉老元帅之命告诉他，除非德国目前这样的紧张状态迅速结束，否则总统将宣布戒严令而把国家控制权交给陆军。

对于希特勒来说，一旦陆军接管国家，他个人和纳粹党则势必完蛋。要生存，只有一个办法：镇压冲锋队，停止罗姆要求的第二次革命。而希特勒要实现他集总理和总统于一身的野心，也必须争取誓死效忠兴登堡的国防军将领们的支持。看来，牺牲冲锋队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他乘飞机返回柏林的途中，他决定采取行动。

尽管希特勒作出了清洗冲锋队的决定，但是在具体的行动计划上还是举棋不定。结果是戈林和希姆莱帮助他走了决定性的一步棋。6 月 28 日，希特勒离开柏林去埃森参加当地一个纳粹党领袖特波文的婚礼。戈林与希姆莱得知这一消息喜出望外。而那个背叛了罗姆投靠到希特勒身边的随从卢策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这时希特勒不能看书面材料而只能听电话报告。

同一天，戈林和希姆莱命令党卫队的特遣队和“戈林警察”处于准备状态。早在三天前，陆军已处于戒备状态，取消一切休假，不得离营外出。这时罗姆却正在休假，他接受医生的劝告到维西浴场碘疗；所有的冲锋队员也获准从 7 月 1 日开始休假一个月。整个冲锋队正处于完全松懈的状态。

希特勒刚到埃森，才光临特波文的婚宴，希姆莱的紧急电话就打过去了。他将事先准备好的关于冲锋队阴谋活动的报告读给希特勒听。而当时站在希特勒身边的戈林则随时准备就希姆莱的报告加以解释和发挥。

希特勒听了报告，顿时六神无主，坐立不安，指示暂停婚宴，在随从的簇拥下回到下榻的饭店。他反复考虑是否该动手了。正当这时，戈林的心腹克尔纳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希特勒面前，他刚从柏林乘飞机赶来，带来了比希姆莱报告更进一步的消息：全国冲锋队都在进行武装，准备举事了。

希特勒从座椅上猛地站起来，大声说：“我受够了。我要惩一儆百！”他终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命令戈林回柏林，等接到他的暗号就出击。这次，他不仅要消灭冲锋队，也要干掉他的政敌。

戈林争分夺秒，于 6 月 29 日晨赶回柏林，他打电话通知希姆莱：定于 6 月 30 日上午 11 时，叫所有的冲锋队副总指挥、地区总队长和督察员到罗姆休假地集中。与此同时，命令陆军总司令向部队发出戒备的警报；党卫队将所有部队拉进营房，配给武器。这是按希特勒的意思办的。

29 日晚上，希特勒又接到希姆莱打来的电话：柏林冲锋队暴动已准备就绪，定于 6 月 30 日下午 5 点行动，占领政府各部。接着又有一个报告是纳粹党巴伐利亚区领袖阿道夫·瓦格纳扛来的，说慕尼黑的冲锋队已经上街，大叫大嚷反对领袖和国防军。此时已不由希特勒不信了，他决定将叛徒崽子们斩尽杀绝。他本人立即动身去维西浴场。

希特勒乘坐的飞机在慕尼黑机场降落以前，那里的冲锋队头子们都被逮捕。飞机在上维森费尔德机场刚刚停稳，希特勒就迫不及待的钻出机舱，对等候在那里的国防军军官说：“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天，但我要去维西浴场进行严厉的审判。”

天才蒙蒙亮，希特勒一行车队，长驱直入特格恩西湖畔的维西小城。汉斯尔包尔旅馆的冲锋队领袖们正高枕酣睡。希特勒握着手枪闯入罗姆的房

间，大骂他是叛徒，下令逮捕他。只一会儿功夫，“阴谋分子的巢穴”就被扫除干净，冲锋队的队员们被全部押往施塔德尔海姆监狱。与此同时，党卫队将火车站团团围住。一列从柏林开来的快车刚进站，车上的冲锋队领袖们就被抓了起来。坐汽车去维西浴场的冲锋队头目也在途中一一落网。

10点钟，希特勒给宣传部长戈培尔使了一个眼色。戈培尔抓起电话，给柏林的戈林说了一声约定的暗号“蜂鸟”。在巴伐利亚的希姆莱立即向党卫队发出大规模的行动命令。恐怖开始席卷全国。各大区的保安处头子打开密封的封套，取出密令，催促手下的暗杀队出发。血洗冲锋队行动正式开始。

警察的汽车和党卫队的卡车在街头奔驰，冲锋队要员们的住宅被包围封锁。正在值勤的冲锋队领袖没有反抗，一一被捕。除冲锋队外，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的政敌也都一并清洗。在这个血腥的星期六，被杀掉的还有因知道内幕情况太多而被灭口的，其中也有错杀的。

在镇压所谓罗姆暴动的行动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希特勒在国会发言时宣布枪决了61人，其中包括罗姆等19名冲锋队高级领袖；还有13人因拒捕而被杀，3人自杀，总共77人。1957年慕尼黑审判时提出的数字是一千多人。

到7月1日下午，该杀的差不多都杀了。希特勒在总理府花园举行茶会。次日，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的“及时扑灭叛国案和拯救德国人民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和个人的豪侠表现”表示感谢。勃洛姆堡代表内阁向希特勒总理致以祝贺，使这次杀戮合法化，说这是“保卫国家的必要措施”。陆军总司令部对此感到满意，并保证建立与新冲锋队的融洽关系。

国防军对它的敌手的覆灭自然是兴奋不已，但是，7月26日，党卫队脱离冲锋队独立，由希姆莱担任领袖，只听命于希特勒一人。这支纪律严明的党卫队力量很快就超过了原先的冲锋队。所以说，胜利者不是国防军而是党卫队。希特勒批准党卫队成立武装部队，这样一来，国防军作为国家武器唯一持有者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而希特勒从此也更加牢固地掌握纳粹德国政权，所以，在这场斗争中，真正的胜利者是希特勒。

（孙化）

惊险的航程

1977年10月13日中午，西班牙帕尔马机场的候机厅里，挤满了行色匆匆的旅客。搭乘下午1点飞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181次班机的旅客，办理好登机手续，从安全门鱼贯而出，登上了即将起飞的“皇冠”号波音737飞机。

当广播里最后一次招呼汉莎181次班机的乘客登机时，穿着度假服装的两男两女，才来到登机手续处出示了飞机票，成了最后一批登机的乘客。在护照检验处，这4个人出示了3份伊朗护照和1份荷兰护照。护照检查官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便急促地点了点头，祝愿这4个年轻人“一路平安”。

机舱内，谁也没去注意这4个姗姗来迟者，只有3位空中小姐对两个男子中的一个产生了怀疑，因为他穿着一套入时的绿西装，又没系领带，这是国际上的恐怖分子最流行的装束。她们在机舱厨房内小声议论着：“坐在后排的那个男子，真像个恐怖活动的同情分子。”以后的事情发展，不幸被她们所言中，等待她们和全体乘客的竟是一场飞来横祸。

时针刚过下午1点，“皇冠号”波音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飞向蔚蓝色的天空。37岁的舒曼机长和比他小两岁的副驾驶菲托尔又驶上了归国的航向。他们是上午9点55分离开法兰克福的，中午在帕尔马机场仅停留了一个小时又往回飞了。早上舒曼离开家时，国内电视上谈论的主要话题，是联邦德国企业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被绑架一事。这位主席先生被恐怖分子扣押了39天，绑匪以此要挟当局释放他们关在监狱的11名同伙。舒曼再也没有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他自己的命运竟会和和人质施莱尔的命运维系在一起。

1点45分，“皇冠”号飞到了意大利海域，还有一个半小时就要到达目的地了。机上的大部分乘客已将托盘上的点心一扫而光，心满意足地靠在舒适的座位上。乘客中的7名小孩，正捧着空中小姐送的礼物——《米老鼠画报》看得入迷。机舱内，沉浸在一片恬美宁静的气氛中。

就在这时，机舱后部突然骚动起来。最后一分钟才登机的那两男两女，霍地从座位上跃起，手里拿着手枪和手榴弹，大叫大嚷地朝前舱奔过去。

驾驶舱的门猛地打开了。机长舒曼还未来得及回头，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就对准了他的脑袋。副驾驶菲托尔被踢下座位，摔到地上。那两个男人用英语、后又用德语大声命令道：“举起手来！你们被劫持了！”接着，一个劫持分子留下来监视机长舒曼。另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则将双手抱头的副驾驶菲托尔和头等舱的旅客一起赶向机舱后门，他们就像一群牲口似地被圈起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机上82名乘客都吓懵了。他们个个呆若木鸡，愣愣地望着歹徒们高悬着的打开保险盖的手榴弹和黑洞洞的枪口，谁也不敢吭一声。

当广播里传来监视机长舒曼的那个人的讲话时，人们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人质。“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你们的新机长马姆特给你们讲话。”那个劫持分子的头目，用英语在麦克风里阴阳怪气地说，“我们不是恐怖主义分子，而是自由战士。我们的要求是释放关押在联邦德国和土耳其监狱的战友。如果要求不能实现，我们手中的武器会说话的！”

接着，马姆特又恶狠狠地命令所有乘客将旅行护照和证件统统丢在过道上。两名妇女被迫将散在地上的护照和证件收集起来，交给恐怖分子。

旅客们陷入一种极端危险的境地，对马姆特的命令一一照办，交出了随身带的手提包和所有贵重的东西。此刻，最重要的是大家还活着，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飞机被迫改变了航向。下午3点45分，“皇冠”号出乎意料地降落在罗马国际机场。不久，联邦德国内政部长麦霍夫就接到米兰飞行安全中心的通话，转来自称是马姆特上尉的绑架分子头目的声明：“我们已经控制了联邦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以我为代表的行动小组要求立即释放关在德国监狱里的11名战友。……”内政部长迅即与联邦总理施密特商定，当晚在总理府召开“营救人质指挥部”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处理危机的对策。然后，麦霍夫给他的意大利同行通话，敦促意大利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被劫持的飞机起飞，但时隔不久，下午5点50分，罗马向波恩通报：“汉莎181次航班未经准许，强行起飞了。”

两个半小时以后，“皇冠”号在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的跑道上降落了。联邦德国立即与塞浦路斯政府联系，希望他们阻止被劫飞机的起飞，以等候联邦德国刑事侦察局专家的飞机到达。塞浦路斯的内政部长爽快地答应了。他们迟迟不给飞机加油，并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当地代表哈里阿斯，通过无线电与“机长”马姆特交谈，试图说服他明智地解决这个事件。但马姆特断然拒绝了哈里阿斯的调解，威胁道：“赶快加油，否则我就把飞机炸毁！”

拉纳卡机场经请示后只好给飞机加了10吨燃油。联邦德国的安全专家尚未赶到，“皇冠”号就于深夜10点50分再次起飞。“皇冠”号一直在中东地区的空中盘旋了3个小时，贝鲁特、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威特的机场都拒绝让它降落。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54分，才获准在巴林机场降落。

舒曼机长不愧是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老资格飞行员，他在恐怖分子头目的枪口下，沉着地驾驶飞机在各国机场起落。尽管长时间的紧张，脑部神经都快炸裂了，但他仍强迫自己开动脑筋，巧妙地与绑匪周旋，找机会向地面站报告机上的情况。在地中海上空，他成功地避开了劫持者的耳目，与飞在“皇冠”号后面不远的一架飞机联系上了。他用德语告诉对方同行说，“劫持我们的一共4个人，两男两女，带有手枪和手榴弹。”就这样，汉莎航空公司从舒曼那里断断续续地了解到机上所发生的情况。

机上乘客的神经也绷得紧紧的，一直处于极度恐惧的状态中。恐怖分子不断地向惊恐的乘客下命令，时而调换旅客的座位，让母亲与孩子、丈夫与妻子分隔而坐；时而宣布不准讲话，不准拉开百叶窗，不准抽烟，甚至有一段时间还不准上厕所。机舱内空气污浊，百叶窗紧闭，飞机到底降落到哪里，乘客们全然不知。

“皇冠”号在巴林机场停了一个多小时，加满了油，于凌晨3点34分再次起飞。

一个小时后，飞机飞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机场上空，但机场指挥塔根据政府的命令已将降落跑道关闭。燃油不多的“皇冠”号只好在机场上空迂回盘旋。天破晓了，机场跑道上阻止降落的几辆消防车在晨曦中依稀可见。

突然，指挥塔上的喇叭里响起劫持分子头目不容置疑的喊声：“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就降落！”“皇冠”号离地面越来越近，最多5分钟就要降落到跑道上了。指挥塔负责人只得将政府的命令搁置一边，吩咐将消防车开走，以免发生机毁人亡的惨剧。

清晨5点51分，“皇冠”号终于在迪拜机场跑道上安全降落了。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收到了由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转来的“红军派”总指挥豪斯纳致德国联邦政府的公开信。“红军派”是联邦德国最活跃的恐怖组织。这份给联邦政府总理的最后通牒声称，“181次班机内的乘客及机组人员完全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旅客和机组人员的生死存亡以及人质施莱尔的生命完全取决于你是否满足我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在10月16日上午8点前，释放关在联邦德国监狱的红军派11名成员，将其送到指定地点，并交付1500万马克赎金。否则，将立即处死施莱尔以及181次班机上的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

很显然，这两起劫持大案的魔鬼集团已经汇合为一体了。

10月14日上午8点，彻夜未眠的联邦总理施密特主持召开了“营救人质指挥部”核心小组会议，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召开内阁会议，研究处理危机的方案。会议决定对恐怖分子决不让步，对他们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但同时又派出“谈判老手”国务部长汉斯·韦施纳夫斯基去跟劫机分子对话。韦施纳夫斯基7年前在处理一起劫机事件中曾创造了奇迹，通过谈判，将德国人质成功地营救出来。

与这位波恩密使同机飞往迪拜的，还有联邦刑事侦察局的专家和联邦边防军的军官。在迪拜机场指挥塔上，韦施纳夫斯基会见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防部长、总统的儿子马克图姆。他为了营救机上的妇女儿童，与劫持者头目已经较量了几个小时。但马姆特软硬都不吃，对国防部长以父亲和全国人民的名义呼吁他释放妇女儿童的请求，马姆特有礼貌地婉言拒绝；当这位总统的儿子发出准备袭击的命令时，马姆特又以“把飞机炸毁”相威胁。

就这样，在紧张的对峙中，这场劫机事件进入了第二个夜晚。

“皇冠”号上的乘客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恐惧使他们难以入睡，而刚进入半睡眠状态，又一再被恐怖分子打人骂人声所惊醒。

由于机舱内门窗紧闭，许多人的手表都已不再走动，人们既不知道停留的地点，也不知道时间。只有马姆特及其同伙才知道，新的一天——星期六——又开始了。机内的空气更加污浊沉闷，两个厕所从帕尔马起飞以来就没有清扫过，粪尿溢到地上，每个经允许上厕所的人，都要忍着极大的恶心。

就在距离这个悲剧中心几百米的地方，在国务部长韦施纳夫斯基的专机里，联邦刑事侦察局的专家们正在俯身研究机场平面图，准备袭击“皇冠”号。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防部长坚决不同意用武力营救的方案。他主张天黑之后，智取巧救。

夜幕再次降临了，迪拜机场上一片静谧，阴森可怕。国防部长马克图姆披上白披风，带着两个同样装束的士兵，登上一辆救护车，朝“皇冠”号缓缓驶去，在离飞机一百米处停了下来。3个人下了车。这时，“皇冠”号前门打开了，一名恐怖分子探出头，鸣枪示警。披着白披风的3个人用阿拉伯语呼喊了一阵，便走到车灯的光圈里，解开衣服，表明他们没带武器。然后举起双手，继续向飞机走去，边走边喊：“不要开枪，我们没带武器！”

但恐怖分子不容分说，对着站在跑道上的人影又是两枪。无奈，国防部长和两名随从只好返回救护车。想要智取的企图，由于劫持者的怀疑而告失败。

凌晨3时许，有两名化了装的“工人”开来一辆地面配电车，以给飞机上的蓄电池充电为名接近飞机，但终因恐怖分子看守得紧而无法采取行动。

在机场大厦，人们仔细检查了刚从“皇冠”号卸下的垃圾，发现有4盒

香烟和 4 张签有舒曼名字的登机牌。很显然，机长舒曼想用此计策，再次向外界发出信号：机上只有 4 名暴徒。

德国边防军反恐第 9 纵队的突击队员已经飞到迪拜，他们正在海湾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737 飞机上进行神速无声地打开飞机舱门的练习。可是，联合酋长国的国防部长依然拒绝对“皇冠”号进行武力袭击。

10 月 16 日中午刚过，离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马姆特突然把舒曼和菲托尔赶进驾驶舱。然后他对着话筒向机场指挥塔喊道：“把地面配电车立即调开，限你们 20 分钟时间。否则，我就要枪毙一个乘客。”

听到这不容置疑的杀气腾腾的口气，正守在指挥塔上的国务部长韦施纳夫斯基不禁一阵寒颤。他急忙问道：“怎么回事？最后通牒的时间还没到呢？”马姆特恶狠狠地回答：“少废话！我们现在就要起飞。最后通牒由我单独决定！”

事情来得突然，那位披着白披风的国务部长也束手无策，只得调开配电车。下午 2 点 13 分，“皇冠”号再次飞上蓝天。

在这个危难时刻，世界各地都伸出了声援的手，各国元首表示愿意为解决人质危机提供援助的电讯纷纷发往波恩。80 岁的教皇保罗六世甚至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作为人质去替换乘客。82 名乘客和 5 名机组人员的安危牵动了亿万人的心。

“皇冠”号像没头苍蝇一样在空中乱窜，阿曼机场、南也门的利扬机场都不允许它降落。“皇冠”号只得绕了个大圈子，又飞往亚丁。亚丁机场早已严阵以待，载重汽车和装甲车统统开到跑道上，以阻止被劫持飞机降落。

这架波音飞机在机场上空不停地盘旋，马姆特气得脸都涨成了猪肝色，他抓过话筒狂喊乱叫：“清除跑道！我们的燃料用完了，不降落我们就要坠毁了！”可亚丁机场指挥塔拒不回答。

“皇冠”号迫降到跑道旁边，飞机猛地弹跳了一下，机身震颤不停，好像要散架似的。周围尘沙腾空而起，像白雾般缭绕着机身。

过了一会儿，机长舒曼穿过通道，苦笑着低声说道：“我们降落在一个沙坑里。”前面几个乘客高兴得鼓起掌来，但马上又戛然而止。因为马姆特出现在头等舱的门帘掀开处。

南也门士兵站在不远处包围着飞机，而且亚丁机场拒绝给飞机加油。马姆特快要气疯了，他怀疑是舒曼唆使副驾驶菲托尔把飞机迫降在沙坑里，目的是阻挠继续飞行。他把所有的愤懑都发泄到舒曼身上。自劫机以来最令人颤栗的场面出现了。

机长舒曼被迫跪在头等舱门帘前。马姆特右手握着子弹上膛的手枪，叉开双腿，站在舒曼面前。他咆哮道：“你知道你有罪吗？”说着，用手枪顶着舒曼的脑门。

“我无罪。”舒曼沉默了一下说道。这句话划破了机舱里令人窒息的寂静。

“砰”地一声枪响，舒曼的身躯倒向一边，鲜血染红了他身子下面的地毯。一直以大智大勇与劫机分子巧妙周旋、全力保护着乘客安全的优秀机长，就这样惨遭杀害了。

乘客们惊呆了，欲哭不能，只好闭上眼睛不看这可怕的场面。恐怖分子开杀戒了，下一个遭枪杀的又该是谁呢？一种绝望的情绪在乘客中扩散开来。

在暴徒们一再以炸毁飞机相威胁下，快到午夜时分，亚丁机场才同意给飞机加油，条件是加完油必须立刻飞走。

10月17日，星期一，凌晨一点，副驾驶菲托尔在枪口威逼下开动了发动机。“皇冠”号慢慢地爬出沙坑，上了跑道。飞机终于飞起来了。

清晨4点35分，“皇冠”号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机场降落。

中午时分，机长舒曼遇害的噩耗传到波恩。数百名人质的家属自发地聚集在联邦总理府门前，他们要求与联邦总理谈话。实际上，施密特总理从早上6点半就开始主持“营救指挥部”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作出了营救人质的重要决定。但考虑到保密，国务秘书哈尔受联邦总理的委托与人质家属交谈时，只是反复地向他们许诺：“请放心，我们在摩加迪沙将尽一切力量营救你们亲人的生命。”

与此同时，联邦总理施密特正通过电话与索马里国家元首巴尔将军交涉，经过一小时的协商，巴尔将军终于表示愿意帮忙解决人质危机。

“皇冠”号在摩加迪沙降落后不久，马姆特又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如果下午3点30分前未释放关在德国监狱的战友，他们就毫不留情地将飞机连同全体人质统统炸毁。

再过半小时，屠杀就要开始了。匆匆赶到摩加迪沙的国务部长韦施纳夫斯基，在机场指挥塔里如坐针毡。他的衬衫都湿透了。这个素来镇静的人，第一次感到神经紧张。他必须赢得时间，必须说服“皇冠”号上的劫持者，再次延长最后通牒的期限。他急中生智，叫指挥塔上的报务员与“皇冠”号通话，以稳住恐怖分子。报务员反复呼叫道：“‘皇冠’号请注意，我刚才获悉，联邦政府的全权代表正带着重要通知赶来这里，请你们耐着性子等待。”但恐怖分子并不作答。

这时，载着60名联邦边防军反恐怖第9纵队突击队员的专机，在摩加迪沙降落了。1972年奥运村绑架事件之后，当时的内政部长根舍，根据慕尼黑血的教训，成立了这支精锐部队，主要用来反对恐怖活动。

反恐怖第9纵队的指挥官是警察局长乌利希·韦格纳，他按照“营救指挥部”的命令，制定了周密而切实可行的计划。为配合这次摩加迪沙行动，特地从英国反恐怖部队那里调来了“惊异式炸弹”。这种炸弹爆炸时，发出的光可达50千瓦，并发出无法想象的巨响，可以使敌人在五、六秒钟内全身疲软瘫痪，丧失战斗力。

离最后通牒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了，机舱的喇叭里传出马姆特粗暴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们说话。我们将重逢于另一世界。你们的政府拒绝接受我们的要求，你们不得不死了。”顿时，乘客们都惊呆了，处于一片绝望恐怖之中。

马姆特命令另外3名恐怖分子，把所有的乘客全都捆绑起来，并用烧酒洒在座位上和地上。再过几分钟，“皇冠”号就要爆炸了。

正在这时，韦施纳夫斯基指挥塔上的官员通知“皇冠”号上的恐怖分子：“你们已经胜利了，关在监狱的那11名囚犯已经获释。现正在来索马里的途中。”为使假象更加令人置信，国务部长还提供了具体的飞行时间和航线情况。

这一缓兵之计十分灵验。外表穷凶极恶而实则贪生怕死的恐怖分子，何不期望他们的要求圆满实现呢？他们在机内依据资料查实，获释囚犯的飞机将于今天深夜降落，不禁开心地笑

马姆特发狂似地冲出驾驶舱，大喊着：“我们胜利啦！你们也死不了啦！”他兴奋地告诉呆若木鸡的乘客：“你们的政府已经让步，我们的战友已经获释，午夜就会到达这里。到那时你们就自由啦！”

捆绑的绳子全都松开了，乘客们还是呆呆地坐在那里。过了好一会，才醒悟过来，他们已获特赦，不禁一跃而起，相互拥抱起来。机舱内气氛骤变，人们第一次得到许可，可以自由活动了。

夜幕降临了。国务部长韦施纳夫斯基坐镇指挥，不时通过指挥塔报话器向劫机者喊话，以稳定他们的情绪，防止他们在最后一刻失去理智而前功尽弃。

在离“皇冠”号两千米远的隐蔽处，韦格纳指挥官与他的突击队员们正在作最后的准备工作。这些训练有素的彪形大汉，穿上了尼龙防弹背心，手提轻型机关枪，腰缠特制的手榴弹，怀揣大口径特种手枪。他们虽全副武装，却体轻如燕，行动起来一点声响也没有。

韦格纳简单明了地叮嘱部下几句，让他们再次熟悉一下机场上的地形地物。为保证万无一失，这次行动的每一步骤，每一动作以至每一个射击角度，他们都训练过上千次。全体突击队员配合默契，就像一只精密的时钟那样谐调一致。

与此同时，索马里士兵已经将整个机场封锁起来。机场大厦成了战地急救医院，医务人员随时准备救护伤员。

深夜 11 点，韦格纳率领十几个突击队员，在夜幕的掩护下悄然无声地跃上跑道，像豹子一样灵活而快速地从飞机后面接近“皇冠”号，屏住气爬到波音飞机的腹下和机翼下。一名突击队员架起灵敏度极高的窃听器，贴在飞机外壳上，机舱里没有任何动静。很显然，劫机分子没有发现他们。

又一批突击队员蹑手蹑脚地跃上了跑道。他们按照分工，埋伏到各自的地点。这些百发百中的神枪手，通过红外线瞄准器，从四面八方将枪口对准“皇冠”号，随时准备击中目标。

韦施纳夫斯基和索马里指挥官接到突击队一切准备就绪的报告后，立即命令开始下一步行动——“调虎离山”。

午夜 11 点 50 分，索马里士兵在“皇冠”号前面不远处点燃了一堆浇上汽油的干柴堆，顿时火光冲天。马姆特在驾驶舱内正与女帮凶一起盘算，如何以人质交换被释放的德国恐怖分子，最好的方案是每 7 名乘客换一名他们的战友。突起的火光映入驾驶舱，他俩猛地跳起身，隔着窗户向外张望，他们中计韦格纳把手一挥，两个突击队员将裹有橡胶垫的金属梯靠在机翼上。韦格纳第一个扶着梯子闪电般登上机翼，其他突击队员也 4 个一组地上了机翼，守候在机舱紧急出口门前。

随着韦格纳指挥官大喊一声：“火焰魔术师！”两名英国反恐怖专家立刻在“皇冠”号附近点燃了“惊异式炸弹”。顿时，机场上闪起刺眼的白光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机舱内的动机分子被强光刺得双泪直流，可怕的巨响震得他们瘫倒在地。

说时迟，那时快。突击队员们从紧急出口冲进了机舱，他们一边对乘客高喊：“低下头，卧倒！”一边举枪向恐怖分子猛射。

马姆特和他的女帮凶刚冲出驾驶舱，还没等他们拔枪射击。就被一排点射击毙。马姆特倒下的地方正好是他先前开枪杀死机长舒曼的地方。

另两名恐怖分子还在负隅顽抗。那名男恐怖分子正要朝机尾方向扔手榴

弹，被两颗子弹击中，手一软，手榴弹滚到一个座位下爆炸，只有一名乘客负了点轻伤。女恐怖分子见事不妙，躲进厕所里，从半掩着的门后向外乱打枪，一枪击中了一名突击队员的脖子。两名突击队员愤怒地朝她一阵猛射，将她打翻在地。

仅仅 8 分钟，这场营救人质的战斗就胜利地结束了。4 名劫机分子 3 死 1 伤，82 名乘客和 4 名机组人员全部获救，只有 3 名人质和 1 名突击队员负了点轻伤。

自由来得太突然了，机上的乘客还未完全反应过来，就被他们的救星送下了飞机。

在机场大厦的小客厅里，86 名人员热泪盈眶，他们不分男女老幼，都激动地与韦施纳夫斯基国务部长、韦格纳警察局长以及反恐怖第 9 纵队的突击队员们一一拥抱。韦施纳夫斯基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

10 月 18 日零点 15 分，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的联邦总理施密特，当听到从摩加迪沙传来的国务部长的声音：“人质全部获救，事情圆满结束”时，不禁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兴奋得与站在一旁的政治家们握手拥抱起来。

1977 年 10 月 18 日下午 1 点 57 分，被营救出来的 82 名乘客终于飞抵法兰克福机场。这次原来只需花 135 分钟就从帕尔马飞到法兰克福的旅行，现在却花了整整 5 天时间，经历了一个长达数千公里的充满恐惧和惊险的航程。

（陈继）

宋教仁遇刺上海滩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火车站依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一片混乱。10点45分，广播喇叭里播出通知：

11点钟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要开车了，请旅客们赶快上车。

这时，从车站贵宾休息室里走出六七个人。走在中间的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陪同他的是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这几个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领袖人物，又是当前坚持制定共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边走边谈话，眼看就要走进检票口时，突然间传来一声尖利的枪声，紧接着又是两声，只见宋教仁身子一晃，踉跄了几步，跌倒在一把椅子上。

车站里顿时大乱，有的人吓得钻到椅子下面，有的人拼命向门外奔跑。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慌了手脚，连忙扶住宋教仁，问他怎么了。

鲜血，从宋教仁的腰部直涌出来。

于右任赶紧跑到车站外，拦住了一辆汽车，把宋教仁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报童们在大街小巷叫喊着：“宋教仁遇害，生死不明！”“宋教仁遇害，凶手不明！”

是什么人，为了什么，要暗杀宋教仁呢？

这就要从未教仁的身世说起了。

宋教仁是湖南桃源县人。西晋时的大文学家陶渊明曾经写过一篇《桃花源记》，把这个地方描绘成与世隔绝、如同仙境的美妙之处。可是宋教仁在这里生活得却并不幸福。他1882年出生，12岁就失去了父亲，一家七口人只能勉强度日。1903年，宋教仁在求学过程中，结识了革命党的重要领袖黄兴，又阅读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他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并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同黄兴等人成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华兴会，宋教仁担任副会长，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第二年，他就因为参加革命被学校开除，被迫逃到上海，又避难到日本留学。

23岁的宋教仁充分显示了他的杰出才干，他四处奔走，联络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革命刊物，发表了大量反抗清政府的文章。

1905年，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及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宋教仁成为其中重要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警察封闭后，宋教仁又创办了《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他并且多次回到国内组织反清斗争。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宋教仁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积极进行新政权的法制建设，起草颁布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任命宋教仁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农林部长。宋教仁虽然对农林工作不熟悉，但仍然努力做了许多工作。随着袁世凯窃国大盗真面目的逐渐暴露，宋教仁越来越感到实行民主宪政、推行政党政治的迫切性。

1912年7月，宋教仁坚决辞去了农林部长的职务，专心投入党的活动中。7月21日，宋教仁被选为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实际负责全党事务。为了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宋教仁主持了同盟会的大规模改组，然后联合统

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派，合并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当选为国民党理事，理事们公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又推荐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全面工作。

1912年11月，在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按照政党内阁原则，应由国民党出来组织内阁。一时间，宋教仁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舆论普遍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中最具有政治见解和经验的领袖之一，是最有希望组织内阁担任总理的人选。当时的总统袁世凯和总理赵秉钧，深深地感觉到了宋教仁的威胁，在他们控制的报纸上，对宋教仁横加责难，谩骂攻击。宋教仁当即给予还击。

双方的对立局面日益明朗。

按照原定计划，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定于1913年4月8日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国会。袁世凯几次打电报给宋教仁，邀请他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筹备国会开幕工作。也就在这时，上海传出流言，说有人要谋害宋教仁。许多人都劝宋教仁暂时不要去北京。宋教仁听后坦然地一笑，摇摇头说：“不会的，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能容许这样卑劣的手段呢！况且，我们的事业刚刚开始，即使有危险，我又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责任？我宋教仁不怕死，用死是吓不倒我的！”

宋教仁毅然决定，3月20日晚乘沪宁快车去南京，然后转津浦铁路北上。可是，他还没有登上火车，就已经中了罪恶的子弹。

全国一片震惊！

召开国会、宪政也就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已是半夜12点，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由德国医生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弹，子弹是从后背射入体内的，伤口离心脏很近，使宋教仁疼痛难忍。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关头，强忍伤痛口授了遗言，又请黄兴代拟电报连夜发给袁世凯。手术之后，宋教仁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不断呕吐，大小便中出血严重。医生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为防止意外，于右任亲自在手术室内监视手术进行。一群新闻记者始终坚守在门外，直到手术完成。可是，做手术的医生很悲观，只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努力，其余的……要看上帝的安排了。”

3月22日凌晨3时左右，宋教仁伤势转重，到4时48分终于逝世。这一年，他才32岁。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悲痛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陈其美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床沿喊叫：“此事决不甘心！决不甘心！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就在抢救宋教仁的同时，国民党内已多次开会，商讨捉拿凶手的问题。黄兴和陈其美积极与各界联络，并同公共租界的外国巡捕房联系，悬赏一万元缉拿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沪宁铁路局因为凶杀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铁路局的声誉，也出赏金五千元。江苏省都督程德全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助捉拿凶手，限期破案。

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也赶回国内。

然而，破案工作十分艰难。除了宋教仁身上取出的一粒勃朗宁手枪子弹，和车站找到的空弹壳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3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上海支部举行隆重的移灵仪式，将宋教仁的遗体从医院移往法租界内的湖南会馆停放。送殡的队伍长达十几里，加入送葬行

列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痛哭失声，围观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宋教仁的遗体盛放在楠木灵柩中，安放在扎满花圈的马车上，在浩浩荡荡的人流护送下，到达了挂满挽联的湖南会馆。

当天晚上，两个四川口音的学生，找到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他们说，在他们住的四马路鹿鸣旅馆，住着一个名叫武士英的凶汉，前几天曾拿一张照片给他们看，说只要杀了这个人，就有人会给很多钱。当时两个学生也没在意，后来看到报纸上所登的宋教仁遗像，才知道武士英所杀的就是宋教仁！今天又见到这样多的人为宋教仁送葬，才明白宋教仁是个为人民办事的好人，所以赶紧来报告这个线索。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消息当即报到了陈其美那里。陈其美当即令人到鹿鸣旅馆去监视武士英。这些人到鹿鸣旅馆一问，发现武士英已经结帐走了；他们在武士英的房间里只发现一张名片，上面写的是“江苏巡查长应桂馨”。陈其美立刻派人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这几天同样绞尽脑汁、熬红双眼的巡捕们马上出动，顺利地抓住了应桂馨。接着，在应桂馨家又查出了他同赵秉钧往来的大量信函和电报。陈其美看到这些信函电报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暗杀宋教仁的竟是袁世凯、赵秉钧一伙，他们是直接指挥者！

那个杀人凶手武士英，是个心狠手辣、头脑简单的家伙。应桂馨答应他，只要杀了宋教仁，就给他一千块大洋。武士英行凶后，一再跑到应桂馨家去讨这一千块大洋，结果也被巡捕逮住了。

3月25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主持国民党工作。当他知道暗杀宋教仁的幕后指挥是袁世凯时，立刻意识到，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惩治凶犯，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在国民党领袖们的秘密会议上，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应该夺取主动权，在所能控制的各个省区组织军队，武装讨伐袁世凯。他主张先下手为强。他说：“袁世凯想使封建专制死灰复燃，他辜负了国民的信任，必须将他除掉。国会只是打口头官司，法律也没有抵抗专制的力量，对付袁世凯这样掌握着军事大权的野心家，只有用武力对抗武力。我们应该趁袁世凯在全国不得人心的时机，起兵讨伐袁世凯。只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才有取胜的机会。错过这个时机，将来会后悔莫及的！”

但国民党内以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却坚持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求得解决，认为只要公布袁世凯一伙暗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袁世凯就会“不攻自倒”。接连几次会议，双方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白白地错过了时机，被袁世凯抓住机会，大耍两面派的老把戏，一面诡辩抵赖，一面加强武力镇压的准备，并且阻挠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凶手的方案，改由上海地方法庭开庭公审凶手。可是，在开庭的前一天，杀人凶手武士英就在看守严密的监狱中突然死亡，既无外伤，也没有中毒的迹像。尽管大家都怀疑这是袁世凯一伙杀人灭口，但一直查不出确凿的证据。

应桂馨在法庭上百般狡赖。然而铁证如山，他同幕后策划者的往来信件电报，已经清楚地勾划出了这一暗杀事件的来龙去脉，指使凶手杀害宋教仁的，就是当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内阁总理赵秉钧，中间联系人是赵秉钧的心腹、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4月25日深夜，法庭将调查结果和证据通电公布，第二天的《民立报》刊载了这些证据和有关照片。真相大白，举世震惊！

遗憾的是，在这样腥风血雨的政治危机中。国民党却没能把握住一举推翻袁世凯的最佳时机，所谓“法律途径解决”，实际上没有能解决任何问题，却给了袁世凯喘息的机会。袁世凯决不手软，一边设计诬陷国民党领袖，一边争取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一边大借外债，准备打仗，并且在5月2日组成了以陆军总长段祺瑞为首的“战时内阁”，调兵遣将，镇压革命党人。国民党却一直拖到这年七月，才在孙中山的一再坚持下，被动地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然而，由于军事力量薄弱，又错过了时机，“二次革命”失败了。

不过，这批歹徒凶手，一个都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袁世凯为了彻底灭口，先后又杀死了应桂馨和赵秉钧；而他自己，在1915年复辟帝制，登基做了83天“皇帝”后，也在世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洪述祖潜逃多年，直到1917年才重新在上海露面，但很快被宋教仁的儿子宋中发现。当时宋中才十几岁，他胸怀杀父大仇，时时刻刻注视着几个杀人凶手的动向。洪述祖满以为人们会淡忘了当年的血案，却不料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拦腰抱住。1919年3月27日，洪述祖被判处绞刑。

为了纪念革命先驱宋教仁，国民党在上海沪宁车站以北约十里的地方，购买了一块约一百亩的墓园安葬宋教仁，取名“宋园”。宋教仁的墓用红砖砌成上尖下方的塔形，上下五层，高一丈多，前面树立一座纪念碑。在上海静安公园，又树立了宋教仁侧坐沉思的铜像，供人凭吊瞻仰。

（薛之兵）

格兰德饭店爆炸案

布莱顿位于英伦三岛的南端，是个终年少雨、阳光明媚的城市。这里四季如春，亚热带的花草处处皆是，城市建筑依山而建。别有特色，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海滨度假。

在布莱顿海边，具有 120 年历史的格兰德大饭店巍然矗立在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山坡上。从外表看，这座饭店古色古香，但内部结构却非常现代化。

1984 年 10 月，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年会便在这里举行。来自英国各地的党魁和代表都下榻于这家大饭店。

10 月 12 日星期五凌晨，尚未入睡的保守党高级官员们，正期待着天亮以后，听撒切尔夫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这届年会为期四天，撒切尔夫人同她的 13 名内阁成员及高级顾问，夜晚也都住宿在这座面对大海的饭店里。

凌晨 2 点 50 分，撒切尔夫人从她所住的套间浴室洗手出来，面对窗下的大海，正在为演讲的开头而沉思。作为首相，她深知自己演讲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将自己的看法让人们留在脑子里，就必须有抓住人心的精彩开头。20 多年来的从政经历无一不证明了这是演讲成功的诀窍。

在这里，我们得顺便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下曾连任两届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 年 10 月 13 日生于英格兰肯郡的小镇格兰姆。父亲年轻时经营肉品杂货店，母亲结婚前是一个裁缝。小玛格丽特中学毕业后于 1943 年获奖学金，进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女子学院攻读化学。她在大学时候参加保守党，并任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从此，她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毕业后，她在一家工业公司担任了四年化学研究员，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法律，于 1954 年取得律师资格，是专门处理税务方面的专家。

1949 年，不满 24 岁的玛格丽特当上了达特福选区的保守党议员候选人，她在当时是英国最年轻的女候选人。同年，她与丹尼斯·撒切尔结婚。两年后，生了一男一女的双胞胎。现在，她的儿子马克是个会计师，女儿卡罗尔是记者。

在 1960 年 2 月进行大选的初次辩论会上，她一出场，就显示出不凡的才华。她不用讲稿，仅用了三分钟就讲清了议案。以往，每逢星期五，许多议员要提前退席，赶回各自的选区。而这一天，却有 100 多人出席，这是难得的好现象。表决时，她的提案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

初次演讲成功，使撒切尔夫人在政坛上一展英姿，哪里有她的演讲，哪里就有暴风雨般的掌声。为此，她以能言善辩、处事果断而获得了“铁女人”的美名。

如今，她老了，但她总觉得还有使不完的劲，她坐下来，准备把想好的开头写上讲稿。就在这时，一阵轰隆隆的巨响冲破了深夜的寂静，一枚爆炸力极强的炸弹在五楼爆炸，把旅馆大楼的正面从上到下炸开了一个很大的窟窿！硝烟中，残砖破瓦和玻璃碎片撒满了旅馆面前的大街。一眼望去，这座百年古朴典雅的建筑物，顿时支离破碎，一片狼藉。

说来奇怪，参加年会的保守党高级官员到旅馆不过几小时，撒切尔夫人所住的套间，在五楼爆炸点的正下方 30 英尺，爆炸前她从浴室里走出来，不

一会炸弹就响了，整个浴室被震毁。好险！正当人们在惊慌中从套间里跑出来后，一个个狼狈不堪地吼叫着时，撒切尔夫人在丈夫丹尼斯的陪伴下，来到惊恐的人们面前。首相依然衣冠楚楚，还佩戴着耳环，异常镇定地对代表们说：“我们非常幸运！”她当即宣布，天亮后会议照常举行。

此时，闻讯而至的消防车，长鸣着来到现场，加入了救灾的行列。救援人员凭借电视摄影设备的灯火进行抢救，他们不停地呼喊，要大家保持镇静。受过专门训练的狼犬在废墟中跑上跑下，寻找着受伤者的位置。每找到一个，消防队员便用斧子扒开积物和尘土，寻找压在下面的受伤者，在他们头上，及时开来的吊车伸出长臂，救出陷在楼上的人。

幸运的保守党代表穿着单薄的睡衣徘徊在海边，不时打着冷颤。他们既感命大没有埋入废墟，又担心丢失政府的重要文件，有的拉来一把折叠椅当作文件夹；有的坐在公文箱上不敢离开一步。

历年来，英国保守党年会的代表们下榻的旅馆，房间的分配向来是经过周密安排的。按照等级惯例，各选区的头面人物总是受到优待，分配在旅馆的最好房间里住宿；而职业政客，即使是内阁大臣，基本上都是年会的列席来宾，房间的等级要较前者差一些。今年的年会同样是这样。最好的房间是窗户面对大海的套间；望不见海景的房间较次，从房间的陈设布置来看，后种房间也要差些。也正因为如此安排，女王政府的几位要员幸免遇难。伤亡多的是住在高级房间的党内显要。

撒切尔夫人可说是福星高照，没有成为爆炸事件的牺牲品，但其他4人却不幸遇难了，另有34人受伤。这些人中，有好几名是保守党的杰出政治家或是他们的亲属。59岁的贝瑞，曾在议会供职20多年，但这次他却永远也醒不来了。被人从废墟中刨出来时已经僵硬的泰勒，是保守党西北分区的负责人。保守党西南联合会主席高登的夫人也身遭不幸。52岁的保守党首席组织秘书维克曼，被挤压在倒塌的碎石之中长达6小时，被救出后，尽管双腿断了，但人还活着。而一直躺在他身边的夫人却早已停止了呼吸。

受伤最严重的人中，有被很多政治家揣测可能成为撒切尔接班人的诺曼·泰比特，此人现在保守党内阁中任贸易和工业大臣。他本人从三层寝室被掀下二层，挤压在石堆之中，失去知觉达4个小时之久，直到营救人员发现他光着的双脚，才把他拖拽出来。这位大臣下肋骨折，大腿也受了重伤。他的妻子受伤更重，医好后也要瘫痪。

黑暗而灾难的一夜终于过去了。第二天上午9点30分，也就是在爆炸6个半小时之后，年会在紧挨着格兰德饭店的现代化的布莱顿中心按时举行。当撒切尔夫人步入会场时，受到听众的热烈欢呼。大会首先静默两分钟，向死者致哀。接着，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政府关于北爱尔兰的政策，以及在北爱尔兰从事军事和警务活动的有关规定。这天下午，撒切尔夫人借题发挥，以谴责北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作为自己讲演的开篇。她说：“炸弹袭击，是一种最不人道的、不加任何区别、对无辜的人进行的一种残害……这种想改变政府意志的袭击，就如同想要通过恐怖主义消灭民主势力的任何企图一样，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长达7分钟之久，撒切尔夫人像英雄般地挥舞着双手……

调查大饭店爆炸事件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据反恐怖的专家分析说，饭店内的炸弹重20磅，是一枚定时炸弹。爱尔兰共和国军宣称，他们对此事负

责，宣称他们放置的是一枚重 100 磅的炸弹。研究爆炸物的专家认为，由于这种小型炸弹制作精密，爆炸力很强，能造成极大的破坏。

这次爆炸的炸弹是安置在旅馆的优等房间——五楼第 609 室的地板下面的。据警方分析，可能在三星期以前，炸弹就已经安置在那里了。这说明策划这次事件的恐怖分子，是精于此行的老手。爆炸后，旅馆大楼宏伟典雅的门面被破坏殆尽。奇怪的是，炸弹所在的 609 室的住客夫妇并没丧命，伤势也不太严重。爆炸点正下方的几层楼面破坏得比上面还厉害。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住的套间的起居室，在一楼 609 室的垂直下面，起居室炸塌了，他睡在一墙之隔的卧室里，得以幸免。

在格兰德大饭店的爆炸发生之前，情报部门就曾发出通报，说国内在近期内可能发生炸弹袭击事件，但是情报部门不知道恐怖分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行动。英国警方虽然得到情报，但是对格兰德饭店的警卫工作没有作特别认真的对待。随着事后调查的逐渐深入，人们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一些政府官员们则相信，恐怖分子是用偷来的出入证，混在参加年会的代表中间进入饭店实施爆炸的。一位政府大臣说，布莱顿的警方对爆炸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工作是失职的，他们只注意防止罢工的矿工向保守党代表扔鸡蛋，而忽视了爱尔兰共和军对扔鸡蛋不感兴趣。他们要扔的是爆炸力极强的炸弹。

一些代表说，旅馆内的保卫工作很松，只要进入看似戒备森严的大门，在里面完全可以自由行动，畅通无阻。

负责保守党年会安全的苏塞克郡警察厅长声称，他事先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恐怖行动的情报，因此，尽管对这次爆炸事件的发生，他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在事实真相没有调查出来之前，他不想辞职。

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警方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其中包括几十名经验丰富的侦探，向所有在近期内在这家大饭店下榻过的旅客进行调查，并将所得的材料情况，都输入反恐怖部队所掌握的电子计算机里储存起来，进行分析。

在侦察过程中，由于害怕担当责任，伦敦警视厅和苏塞克郡警察厅，在协调上屡屡发生矛盾，相互指责，使侦破工作极不痛快。

为迎接保守党年会的召开，格兰德大饭店在开会前，曾经装修过一次，为此，建筑承包商提供了一张 70 名工人的名单，因为这 70 名工人有可能在 609 号房间里工作过。据说这张名单提出后过了一个星期，警方只找过其中的两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对旅馆的 50 名职工的调查工作也很马虎。据帐台的接待人员说，一个月前，曾有一对夫妇在 609 号房间里住宿，但至今已记不清这对夫妇的模样了。

当地的警方宣称，在代表进入饭店之前，曾派人带了警犬在房间里进行搜索。但旅馆的职工说，警察只对撒切尔夫人住宿的那一层进行了搜索检查。事实上，警察对撒切尔夫人的保安措施极为周密，室外走廊有武装特工守卫，阳台和电梯等地方都有电视摄像机进行监视。但在其他地方却很马虎，这成了保卫工作的极大遗憾，以至于发生了这一爆炸惨案。

据英国报刊报道，这次爆炸是“自 1972 年，北爱尔兰共和军第一次让它的恐怖活动跨过爱尔兰海，侵扰不列颠以来的最新、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活动。”

这次事件是长期以来，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国占领、要求并入爱

尔兰而进行的各种恐怖活动的继续，是再一次向英国和撒切尔内阁的示威。

北爱尔兰共和军对不列颠的仇视不是现在才存的。它的暴力活动始于本世纪 60 年代末期，70 年代初达到了高潮。冲突的起因是民族主义组织新芬党，要求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合并；而新教派和亲英国组织，则坚持北爱尔兰继续作为英国的一部分。新芬党的军事组织就是北爱尔兰共和军。

从那以来，北爱尔兰共和军进行了一系列刺杀、爆炸活动，以致老百姓一提到北爱尔兰共和军就惶惶不安，担心横祸随时可能降临自己头上。

北爱尔兰共和军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往往是针对警察和英国国民，或是知名的在野人士，因为他们的死亡一般在国内外都能产生重大影响。但这次格兰德饭店爆炸事件，锋芒却是直指英国首相及其内阁，这说明恐怖活动日益猖獗，且胃口越来越大。

为什么北爱尔兰共和军要进行这次爆炸事件？有专家认为：共和军想通过这次行动，证明其还有很大潜力去实施各种活动，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报复。

不过，在恐怖分子这种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英国政府加强了反恐怖措施，以改变过去对恐怖活动的束手无策。为此，撒切尔夫人明确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凡警察需要新型装备或其它各种装备，一定要给以满足。

据报道，英国在北爱尔兰已建立起一支特别部队，专门对付恐怖活动。同时，英国军方还使用先进的电子仪器，截获和侦破恐怖分子的活动。尽管如此，北爱尔兰恐怖主义分子，依然经常在伦敦闹市区制造爆炸事件，令英国当局头痛不已。

（贺文兵）

肯尼迪总统遇刺之谜

1963年11月21日上午11点零5分，美国总统座机“空军一号”从安德鲁空军基地起飞，美国第35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总统约翰·肯尼迪离开首都华盛顿，开始了为期三天的得克萨斯之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已经开始走向自己的坟墓，这是他的死亡之旅。

得克萨斯州是美国极右分子的中心，也是美国犯罪率最高的一个州。在得克萨斯州，又以达拉斯市的犯罪率为最高，在这里，枪支买卖到处都是，持枪不需要得到批准。每月发生的凶杀案比英国全年的还多，而且72%的凶杀案都是使用火器。总统的这次得克萨斯之行，就包括了达拉斯。

肯尼迪并不想去那里，在此之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对他说：“达拉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请求您别去那儿。”另外还有几个人也都这样劝他。可是，他不去怎么行呢？他还想争取下一届连任总统，他需要得到得克萨斯州的选票。况且，此行是应副总统、得克萨斯人林登·约翰逊之邀，而他们俩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若不敢去那里，便有失总统的面子。肯尼迪认为自己应该做出一种姿态。

11月21日晚，总统下榻在沃思堡的得克萨斯饭店。

第二天下起了滂沱大雨。一清早，肯尼迪在饭店八楼看着他即将发表演说的那个停车场，对身边的人说：“看看那个讲台，周围有这么一些大楼，如果有人真的想谋害我，特工处是无法阻止的。”

好在并没有发生什么，之后，他在大雨中向沃思堡的民主党人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早餐后回到饭店，这时他的心情已经变得比较轻松了。可是，当他阅读了助手特地给他送来的那份《达拉斯晨报》后，脸色却又阴沉下来。上面有一整版广告，醒目的标题是《欢迎光临达拉斯，总统先生！》，四周围以黑框，像死人的讣告。内容则是向总统提出12个问题，都是指责性的。

总统看后默默地 will 将报纸交给妻子杰奎琳，不无担忧地说：“今天，我们将要前往那个疯狂的地方。”

从沃思堡飞往达拉斯只需八分钟。当地时间上午11点40分，总统座机“空军一号”飞抵达拉斯机场。随机到达的还有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夫妇。按照惯例，副总统约翰逊夫妇搭乘另一架飞机抵达。达拉斯天空明净，难得这样晴好。肯尼迪总统的心情又开始变得愉快起来。

当总统夫人手持一束玫瑰花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机场一群年轻小伙子齐声对她喊：“嘿，杰基！”当总统出现时，又是一群年轻新娘向他发出一片欢呼。总统夫妇用了十分钟时间与欢迎他的人群握手致意，气氛是够热烈的。没有任何反对肯尼迪的迹象。

22日上午11点55分，身穿蓝灰色西服、灰条纹白衬衫和蓝色领带的肯尼迪总统与身穿粉红色衣服、头戴无边帽的夫人杰奎琳一道，在州长康纳利夫妇的陪同下，有说有笑、兴致勃勃地坐进总统的敞篷汽车。随即，总统车队浩浩荡荡地向达拉斯市区进发。

在达拉斯商业中心的街道上，起初人群稀稀落落，当总统车队到达时，人很快就多起来，拥挤起来，形成人山人海，人们都以能亲眼目睹总统夫妇的风采为快。见此情景，肯尼迪总统高高地站在敞篷车的右边位置上，杰奎琳夫人站在靠左的位置上，他们面带微笑，不断地向人们挥手致意。而夹道欢迎的群众也被总统的潇洒风度、第一夫人的年轻美貌所倾倒。人群中不时

地发出阵阵欢呼声和喝采声。整个达拉斯商业中心的街道，变成了一片热情的海洋。

坐在总统汽车折叠椅上的康纳利州长夫人内利转身对肯尼迪总统说：“总统先生，你肯定不会说达拉斯不爱你。”

被热情的人群所感染的肯尼迪总统大声地笑道：“不，不能！”

肯尼迪沉浸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愈发信心十足。殊不知死神正在悄悄地向他靠拢。当总统车队慢速驶过一条连接工业区的三角地带，进入达拉斯的迪利广场时，突然，从广场附近的教科书仓库六楼传来几声枪响。一瞬间，居高临下的子弹击中肯尼迪总统的头部和颈部，特别是致命的一枪打在总统头部的右侧。康纳利州长也受了伤。枪响以后，杰奎琳夫人转身去看被击中的丈夫，惊恐地发现他的脑壳碎片及脑浆洒向空中，她先是后缩，接着像是要从车后下车去寻找什么东西，嘴里大声地喊道：“我的上帝，他们干了什么事？我的上帝，他们杀死了杰克，他们杀死了我的丈夫……杰克！杰克！”

而负伤的康纳利州长倒在他妻子的怀中，呼喊道：“天哪，他们想把我们全部杀死。”

此时，迪利广场被人群的叫喊声以及尖锐的警笛声所包围。被枪声吓懵了的群众一旦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像受了惊吓的兔子，拼命地东奔西窜起来，整个迪利广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保安人员的警车强行开道下，肯尼迪总统等人被急送到达拉斯帕克兰纪念医院。约一个半小时后，院方沉痛地向人们宣告：总统受伤过重，不治身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遇刺而死的总统。前面三位分别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和威廉·麦金利总统。

肯尼迪遇刺的消息传来，立即震惊了美国，震惊了世界。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派高级官员到华盛顿参加葬礼。

11月25日，在华盛顿举行了隆重的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并通过通信卫星，向全世界作广播和电视报道。

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是谁杀死了肯尼迪总统？

现在，我们再从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刻说起。枪响以后，总统倒下了。紧握手枪的保镖们环顾四周，力图判断枪声来自何方。这时，一位电影摄影师正好抬起头来，看见教科书仓库大楼的一扇窗口有个拿着步枪的人，但那人瞬间即逝。

四分钟以后，三十名警察包围了那座大楼。证人向警察描述了拿枪的那个人大致外貌特征：一个瘦削的白人男子，身高约1.75米，年龄约30岁，穿一件黑色高领绒线衫……警方从大楼的一名职员口中了解到，一分钟以前，这个人在食堂开过一瓶柠檬水，后来就不知去向。仓库主任立刻补充说。那人是他新雇来不久的工人，名字叫李·哈韦·奥斯华德。

警方的无线电台开始不停地呼叫，命令搜寻这个年轻人。

几分钟后，警察在五楼发现一支带瞄准镜的意大利产“卡尔卡诺38”型步枪，接着在六楼一个窗口发现了一些烧鸡残渣和三个子弹壳。警察们谁也不怀疑他们已经找到了罪证和罪犯的线索。

这一切似乎太顺利了！

警察断定这个奥斯华德是一名暗杀老手，但他却装做是个外行的样子，他并不打算藏起来，也不像一般人估计的那样，事先选好退路，然后开车溜走。而是大模大样地走上大街，在拉马街汽车站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在车上，

还同其他乘客议论刚才总统被刺。

奥斯华德坐了一站就下车，然后改乘出租车前往六公里外的奥克一克利弗区的住所。他的举止一点不像刚刚刺杀了总统。他向女房东问了好，走进自己的房间，换上一件灰色上衣，然后迅速走出公寓。

13点18分，他出现在第十南街。

这时，一个叫蒂皮特的巡警正坐在警车里，收听指挥中心反复播送的寻找凶手的通知，而奥斯华德这时正好进入他的视线。蒂皮特眼睛一亮：人行道上这个家伙很像广播里说的那个杀害总统的凶手！他把警车开到离奥斯华德两步远的地方停下，招手叫他过来。

奥斯华德一声不响，平静地走近警车。隔着打开的车窗，他们交谈了几句。然后蒂皮特走下汽车，绕过车头，逼近奥斯华德。不料，这个年轻人却突然掏出手枪，一连三枪，将这名警察击毙，随后就消失在街角处。

一个正在执勤的自动枪手听到枪声便奔向警车，发现蒂皮特已经死了，于是打开步话机，向指挥中心报告了这一情况。

距蒂皮特牺牲的地方有七个街区的“得克萨斯”电影院正在上映《斗争的召唤》。电影院旁边一家鞋店的老板布莱尔正被不断广播的通告和呼啸而过的警车弄得心神不宁，无意中朝街上望了一眼，发现一个年轻人神色慌张，走近电影院的售票处，买了一张票，随后走进电影院。他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警察。

几分钟后，警察将这家电影院包围起来。鞋店老板布莱尔领着几个警察走进电影院。灯亮了，布莱尔在观众中发现了那个年轻人。警察麦克唐纳命令奥斯华德站起来，轻而易举地逮捕了他。

在达拉斯警察局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顺利破案的记载，从案发到凶手被捕，并获得确凿证据，一共只经历了100分钟！如此神奇的破案速度令人怀疑，以致不禁要问：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名堂？

经调查，这个叫奥斯华德的年轻人出生在新奥尔良，早年丧父，母亲带着他兄弟三个，生活十分艰难。十六岁时，他退学并试图申请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因为年龄不到，被拒绝了。后来他的家迁居沃思堡，重新读了几个月书，到他十七岁生日过后，他终于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呆了一年多，又调到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在部队里，他时常表示对苏联和古巴有兴趣。

1959年退役后，便想方设法绕道芬兰去了莫斯科。但他并没有能取得苏联国籍，只在那里居留了两年多。他声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苏联人却并不欢迎他。

1961年5月，他带着他的苏联妻子和他们的女儿回到美国，仍住在沃思堡。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怀疑他是否卷入间谍活动，对他进行过两次讯问。他不愿说他去苏联的原因，也不承认参加间谍活动。不过，他答应，如果有苏联人跟他联系，立刻通知联邦调查局。

尽管苏联人并没有接受他，却并没有改变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鄙视美国的民主制度，自称是“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主席，其实这个组织只有他一个人。因为经常跟他的妻子发生口角，之后他离家出走，到达拉斯找工作，在一位熟人的帮助下，找到了教科书仓库大楼管理员这份差事。

已被捕的奥斯华德拒不承认自己与肯尼迪总统遇害有任何关联，也不承认曾开枪打死警察蒂皮特。警方对他进行了十二个小时的审讯，奇怪的是，

整个审讯过程竟没有作一个字的记录。

奥斯华德被捕两天后，警方要把他从市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去。星期天一大早，闻风而至的记者们簇拥在市监狱外面，架起了摄像机，准备拍摄这个全世界注目的罪犯形象。

11点20分，当奥斯华德在大批刑警押送下，朝大门口的警车走来时，在电视摄像的弧光灯照射下，从人群中突然钻出一个人，手握一支科尔特手枪，对着奥斯华德的腹部就是一枪。犯人惨叫一声扑倒在地，送到医院一个多小时后死亡。

开枪打死奥斯华德的那个人被当场抓获，经审讯，此人是当地一个叫“旋转木马”夜总会的老板，名叫杰克·鲁比。他宣称，打死奥斯华德是出于对杀害肯尼迪总统凶手的无比憎恨，完全是受个人情绪的支配，与谋杀案毫无关系。

经过联邦调查局的严密调查，发现达拉斯市检察院检察长韦德和警察局长克里在掌握奥斯华德的罪证方面太不严肃，据他们说，在那支“卡尔卡诺”步枪上发现了凶手的指纹，还有一张绘有总统车队行经路线的平面图，其实这都是他们编造的。也没有证据说明打死警察蒂皮特的那个人就是奥斯华德。

这样一来，案情就变得复杂化了。

继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借口联邦调查局对此案侦破不力，下令成立一个七人调查委员会，由最高法院院长沃伦任主席来负责调查此案。人们称此为“沃伦委员会”。

1964年9月，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认为肯尼迪总统被刺系奥斯华德一人所为，并不牵涉他人。杰克·鲁比枪杀奥斯华德是出于义愤，并非杀人灭口。调查报告还认为奥斯华德行刺的唯一动机是“痛恨权威”。

但是，有些社会舆论并不同意“沃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认为肯尼迪被刺可能有幕后指使者，并提出以下的疑点：一是根据肯尼迪总统被刺时，警方对迪利广场音响的录音，发现枪响次数至少有四次，其中三次来自教科书仓库，至少有一次来自广场附近的小山丘的方向。这就是说凶手可能有两个，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活动；二是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在警卫森严的达拉斯看守所中，能轻而易举地开枪打死凶犯奥斯华德，这用出于义愤的原因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三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为什么在刺杀真相尚未清楚的情况下，就第一个提出“必须让人们相信奥斯华德是唯一的凶手”的断言？四是凶犯杰克·鲁比为什么直到1967年1月病死狱中也没敢吐露一点有价值的材料？

上述种种疑点，美国官方既未否认，也未加证实。因此，二十多年来，凡是牵涉到有关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内幕材料，美国舆论界从来没有忽略过，对事件的原因有多种猜测。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与肯尼迪政府的古巴政策有关。1960年4月17日至13日，经肯尼迪总统秘密批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训练和指挥的一支雇佣军，约两千人，在美国军舰和飞机的掩护下，在古巴的拉斯维拉斯省的吉隆滩强行登陆，企图以内外策应的方式，一举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实现肯尼迪总统对外政策的第一个惊人之举。但是，在古巴军队的英勇反击下，入侵者成了瓮中之鳖，被打死了114人，俘虏1189人。

入侵古巴的失败，并没有使肯尼迪政府接受教训，改弦易辙。相反，他

们却更加敌视古巴政府，恨不得置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于死地而后快。1960年夏，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司法部长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再次制定了旨在颠覆古巴政权的代号为“獾行动”的计划。其中包括对古巴的情报搜集、宣传、破坏、游击战和暗杀等手段。随后，在中央情报局的直接领导下，由美国收买和训练的情报人员对古巴领导人采取了投毒、暗杀和策反的阴谋活动。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虽然，肯尼迪总统对古巴的入侵和颠覆政策失败了，但这一政策本身却遭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谴责。这就会成为一些激进分子行刺肯尼迪总统的口实。而凶手奥斯华德自称是“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主席”，又似乎可以作为这种说法的佐证。

另一种说法认为，肯尼迪是因为得罪了美国黑社会的犯罪集团。随着肯尼迪古巴政策的失败，美国上下对肯尼迪政府产生了一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情绪。这就刺激年轻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助手们要创造更大的惊人之举。这就是总统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上任以后所发动的美国有史以来空前广泛、猛烈地打击犯罪集团的运动。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在肯尼迪以前。历任司法部长都只是口头上向犯罪集团宣战。罗伯特·肯尼迪是第一位付诸行动者。”

空前广泛、猛烈地打击犯罪集团的运动到1961年底已初见成效，同时也引起了犯罪分子的恐慌，增强了他们对肯尼迪兄弟的仇恨。特别使犯罪分子恼火的是，当初肯尼迪参加竞选时，他的竞选班子曾私下接受某些黑社会组织的“捐赠”。在肯尼迪对古巴的“獾行动”中，黑社会的某些成员也出过力。可是肯尼迪兄弟并不对他们感恩戴德，反而恩将仇报，出卖了他们。因此，一些犯罪分子发誓要“搬掉这块绊脚石”。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肯尼迪的冤家对头、亿万富翁汉特所为。汉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既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商，也经营其它多种行业，是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喜欢插手政治，但又是一个蒙昧无知的家伙。在得克萨斯，尤其在达拉斯，没有人敢于违抗汉特的旨意，他不仅控制着市政委员会，也控制着警察。

肯尼迪则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也是百万富翁。由于他年轻有为，在许多做法上与那些顽固的保守派形成冲突，使他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众所周知，早在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汉特就花了不少钱与他对抗；汉特仇恨肯尼迪，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肯尼迪明确表示他将关心黑人的利益，而且他也是这样做的。当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大选前在佐治亚州面临威胁时，肯尼迪不顾来自极右势力的警告，公然为他辩护。在肯尼迪兄弟二人的努力下，金牧师获得释放。这一举动赢得了黑人的好感和支持，却得罪了南方的豪门权贵。肯尼迪当上总统，黑人的选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1年1月，肯尼迪宣誓就任，许多美国人注意到，肯尼迪的政策同伟大的亚伯拉罕·林肯的政策有某些相似之处，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同林肯一样被刺的遭遇竟也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肯尼迪遇刺那天在《达拉斯晨报》上刊出那则加黑框的广告幕后策划人正是汉特的儿子纳尔逊·汉特，他为那则广告支付了1645美元。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暗杀幕后指使人就是约翰逊副总统，因为他原本就是肯尼迪的竞选对手，败在肯尼迪的手下，心里很不平。总统一死，他就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总统。

但是，沃伦委员会对这些一概否认，一口咬定不存在什么密谋，不过是1.9亿美国人中的两个精神状态不稳定者的单独行动。而大多数美国人对沃伦委员会报告是持怀疑态度的。几乎有一半美国人坚定地认为，沃伦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完全排除存在一个杀害肯尼迪总统的密谋集团。

更令人惊恐不安的是，与暗杀肯尼迪总统事件有关的一些最重要的证人一个接一个地丢了性命。不是死于被暗杀，就是莫名其妙地自杀，要不就是飞来横祸、性质可疑的心脏病发作等等。到1983年，陆续死去的证人已达188人。

列在这个神秘死亡名单头一个的是那个叫蒂皮特的警察。但后来有些目击者说，打死蒂皮特的那人长相与奥斯华德毫无共同之处，倒与杰克·鲁比非常相似。

第二个死亡者就是凶手奥斯华德。当他在人群中发现杰克·鲁比的时候，显得异常恐惧。还没来得及叫出声，便死于夜总会老板的枪下。

杰克·鲁比本人几年后也病死在狱中。临死前说，有人人为地使他患上了癌症。

还有一个是铁路工人利·鲍尔斯。肯尼迪总统遇害时，他在附近铁路路基后面的停车场发现了几辆他不熟悉的汽车。而在凶杀发生的时刻，他注意到有一群人在那里显得很忙乱，几个军人和一个手持报话器的人在说什么。鲍尔斯向沃伦委员会报告了这些情况，不久，他就死于车祸。

有两位看见警察蒂皮特被打死的目击者，一个叫哈罗德·拉塞尔；另一个叫瓦伦·雷诺兹，他们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讯问时都说杀死蒂皮特的不是奥斯华德，而是另外一个人。事后，两个人都遭到枪击，拉塞尔死了；雷诺兹重伤，侥幸活了下来。在联邦调查局再次讯问他的时候，他改口了，否认以前的证词。

一个谋害雷诺兹的嫌疑犯被捕了，但在杰克·鲁比的夜总会工作过的一个女服务员贝蒂·麦克唐纳作证说，这个人不在犯罪现场。嫌疑犯被释放了。但此后不久，贝蒂却不知为什么自杀身亡。几天以后，贝蒂的丈夫汉克·基拉姆在大街上被几个陌生人切断了喉咙。基拉姆也是奥斯华德一个熟人的好友。

女记者多茜西·卡尔戈伦曾有机会与开枪打死奥斯华德的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面对面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她后来也莫名其妙地死去。

在杰克·鲁比打死奥斯华德后，记者杰克·亨特有机会察看过鲁比的住所。不久，他干脆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警察局大楼内被警察的手枪“走火”送了命。

《达拉斯时代先驱报》记者吉姆·利泽与亨特一起察看过鲁比的住所，结果他在自己家中被枪杀。

奥斯华德在向肯尼迪总统开枪后，曾搭乘过出租车司机威廉·韦利的车。韦利也死于车祸……

在受害者名单上，最重要的一位是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正当他在总统竞选中即将获胜的时候，也被杀害了。原因很简单：有人害怕肯尼迪的弟弟一旦入主白宫，就会大张旗鼓地清查肯尼迪总统遇害一案。于是抢先下了手。

够了，没有必要再一一列举那些无辜的死亡者，但是，正如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琼斯所宣称的那样，无疑存在一个巨大的密谋集团，他们要从肉体

上消灭所有的证人，这决不是黑社会和少数嗜杀的狂人所能做到的。

近年，美国又爆出一个引起轰动的新闻，1988年9月12日，一位叫爱丝达·马斯的女士宣言不讳地说，她是当年行刺肯尼迪总统的主谋杰克·鲁比的情妇，并向外界披露她目击肯尼迪遇刺经过及凶手们策划这一行动的事实情况。一时间，美国新闻界沸沸扬扬，各报刊纷纷以“刺客情妇揭开肯尼迪被刺的黑幕”为题大肆报道。其实，马斯女士当时仅是个酒吧女招待，她所目击的情况，只是肯尼迪总统遇刺前一天晚上，杰克·鲁比和奥斯华德以及另外五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在一起策划刺杀行动。从中最多可以了解策划的一些细节，以及确认杰克·鲁比参与行凶活动。对于了解实质性的黑幕真相却没有多少意义。比如那五名一直逍遥法外的黑衣男子到底是何许人？他们背后真正的主谋是谁？动机又是什么？都不知道。

至今，肯尼迪总统的遇刺仍是一个悬案，一个谜。并可能永远是个不解之谜。

达拉斯正兴旺发达，不少旅游者来到达拉斯都要到教科书仓库大楼前摄影留念。

在费尔公园里，有一座蜡像博物馆，陈列着与肯尼迪总统遇刺案件有关的人物蜡像，个个栩栩如生。

奥斯华德的老母亲仍然健在，她住在距达拉斯20分钟路程的福特一沃特。老太太手下有一名秘书，负责安排来访者与女主人交谈，每次收费100美元。当然，她每次都强调说，她儿子没有杀害总统。

肯尼迪总统的遗体被安葬在华盛顿郊外的阿林顿公墓，这里肃穆、凄凉。四根带链条的小石柱围着一块墓地，墓前立着一个失去光泽的镀金十字架，旁边是燃烧的永不熄灭的长明火；一块黑色大理石碑埋在地上，上面镌刻着：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17—1963）

（孙石夫）

孙中山广州蒙难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并且妄图开历史倒车，将“中华民国”改变性质，成为“中华帝国”，自己上台当皇帝。结果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讨伐之下，袁世凯一命呜呼。但是，袁世凯的爪牙、北洋军阀的将领们，仍牢牢地控制着北京政府的领导权。他们毁弃了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继续实行封建军阀统治。《临时约法》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时颁布的，它规定了中华民国人人平等，人民有人身、信仰、选举等各项权利，是反对封建专制的根本大法。而现在北洋军阀政府要践踏这一辛亥革命最后一个胜利果实。

为此，孙中山挺身而出，举起了护法斗争的旗帜。1917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发表演说，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假共和、真复辟的嘴脸，指出革命党人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是真假共和的斗争，正式发出“护法”的号召，发动了第一次护法运动。8月，拥护革命的国会议员们在广州举行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但由于西南各省军阀与北洋军阀妥协，相互勾结，排挤孙中山，导致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1918年夏天，孙中山离开广东去上海。

面对新旧军阀混战、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惨景，孙中山决心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他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知道军阀武装力量是靠不住的，所以首先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1917年底，他曾从广东都督陈炳焜手中争取到二十个营的警卫军，便以此为基础，全力装备这支军队，并逐渐发展到20000人。他任命自己信得过的将领陈炯明为总司令，把国民党军事人才邓铿、许崇智等都派入这支军队，甚至批准全军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期望他们能成为革命军。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1920年冬天，孙中山重返广州，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拥护革命的国会议员又纷纷南下广州，恢复了广州军政府。由于当时外交活动很多，孙中山提议在广州组织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利于对外交涉。1921年4月7日，广州“非常国会”召开参议院、众议院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发表就职宣言，就任大总统，并到北校场检阅军队。这一天，广州全市悬旗结彩，数十万市民走上街头，热烈庆祝孙中山就任大总统。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生活依然十分简朴。当时总统府负责人吃的午餐，一般都是三元钱以上的西餐；而孙中山的午餐只花四角钱。孙中山坐的木椅椅背太矮，办公室的同志想为他做一张沙发，孙中山知道后，忙说：“沙发椅价钱很贵，不要买。要买就买一张高背的藤椅吧，既省钱又方便。”在穿着方面，他也很注意节约。他不喜欢清朝人穿的长袍马褂，有人建议他穿西装，孙中山回答说：“不好，穿西装就得用外国衣料，我们的黄金、白银就要流向外国去了。”后来，他自己设计了一种服装样式，把当时流行的一种学生装，加上小翻领子，口袋由两个改成四个，下面的两个口袋较大，可以放得进书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山装”。

这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大总统”已经换成了徐世昌。孙中山写信给徐世昌，好言劝他早日引退，以利于国家统一。徐世昌接信后，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要消灭广州政府，于是指使广西桂系军阀陆荣廷出兵扰乱广东。孙中山寸步不让，立即组织部队前去讨伐。革命军旗开得胜，把陆荣廷打了个

落花流水，接连攻下南宁和桂林，陆荣廷狼狈不堪，只身逃走。

孙中山在桂林独秀峰下对军队进行整训，亲自为团以上军官讲课，提高部队的素质，迎接下一步的战斗。这年7月，湖南军阀赵恒惕夺取湖北，与湖北军阀发生混战；后直系军阀加入，到8月底，打败了湖南军阀。这场混战为广东革命军的北伐，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孙中山命令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四川五省革命军一起出动，准备在长江边会师。广东革命军分三路北上，孙中山亲自率领一路直出韶关进入湖南。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革命军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问题出在担任中华民国陆军总长的陈炯明身上。

原来，出身于旧军队的陈炯明，已渐渐地蜕变成一个封建军阀。他利用自己军权在握，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妄图把广东变成他个人盘踞的基地。因此，他对孙中山大耍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口口声声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骨子里却不择手段地破坏北伐行动，甚至不惜与湖南、江西军阀串通一气，破坏孙中山的北伐计划。

陈炯明的所作所为，首先被革命军参谋长邓铿和廖仲恺觉察。他们对他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可陈炯明死不悔改，先下手为强，1922年3月21日他派人在广九车站暗杀了邓铿。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折回广东，把北伐军大本营移到韶关。

1922年4月16日，孙中山到梧州，拍电报约陈炯明到梧州面谈。陈炯明不敢前去。4月19日，孙中山只得采取措施，下令免去陈炯明陆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职务，但仍保留了他陆军部长的职务，给他留下改过自新的道路。陈炯明在当天晚上离开广州，把他的亲信部队调到了石龙、虎门。

4月29日，北方的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又一次爆发混战。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于5月4日发布北伐令，派李烈钧、许崇智领兵直插江西，分三路夹攻直系军阀。北伐进展十分顺利，不久就攻下了赣州，直系军阀陈光远弃职逃跑，南昌、九江大有不战而胜的可能。

孙中山非常兴奋。他为之奋斗多年的民主革命运动，又一次现出了胜利的曙光。

可是，6月13日，攻克赣州的北伐军，在清理敌人的遗弃文件时，发现了陈炯明拍发给直系军阀的一封密电。陈炯明在密电中，详细地向军阀报告北伐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和战斗力强弱，并积极地为直系出谋划策，向他们提供战胜北伐军的作战计划。

这份密电立刻被转送韶关的大本营。孙中山被陈炯明无耻的叛卖行径激怒了，他苦苦地思考对付陈炯明叛变的办法。但是，这时孙中山所能依靠的革命军，都在北伐前线战斗中；依靠大本营的兵力，是无法同陈炯明作战的。

6月16日，当孙中山回广州总统府处理事务时，陈炯明终于撕下了假面具，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开始叛乱。

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先囚禁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廖仲恺。

6月15日晚上10时，一位有正义感的军官用电话报告孙中山：今夜广东军队可能发生叛乱，请大总统务必离开总统府。孙中山以为这是谣言，没有相信。过了一会，孙中山的秘书跑来报告说：“今夜情势危急，陈炯明即将发动叛乱，并将谋害大总统！”孙中山仍不相信陈炯明会对他下毒手。

6月16日凌晨两点，一位军官冒险从粤军兵营中逃出来，赶到总统府向

孙中山报告：“现在粤军已经吃饱了饭，马上就要出动。陈炯明已准备了20万现款，作为谋害孙中山的赏金！”说这话时远处已经隐隐传来叛军的军号声。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再三催促孙中山离开总统府。孙中山身边的工作人员见形势不容再犹豫，便挽住孙中山的手臂，带着他离开了总统府。孙中山命令50名卫队全部留守总统府，就与工作人员悄悄地走出了大门，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这时叛军已在总统府周围布满了岗哨。孙中山身穿一件白夏布长衫，戴一副墨镜，看上去好像是一位中医。走到财政厅门前，一队叛军迎面走来，孙中山不动声色，镇静地穿过叛军的队伍，走到了海军总司令部，登上了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舰。

凌晨3时30分，陈炯明下令开始炮击位于观音山下的总统府。叛军登上了观音山，居高临下，左右夹攻，用野战炮猛轰总统府，同时大喊：“打死孙中山！”气焰十分猖狂。

驻守总统府的总统卫队同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叛军发动十几次冲锋，都被卫士们用手提机关枪击退，叛军死伤300多人。这时，宋庆龄仍然坚持在总统府内，她处理完了机要文件，才在卫士们的掩护下撤出总统府。宋庆龄头戴草帽，身上穿着孙中山的雨衣，在姚观顺副官和两名卫士的护卫下，冒着密集的炮火，混入避难的人群中。从早上8时到下午4时，经过了8小时的躲避与辗转，宋庆龄才同孙中山会合。当时，孙中山正与外交总长伍廷芳商量应变的对策，见宋庆龄脱险归来，心中十分欣慰，但他只简单地同宋庆龄谈了几句，就继续同伍廷芳谈起了工作。这种为国忘私的精神，使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

从这一天起，孙中山以海军永丰舰为基地，组织镇压叛乱的工作。

6月17日，孙中山乘坐永丰舰，率领其它的6艘军舰，开到了白鹅潭，以密集的炮火轰击陈炯明的叛军，打死打伤叛军数百人。叛军还击的炮弹打穿了永丰舰，孙中山仍毫无畏惧，镇定自若地指挥战斗。但在广州城内的忠于孙中山的陆军部队，没能参加战斗，致使海军孤军奋战，难以取得胜利。孙中山只得亲笔写下秘密命令，要在江西前线的北伐军将领李烈钧、朱培德、许崇智等人迅速返回广东平定叛乱。

在等待援军的日子里，孙中山只得困守在永丰舰上。然而陈炯明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竟丧心病狂地悬赏20万大洋捉拿孙中山。然而孙中山整天在永丰舰上不下来，永丰舰又戒备森严，任陈炯明有通天本事，也捉不到孙中山。陈炯明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密谋暗杀孙中山。

孙中山患有肺病，一天紧张的工作下来，往往觉得头昏脑胀，呼吸不畅，便要走上甲板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孙中山这个活动规律，被陈炯明探听到了。陈炯明就想出一条毒计，许诺50万大洋，收买了一个叫庞炳云的飞行员，让他驾驶一架装满炸药和雷管的飞机，乘孙中山在甲板散步的时候，用飞机撞击永丰舰，制造一幕舰毁人亡的大惨剧。

这天下午六点钟，陈炯明派出的观察哨报告，孙中山在蒋介石的陪同下登上了甲板。陈炯明当即命令整装待发的庞炳云立刻行动。几分钟后，飞机已经飞到了永丰舰的上空。

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蒋介石发现了飞机，提醒孙中山注意，并劝他进舱去避一避。

孙中山抬头望了望，不以为然地说：“没有关系。前几天也有一架飞机

飞得特别低，朝下面拍了几张照片。”

这时，飞机离军舰只有八九十米的高度了。庞炳云在飞机上，已能清楚看到永丰舰上的烟囱、大炮，以及甲板上的孙中山和蒋介石。他驾驶着飞机在永丰舰上空盘旋，寻找最佳的俯冲角度，同时还要考虑自己跳伞逃命的机会。几个圈子转下来，他终于选好了撞击路线，正想俯冲下来，却吃了一惊：前甲板上已经没有人了！

孙中山哪里去了呢？

原来，就在半分钟前，孙中山接到了李烈钧发来的电报，报告他回师广州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孙中山兴奋地回舱去查看军甩地图，蒋介石自然也就跟回舱里去了。

庞炳云还不死心，仍然在永丰舰上盘旋，希望能等到孙中山再次登上甲板。这架飞机对永丰舰的过分关注，引起了舰上保卫人员的警惕，当即用高射机枪示警，要求飞机马上离开。庞炳云无可奈何，只得狼狈返航。他刚下飞机，就被陈炯明的副官带走，从此不知去向。这个贪财忘义的杀手，没有得到一个好下场。

陈炯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又收买了一个亡命之徒李悦安，利用永丰舰水兵早晨上岸购买粮食菜蔬的机会，几个叛军冒充巡捕房的巡捕，假装有事借用水兵的舢舨，却让李悦安带着炸弹钻进了舢舨尾部放救生衣用的应急箱，这才把舢舨还给水兵。水兵不知道内情，仍像过去一样，用舢舨把粮食蔬菜运往永丰舰。永丰舰上放下吊钩，把舢舨吊上甲板，卸下货物，然后再吊上有二层楼高的固定架，上了锁，蒙上军用油布，以备下次再用。这样。躲在舢舨上的李悦安，就占据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只等孙中山走上甲板，便可以掷出炸弹杀害孙中山了。

然而，这时才是上午9时，孙中山正在紧张地工作。广州的夏季，白天的温度是很高的，李悦安躲在应急箱里，又闷又热，才半个小时，就已经大汗淋漓，几乎中暑。他大着胆子，钻出应急箱，藏身在舢舨中，又把蒙舢舨的军用油布撑开了一条缝，通风透气，这样才捱到了傍晚。他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了六点钟，他使用手撑开油布，探出半个脑袋朝下张望，只见孙中山和蒋介石果然正在甲板上漫步，毫无防备。他忙缩回脑袋，取出炸弹，正打算拧开保险盖扔下去。却听见甲板上一片吵吵嚷嚷。李悦安再探出脑袋去看时，孙中山和蒋介石已不在甲板上，倒有几个水兵正在用吊钩吊起他藏身的舢舨往下放！

原来，就在李悦安第一次探头张望的时候，已被停泊在附近的“宝璧”号军舰上的观察哨发现。因为按照舰艇上的军规，任何人不许擅自登上在吊架上的舢舨，所以观察哨马上认定是发生了意外，忙用旗语通知永丰舰。永丰舰上的保卫人员当即作出反应，一面让孙中山避进舱内，一边解下舢舨检查。说时迟，那时快，舢舨刚落到甲板上，几个水兵便一拥而上，掀开油布，抓住了束手无策的李悦安。

陈炯明的毒计又一次被挫败了。

这时，陈炯明又操纵一些人出来“调解”，妄图迫使孙中山与他们同流合污。孙中山坚定地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是国会选举的总统，决不当叛军的‘总统’！”

陈炯明软硬兼施不能奏效，他终于撕下了一切伪装，用鱼雷、大炮向永丰舰发起猛烈进攻。同时，他又以重金收买海军，使原来拥护孙中山的“海

圻”、“海深”、“肇和”三大巡洋舰叛变，退出了战斗；北伐军中的第一师也叛变了，回师援助孙中山的李烈钧部队在叛军和北洋军阀的前后夹攻下损失重大，只得退回江西。孙中山在孤立无援的危机中坚持斗争到8月9日，终于不得不离开广州，于8月14日抵达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

陈炯明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最惨痛的一次危机。他完全没有想到，跟随了他十几年的陈炯明，竟要置他于死地！但是，孙中山没有气馁，从这一危机中，他认识到革命不能单纯依靠军队，更要依靠党的力量。9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致国民党员书》，总结经验教训，决心寻求新的革命力量，走新的道路。也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向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对他进行帮助。从此，孙中山找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薛兵）

德国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钟，位于柏林舍内贝格区的国会大厦突然起火。这座建于1884年的宏伟建筑被火焰和烟雾笼罩了。火势蔓延得很快，当消防队赶到现场时，已无法扑救。国会大厅、贵宾席、各党派议员休息室以及新闻记者室都被大火所吞没。这场奇怪的大火烧了五个多小时，直到翌日凌晨二时许才被扑灭。

当消防队员们打开国会大厦各入口时，一个仅穿短裤的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从里面跑出来。警卫人员将他抓住交给警察局。从他身上携带的护照得知，他叫马尔努斯·范·达·卢贝，是个荷兰籍的泥瓦匠。当警察审讯他时，他坦白说，火是他放的，自己是荷兰共产党党员。放火的动机是“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报复”。

柏林警察局认为背后有德国共产党插手，所以连夜逮捕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左翼思想家、文人等130余人。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国会失火是由纵火引起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现场发现了带着导火索的汽油瓶、点火用的布头和棉纱等物品。为了便于引火，椅子的皮面也被撕裂，这些东西都放在共产党议员休息室的附近。可是，从如此庞大的建筑物顷刻之间被大火包围的情况来推测，放火的决不是一个人，至少得有三十个人同时行动。但涉及这一问题时，卢贝便闭口不谈——这是警察方面所披露的有关失火事件的概要。

根据普鲁士内务部发布的消息，这是共产党在幕后一手策划的，其理由如下：失火那天下午，共产党议员曾在国会会议室里召开会议。议员们六点左右才离开；此外，有人曾看见共产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艾伦斯特·托尔格拉亚那天傍晚带着卢贝同行。其次，火灾发生前，2月24日，柏林警察局搜查了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所，没收了室内所有印刷品和其它物品，从中发现有共产党的暴动计划。他们打算将国会大厦、凯撒故居建筑物、博物馆和其它主要公共设施全部烧毁。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放火的青年卢贝是荷兰共产党员。

内务部的声明还补充说：“即使个别事实与本声明有所出入，但是，放火事件背后有共产党进行策划，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此我们掌握确凿的证据。”

所谓“确凿的证据”就是“共产党的暴动计划”。内务部的声明声称，这是通过2月23日新成立的“政治警察”的活动才弄清楚。“政治警察”诞生的第二天，就开始对德国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宅进行搜查，并没收了有关共产党阴谋的许多文件。内务部的声明还说，令人吃惊的是，这座建筑物已成为暴动的大本营，里面修筑了令人发指的设施，包括暗仓、地道、秘密印刷厂等等。

不过，在当时的德国，除了内务部的声明之外，根本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关于这类事件，报纸也被禁止刊载政府声明以外的任何消息。当时普鲁士的内务部长——（确切地说是内务管理委员）是由德意志联邦国务大臣赫尔曼·戈林兼任，他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纳粹的大头目。

既然警察已经知道共产党要在国会放火的阴谋计划，那为什么不防患于未然呢？人们自然要产生这样的疑问。德国民主党的报纸《柏林日报》在触及这一问题后立即被查封、禁售。不久，这家报纸被纳粹（希特勒国家社会

主义工人党的简称)以暴力强行霸占。

只要对这件事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许多疑点，其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放火青年卢贝的行动。他把衣服脱下来扔进火里，穿着短裤从国会大厦里跑出来，本应避开众人偷偷地逃走才是，可他却几乎一丝不挂地跑到大马路上，这已是极不寻常的举动了。而且，他单单把荷兰共产党的党证珍重地保留在身上，目的只有证明他是共产党员。那么，到底是谁让他这样做的呢？

被捕的国会纵火嫌疑犯中，有三位保加利亚人，即季米特洛夫、塔涅夫和波波夫，他们都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3月9日在柏林霍夫餐厅被纳粹警察逮捕。9月21日，在莱比锡的德国最高法院进行了审判，此时距失火当天已过了将近七个月。

上午九点，审判开始，首先被带进来的是卢贝。他穿蓝色囚服，双手被铁链捆绑，过长的铁链缠在身上。左右跟着两名警察。顿时，法庭骚动起来。拍电影的照明灯清楚地照出这个穿囚服青年的身影。

接着，艾伦斯特·托尔格拉斯被带了进来。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西装笔挺，从容不迫地走上被告席。他41岁，但看上去似乎更年轻一些。他身后是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走在前面的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他身体健壮，具有巴尔干人的风度。波波夫是个不胖不瘦的漂亮青年，像个学生；塔涅夫个子不高，红脸膛，有一头卷发，看上去年纪也很轻。

审讯是从卢贝开始的，尽管审判长再三提醒他“声音大一些”，他仍以极低的声音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以致坐在他旁边的翻译都无法听清。在那天的审讯过程中，卢贝基本上承认了起诉书上的事实。但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说：“1930年我已脱党，所以现在不是共产党员。”问到脱党的理由时，他只回答：“出于个人原因。”

23日，季米特洛夫进行了申述。他从15岁起参加工人运动，三十年中一直以保加利亚共产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当过工会总书记，市议会、州议会以及国会的职员，主要负责党的宣传工作。

1923年9月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斯拉夫，从那时起，他一直在国外过着政治流亡生活。1932年夏天来到柏林，与保加利亚国内的同志配合，争取对1932年事件给予特赦而暂住下来，这次遭到逮捕。季米特洛夫申辩说，国会失火那天夜里，他正在慕尼黑开往柏林的列车上，所以与该事件毫无关系。

25日，托尔格拉斯进行了申述。与季米特洛夫一样，他坚决否认自己与国会纵火事件有任何关系。

莱比锡审判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德国国内，言论自由受到镇压，在国外，这一审判遭到各国的抨击。国会纵火案是纳粹镇压共产党的一个阴谋。为此，莱比锡审判一周后，在伦敦成立了“德国国会纵火事件调查委员会”。

另一方面，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与纳粹的暴行、诽谤以及不公正的裁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唤起世界公论。

1933年4月26日，《曼彻斯特卫报》指出，国会纵火案是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一手策划的。这个报道给人们以很大的震动。5月5日，公布了德国国权党领袖奥巴弗伦自杀的消息，但人们都说是暗杀。不久，他的遗书在国外发表，内容与《曼彻斯特卫报》的消息一致。其内容可概括为：内务部有关共产党总部计划暴动的报告纯属捏造。纳粹曾要求国权党与它一

起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但国权党拒绝了这一要求。纳粹党便孤注一掷，向冲锋队和党卫军下达了在国会纵火的命令。在冲锋队长海因斯的指挥下，潜入国会议长戈林公馆通往国会的隧道进行纵火。据说卢贝当时携带的荷兰护照、共产党的传单和几张自己的照片都被留在国会里。

要想了解为什么会发生国会纵火这样的悲惨事件，首先必须研究一下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

1933年1月31日，上台执政的希特勒立即解散国会，并公布于3月5日进行大选。国会纵火事件刚好发生在选举前的一个星期。

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工人就对法西斯的活动进行过抵抗，热切希望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的热诚呼吁终于打动了社会民主党。2月28日上午十点，两党代表决定在国会内举行会谈。社会民主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党中央机关报主编舒坦姆巴，共产党方面参加会谈的是托尔格拉斯。社会民主党由于有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党内又围绕统一问题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所以，一贯反对结成统一战线的该党已经到了再也不能犹豫的地步。

如果2月28日的会谈进展顺利，德国的政治形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纳粹党在上一届选举中获多数票，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但低于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两党票数的总和。假如统一战线获得成功，那么，至少在国会斗争中可以挫败纳粹党。这就是在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两党会谈之前，27日晚上国会必须失火的原因。

在莱比锡审判中，为了诬陷共产党有罪，检察当局动员了五百个人出庭作证。正像季米特洛夫所痛斥的那样，“从大臣到服刑的小偷”都网罗进来了。尽管如此，他们玩弄的把戏却并未如愿。12月23日，法庭宣判卢贝死刑；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释放。

但是，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德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不久，社会民主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纳粹的这一阴谋阻碍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遏制了民主势力，破坏了自由与和平。从这一点上来说，希特勒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孙练）

帕尔梅被杀之谜

欧洲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有个国家叫瑞典，风景如画，国富民泰，是发达国家中社会秩序最安定的国家之一。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金，就是由这里颁发的。

然而，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件。

1986年2月28日深夜，这是一个和往日一样宁静的夜晚。11点多钟，格兰德电影院的新影片《莫扎特兄弟》首映场散场了。瑞典首相帕尔梅和夫人，和观众们一道走出电影院。同时观看电影的瑞典白领工会领导人罗森格夫妇，和首相夫妇道别后乘车走了。首相的儿子马尔腾和他的女友也同父母互道晚安后走了。帕尔梅首相夫妇跟往常一样没带保镖，也没乘车，老夫妇俩像一对恋人，手挽手漫步朝家里走去。这是多年的老习惯了，他俩常在节假日里或去逛逛商场，或在街头散步，从来不要保镖跟随。首相常在电视里露面，市民们都认得他，迎面碰上时，都会给他一个注目礼。

帕尔梅夫妇经过几个街区，踏上了斯韦亚瓦根大街。这条大街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区的几条大道之一。突然，从黑暗处闪出一个人影，那人在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砰！砰！连开了两枪。帕尔梅夫妇随即倒地，凶手立刻消失在夜色中。当时是深夜11点30分。

正好刚刚有一辆出租汽车路过这里，司机听到枪声，立刻停了车。司机名叫代尔斯博恩，他发现首相倒在人行道上的雪地里，周围是一滩鲜血。他立刻通过车上的报话器，向警方报了案，并向医院要了救护车。另一辆过路车上的两名17岁的女孩子听到枪声，也跳下车来。她俩看到遇害者呼吸微弱，就给他按摩心脏。三四分钟后，警车和救护车相继赶到。

帕尔梅夫妇被送进了附近的萨巴茨贝里医院。帕尔梅的胸部和下腹部两处中弹；首相夫人莉斯贝特是被子弹擦过背部而受了轻伤。30分钟后，帕尔梅因一颗9毫米的子弹穿透了胸膛，心脏边上的一根主动脉被打断，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而停止了呼吸。终年59岁。

噩耗传出，人们几乎不敢相信，在瑞典这样平静、安宁的社会里，竟会发生谋杀政府领导人的恶性事件。

帕尔梅首相遇刺殉难，使瑞典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首相的门前，群众排着长队，表达深切的哀悼。在帕尔梅遇刺的现场，人们川流不息地献上一束束鲜花，有的献上一盏长明灯，有的则合家围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

瑞典人民以自己民族特有的方式和传统，自发地举行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人群在帕尔梅生前和经常讲演和活动的地方举行火炬晚会，悼念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悼念活动持续了半个多月，到3月15日葬礼时达到了高潮。政府官员、各党派领袖和各阶层人士，以及帕尔梅亲属和生前好友1000多人参加了葬礼。瑞典官方还及时作出决定：成立帕尔梅纪念基金会，并把地铁街改为奥洛夫·帕尔梅大街。

葬礼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蓝厅举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打破惯例，第一次参加了本国首相的葬礼，并发表了沉痛的讲话。他说，瑞典失去了“一个大家都听从的声音、一个热情地公开反对暴力和压迫的声音”。

全世界1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帕尔梅的隆重葬礼。其中有法国总统密特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西德总理科尔、印度总理

拉·甘地等 23 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葬礼之后，在灵柩移往阿道夫·弗雷德克教堂时，灵车通过的道路两旁聚集着数万市民。教堂距帕尔梅遇刺的地方只有一箭之地。市民们忘记了严寒，自动地站在冰雪覆盖的街道两旁，手持一朵洁白的小花，挥泪默默地为帕尔梅送葬。夜间，成千上万的市民穿着黑丧服，顶着寒风，络绎不绝地来到墓地，向帕尔梅致以最后的敬意。他们都是自发地前来的，凭吊的队伍一直到天亮不绝。

那么，是什么人要把瑞典人民爱戴的首相杀害呢？案情扑朔迷离。现在，我们这个故事就先从帕尔梅生命的最后一天谈起吧——

1986 年 2 月 28 日，星期五。瑞典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星期五就是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

早晨，帕尔梅前去瑞典皇家网球馆，同他 20 多年的老友、瑞典投资银行行长哈里·沙因打了一场网球。

8 点 55 分，他像往常那样，准时进入办公室。他坐下来，看了看办公桌上的日程记事簿，发现到下星期一以前，他没有什么重大外事活动，于是他便让警卫人员和助手们回家度周末去了。

警卫人员和助手们走后，帕尔梅审阅了一些特批的文件，签署了一项瑞典同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希腊和坦桑尼亚联合发表的六国声明。这项声明呼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举行下次首脑会议之前暂时停止进行地下核试验。

尔后，帕尔梅在办公室接见了当地一家工会报纸记者英格瓦·约格贝尔格，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帕尔梅显得非常轻松，兴致极高，在谈到世界形势时，他满怀信心地对约格贝尔格说：“今年是实现和平大有可能的一年。”这位记者在为坐在窗前的帕尔梅拍照时，半开玩笑地说：“坐在窗前不危险吗？”帕尔梅望了望窗外，不在乎地回答说：“谁也不知道窗外会有什么危险。”

帕尔梅一家早在 20 多年前，就在波罗的海的费罗群岛上租了一幢别墅，他常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到那里休假或度周末。但是这一天，帕尔梅一家没有像往常那样，前往费罗岛。晚饭后，帕尔梅决定同妻子一道去看电影。晚上 8 点 40 分，他们离家，乘坐地铁前往格兰德电影院。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为首相留在人间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项活动。

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接到报警电话后，迅速赶到现场，警察们发现是首相帕尔梅被枪击中，感到事情非常严重。他们在把帕尔梅夫妇送往医院的同时，立即封锁了出事现场，向警察总部作了报告。首都警察分头行动起来，封锁出事现场周围的一些区街，控制了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要冲，严格检查过往旅客。正在外地度假的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长汉斯·霍尔默，不到 4 小时就赶回首都，连夜分析案情。

从现场检查情况看，刺客很可能是一名老练的职业杀手。整个作案过程只用了几十秒钟，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唯一的罪证就是两颗直径为 9 毫米的穿甲子弹。警察在瑞典的武器库中还没有发现这一型号的子弹。他们只好把子弹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联邦德国侦探机构鉴定。

据首相夫人莉斯贝特回忆，当她听到第一声枪响时，还以为是小孩在放鞭炮，她回过头来时，第二枪也接着响了。她在慌乱中没来得及看清刺客的面容。

第一个目击者，出租汽车司机代尔斯博恩提供的情况是，当他听到枪声时，曾看到开枪者跑向几百米外停着的一辆大众牌“帕萨特”型蓝色小轿车，车上似乎还坐着一个人。凶手上车后，车子立即开走了。他看到了车牌号，但没有记全。另两名听到枪声的女孩子说，她们看到凶手身高约1.8米左右，年龄约30多岁，身穿一件深色的长大衣，头戴一顶带帽沿的帽子。但是没有看清面容。

还有一位22岁的女画家提供了一条线索。她说那天晚上出事时，她正沿着内加尔但胡同，朝斯韦亚瓦根大街走去，同一个跑来的男人相遇。她还根据回忆画下了一张据认为是凶手的头像。瑞典警方请了两名德国专家，在对这幅头像进行修改和鉴定以后，于3月6日公布于众。从画面上看，嫌疑人的特征是：长脸型、黑头发、高鼻子、黑眼珠、深眼窝，年龄约32—33岁，样子像是中东人或拉丁美洲人。

警方从全国调集了300名警察，根据已有线索进行搜捕工作。他们还检查一切行迹可疑的人，对各种恐怖组织严加注意。侦察机构的领导也进行了改组，充实了有办案经验的人员。警方通过电视台播放了凶手的肖像，将绘制的凶手肖像广为散发，并发出通告：凡能提供线索、抓住凶手的人，将得到7万美元的奖金。

警察总部大楼里，连续接到人们提供的他们认为同案情有关的各种线索。

瑞典警方还使用计算机数据系统，搜索凶犯和线索。这种系统利用为在瑞典出生的所有瑞典人和在这个国家定居的所有外国人确定的10位数字身份号码，可以很快找到他们的一切情况，从以往犯罪情况、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到纳税申报单都有。警方通过移民局和海关当局，可以查到进入这个国家的外国人的情况。

斯德哥尔摩市的出租汽车司机也是警方的助手，他们都随身带有与计算机相连接的电传打字机。警方还把对凶手的初步描绘输入了出租汽车的电传打字机中。

到1987年3月的一年中，瑞典警方一直在运用各种手段，紧张地搜查罪犯。他们已经审查了一万七千名有嫌疑的人，侦察记录多达二万九千份，曾向一万多证人作了调查。

一年过去了，瑞典人民思念帕尔梅的感情，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在他遇难的地方，人们经常献上一束鲜艳的红玫瑰，或点上长明灯寄托哀思。1987年2月28日，瑞典全国各地，为前首相帕尔梅举行了隆重的遇难周年纪念活动。

人们之所以如此怀念帕尔梅，是因为他的一生，为社会进步、为和平正义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然而，凶手究竟是谁？瑞典和全世界都关注此案的侦破。

一晃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在这两年间，有人声称自己是凶手，有人被人怀疑为凶手，但始终没找到真正的凶手。

1988年12月，在经过旷日持久的调查之后，侦破工作突然有了新的进展。据报道，警方让帕尔梅夫人观看了所有可疑分子录像，当看到一名42岁的男子时，她惊呼道：“就是他！他的脸型、眼睛和令人生厌的外表跟我以前说的一样。”这名嫌疑犯叫彼得松，无正当职业，家住斯德哥尔摩郊区，曾因盗窃、行凶和杀人被判过徒刑。警方随即逮捕了彼得松。

1989年5月29日，彼得松在被关押了半年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被起诉。检查官起诉的主要依据是，有人能证明嫌疑犯在事发之前，曾对帕尔梅进行过跟踪。法庭于6月5日开庭。除关键证人帕尔梅夫人以外，还有嫌疑犯的一个熟人出庭作证。嫌疑犯声称出事那天夜里他没到过现场。但这位熟人证明，他在格兰特影院外见过他，当时两人相隔不过2米远。

另一位证人是当时走在帕尔梅夫妇后面的一名男子。他看到在他前面走着三个人，以为他们是一伙的。后来他突然听到两声枪响，随即看到中间的男子倒下了。他是所有目击者中最靠近凶手的人，但当时他却看不到凶手的脸。

整个审讯过程共有32人出庭作证。7月27日，审讯结束，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判定彼得松是杀害帕尔梅的凶手，并因此判处他终身监禁。

彼得松不服，提出上诉说：“如果我是凶手，那么仅仅为了结束这场官司，我也甘愿承认。”瑞典中部地区的斯维亚上诉法院予以受理，并重新审理这一案件。

同年11月2日，斯维亚上诉法院作出判决，宣布涉嫌杀害帕尔梅首相的瑞典公民彼得松无罪释放。法院的判决书说，在帕尔梅遇刺当晚，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彼得松对帕尔梅夫妇跟踪过，并向他们开了枪。审讯过程中提出的各种证据不足以证明是彼得松杀害了帕尔梅。证人提供的有关作案的相貌、体型或走路姿态等，不足以说明凶手就是彼得松。帕尔梅夫人在受到震惊的情况下，断定彼得松为凶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由于斯维亚上诉法院的这一判决，使帕尔梅遇刺案搁浅。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凶手呢？也许真相大白指日可待，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贺金之）

古巴导弹危机

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政权。成立新政权之初，美国和古巴关系还比较好。2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访问了美国，受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热烈欢迎。美国的目的是想把古巴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但是，到了6月份，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动，政府的重要部门绝大多数被主张激进政策的人所掌握。美国对此表示不满，企图逼新政府就范。但古巴政府不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由此两国关系日趋恶化。

1961年1月5日，美国宣布同古巴断交。同年4月，美国支援雇佣军入侵古巴，结果以惨败而告终。同时，美国加强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这使得处于困难时期的古巴经济更加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不得不向苏联寻求援助。

苏联出于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正想在美洲找一个立足点。古巴求援，正是赫鲁晓夫求之不得的事情。1960年，古巴就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在美国与古巴断交后，苏联就逐渐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军事援助。最后，赫鲁晓夫决定把导弹运进古巴。随着古巴和苏联的关系日趋密切，美国政府也越古已导弹危机来越感到不安。

1962年7月2日，古巴武装部队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到苏联访问，两国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当年秋天，苏联要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具体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运去萨姆导弹和米格-21战斗机等防御性武器。第二步是待这种地对空导弹部署好，可用来保卫基地和阻止美国间谍飞机对古巴上空进行摄影侦察后，立即运进弹道导弹和能够运载核弹头的伊柳辛-28喷气式飞机等进攻性武器。

经过伪装的第一批武器是在7月下旬用商船运抵古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从古巴难民口中获悉了古巴港口比往常显得繁忙的情报，于是进行了观察研究。三个星期后，中央情报局给总统肯尼迪送去一份紧急情报：苏联大概已经在古巴建立了地对空萨姆导弹发射网。

肯尼迪警告苏联说：我们不会容忍进攻性武器进入古巴。否则，将会发生最严重的事情。同一天，赫鲁晓夫也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在11月美国国会选举之前，他不会挑起任何事端。

肯尼迪当然不会相信赫鲁晓夫的话。他命令U-2飞机增加对古巴上空侦察次数。侦察提供的证据表明，那些军事设施是防御性的。但与此同时，美国情报机关通过古巴难民的渠道，不断听到关于核装置的传闻。为了弄清楚这些互相矛盾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建议U-2飞机重点对古巴西部进行摄影侦察。这一建议得到肯尼迪总统批准。

10月14日，美国U-2飞机开始对古巴西部圣克里斯托尔进行飞行侦察，发现那里已设置了苏联使用的机动中程导弹基地，还有正在修建的进攻性导弹基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乔治·邦迪在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向肯尼迪总统作了汇报。

肯尼迪听后暴跳如雷，赫鲁晓夫显然欺骗了他。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不仅是对美国的挑衅，更是对他本人的挑衅。如果不猛烈回击，就会有损于他在政府中的威信，削弱他在国会里的信誉，激起公众对他的不信任感。于是他指示乔治·邦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开会讨论对策。

参加会议的有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中央情报局局长麦科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等。这些人组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负责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事务。

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两种不同的主张:以泰勒将军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用“外科式手术”——以空中轰炸来摧毁古巴导弹基地;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则主张进行某种形式的外交试探。争论没有结果。散会时,肯尼迪要求他们严守秘密。

10月17日,“执委会”继续讨论对策。会上提出六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暂时继续观察、通过外交途径悄悄解决、由联合国安理会解决、封锁。空袭、入侵。最后一条暂时搁置留待以后研究。争论的焦点是实行封锁还是进行空袭?麦克纳马拉认为,轰炸和封锁都是战争行为,但封锁的好处在于,至少在最初阶段可以避免流血,给对方时间思考,作出选择。然而,“执委会”的大多数成员还是主张空袭。

在下一轮的讨论中,封锁派占了上风,会议决定,肯尼迪总统在22日晚发表演说,向美国和全世界宣布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的事实和美国政府的对策。

次日,肯尼迪总统从芝加哥飞回华盛顿,并最后决定同意封锁。紧接着,美国政府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当天下午六点,召开了自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以来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国务院官员也开始对美洲国家组织进行拉拢工作;艾奇逊被派到欧洲,向戴高乐和北约组织通报美国即将采取的行动;美国新闻署则同各家私营电台安排一项专题转播节目,把肯尼迪的讲话用西班牙语对古巴和拉丁美洲播放。

美国在军事上也做了准备,海军在加勒比海布置了180艘舰艇;B—52轰炸机部队奉命满载原子武器在空中作昼夜飞行;第一装甲师深夜从得克萨斯出发,开往佐治亚州的港口准备上船。另外五个师也处于戒备状态。

10月22日下午6点,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这位大使从屋里走出来时铁青着脸,显得惊慌失措。他并不知道赫鲁晓夫在古巴的所作所为。35分钟后,肯尼迪在白宫他的书房里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了广播讲话,说明了苏联在古巴装置核导弹的事实,以及美国为什么采取“隔离措施”。并呼吁赫鲁晓夫放弃这种“统治世界的方针”。

肯尼迪的讲话震惊了美国和全世界。

在肯尼迪讲话发表后的十三个小时里,苏联毫无反应。但实际上,克里姆林宫里已是一片混乱。赫鲁晓夫没有料到古巴导弹基地会这么快就被发现,而且美国是这样快地就实行了海上封锁。原先,他之所以选择秋季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是因为他认为秋季是飓风季节,会妨碍美国U—2飞机的越境飞行。而且也正值美国政府竞选,即便发现,肯尼迪政府也不会采取激烈行动;加之,苏联的技术已大大缩短了建造核导弹发射场所所需要的时间。

直到十三个小时以后,苏联才有了第一个反应:塔斯社开始发表苏联政府的第一个声明,谴责美国的海上封锁是“海盗行为”。同时,美国驻苏联大使科勒也在苏联外交部接到这项声明,并附带有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一封信。

10月24日上午10点,美国一支以“特遣—136”为番号的舰队已把由中大西洋通往古巴的五条航线全部封锁起来,在距古巴东端三百公里的一条

巨大弧线上摆开。10点32分，向古巴方向行驶的二十条苏联货船停了下来。先是六条，然后是十二条船掉头回去了。这一天，双方没有发生冲突。

但根据美国飞机侦察的结果，古巴发射场上的工程还未停止。

美国方面认为，除非把工程停下，否则导弹很快就会安装在发射台上。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局势依然很危险。

这时，在联合国方面，代秘书长吴丹已经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发去了内容相同的信，要求双方一方面把封锁和向古巴运送武器都停止二、三个星期，另一方面举行谈判。赫鲁晓夫表示接受，但肯尼迪不同意。

10月25日是在双方僵持中过去的，这一天，只有一艘苏联货船“布加勒斯特”号通过了封锁线，美国军舰没有拦截登船检查，而是尾随它航行，进行监视。这样做的目的，用肯尼迪的话说，是“不想把他（指赫鲁晓夫）逼得走投无路”。

次日下午，出现了这次危机的第一次重大突破。苏联通过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广播公司驻国务院记者转达了赫鲁晓夫的建议：如果肯尼迪总统愿意公开宣布不入侵古巴，那么，他准备在联合国监督下把导弹撤出古巴。“执委会”讨论后答复，美国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到华盛顿时间晚上9点，赫鲁晓夫又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重提了下午的建议。

然而，到10月27日，危机达到了最高潮。美国政府致赫鲁晓夫的回信还没写完，莫斯科广播电台就播放了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另一封信。这封信的语气和上一封信大不一样。赫鲁晓夫要求美国以撤除其在土耳其的导弹来换取苏联撤除在古巴的导弹。正在这时，美国一架U—2飞机在古巴上空被打了下来，造成机毁人亡。美国政府认为，这说明古巴导弹发射场的萨姆导弹基地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下一步就该发射导弹了。同时，联邦调查局也报告说，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这三件事，使得“执委会”的成员都认为只有接受三军参谋长的建议：

29日发动空袭，紧接着就入侵古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但肯尼迪不同意。后来，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想出一个办法：他提议不理睬赫鲁晓夫27日的来信，只就26日的来信回答。这个建议得到采纳。当天，肯尼迪复信给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先从古巴撤走进攻性导弹，然后美国才能同意撤除对古巴的封锁，并保证不进攻古巴。

10月28日上午9点整，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了赫鲁晓夫的回答。他表示，古巴导弹发射场的工程将予停止；被认为是“进攻性”的导弹将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装箱运回苏联。并立即在联合国谈判，以便实现最终解决危机。

这样一来，危机开始趋向缓和。

肯尼迪表示欢迎赫鲁晓夫的“政治家风度的决定”，认为是“对和平的一个值得欢迎和建设性的贡献”。但又表示，封锁不是在导弹撤走之前结束，而是在撤走之后结束。

11月8日至11日，在美国军舰的监督下，苏联船只从古巴运走了导弹。

美、苏互相妥协并没有征求古巴政府的意见，因此，引起了古巴政府的不满。卡斯特罗开始拒绝撤走苏联的导弹和轰炸机，为此，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访问了古巴，劝卡斯特罗放弃这一要求。卡斯特罗最后接受了劝说，但拒绝联合国观察员进入古巴。并提了五个条件：一、美国人从关塔那摩基地撤走；二、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三、美国不得再对古巴搞颠覆活动；四、美国飞机不再进行强盗式的袭击；五、美国飞机不再入侵古巴领空。

对此，肯尼迪指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但因为古巴政府拒绝实地检查，因此，继续对古巴进行监视。

为了安抚卡斯特罗，11月20日至26日，苏联派副总理米高扬访问了古巴。在米高扬的反复劝说下，卡斯特罗最后同意联合国观察员进入古巴进行实地考察。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根据肯尼迪总统的指示，于11月20日解除了封锁的任务。次日，苏联也对军队下达了“解除动员令”。至此，一场濒临核战争边缘的危机就这样解除了。

（孙练）

风波亭岳飞遇难

北宋钦宗清康元年（公元 1126 年）十一月，金国的大军攻到了北宋的京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宋钦宗向金国投降。金兵疯狂地掠夺了东京城，第二年退走时，带走了黄金 35 万两、白银 714 万两，布帛 104 万匹，还抢去了大量的文书档案、珍贵文物，并且把宋钦宗和他的父亲、太上皇宋徽宗都带回北方去了。原来异常繁华的北宋京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就在东京失守之际，宋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渡过长江，逃到南京，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召集如鸟鲁散的北宋文臣武将。第二年五月，赵构在南京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了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史称宋高宗。

这时，无论朝中的文武百官，还是广大的老百姓，抗金的热情都很高。在李纲、宗泽、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坚持抗金的大将领导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多次击败了金兵，又用离间计除掉了投降金国的大汉奸刘豫，收复了不少沦陷的土地。

与此同时，金国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派系斗争。以挾懒为首的一派主张同南宋议和，然而议和的条件非常苛刻，实际上就是要把南宋变为金国的部属。当时南宋朝廷上许多文武大臣都坚决反对与金国议和，然而宋高宗赵构却一心想同金国议和，使自己能做一个太平天子，就派了一贯主张与金国议和的秦桧主持议和的事项。到了高宗绍兴八年（公元 1138 年）12 月，终于同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条约规定：金国把汉奸刘豫原来控制的地区归还宋朝；金国把徽宗的灵柩和韦太后送归宋朝；而宋朝则向金国称臣；每年向金国进贡白银 25 万两，绢 25 万匹。

对于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宋高宗和秦桧还无耻地当作一件大喜事来庆祝，并要求文武百官都上表祝贺。说到底，就是因为这个条约保证了宋高宗赵构的“皇帝”地位。金国不来侵犯，赵构已是求之不得；而金国不肯放回他的哥哥宋钦宗，在赵构更是正中下怀，免得钦宗回来同他争夺帝位。

然而宋高宗赵构和秦桧的美梦并没有能维持多久。绍兴十年（1140 年），金国的内部局势再次发生变动，主张彻底灭掉南宋的大将兀术占了上风，以“谋反”的罪名，杀掉了主张同南宋议和的挾懒。兀术认为，把原来刘豫的地盘归还南宋，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所以他兵分四路，在这年五月向南宋发动大规模进攻，夺取了东京，又继续向南杀来。

南宋小王朝又一次面临灭亡的危机。

宋高宗在和约签订后，就以为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对于边防，根本没有作部署，就连金国归还的地盘，也还是由原来刘豫安置的旧官吏统治着。金兀术大军一到，这班旧汉奸大都望风投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归还”南宋的土地，几乎全部又落到了金兀术的手中。宋高宗这才着了慌，忙给各路将帅下命令，要韩世忠守住淮东，张俊守住淮西，岳飞为“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负责河南各州的收复和防御任务，并要求各路将领务必全力阻止金兀术南下。

岳飞率领岳家军，立即行动，六、七月间，在颍昌、郾城、临颖等地连续大败金兵，金兀术闻风丧胆，一直退回东京。这时岳家军已追到离东京仅 40 余里的朱仙镇了。金兀术一面命令做好渡过黄河北撤的准备，一面又调集十万大军打算同岳家军决一死战。哪知道，金兵对岳家军惧怕已久，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岳飞部将岳云和张宪率 500 名敢死队闯入金兵大营，金兵便四

散奔逃。兵败如山倒，自相践踏而死的金兵不计其数。金兀术感叹地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呀！”

正当岳飞准备乘胜攻下东京，全部歼灭金兵之际，突然从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来了一位使臣，向岳飞宣读宋高宗的诏令，要岳飞立即撤兵。

岳飞听了，十分生气，当即写了一份奏章，派人送到高宗那里。岳飞在奏章中向高宗申诉：经侦察，金国的大军都集中在东京，因为屡次失败，已完全丧失了锐气。金国朝廷内外都非常害怕，兀术已打算扔掉辎重物资，渡过黄河逃跑。河南河北的百姓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我军。现在正是一举打败金国、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再作决定！

但是，在临城中宋高宗和秦桧却不是这样想的。宋高宗早就对岳飞手握重兵心怀猜忌，唯恐岳飞起来造反，他的皇帝就当不成了。如果让岳飞立下消灭金国的奇功，他就更没法控制岳飞了。而中原地区的平民百姓组织义军，又是高宗所害怕的，他怕百姓的力量大了，会起来推翻他。对宋高宗来说，只要能在江南半壁江山当个皇帝，他已心满意足了。所以他宁愿保持同金国南北对峙的局面，也不愿去收复失地。

秦桧根据宋高宗的旨意，想出一条毒计。他先命令其它将帅都从前线后撤，然后以“岳飞孤军深入，不可久留”为借口，一天连下十二道金牌，要岳飞火速撤兵。同时，宋高宗也更认为岳飞不听他的指挥，认为他有谋反意图，已经暗暗下定了杀害岳飞的决心。

岳飞见友邻部队都已后撤，自己如不撤退，就有被金兵包围的危险；再看看这严厉而急迫的一道道金牌，又伤心，又愤怒，他不由长叹一声，说：“我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啊！”

果然，岳家军前脚刚退走，金兀术紧跟着就杀过来了。岳飞刚刚收复的大片土地又失陷了。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三月，岳飞和张俊、韩世忠先后回到临安。宋高宗立即委任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这已是武将的最高官职了；而岳飞也被委任为枢密副使。这又是宋高宗的阴谋。因为这么一来，这三位大将便失去了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徒有虚名的官职再大，对皇帝也不会产生威胁。

紧接着，秦桧便指使他的党羽开始诬陷岳飞，说他在淮西战役中逗留不进，并公开主张放弃楚州（今淮安）。岳飞听了，忍无可忍，请求辞职。宋高宗便乘机解除了岳飞的官职。在这个皇帝心目中，岳飞的辞职，是对他的一种要挟，这就更加使他不能容忍岳飞，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了。

这时，岳飞对宋高宗的真面目仍然认识不清。他性格倔强，为人耿直，过去曾多次在高宗面前坚持自己的主张，弄得高宗皇帝下不了台。在岳飞的主张被否定后，他也曾好几次提出辞职，宋高宗迫于大局，每次都不许岳飞辞职，并且不得不在表面上作出一点让步，请岳飞率兵出征，但心里却对岳飞越来越猜忌。这一次，宋高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放心大胆地除掉岳飞了，所以立刻批准岳飞辞职，并且加快了谋害岳飞的步骤。

谋害岳飞，看来似乎是针对一人而已，其实，在这阴谋背后，隐伏着南宋小王朝的生死危机。因为若是岳飞一死，金兀术便没了敌手，他就可以无所顾忌，挥师南下了。

更大的迫害阴谋开始实施了。为了罗织岳飞的罪名，秦桧授意枢密使张俊对岳家军都统制王贵威逼利诱，迫使王贵同意陷害岳飞。接着，秦桧又派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武汉）岳家军大本营担任总领，监视岳家军；又收买

了岳家军大将张宪部下的副统制王雕儿，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说张宪得知岳飞被罢官，愤恨不平，打算率领大军南下，威逼朝廷把兵权还给岳飞。状词中捏造的谎言十分拙劣，任何稍有头脑的人一眼都能看出破绽。然而，当这份状子到了张俊手中，张俊便立即逮捕了张宪，并进行酷刑逼供。张宪宁死不作假口供。张俊便自己伪造张宪的口供，说张宪已决定在接到岳飞的通知后起兵谋反。秦桧马上奏请宋高宗，把张宪、岳云押送到大理寺，由这个全国最高法庭审理，并命令岳飞也到大理寺，一同接受审讯。宋高宗立刻批准，由大理寺进行彻底审理。

最初，负责审讯的官员是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岳飞被带到大理寺，看见张宪、岳云被打得浑身是伤，血迹斑斑，身上还戴着枷锁，他心中十分愤怒，但他还是努力克制自己，义正辞严地辩白冤屈。最后，岳飞解开衣服，袒露出背上由他母亲刺下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连何铸也不禁肃然起敬。何铸虽然是秦桧的亲信，也不忍心再于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为岳飞辩护。秦桧十分不高兴，沉下脸说：“这是皇上的意思！”何铸依然据理力争。秦桧理屈词穷，便去奏请高宗，派何铸出使金国去议和，而改派他的死党这个姓万的担任御史中丞，继续审理岳飞的案子。

这个姓万的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他完全遵照宋高宗和秦桧的指使，不顾事实，一心要把岳飞置于死地。这个姓万的再次捏造罪名，说岳飞曾写信给王贵、张宪，意图谋反；又说岳飞有攻击皇上的弥天大罪，并拉了王贵等人作伪证。经过两个多月的罗织罪名和毒刑拷打，这年的12月29日，这个姓万的将审理结果上报秦桧，判岳飞斩刑，张宪绞刑，岳云三年徒刑。高宗看到后，当即批复：“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将兵防护。”宋高宗不但要杀害岳飞，而且要斩草除根，决不放过岳飞的儿子岳云。

当天晚上，岳飞在监狱中的风波亭里，被残酷地杀害了。张宪、岳云被绑赴闹市问斩。行刑时，临安城各个城门都派了重兵把守，戒备森严，以防百姓闹事。这一年，岳飞才39岁，岳云才23岁。

岳飞死后，不少主战派大臣上书高宗皇帝，为岳飞鸣冤。宋高宗置之不理，并乘机又罢免了韩世忠的官职。

这样，南宋离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薛兵）

七国首脑死里逃生

1986年3月，日本首都东京樱花盛开，春意盎然。每年这个时节，世界各地的游客便纷纷涌向这个“樱花之国”，在妩媚多姿、灿若云霞的樱花的海洋中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这天上午，位于东京新宿区矢来町的“松原”公寓，来了一位四十上下的中年男子。他对公寓主人说：“我叫松本，我和妻子想在这里租一套公寓住些日子。”

公寓主人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位男子，他身高约1.75米、戴着眼镜，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然后房主颇有礼貌地鞠了一躬。拒绝道：“先生，对不起，我们这里已经没有空余的客房了。”房主说的是实话，松原公寓是座钢筋混凝土的6层建筑，二层楼以下已租给人家开舞厅和餐厅了，五层和六层是早已卖出的私人住宅，只有三层和四层是零散出租的房间。眼下正是旅游旺季，松原公寓又位于繁华闹市区，所以客房相当紧张。

自称松本的男人似乎已料到会遭到拒绝，他递上一张不动产公司的名片说：“哦，是这样的，我们是不动产公司介绍到这里来的，请多多关照。”

名片起了作用。不动产公司老板是松原公寓主人的朋友。他翻了翻登记簿，装作惊喜的样子说道：“先生，算你走运，昨天刚好有一位朋友退房走了。”

松本道了声谢，就这样和妻子住进了401房间。

在公寓主人看来，松本夫妇是奇怪的客人。他们从不和别的房客打交道，也不到楼下的舞厅消磨时光，房门成天都是关着的。不过，现代社会生活中，性格孤癖、行踪诡秘的人并不少见。所以，公寓主人也并不十分在意。对401号房间发生的事，他更是一无所知。

夜幕降临了，东京的一幢幢摩天大厦上的霓虹灯开始闪烁，然而，就在这样和的气氛里，此时的松原公寓401房间内，正在酝酿着一项震惊世界的绝密行动计划。

松本伏在一张地图上，一边用尺比量，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刚好3000米，在最有效的距离内，绝不会有错。”松本的“妻子”心领神会地附和道：“是啊，我们一定会成功！”

原来，松本和他的年轻貌美的“妻子”，是极左派组织“中核派”的重要人物。近一两年来，中核派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反美、反政府、反对东京首脑会议等一系列集会和游行示威，但这些活动收效甚微。于是，他们决定对东京七国首脑会议直接采取“强硬行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得顺便介绍一下，什么是七国首脑会议。

七十年代初，西方国家经历了“美元冲击”、“石油冲击”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共同研究经济形势，商讨对策，协调立场，1975年7月，由法国倡议，在巴黎举行了首次会议，由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六国参加。第二年，在波多黎各岛举行第二次年会，参加国增加了加拿大。于是便称作“七国首脑会议”。后来，欧洲共同体也派了代表参加。此后，西方发达国家最高经济会议作为一种例会，被固定下来。每年一次，在与会国轮流举行。这次是第十二次年会，由日本国作为东道主。

然而，要给来自西方七个国家的首脑“制造麻烦”，说说容易，真做起来，却又谈何容易！姑且不论首脑们都带有自己的卫队和保镖，外人难以

接近他们身边，就是东京警视厅的特工人员，小小的中核派也奈何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的外国首脑和要员频频来访。由于近年来恐怖主义十分猖獗，暴力活动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生，为此各国要员都颇为担心。然而，凡是访问过日本的外国首脑，对日本的保安工作均倍加赞赏，推崇备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日归国后，都给日本特工组织发去了长篇感谢电；就连拥有世界闻名的克格勃的苏联官员，也赞不绝口地说：“日本特工人员彬彬有礼，尽心尽职，是世界一流的。”

日本特工组织成立于1975年9月，总部设在日本警视厅办公大楼第16层，其成员主要从警视厅人员中选拔。特工人员个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机智灵活；剑道、柔道、枪法都很高超，一个个真是身手不凡。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具有责任感强、守口如瓶、勇于献身的品质，大多数特工都能掌握一门或几门外语，年龄也都在25岁至35岁之间，基本上是男性。

日本特工武器精良，能够应付各种意外事件。通常情况下，特工人员的主要装备有：小型速射枪、特殊警棍、手铐、警笛、毒气筒、高性能无线电话等。若是夜间行动，还配有照明弹。

对于特工组织的强大威力，中核派和松本是一清二楚的。要想近距离袭击参加会议的七国首脑，无异于天方夜谭，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几千米外，将炸弹投到首脑人物身边。计划已制定妥当，现在是该进入实施的阶段了。

眼看离七国首脑会期越来越近，坐镇总部的警视厅长官俊藤田，心情一点也不轻松。三月以来，对东京首脑会议的保卫工作，在俊藤田的亲自领导下，进入了筹备阶段。为了向极左派发出警告，东京地方检察院对革命者协会的非公开活动家城野顺治，以侵入建筑物、违反枪刀管理法等罪名，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对反对东京首脑会议的极左派进行起诉，这是第一次。

可是，极左派并没有因此而屈服。警方逮捕了中核派头目桥本利昭，从没收的暗号备忘录中分析，警视厅已经预感到在这次首脑会议期间，极左派可能从高楼直接发射炸弹，袭击会场。俊藤田与同僚们商量后，决定把以迎宾馆和各国首脑下榻的新大谷饭店、大仓饭店为中心向外扩展两公里区域，划为会议期间警备圈，增派三万名警备人员，昼夜戒备，并给警备部增配喷气式战斗机、武装直升飞机、飞艇和红外线夜视望远镜、精确狙击枪、装甲巡逻车等先进的武器装备。尤其是在圈内的每座高楼的前面都设置一组岗哨，严密监视出入的人。对从街上采购回来的主妇挎的篮子，以及送牛奶的货车，都要一一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尽管如此，俊藤田对周密的警备计划心中依然没有底。是啊，1986年，是哈雷彗星回归年。对科学家来说，这是近距离研究这个神秘天外来客的最理想的年份。可这一年，对人类来说却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件。仅仅是前4个月，就出现好几起震惊世界的事件：

——2月28日，瑞典首相帕尔梅被不明身份的人枪杀，凶手至今未找到；

——4月6日，西柏林舞厅发生重大爆炸事件，200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硝烟血泊中呻吟；

——4月15日，美国“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及周围的军事目标进行了猛烈袭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险些丧命；

——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毒气外泄，致命的放射性尘

埃随风飘荡，使大片欧洲土地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一些组织和团体扬言，将以“适当的方法”提醒西方七国首脑，对此事予以重视……

所发生的一切，与四方七国首脑会议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谁敢担保国内国外的“特殊人物”不挺而走险？

首相中曾根放心不下，俊藤田更是忧心忡忡。

决定性的日子——1986年5月4日终于来到了。

雨后天晴的东京，格外美丽宜人。第12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将在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中召开。

下午两点，位于青山墓地北侧的赤坂国宾馆，披上了节日盛装。在前厅里，军乐队奏响了欢快的进行曲。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拉开了序幕。

此时，日本警视厅进入了紧张的战斗状态。首脑人物的前后左右，簇拥着身材魁梧的便衣保镖；树丛中、花坛后手提机枪的保安人员，如临大敌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国宾馆外，牵着警犬、骑着摩托的警察，组成了严密的警戒线。空中机动飞艇的舱内，拿着高倍望远镜和精确狙击枪的特等射手，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地面，一旦发生可疑情况，他们就将毫不留情地扣动扳机……

然而，如此严密的保安措施并非滴水不漏。

里根总统两天前就已到达东京，为出席会议作准备。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则是在欢迎式已经开始后的2分半钟，才从羽田机场匆匆赶到赤坂国宾馆。法国总统密特朗。甚至比撒切尔夫人还晚到一个小时。

按照惯例，欢迎仪式按欧洲共同体、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的顺序，每隔20分钟分别举行一次。当某一国家的首脑同中曾根首相一起站到红地毯中央的检阅台前时，陆上自卫队中央乐队就奏起为这次会议新谱的“祖国”歌曲，而后奏两国国歌，检阅91人组成的陆上自卫队特别仪仗队，向飘扬在仪仗队中央的两国国旗献礼。一次欢迎仪式实际上只用7分钟。

又一次欢迎仪式开始了。

乐队奏响了英国国歌。站在中曾根首相身边的撒切尔夫人和着乐曲，无声吟唱着这首产生于18世纪40年代的歌曲。

接着，日本国歌响起来了。撒切尔夫人对这首名为《君王的朝代》似乎并无多大兴趣。望着红、白、蓝“米”字旗，撒切尔夫人希望这次能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她做梦也不会想到，此时离国宾馆2600米外的松原公寓内，有5门自动迫击炮的炮口已对准了自己。

整个欢迎仪式结束后，各国首脑齐聚检阅台前，互致问候。作为东道主的中曾根首相，一面指着飘忽在会场上空巡逻的日本警视厅飞艇，一面同各国首脑窃窃私语，表现出一副春风得意、从容自信的神态。然而，他非常清楚，此时此刻的首脑会议，正处在危机四伏的险恶局势之中。

今年3月25日，极左派为反对举行庆祝日本天皇在位60周年纪念典礼和东京首脑会议，向日本皇宫和美国大使馆发射了火焰弹；4月15日，美军横田基地又遭到迫击炮袭击；紧接着，大阪和东京也发生了5起炮击事件。

中曾根首相暗暗祈祷苍天保佑：但愿今天不要发生意外。4点20分，最后到达东京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匆匆赶到会场。他刚刚走进迎宾馆，再过10分钟就将举行欢迎美国总统里根的最后一轮仪式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5发迫击炮弹伴着巨响和浓烟，从松原公寓4楼的401号房间，以2分

钟的间隔连续发射出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把周围住宅的门窗玻璃震得剧烈颤抖。

赤坂国宾馆顿时一片混乱。惊慌失措的保镖们一边喊：“有刺客！”“快隐蔽！”一边连拽带拉地把几位首脑送到了安全的地方。在现场采访的各国记者，更是鸡飞狗跳，乱成了一锅粥。

由于松本等人计算失误，5枚尾部带着8枚叶片的炮弹，发出尖利的呼啸声，掠过检阅台上空，分别落在离发射地3100米——3500米的新坂40号大楼屋顶、赤坂公寓阳台和加拿大大使馆门前。其中射程最短的炮弹坠落在离迎宾馆前厅只有660米的地方。真是玄而又玄。

毫无疑问，这些炮弹是射向西方七国首脑的。俊藤田恼羞成怒，立即组成特别搜查本部，开始搜查。根据发射点附近居民在电话上提供的线索，奔赴现场调查。

在松原公寓401房间，俊藤田看到窗口安放着一尊炮筒，对着迎宾馆。金属窗户的里层，有上下开关，通过定时自动控制装置，使它在炮弹发射时自动打开。为了不致留下痕迹，炮弹发射后，室内自动着火，使人无法辨认。警方发现，这种自制的迫击炮炮筒长150厘米，炮弹全长40厘米，直径10厘米，与袭击美军基地时使用的炮筒完全一样。

俊藤田立刻把情况向中曾根首相报告，并断定这是中核派干的。

迫击炮弹使从未在重大活动中失手的日本警视厅丢尽了脸面，不仅打乱了七国首脑会议，也打乱了东京平静的生活。

加拿大大使馆坐落在东京港区赤坂七条、周围矗立着各式各样的高级公寓。每座公寓前都有一名警官在不分昼夜地戒备着。当第一枚炮弹落在离使馆仅10米的青山街上爆炸时，一阵惊人的警笛尖叫声中，警车急驰而过。手持金属探测器的警官也在四处奔跑，顿时呈现出一片惊慌而忙乱景象。

有一个叫饭沼顺子的目击者说：“正当我们沿着人行道向青山一条走去时，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嗖嗖的炮弹飞行声。定睛一看，一颗炮弹划着抛物线落到我们前面三米远的地方，立即发出‘嘣’的一声巨响和一股黑烟，柏油路上陷进一个直径20厘米、深5厘米左右的弹坑。好在炮弹没有爆炸。想起来真是可怕极了。”

这次袭击中，西方首脑们死里逃生，平民百姓也无人受伤，但它却震惊了世界。聚集在新大谷饭店记者中心的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安莎社的记者，几乎在同一时刻，用最快的速度报道了这一消息：

“导弹射向西方七国首脑！”

“迫击炮燃烧了！”

“西方首脑东京遇险！”

当天下午6点钟，出席晚宴的各国首脑走进中曾根首相官邸，一群新闻记者便围了上来，请求发表感想。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不要大惊小怪地报道。”记者又转向里根总统问道：“您害怕吗？是否担心再次遭到袭击？”里根微微一笑，回答说：“炸弹虽然射出来了，但从迎宾馆上空飞过去了，可惜没击中。”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表现出一副临危不惧的沉着态度。

在宴会席上，撒切尔夫人别出心裁地向中曾根首相建议说：“为了表示我们并不怕恐怖主义者，明天我们一起到大街上走一趟。”中曾根首相尴尬地笑着点了点头。

晚上 7 点半钟，警视厅举行紧急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各国记者通报这一事件。

俊藤田阴沉着脸，对记者们说：“原来，警视厅把炮弹的射程估计为 2 公里，并为此采取了严密措施，但今天的射程却是 3.2—3.7 公里……”

记者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俊藤田接着说：“预测发生差错，十分遗憾！虽然事先也收到了中核派已经发明出射程达 3.4 公里的炮弹的情报，但是怕扩大警戒圈会削弱警备力量，所以就没扩大。这次他们果然出手啦！我们正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当天晚上，原定的半径 2 公里警戒圈扩大到半径 4 公里，自卫队的特种部队也开始介入警戒任务。并且连夜印制了旅客登记表 10 万张，第二天早晨便发到圈内各个旅馆饭店，让他们火速将一切行迹可疑的人的情况，填表报上来，以便控制。同时布下天罗地网，缉捕嫌疑犯“松本夫妇”。

然而，大海捞针谈何容易。“松本夫妇”一直下落不明。

东京西方七国首脑被炸，是 80 年代最危险的谋杀案。以往恐怖分子、极端主义者，大都是以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首脑或要员作为袭击的目标。像这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以七个发达国家首脑为袭击对象，在 80 年代绝无仅有，在整个 20 世纪也极为罕见。

如果“松本夫妇”计算精确，炮口稍稍低一点，里根、撒切尔夫人、密特朗、玛鲁尼。中曾根等人恐怕就难逃厄运了。如果西方七个主要国家的首脑同时落难，对他们所在的国家，对西方社会，甚至对整个世界局势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将是难以预料的。

（何文）

斯莫尔尼宫的枪声

1934年12月1日是原苏联历史上重要的一天。下午四点钟，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写完了报告，把笔记本塞进军上衣口袋，给州委打了个电话，通知对方他马上出发到斯莫尔尼宫来。

48岁的基洛夫四年前出任苏共政治局委员，目前他仍住在石岛路大街一幢普通的大楼里，与老百姓为邻。在大门口，他向司机和警卫员问好。坐进汽车，越过横跨涅瓦河的特罗伊茨桥，碾着湿漉漉的柏油马路，向斯莫尔尼宫开去。

斯莫尔尼宫位于涅瓦河畔，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古典式大厦。1917年这里曾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在地，列宁曾在这里发表一个又一个战斗号令，直接领导震撼世界的武装起义。现在则是列宁格勒州、市党政机关所在地。

基洛夫步履轻捷地走进了通常是警卫森严的斯莫尔尼宫，后面的警卫员没跟上来。他独自一人走上三楼，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走在地毯上，没有一点脚步声。正当他停住开门的时候，身后响起了低沉的枪声，有人从附近向他开枪，子弹打中了脖子。他摇晃了一下，转过半个身子，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帽子被掀落一半，盖在脖子上，殷红的鲜血往外冒。

凶手也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张开两臂，身旁有一支手枪和一只皮包。长长的走廊上再无他人，往常形影不离的警卫人员竟没有一个人在场。过了一会儿，内务局工作人员跑来，逮捕了凶手。

凶手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当过工人，1920年他十六岁时在前线入党。

1934年以前在列宁格勒工农检察院工作，曾任物价检查员，后被调离，下放到工厂。领导派他外出搞运输，他拒绝了，为此被开除出党。不久又被开除公职，于是，他全家——老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无法维持正常生活。

尼古拉耶夫给基洛夫写信，请求查清他的问题。他还向基洛夫报告托洛茨基分子在列宁格勒机关里为非作歹的情况。可是，一连写了二十封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他到党和政府机关上访，受到十分冷淡的对待。他陷入绝望之中……于是产生了要杀害当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念头。他想用这种绝望的行动来抗议官僚主义。

尼古拉耶夫有个朋友，获悉他的企图后，立即报告给列宁格勒州内务局。那个朋友安排内务局的负责人伊万·扎波罗热茨与尼古拉耶夫见面。并不时地给他点钱，赞扬他的观点，实际上是鼓励他挺而走险。还给了他杀人凶器。尼古拉耶夫渐渐感觉到杀一个监委干部不足以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决定把基洛夫这样的大人物作为刺杀对象。

尼古拉耶夫第一次潜入斯莫尔尼宫失败了，那个朋友又来鼓励他，建议他最好是傍晚行动，因为那时斯莫尔尼宫防范最为松懈……尼古拉耶夫曾经两次企图接近基洛夫，但都被发现，作为嫌疑犯逮捕，不知何故，后来又被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下令释放了。而且将从他身上搜出的手枪也还给他。这一次行刺是第三次，他成功了。凑巧这一天扎波罗热茨到南方“度假”去了。

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亚戈达、叶若

夫、日丹诺夫等苏共中央负责人，乘专列火车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此时全城正沉浸在深沉的哀悼气氛中。基洛夫在苏联人民和党员心目中的威信极高，在苏共十七大会议上，他被全党一致通过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领导机构，成为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成员。而在此之前，只有斯大林一个人享有过这样的荣誉。当他上台发言时，全体代表自动起立，报以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讲话被一次又一次的掌声所打断，整个大厅都在颤抖……基洛夫成了全党全国威望仅次于斯大林的领袖人物，甚至被人们看作是斯大林的唯一继承人。

党的十七大以后，斯大林提议让基洛夫到莫斯科来工作，基洛夫宁愿在列宁格勒独当一面，而不愿在斯大林的眼皮下工作。但又无法拒绝这个提议，于是他要求在列宁格勒城市改造工程完成之前，不要把他召到莫斯科。斯大林毫不勉强地同意基洛夫从莫斯科回到列宁格勒以后，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火热的城市改造工程中去。过了半年，斯大林突然把基洛夫召到南方的疗养胜地索契，要他放下手头堆积如山的工作，参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工作。基洛夫不是历史学家，他只是形式上参与这项工作，实际上却呆在索契无所事事。一个月以后，斯大林又出人意料地要他到哈萨克走一趟，那里粮食收购进度过慢，必须扭转这种情况。基洛夫只得奉命前往。在哈萨克耽搁了二十多天，其间有人谋图刺杀他，但未成功。

基洛夫回到阔别两个多月的列宁格勒以后，扎波罗热茨在未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就从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里带来五个他自己的人，擅自安排在秘密政治处。扎波罗热茨这个副局长趾高气扬，从不把局长梅德韦季放在眼里，也不把州委放在眼里，扬言只听命于莫斯科。这种现象是基洛夫无法容忍的。如果容许列宁格勒存在这样一个独立王国，州委迟早有一天会丧失一切权力。基洛夫召开州委常委会，请常委们表态。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召回扎波罗热茨和他带来的人。扎波罗热茨随即打电话给斯大林，斯大林断然拒绝了这一个要求。为了扎波罗热茨的问题，基洛夫几乎和斯大林发生了正面冲突，而且是在斯大林不容许任何人过问的一个问题——干部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不久，发生了尼古拉耶夫两次企图谋刺基洛夫的事件。与此同时，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暗地说：“列宁格勒正酝酿着可怕的暗杀。”谁也没有料到，这起可怕的暗杀对象是政治局委员基洛夫。

此刻，列宁格勒的电台正一遍又一遍地播送哀乐，工厂、街道和住宅里，人们失声痛哭；建筑物上高挂着镶有黑色和红色缎带的基洛夫画像。斯大林脸色阴沉地来到斯莫尔尼宫，指定一层楼供他专用，他要亲自审理基洛夫遇刺案。

他首先召见的是内务局局长梅德韦季，问了一些情况。紧接着找赶回列宁格勒的扎波罗热茨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提审凶手尼古拉耶夫。

审讯在一个大房间里进行。坐在那里的还有亚戈达等人，后面站着一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尼古拉耶夫头上缠着绷带，两个人扶着他走进来。一进门，他就站住了。斯大林叫他走近些，凝视着他，用温和的口吻问：“你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这样一个好人呀？”

尼古拉耶夫态度强硬地说：“我开枪不是对他，是对党！”

斯大林又问：“那么，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手枪？”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尼古拉耶夫指着斯大林身后站着的扎波罗热

茨，“请你问他！”

斯大林怒吼起来：“把他关起来！”

走到门口，尼古拉耶夫想站住脚回过头来冲斯大林说什么，但立即被推出门外了。四个星期后，尼古拉耶夫被枪决。

接着受审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利索夫。押送他到审讯地点的是三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两个坐在鲍利索夫身边，一个坐在卡车驾驶室司机旁边，途中，据说车出了点事故，鲍利索夫一命呜呼了。在死亡鉴定书上签字的医生在许多年之后说出了真情：事故死亡的鉴定是被迫做出的，鲍利索夫实际上是被人用金属棍棒猛击头部而死。押送鲍利索夫的两个人后来也被杀掉了。鲍利索夫的妻子被强制送进了疯人院，她逃出来，跑到斯莫尔尼宫，说有人想毒死她，要求给予保护。经内务局同意，她被送进市立医院。但不久，这个女人就死在病床上。

对基洛夫遇刺案的侦察和审讯是非常匆忙地进行的，结案也很粗率。政府陆续发表的公报和消息留下了不少疑点。

案件发生后，政府当即发表了一个公报：“12月1日16时30分，在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里，基洛夫被工人阶级的敌人派遣的凶手杀害了。开枪的人已被逮捕，他的身份正在调查。”接着，第二个公报说凶手姓尼古拉耶夫。第三个公报说恐怖行为的案件将在十天内审理，不准辩护，不容任何申诉，不给任何宽大，判决一经作出，立即执行。

12月28日公布的判决书说尼古拉耶夫和另外十三个人是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次日报纸报道说，这十四个人已在不公开的审判中被判死刑，都已执行。

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先被说成是白党恐怖分子，他们是从芬兰、拉脱维亚和波兰潜入苏联的。几天后，又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抓获了一百零四名白党恐怖分子，并已将他们处决。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谴责白党恐怖分子。不久，杀害基洛夫的罪责又落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头上。全国各家报纸开始公开点名批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被捕入狱。几天后，塔斯社又发表一条消息：“由于证据不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事件将不予起诉。他们的问题将通过苏共中央内务部特别会议解决。”

究竟谁是刺杀基洛夫的元凶？三个公报，三种说法。

更令人不解的是，几乎所有的知情者均死于非命，甚至连列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市党政领导机关的几百名工作人员也未能幸免。许多人没有经过审讯和调查就根据匆忙提出的罪名被处决了。紧接着，斯大林对苏共党内曾经反对过他或者他认为有可能成为反对派成员的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严酷的清洗和镇压。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等人都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处决；苏联红军的高级指挥员百分之八十被处决或监禁，以至于苏德战争初期，当希特勒突然发动进攻时，苏军竟群龙无首，几乎完全失去抵抗能力。为那场政治大清洗付出惨重代价的是苏联人民。

毫无疑问，基洛夫遇刺是苏联三十年代那场大悲剧的序幕，是一个政治阴谋的开始，基洛夫是一个牺牲品。时隔六十年，现在人们再回顾这一切，谁是那场灾难的元凶岂不是很清楚了吗？

（孙石夫）

“彩虹勇士”号被炸案

1985年7月10日。夜幕笼罩着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一阵蒙蒙细雨过后，十里港口闪烁的灯火在雨雾中时隐时现。人们撑着雨伞或匆匆走过，或在人行道上漫步，整个港区，现出平和安宁的气氛。

停泊在海港的“彩虹勇士”号船，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之处，像这样一艘不到50米长的旧拖网渔船，在海港随处可见。不过，凡是看过前两天的报纸和电视节目的人都知道，这艘拖网渔船却非同寻常，它悬挂的是国际和平组织的旗号，7月7日进驻港口时，当地许多民间社团还举行过隆重的欢迎仪式。世界各主要通讯社也都作了采访报道。

“彩虹勇士”号这次是受国际和平组织之命，率船队去南太平洋的穆罗瓦岛核试验基地，抗议法国即将在那儿进行核武器试验的。神圣的使命，勇敢的行动，备受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和赞誉。“彩虹勇士”号这次路经奥克兰港，本想作短暂的停留后启程赶往目的地。然而，谁也没料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悄悄地降临到这艘船上。

突然，“轰——”地一声巨响，“彩虹勇士”号火光闪闪，浓烟滚滚！船身迅速倾斜，海水大股大股涌进船舱，吞没了大半个船身，海面上波浪忽起。船身在燃烧，火光中，只见海面上漂浮着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岸边的人们被突然发出的爆炸声震得目瞪口呆，停泊在港口的其它船只上的水手们，也纷纷跑到甲板上观望。

港口警卫值班员拉响了救火警报，警报声吵醒了港口所有人家，穿着短裤、睡衣的人们惊恐万状地奔出房门，互相打听出什么事了。海面上，警笛长鸣，海岸警卫队的快艇正火速赶赴出事现场，划出了警戒线，立即投入扑火救船战斗。

7月11日，被爆炸声、警报声、喊叫声折腾了一夜的奥克兰港，迎来了又一个黎明。报贩子在街头举着刚出版的晨报，向行人呼叫，“卖报！和平船深夜被炸！”“船上摄影师当场炸死！”一向在平静生活中度日的新西兰人，都非常震惊。

国际和平组织立即作出了反应：在全世界一些重要城市进行游行集会，抗议对和平的践踏。

世界舆论在关注着奥克兰，关注着爆炸事件的背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前面提到的国际和平组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以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为宗旨的组织。西方工业国家几乎都有这样的组织，大部分称为“绿党”，因此，世界和平组织通常又叫作“绿色和平组织”。该组织派出“彩虹勇士”号开赴南太平洋，想阻挠法国即将在那儿一座小岛上进行核爆炸试验，自然就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就发生了“彩虹勇士”号被炸毁的那一幕。

那么，究竟是谁策划并制造了这一轰动世界的事件呢？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新闻记者们，缠着奥克兰警方问个不停。警察局长加尔布雷思一下子成了新闻热点人物。新西兰警察总部命令加尔布雷思全权负责侦破这个要案。

加尔布雷思局长心里明白，这决非一般的爆炸案，也决非一些流氓地痞干的，爆炸现场几乎没留下任何可疑痕迹。这是近几年来，新西兰遇到的最大的一次恶性案件。同时，“彩虹勇士”号船备受世界团体关注，它的被炸

有一种浓厚的政治色彩夹杂其间。

加尔布雷思请求总部增援力量，提供各种内部核心情况，迅速与友邻友好国家取得联系，总部迅速作出了反应，除了将“彩虹勇士”号及国际和平组织的背景材料提供给加尔布雷思外，还作出了一项特别决定：派出70名经验丰富的警探，从全国各地火速赶到了奥克兰警察局。

加尔布雷思让警探们看了“彩虹勇士”号被爆炸的有关资料片，神情严肃地说：“诸位，大家心里明白，这艘拖网渔船来头不小啊！几年来，它服务于国际和平组织，曾到过许多国家，具有很大影响。就是这艘船，准备去穆罗瓦岛，举行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反核示威行动，可是在我们港口作短暂停留的时候，被人炸了！使一个摄影师不幸葬身大海！这两天，已有人指责我们，说什么和平在新西兰没有保障，说什么奥克兰是一个暴力城。如果我们不尽快破案，不抓到那些伪装巧妙而又心狠手辣的凶手，新西兰将蒙受耻辱，我们警方所从事的神圣职责也将蒙受耻辱！”

加尔布雷思说完后，将70名警探分成几个小组，每组由一名高级警探负责。他还强调，在本案未了结前，不得向外界泄露半点情况，这是纪律。

大规模的侦破行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了。

“彩虹勇士”号自身起爆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那么，是谁干的呢？以什么方式干的？一个多月后，这两个最具实质性的问题仍没解开。

世界各地的舆论界咬得很紧，各大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报刊都动用了最精干的采访高手，步步紧逼。一篇接一篇的案情发展动态、评述，不断地与公众见面，政界要人也不断打电话询问案件侦破情况，这些都令加尔布雷思局长几乎难以招架。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加尔布雷思局长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他决心收缩力量，把精力放在寻找与本案有关的线索上。

警探们终于有了重大发现：在豪拉基海湾里，发现一只被遗弃了的法国造的橡皮船。顺着这条线索，警探们又侦查到有一对名叫阿兰和索菲的夫妇极为可疑。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他们所持护照是假的。他们是法国情报人员，这次来新西兰直接参与了爆炸行动。警方立即逮捕了这两名嫌疑犯。

与此同时，警方又发现了一条线索：奥克兰北面的璜加雷海关一位官员报告说，他曾经检查过一艘单桅船“乌维亚”号，怀疑这艘帆船与“彩虹勇士”号被炸事件有关。因为这艘由四个法国人驾驶的单桅帆船，在“彩虹勇士”号被爆炸前，曾频繁出现在奥克兰港湾附近，而且这四个法国人所持护照全是崭新的，一点折痕也没有。

加尔布雷思局长马上指派警探，突击搜查“乌维亚”号，发现船上藏有爆炸性物品。但是，由于证据不充分，警探只好把“乌维亚”号放了。

然而，事隔没几天，加尔布雷思局长从英国请来的爆炸专家断定：爆炸“彩虹勇士”号的炸弹是临时装配的，而且断定是从“乌维亚”号运来的。加尔布雷思局长立刻带上几辆警车火速赶往海岸，并派了三架直升飞机配合行动。可是，一切都晚了，“乌维亚”号早已无影无踪。加尔布雷思后悔没有把“乌维亚”号上的几名法国人扣住。不过，真相已经大白：法国人一手操纵了这起惊动世界的爆炸事件。

新闻界并没有因此而罢休，经过记者们的刨根问底和一番调查之后，“彩虹勇士”号被炸的一些重要的内幕，终于展现在人们面前——

事情得从1985年年初说起。此时，国际和平组织奥克兰分部的工作人

员，正忙着计划本年度的“和平行动”。一天，分部办事处来了位年轻美貌的法国女郎，她名叫博洛，身材修长。她是志愿来办事处工作，而且一点报酬也不要。她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家闷得慌，出来干点有益的工作。

其实，这位美丽的女郎并不叫博洛，真名叫克里斯蒂娜·卡博。在法国海外安全总局（DGDSE）的秘密档案里，记载着她的简历。卡博生于1951年，出身名门，上大学时投笔从戎参加了法国陆军。

1979年，她以军事观察员身份被派往内战不息的黎巴嫩，在一次跳伞时她不慎跳断了腿。骨折治愈后，卡博转业进了法国海外安全局。

作为国际和平组织奥克兰办事处，单位虽小，但接触面很大，有民间团体，有政府要人，有金融界巨头，甚至还有在国际上很有实力的宗教组织。卡博选中了这个不太引人注目但有油水可捞的目标。她觉得办事处正好可以掩护其行踪，搜集重要的国际情报。

作为DGDSE的工作宗旨，卡博非常清楚，搜集对法国政府、军人有危害的情报，坚决破坏一切于法国不利的任何人的行动，而且不择手段！她以自己特有的学识和交际能力，拼命工作。她把日常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她不断地为上司出谋划策，广泛扩大办事处的影响。她废寝忘食，经常加班加点，干别人不愿干的事。如此一来，上司欣赏她，同事赞誉她，她站稳了脚跟，她来奥克兰的第一步计划顺利完成了。

卡博不久又和办事处的男青年雷脱克交上了朋友，一天，她从雷脱克嘴里得知，办事处刚收到总部的一份急电：法国将在南太平洋穆罗瓦岛进行核武器试验。雷脱克忘了卡博是法国人，恨恨地说：“我们要给这些该死的法国佬一点压力，尽量阻止他们破坏和平的犯罪行动。”卡博连忙问他：“怎么阻止他们呢？”雷脱克说：“总部通知，准备派以‘彩虹勇士’号为首的船队，开赴穆罗瓦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行动。”

卡博听了，心头一惊，又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还有呢？”雷脱克说：“‘彩虹勇士’号估计在7月上旬抵达奥克兰港，总部要我们组织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以扩大影响。”……

卡博很快通过秘密渠道，向法国DGDSE报告了她获悉的情报。她同时建议：炸掉这艘和平船！

法国海外安全总局局长收到卡博的报告后，心情异常激动。他认为时机到了！这位老谋深算的局长是知道“彩虹勇士”号船的。

80年代以来，“彩虹勇士”号频繁活动于南太平洋，进行反核宣传。法国军方为此深感不安。

1984年9月4日，法国国防部长曾要求DGSE总部，拿出点像样的行动来，以清除“彩虹勇士”号对法军的威胁。

此后，法军许多高级将领又多次要求DGSE总部，对“彩虹勇士”号采取最严厉的行动，哪怕是冒点风险。

1984年11月12日，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法国总理曾经同意对国际和平组织采取行动。关于行动的计划，由海外安全总部——DGSE负责拟定。

卡博的报告，无疑使她的上司下了最后的决心。

爆炸“彩虹勇士”号的详细计划，得到了法国国防部的批准。计划分三个方面：一、由两名间谍老手，一男一女，就是前面提到的化名为阿兰和索菲的，扮作夫妻，以旅游者身份去新西兰的奥克兰。由他们将炸弹放在“彩虹勇士”号船上，并炸毁它。二、由四名情报人员，驾驶“乌维亚”号单桅

帆船，将炸弹送往奥克兰港湾。三、由卡博负责准备潜水器和橡皮小艇，并提供“彩虹勇士”号的具体泊位。

整个行动可谓计划周密，伪装巧妙，几乎是滴水不漏。

7月10日夜里，卡博和她的行动小组，乘坐橡皮船悄悄划近了“彩虹勇士”号。橡皮船上的几名“蛙人”携带防水烈性炸药，潜近了“彩虹勇士”号，神不知鬼不觉地安放好了炸药。当“蛙人”潜回橡皮船，远离“彩虹勇士”号后，卡博一按无线电按钮，只听“轰——”地一声，爆炸掀起的海浪差点将橡皮船掀翻，这就出现了本故事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卡博和“乌维亚”号船上的情报人员，顺利地炸毁了“彩虹勇士”号和平船后，神秘地溜走了。在DeSE总部的庆功会上，他们都备受头头们的称赞。

然而，倒霉的是那对假夫妇，他们因迟迟未离开奥克兰而被抓获了。

由于“彩虹勇士”号事件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沸沸扬扬，连法国总统也感受到了压力。在7月14日法国国庆日的阅兵式上，总统轻声问身旁的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先生，我听说国际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船，被您的下属机构炸沉了，这是怎么回事？”国防部长报告总统说，此处不是汇报的地方。于是在阅兵式结束后，总统立刻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客厅里，召见了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证实了总统刚才提到的事情。然而，当他把“彩虹勇士”号被炸的来龙去脉详细向总统报告后，他发现总统对此事的前因后果都很清楚，自己并没给总统带来新闻。国防部长觉得纳闷：“为什么总统还要问我呢？”

法国新闻界对“彩虹勇士”号被炸，刚开始时反应很迟钝。随着新西兰侦破形势的不断发展，新闻界热闹起来了。报界纷纷捅出内幕情况。法国最大的报纸《世界报》社长亲自牵头，在头版发表独家报道，指出事件背后有政府大人物参与。有的报纸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法国情报部门的“水门事件”。

总统似乎有点沉不住气了。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他厉声说：“法国在南太平洋的穆罗瓦岛进行核试验，纯属法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任何人不得干涉。但炸沉绿色和平运动的旗舰‘彩虹勇士’号，则是一起恐怖活动，是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有人隐瞒此事真相，直接损害了法国的利益，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必须受到严厉的制裁。”

8月8日下午，法国总理任命行政法院大法官特里科负责全权调查“彩虹勇士”号事件。调查结果提交总理后，总理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没有任何人给海外安全总局下过炸船指示。但稍知政府内情的人压根儿也不相信此项声明。

经过法国与新西兰多次会谈后，双方达成协议：新西兰将捕获的两名“假夫妻”特工人员交给法国；法国向新西兰政府正式道歉，并赔偿700万美元。

法国国防部长被迫辞职。

法国海外安全总局（DGSE）局长被罢免。

紧张了好一阵子的法国总统和总理，终于松了一口气。来势汹汹、震动世界的“彩虹勇士”号事件冲击波，终于到此平息。9月13日，法国总统从繁忙的事务中抽出身来，带着几位内阁部长，飞往法国的海外领土——南太平洋穆罗瓦岛核试验中心视察去了。

（贺之文）

纳吉的悲剧

1956年1月，在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新一代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否定斯大林路线的“秘密报告”。没过多久，报告的内容就传播到了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反响最强烈的莫过于匈牙利了。在匈牙利，也有一个斯大林式的领导人，这个人就是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这人虽然也曾在监狱里度过16年，但在他成为执政党领导人的时候，却毫不犹豫地许多清白无辜的人关进监狱，送上绞架。1948年6月，他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拉伊克案”，指控内务部长、政治局委员拉伊克·拉斯洛为“美国情报机关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诬陷他“阴谋武装暴动，谋杀共产党领导人”，将其逮捕，并将拉伊克的“同党”一个个地绞死。接着，在1951年5月，拉科西进行了一场恐怖的大清洗，每天都有一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外出旅行”，然后就销声匿迹。许多高级军官在夜间不知去向，并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一切，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基洛夫事件”以及后来斯大林搞的“大清洗”如出一辙。失踪和被处决的人数至今无法统计。

拉科西疯狂地践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在他执政期间，匈牙利各地建立了数不清的“拘留营”，成千上万人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便被长期囚禁关押，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拉科西和格罗、法尔卡什·米哈依组成的“三驾马车”，狂热地发展重工业。将轻工业、服务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压到10%以下，强制推行农业合作社，千方百计地加重农民的负担，实行“义务交售制”，交售指标越定越高，收购价格越来越低。对于敢于抵制交售的人，判处三年以下徒刑。这样一来，大批农民纷纷逃离农村，大量土地荒弃无人耕种……农村经济的崩溃直接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许多基本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越来越困难。而年年发行的“和平公债”实际上已成为人民诅咒的苛捐杂税。老百姓住房紧张，收入迅速下降，一个个怨声载道。

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三年以前，在斯大林去世后，他们就逼迫拉科西将政府的一部分权力交给副总理伊姆雷·纳吉。

纳吉是一位出生于农民家庭的教授，又是德高望重的国务问题专家。早在1918年，匈牙利共产党还没有建立的时候，他已经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了。纳吉不像拉科西那样专横粗暴，而是平易近人，富于献身和钻研精神，在匈牙利人民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

纳吉当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拉科西的那一套错误做法，其中包括结束保安部的非法行为；有目的地分配投资；农民可以参加集体农庄，也可以私人经营……在纳吉的领导下，匈牙利经济开始出现转机，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也逐渐改善。

可是，到了1955年初，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获悉美英准备重新武装西德，冷战开始，东、西方冲突尖锐起来，苏联决定立即缔结华沙军事条约。

前一时期一直在苏联“养病”的政治强硬派人物拉科西，在苏联领导人眼里忽然又有了价值，他重新得宠了，他精神抖擞地回到布达佩斯。而纳吉则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并罢免了他的总理职务，撤销一切学术头衔。接着，又被开除出党。

纳吉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

苏联人对匈牙利政治的粗暴干涉以及拉科西的东山再起，激起了匈牙利人民强烈愤慨。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传到匈牙利后，这种愤慨情绪进一步激化。一些青年团组织和新近成立不久的各种俱乐部，纷纷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要求伊姆雷·纳吉重新执政。其中，以一些著名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新闻记者组成的政治沙龙“裴多菲俱乐部”最为活跃，他们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他们组织群众聚会、游行，领导着这一股反拉科西并希望摆脱苏联控制的风潮。

1956年6月，邻国波兰发生了暴乱，数以万计的对现状不满的工人同武装部队发生了流血冲突，一百多人死亡，三百多人受伤，还有数百人被捕。鉴于这个教训，苏共领导人不得不作出一点让步，再次撤换了拉科西，勒令他“因病辞职”，并指定格罗为他的继承人。

格罗虽然不像拉科西、法尔卡什那样臭名昭著，但他是“三驾马车”之一，匈牙利人民对此人并无好感。他上台后，尽管也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矛盾的措施，却仍无法控制和扭转局势。

1956年10月23日，这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三。

从清晨开始，布达佩斯警察局的专线电话就没有一刻安静。不断有报告说，首都各大专院校学生一批批地涌上街头，他们散发传单并发表演说，邀请人们参加这天下午举行的声援波兰人民和哥穆尔卡的集会游行。

到了中午，几千名大学生不理睬政府的禁令，举着横幅和旗帜，开始了游行。他们高呼口号，向市中心的英雄广场进发，一路上，不断有学生加入游行队伍。

到了下午两点多钟，游行队伍已增加到20多万人。在贝姆·尤若夫纪念碑前，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游行要求拆除英雄广场上的斯大林塑像。

几十分钟后，一辆装着盐酸罐和切割机的卡车开到铸像前，几个人从车上卸下工具，开始切割“斯大林”塑像。一个多小时后，塑像轰然倒下。人群一涌而上，把塑像击个粉碎，然后浇上汽油点燃……

随后，人流开始像汹涌的波涛一样涌向国会大厦前的议会广场。

此时，在国家内务部，部长比洛什召集了五位副部长、警察局长来开紧急会议，苏联顾问也在场。他们讨论该不该动用武力镇压，因为意见不一致而陷入僵局。苏联顾问认为，这些闹事者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应该毫不留情地使用手中的武器把他们镇压下去。内务部的官员们却不敢轻举妄动，有人反驳他说，这些大学生都是工农的子女，是智慧的尖子，他们只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表示对波兰的同情而已，怎能动枪镇压？

后来，他们决定请示第一书记格罗。

格罗在电话里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游行的禁令已经取消。政治局决定，将在晚上八点发表他的广播讲话。

苏联顾问站起身来，向在场的人憎恶地扫了一眼，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议室。

暮色降临了，国会广场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实际参加者已将近50万人。人们齐声呼喊：“伊姆雷·纳吉，出来讲话！”

纳吉当时虽然已经恢复党籍，却没有任何职务，当权者自然不会轻易让他露面。他们让另一位党的领导人出来，广场上嘘声大作，他根本无法讲话。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后来，纳吉终于来到国会大厦。他那矮胖的身影一

出现在阳台上，几十万人顿时鸦雀无声。在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纳吉开始劝说群众离开广场。顿时，广场上嘘声四起，没有人愿意听他这一套官方腔调。

纳吉说不下去了，他痛苦地闭上眼睛。然后就从阳台上消失了。

示威的人群又从国会大厦涌到广播大厦，要求播出他们的十六点要求，但遭到拒绝。愤怒的群众开始高喊“打倒格罗！”“要求政府辞职！”的口号，群情鼎沸，声浪喧嚣。

晚上八时整，格罗在电台发表讲话，谴责示威者中有一小部分是居心闹事者。

格罗的讲话犹如火上加油，使群众的敌对情绪猛烈上升到极点。九点半左右，他们开始向广播大厦发起进攻。守卫大楼的保安部队起初用催泪瓦斯和水龙反击，但示威者手里已经有少量从军人那里抢夺来的自动步枪，他们在街对面的屋顶上向大厦的窗口射击。

夜里零时 35 分，守卫大楼的部队接到命令，开始向进攻者猛烈开火。人群成片地倒下，但进攻并未停止。在这之前，曾有两支陆军部队约 600 人来增援广播大厦的守备，但未到达大楼就被人海吞没了。士兵们缴了械，有的甚至参加到进攻者的队伍里。

到第二天上午九时，大楼守卫部队残余的士兵放下武器，停止了抵抗。示威者终于占领了广播大楼。被俘者遭到痛打，被关进汽车房。

大楼前的院子里，堆满了死难者的尸体。

从夜里到凌晨，示威者还占领了国际电信局、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

布达佩斯街头燃烧着战火……

在同一天夜里，匈牙利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了政治局。伊姆雷·纳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接着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同时，以匈牙利党和政府的名义要求苏联派兵协助镇压“叛乱”。

10 月 24 日凌晨 2 时，驻扎在布达佩斯西南方巴拉顿湖边的苏军坦克师奉命向布达佩斯挺进。一个小时以后，约瑟夫·斯大林型坦克隆隆地开进了城，转动的炮塔上灯光照到哪里，机枪就扫射到哪里。

苏军坦克的到来，更加剧了首都的动乱。人们愤怒地质问：是谁引来了苏联坦克？

24 日清晨 4 时，改设在议会大厦地下室的国家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播音员以激动的语调宣称，昨夜发生了“反革命的暴乱”，“反革命和法西斯分子向各公共大楼发动了武装进攻”。宣布禁止集会，实行宵禁，警察局应对各种骚乱和示威依法严惩。

新任总理纳吉也发表讲话，语气强硬地要求市民放下武器，否则将以军法论处……

几乎在他话音刚落的那一瞬间，喧嚣和射击声同时响起来。暴动已经开始向全国蔓延。

10 月 25 日中午，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又一次涌上街头，扛着横幅和旗帜，汇集到议会大厦门前。其中还有不少妇女和儿童。

议会大厦的墙下，苏联坦克摆开了阵势。

人群高呼“打倒格罗！”“伊万（指俄国人）滚回老家去！”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爬上坦克，把匈牙利国旗插入炮筒；另一个青年把写着马克思语

录的传单塞进坦克射击孔。这些传单是用俄语写的。

坦克里没有动静。人们紧张地等待着……

终于，最前面那辆坦克的顶盖慢慢地打开了，一位苏军少校爬出炮塔。立刻，广场上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这位苏军少校友好地微笑着，把军帽扔给群众。青年人爬上坦克，纷纷跟他握手，一位姑娘还拥抱了这位指挥员。

其他坦克里的士兵也爬出来，与群众握手微笑表示友好。气氛极其热烈。

然而，就在这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埋伏在议会大厦以及周围楼上的机枪猛烈地向围聚在苏军坦克周围的人群射击。顿时，广场上的人成片地倒下……

苏军坦克手慌忙钻进车内，用炮向四周楼上射击者还击。不一会，又从附近开来 20 辆苏军的增援坦克，双方对射了近 20 分钟才停止。

这时，广场上已倒下近 300 名死伤者，鲜血染红了地面。几十分钟后，医院开来了救护车，抢救伤员，将死难者抬上一辆大型家具运输车。鲜血像自来水一样顺着车厢的缝隙流下来，汽车驶过之处，血迹像一条暗红的绸带。

消息传播开来，整个布达佩斯像燃起了大火，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枪声遍布整个城市。

形势越来越严峻。在苏联政治局顾问苏斯洛夫、米高扬的授意下，格罗被解除职务。纳吉任命卡达尔为党的主席；内务部长也被解除了职务。然而，这一切都无济无事，丝毫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情绪。

下午 3 时左右，约两万名群众包围了布达佩斯警察局，许多人带着枪，迫使警察局释放了 50 名被关押的“自由战士”。然后，他们又要求警察交出手中的武器。

匈牙利政府进一步妥协，宣布解散国家保安局和情报部，遣散了属于国家保安局的公安部队。纳吉和卡达尔都于当天发表了广播讲话，承认大部分游行示威者都怀着崇高的目的。但由于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插手，威胁了国家政权。呼吁当务之急是恢复秩序。纳吉允诺在秩序恢复后要求苏联撤军，举行自由选举等等。

10 月 25 日流血事件以后，国家保安组织被解散，国家政权已失去一切武装力量。10 月 28 日，苏共代表苏斯洛夫和米高扬再次飞抵布达佩斯，与匈牙利政府开始商讨撤军问题。

当天，纳吉在他的广播讲话中，把三天以前还称之为“反革命事件”的暴动正式称为“革命行动”。并宣布苏联军队将撤离首都，取消国家保安局，部分参加“革命行动”的人员将被编入武装力量组织。还答应提高低工资和退休金，调整工资，成立新政府等等。

这时，首都的战斗已基本平息，而外省的暴动仍在进行。几乎所有的国家机构都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由暴动群众选举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工人委员会”。

10 月 29 日，苏联军队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军。苏联特使米高扬在纳吉的办公室会见了新政府的成员，同他们一一握手，说：“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贵国了，请你们尽力协助伊姆雷·纳吉同志。”然后，他转向总理纳吉：“纳吉同志，凡是该拯救的都要拯救！”

而人紧紧拥抱，握手告别。

窗外，苏联坦克正驶离布达佩斯。

在大使馆附近的俄国人居住区，居民们也在打点行装准备离开，这儿一

片混乱，街上有人高喊：“俄国佬，滚回去！”

同一天，由军队、警察和暴动人员组成的“国民警卫队”建立“维持首都的秩序。”

10月30日，纳吉在广播中宣布取消一党执政，允许以前被拉科西取消的各种政党恢复活动。并释放被长期囚禁的红衣主教明曾蒂。还释放了9000名刑事犯和4000名政治犯。

随着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一场对共产党员、保安警察的血腥报复也开始了。在暴动者中，绝大部分是学生和工人，但也有一些是从前的犯罪分子和旧政府的军官，他们对共产党恨之入骨。

就在30日这一天，暴动者动用三辆坦克，袭击并攻占了布达佩斯市委大楼，将俘虏的公安战士开膛剖肚，有的被倒吊在树上，有的用卡车拖着穿过广场，尸体都成了无法辨认的一堆血肉。陆军上校派普被带到市委大楼前的广场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被俘的女共产党员、部长会议秘书处行政人员阿格内什·凯莱明遭到残酷的毒打和非人的折磨……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许多共产党人和保安警察被暴动者私刑处死，到处都是武装恐怖行动。据统计，一个星期中约有2500人被处死，3000人被监禁。

而在国际上，西方各国则对匈牙利暴动者给予舆论和物质援助，表现得尤为积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接见在美国的“匈牙利人联盟”代表时说：“美国将全力支援这个斗争。”他在电视演说中说：“在今天看来，一个新的匈牙利可以从这次斗争中诞生了。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个匈牙利将是完全独立自由的国家。”

11月2日，艾森豪威尔又宣布，美国将向匈牙利提供价值2000万美元的食物和救济物资。

匈牙利正在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一步步滑向西方世界。此刻，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密切地注视着国际局势和匈牙利国内形势的变化，开始了秘密的部署和行动。

11月初，苏共领导人分别与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尼亚以及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通报与商谈，并形成共同意见，认为如果不出兵对匈牙利进行干涉，匈牙利必将发生内战。如果联合国部队像几年前开进朝鲜那样开进匈牙利，便有可能发生世界大战。尤其是中共方面，对赫鲁晓夫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苏联首先就不应该在匈牙利制造混乱。事件既已发生，更不该撤军，活活断送匈牙利社会主义前途，认为苏联这种做法是“虎头蛇尾的机会主义作风”。

11月1日晚上，纳吉政府的国务部长卡达尔·亚诺什和另一位高级领导人明尼赫·费伦茨忽然神秘地失踪了。第二天，又有五、六位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销声匿迹，去向不明。纳吉政府开始焦急地寻找他们，却毫无踪影。最后，不得不向人民宣布：国务部长等人已经失踪。

纳吉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几个小时前还宣称要跟苏军坦克战斗的第一书记兼国务部长卡达尔·亚诺什，这时正坐在苏联大使馆安德罗波夫大使宽敞的办公室内。

而此时此刻，苏军坦克群正从四面八方越过匈牙利边境，向首都布达佩斯挺进。

11月3日，苏军坦克部队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布达佩斯城围得铁桶一般。

纳吉深知，苏联此番卷土重来肯定与卡达尔等人的神秘失踪有关，他心头不由蒙上了一片沉重的阴影。他代表匈牙利政府三次向苏联大使馆提出抗议。安德罗波夫表示，可以谈判、商讨关于撤军的问题，希望纳吉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距布达佩斯约25公里的特克尔苏军司令部谈判。

代表团由四人组成，团长是年轻的国防部长马勒特尔。其他三位是：国务部长费伦茨·埃尔德、参谋长伊·科瓦奇将军和得奇上校。临行前，纳吉叮嘱马勒特尔，一旦到达苏军司令部所在地特克尔，便立刻向他报告到达的消息。此后，每隔半小时联系一次，电告谈判细节。

一个小时后，马勒特尔一行到达预定地点，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就达成了一项原则协定：苏联人同意将军队撤走，唯一的分歧是撤军的时间。马勒特尔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乐观。

下午，暂时休会，双方各自研究一些细节问题。晚上10时，谈判继续进行。马勒特尔按纳吉总理的要求，每隔半小时电话汇报一次。

到了午夜时分，苏联代表提议暂时休会，大家到休息室用餐，休息一会，然后再举行签字仪式。

休息室里已经摆好了餐宴。双方频频举杯庆贺谈判成功，气氛极其友好热烈。

正当餐宴进行到高潮时，突然一伙人闯了进来，为首的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主席谢洛夫将军，他手握一把大号毛瑟手枪。身后紧跟着苏联保安部的几个军官。

代表们手里还擎着酒杯，房间里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了一般。谢洛夫将枪口对准马勒特尔的胸膛，冷冷地说：“您被捕了！”

曾经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与法西斯作战的马勒特尔此刻显得有点手足无措。他下意识地将手伸到腰间，但接着又垂下。他很清楚，反抗毫无意义。他的脸涨得通红，开始结结巴巴地向苏联人表示抗议。

谢洛夫一言不发，只是冷笑着盯着他看。

马勒特尔的脸色渐渐惨白，他耸了耸肩头，说：“啊，原来如此！”接着，他们四人被押离会议厅，解除了武装，送到兵营大院中，分别囚禁起来。

此时，在布达佩斯，守候在电话机旁的纳吉正为马勒特尔的电话联系中断而焦虑不安，他预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派出一辆坦克，前往谈判地点，恢复政府与代表团之间的联系。

坦克部队的一名副团长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坦克的炮塔旁竖着一面白旗，火速驶往特克尔。一路上，他用无线电不断地向政府大厦报告情况：“我们正在接近特克尔……我们遇到了苏联坦克！是约瑟夫·斯大林型坦克！”

“它们让我们通行了……又过了一个哨卡……有两辆苏联坦克跟在我们后面……”

“我们来到大门口了，他们示意我们开进去……有士兵向我们跑过来……我要下车跟他们交涉了。”

接着，电话里传来坦克的轰鸣声和一片嘈杂声。突然，一声清晰的、带俄国口音的匈牙利语在电话里震响：“滚下车，可耻的叛徒！跟我们走！”

然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纳吉和围绕在办公桌旁的人们惊呆了。至少一分钟，大家都沉默无声。

此时，时钟正指向凌晨一点。

也就在这天晚上，在苏联大使馆内，安德罗波夫大使正向卡达尔最后施加压力，软硬兼施地劝卡达尔离开纳吉政府，在苏联的支持下组织一个新政府。在此之前，卡达尔还一直犹豫不决。安德罗波夫抛出了手中的底牌：马勒特尔和他的政府代表团已被诱捕，匈牙利抵抗力量的军事首领们已被解决。卡达尔已经别无选择，在一阵痛苦的沉默之后，他终于接受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

1956年11月4日凌晨3时，上千辆苏联坦克攻入了布达佩斯，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冲进了城里各主要街道，占领了交叉路口、车站及桥梁，包围了政府大厦和陆军总参谋部。

炮声震撼着整个布达佩斯，火光冲天，映红了夜空。

匈牙利人奋起反抗，与苏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匈牙利陆军坦克团的T-34型轻型坦克与苏军坦克接上了火；在基里安兵营、切佩尔工厂区和科尔文街等许多地点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凌晨6时，收音机里传出了成立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消息。新政府由8名成员组成。它的简要纲领是：保卫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法律秩序和安宁，保持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新政府还宣布，已经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请求苏联红军帮助恢复国内秩序。

黎明时分，随着枪炮声越来越激烈，广播喇叭里再次传来纳吉的声音，这是他最后一次宣告：

“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苏联军队已于今天早晨开始进攻首都，公然企图推翻匈牙利的合法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在战斗，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报告这一情况。”

苏军很快就攻下了议会大厦，当他们一脚踢开纳吉办公室的门，冲进房间，却发现那里已经空无一人。房间里还响着纳吉的声音，那声音是从一台录音机里传出来的……

上午9时，战斗还在进行。基里安兵营的匈牙利正规部队正与苏军坦克部队展开激战。苏军坦克群对兵营进行了猛烈的炮击。直到11月7日清晨，兵营被攻克了，苏军在那里只找到重伤员和许多尸体。而他们自身的损失也不小。

在切佩尔大型钢厂，武装的工人用燃烧瓶给苏军坦克造成严重损失，不少苏联坦克手被烧成一段段焦炭。

在乌洛伊街工人居住区、马克思广场、卡尔文广场及科尔文街等据点，武装的匈牙利人用反坦克手雷、燃烧瓶和反坦克火箭筒把一辆辆约瑟夫·斯大林型坦克打得熊熊燃烧。

为了镇压反抗者，苏军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将工人居住区的一幢幢楼房夷为平地。

大规模的武装对抗持续了两天两夜。直到11月15日，各地零星的抵抗才完全被镇压下去。

在苏军的这次入侵中，两万多匈牙利人丧生；

15万人被迫逃离了匈牙利，成为背井离乡的难民；还有成千上万参加暴动的青年学生和工人被押上火车，强迫运送到苏联各地的“劳动营”和西伯利亚森林充当苦力。

11月4日凌晨，当议会大厦被攻下之前，纳吉和一些政府成员从秘密通道逃到了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和纳吉一起去那里的还有15名政府高级首脑和他们的家属。

苏联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在使馆那座白色的大楼前布下严密的监视，坦克来回巡逻，并制订了相应的行动方案。

在克格勃头目谢洛夫的指示下，他们选派神枪手埋伏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附近，用高倍望远瞄准器对准每一个窗口。

11月5日下午3点左右，苏军枪手发现使馆一个房间的玻璃窗里面出现一个人，个头肥胖，留着小胡子，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外形特征很像纳吉。

谢洛夫将军断定那人正是纳吉，命令枪手瞄准射击，争取一枪击毙！

枪声响了，窗户里那个人应声倒下。这一枪正中脑袋。纳吉必死无疑！

下午5点，谢洛夫等人正要举杯庆祝，有消息传来：被打死的那个人不是纳吉，而是南斯拉夫的一名外交官，此人长得很像纳吉。

南斯拉夫国家元首铁托就此事向苏联政府表示“遗憾”。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狠狠地把谢洛夫训斥了一顿。

苏联放弃了击毙纳吉的计划，转而采取通过外交途径诱捕纳吉及其同伙。

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得到匈牙利新政府保证纳吉等人的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最终同意交出纳吉，让他回到自己的住宅里，加以监护。而且移交工作必须在南斯拉夫外交官的监督下进行。苏联政府表示完全同意。

可是，当纳吉等人乘坐的大客车刚驶离大使馆不远，突然从路边冲出几辆苏联坦克，将客车包围起来。苏联保安部门的军官不顾南斯拉夫外交官的抗议，强行冲入车内，将纳吉等人绑架而去。

到了苏军总司令部，迎上来的是克格勃总头目谢洛夫，他骄傲地做了个手势，说：“请下车吧，您到家了，伊姆雷·纳吉同志！”

纳吉和他的朋友们端坐着，拒绝下车。

谢洛夫将军微笑着一挥手，一群苏联保安人员上前将他们一个个强拉出车外，妇女和儿童都吓得尖叫起来。

随后，纳吉等人被送往邻国罗马尼亚去“疗养”。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在发表的公告中称：“伊姆雷·纳吉一行在相互理解的气氛中受到了罗马尼亚政府的热情款待。”

事实是，罗马尼亚人在接待方面是合乎礼仪的，但纳吉等人的行动自由却受到严格的限制。苏联政府一开始是采取软的方法，同他谈判，要他作“自我批评”，并且揭露这场“反革命事件”的同谋。作为他重返匈牙利的条件，还必须公开宣布这次事件是“反革命暴乱”。然而，纳吉拒绝了这些要求。

之后，情况就开始恶化。1957年1月初，苏联召集各东欧“兄弟党”在布达佩斯开了一次会，专门讨论纳吉问题。

两天后，匈牙利共产党在一份公报中为纳吉问题定了性。公报中说：“伊姆雷·纳吉及其政府的背叛，为匈牙利的法西斯反革命开辟了道路。”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西方帝国主义的走卒”。

与此同时，新政府宣布在暴动期间成立的一切组织均为非法组织，勒令限期取缔。

1月19日夜，一场酝酿已久的大逮捕席卷匈牙利，仅布达佩斯就有2000多人被捕。当天夜里，大部分人被集体枪决。

1957年12月，纳吉等人被秘密押回匈牙利国家监狱，准备由匈牙利法庭审判。

在此之前，由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铁托指责赫鲁晓夫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子，要各兄弟党跟着苏共的指挥棒转，并拒绝在承认克里姆林宫对其他兄弟党享有指挥权的公报上签字。这使得赫鲁晓夫气急败坏。下决心尽快了结纳吉一案，杀一儆百。

1958年2月6日，布达佩斯“人民法庭”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首次对参与暴动的前匈牙利政府官员和军队成员进行了预审。纳吉等人态度坚决地否认自己犯罪。

4个多月后，1958年6月9日，秘密法庭再次开庭，审判了其他一些被告，其中包括在暴动中参加与苏军坦克部队作战的匈牙利陆军第33坦克团的官兵。上校团长麦切里和几十名坦克手以“谋杀”罪被判了死刑。几个小时后，执行了绞刑。这些士兵年龄大多数不过20来岁，好几个在临上绞架时都吓得昏死过去。

最后，轮到纳吉了。

1958年6月15日，秘密法庭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开庭。他们特意在屋顶上悬挂强烈的白色聚光灯，使囚犯们睁不开眼睛。在隔壁的一个厅里，苏联特使鲍里斯·舒米林、谢洛夫、安德罗波夫和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成员，都在暗处观看审判。

伊姆雷·纳吉站在第一被告席上。

纳吉的辩护律师首先指出纳吉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接着，又指出，武装暴动的责任应由腐败的拉科西——格罗领导集团承担。纳吉当时曾以书面形式警告过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可能发生的严重危险；而后来，他又是在苏联人的压力下出任总理的。他在匈牙利实行新方针和改革措施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

律师的辩护引起法庭庭长的极大恐惧，他站起身来大声警告：“如果你继续污蔑伟大的苏联和我党领导人，你自己不久也将坐在被告席上！”

律师向庭长鞠了一躬，接着又列举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奥地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菲舍尔等人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看法。

庭长再次打断了他的辩护，指责他引述的不过是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然后，他宣布休庭。

半个小时后，重新开庭。

庭长宣布，被告可以作最后的一次发言。

伊姆雷·纳吉站起来，手扶着围栏，态度镇静地说：“我曾两次在我国努力维护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在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反对我的则是整个苏联的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了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因为照你们的观点它已失去了价值。我相信，历史终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

法庭鸦雀无声。

隔壁房间里的苏联人和卡达尔等匈牙利新政府的成员们也一声不响。他们是这场审判的真正法官。

接下去，法官转向另一被告——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非共产党员的陆军上将帕尔·马勒特尔。他问道：“你的职业？”

马勒特尔回答：“匈牙利共和国国防部长。”

法官纠正：“是前国防部长。”

马勒特尔反驳道：“不！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伊姆雷·纳吉觉得自己仍然是总理，这可以马上加以证实。”

马勒特尔说完与纳吉相视而笑。

法官转向第一被告：“被告伊姆雷·纳吉，你想提出赦免申诉吗？”

“不！”纳吉用一个字回答。

法官又问第二被告：“帕尔·马勒特尔，你想提出赦免申诉吗？”

回答也是一个“不”字。

法庭庭长缓缓地站起来，用平板板的语调宣布最后的判决：“人民法庭，以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名义宣判：伊姆雷·纳吉死刑，立即执行……”

纳吉面无表情。这一切早在他预料之中。

同时被判死刑的还有马勒特尔、记者米克洛什·基迈什；原国民警卫队司令、布达佩斯警察局局长山多尔·科帕奇被判无期徒刑；其余一些被告分别被判处12年以下5年以上有期徒刑。

宣判结束，隔壁房间里的苏联人和卡达尔等人握手庆贺。

1958年6月16日，星期一。中央监狱的小拘留所院内竖起了三座黑森森的绞架，周围布满了荷枪实弹的保安军官，牵着狼狗的警官在四周巡逻。

苏联特使舒米林和谢洛夫，还有匈牙利新政府的领导人则集中在刑场附近一个隐蔽的地方“监刑”。

6点30分，三名死刑犯被带到绞架下面。

第一个被押上绞架的是米克洛什·基迈什。这位年轻的记者在1956年的事变中过分活跃，被认为“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他微笑着同纳吉、马勒特尔告别之后，迎着死神走上绞架。

接着，是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他走上生命终点的台阶时，脸色苍白，眼珠里布满了血丝，声嘶力竭地呼喊一声：“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最后，轮到纳吉，他像平时走上演讲台一样走上绞架。当绞索套在他粗壮的脖子上时，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喊一声：

“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这个有40年党龄，曾在苏联度过15年光阴，在匈牙利党和政府中身居要职达2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知名人物，在一阵痛苦的抽搐之后，结束了他的生命。

当天的匈牙利报纸都刊登了由司法部公布的一条简短的消息：

“匈牙利十月反革命事件的主谋伊姆雷·纳吉、帕尔·马勒特尔、米克洛什·基迈什和约什卡·希拉基等4名主犯，因阴谋推翻匈牙利合法制度、叛国投敌、军事哗变等罪行，被匈牙利人民法庭判处死刑。死刑已于今天早晨6时执行。”

实际上，约什卡·希拉基早在三个月之前就已被秘密处死了。

苏联的《真理报》迅速转载了这个消息，并且评论这一判决是“严厉和公正的”。

（华炳）

廖仲恺遇害始末

1924年1月，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重新解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内涵，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会上，还通过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以这种方式建立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但由于对三大政策的态度不同，国民党内部逐渐分化成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廖仲恺为领袖。廖仲恺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后来又兼任农民部长，他的夫人何香凝担任妇女部长。右派的首领是胡汉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右派要占到半数以上。汪精卫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中间派，他在高层领导中势力薄弱，便高唱“革命者向左转”的口号。并与蒋介石合作。这时蒋介石还不是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吴稚晖等都积极支持他，他也竭力取得共产党的支持，在军队，特别是黄埔军校中，有很大实力。

最初，因为有孙中山的领导，左派声势很大，右派则受到束缚，廖仲恺成了仅次于孙中山的实权人物，因此更遭到右派的仇恨。

1924年10月，孙中山去北京商讨国家大事，因患肝癌，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此后，国民党内各种固有的矛盾开始激化。号称“反共急先锋”的冯自由等人，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反共产、反苏俄；开除共产派；反对罢工；各派老国民党大团结”的纲领，企图破坏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战线。胡汉民也开始阻挠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继续实行，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府中的作用，限制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廖仲恺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挺身而出，和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发表言论，批驳国民党右派，并促使党中央将冯自由等右派党员开除出党。

然而，右派的气焰并未因此而减弱。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中国的国民革命，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在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问题上，又一次激化起来。孙中山临终前，虽然留下了政治遗嘱，但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以后，国民党内也难以找到一个与孙中山的政治声望可以相比的继承人。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很难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于是，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在争夺这个最高领导的位置。

在国民党右派人物中，胡汉民不仅是资格最老的国民党元老之一，而且也很有政治实力。孙中山逝世后，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政治会议主席，并且代理大元帅，还兼任广东省长。胡汉民自以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广大人民和国民党党员的不满，要胡汉民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廖仲恺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继续让胡汉民掌握大权，势必危及革命。他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支持下，排除右派的干扰，果断地筹建了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当时仍以左派面目出现汪精卫担任主席。胡汉民被迫辞去了代理大元帅的职权和广东省长职务，只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然而当时国民政府只同苏联有外交关系，苏联代表鲍罗廷在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影响很大，实际上中苏关系由他在沟通，不懂外语的胡汉民只得到了一个无权的闲职。廖仲恺在这次权力转移中，完全不贪个人名利，只担任了财政部长。但是所有的人都明

白，廖仲恺是革命左派的真正旗帜。

国民党右派不甘心失败，他们把仇恨都集中到了廖仲恺身上。廖仲恺已成为右派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实行反动纲领的最大障碍。

右派中的极端分子，决心杀害廖仲恺。他们在香港筹备了 200 万元巨款作为谋杀革命者的经费。

1925 年 8 月，广州城里谣言四起，对国民党左派领袖进行威吓，迫使他们向右派让步。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也听到了风声，感到问题的严重，不禁为廖仲恺的安全担心，同他商量说：“既然有人打算行刺，你也该多带两个卫士，加强防备才好！”廖仲恺淡淡一笑，说：“增加卫兵，只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止他们行凶。我天天要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各团体去开会演讲，一天到晚不知要跑几个地方，他们想谋害我，完全可以化了装混在人群中下手。我生平为人处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和民众的地方。他们如果存心想暗杀我，预防也是没有用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是决不能松懈一步的！”

廖仲恺照例按自己的计划去进行工作。

8 月 19 日，上海一家报纸竟荒唐地登出了一份关于廖仲恺死讯的电文！廖仲恺根本没把这些放在心上，这天晚上，他为黄埔军校筹集资金，直到深夜才回家。

8 月 20 日，廖仲恺匆匆地吃了早饭，同何香凝一起，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06 次会议。路上，他们遇上了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便邀请陈秋霖一同乘车前往。

这天，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静得出奇。往日林立的岗哨不见了；应该来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委员们也迟迟没到；中央党部周围的街口，偶然有人经过，也是来去匆匆；路旁树荫下，几双可疑的眼睛在闪射出狡黠的光亮，中央党部门口，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正虎视着前方的开阔地。

一个罪恶的阴谋，正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悄悄实施。

汽车在中央党部门前停稳，廖仲恺、何香凝、陈秋霖先后跨出车门，向中央党部走去。廖仲恺边走边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已是 9 点 50 分，三人登上台阶，正准备举步进入中央党部大门时，突然有五、六个人从门前的石柱后面窜出来，持枪向廖仲恺射来。廖仲恺“啊”了一声，身子一晃，倒在地上。何香凝见廖仲恺中弹倒地，赶紧扑过去，将他一把抱住，大声呼唤：“仲恺！仲恺！”

陈秋霖听到枪声，刚一回头，一粒子弹已射进他的腹部。他踉跄一步，倒在血泊中。

枪声惊动了中央党部内的警卫。此时，廖仲恺的卫士和中央党部的警卫立即拔枪还击。一阵枪战过后，一名凶犯被击伤擒获，其他凶犯夺路逃走了。

人们在慌乱中把廖仲恺和陈秋霖送到广东大学医学院急救。廖仲恺已奄奄一息。医生检查发现，廖仲恺身中三弹，都在胸腹要害部位。虽经医生全力抢救，廖仲恺终因伤势过重，与世长辞，当时仅 48 岁。两天以后，陈秋霖也在医院逝世。

廖仲恺被刺的消息，震惊了广州各界各阶层的人们。当天下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廖案特别委员会”，授予它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非常局势，并负责廖案的侦破和审判。会议还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特别委员会

负责人。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当天就宣布广州全城戒严，并命令黄埔军校学生在海岸布防。可是，捉拿凶手的工作相当艰难，被抓住的那个凶犯伤势过重，只断断续续供出些凌乱线索就死了。侦办人员只知道他名叫陈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枪照和一张名单，枪照系南京 16 号，1925 年 8 月 4 日由建国粤军南路第一路司令梅光培发给；名单是写在新珠海酒店信笺上的，是吴培、梁博、陈细三人的姓名。此外，陈顺在临死前交待，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朱卓文。

侦办人员首先将梅光培拘捕。梅光培在受审时解释说，枪照虽然是以他的名义发的，但他并不亲自处理这种事，而是他的参谋长郭敏卿经手办理。他仔细看了看陈顺作案时使用的手枪，证实这是朱卓文的，因为这枝手枪比一般的左轮手枪要大，可以发射机关枪子弹，所以他见到后印像根深。

侦办人员随后逮捕了郭敏卿。郭敏卿承认与朱卓文过去关系密切，但又说最近已不来往。

陈顺身边名单上的梁博也被逮捕。梁博是广州市公安局的侦探，曾是朱卓文的部下。梁博的妻子林氏交代说，梁博听说廖仲恺被杀后，便说一定是陈顺干的。据此，梁博被认定为此案的同谋犯。

接着，《国民新闻报》的赵士伟也被作为嫌疑犯关押。

各种证据都表明，暗杀廖仲恺的主犯是朱卓文。8 月 25 日，特别委员会下令逮捕朱卓文。然而，朱卓文已经得到消息，逃出了广州。其实，这场谋杀的元凶，则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胡毅生虽是同盟会的老会员，却组织领导了“革命纪念会”和“文华堂”两个组织，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以“反共产”为口号到处拉人入伙，见人就问：“你反共产吗？如反共产请加入来！”这一伙人暗中策划打倒廖仲恺、刺杀廖仲恺。此外，他们还有煽动军人反叛的嫌疑。为此特别委员会决定拘捕胡毅生。可是胡毅生也逃走了。

尽管如此，国民党右派仍然成了众矢之的，右派领袖胡汉民又是胡毅生的堂兄，更加难逃指责。汪精卫派兵以追捕胡毅生为理由，搜查了胡汉民的住宅，一时间外界议论纷纷，认为汪精卫将把胡汉民逮捕法办。胡汉民此时已完全被排斥在国民党中央领导层之外。最后，蒋介石以“保护”为名，把胡汉民接到黄埔军校，实际上是控制胡汉民的行动。

9 月 15 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报告，为胡汉民辩解，一再表示“政府”对胡汉民没有成见，并提出把胡汉民打发到苏联去，将他排除出国民党领导核心。

9 月 22 日，胡汉民起程赴苏联，在此前后，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也纷纷离开广州。国民党的领导大权落到了汪精卫和蒋介石手中。他们借廖仲恺被刺杀的机会，完成了孙中山逝世后的权力转移，而对于刺杀廖仲恺的凶手，却迟迟不作处置。直到 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何香凝等人的努力下，才决定尽快处理廖案。然而，胡毅生、朱卓文始终没有抓到，最后只枪毙了一个郭敏卿，监禁了其它几名凶手，草草了结了这一桩大案。

（薛兵）

希特勒的末日

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厮杀已近尾声。

4月13日，希特勒的故乡，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被苏军攻占。14日，鲁尔重工业区的德军被英美军队包围。当天，美军第五军又在意大利展开了攻势。4月16日，苏军的总攻准备就绪，在奥得河和尼斯河战线发动了进攻。其意图显然在于形成对柏林的包围，此时德军已无力进行防御。

4月15日，希特勒考虑到苏美两军在易北河会师，德军被分成南北两块后不可能再进行联系，便命令力所不及的地区最高司令拥有处理国防事务的全权。北部地区由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元帅负责，南部地区由西部集团军总司令凯塞林元帅负责。

16日，苏军在奥得河、尼斯河全线展开进攻。当天，希特勒在地下室召开特别军事会议。在会上，他信心十足地发表了解救柏林的作战计划，使出席会议的将军们哑口无言。该作战计划要点是：向首都退却的德军如果能在柏林附近构筑强大的防御工事——刺猬阵地，那苏军就一定会向这里进攻。这样，可以减轻其它战线上德军的压力，他们就可以从侧翼进攻苏军。希特勒说：“俄国人进攻神速，但他们供给跟不上。在柏林作战，我军有充分胜利的把握。这次如果能击败俄国人，苏军就没有资格参加未来的和平谈判。”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鼓舞保卫柏林的德军士气，希特勒声称他将留在柏林。几个将军劝他到上萨尔茨山去，可是希特勒不予理睬。他说，作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及国民的领袖，留在首都是他的义务。希特勒写了长达八页的布告（这是他对德军发布的最后布告），交给戈培尔向前线广播。可是，前方将士需要的不是空洞的激励言辞，而是炮弹、坦克、飞机和补充兵员，总之是战斗力。东部战线迅速瓦解。苏军于19日占领莱比锡。在西部战线，莫德尔元帅指挥的部队也完全失去抵抗能力，莫德尔自杀。在意大利，美军已占领博洛尼亚。

希特勒的总指挥部已经在三个月前转入地下，他是经过一条从新总理府延伸到花园下面的地道进去的，除了他的卫队和随从人员，在柏林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条地道。

地下室阴森凄凉，天花板很低，走廊好似墓穴里狭小的墓道。希特勒的三间私室比别的房间稍大，有一个带淋浴的盥洗室。房内只有几件家具，布置得像修道院的斗室。这里就是第三帝国的最高军事大本营，是希特勒用来指挥战争的十三个指挥部中的最后一个。自从1944年7月20日受到施陶芬贝格上校策动的暗杀事件冲击之后，希特勒的健康状况就日趋恶化，先是左手抖得很厉害，到那年秋天，左脚也开始颤抖起来。眼睛的近视程度越来越厉害，看东西必须戴眼镜。为了医治他的肠胃不良，希特勒长期服用含兴奋剂的整肠剂，健康情况越来越差。

战争的最后三个月，在中欧约有四百万军事人员和平民伤亡，希特勒每拖一天，就有成千上万人丧命。从1月到4月，集中营里已有五十五万人被送进煤气室。命中注定希特勒要再活105天，但他再也不能在地面上度过一个整天了。他从这天起，办公、进餐、睡觉、洗澡，到后来结婚、自杀——全在地下。

就像生活在潜水艇里一样，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爬到地面上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在没有空袭的时候，他偶尔也在新总理府玻璃窗已经震坏的办公

室里召开军事会议。

地下室里只有一个电话总机、一架电台和一部直通最高指挥部的报话机。这部报话机必不可少的天线，摇摇欲坠地挂在玛苏伦街柏林大厦顶端一个玩具似的铝质气球上，跟当年横跨欧洲的通讯网相比，简直是个绝妙的讽刺。然而，就是靠了这么个玩艺儿，希特勒在地下指挥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小时。

4月20日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虽然攻打柏林的战役四天前已经开始，并在激烈进行，整个城市几乎全被红军包围，可希特勒仍执意要第三帝国所有主要当权人物来最后见他一面。这次寿宴是一次光怪陆离的表演。尽管大势已去，客人们的举止仍旧竭力装得好像还在显赫一时的岁月里那样。这次惨淡的宴会上，希特勒是最后一次看见希姆莱、戈林以及二十多个部长中的大部分人。

地下室里空气污浊，排风机的柴油发动机嗡嗡地响个不停。只有在停机或出毛病的时候才稍稍安静一些，但这样一来，各种气味混合的恶臭就使人难以忍受。应召来地下室的将军们感觉这里简直就像一所地下疯人院。在临近末日的时刻，希特勒给人的印象就如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过去冰冷发亮的眼睛已经变得呆滞、眼珠深陷而充血。褐色的头发变得灰白，走动时慢慢地挪动身体，而且有一条腿拖在后面。他两手不停地颤抖。他的医生确认他患帕金森氏综合症。

生日宴会在平静的气氛中结束。在宴会后的军事会议上，与会的人都希望希特勒退到南方，因为一两天内苏军可能切断通南方的最后逃脱路线。希特勒对此不接受，他寄希望于党卫队副总指挥费利克斯·施泰纳将军部队的反击。当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军团投降、东线濒于崩溃时，施泰纳将军曾不顾希特勒死守阵地的命令，迅速后撤到战略上有利的地方。希特勒非但没有像罢免其他将军那样罢免他，反而给他以高度评价。因此，希特勒对施泰纳将军的侧翼进攻抱有希望。几天前，他说：“俄国人将在柏林面前遭到空前的惨败。”尽管前线迅速土崩瓦解，希特勒仍旧持乐观态度。

可是，宣传部长戈培尔在这天晚上为庆祝希特勒的寿辰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却说：“局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因此，现在不能像以往那样以普通的祝词来祝贺元首的诞辰。我能说的只有一句话：在充满黑暗痛苦的、严峻的今天，只有元首才是西欧唯一的代言人。”“我们德国今天依然屹立着，具有优秀文化和文明的西欧，现在还没有沉没在眼前张开大口的深渊中——这只能感谢元首。”

当天夜里，戈林和希姆莱都逃出柏林。这两个人都希望在希特勒死后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一心一意想取得英美盟国的信任。里宾特洛甫在这天深夜也逃出柏林，把外交部迁到他在上萨尔茨山近郊的别墅中。

直到22日，施泰纳部队的战况也没有一点消息。希特勒焦急地一再询问，回答总是“来得到任何报告”。下午的军事会议上，武装部队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同平时一样，毫不隐瞒事件真相，据实报告说：“柏林的四分之三已经被包围了。”希特勒急切地问：“施泰纳部队打到什么地方啦？让他快报告上来！”陆军代参谋长不得不说实话：“施泰纳的部队尚未组建成功，所以没有什么可报告的！”

希特勒面孔颤动着，呼吸也很急促，气得在房间里直顿脚，口吐白沫地大骂所有的人都是叛徒，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的“伟大目标”。随后宣布，由

他本人负责第三帝国的防务。大家都表示反对，说元首如果南迁，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有党卫队的舒埃纳元帅的集团军，西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还有相当的兵力。可希特勒根本听不进去，还是命令通过无线电宣布：“元首留在柏林，死守到底！”

23日，武装部队参谋长约德尔上将由于在柏林难以指挥作战，终于离开总理府。这个约德尔是一位杰出的战术家，忠实地为希特勒效劳，直到最后也未能看清希特勒的真面目。约德尔走后，希特勒发布了最后的作战命令：“文克部队要调整回头，在易北河采取守势。挺进东北，攻击波茨坦；在科特勃斯被围的第九军应突围，同文克的第十二军会师；柏林北方的维克泽尔集团军部分部队应向南经奥兰宁堡进入道本斯方向。”

其实，这些部队均遭重创，没有战斗力，几乎濒于毁灭，只不过在希特勒的军事会议室的地图上还插着小旗而已。

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一直在上萨尔茨山，可是在23日中午过后，他就断绝了同总理府的联系。他从各种情况判断，希特勒与外部联系已经断绝，丧失了统治这个国家的能力。他认为，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总统命令，希特勒死后应由自己接班。或者总统由于某种原因不能进行统治时，也应由自己代行总统职权，他感到现在时机已到，正是代行总统职权的时候。他打算就任代总统后，立即开始同英美盟国进行和谈。希特勒发动战争后，戈林曾一度被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人。因此，他相信自己现在在英国人和美国人心目中还有一定的威信，于是，戈林郑重其事地给希特勒发电报：

元首阁下：

考虑您决心留在柏林，遵照您1941年6月日的决定，不知您是否同意我对整个德国内政外交行使指挥权。如在晚十时前得不到您的答复，我将认为阁下已被剥夺行动自由，阁下的上述决定即告生效，我将为人民和祖国而采取行动。

在一生最困难的时刻，阁下知道我对您说这种话该有多么痛苦。我的心情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

愿上帝保佑阁下，并愿阁下尽快到这里躲避。

忠实于您的部下 赫尔曼·戈林

戈林要求希特勒晚上十点前给予答复，这一点很快被擢升为总统身边的第一号人物——总统府秘书长马丁·鲍曼所利用。鲍曼认为，希特勒尚未表态就要求晚上十点前给予答复，这等于是最后通牒。于是，他要求把戈林处以死刑。

希特勒犹豫片刻，他对戈林在空军玩忽职守，在卡林·霍尔过着腐化的生活也很不满。不过，他对戈林还是有感情的，不同意把戈林处死。他免去戈林的一切职务，并发电报说，“你的行为是对元首及国家社会主义的背叛。完全可以判你死罪。但考虑你过去对党及元首的献身精神，如能辞去一切官职，即可免你一死。同意与否，望你立即回复。”

电文是鲍曼起草的。他顺便取消了1941年6月29日的决定，废除了戈林为总统继承人的权利。鲍曼知道希特勒对戈林还有感情，唯恐希特勒变卦，便暗中同上萨尔茨山的党卫队头目联系，逮捕并软禁了戈林。

然而，之后没过几天，又发生了党卫队总指挥希姆莱背叛的事件。起先，戈林因空军失利而权势衰落时，希姆莱这颗新星则高高升起，取代了戈林。尤其是发生了刺杀希特勒未遂事件。事件主谋是陆军增援部队参谋长舒伦堡上校，该部队司令弗罗姆上将也因此失宠，被免去了职务，由希姆莱兼任。

这样，希姆莱除担任党卫队总指挥之外，还担任装备超过正规军的冲锋队司令，再插手正规军的首脑部门，其权力已达顶峰。不过自此之后，希姆莱这颗明星也逐渐陨落，被鲍曼所取代。

鲍曼劝希姆莱去前线指挥部队，以便把他从元首身边排挤出去。希姆莱完全上了鲍曼的当，还洋洋自得地就任了莱茵河上游的守备司令。希姆莱本来是投考陆军军官学校的，但未被录取。他对军人有强烈的兴趣，一直想成为一名军人。希姆莱的权力表面上似乎得到加强，实际上同元首见面的机会却减少了。这样他对希特勒的影响就逐渐下降，鲍曼则逐渐扩大了他的影响。

东部边境吃紧时，希姆莱又上了鲍曼的当，他担任了防守正面最关键的维克泽尔集团军的司令。这个官职地位虽然很高，任务却相当艰巨。在这条战线上，连军事专家们都无法收拾，何况他这个外行司令，处处暴露出他的无能。总参谋长冯·古德里安开口闭口批评希姆莱无能。希姆莱的部下各军司令也轻视他，不理睬他的命令。他终于忍受不住，经常托病离开前线住进医院。甚至连总理府的军事会议也不出席。

4月20日，希姆莱离开总理府地下室后，在他的部下——情报部长与瓦尔特·舒伦堡和他所信赖的指压专家克里斯蒂安的再三劝导下，悄悄地去瑞典与那位跟盟军上层人物有深交的伯纳多特伯爵见了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晤，目的在于探询同美英盟军进行和谈，这也是希姆莱几经犹豫作出的决定。

舒伦堡是位头脑聪明的人，虽一度被希特勒所蒙蔽，参加了纳粹党，但后来逐渐看清了希特勒的本质，较早地看到这场战争必将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舒伦堡懂得，只要希特勒大权在握就不会有和平。他坚持做希姆莱的工作，指出战争毫无取胜希望，只有希姆莱能够取代希特勒同美英进行谈判。舒伦堡又劝说希姆莱除掉希特勒，必要时，他可以不惜自己的性命。因此，早在1943年，希姆莱就有和谈的意向。

希姆莱深知希特勒决不会投降，他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对希特勒的忠诚。尤其是来到希特勒面前时，他没有一点勇气反对希特勒，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由于他的优柔寡断，他与伯纳多特伯爵的第一次会晤几乎没有任何结果。面对伯纳多特的诚恳劝说，他只答应把拉之斯勃鲁克集中营的全部女囚引渡给瑞典的红十字会。舒伦堡对此也很生气，说：“我再也不能为您做什么了！”

回来的路上，两个人都一言不发。车子快到司令部时，希姆莱说：“舒伦堡，今后的前途如何，我是很担心的。”

“那您就应该拿出勇气，采取行动！”舒伦堡说。

希姆莱又是一言不发，他真正担心的是被那个顽固的部下——国家公安总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所觉察。

4月27日，在旧金山召开了成立联合国的会议。当天晚上，英国代表艾登外相在霍普金斯饭店的九层楼上冷静地宣布：“顺便说一下，刚才从欧洲得到各位感兴趣的消息。据斯德哥尔摩的情报说，希姆莱已经通过伯纳多特伯爵向美英军队请求无条件投降。此事眼下正在同苏联方面进行联系。”

这个情报是路透社驻旧金山记者兰金在28日凌晨一点得到的。路透社很快把这个情报转发给全世界的特约新闻社和通讯社。其内容如下：“据艾登致莫洛托夫的报告称，希姆莱承认向美英（不包括苏联）请求无条件投降的信函已交给美英政府。这一点可以信赖，因为明天将在政府人士间公布。希

姆莱有权准备向西欧盟国无条件投降，而且他也希望这样做。这一点已得到证实。”

对总理府地下室的人来说，28日是最严峻的一天。苏军越来越逼近，对总理府的炮击越来越猛烈。文克部队的反击毫无指望，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地下室的人拼命地收听国外的广播，以便了解目前的形势。晚上十点左右，宣传部电讯班收到了路透社关于希姆莱投降的消息。这消息传到地下室里，所有的人，都由于愤怒、恐慌和绝望而爆发出一阵狂嚣。希特勒恼怒极了，那悲愤的狂态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谁也没有想到，连最忠于希特勒的希姆莱也甩掉了这艘行将沉没的航船。

希特勒过去从未对希姆莱的忠诚表示过怀疑，这一次无疑是他所承受的打击中最沉重的一次。他面孔抽搐着狂叫：“戈林想成为元首的继承人还跟我打个招呼，可那个忠诚的党卫队总指挥希姆莱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同敌人勾搭，背叛了我。这是史无前例的最可怕的卖国行为！”说完，希特勒陷入茫然自失的状态。由于这个打击，他下了自杀的决心。

希特勒对希姆莱的第一个报复是处死党卫队总指挥的总统联络官费格莱因。这人是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勃劳思的妹夫，他借着这一层关系爬上了将军的宝座，成为希特勒的一名亲信。两天前，他脱掉军服换上便衣，偷偷溜出地下室躲在家中。他因此而被捕，现在，希特勒认为他是希姆莱的同党，命令拉到外面的广场上枪毙了。

紧接着，希特勒来到三天前刚提升为空军司令的里特·冯格赖姆的病房，对格赖姆说：“这一次连希姆莱都背叛我啦！你们两人尽可能快点从这里逃出去。”希特勒所说的两人中的另一个是女航空队长汉娜·赖奇。希特勒摊开地图，对格赖姆下两道命令：一是逃脱成功后，首先动员他指挥的空军，轰炸通往总理府路上的苏军阵地，这样至少可以使俄国人冲进总理府的时间推迟二十四小时，而文克将军的援军就可以赶到柏林；第二是无论如何要逮捕叛变的党卫队总指挥希姆莱。提到希姆莱的名字时，希特勒的嘴和手忽然剧烈地颤抖起来，他说：“决不是一个叛徒以元首的身份成为我的继承人！你应该立刻出发采取万无一失的手段，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希特勒说，有一架“阿96”教练机正等在那里，叫他们就乘那架飞机突围。可是格赖姆和赖奇心里都明白，他们难以完成这个任务，教练机要冲破盟军的层层拦截，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希特勒认为这是挽救德国的唯一机会。他们也只好从命。

格赖姆和赖奇居然侥幸地逃脱成功了。教练机在仅有四百米长没有弹坑的马路上起飞了，他们穿过炮火交织的网，飞入七千米高的云层中。当飞机从云层中钻出来时，头顶上月光皎洁，空气清新，可是下面却是一片火海……

希特勒送走了格赖姆和赖奇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准备同毕生忠于他的情妇爱娃举行正式婚礼，作为临死前给她的最后礼物。

29日凌晨一点到三点，在地下室的小地图室举行了这个奇特的婚礼。戈培尔从冲锋队中找到一位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市议员，让他主持婚礼。他和鲍曼当证婚人。希特勒说：“由于形势紧张，口头发表一下通知就行了。一切浪费时间的活动都不必搞了。”新郎和新娘都是纯亚利安人的后裔，他们互相发誓“没有妨碍结婚的遗传性疾病”。结婚仪式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宣布结束。爱娃虽只有一天时间，但她实现了成为元首正式夫人的目的。她非常得意。

婚礼结束后，希特勒和爱娃走出地图室，他们同门外等候的人一一握手，然后回居室准备婚宴。鲍曼夫妇、戈培尔夫妇，还有希特勒的两个女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和荣格夫人应邀出席了宴会。他们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谈论着昔日的友情。当希特勒回忆起戈培尔的婚礼时，他说：“那是个幸福的时代，我还当了你们的证婚人哩！”

希特勒也谈到他想自杀。他说国家社会主义崩溃了，再不会中兴，只有死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说他被真挚的朋友欺骗了，这些人都背叛了他。

在座的人都陷入苦闷之中。一个女秘书抑制不住眼泪，离开了座位。随后又有几个人出出进进，过了一会儿，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冯·贝格上校也来参加婚宴，并叫冲锋队副官京舍进屋，参加宴会的人都被召到希特勒面前，听取他口述遗嘱。

这时，鲍曼为了给他的宿敌戈林以致命的一击，便给上萨尔茨山的党卫队分队长打电报，命令处死戈林。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党卫队也不听他的话，他们不但没有将戈林处死，反而相信了戈林的劝说，解除了对他的软禁。戈林担保对他们的性命负责。

希特勒向秘书荣格夫人口述的遗嘱有两份，一份是政治遗嘱，另一份是私人遗嘱。政治遗嘱通篇都是胡言乱语，空洞无物，是一个地道的临时拼凑的大杂烩。

接着，他又匆匆忙忙地口述私人遗嘱。这份遗嘱很短，也没有夸大之词。他回顾了自己出身于奥地利的小市民；说明了他结婚的理由；如何处理他的财产；还谈到他将与新娘爱娃一同自杀。希特勒在这份遗嘱上签了字以后，戈培尔、鲍曼以及八年来一直跟着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也签了字。这时天空已经泛白，希特勒回到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苏军的炮火猛烈地轰击着柏林，市内硝烟滚滚，平射的炮弹使一排排建筑物倒塌。苏军已从威廉大街步步逼近。29日中午，按照惯例召开了军事会议。希特勒也参加了，他已经恢复了平静。苏军从夜里到早上不断地向总理府发起进攻。市内德军弹药奇缺，文克的援军毫无消息。希特勒听到这些报告没有再发脾气。

几名副官不想充当殉葬品，便提出要去同柏林守军一起战斗。克莱勃斯与希特勒商量之后，希特勒同意了。当天下午，又有一个噩耗传到地下室：希特勒的盟友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在从意大利的科摩湖畔逃往瑞士时，于4月26日被意大利游击队截获，28日被处死。当天晚上，两个人的尸体运往米兰，展示在广场上，30日又被绑上双脚，倒吊在电线杆子上。

得知这一消息后，希特勒开始准备自杀。他先让侍医毒死他心爱的狗布朗迪，又开枪打死其余两条狗。然后，希特勒把装有氰酸钾的小瓶子亲手交给女秘书，对她们说：“将军们不那么信任你们，这对我来说是很不幸的。”他还说送给她们这种无聊的诀别礼物很遗憾，并请她们原谅。

黄昏时分，希特勒让荣格夫人焚毁剩下的文件，并命令地下室的人在未接到通知之前谁也不准睡觉。

晚上十点钟又召开军事会议。柏林地区警备司令威德林将军的汇报给地下室带来一片阴郁的气氛。巷战已陷入绝望状态，各师团只徒有虚名，战斗力下降到营以下的水平，士气低落，弹药不足。尽管陆军的宣传机构说文克的部队正在赶来营救，但士兵们对战斗毫无信心，对这种编造的谎言十分气

愤。实际上，当天文克的第十二军总算整编完毕，开始向柏林进发，但已无济于事。

到30日，苏军已几乎占领柏林全城，只剩下总理府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据中午的军事会议报告，苏军已越过柏林的动物园，先头部队与总理府只隔一条街。希特勒这时对一切都绝望了。他的秘书荣格夫人和克里斯蒂安夫人倒还没有动摇决心。希特勒同她们吃了一顿清淡的午饭。他的夫人爱娃因食欲不佳而未吃饭。饭后，希特勒把爱娃叫出来，又同地下室的一些最亲近的人握手诀别。

然后，希特勒叫来副官京舍上校，吩咐他，在自己以及妻子自杀后把尸体焚烧。他说：“我死后，只希望不要把我弄到俄国的战争博物馆去展览！”说完，他和爱娃一起回到自己的房间。

京舍给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打电话，叫他准备二百公升汽油，送到总理府地下室门口。肯普卡说，剩下的四万公升汽油都埋在动物园，那儿已被苏军占领。京舍不管这些，只叫他无论如何要搞到，从打坏的汽车里掏，能掏多少掏多少。肯普卡跑来跑去，好不容易弄到一百八十公升汽油。

京舍上校的房间紧挨着希特勒的房间，他负责元首的安全，在这最后的时刻，他要尽到警卫的责任。此刻是4月30日下午3点35分左右，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希特勒房间里的枪声。个个神经都非常紧张。

这时，没有参加刚才告别的戈培尔夫人马格德匆忙跑了过来，说是要见元首最后一面。京舍劝她不要去扰乱元首的心绪，但她无论如何要见。没办法京舍只好去敲希特勒的房门，他推开门进去，只见希特勒正站在书桌旁，这是希特勒活着的最后姿势。京舍没有看见爱娃，听见浴室里流水声，可能是爱娃正在进行自杀前的化妆。希特勒对京舍的闯入非常不快。京舍说戈培尔夫人一定要见元首最后一面。希特勒说：“我谁也不见！”京舍便走出房间，关上了门。

大约过了五分钟，传来一声枪响。之后就没有听见第二声。鲍曼第一个冲进希特勒的房间，接着是侍从林格和京舍。只见希特勒坐在椅子上，满脸鲜血，子弹是从右边太阳穴打进去的。爱娃在沙发上，脱掉了鞋子，依在沙发的一角。她穿了一件白领带袖的蓝色衣服，眼睛睁着，嘴里散发出浓烈的氰酸钾气味。

林格和京舍用烧破的军用毛毯把希特勒的尸体裹起来抬了出去，鲍曼抱起爱娃，她的金发垂了下来。司机肯普卡从鲍曼手中接过爱娃的尸体，抱了出去。

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被放在距地下室不到十英尺的弹坑内，然后浇上汽油。鲍曼把点燃的报纸扔到坑里，火焰轰地腾起来。戈培尔和鲍曼以及其他送葬的人退到地下室的紧急出口处，举起右手行纳粹告别礼。茂军的炮弹又落到院子里，葬礼很快就结束了，这些人又回到地下室里躲避起来。

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在外面熊熊的烈火中燃烧着……

虽然戈培尔作为希特勒的继承人，这时已经成了帝国总理，但这只有地下室少数人知道，外面无人得悉。戈培尔给海军元帅邓尼茨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柏林发生的一切，正式通知他目前新的权力分配。这就是戈培尔作为德国总理所采取的仅有几项官方行动之一。

新总理和他的妻子几乎整夜都坐在地下室下层的会议室里回忆过去。令人惊奇的是，在这群纳粹头子中，没有一个人对希特勒的遗体表示任何兴趣。

晚上十点左右，京舍派了一个士兵去检视尸体。士兵很快就回来报告：“两具尸体都已经烧得只剩下残骸，无法辨认了。”

将近午夜时分，戈培尔命令将残骸从弹坑里搬出来埋在附近。他竟然没有指定埋在哪里。士兵也没有汇报。所以至今没人知道希特勒的尸骸埋在何处。

（孙练）

十一名部长被绑架

1975年12月21日，这是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呈现出欢乐的节日气氛。贯穿市区的多瑙河上，满载外国游客的豪华游艇在来回穿梭。大小商店门口，摆放着挂满五颜六色彩灯的小松树。十字街头，伫立着三五个民间提琴手，演奏着悦耳的节日乐曲，俨然成了这座音乐之都的一大景观。

然而，坐落在卡尔吕格环城大道10号的乳白色大厦里，却充满着别样的紧张气氛。这座大厦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总部所在地，该组织的11个成员国的石油部长正在大厦会议厅里举行例会。

欧佩克成立于1960年9月，总部在1965年从日内瓦迁至维也纳。它的任务是协调和统一各成员国的石油政策，并确定以最适宜的手段来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欧佩克自成立以来，为稳定石油市场作了许多努力。它每一次例会，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因为这关系到“黑色金子”——石油的产量和价格。

中午11点40分，大厦会议厅内，石油部长们正在为石油差价争得面红耳赤，唇枪舌剑，吵得不可开交。但随着中午的临近，会议也该准备休息了。

就在这时，有五男一女说说笑笑地向欧佩克大厦走来。他们衣著入时，提着阿迪达斯运动包，边走边大喊大叫，并不时唱起祝愿世界和平的歌曲来。这座大厦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加拿大使馆三家合用的，门口只孤零零地站着—个警察，见这6个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便放他们进去了。

路透社驻维也纳分社社长西德尼·韦兰德，正在大厅内与一位美联社记者聊天，见这伙人皮肤黝黑，就开玩笑地说：“瞧！安哥拉代表团来了。”近来有人说，安哥拉正准备加入欧佩克。

这帮人没有理睬两位记者，径直奔向二楼。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男子，头戴贝雷帽，身着军大衣，一脸横肉，鹰钩鼻子，两腮长满大胡子。—上二楼，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电话总机室。接线员黑勒小姐挺有礼貌地问：“你们好！有事吗？”那6个陌生人中的瘦高个男人迎上来问：“会议厅在哪里？”黑勒小姐朝右边指了指：“拐过弯就是。”话音刚落，瘦高个就呼地从运动包里掏出一支冲锋枪，朝电话交换台就是一梭子，整个电话线路就此中断。总机小姐尖叫—声，—下子钻到桌子底下，周身颤抖着。大胡子和其他人也掏出了冲锋枪。

原来这帮人是一群恐怖分子。

在会议厅休息室里，有两名奥地利警卫，—位是扬达警官，—位是蒂希勒警官。他们见这帮持枪者闯了进来，情知不妙。蒂希勒冲上去阻拦，—把抓住大胡子的冲锋枪管，但大胡子猛地—掀，从他手里挣脱出来，直扑会议厅。跟在大胡子后面的女歹徒，用英语问：“你是警察吗？”蒂希勒刚说是，她就朝他开了—枪，子弹击中他的颈部。接着她把受伤的蒂希勒拖进电梯，将电梯开往底层。扬达警官也被其他歹徒缴了械，—脚将他蹬倒在隔壁—间办公室的地板上。

站在会议厅门口的伊拉克驻石油输出国组织代表团的安全官员阿里·哈利法试图拦住这帮人，结果被女歹徒—枪打死。

大胡子手—挥，两个恐怖分子留守门口，女歹徒冲进隔壁—间办公室，

大胡子自己则带着两个人破门而入。

顿时，会议厅里响起一阵轻脆的枪声。所有的吊灯全被击得粉碎，天花板上留下蜂窝状的枪眼。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把与会者吓懵了。尖叫声、祈祷声和桌椅的翻倒声响成一片。平素道貌岸然的部长、大臣们，全都“唰”地一下钻到桌子底下，吓得浑身打哆嗦。女秘书尖叫着蜷缩在墙角屋边，一动也不敢动。只有利比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尤素福，勇敢地奋起反抗，他一个箭步把大胡子撞倒在地，夺过大胡子手中的冲锋枪，但尤素福似乎不会开这种枪，大胡子乘机从怀中掏出一把小手枪，朝尤素福连开6枪，将他打死。

与此同时，倒在隔壁办公室的扬达警官挣扎着爬起来，向警察总部打电话报告，“我是扬达警官，石油输出国组织总部遭暴徒袭击，他们用的是冲锋枪。”仿佛在印证扬达警官的话似的，大胡子打死那个利比亚人的枪声此刻也传进了话筒。

大胡子端着冲锋枪，大吼一声：“全都给我趴在地板上，不准出声！”

人们乖乖地趴在满是散落的文件的地板上，连大气也不敢出，大厅内顿时鸦雀无声。

大胡子用带有外国腔的阿拉伯语喊道：“尤素福，把炸药准备好！”那两个恐怖分子立刻从运动包内掏出一捆捆炸药、雷管、导火索，然后，将炸药置放在厅内四角，并横七竖八地拉起一道又一道的导火线。庄严的会议厅变成了一触即发的火药库。

突然，外面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原来是维也纳的防暴突击队在接到扬达的报告后赶到了现场。这支8人突击队，头戴铜盔，身穿避弹衣，手执冲锋枪，在11点50分，即接报后仅5分钟，就冲到欧佩克大厦的一楼门厅。3名突击队员在同伴的掩护下，冒着恐怖分子雨点般的子弹，沿楼梯冲上二楼。守在会议厅大门的两名恐怖分子顽强抵抗着，激战中，一名恐怖分子负伤，另一名赶紧扔出几颗手榴弹，将一名突击队员炸伤。楼梯炸了个大洞，进攻受阻，而恐怖分子又以会议厅内人质安全相威胁，防暴队只好暂停攻击，十几分钟的战斗就此结束。

停火后，大胡子返回会议厅，怒气冲冲地问：“谁是亚马尼？”

正在默诵《古兰经》经文的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亚马尼大吃一惊：这伙人是冲着我来。肯定是那些抗议油价上涨的欧洲人，找我们这些负责油价的人报仇来了。他越想越害怕，把头紧紧地贴在地板上。躺在亚马尼身边的加蓬石油部长怜悯地朝他看了一眼。

一名恐怖分子开始仔细端详着每一个躲在桌子底下人的面孔。当他的目光与亚马尼惊恐的目光相遇时，他嘲讽地“啪”地立正，对亚马尼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转身告诉大胡子：他找到亚马尼了。

大胡子走过来，一把将亚马尼拽起来，推到一边，接着命令部下将人质分成三组：一是“罪犯小组”，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卡塔尔和阿联酋代表团成员；二是“中间派小组”，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非阿拉伯成员；三是“自由派和半自由派小组”，包括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科威特代表团成员。很显然，这次行动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这时，欧佩克总部大厦已被奥地利军警团团围住，附近的制高点上布满了岗哨，整个街区被彻底封锁，全城处于戒备状态。

大胡子瞅了瞅外面的情况，便写了一张纸条，叫人质中的尼日利亚代表团团长的女秘书凯里打字，并要她将条子送交奥地利当局。他大声地宣布道：

“你出去后告诉那帮混蛋，我是卡洛斯，他们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去办，否则，这群部长老爷们的小命就要完蛋了！”

“卡洛斯”这个名字使所有的人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谁都知道卡洛斯是赫赫有名的国际恐怖组织头目，是全欧洲通缉的要犯。卡洛斯是委内瑞拉人桑切斯的化名，是一名职业杀手，他领导的“卡洛斯帮”这个国际恐怖组织，曾在世界各地制造一连串的暗杀、劫机、扣押人质的恐怖活动。从他住处搜出的暗杀名单，足有几十页。今天落在他手里，恐怕是凶多吉少。

亚马尼更是惊恐不安。今年夏天，巴黎警方袭击卡洛斯的寓所时，就发现了一份暗杀亚马尼的详细计划，上面列举了他的行动和生活方式，以及他在城里常去的地方，并决定在那些地方实施暗杀计划。而这一次，亚马尼无疑是重点打击对象。想到自己在劫难逃，亚马尼不禁又默诵起《古兰经》来。凯里怀揣着卡洛斯给奥地利当局的打印稿，一边紧张地尖叫着“请不要开枪”，一边小心翼翼地冲过走廊，走下楼梯。当警察领她离开时，她面色苍白地对围上来的记者说：“我浑身颤抖，无法讲话，请不要问了。”

奥地利当局这时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非常残暴的对手。卡洛斯帮绑架了11国的石油部长和51名工作人员，事关重大，奥地利政府不得不谨慎从事。此刻，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正在莱希度假，内政部长立即打电话将这一突发事件报告克赖斯基。克赖斯基一放下电话，就立即赶回维也纳，并迅即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决定与恐怖分子谈判，寻求一种避免继续流血的解决办法。卡洛斯率领的这支五男一女突击队，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恐怖组织。他的5名同伙中，第二号人物哈利德是黎巴嫩人，瘦高个子克莱因是德国人，他的女友，即那个残酷无情的女歹徒，名叫加布里勒，也是德国人；小胡子尤素福是巴勒斯坦人；还有一个叫阿利姆的，是南也门人。他们是从北非出发，取道瑞士，辗转到达维也纳的。卡洛斯在瑞士留下一份政治公报，一旦他控制了石油部长，就让他与合作者公布这份公报。

卡洛斯在获悉奥地利政府准备谈判后，显得很高兴。他蛮横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拒绝与奥地利官员直接谈判，而由利比亚驻维也纳大使作中间人。但利比亚大使正好在外地，卡洛斯只好让伊拉克临时代办阿扎维充当中间人。

通过阿扎维，卡洛斯提出了不在奥地利开“杀戒”的条件：下午5点必须在奥地利电台广播他们的政治公报，并提供一架装满燃料的DC—9型飞机将他们和人质送到任何指定的地点。

如果上述条件不能满足，卡洛斯就从傍晚6点起逐一杀死人质，先将亚马尼的副手击毙，再杀死伊朗石油部长阿穆泽加尔的副手，接下来是处死亚马尼和阿穆泽加尔，最后杀掉所有人质，并炸毁欧佩克总部大厦！

奥地利政府知道这伙杀人如麻的恐怖分子绝非戏言，便立即开会商讨对策，并把这一情况通报有关国家。

下午3点，卡洛斯把亚马尼叫到隔壁一间小房间，与他单独谈话。卡洛斯直截了当地告诉亚马尼：“我们尊敬你，但我们迟早都要处死你，以此来抗议你的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如果奥地利政府拒绝我的条件，你就活不过今晚6点钟；如果他们让我们走，我就要带你们去利比亚的黎波里，然后再去巴格达，而你和那个伊朗人，将陪我们去终点站——亚丁。那里很可能是你的坟墓。”

亚马尼对卡洛斯这种坦率而又残忍的谈话，惊恐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下午5点到了，奥地利政府还没有广播那份公报，卡洛斯面带笑容地走到亚马尼跟前，提醒他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亚马尼这时反而不那么恐惧了，他强打起精神，开始给家庭和亲友们写诀别信，交待后事，并请同事哈代尔代为转交。但值得庆幸的是，5点20分，奥地利电台终于广播了卡洛斯的政治公报，并宣布在维也纳机场已停放了一架飞机，听候卡洛斯的调遣。亚马尼那颗蹦到嗓子眼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

卡洛斯那份早已打印好的政治公报，十分冗长，但多少说明了采取这次绑架行动的原因：某些阿拉伯国家的上层人物正在策划一个阴谋，试图迫使阿拉伯人屈从于犹太复国主义。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为了粉碎这一阴谋，打击阴谋活动的支持者，并对参与这项阴谋的所有人员和政党实行革命的制裁”。

傍晚时分，奥地利政府正式通知卡洛斯，答应他的条件，提供的飞机将由他支配。但同时附加了三个条件：一是外国人质随恐怖分子离开奥地利，必须以书面形式说明是自愿的；二是释放所有奥地利雇员；三是飞机飞到阿尔及利亚后，释放所有人质。卡洛斯对这些条件不屑一顾，只管提自己的要求：明早7点提供一辆有窗帘的大客车，把我们和人质送往机场，另外，还要提供一些绳子、剪刀、水果和食品来。

精疲力竭而又惊恐不安的人质们通宵坐在椅子上，度过了一个痛苦难熬的不眠之夜。

12月22日一早，奥地利政府便依约将一辆挂着窗帘的客车停在大厦门口。

由于车小人多，卡洛斯只好释放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工作人员和一些代表团的成员。这时，卡洛斯手上还握有40名人质，其中包括11名石油部长，有这些巨头在，不怕当局耍花招。

前有两辆警车开道，后有两辆救护车护送，大客车一直开到停机坪前。两名恐怖分子检查了那架DC—9型飞机后，所有人质都步履蹒跚地走上飞机。卡洛斯最后一个上飞机，他面对镜头，咧开大嘴笑了。这是胜利者的笑容。刚才临上飞机时，奥地利内政部长奥托·勒施竟出人意料地拥抱了他，这不就意味着奥地利当局向他彻底投降了吗？想到这里。卡洛斯伸手做了个“V”字手势，然后潇洒地上了飞机舷梯。全世界都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这个恐怖组织头目的嚣张模样，以及那些愁眉苦脸的奥地利官员的狼狈相。

9点15分，奥地利航空公司的这架DC—9型飞机腾空而起。自愿驾驶这架飞机的曼弗雷德·波拉克机长，并不知道确切的目的地，直到起飞半小时后，卡洛斯才通知他，飞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

卡洛斯走到机舱，宣布飞机到达阿尔及尔后，将释放部分国家的部长和代表团成员。这个许诺使机舱内的气氛有所缓和，人们开始相互低声谈话了。

卡洛斯显得神采飞扬，用西班牙语同他的同胞、委内瑞拉石油部氏瓦连丁谈笑风生，并将他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交给瓦连丁代为寄送。他甚至饶有兴趣地给人质之一、尼日利亚代表雷米签名“留念”！

然而，当飞机开始在阿尔及尔降落时，紧张气氛又充斥了机舱。卡洛斯让4名恐怖分子站在舱内不同部位，把枪口对准人质，并警告人质不准拉起窗帘。卡洛斯自己则打开后机舱门，站在门口，冲锋枪口朝外。

飞机停稳后，走过来一个阿尔及利亚官员，事后才知道他是外交部长阿布达尔。他走近机身，想爬上后舱门的舷梯。没想到，迎接他的是卡洛斯黑

洞洞的枪口和他的厉声喝斥：“不准上来！滚开！”阿布达尔只好悻悻离去。

卡洛斯把人质中的阿尔及利亚能源部长叫来。两人单独商谈了十几分钟。然后，这位部长走下飞机，向政府转达卡洛斯的要求。

不久，能源部长又转了回来，与卡洛斯一起去机场候机楼谈判。

凶吉难卜，机舱内弥漫着一种沉闷的恐怖气氛。

过了一段时间，卡洛斯同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布达尔一道返回飞机，立刻将一部分国家的部长和代表团成员释放。阿布达尔对尚未释放的亚马尼，阿穆泽加尔等人安慰道：“我们正在进一步努力，请大家保持镇静。”说完，又与卡洛斯一起去候机楼继续谈判。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卡洛斯返回机舱，身后跟着阿尔及利亚能源部长，虽然他已获释，但还是决定陪同剩下的人质一起飞往利比亚。

此时，卡洛斯手中还有 20 多人质，包括 8 名部长。他命令驾驶员飞往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接着，他和副手哈利德向人质们宣布：利比亚总理贾卢德少校将在的黎波里机场迎接大家。人质们见卡洛斯真的履行了逐步释放人质的诺言，心里踏实许多。只是亚马尼和阿穆泽加尔还是惊恐不安，卡洛斯似乎看透他们的心思，特地过来与他们聊天，有意无意地谈到阿尔及利亚人为挽救他们俩的生命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尽管舱内气氛又有所缓和，但他俩的心情依然不平静。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飞机于当晚 7 点降落在的黎波里机场。这一回，恐怖分子似乎不像在阿尔及利亚降落时那么紧张，没有命令拉上窗帘，他们手里也只拿着一把小手枪。

可是，贾卢德总理没有来。卡洛斯下令不准打开舱门。所有的人在闷热拥挤的机舱里等了一个半小时，贾卢德总理才到。但利比亚方面提出，只与阿拉伯人谈判。卡洛斯无奈，只得派副手哈利德与利比亚石油部长一起下飞机去谈判。

大约一小时后，哈利德同利比亚总理和石油部长一道回来了。贾卢德在舱门口受到卡洛斯的欢迎，利比亚总理与机上遭绑架的石油部长们谈话，特别与伊朗和沙特石油部长再三打招呼，安慰他们不会有生命危险。然后，贾卢德与卡洛斯在前机舱进行面对面谈判。

由于绑架者还准备去巴格达，而 DC—9 型飞机难于远距离飞行，卡洛斯便要求利比亚提供一架波音飞机。贾卢德表示同意，但他要求绑架者和人质需在的黎波里等一段时间，因为他们提供的那架波音飞机还停在托布鲁克机场。

卡洛斯无可奈何，只得耐心等待。但一直等到深夜，利比亚人提供的飞机还是没有来。

外面下起了暴风雨，机舱内更显得闷热、潮湿。一连几十个小时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恐怖分子，在漫长的等待中显得疲惫不堪、精神脆弱。女歹徒加布里勒前一晚通宵未眠，此刻在前舱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跳；哈利德疲于奔命，开始恶心呕吐；被防暴队打伤的克莱因，伤口疼痛加剧，不断地呻吟着……

卡洛斯望着濒于崩溃的部下，心急如焚，焦虑不安。他一边大骂利比亚人不讲信用，一边命令驾驶员将这架 DC—9 型飞机开往托布鲁克，到那里再换乘利比亚的波音飞机。但波拉克机长说他不熟悉托布鲁克，没有导航图不行。利比亚人找来一张导航图，波拉克又认为这种导航图不适合 DC—9 型飞

机系统。卡洛斯别无选择，决定返回阿尔及尔，到那里再找一架波音飞机。

起飞前，卡洛斯又释放了几名人质，包括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的两名成员。这两名沙特人，见他们的石油大臣没有释放，不肯离去，但被恐怖分子硬行赶下飞机。临走时，一名沙特人对卡洛斯说：“看在真主的份上，请不要伤害亚马尼。”卡洛斯哈哈大笑，半真半假地说：“我在利比亚已经接到上级指示，不准伤害他和伊朗部长。你们可以放心走了。”

飞机重又飞往阿尔及尔。机舱里还剩下十几名人质，其中有4名部长，他们是沙特的亚马尼、伊朗的阿穆泽加尔，以及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部长。卡洛斯已向后两人打过招呼，下一站就放了他们，因而他们心里倒比较踏实。而亚马尼和阿穆泽加尔则预感到死神将要降临了。

刚飞了不到一半的航程，狡猾的卡洛斯突然决定改飞突尼斯机场，看来他对阿尔及利亚不甚满意。但是，突尼斯机场在禀报政府后，断然拒绝了DC—9型飞机准备着陆的请求。卡洛斯蛮横地命令驾驶员强行着陆。可突尼斯机场早有准备，关掉了机场跑道上的指示灯，顿时机场一片黑暗。飞机无法着陆，驾驶员只得又把飞机拉起。卡洛斯没有办法，有气无力地吩咐驾驶员：“还是飞阿尔及尔吧。”

飞机到达阿尔及尔机场时，恐怖分子们又像上次一样紧张地忙碌起来。飞机刚停稳，卡洛斯便匆匆离开机舱，同阿尔及利亚当局谈判。两个小时后，他返回机舱，脸色阴沉，急促不安，显然遇上了不愉快的事。

卡洛斯把几个同伙都叫到前舱，低声商议了一二十分钟。坐在后舱的亚马尼，虽然听不见他们在谈些什么，但从哈利德和那个女歹徒怒气冲冲的样子，知道肯定有什么变故，不禁忐忑不安起来。

商讨结束后，卡洛斯挤出一副笑脸，径直来到亚马尼和阿穆泽加尔跟前，似乎很郑重地说：“经我们研究决定，明天中午释放你们，那时你们就自由了。”亚马尼不解地问：“现在是深夜，何不现在就放了我们，这样你们和我们都可以睡个好觉，何必等到明天中午呢？”卡洛斯愣了一下，赶忙解释道：“这可以让你们激动的心情多保持一段时间嘛！”显然，这是不成理由的理由，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勾当。

接着，其他恐怖分子也殷勤地给两位部长送来咖啡、糖果，甚至还抱来两个枕头，说是让他们美美地睡一觉。但是，亚马尼和阿穆泽加尔心里都很明白，卡洛斯那些言不由衷的话都是谎言，这很可能是最后的晚餐，死神在向他们招手了。

机上的灯光变暗了，窗帘也放下了，机长和副驾驶员都被释放了，周围的气氛静得令人窒息。亚马尼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

突然，卡洛斯手中的无线电对讲机响了，阿尔及利亚当局向他喊话，要他再去商量一些事情。原来，不久前恐怖分子商量后作出的决定，与卡洛斯告诉两位部长的完全相反。他们的真实计划，是准备在清晨7点将这两位石油部长处死。幸运的是，阿尔及利亚警方偷偷安装的窃听器窃听到了恐怖分子密谋会的内容。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布达尔郑重其事地对卡洛斯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们计划的全部内容。布迈丁总统命令你们不能伤害任何人质。如果你们杀死亚马尼，你们将一个也逃不掉！”卡洛斯竭力为自己辩解，阿布达尔又抛出一张王牌：“有关方面准备付一百万英镑的赎金，如果你杀死人质，将一

个子儿也拿不到！”一百万英镑！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卡洛斯的双眼闪现出贪婪的光。他忙不迭地说：“好说，好说！就这么定了，其他人由我来说服！”

卡洛斯兴冲冲地返回机舱，但他却竭力装出一副沮丧的模样，向同伙转达了布迈丁总统的强硬主张，不等同伙提出反对意见，他就下命令叫部下坚决执行。随后，他把正在沉睡的人质全都叫醒，宣布道：“我们马上离开飞机，你们全都自由了！”接着，他走到亚马尼和阿穆泽加尔跟前，恶狠狠地吼道：“这回算你们走运，但处死你们的决定没有变！你们迟早是要死在我们手上的！”

6名恐怖分子垂头丧气地离开机舱，来到机场候机楼。过了几分钟，剩下的十几名人质下了飞机，也来到候机楼，走进一间休息室，而绑架分子们就在隔壁的房间。

突然，卡洛斯的副手哈利德站起身来，他要求去和亚马尼说几句话，阿尔及利亚保安人员叫他交出手枪，然后把他领过来。哈利德一见亚马尼就破口大骂，用阿拉伯语重复了卡洛斯临下飞机时说的那些威胁话。话没说完，就将右手移向胸前。

站在一旁的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见事不妙，便迅速将手中的一杯桔子汁塞到哈利德的右手中，说：“让我们一起干杯吧！”哈利德接过杯子，一饮而尽。就在这时，一直在注视着他的那几个保安人员乘机一拥而上，从他的怀中掏出一支手枪来。哈利德怒不可遏地吼道：“我是奉命来处决罪犯的！你们为什么要妨碍我？”保安人员不容分说，将他押了出去。

这场由绑架11名石油部长而引发的危机，在经过40多小时惊心动魄的搏斗后，终以恐怖分子悄然离去而告结束。九死一生的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亚马尼，似乎这时才从恶梦中醒来，与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陈继）

危机来自鳄鱼洞

1965年9月30日深夜，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市郊一个叫鳄鱼洞的小村庄里，正酝酿着一场震撼世界的危机。

这个村庄位于哈利姆空军基地外围，距总统府大约有七公里路程。总统卫队查克拉比拉瓦营营长翁东中校准备发动一场旨在消灭“将领委员会”、保卫苏加诺总统的兵变。他召集了总统卫队、中爪哇第454营、东爪哇第530营、第五军区司令部第一步兵旅的四个连队到鳄鱼洞集中。士兵们全副武装，神情紧张，静静地等待出发。

翁东中校将这次行动的意图向部队宣告，他的声音里透着异常的激动：“兄弟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自从8月初苏加诺总统患重病以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将领委员会’加快了他们颠覆活动的准备。他们原想等待总统病逝，但现在他们等不及了。他们策划在今年10月5日建军节从东爪哇、中爪哇和西爪哇调来军队，发动政变。今天，我们要粉碎这个阴谋，逮捕‘将领委员会’成员。这次军事行动就叫‘九·三运动’！”

接着，翁东中校讲了袭击目标和行动步骤，并指定袭击部队由海军陆战队中尉杜尔·阿里夫中尉指挥。

苏加诺总统在印度尼西亚被视为民族英雄，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声望。他本人并不属于某一党派，他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得到以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取得了成功。拥有三百万党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人数上说，仅次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政治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加诺总统和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甚至考虑到在他去世后，把国家权力移交到共产党的手中，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西方社会的不安，也使得军队内部一些高级将领产生了不满。尤其是以雅尼、纳苏蒂安等人为首的一批陆军将领都竭力反对。这样一来，苏加诺总统和陆军将领们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陆军参谋长雅尼公然与苏加诺分庭抗礼，显示出傲慢与不恭。苏加诺虽然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他也知道，雅尼等人的背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1965年5月，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从他领导的情报部门得知，陆军内部有一个“将领委员会”，目的在于抵制总统的政策。他们得到国外势力的资助，准备发动政变，迫使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方向向右转。他们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秘密组成新的内阁，安排国防和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为总理；内阁部长兼陆军参谋长雅尼为第一副总理；陆军总部将领苏普拉普托少将为内政部长；陆军总部将领哈尔约诺少将为外交部长；陆军总部将领准将苏托约为司法部长；陆军总部巴尔曼少将为检察总长。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得知这一情况，总书记艾地和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分别向苏加诺总统作了汇报，感到形势非常严峻。

苏加诺总统在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国庆日的讲话中严厉指责了陆军将领，他说：“昨天是进步的人，今天可能变成退步的、反对进步的人。昨天是革命的，今天可能变成反革命……即使你过去在1945年革命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将军，但如果今天你分裂民族的革命团结，那你就变成了反动力量。”

与此同时，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了热烈称颂，并提出印度尼西亚“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可是，正当苏加诺总统和陆军“将领委员会”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时，他却因心脏病发作而卧床不起，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为此，他忙召回正在苏联和中国访问的艾地。共商对策。

艾地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治局的成员们都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动一场运动来击败“将领委员会”的政变。他们准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来取代现有的内阁，但并没有具体讨论采取什么军事行动。只是打算在军队中下层作一些争取工作，一旦发生政变，这些中下层军官便可能站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边，共同粉碎陆军将领们的阴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翁东中校却抢先行动了。

10月1日凌晨四点左右，翁东中校下令出发。武装部队分乘十多辆卡车和大轿车驶离鳄鱼洞，向雅加达进发。

当车队接近陆军将领住宅区时，这些部队便分成七个袭击小组，奔向不同的目标。他们的战术是，三分之一兵力把守住宅周围的街道，三分之一的兵力包围住宅，其余三分之一兵力进入屋内抓人。

每一位将军都听到一个警卫队员对他说，总统要立即接见他。这样的夜间行动使他们本能地警觉。哈尔约诺将军大声叫喊着：“这是要谋害我，我决不上你们的当！”当几个士兵动手绑架他时，他掏出了手枪。可是没等他动手，一个中士已先开了枪。哈尔约诺痛苦地瘫倒在地，抽搐了一会，便一命呜呼。

在另一座住宅里，班查依丹将军也因拒捕而被击毙。

苏普拉普托、苏托约和巴尔曼将军没有反抗，他们被蒙上眼睛，双手反绑着推上了汽车，迅速拉回鳄鱼洞。

与此同时，人数更多的袭击小组包围了雅尼将军和纳苏蒂安将军的住所。雅尼本人似乎没有怀疑苏加诺要召见他，他对士兵们说：“请等一会，我换上制服就来。”

领头的那个上士说：“没有时间了，你就免了这些俗套罢！”

雅尼十分恼怒，一拳将上士击倒。然后飞快地冲出门去，并把问带上。这时，一个警卫队员用自动步枪对着那扇玻璃门开火。雅尼背后中了七颗子弹，应声倒地，很快就断了气。

最幸运的是国防部长纳苏蒂安。他夫人被外面的骚乱声吵醒，便断定是有人要绑架她的丈夫，起身锁上了通往一楼卧室的门。当军人在外面使劲打门的时候，纳苏蒂安和他的夫人已经通过隔壁的一条地道跑到外面去了。相距几步远就是伊拉克大使的住宅。纳苏蒂安翻过围墙的时候被发现，士兵在黑暗中向他开枪，却没有命中。

纳苏蒂安跳下去落地时，脚踝受了点轻伤。他已经在伊拉克大使馆的地界内。这样，他逃过了这场灾难。这对领导和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人们来说是个严重的挫折。

被捕的将军们没有一个侥幸活下来，他们的尸体被扔到鳄鱼洞村的一口井中。

正当那七个小分队在分别行动的时候，从中爪哇和东爪哇开来的两个团占领了独立广场两侧的国家广播电台和电报大楼，并占领了总统府一侧的指挥阵地。这样，参与行动的部队总兵力就达三千多人。

上午七点刚过一会儿，印度尼西亚国家广播电台就发布了翁东中校的公告。公告中称，他领导的“九·三运动”纯粹是陆军内部的运动，是针对

“将领委员会”的，因为他们已经干出玷污陆军名誉的勾当，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及总统抱有罪恶的企图。“九·三 运动”将坚决执行革命的五大法宝……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0月2日刊载了这个公报，并发表社论说：“‘将领委员会’不论以什么借口发动政变，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反革命行动。”“这个问题是陆军内部的问题。可是我们有政治觉悟和认识革命任务的人民深信是正确的。”

“九·三 运动”领导者掌握的“将领委员会”名单中没有苏哈托的名字。苏哈托是战略后备部队的司令，他的部队担负的是防御马来西亚部队入侵的任务。

大约在清晨五点半，苏哈托从邻居的动静中发现了异常的情况，便亲自驾车开往靠近总统府的战略后备部队司令部。过了一会儿，他从广播中听到了关于“九·三 运动”的消息。接着，他接到纳苏蒂安从伊拉克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叫他大胆地放手去干。

苏哈托无疑是右派将领中的一员。放下电话后，他立即命令西利旺义师的坦克和装甲部队向雅加达挺进。一开始，这支军队的负责人阿吉将军表示，只有在得到苏加诺总统的命令之后他才能这样做。苏哈托告诉他，没有这个必要，所有在“九·三 运动”中被捕的将军们都已被杀害了。这样一来，阿吉将军便改变了立场，调动他的部队开始行动了。

苏哈托接着又召见了由沙禾·埃迪领导的伞兵突击队，把事情经过以及他的意图向他们说明。沙禾·埃迪表示愿意听从他的指挥，由于得到坦克部队和伞兵的支持，苏哈托便处于绝对的优势。

下午三点，他警告来自东爪哇和中爪哇两个营的代理指挥官，如果他们在半小时内不投降，就要消灭他们。这两支小部队经不住威胁，终于投降了。下午五点，装甲部队和伞兵部队开进雅加达，迅速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电报大楼。

但是，空军司令达尼在这之前发布了一则训令，表示支持“九·三 运动”，并宣布他的目的是保卫革命，保卫苏加诺，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颠覆活动。苏哈托决心清除达尼的大本营哈利姆空军基地。

10月2日凌晨三点左右，沙禾·埃迪上校命令他的伞兵部队、坦克和装甲车在空军基地附近进入阵地。一场激战眼看就要爆发。这时，住在茂物养病的苏加诺总统得知形势险恶，便下了一道命令：必须避免流血冲突！这样一来，被围困的空军部队就逐渐瓦解。

10月4日，陆军从鳄鱼洞的那口井中发现了被杀害的将军们的尸体。于是，他们开始大造舆论，指责“九·三 运动”是共产党一手策划的，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要为这一谋杀事件承担责任”。死里逃生的纳苏蒂安将军则咬牙切齿地发誓：“应该立即把他们消灭光！”

10月5日，陆军为这些被杀的将领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后第二天，穆斯林学生便袭击和焚烧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部。然后又冲进艾地和其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的住所，这些领导人事先得到消息，都各自躲藏起来。游行示威的人经过美国大使馆时高呼“美国万岁”的口号。

沙禾·埃迪领导的军队在中爪哇和东爪哇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屠杀。他们将所有拥护苏加诺的共产党人和军官、士兵都抓起来，用机枪扫射。并利用各地区的宗教矛盾，打击在共产党领导下分到土地的农民。在中爪哇，数

以千计的尸体被抛到河流中，再漂入大海。当海潮又把尸体冲到岸边时，这些腐烂发臭的尸体堆积得像一道海堤。据印度尼西亚官方和美国大使馆估计，约有 50 万人在大屠杀中丧生。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在事变发生后，曾指示党的各级组织：千万不要举行拥护“九·三 运动”的示威游行，声明那些都是陆军内部事务，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毫无关系，并表示完全支持苏加诺宣布的任何解决办法。

由于白色恐怖加剧，艾地被迫离开雅加达，转入地下活动。他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势力最大的梭罗和三宝壟之间躲藏了六个星期。这里有一支受过训练并武装起来的工人队伍，可以保证他的安全。但他没有想到，在他的贴身警卫中有一个陆军谍报处的特务。这个人一直在寻找机会杀掉艾地。

11 月 22 日晚，陆军谍报处得到特务送来的情报：艾地离开了他的藏身地，搬到沙姆朋·格德村的一个农户家里。晚上点多钟，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子。艾地藏进一间密室，密室外面放着一个柜子。士兵搜查的时候发现柜子旁边有一双拖鞋，他们把柜子移开。这样，艾地就被发现了。几个小时后被处决了。

人们不禁要问：苏加诺总统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九·三 运动”发生以后，10 月 2 日下午，苏加诺总统在茂物的行宫召开了一次武装部队司令会议。他拒绝陆军要求对共产党人和参加政变的其他人采取镇压措施的建议，坚持认为这些问题应该由他来解决。

第二天上午，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广播讲话，否认空军卷入了“九·三 运动”。他呼吁立刻建立起安定和有秩序的气氛，陆军和空军不要再相互攻击。10 月 6 日上午，苏加诺召开内阁会议，他在讲话中说，他不赞成对将须们的屠杀和成立革命委员会，因为只有总统才有权解散内阁。他建议允许一切报纸出版——也包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人民日报》。他说，以往曾多次发生暗杀他的事件，他总是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次他也并不想报复。

后来，为了削弱陆军的力量，苏加诺对内阁进行了改组，纳苏蒂安被除名，降为国防部统筹部长和陆军参谋长。

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集团对此十分不满，组织了五万多青年学生举行了反对苏加诺的示威游行，并试图攻击总统府。结果被忠于苏加诺的卫队用枪托和刺刀驱散。游行高呼口号，反对让亲共产党的苏班德里约和达尼留在内阁里，反对解除纳苏蒂安的内阁职务。第二天，学生们阻拦汽车，封锁交通，以此阻挠内阁部长们去总统府就职。大街上出现了“审判苏加诺”和“绞死苏班德里约”的标语口号。

3 月 8 日，学生们冲击了外交部。

3 月 11 日，苏加诺在总统府召开新内阁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刚开始，总统收到一张便条，上面说一支番号不明的部队包围了总统府。部长们大吃一惊，苏加诺一言不发，向门口冲去。苏班德里约紧跟在他后面。他们登上一架直升飞机，立即飞往茂物的行宫。

当天，苏加诺被迫签署了命令，向苏哈托移交部分权力。

此后，尽管苏加诺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顽强斗争，但终于被掌握了军权的苏哈托所击败。1967 年 3 月，人民协商会议撤销了苏加诺总统的职务，选举苏哈托为代理总统。一年以后又成为正式总统。

苏加诺最终被软禁起来，直到 1970 年逝世。

(孙化)

皇姑屯的爆炸声

1928年6月4日清晨，一列由北京开往奉天（即今沈阳）的特别快车，徐徐驶出皇姑屯车站，向终点站——小西门外的奉天车站驶去。

这列火车由18节蔚蓝色车厢组成，其中还挂着一节与众不同的车厢，竟是当年清王朝专为慈禧太后准备的花车，让人一看就知道车上载的绝不是普通人。

蔚蓝色列车驶向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陆地天桥。桥下是中国的京奉铁路，中国警卫部队整齐地排列在铁道两侧，背向铁道，严密地监视着周围的动静。桥上是日本人在中国强行修筑的南满铁路，全副武装的日本哨兵紧张地注视着渐渐驶近的列车。正当位于第4节的花车驶入天桥桥洞时，突然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那节花车顿时被炸得粉碎，黑烟腾起有二百米高；列车前半段脱轨翻倒，后半段歪在路旁燃起了熊熊大火。转眼之间，豪华威风的列车成了一片苦海，受伤的人呻吟呼救，活着的人狼狈逃窜……

这辆花车中乘坐的大人物，就是号称“东北王”的张作霖。他被炸成重伤，不治身亡。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根据现场观测，铁桥钢梁被炸塌，水泥桥墩上部炸掉三分之一，至少需要二三百公斤炸药；而且炸药是放置在桥墩上的，爆炸时机掌握得如此准确，显然是采用了电流引爆的先进技术。专家们认为，一个技术熟练的人完成爆炸的准备工作，至少需要6小时。然而，这里日军戒备森严，一般人绝不可能在这里停留6小时而不被日军发现。再说，张作霖从北京返回奉天，行动极端秘密，曾三次改变行期以迷惑外人。但又有什么人能如此准确地掌握这一秘密呢？

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一个目标上——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司令部！

关东军司令部也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

然而，张作霖与日军早有勾搭，双方关系密切，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日军怎么会突然向张作霖下这样的毒手呢？

事情似乎又不是那么简单。

关东军司令部很快就出面宣称，爆炸事件是国民党北伐军干的，日军还在出事地点击毙了两名中国便衣，从他们身上搜出了苏联制造的炸弹和国民党政府下令杀死张作霖的“除奸令”！

皇姑屯爆炸事件成了一个不解之谜。而它所孕育的危机，更直接关系到中日关系和中国东北的命运。为了探究这个不解之谜，我们不能不回顾张作霖所经历的曲折道路。

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自幼游手好闲，16岁就出没于赌场之中，后来又当过土匪，到1903年被清政府收编，张作霖成了清军的管带。善于拉帮结派、望风使舵的张作霖，混到1911年已官至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指挥人马3500多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了拉拢他，封他为陆军中将、第27师师长。张作霖成了奉天省最大的军事实力派。到了袁世凯因复辟帝制陷入困境时，张作霖乘机把袁世凯在奉天的亲信赶走，迫使袁世凯任命他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

此后，张作霖便暗中同日军勾结，利用北洋军阀混战的机会，逐渐掌握了东北三省的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

是变本加厉，用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日军的支持，很快建立起一支包括陆、海、空三兵种的武器精良的军队。而日本军方也希望通过张作霖控制东北三省，甚至进一步控制中国，以达到它们最终吞并中国的目的。

1926年6月，国民党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正式誓师北伐。北方军阀在战场上连连失利，但又不甘心失败，便把张作霖再一次请到北京，拥戴他为“安国军总司令”，同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军相对抗，以继续维持军阀统治。张作霖就乘机向南扩展他的势力范围。

开始，局势对北伐军有利。张作霖不禁有些发慌，已经在做逃回奉天仍然当他的“东北王”的打算。就在这时，广东革命政府中，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分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起消灭共产党的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政变，与蒋介石相呼应。北伐军因此而暂时停滞不前。张作霖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一方面在北方树起“讨赤”大旗，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一方面又派人到南方奔走，向蒋介石宣称张作霖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一直支持“三民主义”，现在愿意与蒋介石共同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问题。可是双方都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而张作霖却趁着北伐停止的机会，组织“安国军政府”，自己得意洋洋地当起了“陆海军大元帅”，也算过过当“国家元首”的瘾。

也就在这时，张作霖同日本军阀的关系开始恶化了。

原来，张作霖在当“东北王”时，为了实现他统治全中国的野心，拼命投靠日本人，只不过是争取日本人支持的一种手段。一旦他进了北京，当上了“安国军总司令”，就同日本人耍开了赖皮，过去答应日本人的种种条件，都一推再推地不肯兑现；同时，他又积极同英国、美国联络，争取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希望借英、美的力量来削弱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在日本人眼里，张作霖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1927年6月底7月初，日本政府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东方会议”，商讨针对中国的政策。会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付张作霖。这次会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日本如果想征服世界，首先必须征服中国；而征服中国首先又必须征服东北。但是在具体对待张作霖的问题上，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外交部主张继续利用张作霖，迫使张作霖听命于日本；而关东军则认为张作霖已成为日本征服东北的障碍，必须消灭张作霖。会后，外交部和关东军便各自按照自己的意见开始行动。外交部派出了一系列外交使臣，向张作霖发动外交攻势，有的威胁，有的利诱，有的恐吓，有的哄骗，把张作霖搞得心烦意乱。张作霖不得不对日本作出一些让步，以个人名义批准日本在东北再修四条铁路。日本方面坚持要签订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协议，张作霖坚决不答应。而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后，东北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英、美等国也指责张作霖给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力。张作霖两面受敌，十分狼狈。更要命的是，蒋介石政府又重新调兵向北进发，张作霖的“安国军”节节败退，战局对“安国军政府”十分不利。

1928年1月，蒋介石政府派张群到日本向日本首相表示：如果日本能迫使张作霖退回东北，他们的军队将不向东北进攻。

日本政府立刻被这个建议吸引了。他们很担心战争打到东北去，使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受到损害。日本外交部当即派人找到张作霖，劝他退回奉天。

张作霖则坚持要同北伐军决战，真正打败了，再退回关外也不迟。

到了这年5月，北伐军已经逼近北京和天津。日本唯恐战火会向东北蔓延，再三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强迫他及早退出北京，返回奉天。5月17日晚，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又会见张作霖，警告张作霖如果打败了，未必能再回到东北去，甚至宣称，日军将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迅速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关东军司令部也从旅顺迁到沈阳。

张作霖此时真是四面受敌，他决不敢真的放弃东北这条退路。无可奈何之下，张作霖屈从了日本的压力，在5月30日下了总退却令；6月2日，又发布了“出关通电”，表示自己将退出山海关，回到东北去。

然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却认为，同张作霖谈判是“无济于事”的，不如干脆把他除掉，免得他碍手碍脚。他们并且希望，张作霖的死能造成东北的大混乱，因为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一定要报这杀父之仇，而张作霖的部下也会发生动荡甚至分裂，这时日军就可以借口保护日本侨民，解除东北中国军队的武装，一举占领东北三省！所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他的高级参谋河本这两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就开始积极地密谋暗杀张作霖的计划。

张作霖大难临头。

东北三省面临着被日本侵占的危险。

村冈司令官原打算派竹下参谋到北京组织暗杀张作霖的行动，因为这样日军比较容易推脱责任。可是河本不同意。他认为，去北京未必能找到暗杀张作霖的合适人员和时机，万一行动失败，打草惊蛇，就绝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所以还是在东北日军能控制的地方进行有把握。他要求竹下参谋到北京后，仔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特别是他回奉天的路线和时间。

同时，为了试探中国、苏联和日本政府对这一事件将会有怎样的反应，河本先在东北搞了几次爆炸铁路事件。果然，中、苏、日的报纸纷纷报道，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侨居东北的白俄罗斯人干的，有的认为是东北军阀之间的摩擦，而没有一个怀疑到关东军头上。三国政府也没有对此作出反应。这就使得河本的胆子更大了。他断定，炸死张作霖后，关东军完全有可能推脱罪责。

接着，河本为置张作霖于死地，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亲自勘察地形，寻找最佳爆炸地点，最后选中了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皇姑屯，因为在这里设置炸药，可以不被外界发现；而张作霖的专车只要出了皇姑屯车站，也就没有再改变车次的可能。接着，河本又精心设计了爆炸方案，并且准备了补救手段，万一爆炸不成功，就使用出轨装置把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翻出轨道，然后由日军敢死队——“拔刀队”的队员冲上去干掉张作霖。最后，河本又指使部下收买了三个吸毒成瘾的中国人，让他们6月4日凌晨到皇姑屯去“送信”，这样，日军就可以乘机杀死他们，将他们说成是炸死张作霖的凶手。

一切都按照河本的计划完成了。一张天罗地网已经布好，只等张作霖来送死了。

但是，日军行动的蛛丝马迹，已被奉天宪兵齐恩铭发现，他拍了份密电报告张作霖，说最近几天皇姑屯附近日军可能在搞什么动作，不许行人通过，请张作霖注意。张作霖没想到日本人会对他下毒手，也就没有认真对待；但他还是故布疑阵，先说6月1日起程回奉天，后来又改为2日，实际上3日才离开北京。

就在张作霖离开北京前几个小时，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又一次拜访了

他，仍然希望能从张作霖手中多得到点什么。张作霖气坏了，在办公厅里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着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都在东北，我不能出卖东北，不能让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条命早就不打算要了！”当时芳泽正在客厅里，听得清清楚楚，急得团团乱转。最后，张作霖草草应付了芳泽一下，就秘密地动身离开了北京。

张作霖再也没想到，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已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

张作霖还在玩他的小花招。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时快时慢，开出皇姑屯车站时，已是清晨5时20分。东北的6月，5点钟已经天亮，河本参谋原先的打算是趁黑夜进行暗杀活动，然而到了此刻，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5时23分，张作霖乘坐的花车车厢进入天桥桥洞，三百公斤黄色炸药准确地炸响了。

张作霖身负重伤。

奉天宪兵司令部齐恩铭匆忙中拦截了一辆汽车，将奄奄一息的张作霖护送到奉天城中的“元帅府”。张作霖浑身是血。医生剪开衣服检查，发现一只胳膊断了，血水不断从脖子下面涌出来。

张作霖闭着眼睛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没了！我不行了，快叫小六子（张学良）来……”

9点30分，张作霖停止了呼吸，终年54岁。

奉天当局为了稳住东北局势，没有立刻宣布张作霖死亡的消息。6月6日，奉天省公署发表通电，说张作霖由北京回奉天时，遇到爆炸，“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元帅府内，依旧秩序井然。张作霖的卧室灯火通明，厨房每天照样为张作霖做饭，医生天天进府为张作霖换药，并发布医疗经过和处方。张作霖部下的官员们礼貌地迎送着“来访”的日本官员；张作霖的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接待着前来表示“慰问”的日本官太太……

关东军一点真实情况都得不到，只得相信张作霖真的只受了轻伤，也就不敢轻举妄动。而这时，奉天当局则在暗中进行紧张的应变部署。张学良接连十多天，故意在北京出头露面，然后于6月17日秘密回到沈阳。20日，张学良宣布就任奉天督办。

6月21日，张作霖的死讯才正式公布。

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东北的局势完全稳住了。张学良顺利地接替了张作霖，完成了这一危机状态下的权力过渡。紧接着，张学良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东北三省也开始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这年12月28日，奉天城头挂起了青天白日旗。

张作霖死了，日本军阀的阴谋并没能得逞。

（薛兵）

教皇的猝死

梵蒂冈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的高地上，面积为 108.7 公顷，比一个高尔夫球场还小，只要花 1 个小时就能漫步梵蒂冈城一周，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却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天主教徒们的总部，圣城梵蒂冈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教皇是梵蒂冈的首脑，拥有最高立法、司法、行政权，被认为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并对所有的天主教会拥有管理权。教皇终身任职，死后由红衣主教团选举新的教皇。

1978 年 8 月 16 日，教皇保罗六世去世。8 月 26 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红衣主教选举产生了新的教皇，他就是卢恰尼。

1912 年 10 月 11 日，卢恰尼出生于意大利克那勒达戈多村一个穷人家，父亲是个普通工人。1923 年，11 岁的卢恰尼来到费尔特里初级神学院就读。他有超人的记忆力，天资聪明。他 17 岁进入了贝卢诺高级神学院。1950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位，成了一名神学博士，并当上了卢贝诺一所神学院的副院长。

卢恰尼身体矮小，和蔼可亲，安详平静，思维却十分活跃。1953 年，约翰教皇任命卢恰尼为维托里奥·韦内托主教。

卢恰尼生活简朴，作风廉洁，他拒绝一切送礼。在欢迎他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对 400 名神父说：“我来时身上只有五里拉（钱币），希望走时也不过如此。”接着，他又说：“亲爱的神父们，亲爱的信徒们，不爱你们便是不幸的主教。我保证做到，为你们服务，为你们出力奉献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他任主教期间，的确是从无闲暇，整天忙于看望病人和残疾人，有时骑着自行车或开着旧汽车出现在山村，与当地神父讨论某些急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卢恰尼十分热衷于宗教改革。在他看来，罗马天主教会应属于穷人。他奉行“贫困教会”的原则，认为教会不应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他从来对个人和教会的财产都是十分冷漠的。

1962 年，卢恰尼经过调查，获悉他管辖下有两位神父与一个倒卖商有些瓜葛，投机赢利数额达二十多亿里拉。于是，他召集了所有的神父来开会，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们有两个人干了坏事，我认为教会必须赔偿，法律必须行使。我们不必以豁免权来遮丑，这是大家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穷人的教会。我们打算卖掉教会的珍宝和一幢房子来赎罪。”

1969 年 9 月 17 日，他被任命为威尼斯大主教。按照惯例，大主教有自备船。但他一如既往，谢绝了一切多余的奢侈品，他奉行的观点是：“教会的真正财产是穷者弱者。他需要的不是偶然的施舍，而是真正的获益。”

不久，卢恰尼的办公室里就常常挤满穷人。他们向他提出各种要求，只要他能办得到的，他一定尽力去办。在他的教区，有一位牧师提高了出租住房的房租，而他的房客是一位失业教师，付不起涨价的部分，牧师就赶他走。卢恰尼得知此事，便立即去劝阻，但这位牧师毫不退让。卢恰尼当时就为教师付了钱，让他继续住下去。

1973 年，教皇晋升卢恰尼为红衣主教。

1978 年 8 月 16 日教皇保罗六世去世。卢恰尼来到罗马，参加新教皇的选举。他压根儿没想到，投票的结果竟是他当上了新教皇。

这个消息传出来，信徒们一片欢呼。

第二天中午，新教皇登上皇宫的中央楼台，向聚集在广场上的二十万信徒发表讲话。教皇希望教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也就是耶稣说的，应该是人类的简朴与诚实。如果耶稣再次降临人世，应该找到一个认可的、不带政治功利的教会。

8月28日，原来将举行新教皇的加冕典礼，但卢恰尼决心先进行教皇制度的改革。他拒绝举行加冕，还取消了为教皇准备的坐轿，取消了镶有红绿宝石的三重冕和鸵鸟羽毛，以及那长达六个小时的仪式。加冕成了普通的弥撒形式。教皇身上的白羊毛披肩，标志着罗马教廷的世俗荣耀已被抛弃，天主教在回归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卢恰尼登上了梵蒂冈的权力顶峰，为了实现自己非凡的梦想，他决心着手解决梵蒂冈最棘手的两个教廷管理处和梵蒂冈银行的问题。这个国家虽小，它的财富却多得难以计算。当然，这些财富不是一天之内积聚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当年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慷慨施舍”。

1929年，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与梵蒂冈签定了拉特兰条约。罗马教廷被确立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必为它的财产和公民交纳任何税款，也不必为进口产品交纳关税。它的外交人士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从这个条约开始生效之日起，意大利即向教廷提供7.5亿里拉，并移交10亿里拉的公债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为了获得更多的同盟者，也于1933年与梵蒂冈达成契约。德国政府确立了教会税，即每年将全国个人所得税的8%到10%交给天主教会。仅1943年一年，梵蒂冈就得到1亿美元的收入。

梵蒂冈不仅将这些钱用来购买军火企业的公司股票，还用来经营纺织业、电话通讯、铁路、水泥工业、电力工业以及从事黄金投机交易，从而大发横财。就这样，梵蒂冈下设的特别管理处就至少掌握了5亿美元，常设管理处拥有6.5亿美元，而梵蒂冈银行的资产远远超过了9.4亿美元。

可以说，梵蒂冈的金融触角已经伸向世界各地。

1968年，教皇任命马尔钦库斯主教为梵蒂冈银行行长，这无疑是等于给梵蒂冈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马尔钦库斯早就与美国黑手党有联系。1973年，黑手党组织伪造了面额达10亿美元的股票，马尔钦库斯以梵蒂冈银行的名义订购了这些股票，黑手党给他1.5亿美元的回扣金。这样，黑手党挣得了4.85亿美元的非法利润。

为了以假乱真，马尔钦库斯又将150万元股票存入苏黎世银行，然后又用大量假股票买下巴斯托吉一家超级公司。美国司法当局派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但由于梵蒂冈是一个独立国家，参与此事的神职人员都守口如瓶，使得调查无法进行下去。

马尔钦库斯有个重要合作伙伴，就是意大利银行家米凯莱·辛多纳，这人是货真价实的黑手党成员。起初，他从巴勒莫的黑市上抢购食品，然后，靠黑手党人的帮助将这些食品私运到墨西哥，在那里高价卖给饥民。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与黑手党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不仅为那些企图逃脱的意大利黑手党人出谋划策，而且还参与贩卖海洛因的走私活动。此后，他从瑞士买下一家银行——日内瓦投资银行，而梵蒂冈在这家银行中占有相当大的股份。辛多纳从银行窃取了大量的钱财。他的办法是，将储户的大笔钱款从他们的帐户上转走，除扣下35%的回扣外，全部由梵蒂冈银行转移到日内瓦投

资银行辛多纳帐上，储户全被蒙在鼓里。万一有哪一位储户提不到需要的钱，经理就会出面向他道歉：“你看出了这特大的计算错误——这些该死的现代化计算机！”

在辛多纳和马尔钦库斯后面，则是一伙原先的法西斯分子组成的代号为P2的秘密组织，主要从事军火走私，参加这个组织的都是一些身居要职的、地位显赫的人物，其中包括梵蒂冈的一些神职人员。

梵蒂冈与黑暗势力勾结从事非法的经济活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密切注意。意大利经济期刊《世界》在给教皇卢恰尼的公开信中写道：“梵蒂冈像投机商一样进行市场交易对吗？梵蒂冈银行帮助意大利资产非法外流对吗？帮助意大利人逃税对吗？”报纸的一位编辑揭露了梵蒂冈与辛多纳之间的勾结，谴责了马尔钦库斯那伙世界上最无赖的金融经济人，包括辛多纳在内的一些银行大亨。还有一位记者在文章中斥责道：“上帝写在钱袋上的是‘死亡的危险’。”

卢恰尼读了这些文章，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他下令国务秘书维洛特立即调查全部经济情况。

维洛特在罗马教廷是个实权的人物，每当老教皇去世，新教皇产生之前，他都起着代理教皇的作用。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尽管他对梵蒂冈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清楚，但由于他从马尔钦库斯和辛多纳那儿得到了不少好处，所以始终保持缄默，不予追问。

然而，卢恰尼从佛罗伦萨那位虔诚的、正直的红衣主教贝内利的口中，得知了不少内幕情况。贝内利的关系网包括一些在意大利身居要职的人物，这些人物揭露了梵蒂冈银行与好几宗违法的金融交易有牵连。如果将这些事情调查个水落石出，马尔钦库斯和辛多纳等人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卢恰尼在对梵蒂冈神职人员的一次讲话中说：“教士应该对每一名教徒满怀同情之心，应该与一切好人平等相待，但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己的权威来打击那些恶棍！”

教皇为人谦虚、和善，处事谨慎，一般不轻易做出决定。但他一旦了解真相，掌握实情，并经过苦思冥想做出决定之后，任何人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他动摇。这位身材矮小的老人就像一头雄狮，开始对邪恶势力伸出了威严的钢爪。

9月，罗马的早秋晴暖宜人，就在一个星期三下午，卢恰尼召来国务秘书维洛特，将自己的几项决定告诉他。

卢恰尼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将马尔钦库斯留在梵蒂冈城内，更不用说留在银行里。教皇通告维洛特：马尔钦库斯必须立即解职，将他派到某一教区当一名助理主教。他的职务将由瓦乔尼·阿波神父接任。

此外，教皇还解除了梵蒂冈银行内许多人的职务。他说他希望梵蒂冈银行断绝与辛多纳等人的一切联系，如果让原来的人士继续掌握梵蒂冈银行，这种联系是断绝不了的。

接着，教皇卢恰尼告诉维洛特本人，他的国务秘书一职将由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贝内利接替。面对教皇的一系列人事变动，起初，维洛特红衣主教不动声色，可是，当教皇说到他的职务将由贝内利接替时，他的脸色陡变，半晌说不出话来。

教皇将自己的笔记本放在一边，问维洛特：“你认为如何，阁下？”

维洛特冷冷地回答：“您是教皇，您有权作出决定。”

教皇依然盯着他：“是的。不过您对此有何想法？”

维洛特耸耸肩说道：“罗马教廷内会有不少人认为，这些变动和任命与已故的教皇愿望背道而驰。”

卢恰尼笑着反问：“难道已故教皇在世时打算作出永久性的安排吗？梵蒂冈城内有些人已经忘记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旨，已经蜕变为不折不扣的市侩，正因为如此，我才打算作出这些人事变动。”

“人们会说你背叛罗马教皇保罗。”维洛特固执地说。

卢恰尼微微一笑道：“他们甚至会说我背叛了教皇约翰，背叛教廷的利益，只要他们愿意，谁都能给我加上个罪名。关键在于，我不会背叛耶稣基督。”

话不投机，维特洛起身离去。

晚餐以后，卢恰尼看了一遍他打算在9月30日耶稣会发表演讲的讲稿。然后拿起那本写有人事变动的笔记本。他走到书房门口，一边开门，一边对两位神父道晚安：“明天见。遵奉上帝的意旨。”

1978年9月29日早晨4时半左右，文琴扎修女给教皇送来咖啡。她敲了敲教皇卧室的门，叫着：“早安，教皇。”可是没有回音。她又敲了一下门，仍旧没有回音。她打开门一看，发现卢恰尼教皇正斜靠在床上，戴着眼镜，手中抓着一一些稿纸，头向一边歪着，龇牙咧嘴露出极其痛苦的表情。修女惊叫起来。

随即，国务秘书维洛特主教来到教皇的卧室。当他看到床头柜上放着卢恰尼治疗低血压的药瓶，便随手把它装在口袋。教皇手中的笔记本也被拿走。维洛特强迫教区成员发誓，决不透露教皇猝死一事。

接着，应召前来的医生给死者作了简单的检查，说教皇死于急性心肌梗塞。

上午6点左右，维洛特决定立即给教皇的尸体涂上海料。他不是不知道，一旦涂上海料，即使解剖也无法确定体内有无毒药。

到了7点20分，维洛特才勉强同意向外界发表布告。他起草的布告内容是这样写的：“1978年9月29日，大约5点30分，教皇的秘书发现教皇一反常规，不在他私人公寓的小教堂里，便去卧室找他，结果发现他在床上死了，灯还亮着。他似乎正紧张地阅读。医生雷纳托·布佐内蒂博士赶到教皇房间，确认了死亡。死亡时间估计在昨晚近11点钟。死亡原因属于‘与急性心肌梗塞有关的突然死亡’。”

报告还说，发现教皇已死的这位秘书是马杰神父，他通常是5点30分开始与教皇一起作弥撒。教皇读的那本书是《效法基督》。

在这份报告里，文琴扎修女早晨4点半左右发现尸体这一至关重要的情节消失了。人们还发现了报告中有许多违背常理的谎言，例如：卢恰尼通常在早晨5点半至7点的时间里喜欢独自冥想和祈祷，说马杰神父5点半见不到教皇而去卧室找他，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教皇的公寓里根本没有《效法基督》这本书。

教皇的突然死亡震撼了世界。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贝内利红衣主教含着眼泪说：“教廷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关键的人。我们感到十分苦恼，感到惊骇。这种事是无法理解的，这是一个限制和制约我们的时刻。”

公众对教皇的死悲痛万分，第一天就有二十万人来瞻仰遗容。他们对教皇是不是自然死亡越来越怀疑。有人透露卢恰尼近期曾做过一次全面体检，

结果是“各方面都很好”。意大利医学专家明确指出，只有通过解剖才能确定死亡的真正原因。西班牙和其它一些国家由争议发展成为公开的辩论。弗朗哥·安蒂科秘书大臣透露，他开始向梵蒂冈首席法官提出起诉，要求对教皇之死进行全面的法律调查。

但梵蒂冈的医生们对是否需要解剖已故教皇绝不发表评论。

10月3日上午7时，梵蒂冈关闭了圣彼得大门。接着，一批医生出现了。事后，梵蒂冈新闻社发表了官方讲话，说医生们对教皇尸体的防腐情况作了一般性检查。

10月4日，近二十万人冒着连绵细雨，在圣彼得广场作了安灵弥撒。在这前四天，近一百万人通过了教皇的尸体旁。最后，教皇的遗体密封在三层分别用柏树、铝和乌木做的棺材内，放进了圣彼得地下室的石棺内，永远地安息了。

从当选新教皇到莫名其妙地死去，卢恰尼在梵蒂冈执政只有33天。他生前曾梦想有一个能够放弃梵蒂冈所有财富、权势和威望的教会，一个回归福音的教会。然而，随着他的死，这种梦想破灭了，消失了。

文琴扎修女不久也被送往北部的一座被人遗忘的修道院内，卢恰尼生前喜爱的秘书洛伦齐被派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所教会学校工作。

1978年10月25日，新教皇产生了，他就是卡罗尔·沃依蒂拉红衣主教。这是一位折衷的候选人。

维洛特再次被任命为国务秘书，马尔钦库斯继续控制着梵蒂冈的银行，辛多纳仍在纽约逍遥法外。而马杰神父则拎着装有几十亿赃款的皮箱，存在瑞士芳纳银行，供黑手党徒们慢慢享用。

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冈方面始终没有就教皇之死组织任何官方的调查，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过，一些勇于伸张正义的新闻界人士，还是私下里作了若干调查。他们发现，梵蒂冈原先的安全防卫设施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穿过那些防卫设施简直易如反掌。任何衣着像神父那样的人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教皇的公寓。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维洛特？马尔钦库斯？辛多纳？马杰？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有作案动机。但却没有人去追究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没有人能惹得起他们。

（孙练）

朴正熙血溅宫井洞

1979年10月26日这一天，南朝鲜首都汉城，天高云淡，秋风送爽。由于已是深秋，天黑得比较早，偌大的汉城早已闪烁起万家灯火。总统府所在地青瓦台，更是灯火辉煌。

朴正熙总统一行抵达情报部宫井洞宴会厅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正好指着18点零5分。

出来迎接朴正熙的，是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和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寒暄之后，几个人同时进了餐厅。朴正熙很喜欢这个地方。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物，外面围墙约3米高，顶端是白色锋利箭头和金属栏杆，墙外戒备森严。园内花木繁茂，中间还有一个绿波荡漾的养鱼池。一切都很安静，服务人员连走路都是蹑手蹑脚的，不敢发出半点声响。朴正熙每次各地巡视归来，总要来这儿吃喝玩乐，以消除疲劳。

朴正熙今天在来宫井洞之前，实在没有痛快过。清晨，他离开青瓦台，前往忠清南道唐津郡，出席插桥湖落成典礼，为防潮堤剪彩。典礼搞得热烈而隆重，宾客很多，对朴正熙来说，不过是一种形式，一种象征性的行动罢了。他心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奋。接着就是参加插桥湖纪念塔揭幕式。开始，朴正熙面带微笑，电视台的摄像机对准了他。当他拽动揭幕的绳索时，偏偏纪念塔上的罩布仅仅揭开了一半，真让人扫兴。朴正熙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于是，他匆匆地和参加揭幕式的官员和议员一一握手，便乘直升飞机离开了现场。

朴正熙乘直升飞机飞往道高温泉观光宾馆，打算在那里吃顿午饭。不料直升飞机在宾馆的前院降落时，又无辜地伤害了一条生命。原来这温泉观光宾馆是个避暑旅游胜地，宾馆为增添野趣，饲养了一些驯良可爱的动物，以供旅游者逗趣玩赏。当朴正熙的直升飞机降落时，发现发动机的巨大噪声和螺旋桨卷起的狂风，使一只从未见过这种“怪物”的獐子惊恐万状。它狂蹦乱跳，左冲右突，最后跌撞而死，看来怪可怜的。宾馆负责人再三向朴正熙道歉。朴正熙虽说没什么责备，但心里总有些不愉快。

就在朴正熙吃完午饭将要离开时，第三个事故又发生了：直升飞机出了故障。驾驶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排除了故障，但终究是耽误了朴正熙归途的时间。

接二连三的不祥之兆，使相信迷信的人认为，今天对于朴正熙来说，恐怕不是个好日子。

朴正熙一行于13点30分抵达青瓦台，到这时，他的心情才稍为轻松一些，总算是平安地回到他的官邸了。

朴正熙哪里料到自己已死到临头！下午16点钟，总统警卫室长车智澈给金载圭打电话说：“您是金部长吗？今晚总统阁下要在宫井洞餐厅和您共进晚餐，望您准备一下。”金载圭一听大喜，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个刺杀朴正熙的计划已在他脑子里迅速形成。

金载圭为什么要刺杀朴正熙呢？这事说来话长。这金载圭和车智澈一样，都是朴正熙的亲信。54岁的金载圭精明能干，一生大部分时间干情报工作，被认为是情报专家。他和朴正熙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关系非同一般。到军中服役后，他始终追随朴正熙。朴正熙上台后，把他看成左膀右臂，对他委以重任。1968年至1971年，他任命金载圭为陆军保安司令。1976年又

让他出任中央情报部部长。

金载圭主持中央情报部后，由于情报部名声很臭，他尽量限制它的过分活动。他自己也不像前几任部长那样飞扬跋扈，横行霸道，而是尽量少出头露面。据说，当时美国政府对朴正熙越来越不满，乃至失去了最后的信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向金载圭透露了美国政府的不满，但对金载圭的政绩却表示赞扬。

金载圭仗着有美国支持，便恃宠无恐，开始抑制朴正熙的内外政策。金载圭代表了朴正熙集团内部“稳健派”的主张，强调从修补现行政策着手，采取较温和的方法，缓和内外的不满和反抗。金载圭自恃与朴正熙是老同乡、老同学、老战友，因而坦率直言，慷慨陈词，结果引起了朴正熙的猜忌和不满。从此，金载圭的地位逐渐为车智澈取代，总统侍从室开始凌驾于情报部和军队之上。车智澈成为地地道道的南朝鲜第二号人物，朴正熙的接班人。

车智澈其实是个不学无术的大老粗，小学毕业后再没受过教育，也没有政治经验。但他有一手好枪法，被朴正熙看中，从1974年8月起任总统警卫室长。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秘密场所，这个剃着光头的彪形大汉总是紧随朴正熙身后，形影不离。车智澈4年效忠的结果，换来了朴正熙的格外宠爱和绝对信任。这一来，车智澈已不满足于只当那有职无权的“家奴”了。他下决心插足政治，锄掉朴正熙身边的重臣。

车智澈先把当了8年总统府秘书长的金正濂赶出青瓦台总统府，又控制了守卫部队和空降兵特种部队，还把陆军总参谋长郑升和管辖的首都警备队的指挥权夺了过来。郑升和虽身为陆军总参谋长，却调不动汉城部队的一兵一卒。眼下，最后一个对手金载圭也不受朴正熙信任了，而车智澈则是无事不管，无事不问，把政策建议和人事任免大权抓在自己的手中。任何人要见朴正熙都要通过他。即使是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不经他准许，也见不到朴正熙。金载圭就更不用说了。

三天前，即10月26日，金载圭获悉准确情报，南朝鲜五大城市29日将掀起比16日示威游行规模更大的反朴正熙浪潮。16日那天，釜山市工人、学生、职员和市民的示威游行队伍袭击市政厅和执政党党部，捣毁了警察所，烧毁警车，还用自制枪支、燃烧瓶攻击军警。金载圭明白，比16日示威游行规模更大意味着什么，于是驱车直奔青瓦台向朴正熙汇报。不料被车智澈挡了回去，说：“对不起，总统没有传见你，我不能让你进去。”

金载圭历来不把车智澈放在眼里，但事关重大，只好强压怒火，说：“你立刻去通报总统阁下，我有重要情报。”车智澈鄙夷地说：“过时的情报吧？”金载圭拔脚就往里冲，正在这时，车智澈的身后传来了朴正熙的斥责声：“成何体统，都跟我进去说！”进到屋里，朴正熙阴沉着脸问他：“什么事啊？”金载圭报告说：“总统阁下，有情报证实：10月29日全国五大城市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朴正熙不动声色地问道：“你有什么措施、方案啊？”金载圭一咬牙，决心直言面谏：釜山事件是由于对维新体制的反抗、政策的不信任以及物价飞涨、增税的不满而引起的，这一情况可能波及全国各大城市。所以应从根本性的政策方面采取措施。

朴正熙听完金载圭慷慨陈词后，提高声调问道：“就是你说你赞成在野党的政见罗？”金载圭默言以对。朴正熙拍着桌子大发雷霆说：“谁敢闹事，格杀勿论！如果再出现类似釜山的事态，我就下令开炮，像当年拿破仑一样，让他们全部暴尸闹市！”车智澈在一旁火上加油，附和着道：“柬埔寨杀了

300 万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杀他一二百万示威者，看他们怎么样……”

金载圭怒视一眼车智澈，继续对朴正熙说：“总统阁下，高压政策如筑堤拦水，不如疏浚水道，缓和矛盾，否则……”朴正熙勃然大怒说：“放肆！今年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新民党议员的集体辞职，釜山、马山的市民暴动……都是因为你事前毫不知晓，事后又不能坚决镇压造成，你的情报部都是干什么的？”

朴正熙驳回了金载圭的建议，声色俱厉地责骂金载圭的无能。金载圭只得忍气吞声，悻悻地离开了总统府。他走后，朴正熙颁布戒严令，动员大批军警，镇压人民和在野的民主人士，授权车智澈起草改组内阁计划，准备拿出他“舍车保帅”的拿手好戏。车智澈当然领会主子意图，大笔一挥，就把金载圭、金桂元一笔勾销了……

金桂元了解到车智澈改组内阁的计划，很快告诉了金载圭。他知道能够改变计划的只有金载圭一个。金载圭听这消息后，深感自己同朴正熙、车智澈的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除了置对方于死地之外，别无其它选择。他又想到美国国防部长布朗透露美国想“换马”的暗示，他于是下决心干掉朴正熙和车智澈。

就在金载圭接了车智澈的电话，知道朴正熙要来宫井洞吃晚饭的消息后，金载圭立即打电话给陆军总参谋长郑升和，请来宫井洞吃晚饭。他电话中没告诉他朴正熙要来的事。接着，他又给中央情报部次官金正燮打了个电话，说：“今晚我已约定与郑参谋长在宫井洞办公室里晚餐，可是由于总统阁下光临，我不能相陪，望你代我陪郑参谋长进晚餐，待总统阁下离去后，我马上去相陪。”随即他找到了自己的几个亲信，作了一番交代。就这样，金载圭以最快的速度作好了刺杀朴正熙和车智澈的安排。

此时，中央情报部的餐厅里，宴会的气氛正热烈。两名艺妓弹着吉他，软绵绵的琴音，使餐厅里的一切显得格外柔和轻松。金载圭表面若无其事，陪着朴正熙和车智澈谈话说笑，但心里却像拉开了弓，绷得紧紧的。

朴正熙的 5 名贴身警卫，在朴正熙、车智澈进入餐厅后就由中央情报部部长随行秘书朴兴柱接待，安顿在会客室。因为职责的原因，警卫人员要分班进餐。金容太、朴相范和金镛燮三人先到和餐厅相连的厨房吃饭，会客室里只留下警卫处长郑仁炯和副处长安载松二人听候差遣。朴兴柱一反常态留在会客室和他俩聊天。

18 时 55 分，金载圭第一次离开座席，来到厕所，随后又观察了周围的动静。5 分钟后返回餐厅刚坐下，车智澈正在那里指责情报部的无能。金载圭怒火中烧，但强忍着，心里在骂：“浑小子，你离死不远了！”

19 时 10 分，金载圭借故第二次离开餐厅。他快步来到距餐厅 50 米远的办公室，见到了如约而来的郑升和，金正燮正陪他吃饭。金载圭以抱歉的口吻对郑升和和金正燮说：“我正在同总统阁下吃饭，望二位稍等片刻。”接着又补充说：“我吃完饭后，马上就来，请二位务必等候。”

金载圭在返回餐厅途中，召见了他的两个助手：中央情报部礼宾处长朴善浩和自己的随行秘书朴兴柱。他对两人说：“国家沦亡，我们也无法生存，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今天我要干掉他们，你们听见第一声枪响，便立即解决他们的警卫员，明白了吗？”

一听这话，朴善浩和朴兴柱颇感突然，有些迟疑。金载圭接着说：“这

里有郑总参谋长和情报次长，你们怕什么？”朴善浩和朴兴柱一听这话，心想既是手握军权的郑升和已参与，我们怕什么？便表示愿意死心塌地执行计划。

朴善浩想了想，向金载圭提议说：“总统阁下的警卫员有5名之多，另找机会怎么样？”金载圭说：“你们挑选三名精明强干的人来支援我，今晚我要把他们全部干掉！”朴善浩提出要求说：“那请给我们30分钟的时间。”金载圭点头答应，叮嘱说：“准备完毕，马上通知我。”

朴善浩和朴兴柱两人领命，分别找随行警卫李基柱和司机柳成玉布置任务。朴善浩负责解决在会客室的郑仁炯和安载松；朴兴柱带领李基柱和柳成玉来到了厨房的后面，钻进停放在那里的轿车，伺机干掉厨房里的金容太、金镞燮和朴相范。

金载圭布置完毕，回餐厅就坐，只见席上气氛轻松，朴正熙和车智澈、金桂元边看电视边说话。

19点33分左右，餐厅厨房长南孝周端着酒肴走进餐厅，将酒肴一一放好后，走近金载圭说：“朴处长要见您。”

金载圭第三次走到餐厅的一个房间，朴善浩低声报告说：“都准备好了。”金载圭满意地点点头，再次提醒朴善浩，以厅内的第一声枪响为讯号。然后，他疾步来到二楼他的办公室，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枪，插入右腰，用外衣包好，再次回餐厅就座。

金载圭坐稳后，突然语气强硬地对朴正熙说：“阁下搞政治要顾全大局啊！”接着又指着车智澈：“您带着这种废物搞政治，能搞得好吗？”说着，从腰间拔出手枪朝车智澈就是一枪，然后站起来朝朴正熙打了一枪。

开第一枪时，金载圭只是坐着，没来得及瞄准，子弹只是钻透了车智澈的右手腕。车智澈到底是军人出身，他随即本能地就地一滚，趁金载圭朝朴正熙开枪之际，站起来逃到厕所躲避。坐在首席的朴正熙被第一枪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没来得及躲闪，就被金载圭的第二枪击中胸膛，子弹穿身而出，身子倒向左侧，伏在一个艺妓的膝上。朴正熙哎唷哎唷地呻吟着，两名艺妓惊慌地扶起倒下去的朴正熙，用手掌堵住鲜血直涌的前胸和后背伤口，问道：“阁下，怎么样？”朴正熙闭着眼，忍着疼痛说：“我没有关系。”说着耷拉下身体。

这时，金桂元已冲进餐厅。

餐厅里枪声一响，说时迟，那时快，朴善浩提着手枪一个箭步窜入会客室，郑仁炯和安载松还没来得及掏出手枪，就被朴善浩击毙。在厨房后门口轿车里等待行动的朴兴柱三人，听到餐厅里传来枪声，打开车门，冲到厨房，不容分说就朝厨房里射击。朴正熙贴身警卫金容太、金镞燮毙命，朴相范身受重伤，跌倒在地。

再说金载圭将朴正熙打倒后，再次扣动扳机朝逃向厕所的车智澈开枪，可是，手枪恰恰这时卡壳了。金载圭把枪扔在地上，跑出餐厅，在花园里遇到了朴兴柱，朝他喊道：“快把枪给我！”可是朴兴柱的子弹打光了。金载圭正要返回餐厅，恰好遇到从会客室跑出来的朴善浩。金载圭上前夺过朴善浩手中的左轮手枪，再次跑回餐厅。

躲在厕所里的车智澈，见餐厅久无动静，以为金载圭已经离去。他跑出厕所，一边跑一边喊：“警卫员！警卫员！”真是冤家路窄，他刚跑到餐桌前便与冲进餐厅的金载圭相遇。车智澈慌不择路，转身窜进餐厅的角落，躲

在一个橱柜的后面。金载圭举枪射击，子弹穿透厨柜击中中年智澈腹部，车智澈惨叫一声，扑倒在地。金载圭绕过餐桌，发现朴正熙还没咽气，就把手枪抵住他的头部开了一枪。这家伙的身体抽搐了一下，便一命呜呼了。

两个艺妓惊恐万状，怕金载圭杀红了眼，连她们也干掉，便连忙放下朴正熙，分头逃走。她们躲过了这场灾难，成为这次刺杀朴正熙的现场目击者。

朴善浩取来了一支 M16 自动步枪，分别向倒地的安载松补了一枪，向郑仁炯补了两枪。然后，又来到厨房向倒在地上的金容太、金镛燮和朴相范进行扫射。受了重伤依然倒地的朴相范却没中弹，侥幸得生。最后，朴善浩来到餐厅，发现车智澈尚未咽气，仍在呻吟，又朝他补了两枪。金载圭出屋时还没来得及穿鞋子，此时仍赤着脚，他衬衣上满是鲜血，再次从餐厅里跑出来，在门口遇上金桂元。金载圭说：“我说干就干，现在已经全部结束了。”金桂元急促地问：“这个场面可怎么收拾？”金载圭说：“你说总统阁下因过度疲劳昏倒了就是。”

金载圭急急忙忙地跑向郑升和和金正燮吃饭的地方，一边高喊：“车在什么地方？把那个房间的客人接出来！水！水！水！快拿水来！”他的警卫闻声端了水来，他接过一饮而尽。

金载圭一把抓住郑升和的臂膀说：“参谋长！发生大事了！”不等郑升和开口，便把他拉向门口，推他上车。郑升和见金载圭神色慌张，大汗淋漓，浑身血迹，而且又赤着脚，莫名其妙，忙问：“发生了什么事？”金载圭说：“快上车吧，上车后再说。”郑升和满腹狐疑上了车，坐在金载圭专车的后座中间。金载圭上车后坐在他的右边，郑升和左边的是金正燮，朴兴柱侧坐在司机旁的前座。

郑升和似乎感到受了挟持，他追问金载圭发生了什么事，金载圭只是说：“出了大事。”小轿车飞快地向中央情报部总部所在地南山奔驰而去。郑升和一再追问究竟出了什么大事，金载圭伸出右食指一弯，做了个狙击的动作，示意朴正熙已死。郑升和急问道：“总统阁下死了吗？”金载圭答道，“肯定死了。”郑升和再没作声，内心却盘算着：总统毙命已是既成事实，杀总统的金载圭身为中央情报部长，拥有巨大的组织力量和权势，其背后又有美国作后盾，他无疑是新的铁腕人物。权衡利弊，郑升和要下决心协助金载圭，想法设法让他成功，使他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郑升和问金载圭：“往哪儿去？”

金载圭回答说：“到情报部去。”

郑升和考虑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万一需要动用武装力量，指挥起来方便，能够得到保护，就建议说：“还是到陆军本部去。”金载圭同意了。

20 时 05 分，他们到达陆军本部地下室。郑升和立即通知国防部长官、参谋联席会议主席、海军、空军参谋长和“美韩联合军”副司令等军队要员，来陆军本部开紧急会议。

再说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与金载圭碰了照面后，他再次进入餐厅，让人把朴正熙的尸体搬进轿车，送往汉城地区军医院。他一再叮嘱下属，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许看尸体。之后，20 时 15 分，金桂元回到青瓦台，电话通知国务总理、部分内阁成员到青瓦台来 20 时 45 分，总理、各部部长来到青瓦台。金桂元说：“总统阁下已故。”来人大吃一惊，一再追究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金桂元没说出真相。

21 时 10 分左右，军队要员也来到陆军本部郑升和地下办公室。国防部

卢载铉询问金载圭是怎么回事。金载圭不说出详情，只说：“总统阁下已经死了，这是肯定无疑的，赶快宣布戒严，维持治安要紧！”卢载铉坚持要把金桂元叫来。

电话打到青瓦台，金桂元不知陆军本部事态发展情况，拒绝前往。相反，他要卢载铉带军队要员去青瓦台。双方僵持不下。金载圭夺过电话，对金桂元说：“大哥，到这里来吧，事情已结束了，上那里干什么！大家都在这里，你陪总理、部长们一起来吧！”

金桂元这才放心前往陆军本部。

20点30分左右，朴正熙的亲信、军内强硬派代表人物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接到国防部长要他不用换装立刻前来的命令。他来到陆军本部地下室，研究了情况，并通过汉城地区军医院院长确认朴正熙已毙命后，就在陆军本部自己另立临时指挥部，包围卢载铉和郑升和。

22时40分，按照崔圭夏总理的指示，在国防部会议室召开国务会议。崔圭夏和部长们强调宣布戒严应有能够为国民谅解为理由，以此逼迫金载圭说出朴正熙被杀的死因。金载圭大叫道：“总统是我杀的，我的后面有美国！”顿时，场内空气紧张起来。金载圭接着说：“两三天不公布理由又何妨？”总理崔圭夏和部长们都哑口无言。

这时，金桂元从内阁成员的态度中，感到金载圭举事难以成功，就把郑升和、卢载铉叫来，把金载圭刺杀朴正熙的经过和盘托出。卢载铉听到金载圭在杀车智澈时把总统也杀了，加上自己所处的形势，只好下令逮捕金载圭。郑升和见风使舵，同意把金载圭看管起来再说。关键时刻，郑升和的动摇使金载圭的计划全盘失败。

郑升和回到陆军本部后，命令汉城陆军部队全部出动，把守各个要冲，随后指示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和宪兵总监金晋基逮捕金载圭。全斗焕接到命令后，立即派金晋基带10名要员去国防部，将金载圭从国防部会议室骗出。金载圭刚一上车，就被宪兵的手枪抵住脑袋，随后，他被缴去手枪，戴上手铐。此时，是第二天零时40分左右。

1979年12月4日上午，南朝鲜汉城军事法庭审判长金永先中将，宣布对金载圭、金桂元等人的第一次公审开始。参加公审的除了由31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外，还有60名南朝鲜及世界各国的记者、40名家属和200多名旁听者。许多律师是自愿报名免费为被告辩护的。在法庭上，律师团发言人金济亨强调说：“这次事件是韩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这次审判的公正与否将决定着政治的方向和民族的前程。因此，我们认为照着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法律来公审是不妥当的，应该由历史来审判，人民来公审……”

照理说，替枪杀总统的罪魁祸首辩护，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弄得不好自己也成为历史的罪人。何况还有来自军方的一连串警告和威胁。但被告的律师们不畏强权，据理力争，这在南朝鲜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即使在国外也是罕见的。朴正熙的不得人心可见一斑。在义正辞严的律师面前，政治上无知而又反应迟钝的军事法官们，狼狈不堪再也无词应付了，只好宣布暂停公审。

12月8日，第二次公审又开始了。双方激烈的争论使审讯暂停了三次。军方安插在旁听席的特务，大声叫嚷要把律师赶出门外。对此，律师们一哄而起，叫他们出来辩论辩论。顿时，审讯现场陷入一片混乱……

再说陆军总参谋长郑升和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后，向军内“强硬派”开刀，

准备逮捕全斗焕以及一些中坚分子，彻底铲除朴正熙在军内的势力。全斗焕得悉郑升和的清洗计划后，抢先一步行动，于 12 月 12 日发动“肃军”政变，调动武装部队进入汉城，逮捕了郑升和等第三军将领 40 余人，击败汉城城防部队。次日凌晨 1 点，政变部队包围了所有的政府官邸，控制了广播电台和报社，“肃军”政变成功。全斗焕依仗军权与谋术登上了总统宝座，成为继朴正熙之后又一个独裁者。

全斗焕等人眼看公开公审已无法进行下去，就不顾法律程序，指使汉城军事法庭于 12 月 20 日，宣判金载圭、金桂元、朴善浩、朴兴柱等 7 名被告死刑。军事法庭只用了 19 分钟宣读判决书后，就草草收场。

12 月 27 日至 28 日，金载圭等人向高等军事法院申诉。1980 年 3 月 6 日，全斗焕下令枪决朴兴柱。他故意让同金载圭关系密切的中央情报部的人去执行，但遭到了拒绝。全斗焕恼羞成怒，命令他的手下人乱枪打死朴兴柱。接着全斗焕又准备枪决金载圭等 6 人。

然而，残酷的斗争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激励着人民的斗志。年初以来，南朝鲜学生和宗教界人士掀起了对金载圭等人的救命运动，这个运动是金载圭等人的家属首先发起的。1 月 30 日，金大中、金泳三等著名反对党的领袖在会晤中，一致决定要阻止军方处决金载圭等人。

与此同时，以学生为先导的反独裁、要民主的斗争很快席卷了整个南朝鲜。工人和农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也起来了。金大中的家乡光州市人民举行了震惊世界的“光州起义”。全斗焕在调兵遣将镇压光州人民的同时，在 5 月 24 日，下令绞死了金载圭等人。

继承朴正熙衣钵的全斗焕，靠残酷的镇压手段并没能在总统的宝座上坐多久，他被迫下台后，带着老婆去一座深山寺庙里当了和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便是后话了。

（贺兰）

蒋经国上海“打虎”记

1948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军事上，蒋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仅1947年一年，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152万人；东北、山东、陕西的大片土地获得解放；济南、长春、锦州、沈阳等战略要地也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经济上，国民党又面临着财政崩溃危险。1947年的军费开支高达100万亿“法币”，而这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仅17万亿“法币”，照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的话说，亏空的83万亿“法币”“全靠印刷机来弥补”。财政部在上海有5家大印钞厂，一分钟可以印制“法币”1600万元，日夜不停地开机印刷，仍然赶不上需要，又到英国、美国去印，用飞机运回来，就立刻投入流通渠道。滥发钞票的结果，必然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再加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索贿受贿，奸商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弄得全国老百姓无法生活。有的编出顺口溜来唱：“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到结果，百姓死完；你做你捞，我做我捞，捞到临了，地无寸草……”

在这样的困境中，蒋介石一再想方设法，挽救危局。他避开军事、经济大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提，认为只要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同时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投机倒把，就能挽救危机，挽回民心，巩固蒋家王朝的统治。

于是，就有了蒋经国临危受命，在上海“打虎”这一段故事。

事情还得从“法币”说起。“法币”就是法定货币的意思。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由过去的使用银元与制钱，逐渐过渡到使用钞票（纸币）与铜元。但发行钞票的银行很多，所以市面上流通的钞票很混乱。蒋介石取得国民政府领导权后，一直想推行法定货币，统一币制，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这样，在经过多年筹划之后，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11月3日宣布，以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一百元“法币”折合美元29.75元。第二年又规定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这样就形成了四大银行统治中国货币体系的局面。

“法币”开始行使时，信誉还是比较好的，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总额只有14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间，因为军费开支和物价飞涨，发行额增加到5000亿元。从1946年3月到1947年4月，蒋介石为了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将“法币”发行额陡增至16万亿元以上。最后，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倍，而物价上涨高达3492万倍！据当时人记录，一斤茶叶要80万元，一顶单人蚊帐和一条草席就要1290万元，一市两黄金要值“法币”五亿元以上。老百姓上街买东西要用麻袋装钞票！

蒋介石政府也知道“法币”已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以想发行新的一种钞票，来重新稳定金融危机。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是翁文灏，财政部长是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是俞鸿钧。蒋介石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王云五立即提出了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建议。他的办法是以政府的行政手段来收兑或收存全国人民所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换给“金圆券”实行管制经济。在行政院下设“全国经济管制委员会”，另在全国若干“管制区”，由“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执行这项工作。

王云五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1948年7月，蒋介石在莫干山避暑时，专门把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等人找到山上，商讨币制改革的方法。蒋介石表示，王云五的“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在场的人也就不敢反对，纷纷表示赞同。蒋介石又问，现在赶印新钞票能不能赶得上8月份发行？俞鸿钧回答说，新印钞票来不及了。不过，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曾在美国印钞公司订印过20亿元林森头像的钞票，都是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的小额票面，运到国内时由于物价高涨已不值钱了，所以一直没有再发行。林森像的钞票在国内没有发行过，现在正好作为“金圆券”来用。蒋介石认为很好，让大家做好准备。不久，国民党开中央常委会时，通过了这一方案。8月19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发行“金圆券”，并规定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币，应在限期内兑换成“金圆券”，黄金每市两可兑换“金圆券”200元。白银每市两兑“金圆券”三元，银币每元兑“金圆券”二元；美元每元兑“金圆券”四元；过期不兑的，一律没收。

当时，上海是蒋介石政权发行“金圆券”，掠夺人民金银、外币和实行管制经济的中心。所以在8月21日，蒋介石又下令派俞鸿钧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而派他的大儿子蒋经国去“协助督导”。同时，蒋介石又发电报邀请上海的党、政、军、金融、经济各界的头面人物到南京开会，要求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白银、外汇，否则就要严厉处置。

在这个背景下，蒋经国来到上海。名义上他是俞鸿钧的副手，实际上俞鸿钧正忙于在全国推行“金圆券”，上海完全由蒋经国独当一面。蒋经国也雄心勃勃，他在日记中写道：“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干下去。”他向蒋介石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愿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

一到上海，蒋经国就向上海的富商巨贾下了最后通牒，他在题为《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中大声疾呼：“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自己的手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把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与此同时，蒋经国调兵遣将，把他的秘密组织“中正学社”的成员纷纷召到上海，决定以原“勘乱建国总队”的成员为核心，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吸收各阶层、各行业的青年参加。在短短的时间里，蒋经国便选拔出12339名青年，分为20个大队，配合军队、警察、宪兵，对大上海实行经济管制。他们搜查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审查帐目，查封仓库、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带头交出黄金、白银、外汇换取“金圆券”；并且严格规定所有商品的价格，必须保持在8月19日的水平上，不许涨价。

蒋经国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叫“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意思是与其整一大批人，不如狠整个别大人物。他的心腹干将王升担任“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总队长，根据蒋经国的意图，王升也喊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表示要“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蒋经国“上海打虎”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9月11日，蒋经国也学着他父亲的办法，在上海请各界头面人物吃饭。但他的态度要严厉得多，尤其是对大人物，他更是不客气。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吓得不敢露面；联合银行总经理戴立庵找了保人才得回家，并被规定

不许私自离开上海；上海银行公会主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李馥荪，打算由各个银行凑足一千万美元应付一下，结果惹得老蒋大发雷霆，蒋经国对他更是声色俱厉；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吓得偷偷乘飞机逃到香港去了；上海农商银行总经理梅哲之，在抗战时同日本人关系密切，蒋经国对他拍桌大骂，逼他交出金银美钞来。杜月笙、荣尔仁、刘鸿生等一大帮头面人物或实业家，也被蒋经国逼得很紧。十月份，蒋经国还组织了“上海十万青年大检阅”的活动，先在兆丰公园集会，听蒋经国发表演说，然后举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

为了杀鸡吓猴，蒋经国真的使开了铁血手腕。

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在上海滩有后台，有背景，他利用职权泄露经济秘密，串通商人搞股票投机，牟取暴利，被蒋经国的部下侦破，人赃俱在，当即判了死刑。同孙中山之子孙科关系密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私套外汇，被判处死刑。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尼亚、稽察处第六大队长戚再玉等因贪污舞弊，被判死刑。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搞股票投机，被判八个月徒刑，后改为罚款；杜家的管家、米商万墨林由于粮食贷款舞弊案被扣押。此外被关罚的大商人、大实业家达到60多人。在这种高压下，蒋经国做到了把物价稳定在8月19日的水平上，同时在一个半月内收兑黄金、白银、外汇等共值三亿七千多万美元。一时间，蒋经国的权威迅速建立起来了，外国记者把他形容成“中国的经济沙皇”。恨他的中国人把他比作清代的雍正皇帝，老百姓则把他当成“打虎英雄”、“包青天”！

蒋介石也大为高兴，并且把“金圆券”的发行量从最初的20亿元一下子提高到200亿元。

然而，经济局势并不是单凭政治权力就可以完全控制的。“金圆券”的信用只体现在政府的文件上，并没有在市场流通中反映出来，所以真正掌握着商品的人，仍然是抱观望态度的多，他们尽量多保留商品而少收入“金圆券”；同时在政治高压下稳定的物价，也打击了商人们的经营积极性。结果物价虽然没有上涨，但市面上的货物却越来越少。少数财大气粗后台硬的奸商，不但自己仓库里的货物不拿出来卖，还派人到市面上抢购货物，囤积起来。这样一来，小商人进不到货，店里越来越空，老百姓拿着“金圆券”买不到东西，对“金圆券”的信誉也就发生了怀疑。黑市上的“金圆券”对美元的比价也就逐渐下跌。

面对新的危机，蒋经国亲自组织了5600个骨干分子，向全市各行各业实施物资总检查。

这一查，查出了一只名副其实的“大老虎”，他就是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的母亲，就是宋美龄的妹妹宋霭龄，他同蒋经国算起来是姨表兄弟。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孔家排在第三，仅次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孔令侃在上海办了一个扬子公司，囤积了大量大米、百货、药品、钢材、呢绒、棉布、汽车配件等等，他拒不拿出来销售。蒋经国发现后，一边全部查封，一边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情况。顿时，全上海、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住了“扬子公司案”，看蒋经国怎样处置他的这位富可敌国的皇亲国戚。

蒋经国决心拿孔令侃开刀。他在日记中写道：“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于是他下令加紧清点扬子公司仓库的存货，准备全部没收。

孔令侃没想到蒋经国会同他玩真格的，加上外界压力太大，他有点沉不

住气了。孔令侃先是去请上海市长吴国桢出面调解，然而吴国桢老奸巨猾，他才不肯在蒋家和孔家的冲突中乱掺合呢。他找个借口，轻轻地推托掉了。孔令侃急中生智，跑到南京，搬来了他的姨妈宋美龄。

宋美龄虽不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但平时两人的关系不错，几乎从来没有红过脸。特别是蒋经国的亲生母亲死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后，宋美龄待蒋经国如同亲生，蒋经国也很尊重这位后母。可是这一回，尽管宋美龄一再劝解，蒋经国仍然不肯松口。他坚定地认为，这不仅仅是关系到他们两家的私事，更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

宋美龄无可奈何，只得动用最后一张王牌，向正在北平忙于军事大计的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上海的意外情况。

蒋介石立即给蒋经国发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他“且慢行事！”

蒋经国立刻明白了这是宋美龄的花样，于是也向北平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告诉蒋介石：“慢则生变，慢则倒台。沪人怨声载道，500万人抢购势如狂潮，金圆券岌岌可危，经济管制毁在旦夕！草草收场，百姓遭殃。”

蒋经国没有夸大危机，此时上海的抢购风潮已经势不可挡，人们提着“金圆券”就像提着一团火，见到什么买什么，连棺材和寿衣都被人抢购一空！

蒋介石见双方相持不下，只得亲自乘飞机赶来上海。可他一下飞机，就被宋美龄和孔令侃接到了孔家。宋美龄一再向蒋介石强调，蒋家和孔家不是一般的关系，损害了孔家的利益，也就是损害了蒋家的利益。孔令侃又以公布蒋家在美国的财产数字相威胁。蒋介石权衡利弊，终于决定袒护孔令侃。第二天，他召见蒋经国，批评他办事太过火；又公开宣布扬子公司储存的货物不属于“日用必需品”，不在查禁范围之内。

蒋经国垂头丧气，向等待消息的他的亲信们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然后再为国尽忠了。”

孔令侃这只天字第一号的“大老虎”逍遥法外，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运动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蒋经国凄凄惨惨地发表了一个《告上海市民书》，表示对上海人民的歉意，灰溜溜地离开了上海。

被捕入狱的60多个富商被释放了。

紧接着，翁文灏倒台，王云五辞职。

“金圆券”像脱缰的野马，在短短九个月内，就贬得一文不值。一千元、五千元、一万元、五万元、十万元、五十万元面额的钞票相继发行，而物价也像天文数字般飞涨，一日数变。到1949年4月，要36万元“金圆券”才能买到一块银元，比发行之初涨了18万倍。到上海解放时，一块银元要值八千万元“金圆券”！

随着“金圆券”的崩溃，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金融再也无法挽救。而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也就走到了末日。

（薛之兵）

蓝光行动

1979年元月，伊朗国内矛盾更加激化，一直亲西方的巴列维君主制王朝，随着国王的出走很快解体。同年2月，一直住在国外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

伊斯兰宗教领袖霍梅尼执政后，奉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的外交政策，美国被视为“魔鬼撒旦”。

1979年11月4日，伊朗激进分子冲进美国大使馆，要求美国引渡巴列维国王回国接受审判，并抓走几十名使馆工作人员作为人质。美伊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两天后，美国召开特别会议，研究营救人质计划。

各种建议都有。有人主张交出巴列维国王接受审判，甚至还有人建议向伊朗首都德黑兰投掷一颗炸弹……有的建议尽管滑稽荒唐，卡特总统却一一仔细听着。结果决定，为避免流血，尽可能不采取军事行动，分别通过外交途径和经济制裁等办法，以求得解决。

但是，各种办法都没有效果，直到1980年4月，卡特总统才最后作出决定：派遣飞机，武装潜入伊朗营救人质。行动计划制定得详尽而周密。参加行动的特种部队的代号是“蓝光”，全名为德尔塔部队。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登堡。

4月24日，格林尼治时间22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防部五角大楼的指挥室里，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将军指挥的“蓝光”秘密军事行动开始了。

在伊朗的海岸附近，8架绰号叫“快活的绿色巨人”的武装直升飞机，从“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载着90名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突击队员，配备最先进的武器和各种使人软弱无力的毒气，朝着伊朗南部飞去。

三小时之后，直升飞机到达第一个停留的地点波什特巴达姆。这是距德黑兰东南300公里的塔巴斯城的沙漠地区，即行动方案中的“一号沙漠”。

在那里，这些直升飞机同几小时之前由中东一个基地起飞的特遣部队汇合。这支部队包括满载汽油、化学药品和装备的6架C—130运输机，以及90名美国志愿军人。

按原定计划，会师后，直升飞机将从运输机上补充汽油，然后飞往德黑兰郊外的预先选好的第二个基地降落。凌晨4点隐藏在深山之中。第二天夜晚，改乘特工人员开来的卡车潜入德黑兰市内，在预定时间里进入外交部大楼和使馆大院，制服看守人员，释放人质；然后，直升飞机根据无线电指令，在上述两处救出人质，以飞快的速度赶往德黑兰以东的第三个基地——一个废弃的简易机场，由两架C—141飞机将所有的人质送到安全地带，直升飞机则扔在伊朗。

但是，这个秘密行动一开始就出了毛病。8架直升飞机到达伊朗海岸不久，其中有一架直升飞机的液压系统发生故障，被迫降落。机组人员只好由另一架直升飞机运走。

不久，第二架直升飞机遇上了沙暴，迷失方向两个小时，最后不得不返回“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按原计划规定，必须有6架直升飞机参加行动，现在已到了最低数字。在到达目的地时，第三架直升飞机“快活的绿色巨人”又发生故障，水管功

能失灵而降落，这时飞机只剩下5架了。整个行动计划遭到破坏。

琼斯将军立即向卡特总统报告一连串发生的意外情况，建议中止这次行动。卡特总统一筹莫展，只好批准。

“蓝光”行动就这样流了产。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美军准备撤离时，突然一辆伊朗公共汽车进入军队的集结地点。公共汽车上的人犹如突然见到了外星人一样，正惊诧得不知所措时，这支美国特遣部队持枪将50名乘客全部扣留了。乘客只好乖乖地坐在车上，念叨着古兰经，祈求真主保佑。有人要下车小便，被全副武装的美国哨兵用枪逼回车内。

“的的——”接着又开来一辆卡车。嗨！后面还跟着一辆轿车。卡车被持枪的美军拦住，被迫停下了。机灵的卡车司机见情况不妙，乘人不注意，钻进后面轿车里，对轿车司机说：“快跑！前面是些美国佬！”

轿车司机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忙打转方向盘，将车开进茫茫的戈壁滩中。这里的戈壁土质坚硬，司机加大油门，开了一程之后才问道：“你不是说胡话吧？”卡车司机说：“是美国佬，还有直升飞机呢！”

美军见小轿车消失在夜色之中，后悔不已，因怕被当局发现，不敢开枪射击，只好眼巴巴望着它开走了。这就意味着，这次行动彻底暴露了，美军只好慌忙撤退。

更不幸的是，当准备起飞时，一架直升飞机在尘埃弥漫中与一架C—130运输机相撞，发生猛烈的爆炸。当场8名机组人员丧生，4人烧伤。

炸死的8具尸体只好留在烧毁的飞机上，4名伤员被撤运出来。

营救人质以失败告终。

武装营救在伊朗人质的未遂事件，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响。

卡特总统在电视广播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说，是他决定采取这次营救活动的，也是他决定取消的，责任完全在他。万斯国务卿由于对卡特总统营救人质的决定“不能给予公开的支持”，故在营救行动前4天呈请辞职。4月28日，卡特总统接受了万斯的辞呈。

美国国内和它的盟国，对此事件反应不一。有的表示可以理解，有的表示同情或支持；但多数人表示吃惊，或表示不安，或表示反对，或对这次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表示忧虑。许多亚非国家则认为，这是侵犯伊朗领土主权。世界舆论热切希望，美伊双方采取明智和克制态度，尊重国际关系准则，通过和平手段，妥善解决两国间的争端。

卡特总统费尽心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人质，本想借此行动挽回美国的荣誉，满足部分公众殷切的要求，为他连任总统的竞选扫清障碍，结果反而加速了他政治生涯的结束。

直到卸任前第四天，卡特总统还为争取人质获释作最后努力。

1981年1月16日，美国终于同伊朗达成释放人质的原则条件——发还伊朗在美国的财产。

但是，由于电传往返上的技术性延误，直到1981年1月20日，新总统里根就职典礼举行了33分钟时，被扣押的52名人质才登上飞机返回美国。历时444天的人质事件，只有半小时之差没有能在卡特总统任期内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使他遗憾终身的事，他不得不含恨离开了白宫。

（贺景白）

吉大港血腥之夜

1975年11月7日凌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街头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四天以前，亲苏联的陆军参谋局长哈立德·穆什拉夫发动了一场政变，将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逮捕入狱。今天，齐亚·拉赫曼的部队又发动了一场反政变，挫败了政变集团的阴谋。他们打开了国家监狱的大门，放出齐亚·拉赫曼将军。

反政变部队占领电台后，齐亚·拉赫曼在广播里郑重向全国宣布：“在目前形势下，孟加拉人民、陆军、海军、空军、步枪队、警察、自卫队和其它人要求我作为军事管制执行官和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暂时接管国家权力。”

齐亚·拉赫曼1936年出生于孟加拉博格拉县的一个穆斯林家庭，学生时代，他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尤其是喜爱足球、拳击和网球，锻炼出一副强健的体魄。17岁高中毕业，便参军入伍，开始了戎马生涯。参加过印巴战争，当时孟加拉国还属于东巴基斯坦。

1971年3月，东巴基斯坦爆发反对叶海亚军人集团的战争。3月25日，已经晋升为陆军中校的齐亚·拉赫曼在吉大港举行了起义，宣布脱离巴基斯坦，成立独立的孟加拉国。建国以后，他受到总统穆吉布·拉赫曼的重用，被授予准将军衔，出任陆军副总参谋长。后来的几年中，这个国家又连续发生两次政变，最后是齐亚·拉赫曼出来收拾局面。

1977年4月，总统赛义姆因健康原因辞职后，齐亚·拉赫曼得到绝大多数的选民的支持，当选为孟加拉国总统。两年后，他宣布结束军管，他本人也退出军界，完成了孟加拉国向文官政府的过渡。

齐亚·拉赫曼总统生活简朴，不吸烟，不喝酒。他办事讲究效率，他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以外交活动家的姿态频频出访，加强与邻国的关系。在国内，他经常到偏僻的农村巡视，关心人民的疾苦，对不能尽职的地方官员则非常严厉，因此有人称他为“仁慈的独裁者”。他不仅自己常到远离达卡的省份主持省政会议，还敦促地方官员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为了根除贪污，他要求议员、高级文官公布私产，并率先公布自己的财产。为保持与军队的关系，他一直在军营安家。在孟加拉国人民的心目中，齐亚·拉赫曼树立了一个“有力、诚实和献身的领袖”形象。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齐亚·拉赫曼，陆军驻吉大港第24师师长曼苏尔·艾哈迈德少将对总统的不满至少可以追溯到1977年。那时，齐亚·拉赫曼改组三军，免去了曼苏尔在陆军总部主管作战、情报、通讯的参谋局长职务，并把他调往吉大港任第24师师长。曼苏尔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此后，他就开始酝酿政变的阴谋，扩充实力，安插亲信，网罗对总统不满的分子。为了避免三军情报局派情报官来他的部队工作，他严令第24师情报处下属的单位一律要向他负责，不许超越上级。

孟加拉国独立以后，三军内部存在一股被称为“自由战士”的势力，形成这股势力的人都曾参加过孟加拉国独立解放战争，他们居功自傲，对自己的地位不满足。曼苏尔利用这股势力，在军内挑拨，说拉赫曼排挤“自由战士”，重用从巴基斯坦派遣返回来的孟加拉籍军官，以煽起对拉赫曼的不满。

曼苏尔经过三年处心积虑的经营，使24师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其它各师，实力相当于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这个师一共有四个旅，其中三个旅的旅

长都是他的亲信。团营一级指挥官和参谋都由“自由战士”派军官担任。因而曼苏尔自以为羽毛丰满，可以行动了。

1980年12月，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第69旅旅长穆赫辛丁准将、第305旅旅长纳瓦兹上校、第65旅旅长拉希德上校及曼苏尔的侄子马布波中校等亲信，制定了企图扣押和杀害拉赫曼总统的第一个行动计划：利用总统出席12月20日的吉大港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的机会。袭击总统住所。后来因为执行这一任务的第10团未能及时到位，行动计划流产了。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

1981年初，曼苏尔及其亲信计划趁2月在科克斯巴扎举行三军演习之机，将前来观看的总统和三军参谋长抓起来，逼总统交权。但这一计划也没得逞。

1981年5月初，曼苏尔突然接到拉赫曼总统发来的命令，调他回达卡任国防参谋学院院长一职。接到命令后，曼苏尔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明白这样一来，他手中的兵权将被解除，如不立即下手，他的整个“总统梦”恐怕就要永远成为泡影了。

曼苏尔召集亲信紧急磋商，决定立刻发动兵变。他一面故意拖延执行调令，一面加紧作政变准备。他秘密调集4000名忠于他的嫡系部队留驻吉大港营地，以便随时出动。并公开宣布将在5月份进行夜间训练，实际上是搞政变演习，同时也可以为政变之夜打掩护、麻痹军政各方。此外，他把一些认为不可靠的军官调离吉大港，去其它防区值勤或强令他们到外地休假。

5月中旬，曼苏尔专门派遣亲信穆蒂乌尔中校去达卡，同总统的私人参谋马夫兹中校进行秘密联系。这两个人是旧日的好友，他们在一起无话不谈。密谈中，穆蒂乌尔透露了曼苏尔的政变计划，要求马夫兹中校给予支持，并提供总统的行踪和日程。

马夫兹欣然同意加入政变集团，并透露总统将于5月27日去吉大港巡视。

穆蒂乌尔果然不虚此行，兴高采烈地返回吉大港，向曼苏尔作了汇报。

政变前，国家情报部门已经注意到吉大港有些不祥之兆，保卫部门为总统安全着想，曾建议总统取消吉大港之行。齐亚·拉赫曼认为不至于有多大危险，吉大港是他常去的地方。他说：“如果曼苏尔敢下毒手，他也没有好下场，肯定会被人民处死。”临行前，拉赫曼略加思索，指示：在他到达吉大港时，曼苏尔不必参加迎送。

消息传到曼苏尔耳朵里，他认为事情可能已经败露，没有退路，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

吉大港位于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东南，在卡拉富利河下游的右岸，人口近90万，是这个国家的第二个大城市，有“孟加拉湾门户”之称。孟加拉海湾波光粼粼，沿岸山丘草木茂盛，寺院和尖塔掩隐在椰林之中，自然环境优美。作为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吉大港市在孟加拉国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

5月29日上午9时，齐亚·拉赫曼乘坐专机离开达卡飞往吉大港视察。总统一行住在政府宾馆。刚住下来，曼苏尔的亲信穆蒂乌尔就打电话给总统私人参谋马夫兹中校，用暗语告诉他当天晚上动手，希望他里应外合，暗中投敌的马夫兹自然一口答应。

午后，曼苏尔及其亲信做完星期五伊斯兰聚礼后，又开了一次碰头会，

再次研究落实了谋杀总统的行动计划和部署。曼苏尔听取了有关政变各项准备工作的汇报后，认为，由于有了内线接应，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使用大部队，而改用从“自由战士”中挑选出来的可靠分子组成突击队去执行任务。最后，曼苏尔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你们怎么搞，使用什么家伙，我不管。我本人已下定决心，不成功，便成仁！”

那天，齐亚·拉赫曼的活动安排得十分紧凑。他上午抵达吉大港后不久，就在宾馆召集执政的民族主义党部分常委开会，会议一直继续到下午2时，接着，他分别会见了当地的社会名流。晚上，他处理完急件后便上床入睡。他准备次日飞回达卡。

政府宾馆属于市区范围，安全保卫工作归当地警察负责。按规定在总统下榻期间，要派166名警卫人员和便衣特工守卫，但在马夫兹的授意下，那天的警卫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二，只有57人。夜间，马夫兹还撤走了二楼总统卧室门口的两名随身警卫，为政变集团谋杀总统扫清了障碍。

这一夜相当闷热，本来繁星灿烂的天空突然布满了乌云，雷声轰隆，电光闪闪，接着便是瓢泼般的暴雨。急骤的雨点敲打着屋顶、树林和路面，天黑得像要塌下来似的。

凌晨3点30分，在暴风雨和夜色的掩护下，由16名曼苏尔亲信军官组成的突击队，分乘三辆汽车，从第24师师部出发，直奔宾馆。他们分成三个小分队：第一分队埋伏在宾馆附近，负责切断向外的通道；另外两个小分队向宾馆大门内发射了几枚火箭筒，墙壁被炸开几个大窟窿。突击队员趁硝烟弥漫之际冲了进去。第二分队迅速占领底层，第三分队则冲上二楼，打死了楼上的警卫。

穆蒂乌尔中校率先奔向总统的套房，猛击房门。齐亚·拉赫曼镇静地打开门，挺身面对叛乱分子，厉声责问：“你们要干什么？”穆蒂乌尔手中的冲锋枪“达达达”地响起来，总统应声倒地，随即便咽了气。

在这次夜间行动中，总统随行人员和警卫人员伤亡28人，突击队员只有两人受伤。

曼苏尔·艾哈迈德和他的亲信得知突击队轻而易举地得手，总统已经死了，当时欣喜欲狂。曼苏尔立即下令部署防范措施，增援战略据点，控制电台、机场和港口，切断通向达卡的石油供应和部分通往达卡的道路。

5月30日上午8时，曼苏尔召集吉大港当地高级军政要员，通报总统已经被杀，要求他们支持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官员迫于威胁，表示拥护曼苏尔，唯独海军和空军方面的领导人没有表态。

9时整，吉大港广播电台正式宣布齐亚·拉赫曼已死。以曼苏尔少将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接管政权，废除原有宪法，解除议会和内阁，对全国实行军管。此外，吉大港电台还广播了一项公告，说曼苏尔已“命令”解除陆军参谋长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沙德中将和其他八位将军的职务。公告动员各地驻军“起义”，准备进军达卡，夺取最高领导权。

在这之前，在达卡的陆军参谋长艾尔沙德中将获悉总统遇害的消息，立即通告总理、副总理和内阁部长等政府领导人。他们一起赶往陆军医院，请住院养病的副总统阿卜杜勒·萨塔尔出院代理总统职务，主持政府工作，平息曼苏尔暴乱。

75岁高龄的萨塔尔闻讯后，立即召开内阁和三军首脑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他们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并举的方针，力促第24师内部分化，

迫使曼苏尔投降。

三军首脑和准军事的步枪队首脑、警察总监都表示效忠达卡政府，各政党也都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曼苏尔发动叛乱、杀害总统的可耻行为。代总统萨塔尔在达卡电台多次命令叛乱者必须尽快投降，否则武装部队将对他们采取“最后行动”和“最严厉的措施”。萨塔尔还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达卡等主要城市实行宵禁。中断一切对外联系，关闭领空。

陆军参谋长艾尔沙德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反击。一面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吉大港驻军司令曼苏尔和他的四名旅长从军队中除名。呼吁叛乱部队士兵离开吉大港兵营，到附近的其他部队兵营报到。他保证：反叛的军人只要自首，都会有“完全安全的保障”。

艾尔沙德的讲话通过卡达电台反复播放，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叛军士气很快就土崩瓦解了。5月30日，也就是发动政变的当天，第24师已有三个团向政府投诚。炮兵团、第305旅等部队也相继倒戈。

5月31日上午，政府向叛军发出最后通牒。下午，第24师下级军官和士兵已经失去控制，开始不听指挥了。政变集团头目开始惊慌起来。晚上，曼苏尔通过电话向达卡陆军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同政府和平谈判。陆军总部断然拒绝和谈，命令他无条件投降。政变集团头目见大势已去，便各自开始择路而逃。

6月1日凌晨2时，曼苏尔携带家眷，乘汽车向吉大港山区的孟、印、缅边境仓皇出逃。政府军开进吉大港，以50万塔卡（约合3万美元）悬赏缉拿叛乱首领曼苏尔——不论死活。

下午4时，吉大港警察在居民的配合下，在吉大港东南40英里靠近缅甸边境的法蒂查理村的一片茶园里抓获了曼苏尔。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一名旅长和一位上校。当晚，曼苏尔被押到吉大港兵营，被一群怒不可遏的战士开枪击毙。到此为止，以刺杀齐亚·拉赫曼总统为开端的短命政变宣告彻底失败。

5月31日，首都达卡上万名悲痛的群众冒雨来到达卡体育场，为已故的齐亚·拉赫曼总统祈祷。所有的政府领导人，包括反对党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祈祷会。代总统萨塔尔宣布将为齐亚·拉赫曼举行国葬，下半旗致哀40天。

6月1日下午，正当叛乱首领在茶园内被抓获的时候，政府军在离吉大港约24英里的工程学院附近一座挖得很浅的坟墓里，取出了齐亚·拉赫曼总统的遗体，并立即用飞机运到首都达卡，经过处理后，把遗体停放在议会大厦。

这一天，达卡数十万群众拥上街头，悼念齐亚·拉赫曼。人们把鞋脱掉拿在手里，赤脚走路以表示对死者的敬意。一英里长的吊唁队伍蜿蜒在议会大厦周围。已故总统弹痕累累的遗体，平躺在鲜花簇拥的木棺内。

6月2日，孟加拉国以最高军礼为齐亚·拉赫曼下葬，遗体被埋在政府大厦附近的月牙湖畔。

参与政变的军人头目除了3人被打死外，另有17人在押。政府组成一个以阿卜杜勒·拉赫曼为首的特别法庭，审讯那些对杀害总统负有刑事责任的军人。1981年7月10日，包括穆赫辛丁·艾哈迈德准将在内的25名军官在吉大港接受军事法庭审讯。9月23日，12名参与政变的军官以“反政府叛乱罪”被处决。

(孙石夫)

日航特大空难

波音 747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航飞机。这种巨型喷气宽体客机载客量极大，有 550 个座位，被誉为“空中客车”。它于 1969 年 2 月 9 日首次试飞成功，为世界上民用航空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6 年后日航一架波音 747 的不幸坠毁，则在世界航空史上创下了单机失事死亡人数最多的悲惨记录。

1985 年 8 月 12 日傍晚 18 点 12 分，一架满载旅客的波音 747 宽体客机呼啸着，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跑道上腾空而起，向大阪方向飞去。

这架日本航空公司 123 班机上，载有 505 名乘客和 19 名机组人员，共 524 人。其中，除 11 名外国乘客（包括 4 名香港乘客）外，其余全是日本人。

按照日本民间习俗，7 月 15 日到 8 月 15 日期间是祭祀祖魂的日子，称为盂兰盆节。在这期间，日本政府机关、企业和学校都陆续放假，许多人就利用这个节假日外出旅游或回乡探亲。现在假日快结束了，因此机上的日本人，除少数是忙于公务的企业界、文艺界人士外，大多数是合家外出后返程的游客。

驾驶这架班机的正机长是 49 岁的高滨正实，副机长是 39 岁的佐佐木祐。他们都是日航顶尖的驾驶员。高滨的飞行时间达 12400 小时，在日航任机长已将近 20 年。佐佐木的飞行时间也达 9000 小时。他们的驾驶技术都是第一流的。

班机上孩子比较多，飞机起飞不久，空中小姐就开始给小乘客们发纪念品——玩具米老鼠。吉崎夫妇的不满 10 岁的三个孩子可开心了，他们一家 5 口坐在机尾倒数第 7 排，是去东京度假后返回大阪的。

26 岁的空中小姐落合由美坐在机尾部 56—C 的位子上，悠闲地拿着一本杂志看了起来。她是在 1979 年 1 月到日本航空公司当航空小姐，1983 年被提升为机上的助理事务长。她与日航大阪分公司的落合可之结婚还不到一年，此行是作为普通乘客，利用 6 天的加班假，去同很久没见面的丈夫团聚的。

然而，机舱内平静而欢快的气氛很快被打破了。落合手中的杂志刚刚翻了几页，就听到头顶上突然一声巨响。她惊恐地抬头望去，只见机尾顶部出现一个直径约 1.5 米的大洞，机尾洗手间的天花板也跟着飞落在地，随后一股浓浓的白雾便从洞口涌入机舱。与此同时，乘客座位上方的氧气罩自动垂落下来，空中小姐通过广播要求旅客们戴好氧气罩。一旦飞机遭遇意外情况，这些程序便自动进行。

此刻的时间是 18 点 25 分，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起飞后刚过了 13 分钟。飞机已飞到大岛以西，爬到 2.4 万英尺的高空。也就在这时，东京空中交通控制塔听到 123 班机的驾驶员在惊呼：“哎呀！出问题了。”两分钟后，控制塔的雷达屏幕上也出现了表明发生紧急情况的密码信号“7700”。接着，传来了高滨机长的呼叫声，他要求降低飞行高度，立即返回羽田机场。

东京空中交通控制塔接到 123 班机要求返回羽田机场的请求后，立即指示该机调头向东返回。但是，在其后两分钟的雷达记录表明：该机并未向东，反而是朝西北方向飞去；飞机不但没降低飞行高度，而且还从 2.4 万英尺上升到 2.49 万英尺。东京方面再次指示 123 班机赶紧 90° 转向，但高滨机长报告说：“飞机已经失去控制。”

实际上，问题出在该机的尾翼。那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正是包括飞机方向舵在内的飞机垂直尾翼的大部分，在空中分解脱落时而发出的。垂直尾翼是稳定飞机航向的重要装置，一旦失去，机头就会左右摇摆，飞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操纵起来非常困难。但是，在驾驶舱内的高滨机长并不知道尾翼已经失去，还以为是后机舱门脱落或是液压系统出了毛病，导致飞机失控。

高滨和佐佐木用了几分钟时间，即到了 18 点 31 分才好不容易把飞机从 2.49 万英尺下降到 1.19 万英尺。又过了三分钟，空中交通管制塔通知 123 班机，其所在的位置是名古屋机场 72 英里，问它是否愿意在名古屋机场降落。高滨仍要求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因为名古屋机场虽然近，但羽田机场跑道长，安全设施完备，有利于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于是，高滨和佐佐木沉着镇静地用飞机的辅助翼和升降舵来控制飞机，力图把 123 班机开回东京羽田机场。

18 点 30 分，机舱内氧气面罩内的氧气供应中断，这时客舱事务长才正式宣布飞机发生了严重故障。乘务员指示乘客穿上救生衣，手扶椅垫，上身伏在两膝之间，以应付将要面临的最坏事态。有的乘客因恐惧而手忙脚乱，救生衣怎么也穿不上，落合由美便离开座位，去帮助客舱后部的几位乘客穿好救生衣。

机舱内虽然没有出现骚乱，但人们的神情极度紧张。从飞机颠簸的剧烈程度及机内出现的种种危急情况，不少乘客已预感到凶多吉少。

家住大阪箕面市的谷口正胜掏出一支铅笔，匆匆忙忙地在座位前的纸口袋上写了几个字：“大阪箕面，真知子：要培养好孩子。谷口正胜，18 点 30 分。”似乎还怕不清楚似的，又将自己的汽车驾驶执照也放进了纸口袋。谷口有两个儿子，一个读中学，一个才上小学。他此次是在东京出差，登机前还给家里通了电话，说如果乘不上飞机，便准备第二天早上乘新干线回家。后来他买到了一张退票，登上了 123 班机。

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河口博次，在飞机剧烈颠簸的情况下，艰难地在工作日记本上写下了 7 页纸：“麻里子、津庆、知代子：你们要齐心协力，帮妈妈干事情。爸爸实在太遗憾了，肯定无救了。原因不明，已经 5 分钟了。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坐飞机了。你们求神灵保佑我吧。没想到昨天同你们吃的是最后一顿饭。机内好像什么东西爆炸了似的，冒出了浓烟，飞机在急速下降。津庆，拜托你了。孩子妈，遇到这种事令人遗憾，永别了，孩子的事全拜托你了。现在是 18 点 30 分，飞机盘旋着急剧下降。到今天为止，我的人生是幸福的，感谢你。”

18 点 45 分，东京空中交通管制塔通知 123 班机，此刻它的方位在羽田机场西北 55 英里处，东京羽田和横田两个机场都做好了准备，班机随时都可以着陆。然而，因飞机发动机的声响太大，高滨机长竟没听到地面控制塔的指示。飞机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天色渐渐晚了，家住东京都奥多摩町的山崎启一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他抬头一看，从西南山谷低空飞来一架巨大的民航飞机。这令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一带从未有民航飞机飞过。那飞机左右摇摆，像个醉汉晃悠悠地掠过他头顶，朝甲武信岳的方向飞去。因为情况特别异常，他猛地意识到飞机可能会坠毁，便拿起自己随身带的照相机，将这架即将遭到不幸的飞机摄入了镜头。

18点57分,123班机从控制塔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但控制塔还能听到高滨机长同佐佐木副驾驶的对话。高滨不断地指示佐佐木“抬高机头”,忽而喊“向左”,忽而喊“向右”,很显然,飞机在急剧下坠,高滨和佐佐木在极力避免飞机撞上山峰。他们对话的声调越来越惊恐,最后是“轰”的一声,谈话中断了。

飞机终于撞到了山上,在坠毁现场,松树被齐腰斩断,飞机残骸和树木在猛烈燃烧。地上散落着残缺不全的尸体、孩子的玩具和其他遗物,甚至在树枝上也挂着破碎的衣服和人体碎片,令人惨不忍睹。

一阵晚风吹来,落合由美苏醒过来,她发现安全带勒得她腹部剧痛。她费了很大劲才解开安全带,但仍被夹在座位中动弹不得。周围充满着烧焦的气味,还听到有人在呻吟。她庆幸自己还活着,不久前飞机坠落时的恐怖情景又闪现在她的脑海中:飞机几乎是垂直坠下的,机内一片凄惨的呼叫声,坠地时有三次猛烈的撞击,周围的座位向她挤压过来,她两眼一黑,昏过去了……。此时周围的呻吟声越来越小,渐渐地一点也听不到了。不久,她听到有直升飞机的声音,她挣扎着向天空招手,但未被发现。天色越来越晚,一阵疼痛袭来,她又昏迷过去了。

吉崎博子也醒了过来,她感到浑身刺骨般剧痛。她伸手摸了摸身边的丈夫吉崎优三和小女儿由加里,发现他们的肢体已经冰凉了。儿子充芳已不见踪影,想必是飞机撞山时被抛出了座位。这时,她听到了8岁的大女儿美纪子的呼叫声,她便赶紧答应。吉崎博子要美纪子挺住,并不断与美纪子讲话,为的是让美纪子保持清醒,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一家5口乘机,现在只剩下母女俩了。

还有一位幸存者12岁的川上庆子。她与父母和妹妹一家4口利用假日参加了北海道夏季旅游团,到札幌、网走等地旅游后,旅游团在东京解散,他们为返回大阪而搭乘了123班机。飞机撞山时,川上庆子昏迷过去。等她醒来时,听到父亲喊她,问她能不能挺住。因为系在庆子身上的安全带解不开,父亲还告诉庆子,要她用刀割断安全带。但庆子并不知道刀在哪里,就问父亲,父亲含糊地说了几句,就再也发不出声音了。庆子还听到了妹妹的痛苦呻吟声,后来,妹妹哇地吐了一口什么东西,就不再出声了。

日本航空自卫队百里救难队在接获123班机失踪的报告后,立即派飞机从百里基地紧急起飞前往搜寻。晚上19点47分,飞行员报告说,在群马县的御巢鹰山附近,发现了123班机坠落的现场。

一小时后,读卖新闻社的直升飞机也发现了坠机现场。该社记者在现场上空发来了报告:事故现场长约2公里,宽约500米,坠机引起的大火还在熊熊燃烧。

从13日凌晨开始,日本航空自卫队、陆上自卫队、长野县及群马县警察机动队等派出约6000名自卫队和消防队员,分别奔赴事故现场。因山高路远,又无路可寻,直到13日上午7点30分,群马县警察机动队的32名警员才最先赶到现场附近,从山顶发现了坠机现场。10点23分,警视厅的直升飞机才将机动队员空投到事故现场,开始了正式救援工作。

13日上午11点27分,正在现场搜寻的长野县警察机动队队员柳泽贤二和深泽达行发现严重撞毁的机体尾部内夹着一个小孩,两只脚还在动,这使他们大为惊喜。他们用了20分钟的时间才把那个孩子救出来,她就是川上庆子。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其他三个幸存者:即落合美子、吉崎博子和美纪子。

她们很快被救护到直升飞机上，迅速送往附近医院。

在这次特大空难中，共死亡 520 人，仅 4 人死里逃生。幸存者都是女性，年龄分别为 34 岁、26 岁、12 岁和 8 岁。在飞机失事 17 个小时以后，她们才被救援人员发现。她们能够生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值得注意的是，这 4 个幸存者的座位都在飞机客舱的尾部。因为飞机是头朝下栽落的，尾部没有直接撞在山上，它在被抛出后又受到树木的遮挡，缓缓地落到地面，故此飞机尾部基本保持完整。这无疑是为这 4 个人奇迹般幸免于难的主要原因。

（陈继中）

首脑会议上空的乌云

1960年5月5日上午，原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上了克里姆林宫的讲台。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在三个小时后才讲到国际形势。他告诉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代表，5月16日，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的最高领导人，将在法国巴黎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目的是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为和平共处打下基础。说到这里，赫鲁晓夫话锋一转，语气沉重地告诫各位代表：“但是，仍然存在着非常令人不安的因素。苏联政府授权我向你们报告，最近几周来美国对苏联采取的侵略行动——5月1日清晨，莫斯科时间5时36分，一架美国U—2间谍飞机越过了我国边界，向苏联领空深入……我们击落了这架飞机！”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又一次热烈鼓掌。待掌声平静下来，赫鲁晓夫才抬头望着应邀列席会议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埃林·汤普森，问道：“这算什么呢？是五一劳动节的节日祝贺吗？”

美国大使尴尬地红着脸，无言以对。

赫鲁晓夫由此得出结论，指责美国那些“坚持侵略政策的人，正力图破坏巴黎最高级会谈，或者说要阻挠达成一项全世界都期待的和平协议！”赫鲁晓夫不愧为一个天才的雄辩家，他十分善于鼓动听众的情绪，同时又机智地把握着分寸。他巧妙地把美国人民同美国政府区分开来，又把美国总统和少数好战分子区分开来，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们要告诉美国人民，尽管发生了这种侵略行为，我们仍然没有忘记我在访问美国时所得到的友好的欢迎。即使现在，我也深信，除了某些帝国主义分子和垄断资本家外，美国人民是向往和平的，是要和苏联友好的……我也不怀疑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和平愿望是真诚的！”

但是，不管赫鲁晓夫怎么讲究策略，他已经使“U—2间谍飞机事件”变成了一个全世界关注的重大危机，并且直接影响到即将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

同一天的早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总统召集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开会。由于时差的关系，他们已经得知赫鲁晓夫关于U—2间谍飞机的讲话。有人提出，美国应该批驳赫鲁晓夫的指责。艾森豪威尔不同意，认为让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发表一项声明作出解释就可以了。他并且叫代理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亲自去起草这份声明。道格拉斯·狄龙同中央情报局首脑艾伦·杜勒斯通了电话，他们俩都觉得，关于U—2飞机的事，美国越少说话越好。因此，狄龙起草的声明十分简单。

11时23分，新闻秘书哈格蒂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报告，说赫鲁晓夫关于U—2间谍飞机的讲话，已经成了轰动全球的特大新闻，因此，总统有必要向新闻界发表讲话。艾森豪威尔拒绝与报界见面，只同意由国务院再发表一个声明。

11时45分，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会见新闻记者，宣读了狄龙起草的声明：“国务院从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获悉：自5月1日以来，我们有一架从土耳其阿达纳基地起飞、由一名非军人驾驶的U—型气象调查飞机，至今下落不明。赫鲁晓夫先生宣布有一架美国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这也许就是我们那架失踪的飞机。”

下午1时半，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发言人沃尔特·邦尼向新闻

记者宣读了一项较为详细的声明，声明中说：“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一架科研用U—2飞机的飞行员，5月1日当地时间上午9时，在土耳其凡湖地区上空报告说，他的供氧系统发生故障。自那以后，这架飞机一直下落不明。该飞机自1956年以来一直从事一项高空阵风气象状况的研究。”邦尼还说到，这架飞机的预定航程为1400公里，航行时间为3小时45分；听到飞行员的最后呼叫时，他正在向北飞行；最大飞行高度为4.5万英尺等具体的细节。

狄龙听到这份声明后大吃一惊，因为其中不值一驳的谎言实在太多。他立刻预料到，这个“愚蠢至极的声明”肯定会成为苏联人进一步抨击此事的把柄。

这天晚上，埃塞俄比亚驻苏联大使馆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旅馆举行招待会，各国外交使节都出席了会议。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无意中听到瑞典驻苏联大使与苏联副外长雅各布·马立克在谈论U—2间谍飞机事件，他赶紧竖起了耳朵。瑞典大使问，苏联人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哪项条款指责U—2飞机入侵事件。马立克随口答道：“现在还不清楚。我们还在审讯那个飞行员！”

汤普森大使大惊失色，他立刻悄悄地溜出会场，赶回自己的大使馆，给华盛顿的狄龙发了一份特急电报：“他们还在审讯飞行员！”

这份电报在白宫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白宫的头头脑脑们再也没有想到，U—2间谍飞机的驾驶员居然还活着！如果这份电报早些到达，白宫就绝不会再让邦尼去宣读那份破绽百出的声明。因为，只要飞行员一开口，什么谎言都站不住脚了。

危机升级了。

这天晚上，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给母亲打电话，问他当总统的父亲对U—2飞机事件有什么看法。总统恼怒地叫道：“难道你以为我该喜欢这件事？”

5月6日，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和副局长比塞尔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至少把一部分”关于U—2飞机事件的真相告诉国会领导人。总统的态度仍是拒绝。他说：“那些家伙肯定会泄露秘密。”

5月7日，星期六，赫鲁晓夫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并致闭幕词，他在讲话中故意引用了邦尼声明中的某些细节，然后宣布了一个爆炸性的秘密：苏联人不但找到了被击落的间谍飞机的残骸，而且抓住了飞行员。这个飞行员现正在莫斯科，名叫弗朗西斯·鲍尔斯。鲍尔斯已经供认，他既没有感到过头昏，供氧设备也没有出过毛病；他是奉命按指定的航线飞行的，同时不断地操纵着仪器对苏联进行间谍侦察！赫鲁晓夫甚至出示了一些照片，证明U—2间谍飞机对苏联的军用机场拍了照。他嘲弄地说：“现在，美国人将不得不重新编造一些新的谎言了！”

不过，赫鲁晓夫又一次提到即将举行的巴黎会谈，并且仍然把艾森豪威尔总统同好战分子区分开来，他说：“我非常愿意假定，美国总统对派遣这样一架飞机入侵苏联的事是一无所知的。”

现在，艾森豪威尔完全明白了：赫鲁晓夫已经掌握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美国政府故意侵犯苏联领空，对苏联进行了间谍侦察，并且又向全世界撒了几次谎！

美国政府不得不正视危机，对赫鲁晓夫的讲话作出反应，特别是赫鲁晓夫所说的，“非常愿意假定”，美国总统不知道这一间谍活动的预谋，这显

然是给艾森豪威尔准备了一个台阶。如果艾森豪威尔接受这一说法，巴黎最高级会谈就可能照原计划进行。

但是，这又将造成其它问题。如果美国总统承认，他对政府的控制力如此微弱，他手下的人可以背着他派飞机入侵苏联，甚至可能引发一场世界大战，那么，世界各国会作何感想呢？同时，怎么能保证赫鲁晓夫提供的这个“台阶”不会是一个新的陷阱？一旦艾森豪威尔中计，公开推卸自己对U—2飞机间谍活动的责任，说不定赫鲁晓夫又会拿出新的证据，来揭露美国总统也是个不诚实的人。

如果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自己是U—2飞机事件的后台，那么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承认美国政府搞了间谍活动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而且他也就不得不放弃总统的宝座了。

这时，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私下表示愿意辞职。也就是说，总统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杜勒斯头上去。但是艾森豪威尔不愿采取这种找“替罪羊”的手段。

于是又有人建议，发表一项半真半假的声明，一方面承认美国在过去的四年中，一直在沿苏联边界飞行以搜集情报，而且某一架U—2飞机“可能”飞入了苏联领空；另一方面，则否认这一次被击落的U—2飞机的行动是得到美国政府批准的。艾森豪威尔听到这个建议后认为，这也许会被证明是个错误，但又同意试一试。5月7日下午6时，林肯·怀特在国务院向记者们宣读了这个新的声明。结果这个声明引起了美国报纸的纷纷议论，第二天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公开指出：“政府否认它授权进行这次飞行，就等于承认它是不称职的！”

艾森豪威尔对此也不满意。他所受的全部教育告诉他，最高领导人应负完全的责任！他要国务院再发表一项声明，承认四年来U—2飞机一直根据总统的一项总的命令飞行，以便对苏联军事工业有充分的了解，使美国不至于遭受突然袭击。但他仍然不想把全部的真相公之于众。声明中说，总统并不了解每一次间谍活动的具体细节，也就是说，他与“五一节飞行”没有直接的联系。

由于一次间谍活动的失败，使美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无论它怎样努力固守阵地，仍然不得不一再后退。

5月9日，星期一。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果然谴责了美国政府上星期六的声明。但在同美国大使汤普森私下交谈时，赫鲁晓夫直率地表示：“这个倒霉的U—2飞机事件使我十分为难。你必须帮助我摆脱掉它！”赫鲁晓夫说的是实话。一方面，作为苏联的国家元首，他不能不对美国间谍飞机的入侵作出强烈反应；另一方面，他又珍惜同西方在和平共处问题上已经达成的谅解，并且希望巴黎最高级会谈能有新的成果。

汤普森大使保证他将尽一切努力。他立即向白宫报告这一新的信息。可是，一切都迟了。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坚持，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已代表国务院宣布，U—2飞机的各次间谍飞行都是由总统授权进行的。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读到这项最新声明，气得几乎发疯了。他并不欣赏艾森豪威尔勇于承担责任的政治家风度，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在洋洋自得地吹嘘：美国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5月11日，苏联人把U—2飞机的残骸放在莫斯科高尔基公园里公开展

出，并通过报纸大肆渲染。下午4时，赫鲁晓夫来到展出地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又一次放过艾森豪威尔总统，而对发表声明的赫脱大加鞭笞。记者问道：“你仍然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来苏联访问吗？”赫鲁晓夫皱着眉头，沉默片刻，然后才说：“你要我说什么呢？你替我说吧……你知道，我对美国总统是抱有希望的，但是我的希望被出卖了！现在，我怎么能够让苏联人民走上街头欢迎这位亲爱的客人呢？他刚刚还允许飞机到我们头顶上搞间谍活动啊！”

记者又问：“那你是否考虑推迟美国总统来访的日期呢？”

赫鲁晓夫笑了，他说：“我不想同你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将在巴黎同美国总统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仍然想找到办法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赫鲁晓夫巧妙地借此机会又向美国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他不会放弃巴黎最高级会谈。可是，与此同时，还没有接到这个信息的美国总统正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亲自宣读了一个声明，说苏联人在U—2飞机上小题大作，搞得太过分了！

事情越搞越复杂了。

5月1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说：“现在，种种迹象都说明，赫鲁晓夫是打算从最高级会谈中捞取最大的宣传上的好处，而并不想进行认真的谈判。”艾森豪威尔读完电报，显得紧张而急躁，并且说他的血压太高了。

然而，他又没法不到巴黎去同赫鲁晓夫摊牌。

1960年5月1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巴黎。这一天是星期六，苏、美、英、法四国首脑的最高级会谈，将在下星期一开始。

5月16日，因为首脑会谈面临危机而几乎一夜未眠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上午8时就前往美国官邸，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共进早餐。艾森豪威尔显得心神不定，谈话的气氛相当紧张。麦克米伦明确表示，不管遇到怎样严重的情况，英国都将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听到这句话，艾森豪威尔的情绪似乎好按照原计划，四国首脑将只带翻译参加会谈。可是现在，赫鲁晓夫提出，应该让顾问也参加会晤。这样，每个国家参加会晤的人便从两个人增加为6个人。美、英、法三国虽然同意了赫鲁晓夫的提议，但都已预感到结局不妙。美国国务卿赫脱在去会场前，向白宫发了一份电报，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打算在第一次会议上抓住U—2飞机问题破坏会谈。请告副总统。”

上午10时半以后，各国首脑相继来到爱丽舍宫。戴高乐总统先把赫鲁晓夫及其随行人员引进一间绿色的、金碧辉煌的小房间。3分钟后，他又把英国人领进房间。又过了3分钟，戴高乐领进了美国人。

艾森豪威尔向赫鲁晓夫点了点头。

在场的24人各自就座。上午11点01分，戴高乐总统身后的门关上了。戴高乐总统宣布会议开始。

赫鲁晓夫立即站起来，大声说道：“我要发言！”

艾森豪威尔也说：“我也要作简短发言。”

戴高乐总统是主人，他表示，艾森豪威尔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应该首先发言。赫鲁晓夫反对，他说：“是我首先要求发言的。”

艾森豪威尔做了让步，点头同意让赫鲁晓夫先发言。

赫鲁晓夫戴上他的无框眼镜，拿着讲稿的手激动得直哆嗦，开始怒斥美国的间谍活动和侵略行为，还激烈地抨击艾森豪威尔公然声称将继续进行U

—2 飞机的间谍飞行。他慷慨激昂地一连讲了 45 分钟。当赫鲁晓夫的嗓门太大时，戴高乐便有礼貌地提醒他说：“这个房间的音响效果非常好，大家都听到主席台讲话。”

艾森豪威尔气得直咬牙，连秃脑门都发红了。赫鲁晓夫宣布：“我们要平等地参加会谈。只有美国宣布今后不再侵犯苏联边界，对过去采取的间谍行为道歉，并且惩罚直接参与这些罪恶活动的人，才有可能进行会谈。”因此，他要求将会议推迟 6—8 个月，到那时，美国将选出新一届总统来了。赫鲁晓夫还表示无法欢迎艾森豪威尔对苏联的访问。

艾森豪威尔发言说，赫鲁晓夫了解的情况不够准确。美国政府并没有表示要继续飞越苏联领空；实际上，自从“五一节事件”之后，U—2 飞机的这种飞行已经停止，今后也不准备恢复了。他并且说：“我到巴黎来，就是为了争取同苏联达成一些协议。如能达成协议，就完全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形式的间谍活动，包括越境飞行。我认为利用这次事件破坏会议是没有道理的。”

麦克米伦首相说：“为了这次首脑会议的召开，各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准备。现在我们头上出现了这片乌云，对此，我当然感到惋惜。我理解 U—2 飞机事件所引起的种种情绪，但是我想指出两点：一，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二，大家都知道，间谍活动是现实生活中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而且大多数间谍活动会侵犯别国的主权。”麦克米伦接着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已明确表示以后不再进行越境飞行，而赫鲁晓夫先生也没有提议取消这次首脑会议，而仅仅要求推迟举行，这都是令人高兴的现象。但是麦克米伦希望，最好不要推迟会期。

戴高乐总统也表示对推迟会期很不满意。他对赫鲁晓夫说：“U—2 飞机被击落之后，你对我国大使说，这次会议应该照常举行，而且会有成果的。你让麦克米伦先生从伦敦赶来，又让艾森豪威尔将军从美国远道而来，我本人组织、参加这么一次会议也非易事，现在由于一桩枝节事件使会议破裂，是不利于全人类利益的。”他提议休会一天。

赫鲁晓夫不同意，理由是艾森豪威尔没有对美国的侵略行径表示歉意。

戴高乐说：“昨天，就在你离开莫斯科之前，你们发射的那颗卫星未经我们的许可已飞越法国上空 18 次。我怎么知道卫星上有没有照相机对我国拍照呢？”

赫鲁晓夫随口回答：“我们最新发射的卫星上没有照相机。”

戴高乐反问：“那么，你们是怎样拍下月球背面那些照片的？你不是很得意地让我们看过那些照片吗？”

赫鲁晓夫毫不迟疑地回答：“那颗卫星上是有照相机的。”

艾森豪威尔接口说：“噢，在那颗卫星上你们安了照相机！请说下去。”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说，苏联卫星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也拍下了别国的照片。

赫鲁晓夫这才面对面同艾森豪威尔说话。他说：“我们不能理解，你们究竟为什么在首脑会议前夕对我们采取这一挑衅行动。如果不出这种事，我们就会在友谊和最佳气氛中来这里会晤！”

艾森豪威尔说：“我不知道下任总统会做出什么决策。但是，无论在本次会议期间，还是我今后的整个任期内，都不会恢复这类飞行。”

赫鲁晓夫坚持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你们没有对侵略行为表示歉意。”

至此，会谈已无法继续下去。麦克米伦说：“最好确定一下明天会晤的

时间，否则新闻界会认为首脑会议已经告吹。当然，有这种可能。”赫鲁晓夫当即纠正他说：“会议还没有开始呢！”

下午2时零16分，赫鲁晓夫一行离开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艾森豪威尔大声说道：“那个人要求得到什么样的道歉呀？”

戴高乐拉着他的手说：“我不知道赫鲁晓夫会干出什么事，但是，我自始至终同你站在一起！”

5月17日上午10时，美、英、法三国领导人为挽救这次濒临破产的首脑会议，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他们在爱丽舍宫决定向赫鲁晓夫发出书面邀请，请他下午3时来开会。

可是赫鲁晓夫没有到会来。他表示，在美国总统表示歉意之前，他不会参加事实上的最高级会晤。

三位西方国家首脑终于意识到，危机已无法度过。他们无可奈何地发表公报，宣布这次最高级会议失败。

5月18日，赫鲁晓夫在巴黎夏约宫对几千名听众发表讲话，再一次抨击美国U—2飞机的间谍飞行和美国政府拒不认错的态度。

一次失败的间谍活动引发的危机，最终导致了这次筹划已久的东西方首脑会议的失败。

（薛兵）

加勒比暴君的下场

在南美洲与北美洲之间的加勒比海上，有许多岛国，靠近北部，有个岛国叫多米尼加共和国。

1961年6月1日，对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民来说，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清早，国家广播电台的电波将哀乐传遍全国；播音员用哭丧的声调宣布：“在特鲁希略当政三十一年后，我们的救星、国父、劳动人民的伟大捍卫者、当今世界的天才、共产主义的头号敌人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利纳大元帅不幸遇刺身亡……”

这位“伟人”其实是个头号暴君，是个作恶多端的独裁者。在他统治多米尼加漫长的三十一年中，欠下了无数血债。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也是个屈指可数的恶人。

特鲁希略把自己吹嘘为民族的大救星、经济独立的创造者，自封为“大元帅”和共和国的“国父”、“民族解放者”、“母亲的保护人”、“全国第一教师”、“第一记者”等等。他还把首都圣多明各改名为特鲁希略城，并下令在首都的各条街道上为自己建造数以百计的纪念碑。他还决定将全国最高的科尔基列山更名为特鲁希略峰；国内以特鲁希略命名的街道、医院、学校、村镇更是举不胜举。他甚至还为自己心爱的坐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并在纪念碑落成之际，破天荒地给这匹马授以总参谋部上校的军衔。像这样的荒唐事还有不少。他的儿子刚满五岁就获得了上校的称号。到十岁的时候，已经是准将旅长了。

特鲁希略不惜使用最野蛮的血腥手段来巩固他的政权，从而获得了“加勒比狼狗”的称号。1937年，他下令屠杀了一万二千名在多米尼加劳动的海地工人，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不能容忍任何反对他的人存在，在他统治的岛国上，他的“国家安全局”为反对者准备了监狱、集中营和死刑。

此外，为了对付为数众多的政治流亡者，他派出了大量间谍和杀手，这些人遍及美国、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古巴、海地、洪都拉斯等地，进行绑架和暗杀活动。

塞尔希奥·本科斯梅是一个流亡的民族解放组织的卓越领导人，长期以来，他为反对特鲁希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在美国著书立说，发表政论文章，揭露特鲁希略一伙的种种罪行。正因为这样，他成了特鲁希略的头号敌人，招来杀身之祸。

两名刺客——鲁多维诺·菲尔南德斯和路易斯·德·鲁比罗沙接受了行刺的秘密指令。他们潜入纽约，布置跟踪，并盗得本科斯梅住宅的钥匙，闯入他的家。

本科斯梅正在浴室里刮胡子。鲁比罗沙扣动了扳机，随着一声枪响，本科斯梅栽倒在地上。凶手顺手关上门逃走了。但本科斯梅并没有立刻死去。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赶到现场时，他还有一口气，竭尽最后的力量说出了凶手的姓名。

刑事侦察人员开始搜捕鲁比罗沙，并很快就掌握了他的行踪。然而，突然从上面来了立即停止调查的命令，使侦探们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特鲁希略已经通过美国政府使了手脚。

两名刺客平安地回到特鲁希略城，并获得高额奖赏。

1953年10月2日凌晨，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附近又发现一名男尸。警

方检查后确认死者名叫安德列斯·列肯尼亚，是流亡国外的多米尼加共产党员。凶手就是上次刺杀本科斯梅的杀手之一菲尔南德斯。

继列肯尼亚之后遇害的是赦苏斯·玛利亚·德·加林德斯教授。他原是西班牙人，三十年代曾参加过反佛朗哥的战斗，并在革命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当佛朗哥夺回西班牙政权后，加林德斯流亡国外，他选中多米尼加作为自己新的祖国。主要是因为这里也讲西班牙语。此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特鲁希略本人建议他担任一个报酬优厚的工作——做他的家庭教师。

家庭教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家庭的一员，因此，特鲁希略一家在他面前讲话几乎没有什么顾忌。这些谈话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商业欺诈行为，以及如何镇压反对派的反抗，如何屠杀人民，盗窃国家和人民财富等等。

加林德斯在特鲁希略家一住就是七年。在此期间，他痛切地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充当了普天之下最凶残的一个罪犯的帮闲文人。教授开始搜集特鲁希略犯罪活动和暴政牺牲者的材料，并准备有朝一日利用这些材料向独裁者清算。

加林德斯于 1946 年来到纽约，成为多米尼加流亡者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在各种英文和西班牙文版的报刊上接连不断地发表揭露特鲁希略暴政的文章。同时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开始撰写《特鲁希略时代》一书，并准备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发表。

1956 年 3 月 12 日晚 9 时许，加林德斯教授从哥伦比亚大学下课回家。一个学生建议用车送他回去，加林德斯同意了，但随即又客气地补充说，他就在中央公园角上的哥伦布地铁下车，从那里乘地铁回家一样方便。

后来的调查表明，加林德斯教授是在晚上 9 时 45 分在地铁车站下汽车的，这时纽约熙熙攘攘的交通已逐渐通畅。但地铁入口处还是人来人往，源源不绝。

教授沿着阶梯缓缓而下。当他走向通往月台的长长过道时，一个陌生人手拿着一支香烟来向他借火。教授刚把手伸进衣袋，这时出现了另一个陌生人。加林德斯突然觉得太阳穴被狠狠的一击，不由自主地弯下腰来。两个陌生人一左一右把他扶住，其中一个把他的手扭向背后，另一个人取出一支针管。教授只觉得大腿上被什么刺了一下，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为了不露破绽，其中一个人走到电话亭前做出打电话要急救车的样子。他刚挂上电话，两个穿白大褂的人就出现了。四个人把跌跌绊绊的加林德斯教授弄出地铁，匆匆塞进一辆急救车里开走了。

加林德斯虽然不是美国人，但却受到美国公众的尊敬和爱戴。就在他失踪的第二天，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拉克亲自到联邦调查局，要求立即追查教授失踪一案。在加林德斯教授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教授的一封信，信中流露出他的担忧心情。他写道：很长时间以来，他就发现有人跟踪他。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多次打电话威胁他，暗示特鲁希略秘密情报机关的特务已受命要杀害他。

为此，联邦调查局展开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最后证实，加林德斯教授确系特鲁希略派来的特务所绑架。绑架者使用了一切酷刑，企图让教授交出《特鲁希略时代》一书的手稿，但终未能得逞。这本书于 1958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这时作者早已不在人间了。的确，这是一本对刽子手和嗜血暴君的血泪斑斑的控诉书，无怪乎特鲁希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它的出版。

特鲁希略出身低贱，原是一个偷牛贼。到后来竟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岛三

分之一土地、百分之八十糖厂的主人，他的财产估计约为八亿美元，也有说在二十亿美元左右。他除了有各种各样的封号（其中绝大多数是他自封的）外，匹茨堡大学还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其它五所美国大学也竞相模仿，授予他各种头衔。罗马教皇给他颁发了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特鲁希略共得到过八十多枚外国的勋章和许多荣誉称号及封号。

他是怎么得到这一切的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清楚地知道对谁可以大喊大叫，对谁则应当百依百顺。而归根结底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死死地抓住一个对他十分有利的机会，这就是美国对这个岛国的占领。

美国占领军 1916 年进驻多米尼加后，长期感到在同当地居民合作的问题上很伤脑筋。而年轻的特鲁希略则是美国组建的国民自卫队中最俯首听命的一个。尽管他的历史并不光彩，却并不影响他成为警官和军队首领。

1921 年 3 月，他在镇压岛国居民暴动的诺里亚战役中表现出色，深得占领军的信任。

1924 年，美国人撤离该岛时，任命特鲁希略为地方警察局局长。而这支警察部队后来就成为国家军队的基础。

1925 年，巴斯克斯总统任命他为全国警察首脑。1927 年就任陆军总司令。

1930 年 2 月，他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登上了总统的主座，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血腥统治。

他在给小学生编写的课本里这样写：警察是你最好的保护人，政府官员是你最好的顾问，法官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你得知谁企图背叛现存制度就当检举他。因为他是最坏的人。

特鲁希略个头矮小，身高只有 1.65 米。他习惯于接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工作，拼命地聚敛财富，挖空心思进行恐怖活动，在这两件事上，他做得都得心应手。他看上去相当年轻，喜欢体育运动。他拥有三艘游艇、三十五辆私人汽车，五座华丽的行宫。他随时都穿着防弹衣，就连身穿在美国定制的、价值一万美元的大元帅饰金礼眼时，也不忘把防弹衣穿在里面。

他的经商才能可谓无与伦比。当他才当上军队首脑，个人财产还很有限的时候，他让自己的妻子担任了负责浆洗军队被褥衣物的洗衣作坊的总管，并在各地设立分号。而她的丈夫则按月从军饷中扣除差不多一半的浆洗费。

这是他发家致富的第一步。后来，特鲁希略家族从事钢铁生产、药品销售，开办水泥厂和糖厂，生产可可、奶油、烟草和肉食品。全国的保险公司都控制在他手里。

当特鲁希略准备开办一家大油漆厂时，他立即颁布了一项重要命令：所有的房主每年都必须油漆房屋的临街部分。他开办了一家生产铁蒺藜的作坊，就下令全国所有的庄园必须用这种带刺的铁丝来加固围墙和篱笆。他想在捕鱼业上发财，却又不想花钱买渔船，于是命令海军都拖上渔网到海上捕鱼。正是靠着这样不顾一切地损公肥私、牟取暴利，他才迅速地成为这个小岛国的首富。

特鲁希略对美国人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美国人也就器重他，利用他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当特鲁希略的财富几乎覆盖了个国家的所有领域时，就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公司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这，预示着独裁者的末日将要到来。

当世界各国的报刊上出现许多谴责特鲁希略暴政的文章时，罗马教皇也

批评多米尼加经常发生侵犯人权和民主的行为。对此，特鲁希略的反应是派手下的人往礼拜堂里扔炸弹，或者将神职人员的汽车偷走，丢在妓院门口。

他变本加厉地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活动，把犯人十人一组关在一间不足三平方米的牢房里。三平方米里只有一张双人床那么大的面积，十个人无论如何睡不下来，只好站着、或者蹲着。这是故意折磨他们。不仅如此，房里还没有窗户，所有人都被脱得精光，不给水喝。每天深夜，一个个拉出去审问、毒打，这样折磨到天亮。大多数人都这样死在牢里。

特鲁希略的儿子、空军司令朗菲斯·特鲁希略手段残忍更是举世罕见，他曾经把一个叫米格尔·巴埃斯的囚犯饿得半死，然后叫人给他送去一大盘米饭和肉。当这个可怜的人狼吞虎咽吃完了这顿佳肴后，朗菲斯告诉他：“你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肉？是你儿子的肉！”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叫人用托盘端着小巴埃斯的头颅来，放在犯人的面前。巴埃斯当即因心脏衰竭而死。

1959年6月，在古巴革命胜利的鼓舞下，由多米尼加流亡者组成的三支自由战士队伍杀回祖国，180名武装人员占领了特鲁希略的山间别墅，准备开展反对特鲁希略的游击战争。

特鲁希略出动了全部兵力，出动飞机和快速战舰进行围剿。起义者在联系中断、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只好放下武器投降。特鲁希略再一次显示了他的豺狼本性。他下令把所有的投降者无一例外全部折磨致死。其中大约有20多人被特鲁希略的儿子用飞机带到二千多米高空，然后一个个把他们从机舱里推出去。说是要亲眼看看这些游击队员们是怎样在空中“飞翔”的。

特鲁希略不仅在自己国内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他甚至还策划了对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库尔特的谋杀。

他们俩之间的仇恨由来已久。早先，当贝坦库尔特在多米尼加经商的时候，是特鲁希略家族垄断资本的有力竞争者。然而从法律上说，贝坦库尔特是合法的，是无懈可击的。为了打击竞争者，特鲁希略采取流氓手段，派人在大街上袭击了贝坦库尔特，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从此贝坦库尔特离开了岛国。后来，当他成为委内瑞拉总统后，多次在国际舞台上批评特鲁希略的暴政。

为了杀一儆百，特鲁希略决定干掉他。

刺客们在哈瓦那国际机场汇合，除了两名前德国党卫军军官外，其他几个人都带着伪造的古巴旅游者证件。从这里，他们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来到加拉加斯。

刺客们准备在1960年6月24日的加拉加斯阅兵式上杀死贝坦库尔特总统。他们把定时炸弹装进停在路边的小汽车里，准备等总统的汽车经过这里时引爆。这种“汽车炸弹”是黑手党惯用的杀人武器。

谋杀计划虽然布置得很周密，却仍有一点小小的疏漏：总统的汽车被炸坏了，副官当场毙命，但总统只受了一点轻伤。

委内瑞拉保安机关很快就查明，谋杀事件出自多米尼加特务组织之手。贝坦库尔特总统向美洲国家组织提出了一项正式申诉。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美洲国家组织公布了调查的结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谋杀贝坦库尔特总统的命令正是特鲁希略本人下达的。

1960年8月，在哥斯达黎加举行了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美国政治家们希望利用这个高级别的会晤建立一个反古巴的统一战线。而美洲国家外长们则是要求立即断绝同多米尼加的外交关系，并实行武器禁运和经济封锁。

美国国务卿赫脱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这也就意味着，特鲁希略已经被所有的朋友所抛弃。

同样地，在多米尼加国内，一场旨在推翻特鲁希略的军事政变也在悄悄地酝酿之中。策划这场政变的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什么进步力量，九名首要人物都是特鲁希略权力集团中的亲信。前外交部长兼特鲁希略党主席莫蒂斯托·狄亚士和他的弟弟胡安·托莱斯·狄亚士将军是这个政变团伙的头头。此外，特鲁希略的堂妹夫、军事部长罗曼·菲尔南德斯将军和他的卫队长也参与了这次政变。

1961年5月30日傍晚，暴君特鲁希略突然决定要外出视察，要他的堂妹夫菲尔南德斯将军陪同。他的汽车一驶出官邸，叛乱分子们的行动也开始了。他们清楚地知道，特鲁希略将在拉达梅斯别墅稍作停留，然后前往畜牧场过夜。七十高龄的特鲁希略经常带着他的情妇来这里寻欢作乐。

叛乱分子的计划很简单：用两辆汽车封锁从别墅通往畜牧场的公路，第三辆汽车执行狙击任务，务必置特鲁希略于死地。

特鲁希略乘坐的雪佛龙轿车是1957年生产的，既没有安装防弹玻璃，也没有铁甲车身。只是在司机（也就是他的保镖）身边放了一支自动步枪。汽车驶出城外，上了交通干道。这时，那辆执行狙击的汽车也启动了，远远地跟在后面。一共有三个枪手，荷枪实弹准备行动。

独裁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末日就在眼前了，躺在轿车后座上昏昏欲睡。司机突然发现前方有两辆汽车同时朝这边开过来，感觉不妙，赶紧刹车。后面那辆车迅速逼近，三名枪手从车窗里探出身来同时射击。

特鲁希略已经无路可逃了，他跟在司机后面跳下车，钻到轿车底下隐蔽。一名枪手走上前，端着自动步枪，对准特鲁希略射出长长的一梭子弹。这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双腿抽动了几下，终于了结了他邪恶的一生。特鲁希略死后，以军事部长罗曼·菲尔南德斯为首的军人集团掌握了国家政权。特鲁希略家族的成员纷纷携巨款逃往国外。国家最高法院后来缺席判处了他们十年至三十年有期徒刑，这是对他们所犯的盗窃罪、诈骗罪、伪造证件罪、谋财害命罪以及他们所参与的大量犯罪行为的惩罚。

（孙石夫）

美国大卫邪教惨案

美国是个信仰非常随便的国家，而美国人生性又偏爱新奇刺激，越是稀奇古怪的信仰越能吸引人，加上近年来有大量的移民流入，世界各路“神仙”也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因此，美国的邪教组织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目前在全美邪教组织多达 5000 个。其中最骇人听闻而又轰动一时的，也许要算“布兰奇·大卫”教派了。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个名叫维克托·霍特夫的保加利亚移民在洛杉矶创立了“布兰奇·大卫”教派，1935 年将总部移到得克萨斯州韦科。

1955 年，霍特夫去世后，由洛伊丝·罗登控制。

1987 年，罗登病逝，一个名叫考雷什的人，开枪打伤罗登的儿子，通过内部火并而夺得教主的地位。考雷什用枪逼迫罗登之子离开教会后，便着手建立一座武装起来的封建王国。

考雷什生于 1960 年，原名弗农·豪厄尔。他中学毕业便辍学，成为流生，但谙熟《圣经》，口才极好，能从早到晚不停地绘声绘色地讲述世界末日的故事，使信徒们在恐惧中不吃不喝不睡，着魔般地听下去。凭此“本领”，他在 1980 年加入“大卫”派教会，1987 年就登上第三任教主的宝座。他以如簧之舌大力发展信徒，目前在世界各地拥有信徒 2000 余名，成为一个国际性邪教组织。

考雷什在教会中自封为活先知，宣称“如果《圣经》是真实的，那我就是耶稣基督”。他装神弄鬼，自称言行受意于上帝。他在 1984 年娶教徒的女儿、14 岁的雷切尔为妻，随后，他宣布上帝告诉他应有许多妻妾。于是，在教会内至少有 15 人被选为妻妾并为他生下了十几个孩子。

考雷什不仅荒淫无度，而且还是个虐待狂，尤其对儿童惨无人道。他常施暴于儿童，把教内儿童打得皮肉青紫，血流满面。他相信孩子的血可以帮助他将来从坟墓里复活，成为救世主。他对孩子还采取极其严厉的控制和洗脑。孩子门平日做错了事，甚至进餐时碰翻了杯子，洒了牛奶，都要遭到极严重的责打。他还对孩子们施行军训，不断向他们灌输以身殉教思想，欺骗他们说，殉教者可以直接进入天堂。他严禁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亲近，教他们以“狗”来叫他们的父母，而以“父亲”来称他自己，以培养孩子们对他个人的忠心。

在平日的讲道中，考雷什大肆宣扬暴力，鼓吹以暴制暴，不向敌人投降。他告诫信徒们同不信该教的人做好最后作战的准备。为此，他把“布兰奇·大卫”教派的总部建在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韦科郊外一个连绵起伏的牧场上。这座取名为“卡梅尔山庄”的庄园，与其说是座教堂，不如说是座军营，它没有哥特式的尖顶，也无巴洛克式的球顶，却有一座岗楼般的望塔。庄园内修筑了许多地下掩体，囤积着大批武器和食品。庄园四周树木稀少，视野开阔，无论白天、黑夜，都有持枪信徒站岗、巡逻，呈现出一种大敌当前的紧张气氛。

考雷什并非是杞人忧天，他的“敌人”果然来了，只不过不是什么不信该教的异教徒，而是一批执法的特工军警。

1993 年 2 月 28 日，这是个星期天。上午 9 点 30 分，在卡梅尔山庄，本该是教徒们做完礼拜前往庄园各处打杂的时间，照理是人声喧哗的时刻，但不知何故，此刻却显得死一般寂静。

就在这时，两辆运牛卡车开到庄园前嘎然而停，从车内跳下来 100 多名联邦烟酒与火器管理局特工人员。他们全副武装，犹如神兵天降，在两架直升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直扑卡梅尔山庄内那 6 栋相连房屋组成的建筑群。一路直取大门，准备破门而入逮捕教主大卫·考雷什；另一路准备架梯爬上二楼，占领教会武器库；第三路则负责集中教堂内的妇女和儿童，保护他们撤出。

可是，当他们冲进大门口，刚爬上二楼的窗户，就听到“砰、砰、砰”三声枪响，接着，从大门后，从窗边的木板墙里，从三层楼高的岗楼上射出了雨点般的枪弹。很显然，庄园内早已有所准备。数名特工人员应声倒下，其余的赶紧龟缩到卡车后面进行还击。在大约 45 分钟的激烈枪战中，4 名特工人员阵亡，16 人受伤。特工人员虽有直升机掩护，但火力仍不敌教会武装，只好请求停火。在教徒的枪口下，特工人员扔下武器，灰溜溜地退出了占地约 10 英亩的卡梅尔山庄。

烟酒与火器管理局的特工人员，是带着搜查证袭击卡梅尔山庄的。他们奉命收缴教会的非法武器，并据此逮捕考雷什。因为有证据证明“大卫”教派教主考雷什已非法购买了近 20 万美元的军用枪支弹药，其中包括 100 支步枪、冲锋枪和机关枪，大批手榴弹与能组装爆炸装置的零部件。考雷什扬言有朝一日要采取类似洛杉矶骚乱的暴力行动，并使之相形见绌。此外，考雷什还有虐待儿童的犯罪嫌疑。

考虑到庄园内有大量的武器弹药，这个管理局经过 9 个月的调查和派坐探卧底后，根据教徒的活动规律，制定了周密的偷袭计划。选择星期天上午 9 点 30 分动手，是因为那时教徒刚做完礼拜，正在回各自房间的途中，手中没有武器，易于袭击。根据原计划，藏有特工人员的运牛卡车抵达庄园后，在 7 秒钟内一组特工人员就应冲进大门，22 秒钟内另一组特工就该登梯从二楼跳窗直奔武器库，60 秒内就可控制住整个庄园。出人意料的是，如此严密的计划竟会在实施的第一分钟内便完全破产。

原因何在？管理局认为，有人事先向大卫教派泄露了这一偷袭计划。那天上午乘乱离开庄园的该局坐探报告说，上午 8 点多钟，他就听到考雷什在布置信徒伏击即将到达的特工人员，只可惜当时他被人盯得很紧，无法将情报送出。另外，在特工人员抵达时，已有 11 位新闻记者拿着摄像机在等候拍摄偷袭的场面。很显然，偷袭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烟酒与火器管理局的特工人员，在偷袭失败撤出庄园后，依然从外面继续包围着大卫教派这座要塞式的据点。当天下午 6 点左右，有几名信徒突然持枪冲出据点，朝特工人员开枪，结果被击退。为防止教徒突围，特工人员请求增援。没多久，一支装甲车队和联邦调查局的人质营救队便迅速赶到现场，从而开始了对卡梅尔山庄长达近两个月的武装包围。

联邦执法军警与持枪的邪教教徒紧张地对峙着。装甲车在庄园周围“轰隆隆”地开来开去，手握现代化武器的军警在来回巡逻，而武装的教徒凭借坚固的岗楼，不时向外面放着冷枪。

根据坐探掌握的情况，据点内约有 75 名信徒，包括 25 名儿童。但据后来考雷什在谈判时提供的数字，里面一共有 132 人，其中 46 人是儿童。因此，当务之急是迫使考雷什释放儿童和妇女。

在装甲车的武力威胁和广播喇叭的心理攻势面前，考雷什似乎有所退让。在围城进入第三天时，考雷什陆续释放了 16 名儿童和两名妇女，并表示

如果电台同意播放他事先录制好的一份声明，他愿意缴械投降。联邦调查局的执法官员喜出望外，立刻与当地几家广播电台联系，很快就播放了考雷什长达 58 分钟指责政府和宣扬其教派主张的录音。可是，当执法人员作好准备，调来囚车，焦急地等待教徒们“和平地走出”庄园时，据点内却毫无动静。很明显，军警们上了考雷什的当。

尽管如此，与考雷什的谈判依然通过电话继续进行着。3月8日，考雷什威胁说，他已做好战争准备，声称他有足够的火力摧毁整天在庄园外耀武扬威的装甲车。

执法官员感到问题严重，又要求增援。国防部长阿斯平立即批准调动 4 辆海湾战争中使用过的 M—1 型坦克开往韦科，同时将执法军警增加到 400 余人。

事隔两天，紧张气氛又有所缓解，考雷什同意继续放人。到 4 月 18 日，考雷什一共释放了 37 人，其中包括 21 名儿童。在此期间，考雷什又多次许诺投降，结果均未兑现。

为迫使考雷什早日投降，执法人员可谓费尽心机。他们从一开始就切断了庄园的水电供应，但这吓不倒考雷什，庄园内修建了独立的供水系统，并储备有灯油，还囤集了大批食品，足够长期固守。

一招不行，执法人员又换一招，施行心理战术。除了 24 小时不间断向庄园内打电话，与考雷什举行马拉松式的谈判外，还出动直升飞机在据点上空盘旋，制造噪音和紧张气氛。夜间则用耀眼的探照灯扫射据点内的房屋。后来又装上高音喇叭，昼夜对着据点播放圣诞音乐和考雷什与执法官员谈判的录音，希望教徒在精神崩溃后能走出据点投降。但这一招也失败了。据从庄园放出来的信徒说，当执法人员播放噪音时，他们便集中到地下掩体内开摇滚音乐会，由考雷什亲自演唱。此外，考雷什还不断地给信徒讲道，为信徒们打气，说上帝会派天兵天将来拯救他们，会给每个信徒送来豪华汽车和珠宝，还会让他们到美国最大的美斯百货公司免费购物，等等。有 20 多个起了异心的教徒一度想离开，但都被他的说教劝阻，终究还是没有走脱。

4 月 19 日，围城进入了第 51 天。清晨 6 点，据点内正在熟睡的教徒被突如其来的撞墙声和外面坦克的隆隆声惊醒。原来是联邦执法军警的坦克正在捣毁据点房屋的墙壁，并往里面喷射催泪瓦斯。

一辆经过改装后安有撞墙锤的 M—60 型坦克，首先将据点大门边的墙壁撞开了一个约 2 米高、3 米宽的窟窿，往里面喷射催泪瓦斯。随后又转到左角，在通往地下掩体的房屋墙上撞开另一个窟窿。最后又开回到大门前，将整个大门撞毁。

10 分钟后，联邦调查局发言人里克斯在现场附近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联邦执法人员的这一行动是在持续 51 天的对峙后，所采取的“符合逻辑的下一个步骤”。他说，坦克将继续捣毁据点房屋的墙壁，往里面喷射催泪瓦斯，直到把坚守在里面的教徒轰出来。他还告诉记者，在出动坦克前 5 分钟，执法官员曾打电话给负责谈判的考雷什的副手施奈德，警告他如不主动撤出据点，执法人员将往据点里喷射催泪瓦斯。但施奈德毫不理会，把电话机摔到了地上。

就在里克斯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同时，考雷什却在庄园内举行世界末日来临的“仪式”，他把庄园里所有的人都召集在一起，然后手拿“圣经”，在讲坛上跪下并大声祷告。就是在这时，他还是没有把殉教计划向信徒们宣布，

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要求信徒们与他一起殉教。他还特别强调，要保护好庄园里的孩子们。

实际上，考雷什已经意识到末日的来临，他早已制定了放火自焚的计划。但他仍不动声色地叫信徒把孩子们集中到二楼寝室去，说是为了保证孩子的生命安全。其实，二楼是起火后最难逃脱的地方。当家长们都离去后，考雷什的亲信便向孩子们发了裹着糖衣的毒丸，还未等到火起，孩子们都已服了药，无一幸免地死在房间里。

11点30分，坦克恢复撞墙。

12点10分，火舌突然从据点右角楼房的窗口探出来，紧接着据点左端的楼房和背后的岗楼也都冒出黑烟。不到10分钟，高达数十米的烈焰便借着风势，很快吞没了据点所有的房屋。12点27分，从据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腾起一个巨大的火球，显然是武器库爆炸了。

12点30分，部分房顶开始在烈焰中倒塌。

12点38分，消防车赶到，但牧场上找不到消防水源，而且大火早已失去控制，无法扑灭了。

火光中，有信徒冲出据点举手投降。但一共仅9人逃出火海，据点内的另外86人，包括24名儿童则葬身火海。烟酒与火器管理局发言人基洛林告诉记者，虽然据点里有地下通道，但在这样的一场大火中，即使是藏在地下通道的人也难以幸免。

烈火在牧场夜晚的寒风中渐渐熄灭，整个庄园除孤零零地竖着一座水塔外，全部夷为平地。4月20日一早，在瓦砾残垣的废墟中，调查人员发现被烧焦的尸体东一具西一具地蜷缩在余烬中。据负责此案的首席医疗检查官皮尔沃尼公布的数字，截至4月26日下午止，一共发现53具尸体。

验尸人员通过指纹和牙齿X光对照，已辨认出几具尸体，其中有考雷什妻子雷切尔的哥哥琼斯，还有一位18岁的名叫多伊尔的姑娘，这两人身上均有枪伤，据说起火时曾有部分教徒企图逃出火海，结果被其他教徒开枪打死。

雷切尔本人，他的3个孩子和他的父亲也都消失在大火中。死者中还有24名英国教徒以及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教徒。

惨案发生后，美国电视网作了充分报道，美国公众为之震惊，纷纷对政府采取如此激化矛盾的行动提出质疑：这一进攻行动是否必要？时机是否合适，方法是否妥当？全国教会协会的领导人坎贝尔说：“我们认为首先考虑到的应该是耐心再耐心。”考雷什的律师指责说：“我对当局这么做感到震惊。我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等待下去，让此事和平地结束，反而要在昨天采取挑衅行动呢？”

面对公众的巨大压力，司法部长雷诺当天表示对韦科事件负责。她说，出动坦克的决定是她作出的，并得到克林顿总统的认可。她对大批人员的死亡表示遗憾。但同时又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他说：“我认为联邦调查局是以非常专业的方式，带着极大的克制采取行动的。”

克林顿总统也于次日宣布对韦科事件“负全部责任”。但他又强调韦科惨案应归咎于考雷什，“是他杀死了受他控制的人”。

大火发生后，联邦调查局发言人里克斯立即宣布是教徒自己纵火自焚，并称正是为了避免引起火灾，执法人员才决定用软管向据点里喷射粉末状的催泪化学物质，而不向庄园内投掷催泪弹。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斯特恩4月21日也表示，大火无疑是由教派成员自己

点燃的。

这场由联邦军警强行进攻而引发大卫邪教教徒自焚身亡的悲剧似乎结束了。但这场悲剧的余波却没有完结。

考雷什的信徒至少还有一千多人，目前散居在美国各地。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以东 100 公里处还各有一处大卫邪教的庄园。记者去庄园采访，结果被持枪信徒赶出来。记者罗伯特回忆说：“当时情况十分可怕，我们在黑洞洞的枪口指挥下，连头都不敢回，生怕他们失去理性向我们开火！”

庄园惨案发生后，各地大卫派教徒暂时隐姓埋名，似乎销声匿迹了。但是一些研究邪教的专家警告说，那些狂热的邪教分子并没有悄然自新，而像是一个定时炸弹，说不定何时会爆个石破天惊。他们预料，一个新的更具权力的大卫教派教主将会出现，他将统治众教徒为已逝世的考雷什报仇。

从后来的现场调查看，根据牙齿记录与 X 光照片资料证实，有一具被烧焦的尸体就是考雷什。这具尸体前额有一个弹孔，但不知是自杀还是他杀。

可是，有不少教徒坚信，考雷什没有死，他现在正在上帝的保护之下，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有一个名叫占士的信徒，他在庄园大火中侥幸逃生。他很肯定地说，考雷什没有葬身火海，而是从地下通道逃走了，他说，考雷什成功地实施了金蝉脱壳之计，他与另一名信徒交换了身份证，换了衣服，甚至把自己的牙箍也塞进那个替身的口中，从而布下一个非常缜密的圈套，使人们相信他死了。

占士说，他是亲眼目睹考雷什从地下通道里逃跑的。当联邦军警发动进攻时，考雷什躲在一个地下室里，继续指挥信徒作战。大家都戴上防毒面具，以防催泪瓦斯的袭击。起火后，人们四处奔逃，占士跃进一个半开着门的地下室，忽然，他听见一个柜子后有人在呻吟。他一看，柜子后是个地下通道，厚厚的暗门夹着一只脚。他用力把门撬开，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被夹的人竟是教主考雷什。他已剪短了头发，换了衣服。考雷什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就转身逃进了地下通道。

占士也企图逃进去，可是暗门关上了，无法开启。大约半分钟以后，一声强烈的爆炸声震撼着整个建筑物，暗门也被震开了。占士急忙爬进地下通道，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他爬呀爬，终于爬到一个地面出口。他说，他在出口处发现地上留有车轮的印痕，他相信，一定是有人驾车把考雷什接走了。

考雷什真的没死吗？也许这永远是一个谜，一个阴森森的谜。

人们在悲剧发生后，痛定思痛，纷纷对惨案发生的原因加以追究，以便防患于未然。

一部逼真地反映该事件的电影，在庄园还未焚毁之前便拍摄出来了。影片的压轴戏是烟酒与火器管理局首次进攻庄园的情景，但电影的重点并没有放在进攻上，而着重探求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影片以两小时的篇幅去揭示美国人的空虚而苦闷的精神生活，正是这种空虚苦闷使许多人热衷于从宗教中得到慰藉，为狂热的邪教打开了方便之门。另外，众多的合法枪店也使邪教徒轻而易举地拥有大量的枪支弹药，从而走上了暴力的道路。这就是影片所揭示的事件发生的原因。

这也是我们这篇故事，向读者朋友提出的一个值得关心的话题。

（承继）

共和国主席之死

1966年，73岁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立刻被卷进了这一场浩劫的漩涡中心。

6月1日，北京大学少数师生贴出了攻击北京大学领导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一些人宣传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时，毛泽东却委托刘少奇和邓小平根据情况处理关于这场运动的问题。

刘少奇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经过认真研究，作出了向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努力把“文化大革命”往好处想，他热情洋溢地对工作组成员和“造反”的学生代表说：“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对运动的设想是：“文化大革命要有斗、批、改三个阶段，7月底斗争结束，8月进入批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让群众把自己的意见全讲出来，看看我们以前犯了什么错误，通过批判，要搞清错在哪里。

我们领导了人民几十年，让人家批判我们几个月还不行吗？到9月就转入扎扎实实的阶段，12月底，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然而，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7月19日，在南方巡视了一段时间的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就召集会议，严厉地批评了派工作组的问题。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号召，直截了当地把斗争矛头引向了刘少奇。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刘少奇在党内的排名，从第2位降到了第8位。

对于党的决定，刘少奇从来是不折不扣地服从的。但是，当他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孩子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刘少奇慈爱地看着他们，轻声他说：“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他请来了身边的警卫员、炊事员和驾驶员，希望大家对他提提意见。

一位老工作人员说：“我在这里工作好多年了，你没日没夜地工作，生活也很简朴。你怎么会犯了错误呢？”

也有人提出疑问：“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毛主席呢？”

刘少奇静静地听着，既不辩解，也不推卸责任，只是不停地抽烟。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说：

“我对这场运动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刘少奇没有想到，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林彪发表讲话，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破“四旧”，立“四新”。一股疯狂抄家的恶风，席卷了全中国。刘少奇的女儿乎平和儿子源源也参加了抄家活动。刘少奇发现后，立即制止说：“不要去。”他取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郑重他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抄家、打人是违反宪法的。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孩子们看到父亲庄严的神情，也感到了宪法的神圣。

在1966年10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做了检查，承担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部责任。事先，他曾把检查送交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亲笔写了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然而，当这份检查作为党的文件往下传达时，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

文革小组”故意删去了毛泽东的批示，到处煽风点火，挑动“红卫兵”把这份检查当成“活靶子”，掀起了新的“批刘高潮”。社会上流言四起，无中生有，满街都是大字报。面对这一片混乱景象，刘少奇痛苦难言。他把孩子们叫到面前，沉痛他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不容易。人民信任你，你就绝不能辜负人民。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了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说到这里，刘少奇再也说不下去了。

12月23日下午，中南海大院内，出现了第一批点名攻击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的大字报，从此，斗争“升级”了。1967年元旦，早晨6点钟，有两个人叫开了刘少奇家门，二话不说，便在四面墙上贴上了大标语。最后，还用排笔蘸了墨，在院子里的砖地上写了两行黑字：“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

1月3日晚饭后，一伙“造反派”冲进刘家，命令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到走廊去接受40分钟的批斗。刘少奇据理答辩，使“造反派”们无言以对。这时，一个家伙跳出来，让刘少奇当场背诵《毛主席语录》某页某条。刘少奇镇静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但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当时的历史背景，针对什么问题，当时所起的作用，在理论上有何创新，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篇文章，我都可以解答！”那伙人被说得哑口无言，便喊了几句口号，一哄而散了。刘少奇对妻子和儿女们说：“这种办法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不能和群众对立。你们要理解群众。群众认为我犯了错误，他们有权批评我……这些年党也犯了些错误，我主持中央工作，必须承担主要责任。群众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可能会有过火行动，你们也不能有对立情绪，要经得起委屈。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民……”

1月6日，有几个人气喘嘘嘘地找到刘家，说刘平平从学校回家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马上就要截肢了。王光美一听，直瞪瞪地望着刘少奇。刘少奇说：“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刚要走，又站住了，说：“周恩来总理关照过，不让我们离开中南海呀！”刘少奇发火了：“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

他俩一块赶到医院，可哪里有平平的影子！倒是源源和亭亭被扣在这里作“人质”。“造反派”见刘少奇亲自出面了，一时不知所措。源源大声叫喊：“妈妈，他们要抓你呀！”王光美一听，立即迎上去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夫人被“造反派”包围起来，他却只能带着孩子默默地离去。

王光美气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欺骗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们得意洋洋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这叫‘智擒王光美’……”

刘少奇和源源、亭亭回到家，只见平平正心神不安地等在门口。刘少奇急切地问：“平平，你的腿……”平平扑在爸爸怀里哭着说：“我的腿没事。他们把我扣在学校，就是为了把妈妈骗出去抓走啊！”

这天的晚饭，全家人都没有心思吃，刘少奇久久地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年龄最小的亭亭默默地捧着父亲那长满老人斑的手，禁不住伤心地啜泣起

来。刘少奇没有听见孩子的哭声，他在想：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决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既然宪法已经被这班人无情地践踏，还有什么东西能保障人民不受侵害呢？中国，中国人民，正面临着怎样的一场危机呢？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周恩来总理在竭尽全力支撑着危局。他得知王光美被骗出了中南海，立刻给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目打电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作法，责令他尽快把王光美送回中南海，“造反派”头目拒不执行。周恩来不得不派秘书直奔清华大学，坐在那里催他们放人。

王光美终于被放回来了。刘少奇见到她，只说了一句话：“平平、亭亭哭了。”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冲破了中南海庄严的红墙，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公开点名批评，每天都有一批家庭失去安宁。刘少奇坚持天天去看大字报，看见自己所熟悉的革命领导干部的名字被七歪八倒地涂划在纸上，有的还用红笔打上叉叉，心里真是又痛苦又迷惑。这一天，他看到一张大字报竟然恶毒地攻击朱德同志，他只觉得浑身热血直往上涌！他意识到局势的危急，决心挺身而出，挽救这个被动乱吞没的国家。他经过反复思考，找到了周恩来，提出一个办法：为了尽早结束这场运动，使广大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他甘愿承担全部责任，并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周恩来久久地沉默着，最后心情沉重地说：“这不行啊，这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啊！”

确实，根据宪法，人民选举的国家主席，只有人民才有权利罢免。然而，此时此刻，宪法在哪里？人民的权利又在哪里？人民代表大会不也同样冲得名存实亡了啊！

1月13日夜，刘少奇被接到人民大会堂，同毛泽东会见。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平平的腿好点了么？”

刘少奇苦笑了一下，说：“根本没有那回事，那是个骗局！”

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见面，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可是这半年来，毛泽东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而刘少奇则被扣上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然而，刘少奇仍然以自己善良的愿望，希望以自己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和人民的安宁。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着又向毛泽东提出几条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负。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该尽快把他们解放出来。二、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回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着烟。过了一会儿，他建议刘少奇认真地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梅洛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刘少奇的要求，但实际上间接地否定了刘少奇的要求。显然，他对这个结果还不满意。

临分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轻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可是，仅仅过了两天，江青又直接指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再次冲进刘家，让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站在桌子上接受批斗……

1月16日午夜以后，刘少奇家的电话铃响了。王光美接过电话筒，立即

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周恩来说：“光美吗？你要经得起考验啊！”王光美感动地说：“总理，你真好！”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一个打到刘少奇家的电话。两天以后，中南海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家，蛮横地扯断了电话线。从此，刘少奇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刘家成了中南海内一个特殊的监狱！

1967年7月15日，一份名为“刘少奇批斗大会”的文件，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手中。他毫不犹豫地签名同意，接着，又把文件名称改为“刘、邓、陶批斗大会”。

7月18日，是历史和人民蒙受耻辱的日子。大清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在中南海职工食堂吃饭时，发现了一张通知：根据江青指示，今晚召开揪斗刘少奇等人的大会。孩子们立刻跑回家去，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了爸爸。

刘少奇听完后，十分镇静。他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了。

中午，他把几个孩子叫到面前，郑重地取出两份文件。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让孩子接触中央文件。一份文件，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去年10月所写的检查的批语全文；另一份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罪状”。刘少奇望着自己尚未成年的儿女，一字一顿地说：“你们都看到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

可是，现在，历史和事实都已成了某些人任意揉搓的面团！

当天晚上，几十万群众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分别押在两个食堂，这里是所谓的“主会场”；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分别在自家的院子里遭受着污辱、围攻、谩骂以至殴打……

69岁的刘少奇，难以忍受“低头弯腰”的苦刑，他想答辩，却不能抬头说话，他想掏出手帕擦擦汗，一个巴掌打飞了他的手帕……

此时此刻，毛泽东、周恩来正在武汉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一起开会。接到中央警卫团的报告后，毛泽东说：“对刘少奇不能那样搞法”。并让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告诉一下北京”。

然而，从这一天起，刘少奇被单独关押在自家前院的办公室里，并加派了岗哨；王光美被关在后院；孩子们则被留在房子里。一家人相距咫尺，却不能见面！

1967年8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一周年，江青一伙策划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批斗行动，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各家的院子里，分别对他们进行批斗。

口号声中，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架进会场，王光美也押在一边。有人揪住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行拍照。刘少奇尽力挺直身躯，不肯低头。那些人使用《毛主席语录》拍打他，用力拧他的手臂，迫使他弯腰屈膝。他每一次高声答辩，都被口号声所打断。接着，会场上又响起了打倒邓小平等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号声。刘少奇没有跟着喊。“造反派”揪住他问：“你为什么大喊？”刘少奇严峻地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造反派”还要刘少奇、王光美向会场一侧的两幅红卫兵巨像鞠躬。他俩刚走几步，就被一拥而上的“造反英雄”团团围住，蛮横殴打。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鞋子也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猛然，王光美奋力从人群中挣脱出来，一把抓住了刘少奇的双手。刘少奇也紧紧地握住妻子的手不放。

这是两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在握手告别！

几个壮汉冲过来，硬拉开了他们，又把一幅画着绞索和红卫兵拳头的漫画，套在刘少奇的脖子上……

批斗会终于结束了。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两个多小时的拼力抗争，加上盛夏的炎热，使他精疲力竭，汗水浸湿了衣服。他强忍着伤痛，一进屋就叫来了机要秘书，拿出宪法丢在桌上，气呼呼地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职务？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污辱我们的国家！”他声音嘶哑了，用手指敲着桌面说：“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刘少奇的呼吁，国家主席的尊严，宪法的权威，在那个年代里，根本就得不到任何人的理睬。

从那以后，刘少奇被折磨受伤的腰背再也无法伸直，被打伤的右腿只能一瘸一拐地拖拉着，扶着墙一点点挪动……

有一次，他偶然看见了孩子们，不禁喜出望外，趁看守人员不注意，连忙一瘸一拐地挪过去，悄悄问：“你妈妈在哪里？”

孩子们告诉他：“关在后院。”

刘少奇又问：“你们好吗？”

源源低下头，说：“他们不许我们跟你说话、见面……”

哨兵过来了。刘少奇只得转过身，恋恋不舍地走开了。

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亲人。

9月13日，王光美被逮捕入狱，孩子们也被“勒令”滚出中南海。这一切，刘少奇毫无所知。他每天都站在关押他的办公室的后窗户前，向后院眺望，希望能见亲人一眼。可是他的眼前永远是那堵坚硬冰冷的砖墙！

不久，几个看守搜查了他住的房间，又强行抽去了他的裤带。这是防止俘虏逃跑的办法。刘少奇气得浑身打颤，半天爬不起身。当他知道妻子儿女都离开了家，这里已只剩下他孤身一人时，他的身体终于彻底垮了下来。

他常彻夜不眠，以致精神恍惚，却得不到足够的安眠药。

他的手臂在战争中负过伤，被扭打后旧伤复发，每天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好长时间。

他的腿伤久不痊愈，每天被押往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路程，竟要“走”50分钟，没有人敢去扶他一把。

他吃的是最劣等的饭菜，有时还给他吃剩饭馊菜，吃了整日拉肚子，他旧有的胃病也复发了。

他只剩下七颗牙齿了，但得到的主食却常常是啃不动的硬窝头。

重病和伤痛使他不能起床走动了，可身边的人谁去为他打饭，就会被骂成“保皇兵”。他只好打一次饭吃几顿……

刘少奇病得越来越厉害。医生和护士不敢好好诊治，每次为他治病前都要先开一阵批斗会，一边检查病情一边还要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医生用听诊器敲打他，用注射器乱捅他。刘少奇只能默默地忍受着。

因为，他要活下去，要活到正义和真理战胜的那一天！为此，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非人的折磨。

1968年夏天，刘少奇突发高烧，很快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

都有死亡的危险。当时的办公厅有个负责人对抢救的医生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被开除党籍，给党的‘九大’留活靶子！”

这场大病，使刘少奇再也无力起床了。医生向上级提出要让他住院治疗，但被否决了；又请求摘掉病人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刺激，也被拒绝了。因为长期卧床，刘少奇的双腿肌肉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太多被扎烂了，护理记录上明白地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刘少奇已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着生命。病痛和窒息，常常使他伸出双手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什么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目睹这种惨状，便把两个硬塑料瓶塞在他手里，不久，这两个瓶子竟被刘少奇擦成了“小葫芦”……

生活对于刘少奇，已经是一种惩罚了。活下去，是需要非凡的勇敢的。但刘少奇从来没有想过要自杀。

他等待着，等待着……

可是，刘少奇等到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他被荒唐地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永远开除出党”了！

更为残忍的是，这个在10月31日通过的决议，一直没有通知他，直到11月24日，刘少奇70岁生日的这一天，才让他知道。刘少奇当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聚在心头的悲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病痛，一起爆发了！他的血压骤升，体温也升到40℃。他不再紧闭双目，而是圆睁怒目！从这一刻起，刘少奇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他只在心中反复默念着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刘少奇又顽强地生活了一年多。

1969年10月17日晚，一位办公厅负责人来到中南海关押刘少奇的房间。这时的刘少奇，浑身骨瘦如柴，气息奄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插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医护人员说他“随时可能死亡”。这位负责人根据上面的命令叫人通知刘少奇转移。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把脸扭向另一边，不肯看报纸上的大字。护士又把报纸送到另一边，刘少奇干脆闭上了双眼。刘少奇的老卫士长凑在他的耳边，把这句话念给他听。刘少奇听见了，仍然一言不发。

晚上7点钟，刘少奇被送上了飞机。这时，他全身赤裸着，因为原来的衣服穿烂了，没人帮他换，更没人帮他补。他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放在担架上抬走的。9点钟，飞机降落在河南开封机场。刘少奇又被用救护车送进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小院关押起来。小院内外如临大敌，高墙铁门终日紧闭，屋内有岗，屋外有哨，在这里执行“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从此失去了自由，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接触……

深秋的夜风侵袭着刘少奇虚弱的身体。当天夜里，他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39℃，不住地呕吐。但有关负责人却宣称刘少奇“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紧接着，北京又来了指示：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药，追回一部分；不准到外面买药……

这一切安排，显然是要置刘少奇于死地。

11月5日，刘少奇再次高烧，整整抢救了两天才稍有恢复。刘少奇虽然不说话，却特别配合治疗。这位顽强的老人，仍然在坚持活下去。他要活到真相大白、冤狱平反的那一天！

11月8日，北京陪同来的人都被撤回了北京，连带来的药也全部带走了。临走时，他们还特意到火葬场去转了一圈。

11月10日，刘少奇体温升高。护士为他量体温，可体温表直到5个小时以后才取出来。

11月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高烧40℃，瞳孔反光消失。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报。

仅仅5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又过了两分钟，值班医生和护士才赶到现场。

又过了两小时，“抢救”人员才来到现场。

但是，刘少奇已被牢牢地锁在了地下室里。

刘少奇的老卫士长李太和火速赶到开封，只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过道上，身上盖着白床单，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巴上一片淤血，如雪的白发蓬乱着，足有一尺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告别了他毕生为之战斗的人民。

11月14日深夜12点，刘少奇的头面部被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用吉普车送往火葬场。吉普车容纳不了他高大的身躯，他的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外。他被当作“烈性传染病人”烧成了灰烬。他留在开封的遗物也被烧得干干净净。留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写着：

骨灰编号：123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

现住址：××××部队

与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年龄：71

性别：男

职业：无业

刘少奇曾经说过：“我活着是一个无产者，死的时候也要是个无产者！”

他没想到，自己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死后的骨灰证上却填着“无业”；更没想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带走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自己的姓名！

（薛兵）

里根遇刺

1981年3月30日这一天，银灰色的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早春天气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乍暖还寒。下午1点45分，美国总统里根乘坐林肯牌防弹轿车，前往希尔顿饭店参加一个集会。一辆护卫汽车紧跟在总统座车后面，车上坐满了白宫的特工人员。

里根在一个建筑工会组织的集会上讲演了18分钟。当他从希尔顿饭店专为重要人物通行的出口走出来时，他的那辆林肯牌防弹车就停在10公尺远的人行道边。马路对面站着一些不知是看热闹还是欢迎里根的人。在汽车的后右侧人行道上，警察拦了一道警戒线，警戒线后面是一群闻讯而来的记者。防弹车的后门已经打开，引擎已经发动，就等里根钻进汽车了。里根满脸笑容，把右手高高举起，向路对面的人群频频招手。他的贴身保镖们在汽车四周散开游动，密切注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

里根正欲一脚跨上汽车，一位美联社记者喊住他，“总统先生……”他想向总统提问题。白宫新闻秘书布雷迪笑呵呵地向记者们走来，想帮助总统回答记者的问题。

就在这一眨眼之间，记者群中一个身穿棕褐色雨衣的金发青年，突然拔出左轮手枪，瞄准里根“砰！砰！”连射两枪。里根一愣，好像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儿竟然呆住了。总统的保镖和现场警察向枪响的地方扑去。特工人员麦卡锡一个箭步扑在里根与开枪者中间。“砰！砰！砰！砰！”又是四枪！里根背后的特工人员猛地把里根的头压低，又使劲推了他一把，里根的脑袋在车门框上撞了一下后，倒在车座上。那特工人员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全身一下子压在里根身上，对司机吼着：“开车！快开车！”汽车一溜烟开走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内。现场乱成了一团。白宫新闻秘书布雷迪脸朝下倒在地上，左眉上方中了一弹。本来站在警戒线前背对记者的警察德拉汉特，脖子左外侧中了一弹，倒在布雷迪身边。那个跳过来挡住里根的特工人员麦卡锡右下腹中了一弹，也倒在地上。白宫特工人员、警察、还有一位工会成员扑在那开枪的青年身上，扭作一团。一个特工人员举着轻机枪，站在那堆人边上，高声吆喝他的同伴，注意有没有别的凶手。他既怕还有别的谋杀者逃掉，又害怕刚被众人制服住的开枪青年被别人杀死灭口。很快，那开枪青年被戴上手铐，头上蒙了件衣服塞进警车。警车一路尖叫着，在严密的防护下，凶手被押往华盛顿警察总局。

经警方初步审讯，开枪行刺里根总统的凶手名叫约翰·欣克利，现年35岁。他是现场唯一的嫌疑犯。

欣克利刺杀里根总统的动机是什么？真是既荒唐又可笑，仅仅是因为他害单相思，迷上了好莱坞的女演员乔迪·福斯特。这乔迪·福斯特是位19岁的电影明星，1976年她在《出租汽车司机》中扮演一个女主角。欣克利看过电影后，就给福斯特写了一封信，说他就要出发去刺杀一位总统候选人，以此来表示自己是个“英雄”，并以示他对福斯特的“爱情”。

1980年，福斯特退出好莱坞，到耶鲁大学学习高级法语和外交史去了。没想到欣克利又追到耶鲁大学，在福斯特的门前放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但福斯特对这种信件的反应极为冷淡，他们连一次面也没见过。

这个欣克利本是个游手好闲的阔少爷。他父亲是科罗拉多州一家石油公司的老板，他哥哥斯理，而且和副总统布什（布什后来接任里根当选为总统）家还有来往，算得上是美国上流社会的活跃人物了。也可能正是由于有这个条件，欣克利能饱食终日，到处游逛。

1978年，他跑到美国中部参加了纳粹党，还专门写过关于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论文。后来据说他总是扬言要杀人，纳粹党怀疑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鱼饵”，把他开除了。

1981年3月30日中午，欣克利仔细研究了里根当天的活动计划后，给福斯特写了一封信，称他这次确死无疑；信中说，他非常爱福斯特，也知道他的那些信使她讨厌，所以他要用刺杀总统里根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来博得她的尊敬和爱情。这种作法就跟《出租汽车司机》里的情节一样。

一个多小时后，希尔顿饭店门口的枪声响了。枪声使美国上下一片哗然，世界各大通讯社和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都用头版头条报道了里根总统遇刺这一特大新闻，全世界都震惊了，的确达到了轰动效应。

欣克利共开了六枪，其中除了击中布雷迪等三人外，另三枪打在里根的汽车上，因为是防弹车，有一颗子弹反弹到里根身上，从左肋下射进，击断第七根肋骨，钻到肺叶中部，那儿距心脏只有3英寸。据专家分析，打中麦卡锡的那粒子弹，本来是极有可能直接击中里根的。里根被送往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后，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手术，取出了子弹，12天后出院。布雷迪等三人，经过抢救后，也活了下来。

依据法律，美国政府起诉欣克利犯有非法购买、拥有、使用武器和谋杀总统、击伤麦卡锡、布雷迪、德拉汉特等13条罪行。如果罪名成立，欣克利将被判终身监禁。这下可使欣克利一家人坐立不安了。欣克利的父亲和哥哥四处奔走活动。

正当人们期盼着法庭对欣克利进行审判时，一项声明使警察局茫然，也使公众茫然：也就是在欣克利被捕后的第5天，他的父母声称“约翰是个有精神病的孩子”，应该先假定他是无辜的。

这一声明使警察局措手不及，因为根据美国法律，精神不正常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也就是说，要审判欣克利，首先要证实他父母的声明是错误的。为此，法院指定一名精神病专家对欣克利作了三个小时的检查，专家的结论是精神方面完全正常，从而证明欣克利应该接受审判。

可是，欣克利父母在发表声明时，早就作好了打官司的准备，他们用重金聘请了高级律师和精神病专家为欣克利辩护。法院对欣克利的结论一公布，马上就被被告的律师驳回，理由是：任何这类检查首先应由被告选择的专家来进行。

不知这其中有没有其它什么原因，虽然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驳回了被告律师的意见，但仍然决定把欣克利送到联邦教养院，作为期三个月的精神病检查。

俗话说，时间是最好的健忘剂，它能冲淡一切。围绕欣克利是否有精神病，一场马拉松式的检查翻来覆去，以至于里根总统忘记了伤痛，健康地走上讲台发表他动听的讲演，好像就没有发生被刺一样。人们也都渐渐地把这件事淡忘了。

1982年4月27日，里根被刺案发生整整一年多之后，美国联邦法院旧事重提，宣布成立大陪审团公开审理此案。法院内外挤满了人，被告席上的

欣克利若无其事，他的父母一声不响望着辩护律师，他们儿子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律师的身上了。

随着首席法官的宣布，审判开始了。第一项是听证会。由欣克利的4名律师和6名精神病专家为其辩护。这些律师表面上看似沉默寡言，文质彬彬，但他们轮流走上台进行辩护时，却口齿伶俐，论点明确。他们论证有力而简短，既不多说一句，也不夸大其词。看得出，他们起码办过上千宗辩护证词，一个个经验丰富，思维灵活。从律师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为被告开脱罪证，使欣克利由重刑变轻刑，由轻刑变无刑。但今天，他们深知这不是一般的刺杀案，辩护如果不成功，他们将会身败名裂，如果辩护成功，他们将名声大增。为此，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不仅收集了欣克利犯罪前的一切有利证据，而且还和欣克利本人进行了大量的接触，为欣克利出谋划策，并作过无数次模拟辩护，在精神上，他们已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A 律师说：欣克利是一个和普通正常人不同的人，在家时他做任何一件事都是无头无尾，没有连贯的思维，而且目光呆滞，沉默寡言……

B 律师说：提起欣克利刺杀动机，首先得看他追求女电影明星福斯特的所作所为。如果欣克利精神上正常，就不会写出狗屁不通的、歇斯底里的情书，打语无伦次的电话，记莫名其妙的日记……而这一切都是欣克利在一次也未见到福斯特时所干的……

欣克利的6名精神病专家从医学角度，运用大量事实证明欣克利精神病的存在。

最后，辩护律师作结论时说：根据以上的大量事实证明，欣克利的谋杀动机、谋杀准备和谋杀行为都是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据美国法律，欣克利应判无罪。

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和精神病专家的结论，受到了原告一方的律师和精神病专家的反对。他们的结论是：欣克利是一个精神方面完全正常的人。

原告一方的理由是：首先，欣克利是有重点地追求福斯特，而且始终如一。当他纠缠不成，便刻意模仿《出租汽车司机》中的求爱方式，三番五次购买枪支，练习枪法，设法接近重要人物；他决心以谋杀里根总统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行动”，来博得福斯特的爱情；他精心研究里根的活动时刻表，从洛杉矶赶到华盛顿，事先写好“求爱书”，提前到希尔顿饭店，混在最有利射击的记者群里，在最合适的时刻开枪，在没有被扭住前一连开了6枪，连伤4人……这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如果欣克利精神错乱是干不出来的。由此可以完全证明，欣克利谋杀动机是自觉的，谋杀准备是充分的，谋杀行动是在头脑清醒状态下进行的。

原告一方的结论是：对欣克利判罪是完全合法的。

欣克利的父母和亲属听到这儿，心都拎到了喉咙口！

被告的辩护律师说：“我反对！……”

原告一方毫不相让，说：“坚持我们的结论！……”

双方辩护律师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光听证会就开了40多天，一直争执不下。最后由陪审团审议。

按照美国的法律，司法当局审理案件时，要挑选社会上各方面的人士组成陪审团。陪审团的意见往往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站出来发表意见的是陪审团成员乔治·伯雷德。他认为欣克利精神错乱，不应判罪。陪审长罗伊·杰克森说：“反对！欣克利的谋杀行为和动机是显而易见的，这说明他精神方

面不存在有病，接受判罪是理所当然的。”

陪审团的绝大部分女陪审员表示同意杰克森的意见。他们又核对了一遍各种证据，当他们再次读了欣克利在谋杀前一小时给福斯特的求爱信后，一位名叫格雷涅斯·莱锡特的陪审员站了起来，说：“请注意：如果说欣克利精神正常，为什么他明知自己这么做确死无疑，但他还坚持这么做呢？”

另一位名叫马里兰·考伯琳的陪审员，马上表示强烈反对说：“先生，请不要漏掉这样的细节：欣克利在来往信件中，只要是讨钱的，都签上‘爱你的约翰’，如果不是讨钱，则只签个‘约翰’，这又作何解释？”……

激烈的争论从3月18日一直进行到3月21日，始终坚持欣克利有罪的马里兰·考伯琳和娜撒丽亚·布朗态度仍然坚决。对于这种马拉松式的审判，意志和精神已将法律抛开，意志和精神的胜利，就是法律的胜利，谁能坚持到终点，法律就被谁掌握。到3月21日傍晚，疲劳不堪的考伯琳再也“跑不动了”，精神和意志动摇了，无可奈何地同意欣克利无罪。布朗也明显地感觉到支持不住了，在坚持了最后10分钟后，也软了下来，投了同意欣克利无罪的票。

地区法官巴林顿·帕克长叹着气，摇着头，慢慢站起来宣读判决说：“起诉罪状第一条……起诉罪状第十三条……因被告精神错乱，无罪。”帕克同时宣布，欣克利立即送往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无限期住院治疗，直到能证明他对社会不再构成危险才能释放。

宣布完后，帕克无力地瘫坐了下去，欣克利却吃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母亲激动得哭了，尔后又和他父亲一起笑了。能不笑吗？虽然他们花费了近百万美元来雇请律师、精神病专家，但事实证明，这钱没有白花。

欣克利无罪开脱的消息传出后，里根夫人南希气愤地说：“岂有此理！”

看来里根也只有自认倒霉了，因为他遇上的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欣克利，发疯的公众。”

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疯子与精神病患者，他们出于各种很不相同的原因，把个人的病患归结为总统的“有害影响”。每天从早到晚总有几千人来到总统府白宫大门前，要求总统会见。据统计，美国这样的人员达4万名。其中最危险的有200人，他们扬言要谋杀白宫的主人。此外，恐怖分子和犯罪集团也常将白宫的主人和高级官员，作为实现自己“宏大理想”的目标。因而，每当总统要外出巡视时，数千名特工人员和警察便如临大敌，戒备森严。虽然情报处为保卫总统安全竭尽了全力，但总有空子被人利用。

里根并不是第一位被袭击的美国总统，里根还算侥幸大难不死，历史上有几位美国总统，像林肯、肯尼迪，都是遇刺身亡的。但里根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位被袭击的美国总统。不知下一位该轮到谁呢。

（贺金文）

榕帕尔毒气泄漏惨案

博帕尔市位于印度中部，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人口 70 余万，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城市。在古代，这里是印度教和佛教的圣地，前来朝拜进香的人络绎不绝，至今仍保存有许多气势宏伟的庙宇。这座在当今世界上只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城市，在一夜之间，却由于一场空前的灾变而震撼了全球。

1984 年 12 月 2 日的夜晚，寒风猎猎，博帕尔市的居民们劳累了一天，一早就关门闭户，上床休息了。整个城市很快沉浸在宁静的夜色中，大街上冷冷清清，偶尔才可见一两位匆匆赶路的夜行人。谁也想不到，一场浩劫，正在向熟睡中的人们扑来。

女工比姆拉·黛维有一个幸福温馨的 4 口之家。丈夫和公公白天工作累了，早已进入梦乡。她自己给孩子喂完奶，哄孩子睡着之后也上了床。半夜时分，比姆拉·黛维被老公公的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声吵醒。她自己也感到眼睛和嗓子像洒了一把胡椒面一样，钻心地疼。她赶紧将熟睡的丈夫推醒。一种本能的感觉使她的丈夫感到大事不好，催促她赶快抱着孩子逃跑。黛维在黑暗中抓起被子把孩子一裹，就冲出家门。街上一片混乱，到处都挤满了逃命的人群。四周充满惊呼和哭叫声，惊恐的人们乱挤、乱撞、乱跑，仿佛世界的末日来临了。黛维随着人流盲目地跑着，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使孩子活下来！她跌跌撞撞地只管跟着跑，不知跑了多少路，才跑到一个安全的避难处。她满以为这下可有救了，但打开被子一看，怀里的孩子早已被捂得停止了呼吸。她心如刀绞，禁不住失声痛哭。天快亮时，黛维挣扎着回到家中，只见患哮喘病的公公和自己的丈夫没有来得及逃走，都已经死去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然而，这不过是千万个受害家庭的一个缩影。天亮时，人们赫然发现博帕尔市的街头巷尾，尸体遍地，惨不忍睹。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瘟疫，还是核武器爆炸？为什么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可怕？

原来，在博帕尔的北部，距市中心 15 公里处，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工厂，名叫联合碳化物印度公司。“碳化物”是什么东西，许多人都不知道。实际上，这是美国的一家跨国公司，是专门生产杀虫剂西维因和涕灭威的农药厂。自 1969 年工厂开工以来，许多来自市郊和农村的穷苦人进厂当了工人。他们在工厂周围搭棚立屋，作为栖身之地。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就业人员增多，这里就形成了两座小镇——贾培卡希和霍拉。

发生在 1984 年 12 月 3 日凌晨的这场举世震惊的大惨案，就是由于这家农药厂毒气泄漏而造成的。

出事的头一个征兆出现于 12 月 2 日深夜 11 点。联合碳化物公司农药厂的一个值班工人，从控制室的仪表显示器上发现一个储气罐的压力在急剧上升。储气罐里装有 45 吨液态异氰酸甲酯，其温度达到 38℃，表明这种有毒液体正在气化，而且随着温度的上升，毒液气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尽管如此，储气罐上装有一个安全自动阀，它可使毒气进入净化罐中得到中和，化险为夷。但不幸的是，这个自动阀值此生命攸关之际却失灵了，同时，罐上的紧急阀门也不知怎么不起作用了。

值班工人感到问题严重，急忙叫来两名修理工，拿着简单的工具进行修理。可他们捣鼓了半天，依然无济于事。

3 日零点 56 分，由于罐内气体压力太大，终于顶开了储气罐阀门，剧毒

气体泄漏出来，腾空而起，在工厂上空形成一个巨大的蘑菇状气柱。浓烈的毒气趁着风势，向东南方向飘去，很快弥漫整个博帕尔市。异氰酸甲酯是一种剧毒气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在集中营就曾使用这种毒气杀害过大批犹太人。据有关专家指出，人只要吸入百万分之二，就性命难保。即便是幸存者，也会染上肺气肿、哮喘、支气管炎，甚至双目失明。

首先遭殃的是工厂周围贫民区的穷人。他们被刺耳的汽笛声惊醒，预感到大事不好，便胡乱穿上衣服朝外跑。刚出门，一股呛人的气味扑面而来，许多人被熏得头晕眼花，呼吸困难，顿时惊慌失措地四处奔逃。还有不少人被呛醒后，企图紧闭门窗避难，但死神却从门缝中伸进了魔爪。更加悲惨的是，有数百人尚在睡梦中就被毒气夺去了生命。

毒气随着寒风继续悄然无声地向东南方向蔓延，一会儿就扩散到离开工厂不远的市火车站。一位值夜班的车站工作人员正在接电话，一股毒气袭来，他立刻跌倒在地，很快就停止了呼吸。火车站的站台，是流浪乞丐过夜的地方。冷风中瑟缩一团的乞丐们，几分钟就有十来人相继毙命，其他 200 余人也都奄奄一息。毒气穿过街道，扫过庙宇，越过商店，继续向四方飘浮，很快笼罩了方圆 40 平方公里的博帕尔市区。

顿时，整个博帕尔市警笛四起，喊声连天。市民们纷纷从梦中惊醒，慌乱地夺门而逃。当人们弄清毒气泄漏时，全城的人蜂拥而出，或乘汽车，或骑自行车，或跑步，千方百计地想尽快逃离这座可怕的城市。许多人一出门就被毒气熏瞎了眼睛，但仍然挣扎着踉跄前行，一心想走出毒气污染的空间。许多人跑着跑着就倒下了，陈尸路旁。

农民甘恩，家离农药厂仅数百米之遥。在睡梦中听到牲口棚里传来几声巨响，他以为是牛在相互打斗，放心不下，可跑去一看，家里的两头牛已死在地上，还有头牛望着主人哀鸣了一声，也颓然倒地。这时，甘恩感到自己的眼睛被刺得剧痛，他大惊失色，立刻逃离这危险之地。

铁路警察穆罕默德·夏菲被毒气呛醒后，一把抱起两个女儿，与妻子一起逃命。他们跑到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外逃，但未等到火车开到，夏菲就晕倒在地，失去知觉。3 天后他在医院醒来时，才知道一个女儿已经死去，另一个女儿正在抢救，妻子下落不明。

年轻的电动三轮车司机苏尼尔·库马尔，家住离联合碳化物印度公司不远的街上。出事时，他正在市里接送客人。他看到街上乱哄哄一片，意识到家里会有危险，就飞快地赶回家，拉上父母和妹妹，箭一般地向城外逃去。库马尔开着车，渐渐感到自己双眼一阵剧痛，泪水不断往外流，最后实在受不了，他只好闭着眼睛拼命地把家人带到安全地方。一家人最后都逃离了死神的魔爪，但库马尔却从此失去了明亮的眼睛，成了终身领救济金的残疾人。

天亮了，整个博帕尔市像遭受中子弹袭击一样，一座座建筑物虽完好无损，但尸横遍地，犹如一座人间地狱。在马路边随处可见一堆堆尸体。当地政府不得不动员人力和机械来进行清理，对死亡者进行埋葬。博帕尔市的大小火葬场和墓地，顿时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死亡人数实在太多，最后只好采取集体埋葬的办法。整座城市哭声不绝，呈现出一片凄凄惨惨的景象。在新埋死人的野地里，一群群野狗刨开浅浅的墓地，拖出尸体争相撕咬。野狗被悲愤交加的人们赶走一群，又来一群。不久，那些吞噬人肉的野狗也一个个地倒地丧命了。

博帕尔市的大小医院和急救站前，一清早就挤满了前来诊治的受难者，

呻吟声、哭喊声混成一片。许多人眼睛已经瞎了。有的人呼吸困难，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尤其是那些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儿童，他们的肺不是太弱，就是太小，无法抵抗毒气的袭击。哈密第亚医院地处出事地区，事故发生6天以后，病人仍以每分钟一人的速度前来就诊。

这次毒气泄漏惨案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一次工业事故，它给印度带来的灾难无异于一场战争。据统计，3年来因这场事故死亡的人数高达2850人，20多万人的健康受到伤害，1000多人双目失明，许多人的肺、胃等器官受到永久性损伤，还有些人由于恐惧和悲哀过度，而精神失常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灾难的高潮终于过去了，但却没有结束，污染地区的孕妇生下的畸形儿大大增加，有些婴儿刚来到人间就悲惨地死去。树叶仍在脱落，草木大片枯死，湖水也变了颜色，博帕尔变成了恐怖的死亡之城。

事故发生后，当年10月才上台执政的印度总理拉·甘地，特地赶到博帕尔市，除对受害者表示哀悼之外，还宣布发放400万美元的抚恤金。当地省长辛哈地立即制定了拯救受难者的方案。

出事后几小时，印度中央邦政府就下令关闭这家农药厂，并以“过失杀人”的罪名逮捕了该厂经理和4名工作人员。当来自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5名技师抵达博帕尔时，当地政府拒绝让他们进入工厂调查，防止他们毁灭证据。印度中央情报局封存了该厂的生产日志，以彻底调查事故的原因。

几天后，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董事长安德森飞抵博帕尔，他刚下飞机，就被警方拘留，6小时后他缴纳了2500美元保证金后获释，然后乘飞机飞到新德里，会见印度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安德森回美国不久，就宣布总公司捐款100万美元救济受害者，但印度中央邦政府拒不接受，并表示要通过法律诉讼解决索赔问题。

博帕尔事件的发生，震惊了全世界，各国舆论为之大哗。不少国家发来了慰问电，还派出医疗专家并携带药品赶赴出事地点，协助抢救受害者。不少报刊口诛笔伐，谴责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指出它设在印度的工厂与设在美国本土西弗吉尼亚的工厂，在安全防护上采取了双重标准，即博帕尔农药厂只有一般的安全设置，而设在美国本土的工厂除此之外，还有电脑报警系统；印度这家工厂的厂址选在人口稠密地区，而美国那个同类工厂却远离人口稠密区。博帕尔农药厂从未向该厂周围的居民告诫过一旦发生险情该怎么办，即使是厂内的工人，对自己天天接触的毒气也知之甚少。几年前，厂里曾出过泄毒事故，一名工人被外漏毒气毒死，不久又有30名工人被毒气熏倒。但厂方总是说：“一切正常。这种气体只使眼睛发痒，用冷水洗洗马上就没事了。”工人们谁都不知道这种毒气的危险性。当12月3日凌晨因毒气外泄而拉响警报时，这些善良的穷苦百姓还以为工厂着火，从四面八方奔向工厂救火，孰不知等待他们的却是死亡。

12月16日至19日，印度科技工作者把农药厂剩余的15吨致命毒气中和成杀虫剂。当局出动了5架直升飞机和3架小型飞机，从农药厂上空向工厂储气罐喷水，防止万一再发生泄漏事件。

当中和行动业已结束的消息传到难民营时，灾民们松了一口气，但对毒气泄漏事件仍然心有余悸，第二天只有几万人返回家园。又过了些日子，惊慌外逃的博帕尔居民才陆续返回，但他们心头上的创伤和怒火是无法平息的。他们坚决要求印度政府为他们作主，坚决要求追究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责任，并赔偿损失。印度全国的律师和法官们也摩拳擦掌，准备同灾难的

肇事者打一场人命官司。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律师界却先行一步，开始为印度的受害者伸冤了。事故发生后第四天，当人们还忙于抢救伤员、掩埋死者的时候，大批美国律师便蜂拥赶至博帕尔，他们有的开设办事处，有的作报告，还有的深入难民营与受难者面谈，拉着他们的手按指纹，为他们拍录像。这些美国律师信誓旦旦地向灾民们保证，将在美国代表他们打官司，向联合碳化物公司索取赔偿，并且附加种种优惠条件。这对于身陷困境、生活无着落的博帕尔灾民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因此，当这些律师离开印度时，几乎每个人的皮包里都塞满了诉讼委托书。他们回去后也确实正儿八经地在美国各州的法院提出一百多宗索赔诉讼案。久负盛名的旧金山梅尔文·贝利律师事务所和另外两家律师事务所一起，代表印度受害者向美国一家法院起诉，要求联合碳化物公司赔偿 50 亿美元和惩罚性赔偿费 100 亿美元。美国加利福尼亚 3 名律师以全体受害者的名义，在纽约向联邦法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 200 亿美元。芝加哥的一名律师也提出诉讼，要求联合碳化物公司赔偿 500 亿美元。提出诉讼的律师越来越多，提出的赔偿额也越来越高，有的甚至要求赔偿 1200 亿美元。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这些“好心”的美国律师如此“义肝侠胆”，不远万里要为“那些可怜的印度灾民赢得正义和金钱”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刊登的一幅漫画，入木三分地道出了其中的奥秘。这幅题为《吃肉的猛禽》的漫画画着一群黑色的美国律师，像嗜食死尸的秃鹫一样，在博帕尔市上空盘旋，寻觅合适的猎食对象。原来，按照美国的有关规定，官司打赢的一方可以从赔偿金中拿出相当可观的数额来酬谢律师，最高可达三分之一的赔偿金。这场状告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诉讼，赔偿金不仅空前巨大，而且肯定胜诉。正是这一笔唾手可得的酬谢金，把这些“秃鹫”，引到了博帕尔。

但是，印度方面早已洞察其奸，并没有领美国律师们的情。印度中央邦政府首席法律顾问拉德利·夏兰·辛哈，在记者招待会上劝告人们不要委托外国律师去打这场官司。他告诉难民，印度政府准备对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约 10 万个诉讼案，以迫使厂方对每个死伤者给予充分赔偿。

不久，印度政府就组成了由印度律师和另外两家美国律师事务所联合参加的委员会，正式代表博帕尔的受害者作为原告，向纽约联邦法院提出诉讼，开始打起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人命官司。

纽约联邦法院接到诉讼后，一直采取拖延不办的态度。与此同时，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也在法庭内外四处活动。公司董事会聘请了律师、专家，组成了一个足智多谋的班子研究对策。开始，联合碳化物公司为尽快了结这场官司，提出与印度政府达成法庭外协议，即赔偿 2.4 亿美元了事，但印度政府要求赔偿 6.5 亿美元，双方所提数目相距甚远，几经回合，协议难以达成。

1986 年初，美国公司又一次开价 3.5 亿美元作为赔偿，企图一揽子解决问题，但印度政府不为所动，坚持诉诸法律。然而，对此事一直拖沓不办的纽约联邦法院却于 1986 年 5 月作出裁决，接受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另一提案：鉴于此案在印度发生，应当由印度司法机关审理，而不应在美国办案。就这样，美国法院在僵持了一年半之后，将这只皮球跨洋过海又踢回印度。

面对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踢来的皮球，印度司法界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一案件的审理工作。但对于尚未摆脱落后和不健全状态的印度法庭来说，要审理这样一桩牵涉到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而且关系到 20 多万人生命

的复杂案件又谈何容易。况且在现行印度法律中，尚无任何条文可作为此案的断案依据。

印度政府于 1986 年 9 月向中央邦博帕尔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指控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给博帕尔市民带来的灾难。又经过两年半的反复交涉，多次开庭闭庭，这场马拉松式的官司才有了最后的结果：1989 年 2 月 14 日，印度最高法院要求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为其在印度的子公司向印度赔偿 4.7 亿美元的损失，并要求美方于 3 月 31 日前付清这笔赔款。美国这家公司的发言人不久发表谈话，表示接受印度法院的决定。至此，这场历时 4 年多的诉讼案终于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但博帕尔市的广大灾民，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饱受毒气摧残后死去，其有生之年丝毫未能得到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任何赔偿。

（陈继水）

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

1981年10月6日，是中东十月战争八周年纪念日。八年前的这天凌晨，埃及军队突然越过苏伊士运河，向驻扎在西奈半岛上的以色列占领军发起猛攻。以色列把全部精锐部队调到西奈，阻击埃军，并派部队深入埃及腹地，切断西奈埃军和大本营的一切联系。埃军在后路被抄的情况下死战不退，一直到停火，始终在西奈半岛屹立不动。十月战争打破了以色列军队无敌于天下的神话，使埃及在世界上的威望大增。

每年10月6日，埃及都要在位于开罗近郊的纳斯尔城，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庆祝那场战争的胜利。

10月的开罗，秋高气爽，碧空万里，全城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的节日气氛之中。1981年10月6日，是埃及总统萨达特按照惯例在胜利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的日子。胜利广场就是为了专门举行阅兵式而修建的。今天，萨达特总统在副总统穆巴拉克、国防部长加扎拉的陪同下，即将前来出席庄严隆重的阅兵式。阅兵式将于上午11点正式开始。

胜利广场位于开罗东南郊，砖体结构的观礼台大棚可容纳百余人，设在胜利广场的南侧。检阅台就在观礼台上，中央部分的前排建有一道深褐色的弧形水泥围墙，高约120厘米，厚度不少于60厘米。在前排安置有一排大红色的沙发椅子，萨达特总统及埃及高级要员们，就坐在这堵保护墙后面临时设置的红色沙发上。后面是埃及官员、议员、宗教界人士、各国外交使节，以及外国来宾和专家。在广场西侧，有专门为各国记者设置的观礼台，比两面的观礼台要高出许多，从这里可以一览广场全貌，为记者观看现场和拍摄现场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在检阅台对面的广场北侧，是一座由四根花岗岩砌成的斜片形空心柱子，连成“金”字形，这就是无名战士纪念碑。

历次的检阅，保安措施都非常严密。上午还不到8点，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有警察和保安人员在执勤了。在总统车队将要经过的通向广场的街道两旁，早已站立着两排身穿黑色警服、白色腰带的警务人员。平时行人熙熙攘攘、车辆拥挤的大街，今天显得秩序井然，道路上的保安措施已到如此地步，广场附近和广场内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可想而知了。

各国记者的汽车经过数道关卡，每次都要停车接受检查，就连挂有总统府记者证的记者也不例外，真可谓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到达广场东南侧的最后一道关卡，进入广场时，还要把携带的东西交给保安人员检查，其中对摄影记者的检查尤其仔细：照像机、闪光灯，甚至连胶卷盒都要一一查看，并且拿过去按几下快门，打打闪光灯才放心。除此之外，保安人员还用一种小型探测器，从头到脚将记者们探测一番。他们对各种证件检查更为认真，直到确认没有问题后才予以放行。

10时30分，观礼台上的检阅台除第一排中间沙发空着外，宾客和埃及军政官员都已到齐了。接受检阅的部队也到达预定位置，无名战士纪念碑前的军乐队早已就位。检阅台前后和广场周围的警戒部队和安全警察，担负着艰巨的警卫任务。

11时差5分，一架轻型直升飞机降落在检阅台南侧的小广场上。这是总统专机。准备专机也是总统安全保卫措施的一部分，因为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总统可以立即从空中撤离现场。

11 时整，萨达特总统在副总统穆巴拉克和国防部长加扎拉陪同下，乘敞篷车进入广场，他频频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下车后，萨达特一行人首先向“无名战士纪念碑”走去，把一个花圈献给了十月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们。行军礼默哀后，这一行人返身一直走向检阅台。

身着蓝灰色军礼服的萨达特总统个头不高，肤色棕黑、身体瘦削，总统的军礼服胸前挂满了闪闪发光的勋章、奖章，肩头斜披着总统缓带。他虽然已是个 63 岁的老人，但紧身合体的军装，昂首挺胸的姿态，稳健的步履和炯炯有神的目光，仍使他的军人气质和风度恰到好处。

就座前，萨达特总统向欢呼的人群再次挥手致意，接着按惯例朗读“古兰经”。这时，萨达特心里默默地说：“真主是伟大的，我的生命在真主手里，他们不能杀害我。”他像往常一样祈祷。“古兰经”朗读完毕，国防部长加扎拉宣布阅兵式开始。

受检阅的步兵方队、伞兵方队、边防骆驼方队、骑兵方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来了；装甲兵、坦克部队、火箭部队也依次通过检阅台。每当一个新兵种从检阅台前走过时，萨达特总统总是要站起身来向他们致以军礼。

当炮兵部队快要进入广场时，天空中的飞行表演已进入高潮。各种战斗机、轰炸机的编队接踵而来。人们都把视线移向天空，观看埃及空军精湛的表演。当 6 架 F—4 鬼怪式飞机再次从检阅台南侧背面低空掠过时，地面上的炮兵车队也快走过去了。但人们仍把注意力放在空中，只见 6 道彩色烟幕在飞机身后扩散，由红、白、蓝三种颜色组成了一面巨大的埃及国旗。

忽然，炮兵车队中一辆拉着大炮的卡车停了下来，萨达特总统以为这是炮兵向他致礼，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抬起右手举向帽沿准备还礼。然而，就在这时，从卡车上突然跳下 4 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向检阅台上冲去。其中冲在最前面的是炮兵中尉卡里德，他手里举起一枚手榴弹向检阅台上扔去，只听轻轻一阵爆炸声，随即升起一股黑烟，原来是烟幕弹。这 4 个人一面冲，一面分成左、中、右三面，扣动冲锋枪的扳机，向检阅台上猛烈射击。萨达特总统立即被一发发子弹击中。

这时，检阅台和东西观礼台上一片混乱，最初的惊愕与寂静被呼喊声、女人的尖叫声和呵斥声代替。但人们还是立即从惊愕中清醒过来，有人迅速卧倒，有人拿起座椅投向冲上来的凶手，当场抓获两人，打死一人，被抓获的两人中，一人身中 6 弹，另一人腿上中了两弹。逃跑的另一人于第二天在全国的大搜捕行动中抓获。当时，他身上已中了 4 弹。在现场被打死打伤的人一个个抬了下来，等待救护车送往医院。

总统中弹后，几十名身穿蓝色军装、头戴红色贝雷帽的总统卫队士兵，立即手拉手把飞机围住，直升飞机开始发动，螺旋桨慢慢地转动；中弹的总统被立即护送上飞机，几十秒钟后这架飞机就升空离开了胜利广场。萨达特总统被送往位于开罗南郊的马阿迪陆军医院抢救。

当萨达特总统被送往医院时，已处于完全昏迷状态，总统身上的蓝灰色军礼服眼早已被鲜血浸透，血压和脉搏已测不出来了，他双眼圆睁，对光线已没有反应，全身也毫无反应能力。医生们首先为他输入氧气，取出他身上的弹片。但是总统伤势太重，医院官方报告中列举他的伤处：左胸有两个弹片，一颗子弹从左大腿上部钻出，右臂、胸部、颈部及左眼周围都有枪伤。颈部皮下还能触摸到一块异物。

尽管医生们全力抢救，但也无回天之力。10 月 6 日下午 2 点 40 分，萨

达特总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共有 21 名医生在诊断书上签了名。

埃及人民敬爱的总统，一位杰出的政治英才就这样结束了辉煌的一生。他的死，造成了埃及政治上难以估量的空白。

据埃及政府的调查，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包括萨达特总统，一共 7 人死亡，28 人受伤。

应邀观看阅兵式的客人中有十几名中国专家，他们坐在距萨达特总统很远的观众台上，但仍有 4 人受伤，其中一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

埃及国民警卫军对抓获的几名凶手进行了审查。

10 月 7 日，埃及政府发表了关于暗杀萨达特总统的凶手的正式声明，指出：“凶手共 4 名成员，两名军人，两名平民，是一个单独的小组。凶手的行动同任何政治党派或国家都没有关系，4 名成员属于一个穆斯林极端分子集团。”

穆巴拉克副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第一副国务秘书乌萨马·巴兹说：“狂热的思想迷住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犯了错误，直至他们暗杀一个国家元首。”

没有人会想到，甚至负责这次阅兵式全面安全工作的国民警卫军司令马斯里将军也没想到，4 名凶手中竟有两名伪装军人，混入了受检阅部队！这支部队是一个多月前。马斯里将军与陆军参谋部合作挑选决定的，并亲自对每一个军人的背景进行调查，稍有一点疑问的人都被刷掉。在受检阅前一天，他又派专人到部队检查武器装备，确保每一个士兵手里拿的都是空枪，绝对没有一粒子弹，一枚手榴弹……阅兵式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反复的检查也找不到安全保卫工作中还有什么漏洞或疏忽。然而，殊不知真正的“定时炸弹”早就埋下了。萨达特总统已处在万分危险之中——

这话还得从 1973 年 10 月 6 日第四次中东战争说起。在那次战争中，埃及和以色列军队在西奈半岛经过一番激战，埃军一举歼灭以色列官兵 2412 人，击落以色列飞机 131 架，击毁坦克 128 辆，并活捉了以色列的装甲旅旅长。到了 10 月 13 日，埃及军队已控制了运河东岸宽 15 公里地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为了挽回败局，以色列调兵遣将，重新集结兵力，在美国大规模向以色列空运武器和提供卫星照片情报后，以军调整计划进行反扑，并派出部队乔装埃军，偷渡到运河西岸破坏埃军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系，对过了苏伊士运河的埃军形成包围圈。已过河的埃军在这种前后夹击的极端恶劣形势下，发誓与阵地共存亡。他们死守阵地，坚持到底，没有后退一步。直到 10 月 24 日在联合国斡旋下才停火。

这一仗振奋了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精神，以色列不得不承认，他们对阿拉伯的优势已经消失，以军已无法始终“保卫”自己了。这一仗也使埃及在阿拉伯和全世界的威望提高了，作为埃及总统的萨达特理所当然地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英雄，成为阿拉伯人民的骄傲，也为全世界所瞩目。

然而，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束，并未给这一地区带来真正的和平，因为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埃及和以色列仍处于不战不和状态。

由于埃及在阿拉伯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四次战争中又是主要参战国，它在历次中东战争中耗费了 1000 亿埃镑，人员死伤 10 万多。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使埃及本已困难重重的国民经济更加捉襟见肘，埃及人

民也普遍厌恶战争，渴求和平。

为了走出困境，萨达特总统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来解决中东问题，争取和平环境，振兴埃及经济。为此，萨达特断绝了同莫斯科的军事联系，加强同美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又对以色列作出争取和平的姿态。

1977年11月下旬，萨达特做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正式访问耶路撒冷，直接与以色列总理贝京举行和平谈判。这一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接着，1979年3月，埃及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中，埃及为了尽快解决中东问题，争取和平环境，在谈判中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

埃、以和平条约的签订，对和平解决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缓和中东紧张局势虽然具有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埃及单独和以色列实现和解，采取行动之前又没有和阿拉伯盟国商议，谈判中又对以色列作了不少让步，所以埃及的和谈举动，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同时对埃及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制裁，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境地。

另一方面，萨达特的和平举动也引起了宗教极端分子的仇视。他们认为，萨达特与以色列“请和”的行动是“不可宽恕的”，他们实在不能接受同以色列讲和的事实。萨达特被称为穆斯林的“叛徒”，对他不满的情绪在不断蔓延着。

1981年新年伊始，敏感的青年学生多次在总统府周围示威游行，抗议以色列在开罗建立大使馆，要求政府与以色列断交。学生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同时，宗教极端分子的活动也十分猖獗，他们加紧了密谋暗杀总统的计划。针对这些恐怖活动，萨达特下令逮捕了1500多名宗教极端分子。总统的安全保卫工作也进行了调整和加强，但暗杀的阴谋仍在加紧实施，萨达特总统已危在旦夕。

这次刺杀萨达特总统的首犯、炮兵中尉卡里德本是个典型的宗教极端分子，他是原教旨主义者组成的小团体——“安古”小组的成员。“安古”是一串葡萄的意思，每串葡萄是独立的，若被摘掉一串，其它葡萄不受影响，因此，这个组织既严密，又松散，各“安古”小组领导人似乎有某种联系，但又无法确定是否有个统一指挥。不过，卡里德所属的“安古”小组，是直接受命于第333炮兵旅的阿尔少校指挥的。有阿尔少校作内应，事情就好办多了。阿尔少校给他下达了刺杀萨达特的命令，并给他配备了三个助手。这四个人，在萨达特总统下令逮捕1500名宗教极端分子以后，对萨达特更是充满了仇恨。他们多次寻找机会刺杀总统，终因不能接近总统而作罢。现在阅兵式临近了，他们接受了命令，要在阅兵式上刺杀总统，便可一举成功。他们都起过誓，为刺杀萨达特而不惜付出生命。随后，卡里德按照计划，伪造了一封他所属部队的介绍信。凭着这封介绍信，让三名助手进入了集合地点。然后，卡里德在阿尔少校的协助下，让他们坐上了他本人乘坐的指挥车进入部队，顶替早已安排好的三名缺勤者而参加阅兵式。在阅兵式前夕，卡里德从枪械库里偷出四支装上子弹的冲锋枪，并做上标记，与别的冲锋枪放在一起，还把四枚手榴弹偷偷地藏在了炮车车座下，他自己在贴身内衣里藏了支装有子弹的手枪。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当卡里德等人随炮车兵方队经过检阅台时，立即

向总统射出一发发子弹，萨达特被击中了，他们的阴谋得逞了。

萨达特总统倒下了，埃及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再也不会醒来了。

可以说，在中东的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使全世界为之震动。他的死不仅预示着中东的大动乱，而且预示着整个世界的平衡将会打乱。

萨达特总统的不幸也给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带来了巨大灾难，西方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纷纷谴责这一暗杀行为，但反对与以色列媾和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对埃及总统遇刺感到欣喜，他们说，阿拉伯事业的其它“叛徒”将会遭到同样的下场。

10月10日，埃及政府为萨达特总统举行隆重的国葬。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领导人亲自或派特使前往开罗参加葬礼。

葬礼就在他被刺身亡的胜利广场举行。

为确保八十多个国家贵宾的安全，埃及政府没有允许群众参加葬礼。但是好几百名普通群众聚集在墓地附近的一条公路上。墓地是开罗东北的纳斯尔郊区的阅兵场，白色陵墓是在两天前连夜赶制出来的，离市中心9公里，在无名战士纪念碑旁。

参加葬礼的有头戴蓝色贝雷帽的总统卫队、伞兵、炮兵和其他军种部队。

萨达特的灵柩由八匹纯种阿拉伯马拉着的炮车运往墓地。灵柩上面覆盖着红、白、黑三色埃及国旗，在大理石的陵墓建成以前，他将长眠在那里。

萨达特亲自选择的继任者穆巴拉克，走在遇刺总统的25岁儿子的旁边，两人走在送葬官员的前列。

萨达特的遗孀吉汉·萨达特光着头，穿着黑色衣服，镇静地坐在四天前萨达特遇刺的检阅台附近的一个台阶上，按照穆斯林的习俗，他的三个女儿和送葬的其他妇女也坐在台阶上，不参加送葬的队伍。

总统的墓穴在无名战士墓穴的旁边。这位埃及总统就这样和那些为国捐躯的士兵葬在了一起。

（何文）

科威特班机被劫记

1984年12月1日上午10点整，一架科威特航空公司的A—310型客机，稳稳地滑过科威特机场的跑道，翘首腾空而去。这架飞经巴基斯坦卡拉奇的221次国际航班，载有150多名乘客。其中120名是巴基斯坦人，他们在科威特工作了一年，个个大包小包，满载而归，随身提箱里也塞满了电器产品。与他们同机的有10名科威特人，包括3名去科威特驻卡拉奇领事馆任职的外交官；3名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审计员，1名美国商人以及十几名其他国家的旅客。

机舱内的气氛轻松活跃。乘客们坐在舒适的软椅上，有说有笑。空中小姐来回忙碌着，给乘客送来饮料点心。那些巴基斯坦人显得特别兴奋，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要和久别的亲人团聚了。一个半小时之后，飞机飞抵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城市迪拜。这是班机预定停留的第一站。

今日的迪拜国际机场格外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治安人员一宿都未合眼，忙得不可开交。原来，在海湾国家访问了3天的英国郡主安妮，今天将从这里返回英国，英国皇家空军的专机已停候在机场上。由于皇家专机与221次航班起飞时间仅仅相差十几分钟，机场保安人员把注意力都集中到皇家空军的专机上，而忽视了对乘坐221次班机的乘客的检查。

就在这时，有4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从一架来自黎巴嫩贝鲁特的飞机上下来，他们趁保安人员不注意，绕过设在转乘候机室的安全检查口，偷偷溜进登机入口，顺利地登上了221次航班。

12点10分，221次班机发出一阵轰鸣，离开迪拜机场，飞上瓦蓝色的天空。飞机刚达到航线高度，坐在后排的那4个年轻人，便从随身带的黑包里掏出暗藏的武器，呼地一声站起来。他们右手握枪，左手举着手榴弹穿过走道。其中一个用英语朝着惊慌失措的旅客大喝一声：“谁也不许动，把手都放在头上！飞机被我们劫持了！”然后，他又用阿拉伯语重复了一遍。

顿时，机舱里一片混乱。女人们发出刺耳的尖叫，孩子们吓得哇哇直哭。劫机分子留下一人看管经济舱的旅客，其余3人飞快地朝头等舱扑去。

头等舱的两名空中小姐正在为乘客准备午餐，突然舱内出现一阵骚乱。3个哇哇大叫的年轻人冲了进来。守在驾驶舱门口的一名机上保安人员见事不妙，正准备掏枪，被一个歹徒的手榴弹击伤头部，倒了下去。几个科威特乘客刚站起身准备反抗，另一个歹徒手起一枪，砰地一声，击中一名科威特人的大腿。几秒钟后，一阵剧烈的砸门声传进驾驶舱。还没等驾驶员反应过来，舱门嘭地被撞开了。两个歹徒冲了进来，一个用手枪顶住副驾驶的脑门，另一个把一颗手榴弹架在机长哈里·克拉克的脖子上，用英语喊道：“飞往德黑兰！德黑兰！”话音刚落，他们就用手枪柄打机械师的头。机长克拉克连忙说：“好，我们去德黑兰，但我们必须要有一张飞行图，必须向地面上要。”歹徒怒吼道：“不行！你们别耍花招，否则，我们就把飞机炸毁。你就给我用地图飞德黑兰吧！”飞机从迪拜起飞，不到15分钟就被歹徒完全控制了。

在劫机分子的逼迫下，221次班机掉转机头，朝德黑兰穆罕拉巴特机场飞去。歹徒们把副驾驶和机械师以及头等舱的旅客全都赶到后舱，并命令所有旅客交出护照和证件，然后将美国人和科威特人一个个分别隔开，以防止他们串联反抗。机组其他人员也被赶到机尾坐在地上。所有乘客都被迫将双手放在后颈部，身体前倾，不许抬头。机舱内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劫机者满以为会受到伊朗当局的隆重接待，以为他们的“革命”行动肯定会得到伊朗的支持。因为当年7月法国航空公司一架被劫持的737喷气客机在德黑兰就受到过接待。但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伊朗当局对这次劫机反应冷淡，不仅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欢迎的姿态，而且，当飞机在德黑兰上空盘旋，请求降落时，穆罕拉巴特机场却断然拒绝。

当221次航班在天空绕了一圈，再次企图降落时，机场干脆开来几辆消防车和大客车横在飞机跑道上。机上的恐怖分子气得哇哇乱叫，他们又逼迫机长克拉克向穆罕拉巴特机场一遍又一遍呼救：“控制塔！控制塔！科航221次班机要求着陆，若不着陆，机上的人质将要被杀害！”可是机场没有回答。机长又用无线电喊话：“机场指挥塔！机场指挥塔！请允许我们着陆，他们正用枪口对着我！”地面仍无回音。原来，伊朗当局这几年也饱尝恐怖分子的苦头。伊朗驻伦敦的大使馆1980年4月曾被5名恐怖分子占领，3名使馆官员被枪杀，20几名使馆人员作为人质长达6天之久，后来还是英国出动了反恐怖特种部队，才将恐怖分子击毙。何况，一旦让被劫持的飞机降落，处理后事极其棘手，并会影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当局迟迟不给机场下达允许降落的指示。就这样，221次航班在机场上空连续向下俯冲了六七次，都无法降落。最后，机长对着话筒苦苦地连声呼喊：“机上的燃油即将耗尽，再过几分钟飞机就要坠毁了！”机场指挥塔将此情况再次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后，才得到答复：“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同意飞机降落。”指挥塔赶紧移开了跑道上的车辆。221次航班终于在穆罕拉巴特机场降落了。

飞机刚一着陆，伊朗警察和全副武装的士兵便团团将它包围。劫机者见到这种情况，立即对着话筒狂喊：“你们给我滚远点，否则我就把这飞机炸毁！”过了一会儿，士兵们一个个向后退去，在远处监视着飞机。

12月的德黑兰已经进入隆冬季节。昨晚上了一夜的大雪，机场上一片洁白。

221次航班停在一条跑道的尽头，就像一个庞大的蓝白色怪物，孤零零地盘踞在跑道上，四周没有半点生命活动的迹象。

下午5点30分，劫机分子通过无线电话筒用阿拉伯语向德黑兰和科威特机场指挥塔同时发表声明，科威特政府必须在12小时之内释放被关在监狱中的17名“圣战者”成员，否则将杀死人质，炸毁飞机。

这17名“圣战者”成员实际上是一批黎巴嫩恐怖主义分子。1983年12月12日上午，在科威特市连续发生了7起爆炸事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冲进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院内爆炸，紧接着在法国驻科威特大使馆门前、科威特国际机场指挥塔的下面、炼油厂附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美国移民公寓门前，都相继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短短90分钟内，炸死6人，炸伤86人。为此，科威特政府宣布全城戒严，搜捕犯罪分子。科威特警方在这次大搜捕中，将作案的17名黎巴嫩恐怖分子捉拿归案，并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而现在劫机者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企图迫使科威特政府释放这批被关押的恐怖分子。

这伙空中强盗一方面通过无线电与科威特政府进行漫长的谈判，另一方面在客机内实施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恐怖分子用塑料绳子将一名科威特人质的双臂高高地捆在背上，然后将他带到驾驶舱，拆下机械师座位上的扶手，拼命地打他。接着两个暴徒又踩在他的身上，把这个年轻人的肋骨弄断。人质发出的撕人心肺的阵阵惨叫声，通过无线电话筒传到科威特机场指挥

塔，同时，也由机内麦克风在机舱广播里放了出来。舱内的 161 名人质，就是在这种凄惨的叫声中，被一脚蹬下了十八层地狱。

人质们在恐怖和不安中度过了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更加可怕的早晨。

12 月 5 日 8 点 20 分，死一般寂静的机舱里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恐怖分子有意识地选择了一名美国人开了杀戒。鲜血染红了地毯。暴徒们逼迫一个名叫阿布·萨里的年轻人，打开舱门，将尸体抛出舱外。僵硬的尸体悲惨地躺在白雪覆盖的跑道上。过了好一会，伊朗士兵才将第一个死亡的人质抬到救护车上运走。虽然尸体身上一切可以证明身分的证件全部被搜走了，但美国官员很快确定，这个死去的人就是来自弗吉尼亚州斯特林地区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审计员，50 岁的查尔斯·海格纳。机上的人质，尤其是美国人和科威特人处于惶恐不安之中，谁都担心自己可能成为第二个枪下鬼。

劫机者与科威特政府的谈判，在人质死亡后有了一点进展。尽管恐怖分子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要求，但最后还是同意让一部分人质离开飞机。当天下午，第一批释放的人质是 46 名妇女和儿童，其中包括一名与巴基斯坦人结婚的美国妇女及其女儿。这些妇女就像一群惊魂未定的兔子，她们抱着或拖着孩子，飞快地跑出机场，唯恐身后会有只巨大的黑手把她们重新捉回机舱。

12 月 6 日清晨，劫机者允许一名伊朗摄影记者走近舱门。然后，在手枪顶住脑门的情况下，记者被允许向舱内探头张望，只见地毯上直挺挺地躺着两名人质，一动也不动，不知是死是活。上午 9 点钟，恐怖分子又让伊朗电视台的摄像机拍下了发生在飞机舱门口的悲惨场面：蒙着黑面罩的歹徒们，手握着枪，猛然推出两名人质，并把一个袖珍电子扩音喇叭递到其中一个人质的嘴边。这个人质身穿白衬衫，结结巴巴地自称是美国驻卡拉奇的总领事。他以颤抖的声音哀求伊朗和科威特的谈判官员对劫机者让步，满足他们的要求。否则，他就要被他们杀死了。他最后说：“他们的威胁可是当真的。”话音未落，这两名美国人质被拽回舱内。一个劫机者拿过扩音喇叭，高声喊道：“伊朗当局必须提供正副驾驶员，以取代机上已经神经失常的正副驾驶员。5 分钟内必须答复，否则将杀死一名美国人质。”在场的伊朗谈判官员，立即开始紧急磋商。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了。5 分钟到了，伊朗官员还在等待上级指示。但劫机者却等不及了。那个穿白衬衫的男子被歹徒用枪押着，重新出现在飞机出口处的舷梯上方。一名伊朗官员见事不妙，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急步跨上舷梯，试图劝说劫机者饶恕美国人。但是，已经迟了。就在这个美国人想要挣扎的一刹那，劫机者的枪声响了，一连射出了 6 颗子弹。这个人质当场死亡。歹徒接着又是一脚，将尸体踢下舷梯。这段电视录像在全世界播放后，美国官员否认美国驻卡拉奇总领事在这架飞机上，但根据录像，确认死去的人质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设在巴基斯坦的办事处官员，52 岁的威廉·斯坦福。

这伙职业恐怖分子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与科威特和伊朗的代表谈判，与前一天一样，早上杀死第二名美国人质，下午又释放了第二批人质，他们是 23 名巴基斯坦人。12 月 7 日早上，他们又把一名与他们作对的巴基斯坦青年押到舱门口。正当他们准备杀死他以做效尤时，这个青年猛然一个鹞子翻身，跳下飞机，用尽全力狂奔。歹徒连忙开枪，子弹在他身边呼啸着，但最终没有击中他。这无疑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到了下午，歹徒们却又释放了一批人质。此后，又陆续放出几批。就这样，到了 12 月 9 日，继续被扣押的

人质还剩下 8 名。

离机的人们像飞出樊笼的自由之鸟，而剩下的人质却遭到加倍的虐待。他们被紧紧地捆绑在座椅上，动弹不得。口干舌燥，没有水喝，甚至连大小便也不被允许，憋不住只好撒在裤子里，残忍的劫机分子把头等舱与经济舱之间的隔离舱作为迫害人质的地方。后来获救的人质心有余悸地称为“恐怖室”。这帮近似于虐待狂的家伙，兽性大发，百般折磨人质，以发泄他们的怨恨。美国商人柯斯塔被蹬倒在“恐怖室”里，肚子朝下，劫机者轮番站在他背上，一面用力踩，一面大声辱骂。然后，又用点燃的香烟头烫他的脸。仅仅几天，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他后来回家时，妻儿们几乎认不出他了。

恐怖分子并未在肉体上过于折磨英国人克拉克机长。他们留着他，万一情况紧急，可借助他起飞逃跑。但事实上，由于飞机上有 13 个舷窗都被劫机分子打破，飞机已不能再飞上蓝天了。但克拉克在精神上却同样备受摧残。一次，他被押去观看暴徒毒打人质表演。两个科威特人被打得奄奄一息，在地上蠕动着，鲜血犹如刚出罐头的番茄酱，一个劲地往外冒。而后，暴徒又往他们的身上撒尿。克拉克从未见过如此惨景，吓得呆若木鸡。他随身带的打火机也被暴徒抢去，用来点燃香烟烫这两个人质的脸。人质们在暴徒的淫威下，发出的痛苦的呻吟和绝望的惨叫，从破碎的窗口向外传去，震颤着机场上每一个人的心。

科航 221 次班机被动持事件，立即震动了全世界，受到各国的密切关注。事发当天，科威特政府立即召开部长紧急会议，决定拒绝恐怖分子提出的任何要求。会后又迅速组成一支全副武装的突击队，随时准备用武力解决危机。与此同时，科威特还致力于外交努力，推动伊朗采取行动。并争取到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充当中间人，从中斡旋。

12 月 6 日凌晨 3 点，一个由科威特外交部高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抵达德黑兰，要求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亲自负责同劫机者谈判。经过考虑，哈梅内伊授权他的首席顾问穆斯塔法前往穆罕拉巴特机场，全权处理这一事件。

12 月 7 日，恐怖分子通过伊朗电台广播了他们又一份声明，再次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科威特监狱中的“无辜弟兄”。他们承认已经杀死了两名美国人质，并且发誓，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叫第三个美国人查尔斯·卡柏成为他们的枪下鬼，此外还将干掉 3 个科威特外交官。

同一天，美国总统里根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恐怖分子杀害美国人质的暴行，并且希望伊朗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一行为。但由于美国与伊朗早已断绝了外交关系，只好依靠瑞士和英国这两个中间人从中帮忙。

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见了伊朗和科威特两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要竭尽全力解决这次劫机事件。叙利亚应科威特的要求，拟派副总统哈达姆前往德黑兰商谈此事。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也在 6 日和 7 日两次打电话给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要求他确保机上乘客平安释放。

面对强烈的国际舆论，伊朗感到压力很大。它之所以迟迟不采取有力措施，是希望这次事件能和平地得到解决，而不动用武力。因为劫机者声称是黎巴嫩圣战者组织成员，伊朗不忍心对他们过于苛刻。何况动用武力营救人质要冒很大风险，在营救过程中不伤及人质更是难上加难。正在伊朗左右为难之际，黎巴嫩圣战者组织的一个代表在贝鲁特向记者发表谈话，否认该组

织与这伙劫机者有任何联系。这无疑给伊朗一颗定心丸，从而下定决心，如果劫机者顽固坚持他们的无理要求，就采取武力行动。伊朗保安部队接到当局的命令：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出击。

12月9日，劫机事件已进入第六天。机上的人质情况十分危急，一名科威特人生命处于垂危之中，但劫机分子拒绝放他出来治疗。这天中午，劫机者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提供一架飞机，让他们飞到要去的秘密地方。到了下午，又告知机场控制塔，飞机上已安装了引爆炸弹，如果伊朗和科威特政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把飞机和机上的乘客一起炸掉。他们发出这个最后通牒后，便切断了与指挥塔的联系。一场机毁人亡的惨剧眼看就要发生了。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解决危机的时刻竟意外地从天而降了。午夜时分，劫机者要求机场服务人员登机清扫机舱。几天来，机舱内无人打扫，厕所粪便外溢，臭气冲天，空气十分污浊。不仅人质受不了，劫机者也熏得喘不过气来。因此劫机者趁夜深人静之际，命令机场在10分钟之内派人前来打扫。哪知道伊朗保安部队早已有所准备，当然不会错过这一天赐良机。于是，不到10分钟，一队装扮成清洁工人的保安人员便登上飞机，另外一些保安人员则暗藏在飞机下面的服务车上。突然之间，机场上所有的聚光灯都齐放光明，照得如同白昼。劫机者只觉得一阵目眩，还没等到他们清醒过来，一名装扮成清洁工的保安人员便扑上去，一把夺过一名劫机者手中的手榴弹，并将他摔倒在地，另一名劫机者冲过来帮他的同伙。就在这时，一道亮光闪过，催泪毒气顿时弥漫整个机舱。原来是飞机底下的保安人员扔出的催泪弹。机内的劫机者全都被熏倒在地。站在舷梯上的那个劫机者，也在聚光灯骤亮的一刹那，被躲在飞机底下的保安人员一枪击毙。

机舱内一片混乱，保安人员与劫机者展开了搏斗。趁这个机会，机长克拉克用牙齿咬开绑在手腕上的绳索，替自己松了绑。接着，他又替身边的两个美国人解开绑绳。克拉克拉着他们就往舱门口跑去。突然，一个手执武器的大汉出现在舱门口，他们吓得冷汗直冒，以为这下彻底完蛋了。但来者并不是劫机分子，而是他们的救星——伊朗保安人员。他把他们扶下舷梯。另外几个科威特人质也被保安人员救了出来。人质们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因为他们可以活着回家了。

这时，机舱内的战斗也已结束。3名劫机者在伊朗保安人员的猛攻下举手投降了。而保安人员和人质无一伤亡。

仅仅5分钟的时间，伊朗保安部队就成功地解决了长达六天的劫机事件。科威特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不等硝烟散去，便冲到飞机前，与保安人员一一拥抱，他激动得连声喊道：“英雄啊，英雄！你们才是真正的反恐怖活动的英雄！”

（陈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3年春，继列宁之后的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

由于斯大林在世时滥用职权，独断专行，制造了无数冤案，所以在他的葬礼刚刚结束后，反斯大林的势力就开始抬头。第一个鸣冤叫屈的是斯大林的亲密助手莫洛托夫，他要求“还我妻子”。莫洛托夫的妻子曾被斯大林作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奸细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由此可见斯大林的“肃反运动”是多么冷酷无情。

随后，原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长、斯大林的亲信贝利亚的大量罪行被不断地揭露出来。许许多多的事实证明，贝利亚是“可耻的挑拨者、卑鄙的敌人”，“他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忌多疑，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人……正是贝利亚把他和他的部下炮制的声明、匿名信、各种谣传材料送给斯大林的。”经过特别仔细的法律程序，中央委员会确认贝利亚犯有滔天罪行，决定将他处决。

斯大林的继承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是1953年9月走上苏共最高领导地位的。列宁在世的时候，他还默默无闻。

1935年起任莫斯科州党的第一书记兼莫斯科市党的第一书记。在斯大林1937年至1939年大清洗的时候，他进入最高领导层。对斯大林清除政治对手的所作所为，他还是比较清楚的。客观地说，斯大林搞的那么多冤假错案，也为赫鲁晓夫登上苏联和共产国际政治舞台铺平了道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是赞成斯大林那一套的。

赫鲁晓夫是个有头脑有个性的政治家，他的许多做法使人感到吃惊，甚至显得有些过激。尤其在斯大林去世不久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所做的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更像一声惊雷震撼了世界。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斯大林一直是被无限颂扬的，社会主义苏联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归功于他的智慧，他是“人民的父亲”、“人类的天才”。“历史航船的舵手”。在过去的时代里，他是人民心中光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拜偶像。赫鲁晓夫这一举动毫不留情地打碎了这一偶像，虽然当时有些人还不能接受，而赫鲁晓夫后来下台也多半是为了这个原因，但历史却证明他是正确的。

“秘密报告”出笼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审理贝利亚的过程中，已经揭露出不少令人震惊的迫害事件。赫鲁晓夫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在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上，他提出：“即将召开的二十大是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会，有必要证明我们是能够承担管理党和国家重任的。”他认为党代会上肯定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斯大林执政期间会发生如此众多的清洗案？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这么许多人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不仅要斯大林在世时发生的事负责，还要对他的政策所造成的遗留问题负责，这些问题在斯大林死后的今天仍摆在我们面前。”

为此，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954年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这是一个不与任何机构接触的委员会。调查的内容绝对保密，只有政治局十一名委员知道。

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彼·尼·波斯别洛夫，是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而且也一直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处的成员，1949—1952年间任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还是《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之一。总之，波斯别洛夫“是一个死板

的、彻底的教条主义者”，他所提供的情况对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当然，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对斯大林时期镇压的真正规模和真正原因知道得更清楚一些。米高扬与斯大林比较接近，而许多与他一起工作并受过他信任的人都被清洗了。因此，对米高扬来说，可能有更多的思想准备。

政治局决定，在 1956 年 2 月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个人迷信时期”滥用权力提出批评，但没有针对性，没有人敢反对斯大林。党的领导人无非希望用这种形式表明，新的领导人决心回到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来。

2 月 14 日上午 10 时，二十大正式开幕。赫鲁晓夫首先要求全体代表起立，为党的十九大以后逝世的三名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和德田球一默哀时，西方一些长驻莫斯科的记者就敏感地意识到其中定有奥秘。因为，赫鲁晓夫竟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同不太闻名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相提并论，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当代表们默哀完毕，抬起头来才发现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已被取走了。

赫鲁晓夫代表党中央所做的报告只是一般性地重申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看不出有其它迹象。报告被“令人鼓舞地通过了”。当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政治局的核心人物之一米高扬在大会发言时第一个点名批评斯大林，他在大多数代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指名道姓地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论点“对我们未必有所帮助，也未必是正确的”。指责苏联历史书歪曲了事实，“有些人被推崇备至，而另一些人则干脆不提”。他要求编一本新历史教科书来取代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米高扬的发言犹如在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会场开始骚动起来。到会的代表们开始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议论开来。关于要不要把波斯别洛夫调查的情况向大会抛出，政治局内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论。有人强烈反对，理由是：我们将如何解释我们在斯大林当政时所起的作用？你们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是谁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总之，持这种意见的人一是担心产生消极影响，二是怕自己会成为斯大林的帮凶。他们要保护自己。

另一部分人主张向代表大会摊牌，这些人的目的也不尽相同。

赫鲁晓夫原没有打算在会上做这个石破天惊的报告，事先也没有任何迹象。会议期间，制定了新的奋斗目标，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并表示了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的决心。

4 月 24 日，赫鲁晓夫宣布大会闭幕。

正当代表们整顿行装，准备返回的时候，夜里 11 点半，突然来了通知，邀请他们返回克里姆林宫，出席一次“已经闭幕的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极其封闭的大会。开会之前宣布，任何消息不得外传！没有一个新闻记者，连东欧兄弟党代表团团长都没有被邀请参加。不过，实际上赫鲁晓夫已经把报告的复本交给了兄弟党代表团负责人，要求他们第二天早上交还。

会议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他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代表们由于连开了几天会，才来的时候都显得很疲劳。可是，当赫鲁晓夫的报告一开始，所有的人都一扫倦意，个个聚精会神。会场上高度肃静，任何一声咳嗽都听得很清楚。后来就不断爆发出阵阵热烈掌声。

在报告里，赫鲁晓夫破天荒地斯大林发起了“正面进攻”，第一次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在30年代中期大搞肃反，使成千上万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同志和无辜人士遭到残酷迫害的严重错误，揭露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对局势的错误估计以及战争期间的战略错误，批判了斯大林在农业问题上和少数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等等。

最后，报告结束时，群情激奋，全场欢呼，长时间的鼓掌。

报告之后，没有进行一般性的讨论，也没有通过什么特别的决定，代表们震惊地、默默无声地离开克里姆林宫，回到各自的驻地。就连一向比较“自由”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意识到这一报告的严重性，所以，“一开始就强迫自己小心从事”。

正是这个报告，日后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赫鲁晓夫不顾党内的阻力，毅然地顺应了这一历史的抉择。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这里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还与赫鲁晓夫本人的禀性以及他所处的历史、现实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一些历史学家们分析的那样，赫鲁晓夫有为了达到一种更高的社会目标，敢拿自己的权力以至生命作为赌注的冒险精神。尽管在斯大林当政时，他的手也未必是那么干净，但他与冈察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比较起来，还是算远离恐怖机构中心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深受了斯大林主义的伤害。对斯大林充满了精神的恐怖感。”他曾回忆说：“那时，不管是谁，一个步子、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有点差错，就会被除掉。”他觉得自己也有罪过。“几十年间积存的反抗情绪像锅里的蒸汽，一下子冒了出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长久地保密，它很快就传了出去，并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最早是由波兰人将报告内容泄露出去的。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把赫鲁晓夫提交给他们的那一份报告文本复制了一份。原件则按照要求于第二天早晨还给苏共领导人。不久，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就将这一复制文本搞到手。然后转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文伦·杜勒斯。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转载全文。自6月6日起，法国《世界报》根据美联社的译本刊登了全文。

由于苏联共产党带头反对个人崇拜，人们敢说话了，思想解放了，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尤其是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摆脱困境的机会，终于引发了1956年的布达佩斯事件。

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原本对苏联革命抱着虔诚的崇敬心理，当他们得知“秘密报告”的内容后，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感到十分震惊，许多人过去的理想破灭了，引起不少共产党员退党。

对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产生的影响，迄今仍是毁誉不一，但随着历史帷幕渐渐揭开，人们必然会逐步认识到赫鲁晓夫迈出那一步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个政党的历史也像一个人的一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很多事情如过眼云烟，被淡化，被遗忘了。唯有那些带有转折性的大事件，才会永远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赫鲁晓夫个人最终是沉沦了，但他所做的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人遗忘。

（孙化）

死在浴池里的州长

克瑙尔是西德发行量很大的《明星》画刊的记者，昨天刚从汉堡赶到瑞士的日内瓦。克瑙尔这次是受编辑部的委派，设法采访路过此地的一位西德政界要人的。这天是1987年10月11日，星期天。克瑙尔不时地拨动电话，但听筒里总是传来单调的“嘟——嘟”声，电话无人接。

克瑙尔与那位政界要人同住“美丽海滩”饭店，上下仅一层楼板之隔。这天清晨，他和同行的摄影师在餐厅足足等了两个钟头，但始终不见采访对象的身影。现在，他守在电话机旁，仍不断地拨电话。眼看12点了，对方还是没有动静。

克瑙尔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没有事先约好的情况下，直接敲响了317号客房的门。

房里没有回音，只是门把手上“请勿干扰”的牌子随着敲门声而震动了一下。克瑙尔拧了一下门把手，门开了。他朝房里扫了一眼，只见过道上有一只鞋。此番情景吓得他赶紧拉上了门。

片刻之后，克瑙尔静下心来，断定房里没有人。他返回自己的房间，取出照相机和闪光灯，不顾饭店的常规，悄悄进入了317房间。

房间的窗子敞开着，拉上的窗帘仅留下一条缝。房里光线暗淡，静静的，床罩没有动，看得出客人没有在床上过夜，但曾在床上躺过。床上有一件叠好的睡衣，还有一本法国作家萨特的小说集。书已翻到第98页，倒扣在床上。床头柜的电话机旁，放着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几页笔记。

克瑙尔匆匆看了一下笔记，立即拿起照相机，将笔记内容逐页拍下来，随后又在房间里照了几张相。接着，他推开浴室的门，里面的情景几乎把他吓昏了：浴池里，一个人闭着双眼，和衣躺在水中，头无力地歪靠在池边上，右手缠着毛巾，左手放在胸前，泡在水中的身体纹丝不动，显然已经死了。

办事一向谨慎的克瑙尔，此时却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相机快门，拍下了这张后来引起轰动的照片。

死者是谁？他正是克瑙尔急于要采访的对象，几天前刚辞去西德石荷州州长职务的巴舍尔。

巴舍尔死了！他突然在日内瓦神秘地死了！消息传到了西德，像地震一样震动了全国，更震惊了政界。美联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新闻机构，很快向全世界作了报道。

这个神秘地死去的巴舍尔是何许人呢？他是西德最年轻的州长，被人看好的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大有可能成为下一届国家的总理，只是由于他不久前开始陷入一场政治丑闻之中，深受各方压力，才不得不辞去州长一职。

巴舍尔是“自杀”还是“他杀”？在这关键时刻，为何要选在日内瓦“自杀”？关心此案的人们统统坠入五里雾中。

在西德政坛上，巴舍尔的确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1944年5月出生在柏林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自幼丧父，靠母亲帮别人缝补衣服挣钱糊口，日子过得相当艰苦。巴舍尔从小就立志当联邦总理，他后来说，为了这一目的，他不惜一切。权力像鸦片一样，对巴舍尔这样的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巴舍尔18岁时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25岁当选为这个党的州副主席，27岁成为州议员，29岁当选州议会党团主席，从35岁起，担任州财政部长和内政部长，是当时西德最年轻的部长。

1982年，当他的顶头上司——石荷州州长施托尔腾贝格荣升联邦财政部长时，巴舍尔当上了这个州的州长。当时他年仅38岁。

巴舍尔在大学里攻读法学和政治学，并获得双博士学位。他的家庭生活也充满政治色彩。他的妻子是德意志帝国创始人俾斯麦的后代，有一大笔遗产。

巴舍尔很有个性。

1986年9月，他为了给孩子摘取挂到树上的风筝，不慎从6米高处摔下来，摔断4根肋骨，受了重伤。但他依然忍着剧痛，很快赶到州政府主持一次州内阁会议。

1987年，石荷州进入了选举年。这年5月31日，巴舍尔乘坐的轻型飞机突然坠落，造成3人死亡，他本人也受了重伤。为了参加竞选，他等不得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便四处奔波，发表演说。

在石荷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内，他是一尊自我设计出来的，尤其受青年人崇拜的偶像。他在西德全国的青年人中也有很大影响。他每时每刻都在维护自己的这一形象。在他管辖的州里，他只听得进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就是精心栽培他的前州长施托尔腾贝格。

巴舍尔在政治上有强烈的进取心和权力欲望，但这也恰恰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正当他春风得意一帆风顺的时候，随着州议会选举的到来，巴舍尔突然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政治对手，这个政治对手名叫恩霍尔姆。

恩霍尔姆是社会民主党人，现年50岁，是瑞典移民的后代。同巴舍尔相比，恩霍尔姆给人留下的是一个“温和”的政治家的印象，一点也不露锋芒。他脸上经常挂着微笑，嘴里常常叼着烟斗。恩霍尔姆连中学都没上完，是搞工会出身的，他曾受到前任联邦总理施密特的赏识，当过联邦的教育部长。社会党下野后，恩霍尔姆回到石荷州州府基尔，与巴舍尔争夺州长宝座。

突然有了位强劲的竞选对手，巴舍尔开始坐立不安了。在一些民意测验中，巴舍尔的得分都低于恩霍尔姆。对于百分之百地要确保自己在石荷州统治地位的巴舍尔来说，是绝对不容许别人有来争夺州长宝座的。因为这个宝座是通向联邦总理宝座的垫脚石，西德全国都看好巴舍尔，整个西方国家舆论也看好巴舍尔，认为他是西方政坛升起的一颗新星。

离州议会选举还有一年多时间，巴舍尔就在盘算如何对付恩霍尔姆了。为了打击对手抬高自己，巴舍尔物色到一名经验丰富的竞选助手和谋士，此人名叫普法伊费尔，原先是一家报社的总编辑。普法伊费尔对政界权势之争的伎俩颇为了解，对丑闻事件极感兴趣，这样一个人对巴舍尔太有用处了。有了这样的得力助手，就能在权势之争中做得滴水不漏，也能挖出恩霍尔姆见不得人的材料。

普法伊费尔终于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应州长巴舍尔之邀上任了。他名义上的职务是州长的新闻顾问。普法伊费尔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深知州长对自己的器重，决心为他效犬马之劳，以报知遇之恩。上任不久，他便向州长呈上一份关于公关的“35点建议”，其中提到“要多与群众握手”、“多多微笑”、“要经常与群众一起散步”、“要与小动物一起照相”、“要访问孤寡老人”等等。

巴舍尔很信任普法伊费尔，凡是遇到非常棘手的事情，尤其是涉及一些不宜公开的事情，总是把他找来密商。由于普法伊费儿的特殊使命，由于他和州长的特殊关系，他的权力突然间翻了几倍。他几乎可以代替州长处理日

常事务，可以出入警察局，索取人事档案等材料。谁也不敢得罪他。

巴舍尔和普法伊费尔常常密谈，如果女秘书在场，州长就以某种借口把她支开。巴舍尔是个老练的政治家，凡涉及重要情况，从不在电话里谈论，最多是说几个提示性的单词。他和普法伊费尔密谈的场合，不仅限于办公室，有时在汽车里，有时是在自己家里。有次在巴舍尔家中，他们密谈了8小时之久。巴舍尔与普法伊费尔的密切关系，自然使基督教民主联盟内的一些人感到吃惊。他们认为普法伊费尔是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物，遗憾的是州长事前并未征求他们的意见。然而巴舍尔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重用普法伊费尔当自己的军师，此事是他亲自安排选定的，不必也无法征求更多人的意见。州长内心的想法和用意只能自己一人知道。而且，州长对普法伊费尔相当满意，这位足智多谋的“私人顾问”，是个难得的人才。

经过短时间的考察，州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向普法伊费尔交底了。州议会眼看要选举了。上次选举，巴舍尔百般努力，勉强在议会重获得刚过半数的席位。这次半道里杀出个恩霍尔姆，可真要认真对付了。这是个很有实力的对手，是巴舍尔登上联邦总理宝座的绊脚石。巴舍尔一心要搬开这个“绊脚石”。但是要搬开它也决非易事，巴舍尔决心做些手脚。

巴舍尔和普法伊费尔密谋，罗织了恩霍尔姆漏税的罪名。他授意普法伊费尔打印匿名揭发信，揭发恩霍尔姆漏交了个人所得税。此信一式3份，一份寄给他州长巴舍尔，一份寄给财政部长，一份寄给税务局。巴舍尔说，他收到揭发信，就可以亲自过问此事。州政府规定，即使匿名信，税务局也可以立案调查。有了匿名信，巴舍尔仍觉不够。在一次私下谈话中，他又向普法伊费尔透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恩霍尔姆的私生活放纵。巴舍尔要普法伊费尔委托一私人侦探公司，监视恩霍尔姆的行动，获取确切证据，最好能拍到这方面的照片或录像。

普法伊费尔心领神会，帮巴舍尔物色了一家叫“哈里·皮尔”的事务所。这家事务所擅长于干私人侦探工作。普法伊费尔和事务所定下了这笔5万马克的交易。这笔钱从哪里开支呢？巴舍尔告诫说，决不能从政府预算中支出。州长于是找他的好友、大企业家老板巴尔豪斯帮忙。这巴尔豪斯也不会白给州长5万马克，他平时就和州长有勾结，通过巴舍尔的关系，他顺利地解决了一些生意上的问题。他和巴舍尔的关系是钱与权的交易。

“哈里·皮尔”事务所拿到钱后，立即派了两名侦探，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恩霍尔姆进行监视。他们每天租借不同的车辆，带着步话器和照相机，悄悄盯着恩霍尔姆，想捕捉恩霍尔姆和女人鬼混的精彩镜头。但是，他们跟踪了10天，竟一无所获，这才不得不放弃这一行动。

巴舍尔爱看侦探小说，这些小说为他在对付反对党方面提供了许多灵感。1987年5月1日，普法伊费尔应约驱车前往巴舍尔的住处。巴舍尔没让他进屋，就与他同车前往附近的一个湖畔。这里是巴舍尔经常散步、游泳的地方。在这里，两人设计了这样一出假戏：巴舍尔让普法伊费尔把自己绑在一棵树上，造成巴舍尔州长被绑架、成了一秘密行动的受害人。巴舍尔想用这出自导自演的把戏，达到陷害竞争对手恩霍尔姆的目的。只是由于后来巴舍尔在一次坠机事件中受重伤，这出戏才没有演成。

为了嫁祸于人，巴舍尔甚至几次催普法伊费尔设法为他弄窃听器，并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时他让女秘书叫安全人员前来检查。一旦查出窃听器装置，巴舍尔就借题发挥，攻击对手，以取得公众更多的同情。

巴舍尔不仅算计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而且对有可能影响他执政地位的小党也不放过。他授意普法伊费尔，冒充《图片报》负责人，通过电话挑拨离间那些小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些电话的作用，小党领导人之间产生了怀疑和矛盾，导致这些领导人互不信任，有的甚至被迫辞职。

巴舍尔两次从空中坠地，六次遇车祸大难不死。他充分信赖自己的后福。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正在悄悄地向他袭来。

1987年9月初，眼看离全国关注的石荷州选举仅剩一周时间了，西德最有影响的政治刊物《明镜》周刊，以醒目的《基尔“水门事件”》为题，报道了在野政界人士受盯梢事件，引起了朝野两派的极大关注。

大约在年初的一天，在社会民主党石荷州领导人恩霍尔姆的私人住宅前，人们看见了一辆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白色轿车。车中坐着两名男子，似乎在等什么。其中的一名男子还不时地举起照相机，悄悄地拍照。

与此同时，恩霍尔姆在州议会的办公室接到了安全部门的电话，电话中说，恩霍尔姆的车子有人跟踪，要司机千万留神。

2月10日，类似情况又在基尔附近的一个小乡镇出现了。这天，恩霍尔姆前去拜访镇长彼得特夫斯，傍晚时分，他的保安人员突然发现附近街道拐角处，有人拿着照相机朝这边拍照。在这个人的附近，停着一辆小汽车。对恐怖分子活动极为警惕的保安人员，立即让警方检查了这两个人的证件。检查结果证实，这两个人是私人侦探。他们是巴舍尔州长花钱雇来跟踪恩霍尔姆的。

但是，对此次事件的调查后来还是不了了之。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的是些支离破碎的不确切的情报。后来在调查中，社会民主党从州政府内部，获悉了一条重要线索：“皮尔”侦缉事务所的顾主就是前面提到的、巴舍尔的“哥们儿”大老板巴尔豪斯。巴尔豪斯的公司是西德最大的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年营业额达10亿马克。

巴尔豪斯是西德雇主协会主席，他极不欣赏反对环境污染的绿色和平组织，因为社会民主党和绿色和平组织站在一边，巴尔豪斯自然就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了，更何况他与石荷州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舍尔有许多利害关系呢。

在调查中，尽管州政府拒绝表态，“皮尔”事务所老板皮尔装糊涂，巴尔豪斯还是承认与该事务所有5万马克的交易，只是咬定这笔交易的目的，是在于了解他本公司内部的安全情况。

《明镜》周刊的报道还提到另一条重要线索，即西德一些州的警察局对这次盯梢事件进行了调查。关于这次盯梢事件和调查结果，石荷州政府没有向当事人恩霍尔姆通报，使之长期蒙在鼓里。

这家周刊在报道中，还提及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党派报纸，对社会民主党的无中生有的恶意攻击等等。

所有这些，巴舍尔和普法伊费尔都知道，几乎每件事都是由巴舍尔布置，普法伊费尔亲自安排的。政治嗅觉颇为灵敏的普法伊费尔，此刻预感到事情不妙，心里开始活动起来。

《明镜》周刊在选举前夕揭露出这起“盯梢事件”，反对党内有人联想到美国的“水门事件”，并且把矛头指向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这个事件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作为一州之长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州领导人，巴舍尔本应立即下令追查

此事的真相，以表清白。但是，他作贼心虚，不敢这样做。相反，为了取得竞选胜利，为了日后能爬上联邦总理宝座，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在《明镜》周刊披露了盯梢事件的第二天一早，巴舍尔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到普法伊费尔家中，指示普法伊费尔为他找一个窃听器。他打算把窃听器装在他的电话里，做赃陷害恩霍尔姆。普法伊费尔当即答应尽力。

当天下午，巴舍尔又打电话给普法伊费尔，询问窃听器一事的结果。巴舍尔顾不上电话可能被偷听，向普法伊费尔透露了自己的目的。他说：“明天上午9点，你派人来检修我的电话机，如果安全人员在检查中发现窃听器的话，你就立刻向新闻界披露，这肯定是我的竞选对手干的，这样，人们就会想到恩霍尔姆，他的形象将受到损害。”

巴舍尔一贯把普法伊费尔看做自己的心腹、俯首帖耳的竞选助手，对装窃听器栽赃害人马到成功深信不疑，可是这一次，他的算盘打错了。

普法伊费尔虽然为巴舍尔效力前是个记者，实际上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主子得势时，他甘心于充当马前卒，但是当主子失利时，他绝不会死心塌地跟随下去，走向死胡同的尽头。他在几周前，已经考虑自己的后路了。

普法伊费尔这天早上接到巴舍尔的电话后，曾经四下打听何处能弄到窃听器。得到的回答是，窃听器属非卖品，私下使用也是非法的，会受法律制裁。当巴舍尔第二次打电话催促他，他就感到事情不妙，他不能再与巴舍尔继续狼狈为奸了。他必须作出抉择，与州长分手。

根据双方约定，巴舍尔当晚20点左右再次和普法伊费尔电话联系，想得知有关窃听器的最后结果。这时的普法伊费尔已不是早上的他了。他一反常态，只是冷冷地说：“可惜没弄到。”就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清晨，普法伊费尔在州府留下了一句话：他白天不在，要赶紧去汉堡处理“州长的事”。在汉堡，他向公证人一五一十的告发了其上司巴舍尔的言行和意图。

9月13日，经过长期而激烈的竞争，石荷州的选举开始了。选举结果，巴舍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恩霍尔姆的社会民主党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在议会都占有37个席位。巴舍尔对选举结果虽然大失所望，但他相信自己还能在州长宝座上呆下去。他苦恼的不是这个僵局，而是他和普法伊费尔的关系。要晓得，反叛他的普法伊费尔，掌握他不少把柄啊。

普法伊费尔在汉堡公证处留下一份记录后，便住进了《明镜》周刊的客店，将自己了解和掌握的情况及证据和盘托出。《明镜》周刊如获至宝，立即抢出一篇指名攻击巴舍尔的文章，在选举那天下午公开发表。

《明镜》周刊在头版头条用了粗黑大标题《基尔“水门事件”》刊发这篇文章，还配发了巴舍尔州长的头像。这篇文章像一枚重磅炸弹，在全国引起了震动。因为现在掌权的是巴舍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而年轻有为的巴舍尔州长又是继任下届总理的最佳人选，如果基督教民主联盟继续执政的话。

由于选举投票已接近尾声，这篇文章对选举结果没有太大的影响，在巴舍尔看来，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明镜》周刊在政治观点上倾向于社会民主党，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受盯梢、在野党受中伤的情况，早已组织人马调查。现在，普法伊费尔又提供了大量情况和证据，周刊编辑部将调查班底扩大到20多人，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和追踪报道。

在西方，人们常说，历史是英雄创造的，但他们往往没有想到，一些小人物在关键时刻也能扮演扭转乾坤的角色。普法伊费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明镜》周刊指名道姓的揭露文章一发表，普法伊费尔立即成了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采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他也是有问必答，来者不拒，他对自己所看到的以及所干的一切供认不讳。且不论是留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总之普法伊费尔是扬名了。

巴舍尔州长的所作所为，使这个联邦共和国出现了它成立以来少有的局面。它不仅给石荷州的选举蒙上一层阴影，而且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全州乃至全国都在议论这一问题：普法伊费尔谈的是真是假？

西德的法律允许新闻界对突发事件立即进行报道，对丑闻也是这样，只要有证人就行，哪怕证人是个骗子。只要记者不是凭空捏造，就可以抢发新闻，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这类事太多了，人们已见怪不怪了。

也许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这个州的统治时间太长了，也许是普法伊费尔揭露的事太出乎人们意料，也许是巴舍尔州长在人们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一时间，百姓们束手无策，不知谁是谁非。

巴舍尔是个职业政治家，雄心勃勃。20年的从政生涯，已把他磨炼成一名角斗士。处于这种局面，他没有乱了阵脚。他十分清楚目前的僵局，他不能手软，不能后退，后退就意味着。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本州、在全国的倒台，就意味着他当联邦总理的希望成为泡影。他要反击，他决心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人们对他的信任，与普法伊费尔这个背叛自己的小人物，作一番你死我活的搏斗。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来自首都波恩的强有力的支持。

事件开始时，巴舍尔的竞选对手恩霍姆并不知全部底细，他仅是向法院起诉，要求追查事件的真相。

局势一天比一天复杂。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全国传播媒介无一不在谈论这一事件。舆论把它称为“德国水门事件”。慕尼黑的一家报纸甚至挖苦说，在这一事件上，美国的前总统尼克松也得好好向巴舍尔学习。另一家报纸评论说，“这一事件写下了联邦德国战后选举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这一丑闻如同大地震一样，震中虽在石荷州首府基尔，但迅速波及首都波恩、波及全国，不仅动摇了州长巴舍尔的地位，也动摇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巴舍尔抓住人们一时还难以判断谁是好人的战机，开始反击了。阵线一拉开，就显得普法伊费尔十分孤立。而巴舍尔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他身为州长，仍控制着州政府。他有他的党作后盾，他有众多的崇拜者。许多人崇拜他，不相信他会作出如此卑鄙无耻的勾当。巴舍尔看准了这一点。

巴舍尔在许多场合，信誓旦旦地否认他和普法伊费尔有任何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他不知道普法伊费尔下班后干的事。对于《明镜》周刊揭露的事，他只承认一点，就是把他的名字写对了，他声称他不但是清白的，而且是普法伊费尔阴谋的受害者。巴舍尔利用自己的威望和手中的权力，调动各方面的人为自己作证。形势继续朝着对巴舍尔有利的方向发展。

孤军作战的普法伊费尔，顿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离开汉堡，到葡萄牙的一个只有他的律师才知道的地方度假去了。普法伊费尔“失踪”了，巴舍尔松了一口气。但是巴舍尔太低估了普法伊费尔的能量了。普法伊费尔临走前，丢给他的律师一包物证材料，其中有巴舍尔的笔迹。在指示普法伊费尔安装窃听器一事上，巴舍尔赖得干干净净，但他的女秘书却向检察院写材

料作证说，她偶尔听到巴舍尔在办公室打电话，其中提到窃听器一事。

在这场揭露与反揭露的斗争中，普法伊费尔与巴舍尔一直相持不下。但在上述几个问题上，巴舍尔无法自圆其说，从而露了马脚。尽管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一再为自己辩解，但一些报刊还是说“巴舍尔在撒谎”。

在首都波恩基督教民主联盟中央，人们也开始怀疑巴舍尔了。虽然事态尚未彻底查明，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就已在考虑物色人选，取代巴舍尔了。

9月25日上午，巴舍尔终于向联邦总理科尔提出，他对目前的事件负政治责任，并要求辞职。科尔没有同意，要他坚持下去。但到了这天下午，巴舍尔已顾不得党的利益，正式宣布辞职，并委托州的联邦事务部长施瓦茨临时接管州长事务。

巴舍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感到束手无策，科尔也感到意外。正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的前石荷州州长施托尔腾贝格，听到消息后立即从会场赶回波恩。与基督教民主联盟联合执政的小伙伴自民党，既感到吃惊，又感到尴尬。外交部长根舍正在纽约开另一个国际会议，听到消息后也连连打电话回国询问。就连长期遭巴舍尔和普法伊费尔暗算的社会民主党石荷州领导人恩霍尔姆，也感到不理解。

从《明镜》周刊指名道姓地揭露巴舍尔起，仅仅两周时间，巴舍尔就从他的州长位置上掉下来。尽管人们早就料到巴舍尔当州长的日子不长了，但都没想到事态发展得这么快。

正在葡萄牙度假的普法伊费尔，从收音机里听到巴舍尔辞职的消息后，同样感到难以相信，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说：“上帝保佑。”

巴舍尔辞职了。他放弃了当联邦总理的远大目标，心里流着血和泪，独自一人走了。但是事情远没有了结。10月9日，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图片报》刊出了一篇报道，大标题是：《巴舍尔将进监狱？》巴舍尔所在的党内人士开始怀疑他了。正在大加那利岛度假的巴舍尔听到这些消息，精神上的压力更加沉重了。他奋力拼搏了半个月，终于精疲力竭，挺不下去了。他对人世间感到厌倦，他幻想着天堂里的田园生活。

巴舍尔独自一人在大加那利岛过了几天轻松日子，又乘飞机到达了瑞士日内瓦，住进一家饭店。在饭店里，巴舍尔与妻子以及他的兄弟姊妹通了电话。

到了晚上，巴舍尔没有出门，连电话也不接。他躺在床上，静静地阅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一本短篇小说选。书中第一篇的题目是《墙》，描写了西班牙内战中3名男子，被佛朗哥分子处死前一夜的情景。这是一个描写走向死亡和绝望的故事。这是巴舍尔看的最后一本书。书未看完，只看到第98页。当《明星》画刊的记者克瑙尔第二天找到巴舍尔时，他早已进了“天堂”。

巴舍尔死了。他死后不到半天，消息就在西德全国各地下胫而走，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闻讯而来的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把巴舍尔生前的客房围得水泄不通，日内瓦当局调动了大批警察维持秩序。

医生在尸体解剖后断定，巴舍尔是服用过量安眠药而死。从死亡现场来看，似乎谋杀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死者是穿着衣服倒在水中的，池边仅一只鞋，另一只鞋在过道上。因此有人认为是：凶手进屋后，逼着巴舍尔吞服大量安眠药后躺在水中，待他睡熟后才离去。

从巴舍尔死前留下的日记看，很可能是有人利用重要材料作诱饵，将他骗到日内瓦，然后下了毒手。

巴舍尔死后，有的报纸就说巴舍尔实际上是外国间谍，与国际非法买卖武器有联系，他的事发后，他的头子显然担心他泄露机密，便派了职业杀手将他弄死。但是警方经过缜密的调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人们分析巴舍尔死前故意制造他杀假象，让大家怀疑是普法伊费尔干的。他临死还想找一个人垫背。再说“他杀”或“谋杀”，可以博得许多人的同情，说不定有朝一日会为自己洗刷罪名。这是一出悲剧，一场骗局。巴舍尔强烈的好胜心理，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忘记打击对手。

巴舍尔之死，导致了西德政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政治危机。

（贺伟）

喀布尔的枪炮声

阿富汗历来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尽管它的历史并不长，从 1747 年立国以来，王朝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就一直不断。外国殖民主义者也经常插手干涉，推波助澜，今天帮助儿子推翻老子，明天又指示首相干掉国王。

1919 年 8 月，英国承认阿富汗独立。

1929 年，阿曼努拉王朝被英国唆使的右翼宗教部族势力推翻。接着，出身王族的纳第尔又率部队击败这股右翼势力，自己当上国王。1933 年，纳第尔被刺身亡，他的儿子查希尔继承王位。

1973 年 7 月，国王查希尔到欧洲去度假。几天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给他送来一个信息：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位专搞颠覆的少将已经到达首都喀布尔。这个家伙已经在五大洲的十一个国家露过面，凡是到他到过的国家，没有一个不发生暴乱和政变。

国王对此并不介意，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不幸的是政变果然发生了。前首相达乌德在一批军人的支持下，将忠于国王的人杀了个片甲不留，宣布成立共和国，自任总统。

达乌德上台以后，就把帮助他上台的俄国佬抛弃了，开始在军队和情报系统中进行大清洗，把跟俄国人跑的军官换得一个不剩。然后与伊朗、巴基斯坦以及美国、西欧热乎起来，苏联领导人对此大为恼火：好你这个达乌德小子，我既然能帮助你上台，难道就不能让你下台吗？

事过不到五年，1978 年 4 月 27 日早晨，达乌德还在床上酣睡，一辆 T—59 坦克像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冲进了总统府，直冲进达乌德的卧室，赤身裸体的总统急忙从枕头下面取出当年俄国大使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那支袖珍手枪。他的反抗犹如螳臂挡车，从坦克的枪孔里射出的机枪子弹像一阵暴雨倾泻，达乌德立即被打成了个马蜂窝。

新上台的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也是个性情鲁莽的家伙，权力欲极盛。但他不会使用权力，在他的领导下，权力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了。拥护他一派与反对他的以卡尔迈勒为首的另一派势不两立，到 1979 年 9 月间，反政府的穆斯林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内外交困的塔拉基要抓替罪羊，便把这一切归罪于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阿明，准备拿他开刀。

阿明出身于普什图即帕但族的一个高贵门第，此人博学多闻，满腹经纶，极有心计，塔拉基岂是他的对手？没等塔拉基动手，阿明已开了火，塔拉基身边的亲信被一网打尽。塔拉基只好束手就擒，最后被勒死在地下室里。

阿明当上了总统，但他并没有接受塔拉基的教训，对塔拉基的幕后老板俄国人也不买帐，态度十分强硬。他竟直接找到苏联大使，让他们撤回驻阿富汗的几千名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他又亲自飞往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里大发雷霆，不仅要苏联人撤回军队，而且要求撤换大使。回来后，阿明立即着手改组阿富汗的权力机构。

克里姆林宫哪里咽得下这口气，决心搞掉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扶植新的追随者上台。

苏联领导人很清楚，光靠他们派驻阿富汗的四千多人是不行的，尽管这些人员都被安插在各个要害部门，但通过政变上台的阿明对苏联人是防范森严。喀布尔城外驻着阿明的两个粘锐嫡系旅，旅长的电话直通阿明的办公室，一有风吹草动，这两个旅便会立即出动。鉴于这种情况，克里姆林宫决定，

只能派特种作战部队介入。

12月初，苏军特种部队乘坐巨型运输机安—22飞抵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郊外的巴格兰姆空军基地，指挥官贝洛诺夫上校选择了一片不显眼的草坪，作为部队驻扎的营地。指挥所临时设在飞机上。

就在特种部队秘密进入阿富汗前一星期，苏军顾问团通知阿明，为了彻底解决瓦尔达克地区日益猖獗的穆斯林武装，苏军准备调来一支“富有剿匪作战经验”的部队，进山扫荡穆斯林分子。

阿明竟然信以为真。贝洛诺夫上校的特种部队在机场草坪上搭起了迷彩伪装色的帐篷，外围是铁丝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相当严密。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机场电务队一名电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他早就盯上这些不速之客。电工敏锐地发现哨兵手中的枪不是普通的拉什尼科夫AK—47冲锋枪，而是一种崭新漂亮的新式冲锋枪。他赶紧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情报局。专家们的鉴定和分析很快出来了，这是苏军最新式的冲锋枪，是AK—47的改造型，口径小，重量轻，坚固结实，射击方便，而且命中率高，被权威的《简氏步枪武器年鉴》称为“二次大战以来所使用的效果最突出的冲锋枪”。现在，这种冲锋枪还没有正式装备部队，只是苏军总参谋部下属的特种兵团才使用它，因此可以断定：苏军的特种部队已经到了喀布尔。

夜深人静，人民宫宫邸的灯火彻夜通明。

阿明似乎嗅出了一点火药味，那该死的俄国人不仅赖着不走，反而加速向这里派兵。巴格兰姆空军基地兵员已经超过了一万人。中央情报局又送来更使他忧虑的消息：北面边境上几个俄国师已经进入实战状态。

墙上挂钟敲过12点，阿萨杜拉急匆匆来到阿明的房间，这个个头不高却浑身透着精干的中年汉子是阿明的侄子，掌管着阿富汗秘密警察和全国的治安情报工作。他又带来了新的消息：苏军的军事顾问团已经在欺骗控制所在的单位。比如，要这些单位将弹药交回清点，或要这些单位交出车辆电瓶实施所谓防寒措施，还控制车辆的油料等等。

阿明听罢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立即命令阿萨杜拉调动所有的特工人员，火速调查苏军的任何行动迹象。

阿萨杜拉领命，急急忙忙地走向大门。正当他一步跨出门口的时候，突然从暗处传来“砰砰”两声枪响。阿萨杜拉摇摇晃晃地倒下了，两枪都命中胸部。与此同时，阿明椅背上也中了一枪，他赶紧钻到桌子下面。

阿萨杜拉当场毙命，这位精通暗杀技巧的秘密警察头目再也没想到竟在自家门口被打暗枪。阿明则有惊无险，第二天一大早，他带着全家老小和随员搬到郊外的达鲁拉曼宫去了。

12月初，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维克多·帕普金中将就率一个工作小组秘密来到喀布尔，劝说阿明“正式邀请”苏联红军前往阿富汗“剿匪”。

可是，中将来喀布尔好几天了，阿明一直拒绝接见他。一直拖到11日才召见他。阿明不但对帕普金将军的劝说置之不理，还反唇相讥。他要苏联履行“诺言”，把军事顾问全部撤走。

20日，帕普金再次前往达鲁拉曼宫，阿明干脆来了个闭门不见。

26日晚上，帕普金又一次来到达鲁拉曼宫，并带了十几个卫兵。阿明在三楼的一间会客室会见了中将。刚一坐下，帕普金就指责阿明容忍“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埋怨当局制止不力。然后又谴责阿富汗政府对苏联的巨大支持“忘恩负义”。

阿明开始坐不住了，他身后的几名身穿宽大白色长衬衣、裤子肥大的侍卫也显得局促不安。阿明心里明白，莫斯科已下定决心，要派军队来了。

正当阿明迟疑不决的时候，帕普金向右边一个助手使了一个眼色。那个助手打开一个黑色公文包，伸手往里面掏什么。

阿明背后一个侍卫突然紧张起来：对方在掏枪！说时迟那时快，两名侍卫同时从长衬衣底下呼地抽出两支瑞典造“欣达”微型冲锋枪。

“慢！”阿明想阻挡。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侍卫已经扣动了扳机，那种冲锋枪发射速度是每秒9.5发子弹。帕普金和三名助手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全被撂倒了。

枪声就是信号，就是命令，立刻，楼下帕普金的部下与阿明的警卫发生了激烈的枪战。阿明的警卫人数众多，特种部队只剩下三个人夺车逃走，其余的全被打死。

阿明知道，这可闯下大祸了，他不得不与苏军决一雌雄。他也知道自己不是苏联人的对手，急得如坐针毡。可是出乎阿明意料之外的是，事后不久，苏联大使主动来见他，一开口便表示歉意，说帕普金的所为纯属个人行为，绝不代表苏联政府意思。并恳请阿明不必多虑。大使还答应对阿富汗的援助再增加三千万卢布。

“这是真的吗？”阿明简直有些糊涂了。

他没有想到，这正是俄国人的狡猾，俄国人深感这位“邻居”已经“病人膏肓”，必须给他做个“大手术”来治疗。大使的访问是手术前的“麻醉”，让阿明失去知觉，以便下刀。

1979年12月28日深夜，就在阿明还处于茫然状态的时候，北边几百公里的边境上，五个红军师的坦克、装甲车已经点火起动了。

同时，巴格兰姆空军基地也进入了临战状态，米格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作好了起飞的准备。贝洛诺夫特种部队下辖的三个营，分别向这位“病人”的“大脑”、“心脏”和“左右手”进发。“大脑”就是达鲁拉曼宫里的阿明，“心脏”是喀布尔广播电台，“左右手”则是阿明的秘密警察领导机关——内政部。

这的确是一个大“手术”，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前途。行动之前，贝洛诺夫接到的命令是：“我们的行动是极其神圣的，必须要绝对保密，不许让任何一个阿富汗人活着离开总统官邸。”

贝洛诺夫亲自带领十二辆T—62型坦克、十辆步兵战斗车、五辆装甲运输车，装载着一百二十名生龙活虎的战士，开向达鲁拉曼宫。贝洛诺夫命令突击队员们换上阿富汗的传统服装，并重申了联络信号。车队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拦，“邻居”正在酣然大睡。达鲁拉曼宫在夜色中巍然耸立，像一只沉睡的怪兽。

贝洛诺夫命令坦克将炮筒对准达鲁拉曼宫，随着一声巨响，达鲁拉曼宫白色的墙壁被炸开一个大洞——手术开始了。

阿明在梦中感到大地猛的一震，惊醒了。等他明白发生了什么，才意识到一切都晚了。他悔恨自己掉以轻心，上了俄国人的当。通往陆军司令部的电话已经被掐断。苏军的坦克堵死了后门。看来只有决一死战，他和卫队长指挥贴身警卫人员进行最后的抵抗。

苏军前院的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仅12分钟就结束了战斗。阿富汗人那几个用沙袋垒筑的工事经不住坦克一冲就完了。加上带翼的滑膛炮命中率极

高，几炮就把仅有的几台机枪工事轰得荡然无存。贝洛诺夫很满意。

远处传来爆炸声，这是贝洛诺夫的战友在解决内政部和电台的守敌。另外还有一个正规旅包围了阿明的陆军司令部。

阿明和他的警卫人员还在用轻武器进行抵抗。贝洛诺夫命令用全部重武器实施扫射。T—62 坦克的高爆穿甲弹在宫殿内部炸开了，大厦里面的设施和守兵的尸体一道飞上了天空。轻重机枪也吼叫着，把成串的子弹倾泻进炸毁的洞里。手执 AK—47 冲锋枪的苏军战士则将榴弹发射器装在枪的下面，40 毫米的杀伤爆破弹就像手榴弹长了翅膀，发发命中目标，很快地，一切都沉寂了。

贝洛诺夫命令两侧的步兵战斗车抵近围墙根。车未停稳，突击队员就跳出来，从一楼的窗户蹿了进去。另一批战士则相互攀扶着，往二、三楼窗上爬。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动作十分熟练。不到十秒钟，冲锋枪又在大楼里响起来。

“跟我冲，不要俘虏！”贝洛诺夫回头命令，并率先冲上去。楼道里到处都是瓦砾和残缺不全的尸体，一、二楼障碍已被扫清，突击队员们又向三楼冲去。

贝洛诺夫一脚踹开一间紧闭的门，将一梭子弹扫进去，里面传来了妇女的尖叫声。他伸头看了一下，都是一些年轻妇女。他毫不心软，再一扣扳机，将弹匣中的子弹都泻在那些绵软的躯体上。

楼梯口被封锁着，双方展开枪战。为了节省时间，贝洛诺夫调用了火箭筒，只听“轰”地一声，道路被扫清。贝洛诺夫带领两名战士翻进四楼一间大房间，这里十几名军官正在焚烧文件。三支冲锋枪同时开火，一梭子弹打完，打死了大半。趁他们换弹匣的时候，剩余的几个阿富汗军官扑了上来，贝洛诺夫和那两个战士只好扔了枪，使出拳脚功夫。

不料这几个阿富汗军官也会中国拳脚，体力也相当好。贝洛诺夫他们渐渐被逼到墙角。正在这时，他们听见窗口传来俄语的喊叫：“趴下，上校！”三人同时卧倒。接着，“哒哒”的冲锋枪声在他们头上响起，子弹飞蝗一般从阿富汗军官们宽厚的背上穿过，他们一一倒下。

贝洛诺夫又率领突击队员直扑四楼的另一端，刚跑几步，突然从走廊两侧杀出一班人。贝洛诺夫眼疾手快，抢先开了火，对方猝不及防，纷纷倒下。紧跟他后面的战士也端枪扫射，那些人一个也没跑掉，全被打死了。至此，战斗基本结束。

贝洛诺夫检查尸体，发现其中一个人像照片上的阿明。经核实，的确不错，正是阿明总统，他身上中了十几弹，鲜血正汨汨地往外冒。贝洛诺夫松了一口气，吩咐清扫战场。

12 月 29 日凌晨，电台广播了一则声明：“在革命政党领导人卡尔迈勒的领导下，阿富汗革命力量刚刚挫败了一次由帝国主义分子支持的反动势力的进攻。反动势力的头子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新政府正式成立。”

（孙练）

折戟沉沙

1971年9月12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正在主持讨论即将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10时30分，秘书长走近周恩来总理身边，悄悄地向他报告：“中央警卫局来电话，说有重要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周恩来总理离开会议室，来到东大厅他的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一个急促的声音紧张地报告说：根据可靠消息，正在北戴河疗养的林彪、叶群、林文果要乘飞机逃跑，时间定在13日早晨6时，目的地是广州，可能要叛国；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他们是一伙，预定明天早晨同时从北京起飞逃走。

周恩来大吃一惊！因为，林彪现在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黄永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是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李作鹏是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邱会作是副总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他们在林彪的扶持和保护下，实际上掌握了中国的军权，并且同林彪的妻子叶群一样，都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尽管他们在前一阶段犯了错误，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但突然堕落到叛逃甚至叛国的程度，仍然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

周恩来敏锐的预感到，一场直接威胁到我党我军和共和国命运的重大危机逼近了。

但是，由于这消息尚未经过证实，林彪一伙的大量阴谋活动还未暴露，周恩来并没有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只是指示对方：“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周恩来回到福建厅不久，秘书长又上前轻声报告：“中央警卫局又有情况要报告总理。”

周恩来马上又来到办公室拿起电话。中央警卫局报告了刚刚发现的新情况：北戴河附近的山海关机场，有一架三叉戟飞机，机号256，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当晚乘坐带来的。

周恩来浓眉紧蹙，脸上顿时现出严峻的表情，他感到问题已十分严重，立即打电话问吴法宪：“你调飞机去山海关没有？”

吴法宪回答：“没有。”

周恩来严肃地追问了一句：“真的没有吗？”吴法宪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忙回答：“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周恩来想，吴法宪可能真不知道此事，他命令道：“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告我。”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机场，周恩来又打了一个电话给李作鹏：“你查一查，256号三叉戟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吴法宪、李作鹏不敢马虎，马上打电话查询。片刻之后，两人分别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查询结果。

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了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的。”

周恩来命令：“要飞机马上飞回来，不许带任何人进北京。”

吴法宪说：“机场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正在修理。”

周恩来当机立断，说：“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北京。”

接着，李作鹏也报告说：“下午到山海关去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但是，作为林彪死党的胡萍，已经从周恩来总理追查 256 号飞机这件事上，引起了警觉。他当即打电话给 256 号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要潘景寅咬定飞机出了故障，正在修理。潘景寅是空军某部飞行副政委，此人飞行技术很有两下子，深得林彪、林立果的赏识，他也就死心塌地为林彪父子效劳了。接着，胡萍又把周恩来总理在追查 256 号飞机下落的消息，通知了林立果的亲信周宇驰。

周宇驰立刻又将这个消息传到了北戴河。林彪一伙顿时紧张起来，匆忙考虑对策。

林彪早年参加革命，在 20 年代末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就深受毛泽东的赏识。此后，在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中，他也是有一定功劳的。但是，自从他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他个人野心便日益膨胀。他用“大树特树”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手段，骗取了毛泽东和全党、全军的信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乘机勾结江青，迫害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为他夺取最高领导权力扫清了道路。在 1969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当上“副统帅”，并且在党章中明文规定他就是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然而，林彪还不满足，在 1970 年 8 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为急于当国家主席，扰乱大会议程，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以后，林彪不但没有改悔，反而变本加厉，大搞阴谋活动。1971 年 8 月，毛泽东主席到南方视察，先后同南方各省负责同志谈话、点名批评了林彪和黄水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想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并且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

林彪一伙打听到毛泽东主席的讲话的内容后，十分恐慌，竟决定由林立果组织亲信，密谋暗杀毛泽东主席，以便“林副主席”顺利“接班”。然而，由于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警惕，使林立果一伙的暗杀阴谋未能得逞。

9 月 12 日黄昏，毛泽东主席安全返回北京。这一来，使林彪一伙阵脚大乱。林彪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南逃广州。这个方案的第一步，就是由林立果将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架三叉戟飞机 256 号带到山海关，供第二天林彪和叶群逃跑用。哪知道这边刚刚一动，周恩来总理已经觉察，并且开始追问了！

林彪终究没能想出什么妙计，只得试图先稳住周恩来。大约在当晚 11 时 30 分，叶群按林彪的意思，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故作亲切地说：“总理呀，有件事要向你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

周恩来机警地反问：“是空中动（乘飞机），还是地上动（乘火车）？”

叶群回答：“空中动。”

周恩来又问了一句，“你们调了飞机没有！”

叶群说，“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

这下可露了马脚！明明他们已将 256 号飞机私自调到了山海关机场，为什么要撒谎？这里面一定有名堂！为了不打草惊蛇，周恩来总理也故意不提 256 号飞机的事，关切地说：“今天晚上飞夜航，只怕不安全。调飞机的事，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也不便再说什么。

周恩来放下电话，却格外放心不下。他立刻又打电话给李作鹏，让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他的命令：“停在山海关机场的 256 号飞机不要动，要

动的話，必須有我、黃永勝、吳法憲和你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同時，周恩來又採取了一些應急措施。

老奸巨猾的李作鵬，馬上意識到周恩來這個命令是針對林彪的，目的是限制林彪的行動。事實上，林彪的行動完全沒有必要瞞着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人，他們也決不會不批准，所以“四個人一起下命令”的關鍵是周恩來總理的命令；而林彪的行動又恰恰不希望被周恩來知道。李作鵬很快想出一個壞主意，他打電話給三海關機場調度室主任李萬香時，就篡改了周恩來的命令，說：“那架三叉戟 256 號飛機的行動，聽總理、黃總長、吳副總長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有其中一人指示才能放飛，其它任何人指示都不能放飛。”

這樣，李作鵬就為林彪的逃跑留下了一條後路。

與此同時，周恩來總理已經考慮到應付進一步事變的對策。他給吳法憲打電話說：“立即準備兩架飛機。如果林彪要起飛，我要到山海關機場去攔他。”

這些消息被李作鵬、吳法憲透露給林彪父子後，北戴河療養區已頓時亂成一窩蜂。

11 時 40 分，林彪對警衛秘書說：“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準備一下東西，現在就到瀋陽去。”為了掩蓋他的真實意圖，林彪故意把目的地說成是瀋陽。

葉群急忙與警衛秘書去找司機，不斷催促說：“快點，快點！有人要抓首長，再不走就走不了了！快點調車上來！”

轎車很快開過來了，是林彪平時乘坐的那輛紅旗牌防彈車。林彪領頭，葉群、林立果和一位警衛秘書從兩邊車門匆匆鑽進了汽車。林立果大叫：“去機場！”轎車開足馬力，衝出林彪所住的 96 號樓，駛上了公路。

但是，林彪的叛逃行為，實在不得人心，他的女兒林立衡在危急關頭，向中央警衛部隊 8341 部隊報告了這一消息。8341 部隊官兵攔住了紅旗轎車的去路，要他們馬上停車。可是在轎車里，滿臉殺氣的林立果用手槍對準司機的後背，惡狠狠地说：“不管他，衝過去！”葉群也發瘋似地叫喊：“8341 部隊對首長不忠，衝！衝！”轎車加快速度，硬是從 8341 部隊官兵的身旁衝了過去。

坐在轎車前排的警衛秘書，親眼目睹了剛剛發生的這一切，思想上也在進行着激烈的鬥爭。突然，他大喊一聲：“停車！”司機沒有防備，不由自主地踩下了剎車。轎車還沒有停穩，警衛秘書跳下車就往回跑。這時轎車里響起了槍聲，擊中了他的左臂。警衛秘書也開槍還擊，可是子彈只在防彈玻璃上留下了幾個白印。等 8341 部隊趕來時，林彪乘坐的轎車已經向山海關機場急駛而去，時速高達 120 公里，把警衛部隊追它的卡車、吉普車遠遠地拋在了後邊。

9 月 13 日零時 20 分，林彪所乘轎車到達山海關機場，兩分鐘後，開到了 256 號三叉戟飛機旁。這時，一輛油罐車正在給飛機加油。林彪一伙慌忙跳下車來，連車上的手提包和文件袋都顧不上拿，就急着要上飛機。由於來不及準備客機梯子，他們就順着駕駛艙的小梯子一個緊接一個地往上爬，倉皇地登上了飛機。沒等飛機加完油，甚至沒等副駕駛、領航員、通訊報務員等起碼的飛行機組人員上機，飛機便強行啟動。在滑行中，右側機翼撞壞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車罐蓋，同時也刮掉了機翼上的鋁皮，撞碎了機翼上

的绿色玻璃罩和有机玻璃。在没有夜航灯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256号三叉戟飞机在13日零时32分飞上了茫茫的夜空。

在13日零时左右，8341部队拦阻林彪轿车失败后，便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

周恩来总理深感事态严重，当即从人民大会堂驱车赶往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住地。周恩来总理与毛泽东主席一起研究了对策，随即下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所有飞机一律停飞，并命令打开北京军区空军的全部雷达，严密追踪256号飞机。

情报迅速、准确地报到空军司令部调度指挥室，然后转报给周恩来和毛泽东。

“零时43分，飞机飞出机场55公里，航向290度。”

“零时46分，航向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

“飞机时速550公里，高度3000米。”

周恩来感到情况越来越严重，他略一思索，问调度人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能不能听到？”

调度人员回答：“能听到。”

周恩来问：“驾驶员是谁？”

调度员回答：“潘景寅！”

周恩来说：“我要对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人员试了试，报告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恩来总理还在作最后的努力。他对调度人员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就说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然而，256号飞机仍不作回答。

这时，飞机狡猾地改变了飞行航向，往西朝内蒙古西部飞去。到了内蒙古西部上空，它又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掉头直往北飞。

北方不多远，就是中蒙边境了。

毛泽东主席听了周恩来的报告，略一沉思，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9月13日凌晨1时50分，256号三叉戟飞机越过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上空。

林彪一伙终于成了叛党叛国的渣滓。

一小时以后，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紧急会议，向他们通报：“林彪乘飞机叛逃，已越出国境。”

不知内情的政治局委员们全惊呆了。

9月13日这一天，从清早开始，到下午三点多，周恩来亲自给全国各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一一打电话，向他们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到9月14日中午，周恩来已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在秘书长苦劝下，他躺了下来，好久才入睡，下午两时，外交部打来电话，说：“我们刚刚接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份电报，要立即送给总理。”

电报很快就送到了，秘书狠狠心，叫醒了刚入睡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一听说是蒙古大使馆来的电报，连忙起来，叫秘书念给他听。电报的主要内容，说是有一架印有中国民航256号字样的三叉戟飞机，于9月13

日凌晨 2 时 30 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周恩来听完，随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消息。

林彪的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似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因为机上人员无一生存，也没有任何人目击坠毁的过程。现在只能从专家们对飞机的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分析，大体上推测出当时的一幕：

9 月 13 日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256 号三叉戟已越过中蒙边境 40 分钟，深入蒙古境内 250 公里，因为油料不够，难以再继续飞行，只得就地实行野外迫降。飞机呼啸着俯冲下来，减速板没有打开，着陆速度太大，尾部首先接触地面，在擦过地面 29 米后形成跳跃，然后两翼折断，成了一个圆筒形的机身继续向前冲，强大的摩擦力使飞机油箱破裂，机身破碎解体，机上人员全部被摔了出去。

飞机坠毁地点是沙质土壤，到处覆盖着 30 至 40 厘米高的茅草，都被机体引起的大火燃烧得一片焦黑。九具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一个个面目全非，难以辨认。

经过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同蒙古外交部长的反复交涉，9 月 16 日上午 11 时，这 9 具尸体才被装入白木棺材，并排合葬在一个 10 米长、3 米宽、1.5 米深的大墓穴里。坟墓上并排插了九块小墓碑，上面没有姓名，只标明一号尸体、二号尸体、三号尸体……根据尸体照片分析，二号尸体是林立果、五号尸体是林彪、八号尸体是叶群。

“折戟沉沙”这个成语，本来的意思是说古代的一种兵器折断了沉没在泥沙里。在这儿，人们赋予它一种新的含义，这就是指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毁在外国的沙地上。

不可一世的“副统帅”和“接班人”，终于成了自己制造的政治危机的牺牲品。

（薛兵）

马科斯出逃

1983年8月的一天，一架从美国飞来的波音767客机，飞抵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上空，空中小姐那甜美的声音在广播里说：“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请诸位系好安全带……”

此时，在二等舱14C号座位上，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乘客，提着一只小包站了起来。他走到前面的厕所里，迅速地穿上一件防弹背心，又小心地套上外衣，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这位中年乘客的机票上写的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做贝尼尼奥·阿基诺。

飞机在马尼拉国际机场安全降落后，通道门与机舱门接通开启了。三个穿军装的军人出现在门口，他们的目光在乘客中搜寻，还没有拿准谁是他们要找的人。

阿基诺在通道中还没有走几步，他就被三个军人推向一个通向跑道的梯子。然后，很快其他一些保安人员堵住了机舱门，使机上的其他人无法走出。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声，紧接着又是一阵枪声。乘客们争先恐后地扑向机窗向外张望，只见那位中年乘客已跌倒在地上，脑后的鲜血红了一大片。几步以外，躺着另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机舱内有人悲痛欲绝地高叫着：“尼诺！”

尼诺是贝尼尼奥·阿基诺的爱称。他是菲律宾前参议员，反对党领袖，是现总统马科斯的政敌。

1983年8月21日，这位被马科斯判处死刑的政治家，不顾马科斯的公开威胁，结束了在美国的三年流亡生活，终于回到了祖国，谁料到，他刚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离开了人世。

阿基诺之死在马尼拉触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示威运动。在阿基诺下葬之日，200万厌恶马科斯政权的菲律宾人跟着灵车，步行20多公里去参加葬礼。整个马尼拉城像一座浓烟滚滚的活火山，到处有人高喊诅咒马科斯的口号。红衣大主教亲自为阿基诺做弥撒。晚上，成百上千的青少年冲向总统府——马拉坎南宫，向里面投掷石块和瓶子。警察向人群开枪，打死1人，打伤74人。

为平息风暴，马科斯政府当即宣布：躺在阿基诺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凶手，是他向阿基诺头部开枪后，被保安人员击毙。然而，几天过去了，却无人指出凶手到底是什么人。一个星期后，当局才宣布凶手名叫加尔曼，说此人是一个为黑社会和颠覆分子卖命的杀手。加尔曼的家人随后也确认了尸体。但紧接着，加尔曼的家人就被空军拘留了。

由于政府发表的声明漏洞百出，不免增加了人们对此案的疑惑。两名与阿基诺同机的日本记者，向外界揭露了惊人的内幕：有两个军人在枪响之前曾掏出了手枪，而阿基诺遇刺倒地时，加尔曼的手里却是空无一物。其中一人还宣称，他手中还掌握了某些令人信服的证据。

日本记者的话像一枚炸弹，在菲律宾各界掀起了层层波澜，成千上万的愤怒的群众自发地在大街小巷示威游行。仅一个月里，就有几十人在与警察的冲突中被打死，几百人被打伤。举国上下强烈要求查出真正的凶手，反对党领导人更进一步指出：“谁是凶手不是关键，关键是谁下达了扣动扳机的命令。”

为了稳定局势，马科斯很快成立了以最高法院法官阿格拉瓦女士为首的

5 人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一成立就受到了巨大压力，经常有人打匿名电话、写匿名信进行恫吓和威胁。一年时间里，调查委员会举行了 183 次公开或秘密的听证会。出席作证的有 193 人。阿基诺案件逐渐明朗化了，矛头毫不留情地指向了马科斯的军事当局。

1985 年 1 月，菲律宾检察院正式向法院控告武装部队参谋长贝尔等 25 名军人及一名政府官员。1985 年 2 月，法院正式受理此案。舆论界称此案是“本世纪菲律宾最大的案件”。不过，同军人作对，其危险系数是可想而知的。菲律宾的 83 名现役将军中的 65 人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重申他们对贝尔“不可动摇的信任与支持”。

尽管许多持存正义感的人们，不顾来自各方面的恫吓，出庭作证，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偏袒被告。1985 年 12 月，法院正式作出判决，宣布贝尔及其他 25 人无罪。外国新闻界称此案件是“菲律宾的水门事件”。

马科斯政府自我包庇的行为，愈加激发人民群众的反政府活动，也壮大了反对党的势力。全国民主阵线领导的新人民游击队，则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马科斯政权。新人民军有正规部队一万五千多人，而且这支队伍每年还在不断扩大。菲律宾混乱的政治局面牵动了大洋彼岸的一根神经——美国开始不安了。

美国在菲律宾有着重要的既得利益。当 1898 年菲律宾摆脱西班牙 400 年殖民统治时，又被美国占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和当地游击队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6 年 7 月 4 日，菲律宾共和国正式成立。但美国仍在菲律宾拥有苏比克海军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第七舰队主要停泊在这里。

基地问题曾是马科斯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王牌，美国一直袒护马科斯。但马科斯实在不争气。美国人看到的是军事管制、反政府游行、愤怒的示威者和游击队不熄的战火。最令美国人感到震惊的，是阿基诺被杀和处决凶杀案时，那一手遮天的全过程。有人认为这太丢美国人的脸了。有人认为美国花在菲律宾身上的钱太划不来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根据情报预测，马科斯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他们的结论是：马科斯由于“阿基诺案件”已人心丧尽了；新人民军力量不断加强，几年以后可能与政府军对峙；菲律宾军人士气低落，军风腐化，军费无保障，有些部队连衣服和鞋子都发不起。美国政府一再敦促马科斯在各方面实施改革，实行民主化，缓解同反对党的矛盾。

然而，马科斯根本不买美国的帐，骂美国政府是个“不分敌我的多头怪兽”。最后不得不由里根总统亲自出面，他派特使去见马科斯，以“最后通牒”的态度，要求马科斯提前进行大选。

这时期，菲律宾政治舞台上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她就是被马科斯政权暗杀的阿基诺的夫人科拉松·阿基诺。曾有 120 万人的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她出面竞选总统。这时候，最大的反对党统一民族民主组织主席劳雷尔，决定和马科斯夫人统一行动。反对党正式推出阿基诺夫人和劳雷尔任正、副总统候选人。

自阿基诺被刺以来，菲律宾政局动荡，国家经济命脉都掌握在与马科斯关系密切的政治商人手里。舆论界称菲律宾的经济是“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经济”。

马科斯的执政党宣布提前大选后不久，民意测验表明，阿基诺夫人大大领先于马科斯。马科斯有些慌了。美国国务院对马科斯政府越来越失去信心，认为马科斯无法实现美国所期望的改革，他掌权的日子已经不长了。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警告马科斯：如他在总统竞选中作弊，将严重影响美菲关系。

美国的一部分人开始揭马科斯的“老底”。国会议员索拉兹宣布：马科斯家族在美国至少拥有三亿五千万美元的财产，这些钱有可能是通过贪污美援等手段获取的。还有人根据美国军方文件揭露：马科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因诈骗钱财被逮捕过。马科斯对此极为愤怒，他指责这是“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对菲律宾内政进行的“赤裸裸的干涉”。

更令马科斯担忧的是，一向效忠他的武装部队内部，也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一位名叫圣蒂亚哥的上校青年军官，公开向记者宣布他支持阿基诺夫人——劳雷尔阵营的竞选。圣蒂亚哥是“军队改革运动派”的成员，其成员都是40岁以下的青年军官，其中不少人是国防部官员，领导人是国防部负责情报工作的菲格多瓦上校。据说他们的后台是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拉莫斯。

在竞选过程中，精力充沛的阿基诺夫人到处奔波演说；而病魔缠身的马科斯在电视演讲中，上气不接下气，像个重病号。气得他的夫人伊梅尔达几次训斥新闻部长失职，没有把马科斯的形象宣传好。在竞选中，还多次发生了暴徒袭击、暗杀阿基诺夫人支持者的事件，就连阿基诺夫人的教子也在一次路边伏击中被打死。

2月4日晚，阿基诺夫人在马尼拉一个公园举行最后一次竞选集会。当她的汽车驶向公园时，有一百万人夹道欢呼，五颜六色的焰火冲向天空，汽车鸣喇叭助威，人们有节奏的高喊：“科丽——科丽——科丽——。”

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在马科斯竞选集会上，尽管谁来参加集会就能吃到一份免费午餐，还能领到一件红衬衫和5美元现钞，但参加者仍寥寥无几。这一天对马科斯来说真是太不吉利了。马科斯刚走上讲台，大雨就倾盆而下，会场顿时骚动起来。虽然各个出口都有工作人员堵住，一些人还是放弃了吃免费午餐的便宜，冲出“包围圈”，溜之大吉。

美国此刻也在为大选悄悄做好了准备。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忽然增加了许多“工作人员”，据说还把许多“菲律宾通”紧急调来开展第一线的考察和调研。1月底，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率超级航空母舰“企业”号和“中途岛”号进入苏比克湾。

2月7日，大选正式开始。科拉松·阿基诺一大早在一个投票站投完票后，对一群记者说：“我希望在就职仪式上再看到你们。”

150英里之外，马科斯一家也乘坐直升飞机来到家乡的投票站投了票。他自信地说，如果我的优势少于300万张票，我将很失望。

美国总统里根派参谋员卢加尔为的官方观察组，到菲律宾监督选举过程。一个国际观察团也来到马尼拉，他们当中有哥伦比亚前总统，美、英、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和社会党国际的代表等。各国驻菲律宾使馆的外交官也全部出动。此外，还有一千多名外国记者赶来采访这个国际瞩目的新闻事件。

马科斯的竞选班子妄图操纵选举。马科斯知道如果实行真正的公开选举，他的政权必垮无疑。凡投马科斯票的人可以得到一张大钞票，许多人不予理会，照投科拉松·阿基诺的票，有的因此挨了一顿打，还有的挨了枪子儿。好多投票站里竟站着带枪的打手。

投票结束，经电子计算机统计结果，阿基诺夫人已领先15万张票。但选

举委员会向大众公布的结果恰恰相反，是马科斯领先了 15 万张。

2 月 15 日，菲律宾国民议会正式宣布：马科斯以多得 14 万多张选票的优势击败科拉松·阿基诺。马科斯匆匆宣布将于 2 月 25 日举行就职仪式。他说这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为艰苦的战斗之一。议会的全体反对党议员退出了国会大厅，抗议马科斯政府玩弄卑劣伎俩，使它成为菲律宾历史上“最污秽、最不体面和最带血腥味的选举”。

阿基诺夫人第二天即举行了百万人集会。她说没有人还相信马科斯是总统了，因为他没有得到人民的选票。她随即号召举行全国性的罢工罢课，并呼吁军警们站在人民一边。天主教会的 80 多名主教也联合签署一项声明，宣布支持阿基诺夫人，并号召教徒们用非暴力手段来积极抵制“邪恶的势力”。在一个天主教徒占 85% 的国家中，教会如此明显地干预政治，在菲律宾还是头一遭。这无疑是在给马科斯政权又一沉重打击。

军队改革运动的政治态度也明朗起来，他们在一份强硬的声明中谴责选举中的舞弊行为。他们敦促武装部队中的同事们，拒绝使用武力和暴力手段来对付无辜的、热爱自由的同胞。

马科斯宣布获胜后，除了苏联新任大使向马科斯递交国书时，转达了苏联的祝贺外，没有一个国家对他的胜利表示祝贺。许多国家为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和暴力所震惊，表示遗憾。一些驻菲大使还应召回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还表示，如果菲律宾的局势继续动荡下去的话，将中断对菲律宾的援助。

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总统特使哈比卜的到来，他在马尼拉逐一会见了马科斯、阿基诺夫人和军、政界的各位领导人。会谈详情一直秘而不宣。据说哈比卜此行的使命是告诉阿基诺夫人和反对党领袖们，马科斯的的日子不长了；他将劝说马科斯及早把菲律宾的政权交给新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里根就菲律宾局势发表了一项声明。里根的助手对新闻界说：“现在不再是马科斯要不要离职，而是怎样离职，什么时候离职。”

2 月 19 日上午，哈比卜离开马尼拉前，又跟菲律宾国防部长恩里莱举行了 70 分钟的会谈。这时，失去了美国后台老板支持的马科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恳求哈比卜说：“你回去向里根总统提交的报告是至关重要的，我要求你帮我澄清事实，说明真相。”

哈比卜前脚刚走，菲律宾的局势后脚就风云突变，国防部长恩里莱和代总参谋长拉莫斯宣布：从现在起，脱离马科斯，支持阿基诺夫人，并要誓死战斗到底。他们呼吁军队“去做对国家有利的事”，并且否认他们进行的是一场政变，但又说：“我们将保卫自己，对付即将发生的进攻。”

军队改革运动早就同阿基诺夫人建立了秘密的联系，还为她训练警卫人员。但是，表面上，他们尽力表现出军人不问政治的姿态。大选的结果使他们个个失望，于是便考虑积极的办法搞掉马科斯。他们甚至在马科斯的贴身警卫中发展了一批秘密成员。

可是，老奸巨猾的马科斯也不是吃干饭的。大选伊始，他就派情报机构严密监视军队改革运动的动向。运动的主要成员担心，马科斯会在他夫人伊尔梅达的怂恿下采取镇压行动。果不其然，马科斯已签署了一项逮捕令，要使一批军政领导人入狱。22 日清晨，一个令人恐怖的消息传来：贸易工业部队司令翁格平的 15 名警卫被捕。翁格平的弟弟是阿基诺夫人的得力谋士之一。

情况十分紧急，他们找到了国防部长恩里莱，原来恩里莱早就是军队改革运动的支持者。几天前恩里莱身边的一名上尉军官投奔反对党，引起马科斯的怀疑。恩里莱在出门时跟妻子交待说：“我可能要被捕。”恩里莱首先要寻求支持。他连忙和代参谋长拉莫斯通了电话。拉莫斯表示将始终和他站在一起，恩里莱放心了。他又和红衣主教海梅·辛通了电话，红衣主教答应从现在起为恩里莱和他的事业做祈祷。

不久，十几架直升飞机把军队改革运动成员和武器弹药运送到国防部大楼。

几小时后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大声呼吁的马科斯。他要国防部部长恩里莱和代总参谋长拉莫斯停止愚蠢的行动，宣布主动投降。马科斯还宣布：已经粉碎了一起未遂政变。他说，约有三个营的部队串通了总统府侍卫官和警卫人员，准备袭击总统府等等。

在国防部的四层楼楼顶上，架起了掩体。黑洞洞的楼道里架起的机关枪，对准了一个个楼梯口。大楼外面，反对马科斯的群众高呼口号，有人推来几辆推土机做路障，想用来阻止进攻国防部的队伍。但是，大楼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紧张。

守在国防部大楼里的军人不过150人，而仅马尼拉市就有1万5千武装精良、配有轻型坦克和装甲车的总统保安部队。此外，30英里外的陆军第二师正迅速向马尼拉集结。据说，这个师是马科斯专门用来防政变用的，从表面上看，兵变部队和马科斯部队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马科斯说：“对付恩里莱等人，动用一下总统府卫队就绰绰有余了。”

然而，国防部大楼里的军人越来越多，他们大都是些尉级和校级的年轻军官，有的军官还带着部队来了。接着，有的将级军官也来了。23日凌晨，国防部大楼里的军人已有近千人。由于国防部大楼易攻难守，兵变军人们决定转移到“联合警察司令部”的驻地克拉梅兵营。

此时，马科斯通过无线电广播再次要求兵变领导人投降，否则就要把他们消灭掉。他还声称自己要亲启率兵攻打他们。恩里莱嘲笑他说，他甚至不能把自己率领到厕所里去。因为马科斯年迈体衰。拉莫斯则回答说，让他们来试试吧。拉莫斯呼吁陆、海、空三军的主要指挥官到克拉梅兵营向他报到，接受指示。

23日中午，马科斯的心腹、恢复原职的武装部队参谋长贝尔，命令塔蒂曼尔将军指挥的海军陆战队，出动坦克包围克拉梅兵营，战火一触即发。

成千上万的人闻讯而来，把克拉梅兵营团团围住。他们在相距克拉梅两公里的地方用成排的汽车堵住道路，迫使坦克群停了下来。人们手拉手，一面唱歌一面喊反对马科斯的口号。他们当中还有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全副武装的士兵面对手无寸铁的人群，茫然不知所措。天快黑的时候，人们发现坦克调转方向开走了。

拉莫斯将军感慨地说：“在菲律宾历史上，老百姓用自己身体来保护军队，这还是第一次。”

23日平安地度过了。24日清晨，又有5架战斗直升飞机向军营扑来。难道马科斯动用了空中力量？由于克拉梅兵营没有防空武器，这几架直升飞机可以轻而易举地使兵营在几分钟内成为一片火海。人们焦虑地望着天空，只见这些直升飞机盘旋了一阵之后，降落到兵营的足球场上。原来是空军第15攻击大队的飞行员，来投奔兵变部队的。

直升飞机的投奔，更增加了人们胜利的信心。拉莫斯立即命令一架直升飞机去袭击劳维尔军用机场。这架直升飞机发射的火箭摧毁了机场上停放的两架飞机。这一行动证明，兵变部队已经有能力袭击马尼拉的任何目标。

傍晚时分，两架直升飞机再次出动，从海上方向，以极高的速度，极低的高度掠过总统府。直升飞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在心理上给马科斯以很大的打击。他斥责拉莫斯“吓得我的家人发抖”。总统府再也不安全了。

贝尔下令城外所有的坦克向城里进发。然而这些坦克刚在马尼拉北面公路上前进了几公里，就遭到了直升飞机的阻击，几枚火箭使车队停止了行动。直升飞机向地面喊话，警告说：如果继续前进，就消灭你们！

贝尔连遭挫折，懊丧已极，最后，他秘密命令陆军最精锐的部队——第一侦察突击团向克拉梅进攻，然而，密令被泄漏了。拉莫斯奉劝这个团官兵不要听从贝尔的指挥。结果，整团的官兵倒戈，集体投向兵变部队。

当天，马科斯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时，坐在他身旁的贝尔忘记了是在电视摄像机前，凑过来说：“总统先生，我们随时准备听候您的命令，歼灭他们……我们除了发动进攻，没有别的办法。”几乎全国的电视观众都清楚地听到了这段话。

忽然，电视节目中断了。几小时后，当电视节目重播时，只见广播员满面春风地向观众宣布说：“这是电视台第一次自由广播……电视台现在在人民手中。”

到此为止，马科斯看来已永远失去镇压兵变的机会了。但在这以前，为什么迟迟不下决心向兵变部队开火呢？这是因为马科斯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事后才知道，马科斯更担心的是自己会像当年越南的吴庭艳那样，被人暗杀掉。他想确切地知道：自己会不会在离开时挨一枪？

23日下午，里根主持了国家安全会议，哈比卜直截了当他说：马科斯的时代结束了。国务卿舒尔茨说，恐怕没有一个人认为马科斯可以继续掌权。曾经一度坚决支持马科斯的里根，也接受了高级助手们的意见。但他补充说，我们将安排此人保持尊严地退休，他将不会流浪。

里根致电马科斯，要求他不要以武力维持政权。接着里根又传递一个信息说，美国欢迎马科斯和他的亲信移居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如果马科斯仍一意孤行。美国将中断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国务院开始同马科斯在美国的代表，秘密谈判将马科斯安全接出菲律宾的计划。24日清晨，马科斯在电话里听完美国的意图后，勃然大怒。生死关头，“老朋友”竟逼迫他弃权下马。他叫嚷着说：“伊梅尔达就在旁边，她不想走。”

美国开始强硬起来。当天下午，白宫发表了总统声明：马科斯应该辞职。解决菲律宾的政治纷乱，只能通过向新政府和平交权来实现。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向贝尔发了电报，警告他“不要胡来”，否则将丧失移居美国的待遇。

阿基诺夫人宣布，她将在25日宣誓就职菲律宾新总统。她于25日上午来到了马尼拉郊外一家豪华的俱乐部里，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提汉奇的主持下，宣誓就职。大厅里挤满了支持阿基诺夫人的各界名流。人群中有一个外国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一等秘书。

电台实况转播了阿基诺夫人的就职仪式，阵阵欢呼声像一把把刀子，深深地刺痛着马科斯的心。中午，他自己也要宣誓就职。在总统府，他也举行了就职仪式。参加仪式的政府高级官员寥寥无几，就连副总统和总理都没来出席，礼毕，他和伊梅尔达走上阳台，向下面一批被动员来的支持者发表讲

话。他挥动着拳头高喊：“无论我们面前有什么困难，我们都将克服！”他的夫人伊梅尔达则呜咽着发誓说，她要“为人民服务，直至最后一口气”。

在下面听他们讲话的人，有谁能料到，此刻的马科斯夫妇正在做逃跑的打算呢？就职仪式一完，马科斯就打电话给恩里莱，要他保证他一家人出走的安全。

这一天，在菲律宾共和国，是有史以来两个总统同时宣布就职。

当天晚上9点，马科斯夫妻携儿带女，和他的一些亲信们打点细软，匆匆钻进4架直升飞机，飞往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

“马科斯逃走了！”消息迅速传遍了马尼拉，人们像过节似的，挥动着双臂在街上狂奔。“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声，到处都能听到。整个城市沸腾了。铜管号、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五颜六色的焰火，和像下雨一样耀眼的黄色纸屑交相辉映。五千多人推开卫兵，冲进总统府。他们看见餐厅里还摆着吃了一半的丰盛晚饭，看见伊梅尔达的储藏室就像小型的百货商店，光是各种鞋子就有2000双！看见总统和他妻子生活如此奢侈，一个个都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人们把伊梅尔达的油画像扔进金鱼池里。一个青年跳上总统办公桌，一拳击穿了墙上挂着的马科斯肖像，并且狠狠地说：“我真想杀死他！”

直升飞机到达克拉克空军基地的时候，马科斯已是心力交瘁。在用担架把他抬上飞机后，随后就做了身体检查。之后，他们一家路经关岛，被送到美国的夏威夷。

美国海关发现，马科斯一行一共带来了300多个箱子，里面有数百万美元现钞，50磅金条和无数珍宝。

马科斯当总统，每年的年薪只有几万美元，但他和他的家族，一直巧取豪夺，侵吞国家巨额财富，据说，马科斯的财富总数达上百亿美元，分别存放在世界各地，此外还有许多不动产，纽约有几幢摩天大楼就是他的。

马科斯逃出菲律宾后，暗杀阿基诺案中的两名被告，愿意出来作证说：暗杀阿基诺的元凶就是马科斯夫妇。

马拉卡南宫的新主人——科拉松·阿基诺夫人作为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踏上了一条全新的生活道路。她要得到对丈夫贝尼尼奥·阿基诺之死的公正处理，还要使千千万万在马科斯统治时候含冤而死的人，都得到昭雪。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90年9月28日，在马科斯逃离菲律宾四年半之后，庄严的法庭终于作出了公正的判决。而刺杀阿基诺的元凶马科斯，忧病交加，客死在异乡美国夏威夷。且死无葬身之地，菲律宾政府一直拒绝将他的尸体运回国内安葬。直到1993年才被允许将他的尸体运回国内他的家乡安葬。

（贺君）

希特勒日记伪造案

1983年4月22日，联邦德国《明星》画刊突然向全世界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独家新闻：它的记者格德·海德曼发现了希特勒的亲笔日记，共有六十二册。

两天以后，世界三大报之一的《星期日泰晤士报》首先发表了“日记”的内容摘要。立刻，就像一枚原子弹扔在了大西洋里，引起了全球性的轩然大波。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都先后转发了这条惊人消息。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界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官方不得不出来干涉。联邦德国内政部长亲自宣布“日记”是伪造的，并下令将海德曼逮捕入狱。他一直不肯认罪。直到1983年底，《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吉塔·泽雷妮在经过七个月的调查之后，终于发现“日记”骗局后面，还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骗局，而在这背后，老纳粹地下组织的幽灵在忽隐忽现……

海德曼是欧洲颇有影响的《明星》画刊的著名记者，他在这家刊物工作了三十年，一直非常顺利。在新闻界的地位也是青云直上。他年富力强，头脑灵活，善于捕捉独家新闻。正因为如此，当他1981年初求见《明星》画刊所属的格鲁纳和雅尔印刷公司董事长菲舍尔，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纳粹空军运输帝国档案资料的“后宫行动”及1945年4月21日发生坠机事件，致使希特勒日记丢失的情况时，菲舍尔完全信以为真。海德曼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发现这些“日记”的经过。

他说，1979年11月，他在一位朋友家里看到一册“希特勒日记”。据说就来自1945年4月21日坠毁的那架飞机。他四处打探提供“日记”的人，但一无所获。于是，他决定从坠机事件调查起。1980年10月，他终于查到飞机坠毁地点是在当时民主德国境内的伯纳斯多夫村。后来，他与《明星》历史部主任瓦尔德赶到那里，找到十六个军人的坟墓，每个坟墓上都有一个饱经风雨剥蚀的木制十字架，上面钉有一块椭圆形的搪瓷牌，其中一块写着“威廉·阿恩特”，另一块写着“弗里德里西·贡德尔芬格尔”……为了证实所述不虚，他向董事长呈上了现场照片。

他接着说，1980年12月，他终于找到了向他朋友提供“日记”的人，此人是德国南部的一位收藏家、来自民主德国，现在仍有亲属在那边，有一个哥哥还是情报部门少将。五年前，这位少将从一个老头儿手里买到一份从那架坠毁飞机上抢救出希特勒档案的人的名单。他就前往伯纳斯多夫村，用金钱和权势逼迫村民交出了隐藏几十年的希特勒亲笔日记，还有他的诗、画和照片。现在那位少将准备把这些东西走私给他的弟弟，即那位德国南部的收藏家。而那位收藏家愿意以每册二十万马克的价钱将“日记”转让。

海德曼不肯说出那位收藏家的姓名，因为“那位将军把话说得很清楚，如果我对他们来说成了危险分子，他们将危害我和我的家人。”

尽管海德曼只提供了飞机坠毁的证明材料，而未提供那批档案幸存和传递经过的任何依据，但由于他过去表现一直不错，菲舍尔也就深信不疑，并不坚持追问那位收藏家的身份，当即指示海德曼去洽购“日记”。为了保密起见，甚至瞒过了《明星》的主编。菲舍尔命令公司财务主任在银行开设一个特别帐户，海德曼可以在这个帐上任意取钱。当天，海德曼就提走了刚存进去的二十万马克，随后就消失了。

几天以后，海德曼带回了第一册“日记”和激动人心的消息：那位收藏

家告诉他，“日记，共有二十七册，为避免万一失手，不致全部被查获，他们将每次走私二至三册，总计约值二百万马克——对于一条必将震惊世界的独家新闻来说，这个价钱一点儿也不过份，因此董事长决定全部吃进。

此后，海德曼每月送来三本“日记”，厚薄不一，厚的约有100页，薄的只有50页上下，都是大开本，黑色人造革封面，每册“日记”大约包括2至4个月时间的内容，每个月底都有一段简短的小给，多数有希特勒的签名。

菲舍尔于1981年离任后，由舒尔特·希伦接替了他“对于这件振兴企业的大事，希伦的兴趣也毫不逊色。为整理这些“日记”，他成立了代号为“绿色档案”的特别工作组，由历史部主任瓦尔德、获历史学学位的年轻记者莱奥·佩施和两位秘书组成。他们的任务是为每册“日记”制作三份照相副本，评价“日记”内容，并准备一组论文。“日记”是用旧体德文写成，还需重新翻译。制好照相副本后，“日记”立即送往瑞士苏黎世。保存在汉德尔斯银行的保险柜里。

到1983年初，《明星》画刊收到的“希特勒日记”已远远超过原来说的二十七册，竟达六十册之多。时间从1932年6月22日至1945年4月中旬，几乎包括希特勒掌权的全部岁月。另外，还有叙述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往英国事件的一本专册，以及叙述1944年7月谋杀希特勒事件的另一本专册。随着“日记”数量的不断增多，售价也越来越高，通过海德曼之手，《明星》画刊共付出了约一千万马克之巨。

在这之前，1982年4月，《明星》领导人决定请国内外专家鉴定“日记”的真伪，他们要找的第一个人，是美国著名笔迹专家奥德韦·希尔顿。

希尔顿68岁，已有45年鉴定笔迹文件的丰富经验，曾揭露过几次轰动一时的文件伪造案。

1982年4月的一天，《明星》代理发行人佐尔格和主任编辑瓦尔德带着一些短笺、信件和签名照片——据说都是希特勒的亲笔，来到希尔顿家。他们还带来两页作者姓名不详的纸，一页是与鲁道夫·赫斯有关的文件，另一页是希特勒给匈牙利总督霍尔蒂的电报原文。他们要希尔顿鉴定，这两页纸与前面那些文件是否同一人所写，即是否为希特勒亲笔所书。

为了不走漏风声，《明星》送来鉴定的，只是与“日记”一起购进的文件。他们认为，若是文件真实，“日记”自然不会假。对希尔顿，他们只字未提这两页文件的来历，他们所要求他的“只是对对笔迹而已。希尔顿把两页原件摄成照片，借助显微镜对笔迹进行比较研究，两周后作出结论：两页文件均出于希特勒之手。

据此，《明星》领导人认定“日记”完全可靠，并于1983年3月拟定了报道计划，准备将“日记”分成三大部分共28节，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一切就绪后，《明星》画刊开始向全世界兜售版权。哪家报刊对“日记”内容有兴趣，可以向《明星》购买转载权。

1983年3月9日，《明星》画刊驻伦敦代表首先找到《星期日泰晤士报》，向它兜售转载权。可是，该报考虑，《明星》是星期四版，而他们的报纸是每逢星期日版，转载时，这些日记早已失去新闻价值了。他们向《明星》推荐它的姐妹报，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出版的《泰晤士报》建议他们去试试。《泰晤士报》兴趣还真大，该报公司的母公司——新闻公司当即与《明星》谈判世界版权。名扬四海的新闻公司老板鲁珀特·默道克是澳大利亚人，在英、美和澳大利亚都有许多新闻企业。他的胃口很大，但他坚持仅仅鉴定几页笔

迹是不够的，必须让一位历史学家检验“日记”，然后才能谈版权的问题。《明星》自然无法加以拒绝。

在历史学界，休·特雷沃·罗珀尔不仅声誉卓著，而且德高望重，被封为戴克勋爵。他是剑桥大学彼得学院的院长，对纳粹帝国和希特勒都有精深研究，并写过几部关于希特勒的专著，其中，《希特勒的末日》被公认是一部经典著作。而且，他是《泰晤士报》公司的董事长，绝对会对“日记”的内容保密。

戴克勋爵一开始对“日记”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他知道，“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暗示过，希特勒曾写过日记”。也没有一个希特勒的助手或仆人曾提到过这种日记。希特勒本人说过，由于体力不济，他写东西很吃力；而且，人所公认，1933年或1934年以后，他实际上已不再写东西，此外，他知道，黑市上还有许多假货：有关马丁·鲍曼的假文件、爱娃·勃劳恩的假日记……但是，当他听取了“日记”的发现过程，并翻阅了几页“日记”之后，他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尽管手写体的“日记”难以阅读，也得不到内容完整的誊清本，但“日记”给他留下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的：一是材料的份量，二是笔迹，三是文体风格和希特勒的签名。希特勒的手迹对他来说真是太熟悉了，而且他对1908年到希特勒自杀前的签名变化了如指掌。他认为，“日记”数量如此之多，要伪造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于是，当天夜里他就打电话给伦敦，说“日记”是可靠的，他愿意“把自己的信誉押在日记的可靠性上”。

在获知“日记”确属希特勒真迹以后，《明星》画刊与新闻公司在纽约重开谈判，默道克想通过谈判杀价，并争取比《明星》先一步发表“日记”摘要。他得知，有世界影响的美国《新闻周刊》正洽购在美国发表“日记”的版权，为了消除竞争，他决定与《新闻周刊》联合购买世界版权。

三家谈得很不顺利，结果谈判破裂。然而，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就在这时，《明星》画刊接到一个电话，是它在汉堡的劲敌《明镜》周刊打来的：“听说你们搞到了希特勒日记。这是真的吗？”

顿时，《明星》的领导人慌了手脚，如果这条独家新闻被最大的竞争对手抢过去，大量的金钱和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再也不能犹豫了，他们决定立刻宣布发现“日记”的消息，并于当天以四十万美元的低价将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报刊转载“日记”的版权卖给了新闻公司。还同意第一批“日记”摘要首先发表在4月24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法国《巴黎竞赛》画刊、意大利《全景》周刊等西方有影响的刊物也买下转载版权。

4月22日，提前出版的《明星》画刊用了17页篇幅报道了它的独家新闻，封面上是“希特勒日记，的照片和鲜红的大字标题。在这17页中，大部分是希特勒和其它纳粹头子的照片和说明，其余篇幅叙述“日记”失踪和发现的经过。最后，《明星》许诺：在“日记”大部分内容发表以后，它将被移交给德国档案馆。并得意地宣称：“随着对日记的评价日益展开，独裁者希特勒的传记，以及纳粹国家史大部分都不得不重写！”

4月23日的《泰晤士报》几乎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戴克勋爵的长文——《地下避弹室幸存的秘密》。他说：“我相信日记是真的，我还相信，有关希特勒的书写习惯和性格。甚至有关某些国际事件时评价，将不得不加以修改！”

4月24日，《星期天泰晤士报》的头版十分引人注目，上面两行通栏标题：“世界性独家新闻——元首日记如何在民主德国的一个草料棚中被发现”，

里面有三个版面介绍“日记”发现经过以及海德曼的情况。根据与《明星》的协议，首先摘要刊登了“日记”的部分内容，题为《我们的朋友和敌人》。

其它许多大报也纷纷以大量的篇幅刊登有关“日记”的报道。而德国的新闻机构反而显得落后了。由于“日记”的第一批摘要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德国人不得不将摘要译成德文，然后再发表。第一炮打响了，《明星》领导踌躇满志。这一期刊物的发行量从180万份一跃突破200万份大关，售价也从每本1.25美元涨到1.45美元。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希特勒日记”发表以后，舆论界普遍认为：要么必须重写纳粹时期的历史，要么就是本世纪最大的伪造案。联邦德国研究纳粹问题的历史学家维尔纳·马泽尔说：“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证据，不过这件事似乎有点耸人听闻的味道。”美国笔迹专家查尔斯·汉密尔顿看了“日记”的照片，认为：“这不仅是赝品，而且是拙劣的赝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日记”嗤之以鼻，他说：“我根本无法相信它是真的。”针对“日记”与民主德国有关的流言，民主德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我们与希特勒日记事件，与希特勒日记在《明星》画刊发表毫无关系。

人们对“日记”真实性的问题提出了种种的疑问：它的内容正确吗？它为何至今仍完好无损？希特勒的日记怎么会是人造革封面？似乎太寒酸了。

关于它的字迹，汉密尔顿说：“真正的希特勒字迹充满力量，在我看到的‘日记’样本上，所有的字母都是摇摇晃晃的，好像它们是描出来的，而不是写下来的。”不过，最有力量、最难驳倒的怀疑是：希特勒根本就不写日记。长期任希特勒随从的冯·贝罗说：“从1937年至战争结束，我们习惯于夜里三、四点钟吃东西，只是在这以后，希特勒才准备上床，他没有时间写任何东西。”其次是希特勒讨厌写东西。《我的奋斗》，大多数军事命令，直至遗嘱，都是向秘书口授的。希特勒自己也承认，他对写东西不感兴趣。越到后来，他越少动笔。多拉尔德·瓦特教授花了六年时间研究战后缴获的纳粹军事文件。他说，在他收集的材料中，1933年后由希特勒亲笔签写的很少很少。再其次是希特勒有病，根本写不了字。从四十年代起，他的左臂逐渐出现震颤，后来扩展到左脚。到覆灭前夕，他的右臂也受了影响。希特勒的随从冯·贝罗说：“在七月阴谋（指1944年7月一些德军将领策划的企图炸死希特勒的密谋）之后，希特勒就不能写字了，除了用铅笔很吃力地写大字。”根据以上三点判断，希特勒的日记还有可能出现吗？

近年来影响很大的联邦德国绿党认为，这种“日记”公开的唯一目的是想洗刷希特勒的罪行，因而必须尽力加以反对。不少进步人士也对“日记”事件正好发生在希特勒上台执政五十周年的时候感到担忧，《明星》画刊发表了“日记”势必助长某些人对希特勒的崇拜，导致产生新的希特勒的神话。

对世界舆论的种种怀疑和猜测，《明星》根本不加理会，并准备在4月25日举行记者招待会，邀请对“日记”表示肯定的英国历史学家戴克勋爵等人出席助阵。但在招待会前一天晚上，在汉堡的大西洋饭店，戴克勋爵和海德曼之间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戴克勋爵单刀直入，向海德曼追问日记的来源。海德曼说，是一位德国军官从飞机的残骸中抢救出希特勒的日记，并将它藏了三十多年，但他怎么也不肯说出那位军官的姓名，以及何时又怎样从伯纳斯多夫村偷运出来的。两人唇枪舌剑，争吵越演越烈，最后是不欢而散。

第二天上午，在《明星》画刊总部，记者招待会如期举行。面对许多同行的诘难，海德曼仍拒绝说出发现“日记”的过程及中间人的身份。戴克勋爵气愤至极，厉声指责《明星》为了抢新闻，“丢掉了正常的历史检验法，不把‘日记’交给本国历史学家鉴定。”到后来，戴克勋爵干脆宣布：“它们是伪造的，除非得到相反的历史证明！”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还发生了另外一场争吵。著名的英国右翼历史学家大卫·欧文随身带了一些希特勒文件，也来出席了记者招待会。自从《明星》宣布发现希特勒日记后，欧文就一直认为它是伪造的。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欧文按捺不住了，一把夺过话筒，开始滔滔不绝地指责“日记”是“纯粹的伪造”，与《明星》总编科赫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记者和摄影师们将他们团团地围了起来。为了阻止欧文在同一间屋里举行对抗的记者招待会，《明星》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请他离开现场。欧文自然不肯，结果爆发了一场争吵，会场乱作一团。最后，欧文终因寡不敌众，被推出会场。

其实要鉴定“日记”的真伪并不难，当时尚有一位纳粹时期的重要人物活在人间，就是鲁道夫·赫斯。他最早与希特勒一起发动啤酒馆政变。希特勒掌权后，他担任负责党务的纳粹军副元首。1941年5月11日，他独自驾机飞往苏格兰，向英国建议：英国人让德国人在欧洲放手干。作为回报，德国将保证大英帝国领土的完整。并归还英国的前殖民地。他的出走是否是希特勒授意，至今仍是个谜。英国当局没理睬他的建议，并把他作为战犯囚禁起来。1946年，他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关在柏林道本斯监狱。海德曼提供的六十二册“日记”中，有一册就是专门叙述赫斯的。

1983年4月26日，是他89岁生日。这一天，赫斯的儿子前往道本斯监狱，为父亲祝寿。尽管“日记”中的赫斯专册与他有直接关系。小赫斯却不能把这情况告诉父亲。因为美、英、苏、法四国有共同规定，不准他与外界交换任何二战期间的消息。若要请赫斯鉴定“日记”的真伪，必须征得四国监狱长的批准，这要通过联邦德国外交部去交涉。而联邦德国外交部对此没有兴趣。

在这期间，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大闹一场的欧文，态度又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与戴克勋爵相反，他与海德曼进行几次接触之后，又表示相信“日记”不是伪造的。

5月3日，《明星》画刊发表声明，决定允许联邦德国、瑞士和美国的专家单独查阅原始资料。当天，他们将七册“日记”交给联邦档案馆鉴定。两天以后，鉴定有了结果：“日记”有许多地方抄自《希特勒演说和宣言(1932—1945)》一书。这部共有两厚册的书由马克斯·多马鲁斯汇编，1962年出版。伪造者在剽窃时，还因为草率出了许多差错。

5月6日，联邦德国内政部长在—项简短的声明中宣布：“联邦档案馆确信，交给他们的文件不是出自希特勒之手，而是战后伪造的。”随后，在科布伦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负责对“日记”的纸张、封面、装订、标签和胶水作化学分析的专家维尔纳宣布：“日记”是显而易见的赝品。“日记”的装订线是混纺的，这种混纺线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产品；粘贴标签的胶水中也含有二次大战以后才生产的化学品；在标签上打字的打字机是1925年制造的，可是，把1934年的“日记”标签上的字迹与1945年的“日记”标签上的字迹比较，时隔九年，而打字机没有丝毫磨损的痕迹。

当天夜里。著名的英国化学家格兰特博士应《星期天泰晤士报》之邀，

检验了“日记”的纸张，确定其中含有战后开始使用的一种增白剂。

至此，真相终于大白。

一夜之间，独家新闻成了特大丑闻。大西洋两岸纷纷谴责《明星》画刊利欲熏心，为了招待读者，不惜用假新闻欺世盗名。《明星》领导人虽然故作镇静，实际上内部已乱作一团。他们急忙召开了紧急会议，发行人南宁表示“感到羞愧”，并宣布不再发表“日记”。

这时，还在联邦德国南部某地寻找“日记”真实性证据的海德曼，当夜被总部派飞机接回汉堡。经过通宵盘问，海德曼不得不说出，提供“日记”的人叫康拉德·库耀，是斯图加特一个买卖二次大战时期军事纪念品的商人。

《明星》成立了一个调查“日记”真相的四人小组，赶往斯图加特调查库耀其人，却吃了闭门羹。库耀的买卖纳粹帝国遗物的小商店门窗紧闭，店主不知去向。

根据《明星》画刊的起诉，汉堡检察当局文案进行了调查，并搜查了库耀的商店和住所，搜出几麻袋与纳粹帝国有关的文件、照片和艺术品，第二天，库耀突然在巴伐利亚边界向联邦德国警方自首，供认是自己伪造了六十二册日记。海德曼完全知道这是伪造品，而且向他提供了纸张。检察当局据此逮捕了海德曼，但是，海德曼否认一切诈骗行为。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声誉受到极大影响，为了挽回损失，它派出女记者吉塔·泽雷妮进行调查。泽雷妮花了七个月时间，按摩耀的口供调查与“日记”骗局有关的人，最后得出结论：“日记”骗局的实际经过比库耀愿意承认的要复杂得多，也离奇得多。

为了调查真相，泽雷妮去了汉堡拘留所。库耀和海德曼分别关在两个单身牢房里，相距很近。当她走进海德曼的牢房时，他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安，不停地说话，反复念叨：“是的，他是个笨蛋；不，他是个骗子。”显然，他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了。

库耀的表现则不同。当泽雷妮进去时，他一跃而起，眉飞色舞地主动说起来。他说，“日记”都是他的作品，他对希特勒的了解比任何人都多。他了解希特勒各个时期的签字方式，还知道希特勒有一个女儿等秘密……

库耀究竟是何许人？他1938年出生于民主德国境内的一个小镇鲍勃，父亲是鞋铺老板，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二战时他才七岁，但纳粹军人的威风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1957年，库耀只身去了南方；到1970年重返故乡时，已由光棍变成一名绅士了。他在家乡四处征集“军事纪念品”，然后把这些东西偷运到联邦德国和西方。他生意兴隆，发了财。在经营过程中，他与前党卫队队员们挂上了钩，还结交了弗里茨·施蒂费尔等人。

施蒂费尔是斯图加特一个白手起家的富商，在库耀的影响下，他也疯狂地收集希特勒遗物，耗资十万英镑，建立起一个希特勒博物馆。但是，这个博物馆中收藏的东西，大都是库耀向他提供的赝品。

为了让主顾们相信货物的来源，库耀煞费苦心地编造了许多故事，包括他所称的与民主德国“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的关系，以及飞机坠毁事件等等。由于库耀夫妇确实曾到过民主德国，因此，当他1979年6月打电话告诉施蒂费尔，说他发现了希特勒的亲笔日记时，后者竟毫不怀疑。

另外还有一人与“日记”事件有重要关联，这人叫克拉佩尔，和库耀一样，也是一个“吃纳粹饭的”，他认识所有幸存的纳粹大亨，也许正是如此，他在这个诈骗案中扮演了主角。

海德曼与克拉佩尔交往已有十年，他在报道一件盗窃名画案时，曾得到克拉佩尔的帮助。海德曼最初得知有希特勒日记存在后，曾多方查找，但无着落。直到1980年12月，在克拉佩尔的帮助下，海德曼才与库耀会面，并且拍板成交。一个月以后，“日记”开始分批送往《明星》画刊。

此后，克拉佩尔告诉海德曼，他还有一个惊人的秘密：马·丁·鲍曼还活着，住在西班牙。这人是继赫斯之后担任纳粹副元首的，是希特勒和希姆莱之下纳粹德国最有权势的人。在纳粹崩溃之际，他在地下避弹室出席了希特勒和爱娃的婚礼，并为希特勒的遗嘱作证，最后安排焚烧希特勒的尸体。此后就下落不明。虽然联邦德国官方在六十年代就宣布鲍曼已死，并出示了一具鲍曼的骷髅，但关于这个人的传说仍层出不穷。如果他活着，就是世界上头号被通缉的战争罪犯。

克拉佩尔声称他与鲍曼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说他把几页带有鲍曼签条的日记拿去让他鉴定真伪。几天后，他又捎回话，说鲍曼认为“日记”是真的。海德曼对鲍曼几乎着了迷。他相信，鲍曼已经选定由他在西班牙建立一个亲纳粹的当代史研究所，并建立一个纳粹文物馆，而他则将成为唯一的访问鲍曼的记者。可是，由克拉佩尔从中牵线搭桥的会面一再被取消，克拉佩尔总是临时找个借口搪塞海德曼。海德曼开始怀疑：鲍曼是否真的还活着？但狡猾的克拉佩尔略施伎俩就使海德曼打消了疑虑。

当时，“绿色档案”小组成员瓦尔德在整理材料时发现了一个别处没有记载的人物——党卫队上尉安东·拉克曼。瓦尔德委托联邦档案馆到美国人管理的柏林文件中心查找到了拉克曼的军事履历。这件事对《明星》的有关人员产生了深刻影响，更加确信“日记”不是伪造。

而海德曼从赫斯专册中看到拉克曼是鲍曼手下的人，便要求克拉佩尔向鲍曼询问。不久，克拉佩尔送来了货真价实的三页拉克曼的党卫队履历，声称见到了鲍曼，并在他那儿看见了拉克曼上尉的案卷。为了证明鲍曼还活着，他特意将这三页文件偷来了。

这纯粹是一套骗人的鬼话，海德曼却信以为真，实际上，文件是由联邦德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个影印员从档案馆里所盗。他是被克拉佩尔收买了的。

可是，伪造“日记”的库耀是怎样知道有这么个死去多年而又名不见经传的拉克曼的呢？经过调查，汉堡检察当局在1941年纳粹年鉴的第221页找到了拉克曼的姓名，有关他的记载被一字不改地抄进了赫斯专册。后来又发现在库耀的藏书中即有这本年鉴，第221页还做了标记。但究竟谁是主谋呢？

女记者泽雷妮认为，尽管库耀一口咬定“日记”是他伪造，但他既无能力，又无时间。在伪造“日记”的几年中，库耀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除去星期天外，白天他都在商店里，晚上先睡一觉，到夜里才到工作室搞“日记”，最多四小时。这点时间只够他抄写，而决不可能从九百多册书中找到伪造“日记”所必需的大量材料。

1983年5月，警方在搜查库耀住所时，发现了总数427册有关纳粹德国的书籍，其中大多数夹着纸条，标明他所抄的段落。“但库耀显然并不具备研究纳粹德国史和希特勒传记的起码能力。泽雷妮认为一定是克拉佩尔在幕后指挥了这一切：是他为库耀提供伪造这么多“日记”的必要知识；是他诱使海德曼陷入了有关马丁·鲍曼的鬼话的罗网；而且也是他拿走了《明星》画刊为“日记”付出的940万马克的一部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他的老纳粹“互助会”提供资金。克拉佩尔是“互助会”理事。克拉佩尔或许并

不关心怎样才能把“日记”弄得无懈可击，只要它们在一段时间内能蒙骗住他人，从而拿到一笔钱，这就行了。

女记者的调查令人信服地证明，纳粹的幽灵仍在德国的土地上飘荡，老纳粹互助会的存在不容置疑，尽管他们的人数也许并不多，但能量却不小。这桩被揭露的诈偏案足以引起全世界人民的警觉。

（孙练）

切尔诺贝利核阴云

切尔诺贝利是个风景宜人而又很普通的乌克兰小镇。它位于乌克兰首府基辅以北约 130 公里处。每到夏天，这里绿树成荫，河水清澈，许多基辅人、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都喜欢全家老少一起来这里度假。他们整个夏季都住在这里，租下几间木屋作度假“别墅”，采集蘑菇，做果酱，或者去基辅海滨捕鱼、晒太阳，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绚丽风光。似乎谁也没在意位于切尔诺贝利以北不远处的一片“禁区”，那里隐藏着由厚厚的混凝土覆盖着的巨大建筑群。

这些由混凝土封闭起来的建筑物就是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建于 1971 年，有四个核反应堆发电机组，每个机组拥有 100 万千瓦巨大功率，从 1977 年到 1983 年相继投入运行。它每年的发电量约占全苏联核电力的百分之十。因此，切尔诺贝利在苏联小有名气，但在世界上却默默无闻。然而，1986 年 4 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核事故，却使它一夜之间震动了全世界。切尔诺贝利，成了核灾难的象征，成了欧洲人闻之色变的恐怖性名词。

在希腊神话中，众神根据宙斯的意志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叫潘多拉。宙斯派潘多拉来到人间，并送给她一只魔盒，里面装有灾难和希望。潘多拉一到，就把魔盒打开，结果一切灾难都从魔盒飞出，从此人类就遭受灾难，只有“希望”还留在盒底。那些由混凝土全封闭的核反应堆，就像是神话中的“潘多拉魔盒”，里面装的是钚、铀元素。在科学工作者的严格控制下，钚和铀乖乖地在反应堆中裂变，产生巨大的能量。核能发电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给人类带来了希望。然而，核能只有有关在“魔盒”——全封闭的反应堆中时，才是安全高效的。而一旦反应堆破裂，“核魔”就会飞出，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就是自美国原子弹袭击日本以来世界上最为严重的核灾难。

1986 年 4 月 26 日子夜时分，愉快地度过了周末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乌克兰在酣睡，切尔诺贝利在酣睡。谁也没有想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反应堆这只“魔盒”的盖子正在悄悄地松动，“核魔”正趁管理人员的操作失误而顶开盖口。一场空前的浩劫正在向人们袭来。

凌晨 1 点 23 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上空突然闪现出异样的红光。随着两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巨响，30 米高的火柱直冲云霄，熊熊火焰照亮了漆黑的夜空，2000 以上的高温的烤着整个厂房，第四号核反应堆里的“核魔”冲出炸裂的盒盖。两名操作人员当场被坍塌的混凝土构件砸死。

1700 多吨石墨成了燃烧的燃料，第四号反应堆仿佛是一团大火球。滚滚浓烟夹杂着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使周围环境的放射剂量达每小时 200 伦琴，为人体所允许剂量的 2 万倍。人如果受到如此高辐射的伤害，轻者患上放射病，重者当场死亡。

大爆炸之后，火势迅即蔓延，核电站多处着火。从火情来看，机房屋顶着火最紧急，它可能成为正在运行的第 3 号核反应堆的“联系环节”。屋顶的坍塌，会砸在第 3 号反应堆上，使之失去封闭性，而造成新的核泄漏，其后果不堪设想。

火光就是命令。最先赶到出事地点的是消防队员。普拉维克中尉率领的核电站消防 3 分队风驰电掣般地奔到火场，冲上机房屋顶，很快将火扑灭，从而切断了通往第 3 号反应堆的火源。普拉维克见火势得到控制，就留下几

个人原地守护，自己则奔向更危险的第四号反应堆。

此刻，第四号核反应堆火光冲天，由基宾克中尉率领的市消防队第六中队的一个小分队，正冒着扑面而来的热浪往上攀登。普拉维克也加入了救火的行列。他们顺着梯子往上爬，抱着水龙头喷水灭火，表面的火很快灭了，而普拉维克、基宾克及其他4个年轻的消防队员却被高辐射所击倒，刚抬到医院就牺牲了。其他灭火的消防队员或被火烧伤，或受到严重辐射。不少人呕吐不止，这是受到大剂量辐射的典型病症。

事故发生后，苏联核专家和州领导人迅速云集切尔诺贝利。他们先后调集15支消防队灭火。快天亮时，火灭了，但第四号核反应堆还在喷射着黑烟。这说明反应堆里的火并没有熄灭，还是一个烧红的“结晶体”，而且核泄漏还在继续。怎样才能使核反应堆心脏冷却，并堵住它的裂口呢？经过几小时的讨论，专家们决定：由于核反应堆的高辐射，人员无法接近，必须由直升飞机把一袋袋沙子、硼砂、铅锭等从空中投放到反应堆上，以堵住裂口，封闭辐射源。于是，从4月26日傍晚起。数百名青年开始连夜将沙子装在口袋里。第二天早上，几架直升飞机飞来，把沙袋投向核反应堆。但即使是空中投放，也必须防止核辐射。飞行高度不能低于200米，而且，飞行员在核反应堆上空飞行时，还必须时刻注意放射性剂量仪。当放射线是每小时几十伦琴计时，就得设法避开高辐射。有时为躲避高辐射，飞行员需折腾20至30分钟才将沙袋投到目标上。这样从早到晚，一天下来几架飞机只投了80多个沙袋，可谓杯水车薪。当局很快又调来十几架载重量较大的米格-26直升飞机，并增加了飞行次数，经过十多天的奋战，用了5000吨的沙子、硼砂、白云石、石灰石、铅锭等，在四号核反应堆外面覆盖了厚厚的保护层，终于在5月11日抑制了辐射的外泄。接着，又在它的外面糊上了很厚的混凝土，使其完全封闭在一个巨大的“石棺”中。

“潘多拉魔盒”终于重新关闭了，但爆炸后飞出去的那部分“核魔”，却在肆无忌惮地污染着周围的环境，危害着人们的生命。

首当其冲的，是生活在这个爆裂的“魔盒”周围的人们。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西北18公里处，有一座与电站几乎同龄的新兴城市——普里皮亚季，有5万居民，几乎都是电站的职工及家属，电站爆炸事故发生后，许多正在休假的职工家属纷纷赶回电站，投入了灭火战斗。不少人得了辐射病，因为核污染看不见、嗅不到、摸不着，人们认识不到核污染的严重性。在出事那天，普里皮亚季市并未采取强有力的防污染措施，只是派出三四辆洒水车，给路面喷洒肥皂水，以防止放射尘飞扬。市民们仍像往常一样，在街上散步，到浴场游泳，去河边垂钓。孩子们照常上学，照样在户外玩耍。结果导致患放射病的人越来越多。据在现场抢救的苏联医生古西科娃事后透露，他们在出事头一天里就诊治了1000多病人。

直到4月26日深夜，即事故发生快一昼夜时，当局才作出出事地点30公里范围内所有居民全部疏散的决定。45年前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时，曾有过大规模的疏散，而今因为核电站事故，在苏联的国土上又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疏散，躲避的却是看不见又摸不着但十分危险的“敌人”。

4月27日，这是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绝大多数基辅人对已发生的核泄漏一无所知。数千名基辅人一早就出门，准备乘公共汽车去郊外游玩。但平日井然有序的交通，今天却混乱不堪。许多线路被取消，有的线路只有一、二辆客车行驶。车站上挤满了候车的人，纷纷埋怨车场调度员玩忽职守。实

际上，各客运部门半夜就接到紧急通知，城里的公共汽车几乎倾巢出动，连夜赶往普里皮亚季市，去疏散那里的居民。

这天凌晨6点，普里皮亚季市政府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市居民发布紧急通告：鉴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宣布全市居民疏散。疏散开始时间为今天下午14点。请携带随身证件、生活必需品和3天的口粮到指定地点集中。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要把市区及周围地区约10万人疏散出去，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疏散工作却出乎意料的非常有秩序。一来层层负责，组织严密；二来“敌人”是无形的，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其严重性，况且只疏散三天。

中午十二点钟一过，大多数市民便按照广播的要求，提着一个个不太大的手提包，里面塞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食品，静静地在自家的楼前集合，等候上车。不久汽车开来了，经民警登记后，人们有秩序地上车离去。

上千辆汽车排成两列，沿公路蜿蜒行驶，成千上万的居民就这样离开了自己的家（后来才知道是永远放弃了），他们穿着一身夏装，只携带最必需的物品，没有眼泪，没有龃龉，只是默默地面无表情地向养育自己的美丽而整洁的城市告别。傍晚，他们被一一安顿在与切尔诺贝利区毗连的波列斯克区和伊凡科沃区的各个村庄里。当疏散工作大体结束后。民警和留下来值勤的人员，又挨家挨户寻找那些躲藏起来不愿疏散的人，并将他们送走。

几天后，普里皮亚季成了一座空城。这座被放弃的美丽城市里只有极少数的留守人员。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呈现出一幅凄凉景象：高楼大厦人去楼空，阳台上还放着自行车，晾晒着衣服；办公室的报夹上，夹着的报纸日期是1986年4月25日，办公桌上的鲜花已经凋谢；在城市的入口处，是身穿绿色防化服的士兵和装有信号系统的密密层层铁丝网；民警们不时在街上巡逻，为的是保护被疏散居民的住宅，防止那些趁火打劫者前来捞取被放射尘埃污染了的财物。

5月初，核污染的阴影也笼罩着基辅。最初几天，切尔诺贝利放射性的烟云向西北方向飘动，但4月30日风向起了变化，向基辅方向吹来。放射性尘埃刮向这座有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于是，洒水车开始不间断地日夜奔跑，用水冲掉柏油马路上的核尘埃。在企业、商店甚至每座楼房的门口，都放着湿抹布，供人们擦鞋之用。中小学开始停课，并将学生送往远离核事故的地区。大街上，身穿连衫裤工作服，头戴防毒面具，手拿辐射剂量检测仪的检查员随处可见。在进入基辅市的大道旁设立了检查站，等候检测的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市场上，牛奶和奶制品消失了，蔬菜都要经过放射剂量测定才允许出售。……

尽管基辅市在5月1日按惯例照样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庆祝活动，但上述预防性措施不得不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从而处于极度惊慌、不知所从的状态之中。一些人开始惊恐不安地逃离这座城市。在火车和飞机售票处前，人们排起了长龙。去莫斯科的“黑市”车票，涨到原票价的六、七倍。甚至皮箱和皮包也成了人们抢购的热门商品，因为有传言说，基辅也要疏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逐渐平静下来。

切尔诺贝利上空的核阴云，随风飘荡，从北欧移向东欧，将死亡的威胁洒向全欧洲，在国际上引起了恐慌。

4月27日下午，与苏联隔海相望的瑞典军用雷达站的一位值勤军官，突然发现自动监测仪显示周围环境的核辐射量急剧上升，高出正常值的六倍。

他赶紧向其他 9 所军用雷达站发出警报。它们也都测出核辐射水平上升的异常情况。雷达站的军人们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焦虑不安地监视着这危险的“敌人”。

4 月 28 日清晨，距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以北 160 公里处的福斯马克核电站，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值班的安全人员立即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是一名上早班的工人引发了厂房门口的自动报警器，经检验，这名工人以及一些刚来上班的工人身上都沾有放射性尘埃。安全人员起先怀疑是自己电站的核反应堆出了问题，但经过彻底检测，并未发现异常，只是发现核电厂外部的核辐射量高出正常值四、五倍，其原因尚不清楚。为了保障人员安全，核电站还是决定将 600 多名职工撤出，并对他们以及附近的居民逐一进行体检。同时，厂方也把这一异常情况报告了有关当局。

正当福斯马克核电站惊恐不安的时候，瑞典核研究中心的反应堆外部也发现急剧增加的核放射尘埃，芬兰、丹麦、挪威也测出辐射剂量的异常情况，而且苏联的邻国芬兰情况最为严重。专家们由此排除了福斯马克核电站发生事故的可能。根据收集到的放射性物质的成分分析，以及风向、云图等气象资料的研究，专家们推断很可能是苏联的某个核电站发生了核泄漏。

瑞典政府根据专家们的报告，指令瑞典驻苏大使与苏联有关部门交涉。4 月 28 日中午和晚上，瑞典大使馆几次与苏联交涉并询问情况，对方的回答都是无可奉告。

然而，在监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此严重的核事故又怎么能隐瞒得住呢？

4 月 28 日晚上 9 点零 2 分，苏联电视台播发了一个极其简短的公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一座原子反应堆受到损坏。”苏联当局第一次公开承认这起核事故，此时距事故发生已整整过去了 60 个小时。

顿时，整个欧洲因此陷入恐慌和骚动之中。瑞典、芬兰等国迅即向国内发出预防核污染的警报，禁止儿童外出玩耍，关闭儿童娱乐场和露天游泳池。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明令居民不得饮用雨水，不得食用野外放牧的牛羊的奶，不要生吃蔬菜。意大利卫生部决定两周内禁止出售新鲜蔬菜，孕妇和 10 岁以下的儿童不得食用鲜牛奶。英国、联邦德国等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入境者逐一进行放射性污染检查，并禁止从苏联和东欧进口新鲜食品。离事故地点最近的波兰，立刻成立了一个由副总理牵头的委员会，以采取种种措施来防止核污染。

欧洲的恐慌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人类或其它生物一旦遭到过量的放射性物质的辐射，会引发放射性疾病。这种疾病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重者能破坏神经、消化和骨髓造血系统，从而导致死亡和伤残。轻者也会引起头痛、头晕、呕吐、白血球减少等疾病。所以，放射性污染引起的社会公害对人类生命造成的威胁，是其它任何污染都无法比拟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据 5 月 17 日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表册，共有 299 人受到大剂量辐射，死亡 17 人，加上当场死亡 2 人，已经死亡 19 人，另有 18 人处于危险状态。5 月 30 日，官方又宣布有 179 人送进医院治疗。

但其他国家的专家认为，实际伤亡情况远比苏联官方公布的严重。美国著名核医学专家盖尔博士飞抵莫斯科，参加了抢救核辐射受害者的工作，他领导的医疗小组与苏联同行一起，投入到与死神争夺 299 名严重核辐射病患者的生命的战斗。他们在一周内对 19 名患者进行了骨髓移植手术，其中仍有

13 人不幸死亡。另一位美国医生韦斯·华莱士博士也到苏联访问了一个月，调查了核辐射受害者。他在 1986 年 8 月会见记者时说：“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刚刚开头。”因为事故地区的工人和居民受到了 600 拉德以上的辐射量，而一般认为，450 拉德辐射量就会使健康成年人死去。

这次事故使苏联经济蒙受巨大损失。首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个核反应堆机组全部停掉，使苏联核电损失百分之十。芬兰、埃及等国原打算订购苏联的核电设备，因这次事故而取消了订购计划，使苏联损失近百亿美元。其次，清除核反应堆及周围的核污染，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至少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另外，乌克兰是苏联的粮仓，粮食产量占全苏联百分之十五。

1986 年，因核事故使谷物减产 2000 万吨，而且乌克兰的数千平方公里肥田可能在若干年内都无法耕种。整个损失可达数千亿美元。

造成这起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的原因，苏联当局对外公布的调查报告认为，主要是机组操作人员违章所致。但在 1986 年 7 月初的一次苏共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上，调查委员会却不得不承认，事故的根源在于核电站反应堆结构有严重缺陷，并要求作出决定，停止建设这种核电站。由此可见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电站核反应堆本身的问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采用的是苏联第二代大功率管道反应堆，这种反应堆技术陈旧，结构上有严重缺陷，一旦发生故障，易于使石墨燃烧，熔化堆芯，加上没有安全罩，极易发生放射性物质外泄。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早就摒弃不用这种反应堆了。但苏联却一直建造使用，而且为数不少，致使事故频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共发生大小事故 104 次，其中只有 35 次是由于操作不当，绝大多数是反应堆结构缺陷造成的。其结果，终于酿成了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核泄漏悲剧。

切尔诺贝利的警钟敲响了，苏联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不再使用这类不安全的反应堆。

1991 年，俄罗斯科学院建议关闭这类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核电站。乌克兰议会决定在 1993 年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核电站仍在运转，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 1 号和 2 号机组也重新启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悲剧是否会重演，世人将为之担心。

（陈重）

暴君博卡萨的末日

1986年10月23日，一架非洲航空公司的波音757客机，从意大利首都罗马机场起飞，穿过地中海上空，朝本次航班的目的地——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飞去。

航空小姐在过道上为乘客服务时，突然发现座位上有一个老头竟是博卡萨！她惊讶得险些叫出声来，连忙找到机长，用颤抖的声音报告了她的发现。机长悄悄地走近博卡萨瞥了一眼，心里嘟哝着说：“上帝！是他……”机舱里坐着的正是被中非法庭缺席判处死刑的在逃犯、前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以及他的妻子阿赛玛和五个孩子。

机长心想，博卡萨一定是疯了，政府正在到处通缉他，而他却自投罗网！

飞机在班吉机场降落。在海关办事处，博卡萨掏出护照。他和妻子护照上填的都是化名。办事人员没找任何麻烦。但就在博卡萨领取行李的时候，几名保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说：“博卡萨，你被捕了！”随即给他戴上亮闪闪的手铐。

博卡萨的妻子和五个孩子，被当局遣返回博卡萨原逃亡地巴黎，而博卡萨立即被囚车押送到市郊思达拉格巴监狱囚禁。

博卡萨明知政府在通缉他，为什么要自投罗网呢？原来，他是想在中非10月24日国庆前夕微服潜回班吉，利用这一大好时机，网罗党羽，伺机发难，把一年一度的国庆大游行变成政治大示威，以实现他复辟帝制的野心。没想到一下飞机他就成了阶下囚，他策划多年的复辟计划成了泡影。等待他的将是绞刑架。

博卡萨1921年2月23日出生于中非共和国境内一个大酋长家庭。他十八岁那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政府因兵源不足，便在它的非洲殖民地招募新兵。博卡萨的爷爷将他送进了法国兵营。在经受了严酷的军事训练后，博卡萨随法军转战欧亚非三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博卡萨已被晋升为上尉，并得到两枚法国荣誉勋章和战争十字勋章，成为获得这一法国最高荣誉的少有的非洲士兵之一。

23年的法国军旅生活，把博卡萨完全变成了一个法国人。尽管他血管里流的是非洲人的血，卷头发，黑皮肤，可他死心踏地为法国服务，自然得到法国政府的赏识，为他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在世界各地民族独立的大潮中，迫于各方面压力，法国政府不得不考虑让它的殖民地中非“独立”。为了扶植法国的代理人，法国政府让博卡萨回去组建中非共和国军队。戴高乐总统为此特地接见了博卡萨，对此博卡萨受宠若惊，称戴高乐为“我的爸爸”。

博卡萨告别巴黎，回到了贫穷落后的班吉，他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组建军队的工作。博卡萨知道，这不是为法国，不是为中非，而是为自己。有了军队，才能实现他的“远大抱负”，得到一切平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荣耀、威严与权力。

当时担任中非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戴维·达科是博卡萨的堂弟，他对博卡萨组建军队全力支持，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达科总统对这位堂兄是太信任了，以致失去应有的警惕。1963年，博卡萨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军阶晋升为陆军上校。虽然陆军总司令由总统兼任，但总统平时无暇过问军队的事，军权实际上掌握在博卡萨手里。

博卡萨锋芒毕露，到处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赫赫战功”，标榜自己有着非凡的勇敢和超人的毅力。到了1965年，他在法国的支持下，已经党羽遍布，羽毛丰满了。他开始公开抨击达科总统，制造舆论，积极筹划政变。

达科总统对博卡萨已有觉察。他授意宪兵司令伊扎莫，于元旦除夕之夜邀博卡萨赴宴，乘机干掉博卡萨，不料这一计划，已经被博卡萨收买的人探听到。博卡萨将计就计，派人设计生擒了伊扎莫。紧接着，博卡萨发动了推翻达科总统的军事政变。达科总统在逃往家乡的路上被政变士兵捉住。于是达科被迫写了辞呈交给博卡萨。

博卡萨上台后，为了赢得人心，摆出一副公正和重视荣誉的样子，今天在这里发表演说，明天到那里即席讲话，许诺满天飞，谎言遍地走，他拍着胸脯保证，今后人民每年只交一次税，政府也不再随意扣发每一个公民的工资。博卡萨花言巧语骗取人心，漂亮的话却无一兑现。实际发生的事是，博卡萨上台后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数额巨大，远远地超过了法国统治时期，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播下了日后博卡萨下台的种子。

博卡萨自任总统后，1972年他又自封为“终身总统”，两年后，又自授“元帅”军衔。从此博卡萨穿起了“拿破仑”式元帅服，戴上三角帽。他身为总统，通过接二连三和政府改组，又兼任了总理、国防和司法部长。稍后，他又担任了农业、畜牧和游览部长及社会事务部长。博卡萨大搞独裁，有权和有钱的部门都叫博卡萨占据了。

为了树立他的个人权威，博卡萨大搞个人迷信。他不惜花费巨款兴建博卡萨大道和博卡萨广场，到处竖立他的高大塑像。他命令工厂把他的头像印在布匹上，做成衣服，免费送给人们穿戴。

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博卡萨又大搞恐怖活动，在国内推广中世纪残酷的刑法。他签署的惩罚小偷的法令条款是：第一次抓到小偷要割掉一只耳朵；第二次要割掉另一只耳朵；第三次砍掉右手；第四次则处以死刑，当众枪决。仅1970年，他就下令割掉被关押在恩达拉格巴监狱的48名小偷的耳朵。

博卡萨还规定：凡是反对现政权，策动罢工闹事的首要分子，都要判处5—10年徒刑。他对付政敌的手段更加狠毒，他把人抓起来后不是活活饿死，就是让蚊虫叮死。所有这一切都秘密进行，何时何地被抓，关在哪个监狱，是死是活，被抓者的亲属一概不知。博卡萨公开宣称自己是“专制君主”，禁止提“民主和选举”。从1966年到1977年，博卡萨改组政府20多次，撤换总理4人、外长8人，失踪、绑架、被“莫须有”的罪名逮捕监禁者不计其数。他下令处决的部长级以上官员就有3人。

在博卡萨的暴政下，中非的监狱人满为患，刑场上尸骨成堆。在博卡萨的折腾下，到60年代末，中非这个本来就穷的国家，国库连政府最起码的行政开支都不能满足。进入70年代的时候，中非的预算赤字高达1亿多法国法郎，相当于全年预算的四分之一。到1975年，中非的经济已面临崩溃的边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博卡萨对自封的“终身总统”和“元帅”头衔并不过瘾，他心目中更向往的是皇帝的“威严”和“气派”，他整日在心中盘算的就是如何当上皇帝。

1976年初的一天，博卡萨终于演出了一场他冥思苦想多日的滑稽戏。

位于赤道线的中非，一月份依然烈日炎炎，温度在30度以上。博卡萨悄悄躲在首都班吉市郊的一个农庄里，好多天来，他断绝和政府官员们的一切

联系，也不接待任何来访的客人。博卡萨病了吗？还是出了什么事？政府官员们焦急万分。

这一天，政府全体成员斟酌再三。最后决定在总理的带领下一起去看望总统。但总统却不肯接见他们，全体政府官员更加惶惑了，总统连他们都不见，是不信任他们吗？还是总统又有改组政府的打算？有好多件国家大事要处理，不请示博卡萨，谁敢擅自作主？要是延误了，博卡萨发起脾气来，谁又吃得消呢？政府官员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一时没有了主意。就这样他们在烈日下站了几个小时，一个个浑身大汗，热得头晕脑胀。突然，卫队长走过来对他们说：“总统同意接见各位。”政府官员们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走进办公室，使他们差一点叫出声来的是，原来神气十足的胖子博卡萨，现在竟变成一个满脸胡子和双眼射着冷光的瘦老头。政府官员们一时不知所措，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幸好一位机灵的部长说：“老伯伯，您怎么啦？把您的心事告诉我们，您要我们办什么事，请尽管说，我们愿为您分忧，您要我们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愿为您献出生命博卡萨轻轻摆摆手，忧心忡忡地说：“不，不，你们帮不了我的忙！”到底博卡萨的心事是什么，政府官员越发感到神秘了，他们再三请求，博卡萨才把他的心事讲了出来，他说：“我想当皇帝。”

政府官员们一听，个个目瞪口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客厅里空气很沉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最后，还是总理大着胆子说：“您想当皇帝，这确实是个问题，外国将会怎么说呢？您是知道人们是怎样对待您的元帅和终身总统称号的。”

博卡萨连眼皮也不抬。丧气地说：“我早就知道你们谁也帮不了我的忙！”说完他突然抬起头来，眼神里显出自信和力量，似乎在告诉他们，做皇帝的事情已经定了，他胸有成竹，无需求助他人。

博卡萨演的这场滑稽戏，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他把自己关在庄园里多天不露面，主要是为了制造神秘感，进一步巩固权威。而对部下的拒绝接见，则是考验他们对他的忠诚。总理和部长们也清楚，若博卡萨真的当了皇帝，他将会毁掉中非，历史不仅将把博卡萨押上审判台，他们这些内阁成员，也必将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但是，慑于博卡萨的淫威，他们又不敢反对，只好支支吾吾地应付。与此相反的是，当有些年轻军官听说博卡萨要当皇帝时，他们秘密地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发誓要杀掉博卡萨，以挽救国家和民族。

1976年2月3日这一天，天气晴朗。博卡萨换上猎装，乘飞机前面往马梅坡去打猎。当他走进机场，突然一个名叫齐孔戈的军士长从二层楼上向他投出了两枚手榴弹。经过专门训练的贴身保镖眼疾手快，一掌将博卡萨推倒在地。“轰！轰！”两声爆炸，博卡萨的三名保镖两死一伤，他自己却安然无恙。

博卡萨爬起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朝他开枪的齐孔戈，子弹嗖嗖地从头上、身边飞过，遗憾的是没有伤着他。闻讯赶来的卫队包围了那座楼房，朝齐孔戈开枪，齐孔戈顽强地抵抗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才开枪自杀。

博卡萨大怒，下令抓了他认为是齐孔戈后台的8个高级官员，未经审讯就把他们枪决了，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奥布鲁上校。这次暗杀行动不仅未能阻止博卡萨的称帝，反而使他加快了称帝的步伐。博卡萨还利用这次行刺事件神化自己，说他之所以安然无恙，是上帝保佑他。他说：“处处有我，又处处无我；我什么也看不见，然而我什么都能看见；我什么也听不到，但我又

什么都听到。”博卡萨要人民把他看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灵，就是要让人民服服贴贴任其摆布和奴役罢了。

1976年12月14日，博卡萨终于当上了皇帝。

他在电台亲自宣布：“从今天起，中非共和国将改为中非帝国。我本人就是博卡萨一世皇帝。”顿时，班吉市骚动了。当1974年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被推翻之后，人们曾经以为，经受着革命和民主风暴洗礼的非洲大陆再也不会出现皇帝了，可是博卡萨使他的国家一下子倒退了173年。巴黎、伦敦、华盛顿被震惊了；观察家说，中非帝国是非洲大陆腹地的“怪胎”，而博卡萨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为，则像一头“蠢驴”。面对纷纷议论，博卡萨充耳不闻，仍忙于准备他的加冕典礼。

加冕典礼办得异常豪华和隆重。博卡萨拨巨款在班吉市郊，专门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华丽宏伟的皇宫，铺设了宽阔平坦的大道，包租了22架外国飞机、从世界各地运来物品。其中有红香槟22吨，最贵的法国波尔多名酒150吨，玫瑰花瓣200公斤，鲜花25000束，还订购了一个价值700万美元的金冠，和一个饰有展翅鹰的重达2吨的金宝座。黄色御袍上嵌有78万粒珍珠和近百万粒水晶珠，重达35公斤。另外有三颗罕见宝石，其中最大的一颗58克拉，它们分别装在皇帝皇后的皇冠上和皇后的笏上。还买了80辆世界上最昂贵的轿车，拉皇帝马车的八匹良种马也是进口的。还从法国订购了2000个鲜红色上等挂毯，又委托世界上一流时装设计师皮埃尔·卡丹设计了大量的礼服和鞋。请来了法国著名厨师准备加冕宴会。

加冕典礼耗资多达三千多万美元，占国家年度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上。

博卡萨对拿破仑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认为自己也和拿破仑的经历一样，从士兵当上皇帝，也有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妻子。他不自量力，决意把加冕典礼办得比173年前拿破仑的加冕典礼还要隆重。

1977年12月4日上午10时许，博卡萨和皇后乘御辇缓缓前往加冕宫。浩浩荡荡的仪仗队由乐队作前导，然后是一个中队戴绿盔白羽毛，穿绿色军上衣、白裤的长枪骑兵，其后是一些手拿明晃晃马刀的侍从；一个中队长枪骑兵断后。典礼10点35分正式开始，鸣礼炮101响，高奏中非国歌，然后，博卡萨将一把镶有钻石的宝剑放在右前方，手按宪法。宣读誓词。接着，他披上皇袍，亲自把皇冠戴在自己的头上，再将另一顶皇冠给身披皇衣、单膝脆地的中非皇后卡特琳戴上。这时，欢呼声震天动地，博卡萨高举宝剑，当众宣布他为终身皇帝——中非帝国博卡萨一世：为了使博卡萨王朝“世代相传，久盛不衰”，博卡萨加冕后，立即立他的小儿子让·诺贝尔·博卡萨为他的继承人。这位太子刚满两周岁。

博卡萨做了皇帝后，还规定了一套帝国礼仪。如，任何人遇见皇帝，“在相距六步远的地方俯首致敬”；在回答皇帝问话时，必须说：“是，皇帝陛下。”在谒见皇帝时，必须穿大礼服和戴白手套。

博卡萨当了皇帝，更加暴虐无度，挥金如土，中非是联合国列为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他完全忘记他上台当总统时的庄严许诺，把中非看作自己的庄园，把国库当作自己的钱柜，巧取豪夺，搜括民财。加冕礼毕，他下令全国职工拿出工资的10%作为“献礼”，停发大学生的助学金，向农民预征三年税收，宣布中非帝国凡年满十八周岁的臣民，都是执政党党员，每人都要缴纳党费，凡缴不起的人，必须服六个月的劳役以资抵销。他甚至把外来的贷款援助也大笔大笔地塞进自己的腰包。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存入法国和瑞士

的银行里，在国外购置好几处庄园和别墅，据估计，博卡萨的私人钱财不下10亿美元。

1979年1月18日的这一天，班吉的大中小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原因是博卡萨强令学生一律穿上印有“中非帝国”字样的皇冠图案的学生服上学，这些服装是由皇后的工厂生产的，每套售价5000非洲法郎，相当于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工资。博卡萨规定，不穿这种学生服的学生一律不得入校。而在此之前，全国职工已数月未领到工资了。学生们忍无可忍，提出“发给我们父母工资，我们就买校服。”他们强烈抗议皇室的腐败行径，第一次喊出“打倒帝国”、“处死皇帝”的口号。

博卡萨恼羞成怒，下令军队对学生进行镇压。一时间，班吉街头枪声四起，哭声震天，学生们在街上或家里被捕，谁稍表现不满，士兵就在孩子的太阳穴上打一枪。死的人用袋子装起来集体掩埋，家长连尸体也找不到。

4月，义愤填膺的学生再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结果又遭到博卡萨残酷镇压。

博卡萨亲自来到关满学生的恩加拉格巴监狱，他身穿军服，手握从不离身的金象柄权杖，向学生们咆哮着喊叫：“你们说‘处死皇帝’，今天我要叫你们知道，是你们该死了！”

被囚的学生们临死不屈，高呼口号，博卡萨气得脸上的肌肉都在抖动，他把权杖一挥，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射击！”一阵枪响，学生们倒在血泊之中。

从1月到4月，大约有150多名学生丧命，其中最小的只有15岁。被打死的人要么扔进动物园喂鳄鱼、狮子、老虎，要么就存放在宫廷后院几个两米高的冰箱里冷冻起来。博卡萨亲手打死过犯人，还把辣椒粉撒入犯人眼睛里，甚至让犯人和猛虎，饿狮“比赛”，观赏野兽如何扑咬。吞噬活人，博卡萨以此为乐。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蛮罪行是，这个暴君竟然吃人肉！博卡萨的厨师后来证实，在科隆戈皇宫，博卡萨曾命令他做烤全羊式的“烤全人”，供他夜间食用。他不仅自己吃人肉，还让厨师把人肉做成“美味佳肴”来招待外宾。

博卡萨的残酷统治和无情镇压，激起中非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国内外的人都把博卡萨看成是个可憎可恶的人。人民愤怒的呼声像潮水一般扑向博卡萨，谴责和揭露博卡萨王朝罪恶统治的声明和传单雪片般飞进科隆戈皇宫，一股股强大的反皇力量从四面八方汇合在一起，猛烈冲击着中非帝国的根基。

博卡萨统治中非14年，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这些罪行，终于被一个国际组织一桩一件地在报端披露，并经非洲五国法官调查委员予以证实，世界舆论为之大哗！这时，法国已感到继续支持这位臭名昭著的暴君不符合法国的利益，于是先后中断了对中非帝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在频频劝告博卡萨“体面”下台的同时，加紧物色新的代理人。

1979年9月20日，正当博卡萨在利比亚访问时，前总统达科在法国人的支持下，重新夺取了政权。由于博卡萨丧尽人心，当达科在中非电视台庄严宣布：“博卡萨一世已被推翻，中非帝国已不复存在，中非恢复为共和国”时，军队、警察、公职人员和人民群众都表示拥护，甚至连博卡萨苦心经营的皇帝卫队都没有抵抗就缴械投降了。整个政变计划实施得很顺利，几乎没流一滴血。

昔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皇帝博卡萨，如今成了丧家之犬。几小时前还被利比亚尊为“贵宾”的博卡萨，现在接到了“逐客令”。他想从利比亚去瑞士，瑞士当局不许他的飞机降落。他想在法国居住，而法国政府不许他下飞机。他想去的其他地方都表示“不欢迎”。在偌大的世界上，这位腰缠万贯的“皇帝”竟找不到一个避难所，最后，博卡萨苦苦哀求，西非的科特迪瓦总统念及旧交情，总算收留了他。

9月23日，重新上台的达科总统，发出拘捕博卡萨的国际通缉令；9月24日，达科向科特迪瓦发出了引渡博卡萨的要求，但这一要求遭到科特迪瓦当局的拒绝。

中非法院1980年12月19日缺席判决博卡萨死刑。

博卡萨住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的日子里，开始隐姓埋名，极少外出，但他内心念念不忘复辟美梦。他认为他的下台是法国总统德斯坦一手造成的，当他得知德斯坦在大选中失败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了。他甚至致函法国新总统密特朗，请求他帮助他返回中非。

博卡萨的种种行为，违背了他当初避难科特迪瓦的保证：今后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发怒的博瓦尼总统下令将博卡萨驱逐出境。经过多次周折，博卡萨于1982年从科特迪瓦流亡法国，定居在巴黎以西约40公里处的一座别墅里。法国政府派警察和密探“保护”着他，他的一切活动都得听从法国的安排。但是，博卡萨依然不死心。这时中非的达科总统下台了，科林巴将军当上了新总统。博卡萨认为时机已到，他对人吐露心事说：“现在没有人反对我回去主宰我国命运了。”

经过周密策划，博卡萨在四年之后，即1986年10月22日，终于神秘地出现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机场，于是发生了这个故事开头所叙述的场景……

也许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博卡萨现在被囚禁的恩达拉格巴监狱，就是当年他血腥统治的年代里，由他下令屠杀人民的地方。中非人说，在那些岁月里，每当谈起恩达拉格巴监狱，人们都不寒而栗。历史往往嘲弄那些政治疯子，想不到杀人魔王博卡萨自己成了阶下囚，也关进了这里。

“班吉屠夫”博卡萨终于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

1986年12月15日，中非刑事法院开庭对博卡萨进行审讯。刑事法庭设在班吉法院的大厅内。这一天，班吉市内的气氛格外紧张。法院周围，身穿迷彩服、荷枪实弹的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法庭内维持秩序的军人比听众还多。旁听的群众约有300人左右。

上午8时左右，一辆囚车开了进来，博卡萨由两名士兵押着，走进庄严的神圣法庭，在大厅正中的被告席上一条长木凳上坐下。居高临下的审判席上，坐着正、副审判长。博卡萨身穿笔挺的海军蓝制服，极力做出轻松的样子，面带微笑。新闻记者们的闪光灯亮个不停。博卡萨身边一左一右站着两名军人，一人手拿步话机，挽着手铐和铁链；另一个手提电击棍，腰挎手枪，博卡萨不由打了个哆嗦。

先由“中非博卡萨罪行调查委员会”宣读起诉书。它陈述博卡萨犯有暗杀、谋杀、侵吞国家财产、吃人肉、使用酷刑，杀害儿童、堕落腐化等14条罪状。这天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前财政部长邦扎的妻子，她控诉博卡萨1969年杀害了她的丈夫和亲人。她泣不成声地说，她丈夫是被人用头上钉钉子的酷刑处死的。别的证人也提供了不少细节。

16日，法庭继续开庭，诉讼指控博卡萨1974年秘密杀害了公共工程部部长和高级军官邦戈少校。邦戈的妹妹作证说，她曾跪在博卡萨面前，恳求免他哥哥一死，但博卡萨铁石心肠，仍然将她的哥哥杀害。

18日，法庭主要审理了博卡萨杀害少年儿童及中小学生的案件。在连续三天审讯中，博卡萨对上述重大案件，开始都是矢口否认，百般开脱自己，嫁祸他人，最后才略有认罪表示。

在审讯中，博卡萨的情绪一次比一次低落。第一天他还神气十足，又是回答记者问题，又是叫记者照相。第二天他进法院时就低下了头，不愿和记者讲话。在审讯过程中，他不断做出丧失理智的冲动，而且在答辩过程中常出现语无伦次的情况。第三次审讯时，他明显地表现出失望情绪。第四次审讯时，他弓着腰，无精打采，走进法庭时差点跌倒。

历经8个月85次开庭审讯，中非刑事法院于1987年6月6日对博卡萨进行最终审判，正式宣布博卡萨犯有杀人。同谋杀人和侵吞国家财产等罪行，依法判处死刑，罚款600万非洲法郎，没收他总值达31.43亿非洲法郎的私人财产，并终身剥夺公民权。

这时，这位烜赫一世，无法无天的皇帝才彻底绝望，感到末日的来临。他眼前发黑，周身发软，险些栽倒在法庭上。行刑的士兵将他架出大厅，押上囚车……

博卡萨末日终于来临了。中非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

博卡萨并没有处死，在坐了7年牢后，被特赦出狱。他表示要回家乡当一名牧师，以赎回以前的罪孽，此公会不会“立地成佛”呢？人们拭目以待。

（贺兰）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就像有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6公里处的地壳中猛烈爆炸！

唐山上空电闪雷鸣，狂风呼啸，这座百万人口城市在顷刻间夷为平地；据统计，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是迄今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整个华北大地都受到了这次大地震的影响。天津市一片房倒屋塌，正在该市访问的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从睡梦中惊醒，他所住的宾馆墙壁出现可怖的裂缝。北京市摇晃不止，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颤动，天安门城楼上的粗大梁柱发出仿佛要断裂的嘎嘎声。甚至北至哈尔滨。南至安徽蚌埠、西至宁夏吴忠的广大地区的居民，也都感到了异乎寻常的摇撼。

美国、日本、瑞典、香港、台北等数十家地震台、天文台都测到了唐山大地震，并且纷纷公布了这一消息，然而，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场浩劫竟是史无前例的！

地震发生之前，大自然曾发出警告。

7月20日前后，唐山地区水库、池塘中的鱼纷纷浮上水面，成群跳跃，有的鱼尾巴朝上头朝下倒立在水面上，像陀螺一样飞快地打转；唐山附近海面上，海蜇突然增多，成群的小鱼急促地游来游去，梭鱼、鲶鱼、鲈板鱼纷纷上浮，极易捕捉。

成群的蜻蜓、蝴蝶、蝗虫、蝉、蝼蛄，麻雀飞聚在海岸边的油轮上，凭人捕捉驱赶，一只也不飞起。天津市郊接连几天看见成百上千只蝙蝠，大白天在空中乱飞。

7月27日，唐山郊区的农民看见成群的老鼠仓皇逃窜。还有人看见一百多只黄鼠狼哀嚎乱跑。

海边的渔民们注意到，海水涨高了，变黄了。唐山市郊的农民们发现，有的井中水柱腾涌，还有的池塘又突然变干枯了。

7月27日深夜，北京和唐山的不少人家中，关闭了的日光灯依然奇怪地亮着。一些人家驯养的狗、猫，甚至还有鸭子，努力把主人拉出房屋。养鸡场的鸡怪叫惊飞，养貂场的貂惊恐万状，骡马挣脱缰绳逃出马厩，鸽子飞上天空不肯降落……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大自然的种种警告，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不能被及时收集整理，并据以做出地震将临的判断。人们迷迷糊糊地错过了挽救自己的时机。

短短的几秒钟，地震毁灭了唐山市。

在地震地裂缝穿过的地方，唐山东东街小学、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以及整个路南居民区，仿佛被一双巨手抹去似的不见了。唐山市在大自然的魔力作用下，面目全非；街巷被踏平了，桥梁被掐断了，铁轨被扭曲了，到处都是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梁柱，冰冷的机器残骸，倾斜的电线杆，悬在半空中的楼板，到处都是死尸。据估计，唐山大地震中可计算的直接损失达30亿元以上！

唐山人民从强震中苏醒，立刻开始了自救工作。

凌晨4点10分，也就是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一辆红色救护车吼叫着

从开滦唐山煤矿驶出。这是地震后，唐山第一辆复活的车，它冒着余震的颠簸摇晃，努力向前开去。车上坐的是唐山矿前工会副主席李玉林、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司机崔志亮和袁庆武，他们从废墟中钻出来后，首先想到的是去向矿党委报告；然而，矿务局党委和唐山市委机关已是一片瓦砾！

李玉林在震惊中，只有一个念头：“上车！去找电话……”红色救护车开到街道上，可街边的建筑全成了废墟。废墟中传来阵阵的呼救声，有人挥手拦车要求运送伤员。李玉林狠狠心说：“不能停！打电话要紧！”在市郊，救护车被伤员拦住了，要他们转头把伤员送往唐山医院。曹国成告诉他们：“唐山全平了，哪有医院呀！你们快组织自救吧。”李玉林向伤员们解释说：“这是报信的车！上级早一分钟知道，要多救活许多人呀！”

伤员们让出了道路。救护车从染血的路上通过，一直冲到玉田县委。玉田县委大院也成了一片废墟，县委书记背着手在团团打转。哪里还有什么电话！

红色救护车继续沿着公路奔驰，一路上连一个可打电话的地方都找不到。在蓟县，他们碰上了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的几个同志。听说震中在唐山，地震地质大队的人请袁庆武领他们去唐山，他们派了一个人跟李玉林继续去报信。救护车到了通县，李玉林向一个工厂借电话挂北京长途，工厂门卫说：“还挂什么电话？有等长途的功夫，车都开到北京了！”

李玉林才发现，救护车已经开到北京城外了。红色救护车拉响警报器，风驰电掣冲进北京建国门，直向国务院所在地驶去。国务院接待站的解放军首长同国务院领导通过电话，正让李玉林他们登记，唐山机场乘飞机来的两位空军也到了。他们一起被领进了中南海。

当时，中央政治局关于大地震的紧急会议刚结束，震中已初步确定，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和煤炭部长肖寒奉命立即乘飞机赴唐山。李先念、陈锡联等几位副总理，和北京市委书记莫德，详细地询问了唐山遭地震损毁的情况，并决定调解放军前往唐山救灾。紧接着，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医疗队赶赴唐山……

7月28日，通往唐山的一条条公路上，烟尘弥漫，马达轰鸣，人民解放军十万救灾部队，急如星火地向地震灾区开进。摇晃着天线的电台车，不时向部队发出联络信号。飘着红十字旗的卫生车上，各医疗队正在紧急部署抢救工作，无数辆满载士兵的解放牌卡车，在低洼不平的公路上连成了一条条长龙。战士们面临的就是一场战争：一场自然和人的恶战！

与此同时，灾难中的唐山人民已开始积极地自救。每一个废墟瓦砾中挣扎出来的人，立刻从瓦砾废墟中扒出其它的人：亲人、同事、邻居……一个人的生存往往决定了周围几十个人的命运，而这几十人又救出了更多的人！地震后幸存的唐山人，十有八九是这样活下来的。伤员在本地无法救治，一辆辆被砸得不像样子的汽车，摇摇晃晃地开出唐山，将伤员向外运送。它不时停住，抬下一具具刚刚咽气的伤员尸体；又不时被人拦住，抬上一个早已守候在路边的生命垂危的伤员。

有一辆卡车满载着伤员驶往玉田县，一路上，车子行驶得十分艰难，方向盘好像不灵，车轮时而歪向左边，时而歪向右边。终于，车开到了玉田县，伤员一个个被抬下车去。有人招呼驾驶员下车休息，可是喊了半天没人答应。人们打开驾驶室的门，一个个惊呆了，原来这位司机也是重伤员：他头部被砸伤，腹部裂开，肠子都流了出来，左手又骨折，当人们想把他扶下来时，

发现他伏在方向盘上已死去，驾驶室里满是血……

7月28日上午，唐山市委在一辆破公共汽车上成立了救灾指挥部。当晚，河北省委和北京军区的救灾指挥部也在唐山机场开始了工作。救灾工作逐渐有了统一调度。水、电、通讯、交通……一项一项得到了解决。

然而，首当其冲的还是救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个医疗队，一万多名医护人员，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撒开，28日下午，在天津汉沽已出现收治唐山伤员的手术帐篷。当晚，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也已在唐山机场搭起了三个手术台。这是唐山地震后最早的手术室，所进行的也是最艰难的手术。大量的清创缝合，大量的截肢，甚至还有开颅……一切都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医生几乎是踩在血泊中抢救伤员的。他们脚下的解放鞋被鲜血染红浸透。仅有的一双手术手套，做完一个伤员的手术后，用自来水冲一冲又给下一个伤员做。没有电，医生们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一个个急需输血的伤员就死在手术台上。截肢截下的胳膊大腿，填满了手术棚外的一个大坑。

7月30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十一个省市转运。到8月25日止，共有159列火车、470架飞机，将十多万名伤员分别运往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和上海。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唐山机场，承担了极为繁忙的飞行任务，密度最大的时刻，仅间隔26秒就有一架飞机起落。他们为危急中的唐山人民铺平了一条救死扶伤的道路，也铺平了一条向唐山源源不断输送救灾物资的道路。而参加运输的汽车则达到了两万多辆！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救灾人员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抢救那些被压在废墟中的幸存者。这个压倒一切的重任，落到了数万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肩上。7月28日中午12时，某部一营率先赶到唐山市新华旅馆的废墟前。战士们都惊呆了，谁见过这么惨的情景啊：满地死尸，脑浆、血流……几个年轻战士呜呜地哭了起来。教导员李福华急得大叫：“哭什么！快救活人呐！”但他自己的声音也在发抖。然而，他们出发时想得太简单，只带了几把铁锹来，面对着钢筋水泥和沉重的楼板，战士们虽竭尽全力，但收获甚微。到处听得见呻吟，到处听得见呼救，可是楼群的残骸像山一样压着无数一息尚存的生命。战士们咬紧牙关，用手扒开坚硬沉重的瓦砾废墟。当天下午，全营三分之二的战士的手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就这样，到第二天中午，他们救出了50多个人！到唐山后的三天里，全营没吃饭，没喝水，没合眼。从营房送来的饭，都在半路上给了灾民和伤员。那几天，人的精力、体力真是惊人，战士们赤着膊，只穿条短裤，蹭得浑身是伤，但不晓得疼，只知道扒呀！扒呀！

这支同大自然灾害搏斗的军队，实际上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的军队。战士们的心像成天被刀戳着。有的地方，清清楚楚可以看见废墟下的活人，可是没有工具，没法救出。里面的人在受折磨，外面的人也在受折磨！战士们千方百计给压在废墟下的伤员送水送食物，用嘶哑的嗓音一遍遍喊话，让那些幸存者坚持、顶住！

7月28日上午，几乎没有人怀疑，在灾难中境况最惨的，是开滦煤矿的万名井下工人。地震一开始，他们就被无情地留在大地深处了。从废墟中钻出来的矿工家属们，顾不得擦去身上的血迹，便哭喊着亲人的名字，向矿井口奔去……煤矿的地面建筑几乎全部倒塌了，地下的情况可想而知！然而谁

也没有料到，矿井下的设备，竟基本上没有遭到毁坏！被隔离在地下的万名职工，正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返回地面。

在唐山矿，900米深井下的1600名职工，由三个采煤区的负责人带领着，从一条可以通向地面的狭窄、倾斜的小道，艰难地移动上攀。数千米的延伸线上，一盏盏矿灯组成了一串闪耀的光斑。人们仿佛是从深深的海底，向陆地前进，空气缺乏使人眩晕无力。终于，地面救险人员送进的自然风，吹到了他们的脸上！这使他们增添了力量，也增添了生存的希望！

在吕家煤扩，六百多名职工，包括几十名妇女，从陡峭狭窄的备用竖井，攀登了上百米高的金属梯子，在极其危险的姿态下，缓缓地攀到了地面。

在范各庄矿，几十名矿工被困在520米深的井下。组织营救的郭振兴同志，坐在一条保险梯上，让人缓缓地将他放下竖井。当无数矿工奋力向地面攀登时，只有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却在向地层深处前进！他在漆黑的竖井中整整摸索了三个小时，每一分钟都面临着死神的威胁。但他终于找到了井下的矿工，让大家沿着保险梯回到地面！

最惊险的生死搏斗发生在赵各庄矿，陈树海、毛东俭等五位矿工，被困在千米深的地层之下。没有电，没有水，更没有出路。号称“活地图”的陈树海，带领着他们，打通了一条又一条艰难的通道，一寸一寸地向地面移动。他们在地下居然坚持了整整十五天！渴了，喝自己的尿，喝渗出的地下水，还坚持向上攀。最后三天，他们谁都没有力气行动了，挤在一节运煤的车厢里，互相紧紧地拥抱着，用自己的微弱的热量温暖着别人。他们终于等到了下井营救的人！

唐山大地震，留下了三千多名孤儿。他们的父母被夺去了生命，却留下了这些稚嫩的幼苗。

7月29日，唐山市委副书记张乾在一个防震棚里，把寻找和安置全市孤儿的任务，交给了女干部王庆珍。副书记严肃地说：“那些孤儿，一个也不许饿死，一个也不许病死！”

从那时起，王庆珍就坐着一辆破吉普车到处跑，东一个、西一个地把孤儿们“收”回来。当时，多数孤儿是被父母单位、邻居、医疗队和救灾的部队收养着的。执行任务的军车上，常常能看见驾驶室里坐着个孩子，裹着大军装，捧着小苹果。有的解放军连队平均三个战士带一个孩子。但也有人在抢孩子，全国各地许多没孩子的父母，都在托救灾人员到唐山抱孤儿回来收养。运输部门有时也会把孤儿带往天津、北京、承德。有一次，河北遵化县来了一支车队，一下子就带走了二十多个孤儿。

找到了孩子，还要为他们找吃找穿……

这些没有了爸爸妈妈的孩子，在地震后一下子懂得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有一家父母双亡，留下了四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解放军收养了他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把改小了的军装给他们穿，还在高坡上为他们盖了一间简易房。孩子们嘀嘀咕咕商量，想做点什么来报答解放军叔叔。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啊！结果他们想到了家里的五只小鸡，那是他们姐弟五人用小手从废墟中扒出来的没死的小鸡。心爱的小鸡成天叽叽叫着不离开他们的脚边。大姐说：“解放军叔叔扒人、盖房那么辛苦，咱们熬一锅鸡汤给他们送去吧！”弟弟妹妹都赞成。于是，他们真的把那五只小鸡杀了，熬成了鸡汤。战士们接过那只用布包着的小锅，看着那五只小小的鸡雏，一个个淌下了热泪……

可是，唐山当时的情况仍然很混乱，教育系统、学校和幼儿园损失很大，

没有力量管这么多孩子，又有瘟疫流行的危险。孩子们在大地震中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决不能再让他们有个三长两短！因此河北省委决定，把孩子送往外地抚养。

出发的那天早晨，孩子们从各处聚集到了车站广场。所有的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衣服，胸前挂着写明姓名、年龄、籍贯的白布条，广场上一片蓝色，四处是尖细的叽喳声。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只饱鼓鼓的新书包，里面装着收养单位送的水果、点心、日用品。

有一个六岁的小哥哥搀着四岁的小妹妹……

有一个五岁的小姐姐吃力地抱着小弟弟……

许许多多唐山人到广场上为唐山的孤儿送行。一个戴矿工帽的小伙子，为他已故师傅的小女儿在梳辫子，他的手颤抖着，不小心带下了头发……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大娘，深情地望着孩子，喃喃自言自语：“出远门喽，出远门喽……”

地震，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据统计，全球每年发生可记录的地震在五百万次以上，其中人类能够感觉到的达五万次，造成破坏的地震约一千次，而七级以上、足以造成惨重破坏的强震，平均每年要发生十多次！

更可怕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地震破坏的惨重程度也在剧增。有人说，人类面临的两个大难题，就是癌症和地震。现在，治疗癌症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攻克癌症已充满希望；可是对于地震，人们了解得还太少太少！

人类认识地震，也像认识其它种种大自然之谜一样，经历了漫长的曲折道路，付出了大量的血的代价。今天，中国的地震学家，外国的地震学家，都有过成功预报地震的经验。总有一天，人类不但能预报地震，而且将有效地疏导和化解地震！

总有一天，人类将战胜这个置人于生死存亡危机线上的地震恶魔！

（薛小勇）

伊朗门事件

1985年2月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一个绝密情报：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健康状况不佳，有可能活不多久了。目前伊朗形势非常糟糕，一旦霍梅尼去世，这个国家将会出现四分五裂局面。苏联已经开始插手伊朗，派了大批克格勃特务潜入，如果美国不立即采取行动，伊朗便有可能被苏联操纵。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伊朗是中东一个石油蕴藏量丰富的国家，同苏联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伊朗原教旨主义对邻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苏联信奉伊斯兰教的各加盟共和国都有潜在的影响。因此，美国在权衡自己在这地区利益时，一向很重视伊朗的地位。当原先的伊朗国王巴列维在位时，与美国的关系是很好的，同时也得到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1979年，宗教领袖霍梅尼发动的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的统治，美国自然是支持巴列维的，因此在宗教革命者的眼里，美国人被视为“大撒旦”，也就是魔鬼的意思。

巴列维国王的垮台，使美国在这一地区失去了一位可靠的盟友，他们的情报收集网也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不言而喻，这个情报网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美国在中东的一位好友以色列也非常关注伊朗局势的变化，以色列与伊朗关系不算太坏，与伊朗的敌人伊拉克关系却非常紧张。美国人要想插手伊朗，以色列倒是一个有用的角色。

中央情报局中东处将这个情报呈交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法兰，麦克法兰又将这一情况汇报给里根总统。总统表示，密切注视伊朗动向，随时准备积极介入。

果然，不久之后，一些位居要职的美国权威人士得到一个重要信息，有一批伊朗高级官员表示愿意与美国改善关系，他们甚至已经掌握了这些官员的名单。这使美国政府人士大为惊喜。有情报证明，这批伊朗高级官员是属于“温和派”的，他们认为苏联才是伊朗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希望与美国进行广泛的军事和情报合作，也希望美国人能像在巴列维时代一样给他们提供武器。他们的回报则是协助美国向阿富汗反政府军提供补给，并努力帮助当时被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获释。

机会来了！美国人人为此兴奋不已，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伊朗政府布置的一个圈套！

当时伊朗正和邻国伊拉克打仗。为了击败主要敌人伊拉克，伊朗急需大量的武器和零部件，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只有美国。然而，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却不能当着全世界的面向“魔鬼”求援，因此布置了这么一个圈套，诱使美国佬主动将武器送上门来。他们认为，美国人对伊朗内部政治了解甚少，绝不会识破这一计划周密的骗局。

伊朗人采取这一行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击伊拉克的支持者苏联。

霍梅尼一直担心苏联人会暗中破坏他的政权。两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他们掌握的有关苏联克格勃在伊朗间谍网的情报秘密交给霍梅尼政权，导致将近200名苏联克格勃特务遭处决，伊朗共产党（人民党）也被解散。这对苏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苏联在德黑兰的间谍并没有被斩草除根。其后，克格勃再次将一批特务派入伊朗，特别是潜入了伊朗空军。美国和伊朗的官员都相信，如果霍梅尼垮台，苏联可能会进行夺权。霍梅尼希望诱使美国提

供武器后，可以促使克格勃间谍现身，把苏联间谍网一举消灭。

不久前，在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北丘陵地区贾马兰一座戒备森严的豪华寓所里，举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重要会议。会议是由霍梅尼亲自召集的，参加者包括议长拉夫桑贾尼（兼伊朗作战委员会主席）、总理侯赛因·穆萨维、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长穆赫辛·拉菲克·杜斯特、保安部门负责人穆罕默迪·雷沙里以及外交部长韦拉亚提。另外，还有霍梅尼的儿子艾哈迈德·霍梅尼。

经过周密的计划，伊朗政府决定派穆罕默德·卡鲁比来执行这一计划。他是个出色的国会议员，由于他弟弟迈赫迪·卡鲁比同劫持环球航空公司 847 号班机有牵连，并参与了 1983 年阴谋占领麦加的计划，他与伊朗恐怖组织建立了联系。霍梅尼认为，可以让卡鲁比出国去会见外国使节以吸引美国人，称他是“摆在陷阱里的一块干酪”。

1985 年初，尽管霍梅尼的健康确实不佳，但在贾马兰村议定的计划仍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开始逐渐实施。不久之后，美国、以色列，甚至苏联都被诱入了伊朗的这一陷阱之中。

在贾马兰会议后不久，1985 年 2 月中旬，伊朗总理穆萨维邀请一名叫戈尔巴尼法尔的伊朗军火商到德黑兰会谈。当穆萨维透露想购买 25 亿美元的军火时，这个大军火商立刻兴致勃勃地表示，他的好友哈舒吉也是大军火商，同国外有广泛的联系，他认为这笔买卖可能引起以色列和美国的兴趣。

此后，戈尔巴尼法尔在西德与哈舒吉进行了秘密会谈，制定了行动计划，并于 1985 年 7 月 1 日将一份表达他们意图的备忘录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的办公桌上。

1985 年 7 月 8 日，这两个大军火商又在汉堡的四季饭店召开了一次特别聚会。参加聚会的有以色列和伊朗的代表。以色列方面有当时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基姆希、军火商施维默尔和尼姆罗迪。伊朗方面有戈尔巴尼法尔和卡鲁比，卡鲁比是以这场骗局主角的身份参加会谈的。

在会谈中，卡鲁比滔滔不绝地陈述了他对霍梅尼死后的伊朗局势的预测。他分析说，伊朗有三个派系，彼此互相争斗。第一派系是激进集团，主张与苏联建立关系，它由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和总理穆萨维领导。第二派系是由议长拉夫桑贾尼领导，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国内政策，但又认为伊朗不应与西方断绝关系。第三派系是温和派，他们认为伊朗最危险的敌人是苏联。说到这里，卡鲁比从他的长袍中取出一份名单，上面列有第三派五十位宗教与军事领袖的名字。名单全文共有 30 页，内容还涉及许多伊朗政界人物各种关系的“原始材料”。后经美国中央情报局中东处进行分析，结果认为情况属实。

卡鲁比还透露了伊朗在欧洲和中东的恐怖活动网，这使与会者对他的信任更加强了。最后，他还提出了对伊朗前途的看法，并暗示他就是伊朗第三派的人。他警告说，一旦霍梅尼去世，伊朗将会出现“政界人士、神职人员和军事将领各自为政的局面”，如果斗争不能迅速地解决，伊朗将会四分五裂。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如果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帮助解除苏联的威胁，伊朗将会成为第二个黎巴嫩。在会议结束 24 小时后，有关这次会谈的内容概要便由一位以色列人提供给了华盛顿。

计划进展之顺利简直令伊朗人吃惊。在汉堡会谈几天之后，以色列就接到美国“畅行无阻”的通知，表示可以继续和伊朗人谈判。于是，伊朗、美

国和以色列代表开始了正式会谈。

美国发出安全通行令数周之后，里根为了表示善意，批准了由以色列运交伊朗的第一批武器。1985年8月最后一周的一天，戈尔巴尼法尔把100枚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运到伊朗的大不里士。这位军火商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乘坐穆萨维的“猎鹰”式喷气机返回到德黑兰，很快便受到霍梅尼的盛情款待。

8月底，这位大军火商又与伊朗领导层权力最大的两个人——伊斯兰议会议长拉夫桑贾尼和总理助理穆萨维接触，在场的还有总理助理穆罕默德·坎加卢和霍梅尼的儿子艾哈迈德·霍梅尼。戈尔巴尼法尔提出一项可以从以色列和美国获取武器的计划。但四位领导人都不要轻易答应，因为他们不知道霍梅尼是否会同意他们直接与“大撒旦”和他所憎恨的以色列打交道。必须要请示霍梅尼。

戈尔巴尼法尔等在霍梅尼居室的门外，那四位领导人装出胆战心惊的样子去见霍梅尼。等了不一会儿，拉夫桑贾尼等人情绪高涨地出来了，他们说，霍梅尼同意了这项计划。

其实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戈尔巴尼法尔十分兴奋，他认为自己说服了霍梅尼向“大撒旦”购买武器。因此，当他离开那里时，耳边仿佛还萦绕着一片赞扬声。

正如一些伊朗人所说的，如果戈尔巴尼法尔是受骗了的话，他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的是，他不是唯一的受骗人。当他1985年8月初准备访问德黑兰的时候，美国一些高级官员也正在迫不及待地利用“伊朗良机”。当时已辞去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戴维向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法兰说了有关这三次会谈的情况：在会谈中“伊朗人说伊朗的局势现已一团糟，出现新政府已在所难免”。他表示，伊朗人“仍然亲美”，“想同美国对话”，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伊朗人想要的只是武器和金钱。

由于麦克法兰等人过分地相信戈尔巴尼法尔，过分地相信了从以色列那里得到的假情报，因此，他们轻易地上了伊朗人的当。直到1985年秋天，美国有关方面还在试图同伊朗讨论彼此的战略问题。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这一系列活动根本不会有丝毫收获，因为85岁高龄的霍梅尼丝毫没有死亡的迹象。

同样，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也因为相信霍梅尼将不久于人世而上了大当。苏联克格勃驻德黑兰情报站长，同时也是伊朗情报部门的副首脑扎马尼告诉苏联人说，霍梅尼的健康状况很不好，并将伊朗通过中间人美国获得武器的情报透露给苏联人。这样一来，克格勃分子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在适当的机会采取适当的行动”。伊朗人设的大圈套中又多了一只猎物。

1983年5月25日，麦克法兰亲自前往德黑兰，希望直接与伊朗高级领导人进行正面谈判。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伊朗方面对麦克法兰一行给予了极为冷淡和低级的接待，而且在整个谈判期间，不但像拉夫桑贾尼这样的高级领导人没有出面，甚至连一位部长级的领导人都没有出场。虽然麦克法兰一再暗示，如果美伊双方能够“交换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动向和实力的情报”，则彼此都会得益，但伊朗人却始终不做出积极的表示。他们甚至抱怨麦克法兰没有按照约定带来足够的武器零件以及操作雷达所需要的重要部件。

在美国人上当的同时，苏联人也没交上好运。当麦克法兰等人在德黑兰秘密地与伊朗人谈判时，在离他们下榻的三公里处，示威者在扎马尼、哈希米以及其他亲苏领导人和克格勃的鼓动下，正在德黑兰大学附近集结，准备

对麦克法兰等人进行突然袭击。如果他们的示威计划得逞，果真将麦克法兰等人扣押起来，那就将严重削弱霍梅尼政权，进而导致霍梅尼政权的部分官员下台。

示威群众从一栋戒备森严的十层大楼出发，这栋大楼是自称为伊玛姆路线追随者组织的总部。这个组织实际上是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前线组织，其成员曾在 1979 年协助攻击过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示威群众”本以为霍梅尼已不能管事，企图借机瓦解霍梅尼政权。但他们，包括精明狡猾的克格勃特务们在内部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正与美国人一起被摆在了霍梅尼骗局的棋盘上。

就在麦克法兰一行准备离开德黑兰的前几个小时，约 400 多名示威者沿着查姆兰烈士大道向美国人下榻的饭店进发。示威者在离饭店约 1.5 公里处遭到革命卫队的阻拦。他们被赶到德黑兰大学门前的一片草地上，接着被一一扣押起来。随后，又有 58 名幕后操纵的克格勃特务被逮捕。

骗局的结果令伊朗人很满意，麦克法兰等人两手空空离开了德黑兰，从而也结束了这场又赔武器又赔人质的丑恶交易。他本人此后也成了“伊朗门”事件审判的主要罪犯。

苏联人在伊朗人的诱骗下，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把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谍报网拱手交了出来。

到 1985 年底，美国不再强调战略利益问题了，里根总统比过去更加关注起黎巴嫩的人质问题。实质上，整个谈判已经成为用武器交换人质的低级交易。虽然先后已有两名美国人质在美国送交了四批武器的情况下被释放。但是，在同一时期，又有四名美国人在贝鲁特被绑架。这场交易终于以伊朗人大获全胜而告结束。

（孙晓）

鲁斯特驾机闯红场

莫斯科红场，俄文意为“美丽的广场”。自15世纪末叶以来，一直是俄国和苏联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心。十月革命胜利后，红场更成了苏联人民心中向往的圣地，在红场的西面，是一排用红色大理石砌成的观礼台，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和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登上红场观礼台，检阅游行队伍和参加阅兵式的武装部队。观礼台正中是列宁墓。观礼台后面就是著名的克里姆林宫，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办公地。红场的南面，矗立着俄罗斯古代建筑艺术的象征一波克罗夫斯基大教堂，而与它遥遥相对的，是国家历史博物馆。1987年“五一”节刚过，人们就开始为迎接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而装饰起红场了。

1987年5月28日傍晚，晚霞映照下的莫斯科红场显得格外庄严、静谧。广场上游客如云，人们不时按动着照相机快门，摄下这美好的景色。

突然，从天空隐约传来一阵阵飞机引擎声，这在空中管制极为严格的莫斯科市区上空，是很难得的。人们不禁抬头观望。不一会儿，一架白色的轻型飞机从云中钻出来，开始在红场上空作超低空盘旋，很显然，驾驶员在寻找降落地点。红场上的游客都惊得目瞪口呆，一位苏联艺术家对他的同伴说，这肯定是在拍电影。广场上执勤的警察此时也不知所措。

飞机降落到20米的高度，向波克罗夫斯基大教堂和克里姆林宫斯帕斯钟楼之间的空隙冲过去，并打开了降落灯准备着陆。地面上的游客吓得四处躲开。驾驶员发现有人，无法降落，就又将飞机拉起来，再在红场上空盘旋一圈。

飞机第二次准备着陆，高度只有几米，但广场上仍然有人，驾驶员只好开足马力再次爬高，从历史博物馆和列宁博物馆之间狭窄的通道穿过，然后紧急右转弯，差一点撞到莫斯科饭店。

飞机又在红场上空转了一圈后，决定在宽阔的莫斯科沃列茨基桥上着陆。飞机钻过桥上的电线，滑到波克罗夫斯基教堂和克里姆林宫斯帕斯钟楼之间的斜坡上，打了两个圈后，终于着陆成功。这时，斯帕斯钟楼上的大钟，时针正指向下午6点45分。

游客们被这酷似电影中特技表演的飞行惊呆了，直到飞机引擎停止转动，才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纷纷向飞机奔去。

座舱盖打开了，一位身着红色风衣的年轻人从机舱里钻了出来。他身材修长，金色头发，英俊的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一副潇洒自得的神情。他挥舞着双手，用德语向人们打招呼：“我是来自汉堡的和平使者，我想和苏联人民交谈。”这位不速之客一边向越来越多的围观者散发写有“汉堡——莫斯科”的签名纸，一边交替用德语和英语同他们攀谈。当人们得知他从赫尔辛基驾机起飞，飞了5个多小时的时候，一位苏联妇女热情地走上前，按照斯拉夫夫人欢迎客人的传统习俗，递给这个青年一个面包。

十几分钟过去了，围观者已多达300多人。这时，在红场值班的警察才如梦初醒，在请示了上级后，匆匆赶来设置栅栏，把围观者和飞机隔离开来。不久，一辆黑色轿车开来，几个警察把这位青年“请”上车，带离了现场。直到晚上9点，大批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数百名围观者驱散。29日凌晨两点，3位美国记者闻讯赶来拍照，遭警方阻止。这时，机尾上的联邦德国国旗的标志已被金色的油漆涂掉。凌晨4点左右，这架小飞机被装上了

一辆大型平板车，在六辆警车的护卫下，拖往莫斯科郊外的舍列缅捷沃机场。

警方从缴获的签名纸上，得知这场恶作剧的肇事者名叫鲁斯特。鲁斯特是何许人？他为何要驾飞机到红场？他又是怎样飞来的呢？从鲁斯特的自述和审讯中，人们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才有所了解。

这个现年 19 岁的青年，全名是马蒂亚斯·鲁斯特，生长在联邦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他从小就想当一名飞行员，12 岁就成了航空模型的制造迷，参加了学校航模队。他 17 岁时参加了航空俱乐部，学习轻型飞机的驾驶技术，只是因为视力不佳而没成为职业驾驶员。但他经过一年多刻苦训练，却取得了私人驾驶执照，并成了汉堡航空俱乐部正式成员。

在汉堡航空俱乐部里，每当周末晚会结束的时候，那些酷爱飞行、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总爱开玩笑地相互祝愿：“愿你在耶稣升天节那天着陆红场！”对此，鲁斯特印象特别深刻。

有一天，他在俱乐部里翻阅到一条资料：1981 年 10 月 18 日，一个名叫阿兰·马钱德的飞行爱好者，驾驶一架轻型飞机，以每小时 160 公里的速度，从巴黎的凯旋门门洞一穿而过，从而完成了轰动世界的飞行壮举。对这个法国人的冒险行动，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联想到同伴们在晚会相互告别的祝愿语，他不禁突发奇想：我为什么不能驾机在莫斯科红场降落，干一番一鸣惊人的大“事业”呢？于是，他开始酝酿飞往红场，在红场着陆的计划。但这个大胆的想法，他既没有告诉父母，又没有告诉任何朋友，而是悄悄地准备着。

鲁斯特的准备工作十分细致。早在 1987 年 3 月，他便给法兰克福的一家公司去信，索要苏联航空图。这家公司很快就给他寄去一份从赫尔辛基到苏联的航图，但却缺少去莫斯科的资料。因此，鲁斯特再次与该公司联系，花了 25 马克买了一份包括莫斯科在内的欧洲航空地图。从此，他经常背着家人，在房间里研究飞行路线上的风向和地貌，以及各种飞行细节。

要闯过苏联国境，关键在于避开雷达跟踪。鲁斯特就这个问题特地请教了航空俱乐部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他告诉鲁斯特，躲避雷达系统监视的唯一办法，是驾驶轻型飞机，在离地面仅数十米高度作超低空飞行。但他最后还是警告鲁斯特，最好放弃这次冒险，因为苏联的防空系统是第一流的，要想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

这并没使鲁斯特知难而退，反而激发了他勇于冒险的决心。5 月初，他告诉父母，想去北欧作一次长途飞行。因为按规定，要取得商业飞行的驾驶执照，至少得飞满 150 个小时，眼下他累计飞行达 60 小时，所差 90 小时必须靠长途飞行才能补上。父母同意他的北欧之行，并出钱帮助儿子从汉堡航空俱乐部租了一架塞斯纳—172 型轻型飞机。这种飞机时速只有 200 多公里，为减轻负荷，加大航程。鲁斯特将飞机上的 4 个座位拆掉了 3 个，还安装了一个副油箱。

5 月 13 日，他告别父母，驾机从汉堡起飞。向北飞越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抵达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在那里逗留数日后，他驾飞机飞往挪威的卑尔根。过了几天，他又飞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正是在那里，他下定了飞往莫斯科的最后决心。5 月 27 日晚上，鲁斯特独自一人徘徊在赫尔辛基街头，对这次冒险行动作了周密的思考，决心冒死闯红场。他在电话亭里，跟父母通了电话，告诉他们明天他将飞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然后再飞回家。蒙

在鼓里的鲁斯特的父母，压根儿也想不到儿子会干出一桩石破天惊的冒险事儿。

5月28日上午，鲁斯特给他的小飞机加足了燃料，270公升汽油足以保证6小时的飞行，在最佳情况下，飞机可以续航800公里。

中午12点21分，鲁斯特从赫尔辛基马尔米机场驾机起飞。在向机场递交的飞行表格上，他填的目的地是西南方的斯德哥尔摩。谁知他向西仅飞了几分钟，就向东南方急转。机场控制塔雷达荧光屏上，显示这架飞机的亮点迅速消失了。航空管制人员以为飞机遭到不测，便急忙与他联系，却没有回音，也没有收到任何遇难呼救信号。管制人员判断飞机可能坠落大海，便立即派出3架直升飞机、4艘军舰和17名潜水员，到漂有油迹的海面搜寻营救，结果却一无所获。

人们以为这个毛头小伙子“葬身鱼腹”了，殊不知他正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原来，鲁斯特在向左猛打舵盘的同时，就关掉了无线电台，并戴上了头盔，把飞机驶向芬兰湾的水域。为躲开苏联的雷达，他尽可能降低飞行高度，进行超低空飞行。他最终以80米的高度、225公里的最快时速，顺利地

从苏联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海边城市科赫特拉—亚尔维进入苏联领空。但苏联边防部队还是在下午2点45分发现了这架侵犯苏联领空的不明国籍的飞机，高度灵敏的雷达系统捕捉到了这个目标。两架歼击机迅即起飞跟踪。

鲁斯特不顾一切地朝苏联内地飞行，目标直指莫斯科。他没按正常空中航线走，而是按117度磁航向径直奔向莫斯科的西北郊。

接近下午4点钟的时候，正在500米高度低飞的鲁斯特，发现离自己7公里的空中有一架前来截击的苏联歼击机。这架战斗机从他的右边飞过去，接着又从左边飞过来，并以很近的距离一掠而过。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飞行员橙黄色的飞行服和白色的头盔。他紧张得心都要蹦出喉咙了。他想，苏联飞机可能要向他发出警告性的炮火，逼他改变方向或迫降。但奇怪的是，苏联战斗机只是环绕他转一圈，便呼啸而去了。原来，苏军飞行员误认为这是一架苏联轻型体育运动飞机，他过于马虎，没有看到机尾联邦德国国旗标志，便稀里糊涂放行了。

此后，鲁斯特再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下午6点15分，一座雄伟壮观的城市跃入他的眼帘：鳞次栉比的建筑，川流不息的车辆……啊，莫斯科到了！

然而，鲁斯特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克里姆林宫，是红场。他身边没有详细的莫斯科地图，只好以电视塔来掌握方向。他只在照片上见过克里姆林宫，生怕不能很快找到，他就把飞机高度降到300米。他终于看到了俄罗斯饭店、大教堂的金顶和克里姆林宫钟楼上宝石般的红五星……

就这样，鲁斯特经过6小时的飞行，躲过苏军严密的防空网，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天而降，落在苏联心脏——红场。

鲁斯特驾机私闯红场一事，苏联官方极力封锁，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29日早上，世界各大报纸都以头版头条刊登这则消息，19岁的鲁斯特也一下子成为轰动全球的新闻人物。

当然，最为震惊和恼羞成怒的还是苏联当局。正当鲁斯特随心所欲地在红场上空盘旋时，戈尔巴乔夫等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柏林出席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5月29日晚，戈尔巴乔夫才返回莫斯科。闻知此事而大为震惊的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让中央电视台和塔斯社播出一条3行字的简讯，公

开予以证实；另一方面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非常事件。

5月30日，在克林姆里宫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指出：“国土防空军总司令部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不可容忍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和犹豫不决，没有采取战斗手段来制止入侵飞机的飞行。因此，我要求解除防空军总司令科尔杜诺夫同志的职务。”很显然，科尔杜诺夫的错误是无法原谅的，他使世界上最强大的防空部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但是在接下来的会议上，有人开始为科尔杜诺夫说情，国防部长索科洛夫还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批评，指责他没有服过兵役，没有资格对军队的事情评头论足。这使戈尔巴乔夫更为恼火，他再次发言：“我认为，国防部对部队领导严重失职，对出现的重大疏忽缺乏应有的警惕和纪律，而导致国家和军队的尊严受到极大的损害。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求同样也解除索科洛夫同志的职务。”与会者都大吃一惊，因为索科洛夫是屈指可数的元帅之一。

第二天，公布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国土防空军总司令亚·科尔杜诺夫被宣布撤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元帅则因“退休”被解除职务，新任国防部长由鲜为人知的亚佐夫大将担任。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全世界都为之一震，各国舆论一片哗然。谁能料到，官阶显赫的两位苏联高级将领，竟会因为一位不足20岁的联邦德国青年机降红场而丢掉了“乌纱帽”。不久，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部一批空军将领被撤职，还有一些将校级军官也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至此，鲁斯特的“恶作剧”，已演变成苏联国内的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

戈尔巴乔夫迅速作出一连串人事调整的决定，引起西方人士的种种猜测。有人甚至断言，鲁斯特是在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克格勃操纵和利用了，其目的是使戈尔巴乔夫有借口向军内对改革持冷漠态度的元老派发动一次“突然袭击”。据法国《巴黎竞赛画报》透露，克格勃通过联邦德国一位飞行爱好者，获悉鲁斯特准备机降红场的计划，戈尔巴乔夫便利用这个机会，让克格勃有意使鲁斯特顺利地降落红场。

如果这一说法可靠的话，似乎对该事件中的一些疑点可以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了。首先，鲁斯特是在1987年5月28日这天行动的，这天是苏联边防军节日，是苏军边防稍为松弛的日子，可以认为，是了解苏联边防情况的人向鲁斯特建议选择这一天的。

其次，苏联的雷达飞机，在这一天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苏联和芬兰边境地区巡视，使鲁斯特得以顺利地避开苏联雷达和导弹系统的监视。

再次，苏联歼击机曾两次贴近鲁斯特的飞机，它们完全可以发出警告，或迫使其降落，但结果却莫名其妙地离开了，这或许就是克格勃在大开绿灯。

最后，戈尔巴乔夫在对军队采取措施和行动时，非常果断、干脆，似乎他早已成竹在胸。

不管怎么说，戈尔巴乔夫巧妙地利用了鲁斯特事件这一天赐良机，为推行他的政治计划赢得了关键的几分。

在联邦德国，鲁斯特一夜之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有关他的报道，记者们称之为“航空史上的一次壮举”。在西柏林，印有鲁斯特机降红场图案、标有“红场国际机场1987年5月28日开放”字样的T恤衫十分畅销，每件售价达8美元。但汉堡航空俱乐部并不为

拥有这样的“英雄”会员而高兴，俱乐部副主任盖斯反而宣布开除鲁斯特的会员资格，并要他承担将那架飞机运回联邦德国所需的25000马克的费用。联邦德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鲁斯特驾机在红场着陆的行动，是一种会带来不幸后果的“轻率行动”，并提醒人们千万不要仿效这种做法。同时，这位发言人还恳请苏联方面，能宽恕这位无知的年轻人。

8月4日，苏联方面宣布，对鲁斯特案件的调查工作已告结束，苏联最高法院将对他进行审判。当警察把鲁斯特正式逮捕时，这位“英雄”才意识到闯了大祸了，他必须在苏联的法律面前付出代价。

9月2日上午，莫斯科秋寒袭人，细雨绵绵。但在苏联最高法院大厦门口却是一派热闹景象。数百名外国记者一大早就蜂拥而至，他们肩扛摄像机或手拿照相机，抢占有利位置，等候拍下鲁斯特受审的第一个现场镜头。众多的苏联人也站在两旁的人行道围观，想亲眼目睹那位神奇般闯入他们国家心脏的联邦德国“冒险家”。

开庭时间就要到了，可是左等右等连鲁斯特的影子也没见到。冒着风雨站在法院大门口的外国记者和围观的苏联群众，开始焦虑起来。这时，有消息说押解鲁斯特的警察已经从法院后门溜了进去，人们这才发觉上了当，又蜂拥赶到后门，只看见两辆绿色面包车停在后院。显然，鲁斯特已被押进去了。

上午10点整，审判开始。在监狱里度过了97天的鲁斯特被带入三楼审判厅的被告席，他瘦高的身材，白皙的面庞，戴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身著一套藏青色的西服，还系着一条蓝底白点领带。他举止文雅，动作从容不迫，像一个文弱书生。他微笑着扫视着公众席，那里坐着25名外国记者和15名苏联记者，还有100多名苏联各界的代表。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离他不远的父母和弟弟的身上。他们是两天前从汉堡千里迢迢赶来旁听的。突然，他看到母亲眼里滚动着泪花，他不由得收敛起笑容。

苏联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指控鲁斯特犯有非法蓄意侵犯苏联国境、违反国际飞行规则以及恶性流氓行为等3项罪行。

鲁斯特也许是“心中有数”，他显得很平静。他不用讲稿，口齿伶俐地回答检察官向他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并在一开始就不假思索地承认公诉人列举的3项罪名，只是在与辩护律师商量后，才否认自己犯有“流氓罪”。

当检察官追问他此行的目的与动机时，他乖巧地争辩说，他驾机到莫斯科确实有政治目的，那就是他冒险飞到莫斯科是为了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他讨论世界和平问题，以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与和平。为取悦于苏联人，他还说了一些苏联人最中听的话。他强调，他此次和平使命之所以选中莫斯科，是因为和平的策源地不在华盛顿或波恩，而是在莫斯科。他承认这次机降红场，只是希望达到目的，而没顾及后果。现在他认识到这是他有生以来犯的最大错误，并表示今后决不重犯。最后他恳请法官能从轻处理。

9月4日，是审判的最后一天。鲁斯特的辩护律师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鲁斯特确有悔过诚意。他希望法庭考虑到被告年纪尚轻，以及所犯罪行没有酿成重大后果，最好能从轻量刑。但公诉人认为鲁斯特所犯3项罪行，后果严重，建议法庭取最高刑期，判处鲁斯特8年徒刑。公众席上顿时一片愕然，大多数人认为量刑过重。

当天下午4点半，最高法院宣布，判处联邦德国公民鲁斯特在普通劳改营服刑4年。鲁斯特和他的母亲对判决没有异议，事后他们对记者说，对此

他们早已有思想准备。

鲁斯特被判刑后，名义上要在劳改营服刑，但他却一直呆在牢房里。他每天除学习俄语外，还要到监狱图书馆装订和修复图书4小时。他在狱中待遇很好，他的父母多次被准许探望他。1988年，当鲁斯特20岁生日时，他的父母特地飞抵莫斯科，带着生日礼物，与他在狱中团聚了3个小时。

当鲁斯特身陷囹圄时，他驾驶的那架塞斯纳轻型飞机却身价百倍，大出风头。法国作家保尔和法国企业家诺伊曼合伙以12万美元买下了这架轻型飞机，然后以200万美元的高价卖给一收藏家。接着，这架轻型飞机成了真正的“和平使者”，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

鲁斯特入狱后，联邦德国总统、政府总理、外交部官员先后利用不同的场合，为鲁斯特说情。联邦德国驻苏使馆官员更是数次去狱中探望。苏联当局则顺水推舟声称，鉴于鲁斯特能“自觉接受改造，遵守监狱纪律”，故在鲁斯特服刑仅14个月后，即宣布提前释放。

1988年8月3日晚7点左右，联邦德国法兰克福机场上人声鼎沸，两三百个新闻记者手捧录音机话筒和照相机，仰望茫茫夜空，严然在等待着一个“大人物”的到来。

突然，机场灯火通明。一架联邦德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徐徐降落。245名乘客从这架来自莫斯科的客机上走下来。记者们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一个刚走出舱门的男青年。

“鲁斯特！鲁斯特！”顿时，机场上一片嘈杂，闪光灯闪个不停，原来记者们等候的并不是“大人物”，而是这个机降红场的新闻人物。

正当记者们一拥而上，将十几只话筒伸上前时，鲁斯特却旁若无人，一声不吭，一个劲地朝前走，并很快钻进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小轿车。记者们尚未弄明白怎么回事，小轿车已疾驰而去。事后，人们才知道，联邦德国发行量很大的《明星》周刊已和鲁斯特父母商定，买下了有关他在苏联狱中生活情况报道的版权，于是他刚下飞机就作为“专利”，被这家杂志接走了。

记者们大失所望，叫苦连天。只有紧跟在鲁斯特后面走下飞机的美联社记者面带微笑，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和美国一家电视网的记者捷足先登，在莫斯科便随鲁斯特登上这架飞机。途中，在飞机上就单独对鲁斯特进行了采访。看来机降红场这个恶作剧的肇事者，对错误的认识是深刻的。他坦言，在监狱饱受孤独与失望之苦，并不无感叹地说：“我在被关进监狱时还是个孩子，出来时却已是成年人了。”

鲁斯特机降红场的事件，由于他的被释回国，似乎结束了。

然而由它引发的苏联军队危机和清洗并没有结束。西方报刊对事件内幕的披露和猜测还在继续。此次购买鲁斯特“专利”的《明星》周刊，是一家惯于刊登内幕消息的畅销杂志。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该杂志或许会对鲁斯特驾机闯红场事件，爆出更加惊人的内幕。

（陈忠）

海峡渡轮倾覆记

1994年5月6日，联接英法两国的海底隧道正式通车。这条全长49.5公里的隧道，使冰川时期分开的大不列颠岛再度与欧洲大陆相联结。欧洲历史上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乘坐第一辆欧洲隧道公司的“欧洲之星”高速列车，从伦敦经过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来到了法国，受到了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热烈欢迎。欧洲人数百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然而，英法隧道的修建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1753年，法兰西地质学家德麦莱就向法王路易十三提出过修建法英海底隧道的建议。1869年英法两国成立了海峡隧道研究会。1878年英法两国共挖了两公里隧道，因遭国人反对而被迫中断。直到1986年，英法两国才重签建造海底隧道协议。但真正促使加快隧道修建进程的，却是1987年3月发生的一起英吉利海峡渡轮“自由企业先驱”号翻沉事件。

英吉利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每年约有5000万人乘渡轮横越海峡。它的东面航道由英、法、比、荷4国共同管理。最繁忙的时候，一天有250趟渡轮日夜往返于这4国的海湾之间。

“自由企业先驱”号渡轮是英国最大的轮渡公司汤森·托雷桑公司经营的15艘渡轮之一，它在英国多佛尔港和比利时泽布吕赫港之间穿梭往返已有7年的历史，被人们戏称为“漂流的罐头盒”。托雷桑公司主要经营英比和英法航线，每年要摆渡1000万名乘客及150万辆汽车，轮渡任务非常繁重。每到周末，乘客倍增，码头上聚集了许许多多赶乘渡轮前往海峡对岸的度假者。

1987年3月6日，星期五。由于欧洲许多国家已实行周五工作制，所以这天是周末，在比利时泽布吕赫港等候乘船的乘客特别多。傍晚时分，停泊在第12号泊位的“自由企业先驱”号渡轮正准备返回多佛尔港口。上船的乘客和汽车实在太多，因而渡轮启航的时间比预定时间延迟了半小时。

傍晚7点28分，“自由企业先驱”号渡轮一声长鸣，缓缓地驶离泽布吕赫港。这艘长132米、宽23米的巨轮，自重8000吨。船舱分为五层，最底层为轮机舱，接着是两层汽车舱和货舱，甲板上是餐厅和免税商店，最上层是客舱，以及驾驶室和酒吧。从泽布吕赫港到多佛尔港航程共135公里，约需4个半小时。

为吸引乘客，托雷桑公司和《星期日太阳报》一起搞了一个特别优惠活动。长期乘坐此船的乘客每次只需付一英镑的船票钱。“自由企业先驱”号的载客量是1200名乘客，据事后登记查证，这次渡轮上除84名船员外，还载有566名乘客，以及卡车38辆、轿车84辆。但由于公司规定4岁以下的儿童不用购票，2岁以下的儿童不登记在乘客之数，再加上一部分逃票的乘客，所以实际船上到底有多少乘客，谁也无法确切知道。乘客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有在欧洲大陆尽兴游玩后返家的旅客，也有每天来往于英吉利海峡的汽车司机；有刚度完蜜月归来的情侣，也有100多名回国休假的军人。他们几乎都是英国人。

这时的泽布吕赫港，黑云低垂，下着蒙蒙细雨；浩瀚的海空，有几只海鸥在盘旋，不时掠过微波涟漪的海面。

渡船上，正是进晚餐的时刻，餐厅和酒吧里挤满了乘客。他们一边饮酒

品茶，高谈阔论，一边隔窗眺望港湾的美丽夜景，只见灯光点点的泽布吕赫港在夜幕下慢慢向后退去。

7点46分，渡轮驶离泊位1000米左右，即将进入北海了。这时，一个淘气好玩的7岁小男孩马丁·哈特雷玩兴正浓，在舱内兴奋得跑来跑去。他妈妈喊住他：“不要乱跑，不然会翻船的！”话音刚落，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渡船像被人推倒的老太婆那样，猛地向左倾倒。顷刻间，汹涌的海水从下层舱门灌进舱内，船上顿时乱成一团。餐厅里所有的杯盘碟子和餐桌椅凳，一律向左面滑去。所有的人也都向左边倒去。46岁的船长大卫·雷里立即将推进器的手柄拉到“全速后退”的位置，试图让船立即停下来。结果却毫无作用。30秒钟过后，船上灯光完全熄灭。仅仅不到一分钟，“自由企业先驱”号就歪倒在海中，在舷沉入9米深的海底，右舷则高高地朝天露在外面。沉船速度之快，竟使经验丰富的船长雷里没有来得及发出SOS求救信在船体突然翻沉的瞬间，舱内一切不固定的物体满天飞舞，朝着人群砸去。有的乘客当场被击昏，有的胳膊和腿被砸断。人与人也挤撞在一起，一个个碰得鼻青脸肿，凄惨的喊叫声，哭嚎声在黑暗中响成一片。那些受伤者以及来不及抓住固定物体的人被抛出船外，落入冰冷的水中淹死；有的被堵在舱内，与船体一起沉入水中；还有的被下层货舱翻转摔下来的卡车、货物当场压死压伤。

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变，历时只有短短的几十秒，但人们却经历了一场毫无心理准备的生死大搏斗。

安德鲁·西蒙斯是侥幸死里逃生的乘客之一。这位30岁的机械师是托雷桑公司的常客。那天他是买了一英镑特价票乘船回国的，遇难时他正与一位朋友在船舱走廊上聊天。突然间，天翻地覆，整条船就像被锯倒的大树，向一边倒下去。船上的旅客就像滚木一般向一侧滚过去。西蒙斯在紧急中抓住了一根柱子，才捡回了一条命。

23岁的斯坦·马森是一名英国军人，他是同妻子凯瑟琳以及仅4个月的女儿凯丽一起回国度假的。在翻船的一刹那，马森一把抓住妻子和女儿。但飞来的一件沉重的重物突然击中了这位军人，他的脊椎骨受了重伤，妻子脱手滑下了水。就在女儿也将脱手的关键时刻，他用牙齿一口咬住凯丽的衣服，拖着她爬出了船舱。在马森旁边的是一个名叫柯德威尔的司机，他碰巧抓住窗口旁边的一根柱子才未被海水冲走。他见马森拖着女儿在海水边挣扎，赶紧设法将幼小的女婴抱过去，并帮助马森脱离了险境。

43岁的保罗·怀特是渡轮上的大厨。事故发生时，他站在靠近餐厅窗口的甲板上。船身倾斜的一刹那，他本能的抓住壁板上一个固定的把手，同时又用左手设法摸到一件救生衣穿上。他身边一些人被海水冲往另一侧窗口，然后便消失了。他连忙大声叫大家抓住船上固定的柱子和家具，并叫大家脱掉身上的大衣，以免衣服吸水过多而把人困住无法动弹。他的喊声被惊慌失措的嘈杂声淹没，只有附近的几个人照他的话去做而获救。

18岁的英国女大学生卡布雷和她的祖母，在翻船时恰好抓住身边的固定物而没滑落下去。但紧接着，一辆载着一个残疾人的轮椅，从她和她的祖母的面前飞速地滑过来，她的祖母出于救人之心，伸手抓住轮椅，可轮椅太重，速度又太快，反而把祖母也一起带落水中，不幸的祖母就这样被海水吞噬。

37岁的银行职员安德鲁·帕克成了这场事故中的传奇英雄。翻船时，他正与妻子及一岁的女儿在餐厅就餐，剧烈的晃动把他们和另外的20多人都摔

到了餐厅的另一侧。一条很宽的裂口横在他们与安全出口之间。对身高1.9米而又身强力壮的帕克而言，跨过这道裂口逃命可算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对身边那些老人和妇女儿童来说，裂口却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帕克毫不犹豫地用自己身体架在裂口上，然后大喊：“快从我的身上爬过去！”20多位乘客和他的妻子女儿，都从这座“人桥”上爬过去，逃到安全的地方，而他自己也安然无恙。

船上的84名船员，约有一半死亡或失踪，他们原可以弃船逃生，但为了抢救那些处于危难之中的旅客，他们没有擅离职守，结果只有半数遇救。

船长大卫·雷里是“自由企业先驱”号的第六任船长，他在失事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抢救乘客，甚至负了伤。当他的船员要扶他离开沉船时，他坚决地说：“我是船长，我不能离开我的船。”说完，仍旧直挺挺地坐在沉船上，指挥船员抢救乘客。直到最后，他才被救护人员救出。

那个在出事时到处乱窜的小淘气马丁·哈特雷，双腿被飞来的器物砸断。但是他还用双手支撑着爬出船舱而生还。可是，他那不幸而言中的“要翻船”的母亲以及他的父亲、爷爷和婶婶，全都淹死在冰冷的海水之中，小哈特雷在转瞬之间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可怜的孤儿。

在“自由企业先驱”号渡轮倾翻时，一艘荷兰籍的挖泥船“桑德露丝”号正在3公里远的地方作业。大副范·马伦发现后，立即向港务当局发出海难警报，并立即下令停止挖泥作业，奔赴现场抢救。

15分钟后，比利时当局派出两架“海王”直升飞机首先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活动。稍后不久，法国、荷兰及英国的直升飞机也加入到抢救行列。前来抢救的拖船、游艇达50余艘。救护人员爬上高翘着的沉船右舷，砸窗、捣门、凿开甲板，抢救幸存者。泽布吕赫港口还派出十几名潜水员参加水下抢救工作。

经过救援人员的连夜奋力抢救，加上遇难者之间互助自救，最后有409人幸免于难，但仅找到54具尸体，约有80人下落不明，估计被压在沉船以及千百吨货物之下，打捞不到他们的尸体。

“自由企业先驱”号遇难的消息震撼了英伦三岛，轰动了欧洲大陆，也使全世界震惊。这是1912年“泰坦尼克”号客轮沉船以来，英国海运史上发生的一起最严重的灾难。英国女王和首相撒切尔夫人闻讯后极为震惊，分别发表电视讲话。撒切尔夫人在第二天下午亲临现场视察，她下令成立有法官和专家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并要求处理好各项善后工作。她还到医院探望了伤员。英国议会也就渡船倾覆案件举行聆讯会。

数百名遇难者的亲友拥到多佛尔码头，他们一边哭泣一边隔海眺望，纷纷要求乘渡轮去泽布吕赫现场。托雷桑公司派人向遇难者家属深表慰问，并表示将尽快把他们送往现场。

3月8日，泽布吕赫市气氛肃穆，各大建筑物一律下半旗，向死难乘客表示哀悼。市体育馆的一个篮球场被黑布团团围住，成了罹难者的临时停尸场。里面放着从海水中打捞上来的多具尸体，分为男人、女人和孩子3部分。遇难者的亲属及部分幸存者，在警方的安排下前来辨认尸体。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履，在低回的哀乐声中，一个棺木一个棺木地辨认。他们有的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有的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有的悲伤过度，难以自持。一个50多岁的幸存者乔治·拉米老泪纵横，脸色苍白，他从3具棺木中，分别认出自己的老母、妻子和外孙，但仍在不断地呼喊着：“我的女儿呢？我的女

婿呢？”闻者无不为之落泪。

事故发生后，最为紧张的莫过于比利时当局了，因为在沉船内有两辆卡车装有剧毒物质，其中有含氰化砷的化学物品 11.1 吨，甲苯氰酸盐 5.5 吨。虽然这些剧毒品有良好的包装，但渡船沉没时货舱已破损，化学物质有外泄的可能。为此，比利时当局警告当地居民，切勿用手触摸冲上岸的罹难者的尸体及其它物品。环境保护官员也一直守候在沉船周围，检测海水污染的情况。救援和打捞尸体工作也因此受阻，潜水的蛙人工作起来特别小心。

失事当天，英国和比利时政府以及托雷桑公司分别成立了海难调查小组，探寻渡船倾覆原因。调查持续了 4 个半月，但结论却出奇的简单。7 月 24 日，负责调查的英国法官宣布，此次海难中，船上共有 655 人，罹难者 188 人，还有近百人受伤。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船长、大副和助理水手长严重玩忽职守，船启航后没有关上汽车舱的舱门，以致在渡轮底部撞上港口凸形防护堤的水下基石时，随着船身倾斜，海水从离海面 2.4 米高的舱门顺势内灌，引起翻船。为此，法院裁定，给予船长停职一年、大副停职两年的处分。

至于酿成这场大祸的根本原因，许多欧洲报刊却认为是托雷桑公司唯利是图，拼命追求高额利润而不重视行船安全而造成的。

在调查事故原因的同时，打捞渡船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因为舱内的有毒物质有可能污染环境，航道也需及时疏通，此外，沉船内的尸体必须打捞出来，以便亲属们认领。

托雷桑公司将打捞渡轮的任务，委托给著名的荷兰斯密特·塔克国际打捞公司。公司经过详细勘察，制订出打捞计划：向海底打入 16 根钢柱，用以固定两艘驳船。每只船上放置一部可吊 3000 吨重物的起重机，把沉船的水底部分吊起放平，然后抽去渡船中的海水。经过一个月的努力，4 月 7 日，终于将侧卧在水中的“自由企业先驱”号扶正。一批蛙人在弧光灯下进入船内，搜寻遇难者尸体，然后由比利时海军人员将尸体装入塑料袋，送往图格斯海军基地的临时停尸场。就这样，又搜寻到数十具尸体。

这次海难的赔偿金额巨大，在海事保险赔偿史上创下了新的纪录。事发后，“自由企业先驱”号船主托雷桑公司立即拿出 25 万英镑抚恤家属，但遇难者家属依旧纷纷提出索赔要求。在悲剧发生的第二天，由英国消费者协会出面，请求英国著名的经办灾难诉讼案的律师罗杰·潘农，由他来协调受害者的赔偿要求，并担任该事件中全体受害者所聘律师的总顾问。根据 1974 年雅典公约，海上失事的最高赔偿费为 3.8 万英镑。潘农认为这是一种“人为的限制”，一个丧失亲人的家庭应得到 10 倍于此的赔偿。他决定说服托雷桑公司在法院外解决，给遇难者家属比公约规定高得多的赔偿金，否则就到比利时打这场官司，因为渡轮是在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口沉没的，而比利时并没有批准关于限制赔偿金的雅典公约。托雷桑公司在潘农的交涉下，只好让步，将最高赔偿金提高到 8 万英镑，托雷桑公司一共赔偿了近 3000 万英镑。

英吉利海峡渡轮翻沉的悲剧，促使人们对英法海底隧道的修建予以更大的关注。尽管 1986 年 1 月英法两国签订了修建海底隧道协议，但仍停留在文字上，在法律程序和资金上还障碍重重。英法两国舆论借此事件，大声呼吁加快隧道修建的进程。英法朝野为之震动，议会很快就正式批准由英法联合修建海底隧道的议案。到 1987 年夏天，有关修建隧道的所有法律手续全部完成。工程所需 100 亿英镑的资金由欧洲投资银行牵头，与 220 家银行一起集资贷款，并且还向 63 万股民发放了 16 亿英镑的隧道股票。至此，海底隧道

的全部准备工作已完成。1987年12月隧道工程正式开工。历时6年零5个月，隧道终于建成通车，从而改变了英吉利海峡以渡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历史。

1994年5月6日傍晚，英法海底隧道的通车典礼结束之后，数百名“自由企业先驱”号遇难者的家属聚集在多佛尔港口，将一个由蓝、红、白3种颜色的鲜花做成的大花环，放进波涛滚滚的海面，向遇难者传递海底隧道通车的消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对他们的无限哀思。

（陈继忠）

诺列加的命运

1989年12月20日，美国南方军司令部派出一万三千人的机械化部队和伞兵，向远在加勒比海的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发起了突然袭击。一个多小时以后，美军已控制了巴拿马城市中心以及郊外的托里霍斯国际机场等战略要地。

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军开进巴拿马的目的，首先是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其次是帮助巴拿马恢复民主，再其次是维护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完整以及对诺列加绳之以法。其实，美军的行动，主要目的是逮捕诺列加。

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是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他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物，也是个独裁者。他是在美国人的扶持下上台的，上台六年，他行使铁腕政治，而且自己又嫖娼、贩毒，丑行累累。最终因与扶持他上台的美国政府分庭抗礼而获罪，走上了政治生涯的末路。

60年代，诺列加在秘鲁乔里勒军事学院学习时，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收为情报员。

1960年夏，他因斗殴闹事，被关进拘留所。后来由美国人幕后交涉，才将他放出来。中央情报局将他作为重点对象来培养，让他专修“军官与军事情报”；诺列加最感兴趣的是心理战，他学会了利用新闻媒介来制服对手。后来，在他担任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军事情报处处长的十三年里，除了控制军事情报、刑事侦察、海关、警察以及移民大权，网罗了一批党羽之外，还向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提供古巴方面活动的情报及本国政府情报。1971年，巴拿马政府任命诺列加为巴美两国之间的联络官。而他每年又在美国人那里领取了10万美元左右的“联络费”。

诺列加当权后，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采取一种互相利用、谁也不得罪谁的方式，对美国人也不例外。他控制着分割南、北美洲的巴拿马运河，只要有好处，对任何人都可以提供方便。一方面，他允许美国在巴拿马运河设立监测中南美洲的情报监听站，允许美国利用运河作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训练和补给基地，而且帮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而另一方面，他又协助古巴和尼加拉瓜破坏美国对他们的贸易禁运，卖武器给尼加拉瓜政府及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游击队。甚至还暗中向古巴通报美国的秘密情报。

美国人对诺列加的这些行为了如指掌，在中央情报局关于诺列加的档案中这样写：“此人对巴拿马运河只肯出租，但不出售。”他们对诺列加不满，但又觉得这个人还有用，至少还可以利用，所以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当美国国内几名参议员指控诺列加向美国贩卖毒品，向古巴销售武器后，国会责成中央情报局调查，但事情后来不了了之。

只是在里根总统上台后，多次向诺列加表示，希望延长在2000年以后美军驻守巴拿马运河的期限。而诺列加则漠然置之，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才决定换马。起先是利用巴拿马内部矛盾，推波助澜，施加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压力，逼诺列加下台。开始他也曾表示愿意“主动引退”。但随着美国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强，他反倒强硬起来。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我不能放弃我的职责、我的命运。”他强调他到哪里不能听从美国人的安排，他似乎忘记了他的命运向来是由美国人为他安排的。

这一来，他就遭殃了。

当巴拿马国防军正在城里和郊外抗击入侵美军时，身为国防军司令的诺列加却不知去向。直到当晚8点左右，电台广播中传来他不到一分钟的简短讲话：

“这里是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我谨向国防军及全体人民致敬！我们绝不后退一步，必须抵抗，前进，直到胜利……我们现在正在战壕里。”

事实上，他根本没在战壕里，也没有在国防军司令部指挥战斗，而是躲在一个秘密据点里。

其实在12月19日，当部下告诉他美军正在加紧入侵时，他认为“那一定是虚张声势，美国人的惯用伎俩”。他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而是拿起电话，找他的朋友闲聊。

当美军悬赏百万美元捉拿诺列加的时候，他带着情妇到处躲避，住到他的亲信或秘书的家里。他不停地换地方，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此时美军上将鲍威尔正在布置挨家挨户搜捕。

12月24日，美军第82空降师的四个士兵得到一个密报：指列加正在他情妇的母亲家里。他们赶紧开车去捉拿。但路上遇到当地居民设置的路障，过不去。他们立即通过无线电，请求支援。当增援的美军赶到，排除了路障，赶到目的地时，诺列加已经乘直升飞机逃走了。

诺列加东躲西藏，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找一个比较稳妥安全的地方，作长期打算。

23日，他设法与古巴驻巴拿马大使馆取得了联系，要求政治避难。

古巴使馆官员说，他们很愿意他去避难，但使馆已被美军团团包围，他一来就会被抓住的。

同一天，诺列加的好友，奇里基省国防军司令路易斯·德尔锡德中校向美军投降。诺列加已经走投无路了。

12月24日，他打了个电话给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他对拉沃亚大使说，如果不同意他的要求，他就到奇里基省山里去打游击，并威胁要进行一场大屠杀。他给大使15分钟的时间考虑。

拉沃亚大使只好立即请示罗马教廷。15分钟到了，教廷尚无答复。大使只好自行作主，同意诺列加进入大使馆避难。

下午3时，诺列加乘坐的小车飞快开进了梵蒂冈大使馆。当时，美国人显然没料到他会到这里来，只是在尼加拉瓜和古巴大使馆外面设置了警戒线。

诺列加进入梵蒂冈大使馆后，拉沃亚大使将这件事通知了美军南方司令部。同时希望不要公布此事，但美方并没有按他的要求去做，他们立刻派部队包围了大使馆，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大使先生劝说诺列加自动走出大使馆，以免影响梵蒂冈与美国的关系。诺列加气得要命，为了表示抗议，他关掉房间里的空调。这样一来，便又闷又热，他像一只掉进陷阱里的野兽，愤怒而绝望。房间里没有电话，也没有报纸。大使命令工作人员不得与诺列加谈话。

美军在大使馆外面架设高音喇叭，不断播放摇滚乐和抨击诺列加的新闻，加剧他的紧张心理。从广播里，他得知他在国外银行的帐户被冻结，他的助手纷纷被捕等等。

拉沃亚大使将诺列加的处境告诉他，劝他向美军投降。并告诉他不可与

使馆人员接触。一天三顿饭有专人送来，其他时间房门必须关上。圣诞节之夜，大使给诺列加和他的随员送来干食面，诺列加边吃边说：“厨师的手艺不错，这种干食面很好吃！”

他几乎已经成为囚犯了。

美军的坦克在大使馆外面开来开会；直升飞机在附近频频起落。整个使馆都被临时设置的铁丝网包围着。美军还在周围埋伏了几十名狙击手，装有红外线瞄准器的自动步枪对准所有的窗口，诺列加根本不敢走到窗口去。此刻，美军还打灭了使馆院内所有的路灯，清理了所有能作为屏障的东西。

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频频与梵蒂冈官员接触，坚持要求把诺列加送上美国法庭进行审判。梵蒂冈方面则感到有些为难：一方面他们不想违反国际法，但同时也不想得罪美国人。12月27日，梵蒂冈发言人宣布：根据国际法，梵蒂冈教廷驻巴拿马大使馆不会把诺列加交给美国。但在几个小时以后，四辆小车开进大使馆院内，将七名与诺列加一同来避难的巴拿马人送往霍华德美军空军基地，然后，他们被送往美国。

巴拿马政府坚持要梵蒂冈大使馆将诺列加交给他们。总统恩达拉说，使馆应该劝说诺列加离开那里，但不得离开巴拿马。

12月31日，巴拿马总检察长宣布，他们准备以谋杀罪和贩毒罪对诺列加进行起诉。这里说的谋杀罪指的是两个月前有一批军官发动了一场企图推翻诺列加的兵变，结果失败了，领导和参与兵变的10名军官被捕后遭残酷折磨，最后被处死。

诺列加在国内民愤极大。1990年1月3日，成千上万的巴拿马人聚集在梵蒂冈大使馆门前，要求把这个军事独裁者交给他们。听见外面一片愤怒的吼声，诺列加心惊肉跳，他开始考虑是向人民投降，还是向美国人投降。

这时，拉沃亚大使走进房间，对他说：“将军，人民要抓住你，这种神经质的愿望是存在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你的结局将会像墨索里尼那样，是极悲惨和有失体面的，但决定要你自己做。”又说，“我永远不会要求你离开这里，罗马教廷也不会这样做，如果你要走出去，必须是自愿的。我认为，投降是一条出路，对你有利，对曾给你好处的罗马教廷也有利。”

诺列加此时愁眉苦脸：“您认为，我应该向谁投降？”

大使说：“向美国人投降。如果你是正义的，就应该出庭。美国法庭是可以信任的；另外，你也不会受到拷打。”

诺列加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您说的我完全理解。”

随后，两人就一起去做弥撒。

然而。大使和诺列加都没想到，此时罗马教廷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教廷派了特使飞抵巴拿马，要求美军给他们一天时间说服诺列加离开大使馆。随后就向诺列加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必须在1月4日中午之前离开大使馆，否则他们将请巴拿马政府派人来将他带走。

也就在同一天，恩达拉总统撤换了亲诺列加的最高法官；提出研究将诺列加引渡给美国的可能性，他认为现在由巴拿马对诺列加进行公正审判还有困难，希望梵蒂冈大使馆不要将诺列加交给巴拿马。

接到最后通牒后，诺列加已经走投无路了。当他获悉忠于巴拿马新政府的保安部队已准备冲进使馆逮捕他的消息之后，更是魂飞魄散，于是下决心向美军投降。但他向美国人提出三个条件：1.允许他穿军服投降；2.允许他

打几个电话；3．暂不公布他投降的消息，直到他离开这里。

美国人答应了，并且还许诺不会根据判处贩毒头目的新联邦法判他死刑。

1月3日下午4时30分左右，梵蒂冈特使通知美国驻巴拿马军事当局，诺列加同意当晚离开使馆。晚上8时50分，在梵蒂冈特使和拉沃亚大使的陪同下，诺列加走出了大使馆。随后，他被守候在使馆门前的美军士兵押上了停在附近的直升飞机。送往霍华德空军基地。在那里，美国缉毒署官员正式将诺列加逮捕。

至此，美军入侵巴拿马的四个目标都已实现，一场国际性危机也就过去了。

（孙吴）

布托走上绞刑架

1978年3月18日，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穆斯坦克·侯赛因宣判：前总理阿里·布托因为在1974年下令进行政治谋杀而被判处绞刑。另外还有4个人，包括保安部队的总指挥米安·阿巴斯，因参与了共谋和实际动手杀人而同时被判处死刑。

由于布托被判死刑，巴基斯坦国内气氛再次紧张起来。拉合尔有上千人上街游行示威，卡拉奇和白沙瓦等大城市也发生了骚乱。阿里·布托是年前刚被军事政变赶下台的文官政府总理，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声望，为什么突然被判绞刑的呢？这事得从头说起——

1977年7月5日，巴基斯坦电台向全世界报道了一条重大新闻：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于格林尼治时间2点30分，接管了政府，并且对巴基斯坦人民党全部领导人，包括布托总理，实行拘捕。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政变的直接导火线是：布托政府和反对党全国联盟，就10月份在全国重新选举而进行的会谈失败了，并导致了政局的动荡；支持政府和反对政府的群众同时示威游行，并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死亡约350人；因罢工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亿美元。

军队成立了由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任军政府的首脑。1976年以前，哈克军衔是中将；是布托总理将他破格提升为上将总参谋长的。齐亚·哈克在首都伊斯兰堡宣称，他原先“并未打算介入布托总理和反对派长达4个月的纠纷，作为最后手段才采取行动的。”他表示军事接管政权只保持三个月，目的是为今后三个月里为公平选举奠定应有的基础。

根据军事统治者命令的条款，乔德里继续担任总统。

政变当天晚间，同布托对立的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领导人帕加罗皮尔被释放了。该联盟的领导人也是和布托同时被政变当局逮捕的。

7月28日，布托和其他15名政治家也获释出狱。齐亚·哈克分别同他们举行了会谈。他把已颁布的在竞选期间各政党必须遵守一些条例告诉了他们。条例中规定，凡是阻挠、妨碍或宣传反对举行大选的人，都要被判处7年徒刑。

当布托乘专机回到南部城市拉卡纳家乡时，受到好几千人的欢迎。在从机场驱车29公里回家的途中，一路上都有支持者向他撒花瓣。同一天，布托从家乡拉卡纳到达卡拉奇，受到成千上万支持者的欢迎。拥挤的人群使他无法走下火车。他让火车开到另外一个车站，然后乘汽车回卡拉奇的家，后面跟了几百辆汽车。

8月1日，巴基斯坦军政府宣布：大选将于10月18日举行；军队和司法部门将监督这次选举。巴基斯坦人民党中央执委会在布托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人民党将参加大选。布托的政敌、巴基斯坦全国联盟也宣布参加竞选。

与此同时，布托的政敌反对派政界领导人，要求审讯布托“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犯下的罪行”。由军队提出的调查工作也正在进行：调查布托总理在执政5年期间，所传的贪污、政治谋杀和其他营私舞弊行为。

军政府首脑齐亚·哈克也说，有些人已经控告前总理授意制造政治谋杀和绑架。他说，如果地方法庭对布托提出起诉，布托应该作为一个公民承担

其事。如果布托觉得冤枉，他有权申诉。

对前总理布托的指责接踵而来，从谋杀到绑架，从非法抓人到受贿，什么都有，甚至还有人指责布托在购买法国“海市蜃楼式”战斗机的交易中，接受了200万美元的贿赂。由9个党组成的巴基斯坦全国联盟领导人、退役的空军中将阿斯加尔汗，要求在选举以前，审理对布托和人民党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控诉案。布托在自己党内也遇到困难，有大批人退党。

9月3日上午4时，布托在拉合尔郊区海滨的家中再次被捕。进行这次逮捕的是警方最高刑事部门——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布托的助手、前警察首脑马苏德，被最高法院以“严重无视法律的罪行”判处6个月的徒刑。

9月7日，军管当局命令银行冻结布托和他的夫人努斯特拉的存款。布托夫人是人民党妇女部长，她被获准去监狱探望丈夫，他们谈了90分钟。布托夫人第二次接替坐牢的丈夫，成为人民党的临时负责人。她领导了一场争取丈夫获释的运动，几日来，巴基斯坦各城市连续出现抗议布托被捕的骚乱，并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这种场面说明，不管是把布托关进监狱，还是得出了什么样的控诉，布托都会得到一部分群众的支持。

齐亚·哈克将军命令军事法庭审判布托等人。

布托的律师、巴基斯坦前检察总长叶海亚，向最高法院递交了诉状。他的申诉是，军事法庭审判布托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它侵犯了布托应享有的权利。

9月20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开庭，听取了这项申诉。最高法院在听取申诉之后，同意暂时释放布托。但军事当局代表政府发出一个通知，驳回了最高法院的请求。通知说，目前正在调查布托和其他一些同事所犯的极其严重的罪行，其中包括叛国罪。齐亚·哈克把巴基斯坦首席法官雅各布撤了职，任命老资格的最高法院法官谢赫为首席法官。

9月24日，巴基斯坦新任首席法官谢赫，用新的誓词宣誓就任，并开始履行职务。法官们声明忠于齐亚·哈克将军的政权。当天，布托被带到高等法院出庭。由于案情复杂，法官同意休庭。一场马拉松官司在继续。

对布托案件的审理进行了将近半年。进入1978年的3月，据可靠人士透露，在3月中旬，最高法院要审理一桩谋杀案件，布托是这桩案子的主要被告。在这前一周，布托的支持者数百人被捕。3月12日，军方政府宣布从即日起，对布托夫人软禁15天。软禁令指责她组织游行示威，并且发表煽动性讲话。

1978年3月18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全体法官都出了庭，首席法官谢赫·侯赛因宣判：前总理布托国为在1974年下令进行政治谋杀而判处绞刑。另外还有4个人，包括前保安部队的总指挥阿巴斯和三个下级军官，因参与了共谋并且实际动手杀人而同时判处死刑。

布托被判处死刑的谋杀罪，是由反对党的卡苏里起诉的。卡苏里曾是布托的支持者，两年前转入了反对党，而且对布托起诉得最凶。

1974年，卡苏里同他的父亲坐在同一辆汽车里，遭到枪弹的射击，卡苏里幸存下来，而他的父亲艾哈迈德被打死了。自那以来，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主要嫌疑犯是布托的保安部队首脑阿巴斯、用埋伏的机枪打死的。起诉书说，这是布托亲自指使的。

在死刑判决书刚一下达，布托就被转移到监狱中“死刑罪犯”的牢房里。

由于布托被判处死刑一事，使国内气氛再次紧张起来。齐亚·哈克用尽一切办法防止民众暴乱。布托一家已被严密地软禁；政治活动完全禁止，数百名人民党党员关进了监狱；新闻检查比平时严格得多，官方不希望对审判结果发表公开的讲话。同时，除警察外，军队也全面戒严以防不测，如果城市里发生骚乱，他们已奉命严厉镇压。

布托向最高法院上诉后，最高法院确定于5月6日，在拉瓦尔品第开始审理布托以及另外被判死刑的4人的上诉案。最高法院下令让这五名罪犯在5月4日和5日，同他们的辩护律师见面磋商。布托的首席律师巴赫蒂亚尔反对这样做，他说应当允许上诉期为通常规定的两年时间。但法院只把开庭期限延迟到5月20日。

5月17日，布托从拉合尔的监狱转移到拉瓦尔品第的一所监狱。拉瓦尔品第最高法院开始审理布托的申诉。布托提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安瓦尔·哈克没有资格当主审官，因为他们之间有私怨。安瓦尔反驳了布托的说法。

布托从转移监狱就开始了绝食，除茶水以外拒绝进食，以此抗议监狱给他难以忍受的条件。经过一周的斗争，布托取得了胜利，结束了绝食。原先在牢房外走廊里的5名警卫已撤去，只留一位警卫值班。厕所的门装上了门帘。在牢房里装了电灯开关和电风扇。

布托的家属曾要求巴黎律师事务所的巴丹太尔律师、伦敦律师事务所的马修斯，出庭帮助布托的巴基斯坦律师，这一要求被当局拒绝。

在高级法院审理布托上诉的初期阶段，布托曾于7月底给法国总统德斯坦发出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法国的《快报》上摘译登载。此信反映了布托的真实情感，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总统：

在死牢中，我无法把手伸出坚实的铁栏之外，否则，我早已向您致意并表示热烈的祝贺了。对于您的关心，在我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我的血将滋补我国的男女青年，如同肥料养育着无比秀丽的法国玫瑰一样。

从15岁起，我就为自由而斗争，不屈不挠。我曾和尼赫鲁与真纳并肩行动。我见过戴高乐，他仪态非凡。毛泽东以其对我的敬重给了我荣誉。在我的身上，政治、诗歌和浪漫的幻想揉为一体了。我纯真的爱情中，最为绚丽的是我与人民的爱情。对我来说，人民的力量并非一句政治口号，而是永不枯竭的信仰……

总统先生，倘若我得以生存，我将继续战斗，犹如沙场中央的斗牛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在我蒙难期间，我的家人经受了不能令人容忍的痛苦。这是我受迫害给我带来的唯一真正的悲伤……

您了解我对贵国的热爱和对您本人的欣赏。人类在呼吁更大的公正，如果我活下来了，无疑将分享这一呼吁得到的荣誉。如果我不免一死，我在此向您道别，同时祈祷比我强的人，去完成解放我国人民于可怕的贫困与苦难之中的战斗。我，一个“杀人犯”，对您，不敢以“朋友”相称。虽如此，我仍请您向尊夫人转达我的敬意，以及对您的儿子亨利的钟爱。

谨致深厚的友爱之情。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1978年7月30日于拉瓦尔品第狱中

8月下旬，布托的首席律师巴赫蒂亚尔宣称他已结束了他的辩护，大约在9月中旬左右开始听取起诉总结，然后，被告一方将有机会答辩。12月18日，布托到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出庭为自己辩护。这是他自三月

判罪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他穿的灰衣服松松垮垮，面色苍白，眼里含着泪。他谴责对他的审讯是荒唐的不公正之举。他对他的判决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上诉，他说，“我要的是公正，不是怜悯。”

这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律师布托，在 65 分钟的讲话过程中，有时候讲不下去了，眼睛里涌出泪水。他强忍住抽噎之后，对法庭说：“他们对待我是下作的，我不是一个无根底的人。我没有做过损害国家的事。”他说，他的案子是假案，是捏造出来的，说他利用联邦保安部队进行个人复仇的说法，是绝对不正确的，他没有理由要杀害卡苏里。他还批评了军方统治者哈克将军，说他未能解决国家的问题，还斥责当局未能宣布新的选举日期，并且修改了宪法。

布托讲话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激烈慷慨，雄辩有力。但是随后他说头昏、很疲劳，要求把答辩推迟到明天，法庭答应了。布托说，最近 90 天以来我未见过阳光，被囚在一个 10 英尺长 7 英尺宽的死牢里。

这一天，在法庭内外实行了严格的保安措施。主要大街设立了路障，旁听者经过严格的检查后，才允许进入法庭大楼。

布托夫人对记者说，布托现在确信军人政权打算把他处死。他对全家人说，如果最高法院确定了对他的死刑判决，他不愿向军人政权首脑哈克要求宽恕，而且也不准他的近亲提出要求。布托夫人说：“谁也不会去做违背他的意志的事。”

观察家们分析说，军方首脑现在认为，如果让布托活下去，他就会成为一切反对现政权者的旗帜。所以他们明知处死布托会激起他的追随者的反抗，一些强有力的邻国也会愤怒，却不打算留下布托。

时间又跨过了一个新的年头。1979 年 2 月初，在最高法院即将宣布对前总理布托的死刑判决最后裁决前夕，警方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逮捕了包括布托夫人和女儿在内的大批人民党领导人。

2 月 6 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驳回布托的申诉，法官们在有分歧的情况下，根据一项 4：3 的裁决，维持了对布托判处死刑的原判决。最高法院作出了这一决定，意味着除非齐亚·哈克下令缓期执行，否则，布托将被绞死。布托有 7 天的时间，可以向总统提出申诉。

布托的首席辩护律师巴赫蒂亚尔坚持认为，根据多数法官意见来执行死刑，在巴基斯坦是没有先例的。以前是必须所有法官一致同意才能执行死刑。

巴赫蒂亚尔去狱中见了布托。布托听到裁决时，显得很平静，表现得非常勇敢。布托用大部分时间同他谈了法官们的党派倾向，他说这项意见不一致的判决会给国家带来影响。

当布托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国家首脑或政界人士，纷纷打电报或发表声明；呼吁巴基斯坦当局重新考虑对布托的判决。

孟加拉国政界一些头面人物公开发表声明，对判处布托的死刑一事表示震惊。

斯里兰卡国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以她个人名义和自由党主席身份，打电报给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呼吁取消布托的死刑。

英国外交大臣欧文向巴基斯坦外交顾问夏希表示，反对将布托处死。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总统写信给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和军管当局首脑齐亚·哈克将军，呼吁停止执行布托的死刑，予以减刑。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打电话给伊拉希总统，表示关心布托的命运，

并呼吁对布托的案件“以人道主义”理由予以宽大。与此同时，有上百名群众在联合国总部对面集会示威，谋求让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采取行动。以拯救布托。

大赦国际这个人权组织从伦敦发出呼吁，要求巴基斯坦军方政权，允许外国观察员参加对布托的死刑上诉。这个人权组织还公布了一个报告，说几千名布托的支持者被拘留，他们呼吁不要让军事法庭审讯文官。

还有不少国家元首如美国卡特总统、法国德斯坦总统、英国卡拉汉首相、印度德赛总理、利比亚总理等，纷纷致函巴基斯坦元首，要求实行宽恕，保全布托的生命。

巴基斯坦军人领袖齐亚·哈克将军，不止一次对记者说，一些国家元首和世界领导人发出的为布托减刑的呼吁，大部分是出于私人关系，他说，有些是诚心诚意的，有些“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他指出，有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以兄弟态度写信，要求对布托宽大，但这些信里承认，巴基斯坦内政只有巴基斯坦政府才有资格处理。他说，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劝告，我们最好下台。

早在1978年8月，侨居爱尔兰的一位巴基斯坦商人米尔扎，在当地的电视节目中，说1974年是他在拉合尔靠一批职业杀手的帮助，杀死了艾哈迈德的。他所以要杀死他，是因为他同一次行贿事件有关。然而巴基斯坦法院确定的案情是：布托主使谋杀他的政敌卡苏里，致使卡苏里的父亲遇害。因而，对这位商人的供认无人过问。

1979年2月6日，米尔扎再次供认：使布托被判死刑的那一谋杀案是他干的。他说，他要回到巴基斯坦去证明他的讲话是事实，但巴基斯坦驻伦敦使馆没收了他的护照。

3月29日，布托的律师皮尔扎达，到死牢里和布托会晤了几个小时。他对记者说，布托“在精神上已经作好了问心无愧地到麦加（伊斯兰教圣地）去的准备。全世界将看到一个勇敢的人是如何走上绞刑架的。”皮尔扎达过去在布托政府里担任过财政部长，是布托的左右手。他说，5天来布托只吃流质，看到布托瘦骨嶙峋的模样，他的心都碎了。他还说，申请赦免的期限到31日午夜为止，但是布托和他家里的人不再提出这种要求，看来靠法律拯救布托的希望破灭了。

4月3日，布托夫人努斯特拉和女儿贝齐姬尔·布托得到通知，在布托被处以绞刑以前，可以最后一次会面。布托泪汪汪地同她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面。

监狱发给布托一张纸和一支笔，让他写下遗嘱。但是，布托写后又毁掉了。他洗了澡，刮了胡子，并吃了一顿饭。专门举行了穆斯林的仪式，他念了《古兰经》。随后，监狱的正副狱长进入死囚牢房，宣读下令处死他的黑手令全文。

4月4日凌晨，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布托双手被反缚，在保安人员的押送下，向绞刑台走去。在经过关押犯人们的牢房时，犯人们高声齐诵《古兰经》。

51岁的布托，在死牢里关了一年后特别苍白瘦弱。他穿着自己的服装。当他站在绞刑架上，绞索套在他脖子上时，他讲的最后几句话是：“天哪！救救我吧，因为我是无罪的人！”

在刑场，有一名特派司法官和一些军管官员监刑。按法律规定，布托在

绞刑架上被吊了 30 分钟才砍断绞绳，放下尸体。随后，布托的遗体由一辆军用卡车，送到附近一个机场，经空运送到他信德省的家乡拉卡纳，然后再转运到墓地。在那里，布托的亲属举行了葬礼和祷告。布托的妻子和女儿未能参加，因为她们两人被软禁在城市郊区一个警察所里。

（何景）

布鲁塞尔足球赛惨案

足球，以它那无与伦比的魅力，牵动着千百万人的心，一代又一代的球迷为之倾倒，如醉如狂！但有那么一些球迷过于疯狂，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在绿茵场上肆意滋事。甚至诉诸暴力，酿成惨剧，而沦为“流氓”、“暴徒”。英国球迷一向冠有“足球流氓”的恶名，“哪里有英国球迷，哪里就有球场暴乱”。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源于英国球迷的暴乱更是一场接一场。1985年5月11日，英国布拉福特球场因暴徒放火，而导致木质看台燃烧倒塌，造成56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的惨剧。谁也没想到，仅仅时隔18天，又一场由英国球迷一手制造的球场大灾难又降临了。

1985年5月29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春意盎然，一派节日的气氛。万众瞩目的欧洲足球冠军杯决赛将在该市的海塞尔体育场拉开战幕。

一年一度的欧洲冠军杯赛，是除欧洲锦标赛外全欧洲水平最高的足球比赛，参赛者全是各国甲级联赛的冠军队。从1956年首届比赛起至1985年这29年中，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捧走冠军6次，联邦德国慕尼黑拜仁队和荷兰阿贾克斯队也都曾3次夺标，而意大利一直与奖杯无缘。

本届杯赛，争夺异常激烈。意大利尤文图斯队为了填补历史上的空白，不惜用重金聘来了法国“天皇巨星”普拉蒂尼、波兰主脚博涅克，他们与上届世界杯赛中荣获“金鞋”大奖的“金童”罗西联袂，实力超群，一路夺关斩将，闯入决赛。而他们的决战对手，是英国唯一捧过杯的甲级联赛冠军利物浦队。利物浦队去年击败意大利的罗马队，取得决赛资格，今年再次与意大利球队狭路相逢，他们发誓要击败这支由各国巨星组成的球队，重圆冠军梦。

无疑，这是一场超水平的较量！

下午7点30分，离比赛开始还有45分钟。此刻，整个英伦三岛沉浸在异常的宁静中，几乎每一个英国家庭都聚集在电视屏幕前，耐心地等待着。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也摆脱了浩如烟海的公文，坐到了电视机前。但她并不显得很激动，不久前她翻阅完一份警方送来的有关英国球迷的报告，使她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为防止英国球迷在这场大赛上闹事，从利物浦到布鲁塞尔，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在过海峡的渡轮上，英国球迷们都处于英国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一经发现酗酒闹事，便予以严惩。但是，有两万英国球迷却从奥斯坦德、泽布勒赫和敦刻尔克等地潮水般地涌向比利时，使警方防不胜防。

在海塞尔体育场的各个入口处，自午后开始便发生了几起英国球迷酗酒闹事事件。一帮“足球流氓”甚至打碎了一家珠宝店的玻璃橱窗，公然进行抢劫、抢走价值1千万比利时法郎的金银珠宝。而比利时警方竟没有逮到一个肇事者。这些不祥的迹象，怎么不使首相担心呢？

此刻，电视镜头正对准了圆形球场上紧紧相联的X、Y、Z看台。这几个看台有一个绰号，叫“牲口圈”。因为它们的票价最便宜，观众一个挨一个，相当拥挤，有的人甚至是站着看比赛的。这里的秩序也是全场最混乱的。对此，比利时当局似乎早有准备。为避免两国球迷发生冲突。当局规定英国球迷在X看台，意大利球迷在Z看台，这两个看台之间的Y看台是缓冲区，只容许比利时本国观众就坐。但实际上这些观众却主要是意大利的移民工人，因比赛的组织者们考虑不周，而把这个看台的门票卖给了他们。少数由真正

的比利时人购买的门票，又被意大利球迷以高出原价 30 倍的价格买了过来，因此，Y 看台成了清一色的尤文图斯队的支持者。这样一来，组织者刻意安排的计划完全落空，相互对立的两队球迷竟成了紧邻。从电视画面看，X、Y、Z 看台已经成了一座火药库，混放的炸药随时将爆炸：X 看台上的英国球迷，挥舞着利物浦队队旗，身穿红色球衣，俨然像一帮“红衣野兽”。他们高唱“战歌”，正醉醺醺地将空酒瓶猛烈地掷向 Y 看台上穿白球衣的意大利球迷。一些长发的英国青年，居然用石块猛击对方……不堪入耳的谩骂和侮辱性的手势，表明这个“牲口圈”的一场“大屠宰”就要开始了。

由于 X 看台上的“红衣野兽们”实在太多，拥挤不下，一部分啤酒灌得醉眼惺忪的红衣啦啦队，干脆越过铁栅栏，挤到 Y 看台的高层，与坐在底层的意大利球迷发生直接的冲突。海塞尔球场的气氛再次升级。

“红衣球迷”向“白衣球迷”展开猛烈的攻击，他们用手中的旗杆，用栅栏上拆下来的铁棍，朝意大利球迷砸去。意大利球迷中的坚定分子则以拳相迎。但瞬息之间，从 X 看台飞过来的“红云”越来越多，很快将这片“白云”包围起来。惊慌失措的意大利球迷赶紧越过栅栏，奔到 Z 看台。

“轰”的一声，电视屏幕猛烈地颤抖起来。可怕的景象终于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数以百计的英国球迷，干脆推倒了 Z 看台和 Y 看台中间的铁网栅，铁网栅向 Z 看台倒去。顿时，数十名意大利人被压在铁网栅下。疯狂的英国球迷狂叫着，挥动着酒瓶、旗杆和铁棍，狠命地扫向意大利球迷。

惊恐万状的意大利球迷，为了躲避自上往下倾泻而来的“红衣野兽”浪潮，急忙朝下拥去。数百名意大利球迷被逼到看台下端一堵 10 英尺高的水泥矮墙下。人们慌不择路，爬上墙壁，企图逃到草坪边缘去。

几十名担负治安疏导任务的比利时警察，面对这场大规模的殴斗不知所措，而且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他们以为是一些不守纪律的人在起哄，企图占据比赛场地，于是，这些治安警察拼命地堵住出口，不让人们撤离看台。这么一来，人群便挤压在水泥矮墙前。前排的人被踩在下面，后面涌来的人潮，就像压路机一样从他们身上压过。

突然，陈旧的水泥矮墙轰地倒塌，压住近端的观众，仓皇夺路的人流踩了过去，又将场地铁栏杆挤断，将倒在断杆上的人体撕得稀烂。此时，惨剧达到了高峰。

一个来自都灵的小男孩安德里亚·卡苏拉，他个头小，挤在前排的铁栅栏前，想看个真切，结果压在倒塌的矮墙下，永远不能欢度他 8 月 15 日的 11 岁生日了。人流之下，堆压着几十具人体。有的人胳膊和腿被铁栏杆完全砸断了，有的则被挤断的铁丝网戳穿了喉咙。人们高呼“救命”，而疯狂的英国球迷仍不罢休，一个劲地穷追猛打。利物浦小伙子韦尔科见此惨景，舍命推开球迷们的皮鞋和靴子，奋力从他们脚下救出几个奄奄一息的意大利人，而球迷们的拳头和皮靴却落在他的头上。……瞬息之间，足球盛会变成了面目可憎的屠宰场！

离此不远的主看台左侧，5 名红十字人员面对这场灾难，无能为力，眼睁睁的望着。几十双手伸向他们，那些无法从人群的旋涡中脱身的人发出了最后的呼救。

海塞尔体育场其他看台上的 5 万名观众，还不知道惨剧的严重程度。场内喇叭声、号角声、喧闹声和歌声嘈杂一片，完全淹没了仍在挣扎的垂死者的凄厉叫喊。高音喇叭则要求人们保持安静，广播员还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

打斗。

当“红色旋风”刮过以后，人们赫然发现Z看台上瓦砾满地，血流成河，尸陈遍地，这才齐声惊呼起来：“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这时，场内各看台的意大利球迷纷纷呼喊着报仇，他们也拔起栏杆上的铁棍，要与“红色野兽”拼命。白色浪潮在体育场内汹涌澎湃，追逐着“红色野兽”……

在事情发生半小时后，紧急增援的700名警察和1000名军人才先后赶到现场。他们横在红白浪潮之间，阻挡冲突进一步扩大。但英国球迷仍不罢休，用扯烂的铁丝网和铁棍作武器，转而攻击警察，并发狂地冲入绿茵场……

对球赛进行现场直播的77国电视台中，几乎所有的欧洲电视台为了表示对这场骚乱的抗议，都中止了直播。目睹这一惨剧的撒切尔夫人愤然起身，赶往首相府，她知道这场英国球迷造成的大灾难正等着她处理。

海塞尔体育场成了名副其实的军管下的营地。直升飞机发出凄惨的嗡嗡声，将受伤的人员转运到附近的医院，骑警队的高头大马在来回奔跑，将站在场上的观众驱赶回看台。夜色像灵堂的帷帐似的降临在体育场上。这次惨祸造成38人死亡，其中，31名意大利人，4名比利时人，2名法国人和1名英国人，受伤者达200多人。

惨剧发生时，两支球队的队员正集中在各自的更衣室里，对头顶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后来，惊慌失措的场地工作人员跑来报警，才知道外面出事了。

晚上8点钟，欧洲足球联合会的一位高级官员罗滕布勒来到更衣室，召集两队的队长谈话。他十分沮丧地说：“情况很严重，要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这场比赛是否举行。”

讨论时意见很不一致，意大利尤文图斯队有些队员不想再踢这场球，不愿向惨案的制造者让步。罗滕布勒转身看看他们，他的话生硬而明确。“你们要是不踢这场球，那么，在体育场周围就不是几十个人，而是近百人可能在骚乱中死亡！”

尤文图斯队队长希里亚提议在等候理事会最后决定前，先去现场看看灾难的程度。他带着球星普拉蒂尼、罗西等人，跑向意大利球迷殉难的Z看台。海塞尔体育场已是一座爆发中的火山。他们跑到Z看台上的幸存者中间。受伤的人，处于休克状态的人到处都是。那些幸免于死的人向他们发出绝望的请求：“报仇！红衣野兽杀死了妇女和儿童，你们要报仇啊！”“请你们不要踢了，这是一场可耻的比赛！都死人了，还踢什么球呢！”希里亚和普拉蒂尼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向他们解释为何要继续踢这场球，这是避免更多人死亡的唯一办法。只有比赛才能使头脑已达白热化程度的人们平静下来。

尽管已经有第一批人遇难了，但整个海塞尔体育场依然是一座令人恐惧的火药库，一触即发。仇恨和复仇的情绪在集聚着，只要有一个信号，灾难便会扩大开来。如果不踢这场球，人们一出体育场，必然会出现复仇心切的意大利球迷与醉意初醒的“红衣野兽”之间的追杀。但如果进行比赛，人们的激动情绪会在比赛过程中逐步化解，从而避免更坏的情况发生。欧洲足球联合会的负责人终于作出继续比赛的决定。尤文图斯队的希里亚队长走到体育场广播喇叭前，宣读了号召书，希望意大利球迷保持冷静和克制。

比赛开始了。比原定时间晚了1小时45分钟。英意两队球员心情沉重，但却努力踢出了一场漂亮的球。普拉蒂尼为尤文图斯队踢进了全场唯一的一个球。欧洲足球联合会主席雅克·乔治将欧洲冠军杯授予意大利尤文图斯队。

授杯仪式后，胜利者尤文图斯队并没有按惯例高举奖杯绕场一周，而是跑向有人遇难的 Z 看台，跪拜在它的面前，一方面告慰罹难的意大利球迷，另一方面也对受伤者和幸存者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承受了苦难而不图复仇，自始至终地观看了比赛。这场比赛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失败者。这失败者是狂热的球迷，是英意两支球队，是整个足球运动！英国“足球流氓”的耻辱，将永远记载在世界足球运动史上。

第二天一大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立即召开内阁紧急会议，首相严厉谴责肇事球迷，并要求对这些“足球流氓”依法严厉制裁。她认为英国应当接受全世界的谴责。她亲自致电意大利总统和比利时首相，代表“肇事者所在的国家”表示“羞愧、耻辱和道歉”。内阁决定拨款 25 万英镑，作为抚恤死难者家属基金的最初款项。同时，英国政府也要求英国足球联合会在两年内禁止英国俱乐部队参加欧洲的比赛。撒切尔夫人希望英国能“识相”地主动退出欧洲大赛，不要坐等欧洲足联的逐客令。

5 月 31 日，英国足联被迫决定：英国所有职业球队退出英国人为之倾倒的下届欧洲三大杯赛——冠军杯、优胜者杯和联盟杯足球赛。而利物浦队则在禁令宣布前已自动退出。它知道别无选择。英国森德兰队也被迫退出 6 月在中国举行的“长城杯”比赛。

在大赛的足球场上，数千万名英国球迷，将看不到自己同胞以英国的名义去争取荣誉。惨祸发生的第二天，被首相从墨西哥叫回来的英国足联主席米利奇普，一下飞机就发出痛苦的呻吟：“英国和它的足球，葬送在这帮无法无天的小伙子手中了！”

在梅尔斯布瑞克军用机场的大停机库里，停放着意大利遇难者的灵柩，上面覆盖着意大利绿、白、红三色国旗。比利时国王的弟弟阿尔贝·德·列日亲王和王妃保拉公主，亲自前来向遗体告别。这位意大利籍的公主，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心情，流下了眼泪。几架 C—130 军用飞机，专程将这些灵柩运回意大利，就像他们是在战场上身亡的烈士一样。

当第一批球迷返回英国时，整个社会都怒斥这些害群之马。与此相反，那位在骚乱中“倒戈”，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抢救出 8 名意大利观众的英国青年韦尔科，却成了真正的英雄和英国足球的希望所在。他受到同胞们的赞赏，并作为利物浦市“和平使团”的一员，到意大利去“媾和”。

海塞尔体育场惨案在比利时朝野也引起震动。比利时警方过分的懦弱和大意，也是灾难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事先对 Y 看台观众的真实国籍发生变化没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英国球迷带进整箱整箱的烈酒未加制止；警方人员不足，面对骚乱束手无策，没有及时在 Y、Z 看台之间设置警戒线，增援警力也姗姗来迟。在预防和制止足坛暴力事件上，这些都给各国，尤其是英国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5 月 31 日，英国内阁宣布：在 8 月开始的下一个足球季节到来之前，要力争使国会通过一项对付足球暴力事件的紧急法律，内容有：入场球迷必须事先申请一种会员证，以辨别身份；设立专门供家庭观看的看台，保护妇女和儿童；一律禁止带酒入场；授予警察以更大权力，以及时制止球迷闹事。

英国盛产“足球流氓”，反映出英国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成长的环境并不健康，因此，撒切尔夫人在议会演讲中大声疾呼：“足坛暴力日益猖獗，其原因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青年人缺乏法律观念。无论在家里、学校，还是在公共场合，都缺少一种培养遵纪守法习惯的环境。我呼吁，英国

应当重新创造这种环境。”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连电视节目中都充满了暴力的今天，英国想要创造一个“人人遵纪守法的环境”，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陈齐）

洛克希德丑闻

1989年10月14日，日本前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宣布他将在众议院任满期之后退出政坛。这位在日本主要政党——右翼，的自民党内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日本政治家，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田中角荣几乎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与战后其他首相不同的不仅是他比较年轻（54岁），更突出的是他并非出身于名门望族，而是出身于农民家庭，仅读过小学。他当过建筑工人、职员、记者，写过小说。

19岁开始涉足建筑业。后来他应征入伍，1939年在满洲与苏联军队打过仗。一年后因生病回国，成了一个成功的建筑商。战争结束时，他的建筑公司是日本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

1947年他进入政界，成为吉田茂的法务次官，曾因受贿被捕遭监禁，后经上诉获释。在递信委员会任职时，他引进了商业电视。他经常在电视上露面，以“开发大臣”出了名。

当佐藤荣作首相竞选失败后，田中角荣作为自民党的一个大派系的领袖继任了自民党总裁的职务。这一职务使他成为首相。担任首相期间的田中角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73年石油危机使得能源依靠进口的日本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他是一个不祥的开始。但他顺利地渡过了危机。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问了北京，与中国大陆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他又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这一计划是以一本书的形式发表的。计划中指出一些发展区域，特别是新兴工业城市，这样必然引起了被列入计划地区的地价飞涨。津山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三菱地产迅速买下它附近的土地。在九州南部，有的地方土地价格涨了十倍。这种明目张胆讨好大产业主的做法使得田中角荣在民众中的威望下降。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僚集团阶层把他视为暴发户，不信任他。右翼知识分子杂志《文艺春秋》在1974年十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田中角荣、他的金钱和帮凶剖析”的60页长文，使他名誉扫地。那一年，他购买了价值是他申报收入6至7倍的土地，因而文章指控他把政治资金用于自己个人的目的。《文艺春秋》还揭露他与一位酒吧女招待的关系，这位女招待替他把他大笔钱分给他那一派的成员，讨他们的欢喜。在民意测验中，他的支持率大为下降。1974年11月，他公开承认他进行不明不白的交易使党的名声受到损害，他应当为此负责，并辞去了担任的职务。

然而，辞职并不意味着他作为权力经纪人生涯的结束。作为自民党最大派系的领袖，他理所当然地是制造权力的人，因为他对首相和内阁成员的人选有最后的决定权。随后，在1976年2月，他遇到沉重的打击，这一打击使他被判监禁，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洛克希德丑闻。

这件事始于国外，美国国会的一次调查揭露，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为了将它生产的飞机卖给日本，曾贿赂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金额达5亿日元。

洛克希德公司在日本有两个代理人：一是丸红株式会社，这是公开的；另一个代理则是秘密的，此人是日本全国有名的掮客，名叫儿玉士誉夫。1971年底，洛克希德公司得知日本航空公司已经准备把喷气式客机用于国内航线，全日航也准备购买美国麦道公司的喷气式客机，立即找来丸红株式会社的会长桧山宏，授意他花钱买通关节，挤掉麦道公司的生意；让全日航购买

他们的三星式喷气客机。

桧山宏为此专门拜访了田中角荣，许诺给他 5 亿日元好处费。田中满口答应。

田中心里很清楚，这件事他不宜亲自出面，便授意运输大臣桥本富三郎和运输省次官佐藤，由他们去说服全日航社长若狭得治，答应给他 1.6 亿日元的回扣，请他改变决定，转而购买三星飞机。

1972 年 10 月 30 日，当全日航同意购买三星飞机之后，田中便催着要钱。洛克希德公司将 5 亿日元分四次交付，由丸红株式会社派人把钱放在汽车的后行李箱中，在东京的四个不同地点交给田中角荣的秘书夏本敏夫。

1973 年 7 月，洛克希德公司总裁柯奇安又得到一个消息：日本政府准备购买一批格鲁曼战斗机，用来武装日本海上自卫队。这又是一个生财的机会！柯奇安找来他们的秘密代理人儿玉士誉夫，吩咐他设法把这笔生意夺过来。

儿玉说他认识一个叫小佐野贤治的房地产商，这个人在夏威夷有许多财产，他可以对日本政府的决策人产生影响。不过，儿玉又提出，跟这样的亿万富翁打交道，钱少了不行，至少得要花 5 亿日元。

柯奇安说：“只要事情办成，钱不成问题。”

不久之后，小佐野贤治在美国洛杉矶机场接受一张 20 万美元的支票。然后，他就开始积极活动。他也买通了田中角荣首相，使得日本政府取消了购买格鲁曼战斗机的决定，改为购买洛克希德公司的 F—104 战斗机。

洛克希德公司虽然花了不少钱，但却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如果不是美国国会的调查揭露了真相，这件事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事件曝光后，日本国内舆论大哗。

1976 年 7 月 27 日，田中被东京地方检察院拘留。无疑，这对自民党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为了减轻对党的影响，田中宣布退出自民党。但继续作为无党派人士留在国会里。当然，他还继续充当着保护人的角色，因为自民党内他那一派仍旧服从他的命令。

东京地方检察院首先从全日航的案子开始调查，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购买飞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它拖延了将喷气式客机用于国内航线。为了做成这一桩买卖，运输省推迟了将喷气式客机用于国内航线的决定，直到全日航做好一切准备为止。

经过前期听证之后，东京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洛克希德案件。当法庭传讯田中的秘书夏本敏夫和丸红株式会社的人时，他们都发誓说不知道所发生的事，田中角荣本人也矢口否认。但后来审判时又都露了馅，证明他们都在说谎。

法庭审理结果认为，这个案件中，受贿的不仅是田中和两名运输大臣，还有自民党干事长二阶堂进、前运输大臣佐佐木秀也、自民党航空特别对策委员长福永一巨和前运输省政务次官加藤六月。不过这四个人并没有受到起诉，其原因或是因为诉讼时效已过，或是因为他们对国家航空政策的制定没有发言权。

这个案子一直拖到 1982 年 1 月 26 日才宣判。全日航社长若狭得治和他下面的五个人被在接受了 1.6 亿日元回扣（也算受贿），判处六个月到三年的缓刑；运输大臣桥本富三郎和运输省次官佐藤被判犯有“恳请接受贿赂罪”，分别判处两年半和两年监禁，并没收了贿款。

诉方要求对田中角荣判处最高刑罚，没收其接受的 5 亿日元贿款。冈田

法官将刑罚减至 4 年，这是对受贿罪所判过的最长的监禁。他为田中减刑的理由是：全日航购买的飞机并没有损害日本的航空工业，他没有主动索贿，而且他曾为日本服务了多年。田中的保释金是 3 亿日元。田中仍称自己是清白的，拒绝放弃国会议员的席位。

丸红株式会社的三名中间人被判处犯有行贿、违反外汇管理法和作假证，分别判处两年至两年半监禁。

另一条线索，也就是小佐野贤治和儿玉士誉夫的行贿行为也同时受到调查。

1976 年 2 月 16 日，小佐野贤治因田中事件被叫到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他坚决否认有任何牵连。

至于儿玉，这人在战前就是极右翼的青年，专门从事恐吓活动，充当掮客，名声不好。他在上海充当日本帝国海军的供应商时挣了大钱，战后他成了战争嫌疑犯，但从未受到审判。他利用他的钱帮助建立了自民党。儿玉承认，从 1969 年起，他每年从洛克希德公司领取 5000 万日元的顾问费，但从不超过这个数目。这笔钱是付给他的咨询费而不是销售代理费。另一方面，起诉人估计他收到的咨询费是 10 亿日元左右，指控他作为掮客从洛克希德公司那里总共得到 25 亿日元，偷漏税近 20 亿日元。

经过 10 个月的拖延之后，儿玉 1977 年 6 月第一次在东京地方法院出庭。起诉人无法将他与贿赂官员联系在一起，但集中指控他偷漏税和违反外汇管理法（没有经过日本银行授权而从美国公司那里接受大笔费用）。起诉书说儿玉从 1958 年起就是洛克希德公司的秘密顾问，他并没有签合同，而且总是要用现金来支付他的咨询费。

美国参议院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证实儿玉是洛克希德公司的秘密代理。日本法庭接受了该小组委员会的证据，同时也接受了洛克希德公司的经理人员柯奇安和克拉特的证词，他们是在得到允诺不在日本受到起诉后提供这些证词的。诉方要求判处儿玉三年半监禁和 7 亿日元罚款，此外还证实了他的偷漏税行为。另一方面，诉方无法说明儿玉是如何将洛克希德公司的钱转到政治家和官员们手中的。

人们很自然会猜想，像这样大的一个政治和经济丑闻，首先会使田中角荣在全国威信扫地。的确，《文艺春秋》在 1974 年所做的调查迫使他辞去了首相的职务。在他被判刑的那一天，反对党在全国 230 个地方组织了示威游行，有 35 万人参加，要求田中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在东京，示威者在明治公园举行集会，然后走上大街高喊口号：“田中，快进监狱！”但自民党田中派却支持他。在新泻县，他的选区有一个强大的集团也支持他。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日本的主仆政治传统的巨大力量。田中角荣多年来对他的支持者的关心，现在得到了报答。他的处境越艰难，他的派系成员越不可能抛弃他。派系的一位发言人渡边毫不掩饰地说：“尽管一般外行认为洛克希德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政治家不那样认为。大多数政治家同情他……一个政治家的钱是否‘不干不净’，应该以他如何花这些钱来判定。”渡边还说，“在政界，难道还有别的像田中先生这样让人信赖、让人着迷的人吗？”

洛克希德丑闻的反响在选举中也可以看出：在 1983 年 12 月众议院选举中，在田中保护下上台的中曾根康弘所领导的自民党失去了 30 多个议席。没有取得众议院的绝对多数。另一方面，与洛克希德丑闻和其它丑闻有关的政治家又重新进入国会。那个选举年的年初，在京都大学和哈佛大学受过教育

的政治作家小室直木表达了许多人的观点：“我喜欢、热爱、敬仰田中角荣先生。他是日本唯一可以称得上政治家的人。”

小室直木把田中角荣描绘成为一个思想、行动果断的人。说他接受洛克希德公司的贿赂和今天政界的腐败相比，大不了和从超级市场偷一卷卫生纸一样。他说、战前日本的政治家很少有腐败的，结果却把国家引入了一场战争灾难，腐败是日本人为民主付出的代价。

这种怪异的情感在日本西北部田中发迹地方更是处处可以感受到。田中总是利用他对公共建设项目的影晌来促进他的选区的发展。新泻是个“雪国”，以大雪和稻米著称，但它远离日本主要工业区。现在那里有了一个国际机场，一所新大学，新交通干线也从那里经过。

1983年新泻的人均公共工程投资在日本的47个县中名列第一。在洛克希德丑闻发生后，新泻人民仍把田中角荣称为他们的最好的儿子，远远排在珍珠港事件的胜利者、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之前。1983年，田中角荣被判罪两个月之后，新泻人民又把他选入国会。

反对党要他辞去议员职位的呼声并没有使他稍感不安。最后，还是老天爷插手了。1985年2月27日，田中患了不太严重的中风，身体右侧瘫痪，讲话开始语音不清。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医生宣布他的病情比他们预料的要严重。他无法再进行政治活动了。原先自民党内的田中派系逐步转到中曾根内阁的大藏大臣竹下登手中。

1985年6月6日，田中角荣关闭了他的办公室，由他女儿陪同，到一个疗养胜地作康复疗养去了。

（孙化）

总理府的枪声

1984年10月31日上午，一辆电视采访专车，从繁华热闹的新德里市区驶向印度总理府。车上乘坐的是爱尔兰著名影星乌斯蒂诺夫率领的电视小组。他们将在英迪拉·甘地总理官邸的花园里架设摄像机、摄影机和各种音响设备，准备在10点钟采访这里的主人。这个电视小组不远万里而来，是专程为甘地夫人拍一部20分钟的纪录片的。

英迪拉·甘地原来准备取消这次会见，因为她的孙子拉胡尔和孙女普里扬卡在头一天的交通事故中受惊，而他们的父亲拉吉夫·甘地在西孟加拉邦参加竞选活动未归。自幼饱尝孤独之苦的甘地夫人，对儿孙倍加爱抚，她本想留下陪伴孙儿孙女，但是这位在1964年就担任内阁宣传部长的政治家，深知宣传机器的份量，于是忍痛改变初衷，准备接见客人。

这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很早起床，和孙儿们用过早餐后，这位刚毅自信的67岁的女总理，身着橙黄色的莎丽服，在贴身保镖、锡克族警官本特·辛格陪同下，前往总理府办公室，商议访问内容。

印度的总理府，占地70亩，这里环境优雅，芳香袭人，住宅部分与办公室部分的面积大致相等。住宅坐落在总理府的东半部，办公室在西半部，总理官邸和总理住宅两座建筑相距几十米，中间是绿茵茵的草坪和雅致的花园，两部分之间由一长条矮灌木丛分隔，灌木丛中央有一座布满九重葛的拱门，有活动木栅充当闸门。

9时18分，甘地夫人在本特·辛格陪同下，轻轻推开住宅通往花园的大门，走下台阶，踏上花园中的一条砂石小道，来到拱门前，她永远也不会想到，此时的她，正在跨入地狱的门槛。

离拱门只有三步了。本特·辛格本能地低低喝了一声口令，拱门边的锡克族卫兵萨特万特·辛格倏地托起冲锋枪向总理致礼。

这是例行礼仪。每天，当甘地夫人走过这个拱门的时候，卫兵总要向她举枪行礼。今天，她不可能意识到她是最后一次接受别人向自己致敬了。

四周一片静谧，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鲜花的芳香与温馨，只有莎丽服在甘地夫人走动时发出的沙沙声，和跟在后面的本特·辛格脚步声。

她和萨特万特·辛格并行了。

她轻步越过了卫兵。

这时候，一直跟在甘地夫人身后的本特·辛格突然加快了步伐，三步并作两步超越了甘地夫人。趁甘地夫人还没有从诧异中醒悟过来，他猛然转过身来，探手到头巾内抓出一枝左轮手枪；萨特万特·辛格也慌忙将刚竖起的冲锋枪平放，冲锋枪随即吐出长长火舌，横扫甘地夫人。

“哒哒哒哒……”骤然而起的一阵枪声划破了周围的寂静。甘地夫人只觉得猛然一震，脚下好像踩上了一大堆棉花，她努力使自己侧过身；她看到两只黑黝黝的枪口阴森森地对着她枪声又是一阵脆响，子弹像是一股冷风，凉冰冰地钻进她的胸腔，穿过她的肌体。

英·甘地总理一声不响地倒下了，仰面躺在铺满砾石的小道上，鲜血泉涌般地喷射出来，洒在橙黄色的莎丽服上。从此她生命之光在这条留下她无数足迹的花园小道上消失了。

听到枪声之后，英·甘地的大儿媳索尼娅光着脚从屋里冲出来。她刚送走婆婆去上班，这密集的枪声使她的第六感官意识到事情不妙，她急忙推开

家门，沿着小道向总理官邸跑去，到拱门时，发现婆婆倒在血泊中。

与此同时，在总理办公室外等候甘地夫人的乌斯蒂诺夫摄影小组正在忙碌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他们驻足侧耳细听。乌斯蒂诺夫认为，总理府的花园哪来的枪声？大概是爆竹声吧？接着又是几声枪响和一阵喧闹，乌斯蒂诺夫这才断定是枪声！这位影星立即冲着枪声传来的方向，向出事地点跑去，沿途没有受到阻拦。因为现场混乱，警卫人员惊慌失措，东奔西跑，乌斯蒂诺夫赶到时，映入眼帘的情景使他惊呆了：10点钟准备接受他采访的英迪拉·甘地总理，此时已倒在血泊之中；她的大儿媳索尼娅和几个卫兵正围着她的身旁抢救。

甘地夫人的亲信助理达温早已赶到、在达温的指挥下，大家很快镇静下来。他们一方面客气地阻止乌斯蒂诺夫和摄影小组进入现场，直到5小时后，搞清他们没有拍摄足以作为证据的行刺过程才获准他们离去。另一方面，警卫执行操练得纯熟的应变计划。

4个警卫扛起血流如注的甘地夫人，由另6名警卫团团围绕，与达温和索尼娅一起跑向一辆白色的大型房车。这辆由印度出产的汽车，特为甘地夫人而制，除了防弹装甲之外，还有防弹轮胎。在车上，索尼娅让甘地夫人枕在膝上，搂着她的头。房车以警笛开路，飞驰到附近的全印医学研究院，这是印度最现代化、设备最完善的医院。一个由12人组成的医疗小组，早已接到了总理府保安主任通知，甘地夫人一抵达，立即送到8楼的外科手术室。

虽然甘地夫人送抵全印医学研究院时，表面上毫无生机，但医疗小组仍然竭力抢救，希望制造奇迹。医疗人员首先给她接上俗称铁肺的人口呼吸器，为她取出胸、腹、腿内16个弹头。在这个过程中，医生不断为甘地夫人输血，由于伤口太多，血如泉涌，全印医学研究院血库的血很快使用完，要由其他医院赶快送过来。共用了88瓶型血液。等到医院血库的同型血液都用尽时，医生向聚集在医院外面的群众呼吁捐血。有大约200个人拥向前来愿意捐血。

上午10时，甘地夫人的肺和肾终于停止功能。到了下午2时30分，医疗小组正式宣布她死亡。事实上，甘地夫人送抵全印医学研究院前已死亡，但医生正式宣布死讯时，在医院会议室等候消息的内阁部长，初步反应是不相信，继而痛哭流涕，如丧考妣。

设在内政部的应变小组，直到黄昏时分才公布甘地夫人的死讯，顿时，印度首都新德里一片愁云惨雾。

根据事后调查，这次“九重葛门之变”，是锡克教徒因为甘地夫人下令血洗金庙而采取的报复行动。

参与这次行刺阴谋的全是锡克教徒，大约6至12人，其中并无军人在内，除了一二个平民之外，全是信奉锡克教的北部旁遮普邦警务人员。

锡克族是印度的少数民族，他们信奉的锡克教是仅次于印度教的另一个主要宗教，教徒有400万人。这个教派出现于16世纪，创始人是那纳克。他试图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融为一体，反对印度的种姓制度，教徒终生不理发，不刮胡子，甩长巾裹头，他们性格刚毅，骠悍尚武，在印度军队的总人数中占十分之一。

锡克人名字后面都有“辛格”二字，意即“狮子”，象征勇敢凶猛；这个民族曾为印度独立作出巨大贡献。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的2000多人中，他们占四分之三。在阿姆利则市，有一座通体镏金的寺庙，教徒们誉为“锡克教

圣冠上的宝石”，它是锡克教徒最神圣的礼拜中心。从 1982 年起，为争取旁遮普邦更大的自治权，锡克人同政府发生矛盾。同年 10 月，锡克教领袖宾德兰瓦勒，在锡克教徒的活动中心阿姆利则金庙设立了总部，公开向印度政府挑战。金庙成了锡克人搞反政府暴力活动的据点。政府指责好斗的锡克人在金庙内储藏大批军火和窝藏犯罪分子。英·甘地总理曾多次同他们进行谈判，但均告失败。

1984 年 4 月 4 日，英迪拉·甘地宣布旁遮普邦为“危险的骚乱地区”，并调派了大批保安部队进驻旁遮普邦，维持这一地区的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二天，宾德兰瓦勒就在金庙的集会上，号召锡克人“迎接这一挑战”，要求各村集资集物，准备抗击政府军的“侵略”。他对政府军的威胁不但不后退，反而采取以牙还牙行动。因此，印度的一家报纸评论，印度政府对旁遮普邦实行军事管制并武装包围金庙，“实际上是为了对付一个人——宾德兰瓦勒”。

1984 年 6 月 2 日，印度政府宣布出动陆军部队，控制旁遮普邦的局势。几万名全副武装的政府军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向阿姆利则金庙发动了猛烈攻击。一时间，枪声震天，血肉横飞，几千名锡克教徒顿时饮弹身亡。金庙被血洗了，武装分子在宾德兰瓦勒的指挥下，利用塔楼顶部的有利地形拼死抵抗。每一座建筑都要经过激烈争夺才能易手。直到 7 日黎明，政府军才攻克了这座三层楼的建筑；宾德兰瓦勒在进行殊死抵抗后，被迫自杀了。

在进攻金庙的同一天，印度军队还对旁遮普邦的 30 处锡克教寺庙同时采取了行动。占领金庙后，又对武装分子进行搜捕。被捕人数多达 700 人。

自从血洗金庙以来，一些锡克教徒发誓要进行血的报复。他们扬言，要用印度教徒的血，来祭祀他们的圣宾德兰瓦勒和死去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首先选中的是英迪拉·甘地夫人，其次是她的长子拉吉夫和总统宰尔·辛格。

宰尔·辛格也是个锡克教徒，他之所以被列入暗杀名单之中，是因为愤怒的锡克教徒指责他事前并没有制止血洗金庙的行动，事后不仅没有支持锡克教，反而站在甘地夫人的立场上。

金庙事件后，暗杀总理的谣言不胫而走，这位态度强硬的总理听到传言后，似乎不太在意。只是负责甘地夫人安全的保安首长，已把原来的锡克教徒为主的特别警卫队撤换大部分，只留下少数锡克教徒。这些获得留在总理府的特别警卫队中的锡克教徒，都被认为是忠心耿耿的人。

本特·辛格和萨特万特·辛格，是留用的少数几个锡克教徒中的两个。这两个人不仅获得警卫队指挥官信任，也获得甘地夫人信任。但是在他俩眼里，英迪拉已不再是个受人尊敬的总理。因为她下令杀死了几千名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杀害了他们最崇拜的圣宾德兰瓦勒，烧毁了锡克教徒的圣地金庙，对锡克人犯下了血腥罪行。他们暗自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杀死甘地夫人，为金庙事件雪耻。

宗教，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力量；宗教掀起的狂热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在此之前，本特·辛格和萨特万特·辛格一直在寻找机会。第一次行动安排在 10 月 14 日。他们计划是本特·辛格上岗前将一颗手榴弹藏在大包头布里，当甘地夫人中午从办公室出来回家吃饭时，向她扔过去。但那天甘地夫人正好有事，一直到本特·辛格下岗她也没走出办公室。第二次行动安排在 10 月 27 日，但又未成功，正当本特·辛格想动手时，附近走来了几个人。

本特·辛格不愿滥杀无辜，因此只得作罢。

昨天下午，本特·辛格作好第三次安排。他已经打听到，第二天早上9点半左右，甘地夫人要在办公室接待客人。他决定在甘地夫人去办公室的路上行刺。

本特·辛格原定于10月31日星期三下午，在总理府执行警卫任务。萨特万特·辛格原定也在同一天上午在总理府担任站岗警卫任务。两人在同一天值勤，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惜只是未能在同一时间值勤。结果还是经验丰富的本特·辛格想出计谋。

本特·辛格先以私人事务为理由，与一个原定上午值勤的警卫调班。这样，本特·辛格便可与他的同谋萨特万特·辛格同在上午值班。

接着，本特·辛格利用他的年资和官阶，取得他可以随意在总理府内走动的差事。对于他的同胞来说，本特·辛格星期三值班和调差，并无不寻常之处。

几个月前，金庙事件之后，一个外国记者目睹甘地夫人的警卫之中有锡克教徒时，曾询问她是否觉得安全。甘地夫人的答复是，夸赞随侍在她身旁的本特·辛格忠心耿耿。直至在遇刺前不久，情报首长接获关于锡克教徒的情报后，建议甘地夫人更换警卫队中的锡克教徒时，仍遭甘地夫人的拒绝。

甘地夫人与本特·辛格相识将近8年，对他完全信任，信任程度达到经常差遣本特·辛格驾车接送她的孙儿孙女上学的程度。

本特·辛格的同谋萨特万特·辛格，在实行暗杀之前两天才销假恢复执勤。萨特万特·辛格原籍旁遮普邦古达期普市，该市是死硬派锡克教领袖班达伦华尔支持者的根据地。班达伦华尔在印度军队强攻金庙时丧生后，他的徒众都跑到古达期普。萨特万特·辛格度假期间耳闻目睹印度军队的暴行之后，义愤填膺，与本特·辛格一拍即合，准备了这次暗杀行动。他在这天早晨值班时，向上司表示自己拉肚子，要求在总理府其中一幢建筑物附近站岗，以便他需要时可以使用卫生间。结果萨特万特·辛格如愿以偿，被分派在办公室与住宅之间的九重葛门下站岗。

就这样，当10月31日上午，本特·辛格同甘地夫人走过住宅草坪，来到拱门时，震惊世界的暗杀事件发生了。

甘地夫人倒下来，她生命之火被自己的贴身警卫无情地熄灭了。

值得一提的是，暗杀事件一发生，保安部门立即行动。在现场，除了遇刺倒下的甘地夫人之外，还有当场被击毙的本特·辛格的尸体。在拱门值班的萨特万特·辛格也受到重伤躺在那里。事件的唯一外围见证人彼得·马斯蒂诺夫首先受到盘查。他回忆说，一阵急促的枪声后，又听到一阵枪声。他分析，凶手可能是抓起来后被打死打伤的，显然是为杀人灭口。本特·辛格这个33岁的锡克侍卫官，是甘地夫人最信任的保镖之一，为什么他率先下手行刺，而又是谁当场将他击毙？是否有大人物参与策划，是否有外国背景？这一系列疑团都是由于主犯当场被击毙，给历史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另外，锡克人仇恨英迪拉·甘地政府已有数年之久，令人不解的是，她为什么对身边那么多锡克卫士没有提防？如果她有先见之明，将锡克卫士撤换，也许就可以避免这次杀身之祸。公众舆论对此说法不一。总统宰尔·辛格是个老国大党人，与尼赫鲁祖孙三代关系密切。当年甘地夫人极力把他推上总统宝座，不仅仅由于这一点。她知道，他是个锡克人，而锡克之乡的旁遮普邦局势动荡。有人认为甘地夫人失策之处，是她过于自信，把宰尔·辛

格的桥梁作用看得过重。另外，金庙流血事件后，锡克人同政府的矛盾日益加剧，但为了国家的安定，甘地夫人不想在一些小事情上再伤害锡克人的感情。但这样反而纵容了锡克人。因此，有人说，甘地夫人是被自己的姑息态度和政治手腕葬送掉的。

就在甘地夫人遇难当天下午，正在西孟加拉邦参加竞选活动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匆匆赶回新德里。母亲饮弹身亡使拉·甘地极度悲愤，他惊魂未定便参加了国大党政府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会上，拉吉夫·甘地被推举出任新总理，成了尼赫鲁家族的第三代印度领导人。

新总理拉吉夫·甘地青年时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从政前是飞机驾驶员。他喜欢干实业，从来和政治没有缘份。他的弟弟桑贾伊·甘地则不同，他有和母亲同样的气质，在他身上，遗传着母亲同样的政治才干。知子莫如母，甘地夫人早就选中次子进行培养，希望他将来接班掌权，以维持尼赫鲁家族对印度的统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甘地夫人精心培植这株政治幼苗时，桑贾伊却不幸于1980年驾驶滑翔机时坠机身亡。

小儿子桑贾伊的过早夭折，使甘地夫人悲伤之至，她只好另选他人接班掌权。甘地夫人终于说服老实忠厚的长子拉吉夫弃业从政。拉吉夫做了母亲的助手。

母亲遇刺后，年仅40岁的拉吉夫·甘地在全国一片骚乱中，毫无精神地走马上任，成为这个有7亿人口的文明古国独立后的第4任总理。

不出当局所料，总理遇刺，在全国尤其是新德里引起一片骚乱，烧、杀、抢事件屡屡发生。人们一见锡克人就打，甚至把锡克人从汽车里拖出来，活活打死。新德里到处充满了仇恨的情绪，锡克人汽车被烧毁，商店被洗劫一空。当时的印度报道称之为“黑色的星期三”。

面对这种局面，新总理当晚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紧急呼吁全国各阶层人民，在这“极度悲痛的时刻”，保持镇定和最大限度的克制，恳求各政党、各教派协助政府渡过难关，维护印度的完整和荣誉。

英迪拉·甘地的灵堂设在她先父、已故印度总理尼赫鲁纪念馆。

11月1日，即遇刺的第二天，她的遗体在她儿子的护送下，用装饰着鲜花的炮车从官邸运到纪念馆。遗体上覆盖着印度三色国旗。印度总统宰尔·辛格和副总统首先前来吊唁，并献上花圈；接着而来的是政府内阁成员和各界社会名流。

在整个瞻仰遗体期间，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川流不息，人们为印度失去一位杰出的总理而悲痛万分同时又为这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深恶痛绝。

轮流守灵的还有甘地夫人的儿孙们。她生前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无限的感情，就在遇刺的早上还与儿孙同桌进餐。

11月3日是英迪拉·甘地总理举行国葬的日子。国葬仪式是典型的印度教徒的宗教仪式，在新德里附近的米木拿河边，离她父亲尼赫鲁火葬不远的和平森林里举行。

这一天上午，灵车从尼赫鲁纪念馆开出来，在拥挤不堪的大街上缓缓移动。前来送葬的60多万人使灵车几乎无法通行。人群中有的愤怒。有的哭泣，更多的是悲哀。灵车在12公里的路程上竟然走了三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时，米木拿河畔10英尺高的灵台上，已经架好下包括檀香木在内的200多公斤柴火。甘地夫人的家庭牧师主持了她的葬礼。这位牧师，20年前为她的父亲尼赫鲁，4年前为她的儿子桑贾伊主持了同样的葬礼。

下午 3 时 50 分，火葬仪式正式开始。甘地夫人的遗体被送上柴堆，在吠陀经的朗读声和低回、悲壮的哀乐声中，长子拉吉夫·甘地手持火种，围绕母亲的遗体走了七圈，然后将柴堆点燃。尸体随着柴堆缓缓燃烧，化作缕缕青烟，悠悠然向太空飘去。

亲属们放声痛哭。印度总统宰尔·辛格和副总统以及政府高级官员都默哀致敬，祝愿甘地夫人不朽的灵魂得到自由。参加葬礼的 50 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特使，也模仿着亲友和印度官员的做法，每人手中拿着一片草叶，依次向燃烧着的柴堆投放，绕灵台转一圈，向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

柴堆和遗体继续燃烧，人们神情专注地肃立在周围，望着袅袅升空的青烟，不由追忆这位政治英才杰出的一生：英迪拉 1917 年 11 月 19 日生于印度北方邦的圣城阿拉哈巴德市，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独生女。她家是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族，她祖父是著名的大律师。英迪拉的童年正处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动荡岁月之中，祖父母和父母经常被捕入狱，不满 5 岁的英迪拉经常到监狱去探视亲人，政治过早地来到了她稚嫩的心田。

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英迪拉从小立志从政，对于家庭琐事，甚至婚姻大事都毫无兴趣。后来，青年律师费罗兹·甘地闯入她的家庭，并经常出入尼赫鲁家，受到了她父母的赏识和好感。1942 年英迪拉与费罗兹举行了婚礼，二人刚度完蜜月，又因参加独立运动而双双被捕。1960 年，费罗兹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1947 年，尼赫鲁出任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英迪拉作为父亲的助手和总理官邸女主人的双重身份，开始参政。在国内，她主持总理官邸事务，起着“第一夫人”（她母亲在她 19 岁时不幸早逝）的作用；在国际上，她随父亲出访许多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她见过蒋介石、西哈努克和杜鲁门总统，后来随父访华，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又随父参加了在雅加达举行的万隆会议。

1964 年，尼赫鲁总理病逝。英迪拉·甘地担任了夏斯特里政府的宣传广播部长。1966 年，夏斯特里总理病逝，英迪拉·甘地竞选获胜，当上了印度历史上第三任总理。这位“第一千金”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她当权 12 年后于 1977 年大选失利后下台。

1980 年，她东山再起，在人民院大选中以绝对多数的优势击败对手，再度出任总理，直到 1984 年 10 月 31 日遇刺身亡。

英迪拉·甘地从政 40 年，先后担任总理近 17 年，如果说，她的家族在打下江山之前，为印度摆脱殖民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话，那么，她本人则为巩固印度的独立，为印度的发展和建设献出了全部心血。

灵台上的青烟持续了一天多。火化完毕后，牧师将圣水洒在骨灰上，冷却的骨灰分别装入 31 只骨灰瓮中，然后撒在印度各地，以了却这位政治家的报国心愿。

人们还没有忘记，在总理遇刺的前一天晚上，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她曾这样宣称：“我的每一滴血将会贡献给国家的成长、壮大与强盛。”这番好像和国人诀别的豪言壮语，确实反映了这位政治家的胸怀与气魄。

英迪拉·甘地的性格以“强硬”而著称，她的名言是：“我是怎么样的人便是怎么样的人，没有人可以改变我，我无惧也无悔。”她曾这样为自己辩护说：“有人认为女人体力上的耐力比男人差，然而我肯定比我周围的男

人更强。”但遗憾的是，这位铁腕女总理驰骋政坛 40 年，最后倒在自己认为“最安全”的总理府。

甘地夫人一家的悲剧，并没因她的遇刺身亡而结束。她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在接任总理的几年之后，也于 1992 年遇刺身亡。拉·甘地比他母亲死得更惨：他是在竞选过程中，一名据说是受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游击队指使的年轻女子，在向拉·甘地总理献茉莉花环时，弯腰吻他的脚时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烈性炸药……政治斗争太残酷无情了，因此拉·甘地的遗孀发誓说，甘地家的人从今以后再不从政了。

（贺兰）

西班牙折箭始末

1965年1月15日上午10时22分，一架美国B—52E型战略轰炸机和一架KC—135空中加油机，从地中海飞临西班牙帕洛马雷斯上空约一公里处。这架B—52飞机正在执行例行的战略巡逻任务，弹药舱内装载的并非一般炸弹，而是4枚马克28型氢弹。每枚氢弹为200万吨TNT当量，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广岛爆炸的那枚原子弹的160倍。这架载有7名机组人员的B—52飞机，像往日一样从后方靠近KC—135，正准备加油时，突然发生意外，B—52的机首撞在KC—135的尾部上。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两架飞机失去平衡，双双坠落。

多年以来，帕洛马雷斯附近的居民和海上的渔民们，对巨型飞机每天上午在空中例行加油的场面，早已熟视无睹，司空见惯。但今天这声雷鸣般的爆炸声却震撼了周围6英里的地区。许多平常已不对空中加油作业感兴趣的人，也纷纷跑出家门，想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赫然看到，在加油机后下方飞行的轰炸机已经爆炸，化成一个烈焰四射的火团，加油机摇摇摆摆地向前飞了一会儿，也开始解体。200多吨燃烧着的飞机残片，散布在空中，朝地面落去。

农民胡利奥正在帕洛马雷斯村西头浇灌自家的柠檬园，他闻声向上望去，正好看见两机对撞爆炸，他顿时吓得呆若木鸡。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砸在他家屋顶。他边跑边发疯似地呼唤正在房子南边浇水的妻子：“玛丽亚，天上掉火团啦！快跑！”他一把抓住妻子的手，与她一起逃了出去。胡利奥回头一望，只见那团火球掠过他家屋顶，轰地撞在屋后30码的路上。一股浓烟从那块飞机残骸上升起。胡利奥和玛丽亚跑了过去，只见那是加油机的一段座舱，里面有3个被安全带缚在座椅上的人，其中两人已经死去，另一个失去知觉，但还发出微弱的呻吟声。等他们用土扑灭烈火，却发现那人也死去了。夫妇俩低着头，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

正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加西亚也看到了飞机碰撞。他吓得飞奔，一个大火团在他身后落地，原来是B—52飞机燃烧着的机翼和发动机残骸。

五颜六色的降落伞在空中绽开，有些伞下系着人，有些却吊着古怪的东西。其中一顶伞下吊着一个大座椅，上面缚着一个人，重重地落到何塞的田里。着陆时，座椅往前一翻，椅上的人脸朝下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何塞老婆尖叫起来：“他死了！他死了！”

何塞生气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说不定我们能救他哩！”他们跑到那飞行员身边，轻轻地给他翻了身。他果然没死，但伤势很重。他就是34岁的布凯雷少校，B—52飞机上的雷达导航员。撞机时，他按了弹射按钮，连同座椅一起弹离飞机。不知怎的，座椅竟没跟人分离。他好不容易才打开降落伞，但座椅增加了大约200磅的负荷，大大加快了下降的速度。他的脊椎骨撞成骨折，身上被烧伤，嘴里不停地咕哝着：“我冷得厉害，我冷得厉害。”不一会，他昏了过去。何塞夫妇把他抬上一辆路过的卡车，送往附近的诊所。

距海岸5英里的海面上，“多丽塔”号渔船正在进行拖网作业。船主马丁内斯看见有几顶降落伞飘落下来，立刻向船员们喊道：“赶紧收网！”

船员们尚未执行命令，他就开足马力朝一英里外飞行员将要落水的海面驶去。6名船员吓得面面相觑，还以为他疯了，全速前进时，怎么能收起沉

重的渔网呢？

马丁内斯驾船及时赶到落水处，几分钟后，把那个飞行员救上了渔船。遇救者是 30 岁的温道夫上尉，B—52 飞机的机长，他的左臂骨折了。

离船 200 码的地方，又有一顶降落伞落在水面。“多丽塔”号驶过去，船员们扔给落水的飞行员一个救生圈，把他拉上船。他是 26 岁的少尉鲁尼，B—52 飞机的副驾驶员。他的臀部负伤，船员们为他包扎好伤口，替他换上干衣服，并用毯子把他裹起来。

飞机相撞时，渔民奥尔兹正驾驶着“西莫”号渔船，在“多丽塔”号后面两英里处捕鱼。他看到天上有两顶降落伞飘过来，其中离他较远的一顶正飘向他表兄阿尔索的船。他赶紧用无线电与表兄联系。阿尔索驾船向前。飞行员刚一落水，阿尔索就把他救上船。他是 44 岁的少校梅新杰，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名参谋，作为温道夫的替班飞行员，共同驾驶 B—52 轰炸机作长途飞行。

奥尔兹追踪的降落伞，下降速度较快，伞下挂的不是人，而是闪着银光的金属圆柱体。奥尔兹眼看着它溅落水面，他赶到那里，那东西已沉下去了。这显然是个重要的东西，否则不会系在降落伞下。于是，他暗暗地把溅落点的方位进行粗略的估算，并当场作了记录。他作梦也没有想到，这简单的工作竟使他不久便闻名于世了。

此次撞机空难，有 7 名优秀人材死于非命，其中包括加油机的全部 4 名机组人员，以及 B—52 轰炸机上的 3 名飞行员。然而更为严重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仅仅是飞机残骸和人，还有 4 枚氢弹！在帕洛马雷斯村东，距爱德华多房屋大约 75 码的地方，有一件沉重的东西坠落在西红柿梯田的石头墙上。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爱德华多房屋内的玻璃窗全被震得粉碎，那段护墙和西红柿田也被炸了个大坑。爱德华多和另外几个农民跑到梯田上，发现有一件东西正在燃烧，他就用脚去踢它，并撒上一些土，把火扑灭。爱德华多事后才知道，他用脚踢的那东西，竟是一颗氢弹，不禁吓得魂飞魄散。

这天上午，有两组空中加油机和 B—52 轰炸机在空中作业。撞机发生时，另一组飞机尚未完成对接，加油机上的飞行员亲眼目睹了这场爆炸。他立即通过无线电，向设在莫隆的空军基地报告：“一架 B—52E 飞机在加油时起火下坠！”

这一惊人的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空军第 16 航空部队司令威尔逊少将那里。他深感问题严重，迅即通过热线电话与美国国内奥费特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联系。此刻，在美国已是凌晨 4 点 35 分。“叮铃铃”的电话铃声，使战略空军司令爱森哈特少将从睡梦中惊醒。威尔逊向他报告：“十几分钟前，在西班牙的东南部折断了箭！”

“折箭”是暗语，意思是发生了核事故。

爱森哈特指示威尔逊，必须将 B—52E 轰炸机上所载 4 枚氢弹尽快回收，速将所需专家和设备报来，一切都会如数得到满足。

威尔逊旋即向灾难控制部队下达了简短的命令。这支部队共有 43 人，由受过特殊训练的现役军人组成，专门负责处理意外事故。他们中间有医生，还有维修、通讯、易爆物处理等各方面的专家。这支部队不久就飞往出事地点。

自核武器出现以来的 20 年中，美国已有 11 次“折箭”事故。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一个月前，即 1965 年 12 月 5 日，美国“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

上一架载有一枚马克 43 型氢弹的天鹰式歼击机，因制动系统出现障碍，在准备起飞时，滑落到日本冲绳以东 110 公里的海底。由于此处深达 4800 米，氢弹的搜索工作以失败而告终。想不到事隔一月，又发生了这起事故。而且发生在外国的领土和领空，这尚属第一次。

在马德里，驻西班牙美军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多诺万少将，担心这起核事故会导致一场政治危机。坠毁的 B—52E 轰炸机属美国战略空军的戒备部队，常年在空中巡航，一旦美国及其盟国遭受核打击，它们就立即攻击预定的目标。因此，敌对阵营国家有可能借此向美方提抗议。于是，他马上挂电话给美国驻西班牙大使比德尔，要他紧急会见西班牙外交大臣，使美国的忠实盟友有所准备。

至于坠落的氢弹是否会发生核爆炸，作为知情者的多诺万少将，倒并不担心。一来核弹本身结构具有严密的安全防范性能。要起爆一枚氢弹，必须使其中的核物质均匀而紧密地压缩，即裹在核弹芯外面的高爆物必须向内均匀爆炸，稍有不均，核物质受压就不均匀，核爆炸就不会实现。因此，万一核弹发生意外，从极高处坠落地面，或在高温中燃烧，引起爆炸，也仅仅是冲击一下核弹芯，即使弹壳炸裂，造成物质溢散，核弹本身也不会出现核爆炸。美国的每一枚核弹，都经过彻底的检验，在各测试点进行过长达一年的一系列撞击或燃烧检测，决不会也从未发生过一次意外的核爆炸。二来核战略轰炸机投入战斗的操作程序极其严格。首先，B—52E 的机组人员必须是由医学权威严格确认的身心健康者，当他们一致认定接到美国总统亲自口授的开战指令时，才能投入核战。其次，要起爆一枚核弹，必须由处于机内不同位置的这些操作人员，分别进行解除保险、起爆等操作程序，而且操作必须准确无误。也只有在这时，核爆炸才会发生。

就在西班牙政府被告知的同时，一场兴师动众、耗资巨大的搜寻氢弹的行动开始了。

美国时间 7 时 27 分，一架空军运输机载着核事故调查队的人员，离开新墨西哥州的柯特兰空军基地，前往西班牙。他们将与威尔逊将军磋商，并进行实地考察。

空中爆炸发生后仅 14 分钟，一队西班牙皇家警察就赶到现场，带领村民搜索出事地区。到下午 3 点多钟，所有大块飞机残骸都被拖走了。7 位飞行员的尸体也放进棺材，运往附近的公墓，等待美国人前来认尸。

威尔逊将军迅即赶到帕洛马雷斯。在肃穆的气氛中，将军打开棺材，默默地望着死去的飞行员，然后向牧师和西班牙警察致谢，请他们将棺材运往圣哈维尔，再空运到美国。

夜幕降临时，多诺万将军也从马德里赶来，他与威尔逊一起，会同高级参谋人员，在当地一家小酒馆里，制定了回收氢弹的计划。从氢弹的降落伞可能打开或没完全打开的情况推测，它们溅落的范围可能包括方圆几英里的地区。夜间无法搜索，他们决定天一亮，就同时开始陆上和空中的搜索。

这时，一位西班牙警察跑进来报告，他在海边一条干河床旁发现一个像是氢弹的东西。灾难控制部队的军械专家们立即出动，不久即证实，那确实是一枚氢弹，而且完好无损。这个发现大大增强了人们很快找到全部氢弹的信心。天蒙蒙亮，全体搜索人员都赶到河床一带，直升飞机也在人们头顶上盘旋。3 支搜索队拉开了一英里的搜索线，从帕洛马雷斯村北两英里处开始，向村南海边方向推进。搜索工作极其细致，几乎每株庄稼下面的泥土里，每

个像是弹坑的凹地或洞穴都一一搜查到。几个小时后，一架直升飞机在公墓后面的一片田地里发现了第二枚氢弹。接着，地面搜索人员找到第三枚，也就是在村东爱德华多用脚踢过的那枚。至此，搜索工作似乎进展得非常顺利。

后两枚氢弹的高爆物在撞击地面时都爆炸了，弹体像破碎的南瓜一样裂开，核弹芯崩出弹体，在常规爆炸中蒸发掉了。但是核裂变肯定没有发生，因而也不会释放出核能和核爆炸所产生的致命物质。溢散的核物质放出的射线射程极短，不能穿透皮肤，甚至连纸也穿不透。核弹所使用的钚，拿在手里也不会造成伤害。钚污染很容易处理，用水就能清洗掉。

尽管如此，美国核安全条例还是制定得非常严密。为防万一，受污染的这几块土地都将彻底清除掉。1月19日，西班牙核能局的首批人员抵达帕洛马雷斯，他们与美国空军的放射性探测专家一起，对两颗氢弹的高爆物爆炸地点进行了最严格的清污工作。他们不放过每一寸土地，即使带有极微弱放射性的每一小撮土，都将运往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核废物处理场。地里的庄稼也全部回收，物主将得到赔偿。

然而，对空军少将威尔逊来说，目前最重要最紧迫的还是要找到丢失的第四枚氢弹。

当天下午，地面搜索人员对上午搜索过的地区，又进行了第二次搜索，可还是没发现第四枚氢弹的踪迹。

空军核事故调查队询问了数十个目击者，对渔夫奥尔兹提供的线索颇感兴趣。他们认为，如果确实如奥尔兹所说，那么氢弹就在离海岸5.5英里处的海底。当然，也许他看错了，因为他并不知道氢弹是什么样子。

为确定第四枚氢弹坠落的具体位置，空军侦察机对这片长12英里、宽8英里的区域进行了高空摄影。1月19日中午，一幅航空照片镶嵌图送到威尔逊将军的办公室。在这幅透明塑料地图上，划分成许多小块，每块面积1000平方英尺，搜查中发现每一小块飞机残片的位置都标在图上。专家们仔细研究这幅图，并结合目击者的叙述，重现事故的全过程。接着，美国国内的十几台各种各样的大型计算机投入了运转。根据已找到的3枚氢弹的位置，推算出它们在空中飞行的弹迹和空气动力轨迹，以及准确的碰撞点。以此为基础，分析出第四枚氢弹的假定弹道和空气动力轨迹。计算机最后运算结果表明，这枚氢弹可能落在内陆一个直径两英里的圆形地带，也可能掉进离岸几英里的海底，这取决于氢弹的降落伞是否打开，打开的程度以及是否被烧毁。

于是，威尔逊将军决定先在地面搜寻。搜索队发现这圆形地带布满了零零星星的耕地和废弃的矿井，他们300多人排成一排，手拉手缓缓地穿过这一地区，在每一个值得怀疑的凹地、坑穴、矿井和坑道部插上小红旗，一共插了400多面。随后，直升飞机运来军械专家，带着照明设备爬进每一个旧矿道和竖井，将坑坑洼洼的地方搜了个遍。搜索队花了37个小时才从北向南把这一地区搜了一遍，接着又开始第二次搜索，从西向东推进。这种拉网式的搜索一共进行了8次，而且一次比一次细致。但结果却一无所获。人们开始相信渔夫奥尔兹的说法，即那枚氢弹很可能落入海中。

1月22日，也就是空中撞机发生后的第7天，美国军方派人来到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要求借用该所的“阿尔文”号深水潜艇去协助寻找落入海中的那枚氢弹。“阿尔文”号是一艘长22英尺的科学实验潜艇，下潜深度可达7500英尺。

1月23日，南欧美国海军突击与支援部队代理司令格斯特少将，接管了

海上搜寻和回收氢弹工作。他统辖的部队被称作第 65 特种部队。第二天他便飞抵帕洛马雷斯，乘直升飞机考察了飞机残片的分布情况，然后划定了面积达 120 平方英里的搜索区域。

格斯特将军从地中海和大西洋各舰队调来 130 名蛙人和潜水员，各种配备有奇特仪器的船只也汇集到出事区域。来自费城的海军研究船“迈兹阿”号，上面装有水下摄影机，它提供了大量的清晰的水下照片。

海洋调查船“达顿”号测绘了搜索区域的海底地形。不久，一个海底地形的石膏模型就送到了格斯特少将的办公桌上。海底情况不很妙，到处是陡坡和沟谷，崎岖不平，在东南部甚至还有一条深达 9000 英尺的水下深谷。

格斯特把渔夫奥尔兹请来，详细地讯问了情况，然后一起登上扫雷艇。奥尔兹向将军指明了当时他看到氢弹入水的准确地点。格斯特把这一地点标在海图上，以它为中心画了个半径为一英里的图，称之为“阿尔法一号区”。这很可能是氢弹坠落的地点。靠近海岸处为“阿尔法二号区”，那里曾打捞到许多飞机残片。如果氢弹的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氢弹就可能坠入在那片区域。

水下搜索是按深度分层次组织实施的。水下 80 英尺以内由潜水员用肉眼搜索；水深 80 英尺到 130 英尺的区域由潜水员、扫雷艇和电声纳扫描仪负责；130 英尺到 200 英尺以下。由“海洋实验室二号”潜水艇派出的潜水员搜索；搜索水下 200 英尺到 380 英尺的区域，潜水员需戴上头盔；再往下到 600 英尺的搜索工作，一概由潜水艇进行；600 英尺以下就得动用“阿尔文”号和另外一艘深水潜艇“阿鲁明纳”号了。

格斯特少将非常清楚，尽管拥有众多的专家和先进设备，搜索前景依旧不容乐观。因为在海底搜寻一枚氢弹，无异于在漆黑的夜里，站在陡峭的山顶，借助一只笔形电筒，用肉眼去寻找山下只有罐头盒大小的东西。

2 月 10 日，“阿尔文”号和“阿鲁明纳”号先后从空中和海上运抵出事现场帕洛马雷斯。2 月 14 日，这两艘深水潜艇开始下潜作业。一艘装备着大量监听设备的苏联拖网渔船，偷偷地泊在远处水平线上。格斯特少将立即派出两艘驱逐舰警戒着搜索区域。

3 月 1 日，“阿尔文”号在渔夫奥尔兹所指氢弹入水处不远的地方进行第 10 次下潜。驾驶员瓦伦丁正开着潜艇在一个水下山坡上行驶，突然，搜索灯照到了一条圆槽形痕迹，似乎是一个沉重的物体滑过去时留下的印痕。瓦伦丁兴奋地对着水下电话高声喊：“我发现一处痕迹！”坐在旁边的伦尼·威尔逊立刻用水下照相机拍了下来。第二天，“阿尔文”号在那个陡坡上搜索了 7 个多小时，但由于海流太大，搅起一阵泥云，失去了目标，结果无功而返。

3 月 15 日，瓦伦丁驾驶着“阿尔文”号又一次在海底发现那道可疑的滑痕。这一次，为避免痕迹再被海流搅起的泥云遮掩，他掉转潜艇方向，沿山坡慢慢倒着下行，终于跟踪着那条痕迹，进入更深的水域。几分钟以后，他看到一顶浮动着的降落伞罩在深沟边缘，随着它不停的抖动，一个像炸弹架的黑东西在它下面时隐时现。为防止苏联拖网船监听，曾专门为找到氢弹时的通话规定了暗语，降落伞被称作“本萨索鲁斯”，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 3 条腿鱼的名称；氢弹代号为“仪表板”。但此时此刻，瓦伦丁太激动了，竟忘记了暗语，对水面上的比尔·雷尼喊：“我看见了一颗锈钉子！”

这句话简直令人莫名其妙。雷尼急了，干脆破坏了讲暗语的规定，对着

话筒问：“你是说看到了氢弹？”

“还不能肯定，”瓦伦丁答道，“但我看到了降落伞！”

因为还不能确定是否已经找到氢弹，格斯特少将命令“阿尔文”号原地不动，等候“阿鲁明纳”号来接替它。瓦伦丁让潜艇与那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它躺在70度的陡坡上，很不稳当，海水稍一搅动，就会往下滑到无底深渊中去。

8个小时后，充足了电的“阿鲁明纳”号开来了。两只潜艇用水下电话实行交接后，“阿鲁明纳”号留下来看守，“阿尔文”号则回到母船充电并安装机械手臂。

为确保回收任务的完成，海军少校穆迪等人在供应船上的车间，设计了一个机械装置。它有一个钢骨架，下面安着几个尖尖的金属腿，能牢固地插入泥质海底，钢架上还有声纳发生器和3根长300英尺的特殊尼龙绳，绳的一端带有抓钩，只要将钩子钩在降落伞上，就可以用绞车将它拉出水面。这种机械手看上去古里古怪，被称为“卷毛狗”。

22小时后，“阿尔文”号带着“卷毛狗”潜回降落伞发现处。用3根尼龙绳中的一根挂在降落伞上，便往上拉，但出人意料的是，“卷毛狗”翻了个身，使另两根尼龙绳缠在一起，不能用了。只好再换一些两端有钩子的绳子，再将绳子两端分别挂在“卷毛狗”和降落伞上，但试了几次，都因绳子缠卷在一起而失败。

10天过去了，挂钩操作屡试屡败，格斯特少将询问有关专家，他们认为既然挂钩办法行不通，不妨还是利用已经挂好的那根绳子，把东西拉上来。

3月24日晚8点，风平浪静。母船上的绞车开始缓慢而均匀地收起系在降落伞上的尼龙绳，想把那东西拉离海底。但在25分钟后，尼龙绳突然松了下来。原来尼龙绳被突出的岩石割断了，“卷毛狗”下面吊着的东西不见了。

人们大失所望。第二天，“阿尔文”号和“阿鲁明纳”号下潜寻找，什么也没找到，连系在降落伞上的信号发生器所发出的信号也没听到。

格斯特少将只好命令深水潜艇继续在海底搜索，又从加利福尼亚调来新的水下回收器——电缆控制水下回收器，这主要是用来回收演习鱼雷用的。

4月2日，“阿尔文”号再一次发现了那个降落伞，它躺在2800英尺深的光滑山坡上。两天后，新的水下回收器下水，花了半天时间，终于将缆绳系在降落伞上。

4月6日，当水下回收器再次探访目标时，“阿尔文”号在一旁观察。驾驶员瓦伦丁开过去想靠近一点降落伞，结果因能见度差而开过了头，一头闯进降落伞里。瓦伦丁赶紧开倒车，可螺旋桨已被降落伞缠住了。这一下，坐镇水面指挥的格斯特少将气得几乎要发疯了。氢弹没捞到，说不定还要牺牲两个人。幸好瓦伦丁非常镇静，他硬是一寸一寸地把“阿尔文”号从降落伞的缠绕下退出来。

15分钟后，“阿尔文”号终于摆脱了降落伞。格斯特这才松了一口气。

4月7日凌晨，水下回收器第三次下潜，又将一根缆绳系在降落伞上。早晨7点零2分，绞车开始转动，降落伞下系的重物慢慢地拉离了海底。

格斯特少将不想再冒绳子断掉的风险。上午8点19分，当回收到200英尺深度时，格斯特命令绞车停止转动。海军少校穆迪派了几名潜水员下海，他们扯开降落伞，露出了炸弹架，氢弹还稳稳地固定在上面。潜水员们用金属带子把氢弹缠起来，上面再系上钢缆，绞车又转动了。8点45分，也就是

事故发生后的第 79 天 22 小时 23 分钟，氢弹浮出了水面，回到美军手里。

这场动员 3 万多人竭尽全力地干了 3 个多月，使用了各种新式装备的战斗，终于以 4 枚氢弹全部找到而告结束。

此刻，格斯特将军已连续 70 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他疲惫不堪，勉强写下了一纸电文，发给爱森哈特将军。电文只有一句话：“圆满完成使命，在西班牙折断的箭全部回收。”

（陈重）

“挑战者”号爆炸

1986年1月28日上午，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天中心，碧空如洗，万里无云。巍然矗立在发射架上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犹如一条银色巨龙，只等一声令下，便直上云霄。

在美国载人航天飞机飞行史上，“挑战者”号可谓战功显赫，独占鳌头。在美国现有的4架航天飞机中，它飞行的次数最多。从1981年第一架航天飞机升空，至今总共有24次航天飞行，它就占10次。今天，它飞行的使命是将一个通讯卫星和全套观察哈雷彗星的仪器送入太空轨道。此外，“挑战者”号还创造过多次第一：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宇航员、第一位黑人宇航员和第一位华裔宇航员都是乘坐它升空的。这一回，它又将创造一项第一——首次运载一位普通公民遨游太空。

这位普通公民是37岁的女教师麦考利夫。她是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中学的社会学教师。

1985年7月，美国航天局公开招募一名将作太空飞行的普通公民，里根总统提议选择一名教师。麦考利夫勇敢地应征，结果从11400名自愿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幸第一个乘航天飞机进入太空的“普通公民”。此刻，她静静地坐在航天中心的休息室里，想到自己遨游天宫的理想就要成为现实，不禁激动异常，同时又充满信心，纷飞的思绪把她带回到约翰逊太空中心度过的日日夜夜……

当她“过关斩将”，在应试中一举夺魁后，她意识到在通往太空的道路上她仅仅迈出了第一步，还有更多的艰难险阻有待于攻克。于是，她抓紧时间，埋头苦读，遍览有关宇航的基础知识，为日后的操作训练打下良好的基础。

3个月紧张的模拟训练开始了。她在约翰逊太空中心的5号大楼里参加了宇航集训。整个训练场就像个“机器人”世界，宇航员在模拟座舱内必须用计算机程序中的术语对话，不允许流露任何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训练极其严格。集训课程包括熟悉机上全套系统，掌握飞行操纵规程，学习排除故障、紧急避险，同时要接受失重训练，以适应太空中的生活。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宇航员工作完全是个崭新的世界，要想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学会操纵航天飞机的本领，适应宇航员生活，她付出的代价远比职业宇航员多得多。每天5小时的高强度训练，麦考利夫总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高度紧张的脑力活动和超乎寻常的形体训练，使她疲惫不堪，但她总是咬紧牙关坚持着。她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宇航员。

在这次航天飞行中，她将在第4天向地球上几百万中学生讲授两节“太空课”。第一节课她将用自己在太空的亲身感受向学生们讲解：什么是“太空”？在太空中人类如何生活？第二节课她将告诉学生们：为什么人类要耗费巨额财富，冒着生命危险闯入太空？太空对人类的价值。在太空中讲课，这在教育史上是前无先例的，想到此，已有12年教学经验的麦考利夫内心充满了初试讲台般的喜悦与不安。

临行前几天，她特地来到康科德中学，向学生们告别，她开玩笑地说：“再见吧，我的孩子们！如果老师不再回来任教，那就是被上天留下了。”她深知航天飞行中充满着巨大的危险，但为了唤起学生们和全国民众对航天事业的理解和热爱，她愿以身试“险”。

工作人员的脚步声，把她的思绪打断。紧张而又繁杂的登机准备工作开始了。在作了一系列测试后，人们帮她穿上笨重的宇航服。

这是一个少有的寒冷天气，北风凛冽，温度降到了零下4摄氏度，发射架上挂满了晶莹的冰柱。由于天气太冷，原订上午9点38分发射的时间，不得不推迟了两小时。看来，这不是个好兆头。

但在距发射架4英里远的看台上，却是一幅热气腾腾的景象。一大早，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观众就冒着严寒赶到这里。他们中有国家宇航局的官员，有前来采访的各国记者，有专程来观看的美国各州的旅游者，还有即将起飞的宇航员的亲属，其中包括麦考利夫的父母和妹妹。他们手拿望远镜和照相机，遥望着发射台，焦急地等待着那最后一刻的来临。

11点左右，身着宇航服的麦考利夫和她的战友们——另外6名字航员从航天中心大楼出来了，他们微笑着向兴高采烈的观众挥手告别，愉快地从航天飞机头部左侧的圆形舱门进入密封舱。

11点30分，一切准备就绪，开始倒数计时。发射前7分钟，最后一架舷梯撤离“挑战者”号。前4分钟，宇航员最后做一次头盔和面罩检查。前35秒，一切显示正常，自动程序开始工作。前6秒钟，“挑战者”号主发动机点火。

这时，所有看台上的观众都盯青巨大的电视屏幕。他们屏住呼吸，注视着屏幕上倒数计时的数字变化：“5、4、3、2、1！”

11点38分，当最后一声指令从指挥中心下达，“挑战者”号下方腾起一阵翻浓着的白烟，轰鸣着拔地而起。这条银色的巨龙，喷着明亮耀眼的火柱，以3倍于音速的速度直插云天。顿时，看台上爆发出阵阵欢呼声和掌声。人们欢欣雀跃，被眼前壮观的景象所陶醉，人人脸上绽出喜悦的笑容。麦考利夫的双亲和妹妹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为自己亲人的成功而感到自豪。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现场直播的亿万观众，也欢天喜地，赞叹不已。聚集在学校礼堂里观看电视的康科德中学的数百名学生，个个欣喜欲狂，为敬爱的麦考利夫老师飞上太空而喝彩。整个美国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11点39分12秒，即“挑战者”号发射后仅仅72秒钟，意想不到的惨剧发生了。“挑战者”号底部突然闪出一道白光，顷刻间，一团由桔红色火焰和乳白色烟雾组成的大火球吞没了整个航天飞机。紧接着，从15000米的高空传来闷雷般的爆炸声，耗资12亿美元的“挑战者”号砰然爆炸，两枚助推火箭拖着白烟从火球中窜出来，形成一个“Y”字型坠落下来。而飞机本身则变成千万块燃烧着的碎片，洒落在离发射场19公里的大西洋里。

广阔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场上死一般寂静，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看台上数以千计的观众茫然不知所措。麦考利夫的妹妹“啊”地一声发出撕人心肺的惨叫，使看台上的观众从恍惚迷离中惊醒，一时间，痛哭声、唏嘘声响成一片。几分钟后，广播员以沉痛缓慢的语调播出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人们刚才目睹的景况是一次千真万确的空难。整个发射场立刻沉浸在悲哀和痛苦之中。

坐在电视机前目睹这一惨剧的千千万万的观众，却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播音员反复报道、荧屏上连续播放这一悲惨的瞬间，人们才被迫接受了这个事实。悲恸的气氛笼罩着成千上万个家庭。

在康科德中学，礼堂内兴奋的欢呼声还未停息，电视屏幕上的航天飞机已猝然间化成一团大火，孩子们个个都惊呆了。礼堂里顿时寂静下来。接下

去便是举座悲泣，放声痛哭。这生与死、欢乐与悲痛的瞬息变幻，简直叫孩子们难以置信，幼小的心灵无法承受。许多孩子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久久不忍离去，仿佛这样能使时光倒流，挽回麦考利夫老师的生命。教师们强忍住心中的悲痛，尽量安抚孩子们，并立即通知学生的家长，把孩子领回家中。

历史将永远记住 1986 年 1 月 28 日 11 时 39 分 12 秒这一难忘的时刻，一场世界载人航天史上最大的悲剧在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上空发生了。“挑战者”号航天飞机高空爆炸，7 名机组人员无一幸免。这 7 名为人类的太空事业献身的勇士，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他们是：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中学 37 岁的女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46 岁的机长弗朗西斯·斯科比、40 岁的驾驶员迈克尔·史密斯、36 岁的黑人女宇航员朱迪斯·雷斯尼尔、35 岁的罗德·麦克奈尔、39 岁的埃利森，奎恩和 41 岁的格雷戈里·贾维斯。

“挑战者”号爆炸的噩耗，通过无线电波立即传遍全球。全美国为之震惊！全世界为之震惊！

悲剧发生之时，美国总统里根正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召集高级助手讨论国情咨文。副总统布什和国家安全顾问斯皮克斯惊慌失措地跑进来，通报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惨讯。里根当即要求打开电视机看录像。“挑战者”号爆炸的惨景使他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过了很久他才喃喃自语：“这，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悲剧。”他迅即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 7 天，并推迟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

几小时后，里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他的面容似乎一下子苍老许多。他以低沉而略显沙哑的声调悲痛地说：“‘挑战者’号失事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民族悲剧，南希和我与你们一样深感悲痛。”他宣布 1 月 28 日为全国哀悼日。他满怀激情地赞扬罹难的 7 名字航员是“星球旅行者”，是“大无畏和勇敢的人”，“他们具有那种特殊的精神，即挑战者的挑战精神”。

美国全国上下无不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布什副总统受里根总统的委托，立即飞往肯尼迪航天中心，慰问死难者家属。正在开会的众议院也宣布休会。全国各地降半旗致哀，所有教堂都响起了钟声，前往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洛杉矶运动场上的奥林匹克火炬被重新点燃，以纪念遇难者。在纽约，往日灯火通明的帝国大厦当晚一片黑暗，燃起了蜡烛。连热闹非凡的纽约股票交易所也变得格外冷清，停止了股票交易。

在佛罗里达州大西洋沿岸，约有两万人在失事当晚向茫茫夜空射出手电光，似乎想找回 7 名字航员的伟大灵魂。在麦考利夫的家乡，家家户户庭院的树上都挂满了黄色彩带，以表示对英雄的怀念。

全世界都加入到哀悼者的行列。联合国安理会中止了正在举行的会议，在德奎里亚尔秘书长的提议下，向“挑战者”号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欧洲议会也中上会议，向蒙难的宇航员致哀。许多国家的电视台都中断正常节目，迅速插播了这一消息。来自各国领导人的唁电、唁函像雪片般地飞向华盛顿。苏联政府还决定以遇难的两名女宇航员——麦考利夫和雷斯尼尔的名字命名月球上的两处火山口。

1 月 31 日，15000 余人冒着刺骨寒风，在得克萨斯州约翰逊航天中心的草坪上为“挑战者”号 7 名英烈举行追悼大会，里根总统和夫人专程赶来参加，与遇难者家属坐在第一排。会上，里根总统赞扬了 7 名字航员的光辉业绩，并表示：“‘挑战者’号的爆炸，并不意味着我们征服太空的终结。今

后美国还要进行更多的航天飞行，要有更多的宇航员，还要有更多的普通公民，更多的教师，到太空探险。‘挑战者’号上的英雄正把我们引向未来，我们要继续沿着他们所走的道路走下去。实现新的目标，取得更大的成就，就是我们纪念‘挑战者’号7位英雄的最好方式。”

事故发生的当天，美国宇航局就成立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临时调查委员会。2月3日，里根总统又下令成立由前国务卿罗杰斯任主任的13人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事故的原因。

美国国防部在航天飞机爆炸后就立即派出飞机和舰船，全面封锁了爆炸碎片散落的大西洋海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搜索和打捞航天飞机残骸的工作。直至8月28日。这次为时7个月的打捞工作才宣布结束。据统计，一共出动了6000人、52架飞机、31艘船只、3艘潜艇、5艘无人驾驶潜水器和151名潜水员，对离肯尼迪航天中心东北64公里的9.3平方海里的海面 and 429平方海里的海底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搜索，打捞出111.32吨残骸，占升空物体总重量45%。其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

3月8日，在30米深的海底，潜水员打捞出“挑战者”号的座舱，舱内有部分宇航员的遗体。通过对残骸的复原和分析表明，爆炸时，座舱是完好的，直至高速坠落撞击水面后才解体。4月13日，又从海底捞起右侧固体火箭助推器连接部位的残片，为确定爆炸起因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美国政府调查委员会的专家们，根据打捞上来的航天飞机残片以及爆炸前航天飞机发回来的大量数据，反复观看了“挑战者”号从起飞到爆炸的录像，认为问题出在右助推火箭上。

6月9日，里根总统在白宫收到了政府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这是经过4个多月的调查而写出的关于“挑战者”号爆炸事故的总结。报告长达256页，确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航天飞机右侧的固体火箭助推器的密封装置失效，燃气外泄，喷出火舌后引起推进剂储箱爆炸。除了设计上存在缺陷外，发射时气温过低，合成橡胶密封圈失去弹性，丧失密封作用，也是导致这场灾难的重要原因。报告指出，这两个原因并非不可避免，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美国宇航局本身在管理上存在的严重缺陷和官僚主义问题。

早在前几次航天飞行中，就发现橡胶密封圈有移动、腐蚀或烧坏的情况。为此，宇航局在1985年7月将此列为优先处理的课题，但该计划始终未能兑现。

1月27日，此次发射的前一天，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航天中心的两名工程师曾告诫说，严寒会使密封装置失效，将严重威胁航天飞机的安全。他们一再建议推迟发射计划，但经过几个小时的争论，航天中心的一名高级官员否决了他们的意见。结果酿成了一场本应避免的特大灾难。

“挑战者”号的爆炸，使美国的整个航天计划陷入停顿状态，1986年的15次航天发射计划全部取消，损失极其惨重。

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被“挑战者”号失事所吓倒，失败、危险阻挡不了人类对太空的探索。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坚决支持航天飞行计划。1700多名原来准备应征的第二位进入太空的“普通公民”，在事发后无一撤回申请。两名儿童向全国学生发出倡议：每人向国家捐献一美元，用来制造一架新的航天飞机，响应者众多，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也捐了款。

里根总统下令建造新的航天飞机。宇航局的专家们对火箭助推器的关键部位作了重大的技术性修改，重新设计和制造了环形密封圈。为避免再次发

生类似“挑战者”号的悲剧，宇航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航天飞机上的101个重要部位上安装了传感装置，以确保在飞行中各部位的技术参数能及时反馈给地面控制中心。发射塔上增添了应急滑降篮，宇航员可在发生意外事故时迅速疏散。在非洲北部还增建了两处迫降跑道，供航天飞机紧急降落。

两年后，美国宇航局宣布了航天飞机恢复太空飞行的日程表。1988年9月29日，“发现”号航天飞机成功地发射升空。美国人终于从“挑战者”号爆炸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东山再起了。

（陈忠）

没有硝烟的激战

197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

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7月6日，朱德委员长悄然逝去。

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死亡24万多人，重伤16万多人，百万人口的唐山市被夷为平地……

9月9日，毛泽东主席走完了最后的征程。

然而，在1976年，在人民共和国27年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55年的历史上，最最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大事件，还要数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场斗争。

“四人帮”，指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主席生前，早在1974年7月就揭露和批评了他们结帮营私的嘴脸，警告他们不要再搞“四人帮”。但是这四个阴谋家和野心家，却执迷不悟，不肯改悔，继续利用“文化大革命”实行他们篡党篡国的罪恶活动。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他们更加快了步伐，图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凭着他们对党对国家的忠诚和关心，凭着他们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正敏锐地观察着“四人帮”的一举一动，商定和部署应变措施。

9月9日凌晨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病逝。3小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治丧问题。一项项议程，包括成立治丧委员会，起草并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群众吊唁，追悼大会等，一一讨论通过。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一直没有开口的江青，突然要求发言，她充分利用她是毛泽东夫人这一特殊身份，不可一世地发号施令：“我的意见，还要讨论一下运动问题，不要光顾治丧，而忽视了批判邓小平。从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她昂起头，一个一个地看政治局委员的反应，见大家没作声，又强调了一次：“批判邓小平，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事，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着起哄，逼着当时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表态。华国锋沉默了许久，终于表了态。“对邓小平当然要继续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江青马上打断了他的话，蛮横地说：“批邓小平批了快一年了，还是批而不倒，不是很危险么！我这里掌握了很多材料呢！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的问题，政治局做个决定，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江青这个突然提出的“建议”，给政治局出了个大难题。许多委员心里是不同意的，但考虑到毛泽东刚刚去世，对他的夫人又不好硬顶。这时叶剑英发言了，他用劝慰的口吻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些！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我们现在要办的事很多，但第一位应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正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更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叶剑英的话说得合情合理，首先得到了华国锋的赞同，他沉痛地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渡过这个难关！”

许多同志纷纷表示同意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连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不好再反对。江青突然站起来高呼口号：“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然而，就在这时，江青的文件包里，还装着整华国锋的黑材料。

9月10日清晨，才8点多钟，几乎是彻夜未眠的叶剑英就已经醒来了。按照作息时间，他夜晚办公，上午该休息到10点左右才起床，可是今天，他再也睡不着了，索性起身来到办公室，坐在写字台前的高背藤椅上，闭目沉思。一有所得，他便信手在纸上记下几个字。

叶剑英觉得，眼前的局势，犹如一场战争，到了最后决战的关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要彻底打败对手，比赢得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更复杂、更困难！

然而，这位七十九岁高龄的元帅，早年追随孙中山东征北伐；后来多年在最高统帅部，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一起，为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足智多谋，文武兼备，完全有夺取最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兵，如何遣将，如何指挥，如何克敌制胜。叶剑英认识到，要粉碎“四人帮”，还必须依靠人民，依靠党中央的绝大多数同志。同“四人帮”作斗争，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要彻底打倒“四人帮”，则还需要再做工作。有一个人工作非做好不可，此人就是华国锋。因为若干年来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使人们不敢不执行毛泽东的任何指示，更不要说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决定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提议任命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不便越过他直接指挥这场斗争。

叶剑英决定要找华国锋好好谈谈。

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而直到此时，叶剑英对华国锋可以说很不熟悉，很不了解。华国锋参加革命工作比较迟，叶剑英早年同他没有接触。

1970年，叶剑英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被流放到湖南，当时华国锋是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上，两人只在集体场合会过面，没有谈过话。华国锋调中央工作后，两人仅限于工作上的来往，没有深谈过。

1976年2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与此同时，叶剑英却接到了另一份中央文件，声称他“生病”不再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他的身体同以往一样健康！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被镇压，在“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口号声中，华国锋作为毛泽东主席继承人的身份被公开确定下来。

尽管华国锋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上台的，但叶剑英从几件事上，发现华国锋同“四人帮”是有区别的。一件是7月初的事，当时毛泽东主席病情日益加重，“四人帮”却要在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病情的文件中，写上毛泽东“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这种违背事实的做法遭到了叶剑英等人的坚决反对。华国锋在会上没有发言。但在会后签发文件时，他毅然删去了这十个字。另一件事发生在8月里，叶剑英去看望华国锋，华国锋在门口等候，并亲自为叶剑英打开车门，表现出他对叶帅的敬重。谈话中，叶剑英说到，“有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企图以此同解放军对抗，这是

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华国锋当然知道这是“四人帮”的主张，“四人帮”指挥不动解放军，所以想发展民兵作为自己的武装力量。他沉默了一会：“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有了这样一个底，叶剑英也就有了做好华国锋工作的信心。他当即乘车来到华国锋家里。在客厅里坐定之后，叶剑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现在毛主席去世了，你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呀！”

华国锋请叶剑英喝茶，自己也端起茶来呷了一口，这才说道：“这个，我还没有想好哇！”

叶剑英认真地说，“你没有想好，人家可是抓得很紧喽。”他把“人家”二字咬得特别重。停了一下，他又说：“过去，你是副主席，有主席在，有些事情你不好处理。现在主席逝世了，你就要站出来，该拿主意的要拿主意，该下决心的要下决心啊！”

华国锋只说了一声“难啊”，就岔开了话题。

看来这一次只能谈到这个地步了。叶剑英告辞了。

可是“四人帮”紧接着又玩出了新花招。9月10日晚，王洪文布置秘书廖祖康、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他们架起17部电话，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直接与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通话，传达两条王洪文的指示：一、在为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想把控制各地方政府的大权，揽到王洪文手中，架空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米士奇的电话后，十分奇怪，便直接打电话向华国锋询问。华国锋大为震惊，当即向叶剑英问起此事。叶剑英也不知道。他们估计一定又是“四人帮”背着中央搞了小动作，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各地，澄清事实，并强调指出，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被挫败了。但是，知道内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头的危机感更重了。邓颖超、陈云、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等人，都设法同叶剑英联系，商谈怎么对付日益猖獗的“四人帮”。由于斗争的复杂性，每次谈话时，叶剑英都要开水龙头或者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

9月12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去看望聂荣臻元帅，谈到“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聂帅一字一句地讲了一段话，让杨成武赶快去转告叶剑英。聂荣臻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杨成武当即赶到叶剑英住地，转达了聂帅的意见。叶剑英对杨成武说：“回去转告聂帅，我与他有同感，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

接连几天，叶剑英又去找华国锋谈心，仔细地向他分析当前的局势，希望他能站出来，担负起斗争的责任。

可是，华国锋还是下不了决心。

9月16日，“四人帮”在他们控制的宣传舆论工具《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

中》。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抛出了一条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狂妄叫嚣“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很显然，“四人帮”已经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

叶剑英又一次来到华国锋家里，找华国锋谈话。叶剑英从历史讲起，讲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几次危机和转折。华国锋听得很认真。叶剑英注意到他神情的变化，乘机问他：“怎么样，你考虑好了吗？”

华国锋将身体朝叶剑英贴近了些，说：“叶帅，你讲的那些，我都赞成。不过，党内还有那么多老同志，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怎样？”

叶剑英说：“你应该多到老同志那里去走走，多找他们沟通思想嘛。”

华国锋有点为难地说：“叶帅，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资历又浅，在老同志面前，论党龄，我是晚辈；论年龄，我更是晚辈。我去找他们，他们不理我怎么办？”

叶剑英明确地说：“我支持你。你去找他们，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能站出来斗争，老同志们不会不支持！”

华国锋站起身说：“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我就干！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逝世追悼大会。第二天，江青就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并且提出不要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参加，而不是政治局常委的江青、姚文元、毛远新都要参加。在王洪文、张春桥的支持下，会议召开了。江青摆出架子，东拉西扯地说了半天，最后才说到正题上。原来她要以毛泽东的“妻子兼秘书”的身份，接管毛泽东的文件书籍。华国锋没有同意，仍坚持由中央办公厅暂时封存，江青一伙便胡搅蛮缠，一直闹了四、五个小时。华国锋最后仍然没有让步。

正是这场大闹，使华国锋更清楚地看透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9月21日，华国锋亲自去拜访李先念，请他传话给叶剑英，请叶剑英“务必想个办法解决”“四人帮”问题。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重大使命。叶剑英同李先念在收音机噪音的掩护下密谈，这次谈话对于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并付诸实行，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同时，“四人帮”也在紧锣密鼓地行动。9月21日，王洪文亲自乘飞机去上海，了解给上海民兵发放武器的情况。从8月15日开始，“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突击下发了各种枪枝7万多支，大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上海全市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此后，张春桥、王洪文又不断向上海发指示，要上海“准备打仗”。

9月29日，“四人帮”一伙又大闹政治局，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华国锋坚定地回击了“四人帮”的无理取闹，使得江青一伙对华国锋恨之入骨。然而，华国锋也从这次会议看出，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四人帮”问题，确实是行不通的了。

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用召开会议的方式，请“四人帮”到会，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叶剑英说，这是一着“险棋”，但又非走不可。

华国锋终于同意了。

叶剑英又找到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汪东兴当即表

示：拥护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决定。他们又研究了具体的行动部署。

10月1日，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污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叫嚷要“开除邓小平党籍”。

10月2日，王洪文私自拍摄“标准相”，准备夺权后上台时使用。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放厥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要把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修正主义！”他这是明目张胆地影射华国锋、叶剑英是“修正主义”。

同一天，江青也得意忘形地拍了17张“标准相”。

10月4日，“四人帮”以“梁效”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叶剑英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信号！解决“四人帮”的时间不能再推迟了。于是，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果断决定：先发制人！根据情况变化，提前采取行动。

这时，社会上已流传开“四人帮”散布的谣言：

10月8、9、10日首“特大喜讯”。上海商店里的红纸、鞭炮被抢购一空，准备“庆祝”。于是，叶剑英决定在10月6日动手。1976年10月6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上午，王洪文、张春桥同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今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望准时出席。下午，姚文元也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说为了修订文献、改动文字，请他列席晚上的政治局常委会。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下午3时30分，按照约定，汪东兴打电话给叶剑英，通知他去“开会”：“晚8时政治局开常委会，请叶副主席提前一小时到怀仁堂。”

这是一切顺利的信号。叶剑英当即命令身边的工作人员：“作好行动准备！”

6时15分，叶剑英换上灰色的军便服，带上警卫参谋，从容不迫地出发了。

7时整，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轿车准时停在怀仁堂门前。

负责执行任务的同志，也提前到达了怀仁堂。这批同志，都是汪东兴慎重地挑选出来，又经过叶剑英仔细审查的，每个人都完全可靠。

一场特殊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怀仁堂正厅内，一扇屏风将大厅一分为二。前厅仅留下一张专供叶剑英坐的高背沙发，斜对着厅门，其余空空荡荡。叶剑英端坐在高背沙发中，神情坦然。华国锋站在叶帅身边，目光直射正厅的大门。厅内安静极了，人们似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偶尔传来的蟋蟀叫声，更烘托出厅内的寂静。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这个行将落网的人，会是“四人帮”中的哪一个呢？人们屏住呼吸，悄悄猜测着。

命运之神好像在开玩笑。最先露面的，竟是号称“神机妙算”的军师张春桥。他夹着文件包，摇头晃脑，兴冲冲地踏进了怀仁堂。直到随身警卫留在了门外，他才嗅出了一点异味，不停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等他回过神来，行动组的几名同志已上前截住他，并“保护”他进了正厅。

叶剑英严峻的目光逼得张春桥缓缓垂下了头。华国锋宣布了中央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张春桥像瘪了气的皮球，没作任何反抗，就乖乖地让监护人员带走了。

厅内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不过，人们紧张的心情一点也没有放松。

接着来到怀仁堂的是王洪文。这个所谓“文武全才”的大人物下了车，趾高气扬地向怀仁堂走来。行动组的几个同志迎了上去。王洪文顿觉情况不对，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随后便使出当“造反司令”的浑身招数，拳打脚踢，拼命反抗。可是他的武斗本领毕竟有限，很快被扭住了双手，由警卫人员带进正厅。当他看到神态严峻的叶剑英时，预感到末日来临，竟向叶剑英和华国锋猛扑过去，结果被警卫人员推倒在地。待他再爬起来时，已经失去了刚才的骄横，沮丧地低着头，听华国锋宣布了他的罪状和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在被警卫人员带走时，王洪文才有气无力地叹息了一声，说：“没想到有这么快！”

这时，姚文元已匆匆赶来。当行动组的几名同志上前截住他时，他竟当场瘫倒在地上。华国锋向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他也被带向隔离室。

就在怀仁堂主战场战役悄悄进行的时候，分战场的战斗也同时开始了。

中南海万字廊 201 号，江青府第。

这个梦想当“女皇”的女人，正斜靠在沙发中，得意洋洋地盘算自己登基的计划。突然，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未经请示，便进入了大厅。江青立刻觉察情况有变，但仍撑持着问：“你们来干什么？”

行动组负责人向她宣读了中央对她隔离审查的决定。

江青沉重地站起身来，故作镇静地取出一串钥匙，装进信封里，封好口，交给行动组负责人，请他们转交华国锋。然后，她又像演员一样理了理衣襟，跟着行动组的人，到她应该去的地方去了。

其它“四人帮”的爪牙头目也陆续就擒。

消息传到怀仁堂，叶剑英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场特殊的激战，没有枪声，没有硝烟，但比枪林弹雨的战争更加艰巨，更加危险！

当天晚上 10 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华国锋、叶剑英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报告。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5 时，与会同志欢欣鼓舞，完全赞同中央对“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敢行动。

危机终于渡过。

中国，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新转折。

（薛兵）

莫罗遇害

1987年5月中旬，罗马城一条街道旁停着的一辆汽车里，竟塞着被绑架惨遭杀害的意大利前总理莫罗的尸体！莫罗是怎么遇害的？这事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三月的意大利首都罗马，海风徐来，阳光明媚。在威尼斯广场南面，紧挨着举世闻名的科洛塞奥竞技场的，便是罗马法院。大街上，行人川流不息，汽车往来如梭，店铺生意兴隆。这时，一辆闪着警灯的囚车，响着凄厉的警笛朝竞技场方向驶来。人们禁不住顿足伸头望着囚车从身旁疾驶而过。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法院又一次开庭审判“红色旅”首领库乔的日子。

囚车开到法院大门口停下，车门打开后，戴着手铐和脚镣的库乔出现了。站在一旁的警察想搀扶他下车，他轻蔑地拒绝，自己纵身跳下车，趑趄一下，但马上站稳了。他扬着头向前走去。紧跟在身后的9名端着冲锋枪的警察，押送着库乔，枪口指着他的身体，仿佛他是一头凶猛的野兽，随时会发作把人吞掉一样。

库乔虽然身材瘦小、单薄，但眼里却闪出机敏和狡黠的目光。自从他被捕3年多来，对他开庭审判已有好多次，然而没有一次能进行到底。每次库乔都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俨然以审判者自居，并常常威胁法官：谁要对他进行审判，他的组织“红色旅”便会结果其性命。

这不是假话，“红色旅”的凶残和神通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法官们一个个都“激流勇退”。

原来，“红色旅”是库乔于1968年组织起来的一个组织，由于专搞暗杀和恐怖活动，不仅扰得百姓人心惶惶，更使政府深感头痛。为了消灭“红色旅”，意大利政府于1984年派人活捉了“红色旅”的头领库乔。

今天是一次新的审判，法庭上人头济济，就连过道上也挤满了听众，人们焦急地等待着对库乔的开庭审理。在审判席正中，端坐着黑衣黑帽的大法官巴巴诺。陪审团的人坐在巴巴诺的右侧，大厅四周站着一圈警察。被告的位置上放着一个2米高3米长的钢笼，警察们押着库乔来到钢笼前。警察命令道：“进去，库乔！”

库乔狂妄地叫道：“你们竟如此怕我？”他昂着头走进钢笼，警察“咔嚓”一声落了锁。库乔低头来回踱步，那情景使人立即联想到科洛塞奥竞技场上被囚在铁笼里的猛兽。

威严的巴巴诺拿着判决书念道，“被告库乔，你被指控组织‘红色旅’后，数年来……”库乔立刻打断了他的话说：“听着，你们无权审判我，被审判的是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

巴巴诺没有被库乔的气焰吓倒，继续念着。

库乔暴跳如雷地吼叫着：“住口！”巴巴诺全然不理睬。今天参加审判的法官们都是经过多方挑选的，并对他们事先规定。不管今天库乔怎么恫吓威胁，审判都要善始善终地进行。

库乔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知道已没有办法阻止巴巴诺继续读下去，他思忖片刻，立即把目光转向右侧的陪审团。他双手紧握拳头吼叫道：“你们，你们立即给我出去，立即离开法庭！”陪审团里起了一阵骚动。以前库乔只冲着法官，今天却对着陪审团来了。

整个法庭里回荡着库乔充满威胁的声音：“请相信我我说的是实话，你们

想想柯罗希的下场！”骚动的陪审团里有几个人面容顿时失色！谁也忘不了柯罗希的不幸。柯罗希本是都灵市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半个月前，政府指定他给库乔担任辩护律师，库乔闻讯后大骂说：“小丑，不要讨好政府，你会倒霉的。”并拒绝为柯罗希提供任何真实情况。

忠于事业的柯罗希并没有因为库乔的拒绝和威胁而放弃正义的原则。于是在一个星期前的早上，柯罗希就在自己家门口被人枪杀了。他为自己的事业献出了生命。

毫无人性的“红色旅”声称此事是他们干的。

库乔声色俱厉地说：“难道你们想步他的后尘？蹈他的覆辙么？”提心吊胆的陪审团成员哪里经得住这一吓！一个妇女首先站起来，声音颤抖着对巴巴诺法官说，因罪犯用恐吓和威胁妨碍公正的审判，她申请退席。接着陪审团成员接二连三地申请退席。

库乔在一片申请退席声中大笑。巴巴诺法官只好宣布退庭，把被告押下去。巴巴诺表情严峻地说：“我们终究要审判你的。库乔，你等着，别高兴得太早了！”

库乔大叫着说：“我等着，我等一千年！”他眼睛里射出仇恨的光芒。他在警察的押解下离开了法庭。

巴巴诺没有想到库乔以威胁陪审团的卑劣方法中断了审判。他立即和其他法官商量对策，指出不论库乔威胁法官还是陪审团，都不得同意退席，同时商定了下次开庭的时间。

转眼间离开庭时间只有两天了，这天深夜，大法官巴巴诺家的电话铃刺耳地响了起来。巴巴诺抓起听筒。一个低沉的声音说：“这里是‘红色旅’，巴巴诺，我们以上帝的名义起誓，绝不能让审判如期进行。”巴巴诺抑制住心跳，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不可能，不可能。”话筒里说：“你等着瞧好了！”巴巴诺说：“后天就要审判，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又能干什么？”话筒里说：“后天？还有两天时间足够了，明天你就会知道的。”对方挂断了电话。

巴巴诺拿着听筒发怔。明天，明天他们要干什么呢？他不由自主地瞥了墙上的挂历一眼。妻子把今天的一页已提前撕去，日历上的几个数字是：

1987 . 3 . 16，难道明天灾难要降到自己头上？想到这里，巴巴诺不寒而栗。

巴巴诺一整夜不能入睡。他无论如何没想到“红色旅”的魔掌此时将伸到意大利前总理莫罗的身上……

凌晨4点半，莫罗就起床了。他蹑手蹑脚地从妻子依列娜卧室前穿过，到阳台上去做软体操。他是个勤勉而努力的人，习惯早起，持久的锻炼造就了他矫健的身姿和坚强的意志。

可今天莫罗比平时要起早许多，他心情激动，睡不着。对于莫罗来说，今天是他30年政治生涯中最重要，也可以说是最辉煌的日子。不久前，他解决了意大利战后最大的政治危机，数月来的无政府状态就要结束，各党派在他的斡旋下达成协议，组成联合政府。今天，国会就要讨论这个协议。许多头面人物曾经私下向他保证：协议一定会获准通过。可以说，莫罗是当今意大利政坛上最举足轻重的人物。

莫罗是天主教民主党的主席，曾经五度出任总理，他解决过许多棘手的政治危机，但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样引人注目。人们说，没有莫罗，意大利早

四分五裂了。现在他们尤其体会到这一点，年底的总统竞选，他是最有希望的人选。如果这个协议得到批准，总统的宝座就属于他了。

7 点半，莫罗和妻子共进早餐。早餐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同往常一样简单：意大利馅饼和速溶咖啡。可莫罗今天吃得特别香甜。一想起国会将要通过协议的事，他虽然嚼着食物，嘴边还绽出一丝微笑。他一边喝咖啡，一边对妻子说：“亲爱的，今天国会讨论通过协议后，你要亲自炸牛排为我庆祝。”依列娜有些忧郁地说：“你高兴得有些早吧。”莫罗满有把握地说：“我坚信国会一定会通过的。”依列娜叹了口气，一时无语，过了片刻才慢慢说：“国会能不能通过，我不管，我只知道，搞政治太危险啦！”

卓罗没理解妻子这话的含义，他只觉得略有扫兴，正想说什么，门铃响了。

来人是莫罗的保镖头目、反恐怖小组警官里奇。他曾受过严格的特殊训练，反应敏捷，身手不凡，遇事冷静有决断能力。里奇是莫罗的贴身保镖。近几年来，由于各种恐怖活动在意大利层出不穷，谋杀事件也屡屡发生，为此，警方对政府要员实行严格保护，也给莫罗派了 5 名保镖。

莫罗对此不以为然，曾极力反对警方的决定。他说，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就要时时刻刻同人民在一起，如果被他们隔绝起来，那是最可悲的事。可警方没有让步，对他说，你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意大利的政局，这绝不是个人的事。莫罗无奈，只好服从，但终于拒绝了警方要求，仍然坐他的菲亚特牌小轿车而不肯坐防弹轿车。

莫罗哪能料到，由于不肯坐防弹车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8 点半，莫罗准备离家，在门口，他同妻子深情地吻别。伊列娜叮嘱说：“早点回来，我炸好牛排等你。”莫罗道别了妻子，走向菲亚特汽车。里奇早已在司机旁坐好。另外 4 名保镖坐在另一辆随行汽车里。汽车开始启动，莫罗在反光镜中看到依列娜瘦削的身影，在尘埃中一点一点地缩小。这对情深意笃的夫妇万万没想到，今天竟是永别！

在汽车开始启动的同时，“红色旅”的“宝石行动”——绑架莫罗便已经开始了。

4 名“红色旅”罗马小组成员，静静地站在玛利奥夫尼街和斯特里街的交叉处。莫罗去国会大厦，这里是必经之路。他们化妆成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雇员，身穿制服，提着旅行包，像是在等候机场的班车。他们中有一位娇小玲珑楚楚动人的金发美女，名叫安娜。安娜曾就读于特伦多大学，是“红色旅”的创始人之一，是库乔的同窗和挚友。为了解救库乔，她担任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此时，她把自己打扮成空中小姐模样。

其实，绑架莫罗的阴谋早在半年前就开始实施了。安娜和她的伙伴多次到这里勘察地形，选择路线，一次又一次进行实战演练，甚至还到捷克斯洛伐克去进行实战演练。他们连最微小的细节也没有放过。譬如：安娜发现，就在他们要下手的地方，每天早晨 8 点半，有一个花匠开车来这里贩花。为了不让他妨碍“宝石行动”，昨天夜里，安娜派几个人潜入花匠家，把他的汽车轮胎全部刺破。今天早晨，花匠消失了。为了在得手后顺利逃跑，她又命令手下喽罗偷来一辆警车。在罗马，唯有警车才能畅行无阻。

马路对面站着几个穿电话公司制服的人，也是“红色旅”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在行动的同时破坏这一带的电话线。执行这次任务的所有“红色旅”成员，都是经过安娜精心挑选的，他们个个身手不凡，许多成员曾在东欧国

家受过严格的训练。可以说，一切都是无懈可击的。

太阳已经升得好高了。街上行人渐渐多起来。安娜镇静自若，但她的几个同伙已显出紧张的神情。安娜早就打探到今天是国会讨论协议的日子。莫罗今天无论如何也会到国会去的。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的同伙不停地斜视安娜，安娜狠狠瞪了他一眼，意思说：废物，沉住气！然后就仰起头来，让春天暖融融的太阳照射自己的面庞。过往行人若是无意瞥一眼安娜，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天真美丽的女郎，竟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的头目。

9点整，莫罗总理的轿车沿斯特里大街驰来，保镖的随车跟在后面。

安娜轻轻地咳了一声，安东尼奥取下帽子，这是暗号。

布置在四周的“红色旅”成员们看到这个暗号，马上明白：“宝石行动”正式开始！

一辆白色的菲亚特128型旅行车，从一条小巷里开出来，在斯特里大街中央缓缓而行。

莫罗的车恰好此时来到，被迫减速。里奇有些警觉，但当他看到那辆旅行车挂的是外交牌照时，便放心了。他哪里晓得，这辆车是“红色旅”从委内瑞拉大使馆偷来的。为了绑架莫罗，“红色旅”真是用尽了心机！莫罗的车跟在旅行车后面缓缓行驶了一百多米，来到两条大街交叉处。里奇看见了路旁站着的4个穿民航制服的人。

9点03分，莫罗看了看表，国会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对司机说：“超车！”司机正要加速，意外发生了。前面的旅行车突然刹住。莫罗的司机也连忙急刹车，汽车发出刺耳的怪叫，但终于没有撞上前面的车。里奇猝不及防，脑袋在挡风玻璃上狠狠碰了一下，眼冒金星；随车的司机没有来得及刹车，“哐”地一声撞上了莫罗的车尾巴。保镖们都不同程度地负了伤，有的撞昏了头，有的擦了手。

这时，安娜猛一挥手，4个人同时打开旅行包。转眼间，乌亮的冲锋枪出现在他们手中，他们闪电般地向莫罗的汽车冲来，这一切发生得这么突然，以至于最有经验的受过特工训练的里奇都被惊得目瞪口呆，直到安娜冲到汽车跟前，他才掏枪。

可是迟了！安娜用枪托猛击挡风玻璃，其动作之迅猛，简直不像一个娇弱女子所为。莫罗的固执终于害了自己：“因为不是防弹玻璃，玻璃哗啦啦地碎了。安娜端着冲锋枪对准前排座位乱扫，里奇和莫罗的司机全身被打得像马蜂窝一样，连叫都没叫一声就死了。

后面的随车情形更惨！4个保镖看有人端枪冲来，知道中了伏击，刚要开门冲出去，一阵弹雨铺天盖地而来。3个保镖立即被击中要害死在车里，最后一个身材比较壮实的保镖，勉强能打开车门冲到外面，才踉跄数步，就被一排更为猛烈的子弹打倒。

从撞车到所有保镖被击毙，只有几十秒。“红色旅”几个月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安娜打开菲亚特的后门，用冲锋枪指着莫罗，喝道：“出来！”另外几个同伙也跑过来，他们以为莫罗一定会吓瘫了。蜷缩在车里发抖。没想到这位前总理却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尊大理石像，他那张溅满了司机和里奇的鲜血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当第一排枪响的时候，莫罗已经知道今天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他不想抵抗，也无力抵抗，只在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保镖能死里逃生。他不愿别人

因为自己而受到伤害。凶手们再次喝令他：“出来！”莫罗出来了，双手紧紧抓着公文包。面对恐怖分子黑黝黝的枪口，他没有惊慌，还故意把头昂得高高的。

安娜指着路旁的一辆警车，喝令莫罗说：“跟我们走！”

莫罗回首望了望司机和里奇的尸体，眼里含着一缕痛苦和悲凉，然后走向警车。

左边一座楼房的阳台上，有一位妇女自始至终目睹了这一切，事后她激动地对别人讲：“莫罗是意大利最勇敢的男子汉。”

安娜厉声命令莫罗上车，莫罗顺从了。

有人立刻打电话报警，但电话线被割断了，无论如何也拨不出去。

半小时后，警察才赶到现场。斯特里大街上到处是围观的人，却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大多数人面呈冷漠之色，这样的凶杀案人们见得太多了。在意大利，不光有恐怖组织“红色旅”，还有更大的恐怖集团黑手党，这些无法无天的家伙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所不同的是，今天被恐怖分子绑架的是这个国家的“国父”，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意大利实际上的领袖莫罗。

依列娜在子女陪伴下来到现场。目击惨不忍睹的场面，这位一贯稳重而冷静的前总理夫人，竟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

意大利举国震动，全世界也为之震动了。是谁绑架了莫罗？在最初的48小时里，人们众说纷纭，全世界也在猜测。

3月19日中午，《罗马信使报》记者沙巴拉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要他到亚兰诺路天桥下去拿“红色旅”的第一号公告。沙巴拉惊讶地问道：“难道是你们绑架了莫罗？”对方沉默。沙巴拉愤怒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绑架莫罗？”对方平静地回答说：“我们要向全世界宣战。”

沙巴拉放下电话听筒，来不及报告这一情况，立即跑到指定地点，果然找到了一份“公告”。

“红色旅”提出了用莫罗交换库乔的要求，并附了一张莫罗的照片：莫罗神情沮丧地坐着，背后的墙上贴着“红色旅”的徽号：环绕着圆圈的五角星。

《罗马信使报》在显著的位置上发表了“公告”和莫罗的照片。世界各大报刊也纷纷转载。

罗马戒严，警察倾巢出动，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大搜捕行动。警察和军队把偌大一个罗马城像篦子梳头般地过了一遍，但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这样，警方作出决定：“红色旅”一定把莫罗转移到其它城市了，立即开始全国性大搜捕。警察们搜遍了每一个地方，但是依然没有一丝线索。

其实，莫罗并没有离开罗马，他所在的地点甚至跟他被绑架的地点斯特里街不太远。安娜和伙伴们早在一年前就选好了这个地点：一座地下停车场的修理库。他们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在那里盖了一座隔音的密室。就在莫罗被绑架的当天，警察便对修理库进行搜查，却没有发现密室，真是件天大的憾事！

“红色旅”不断发表公告，不断提出要求，然而，所有这些，均遭到意大利政府的拒绝。

依列娜也多方奔走，希望政府能同“红色旅”对话，拯救莫罗的生命。然而，他们沉痛地说：“政府的立场不能改变，我们绝不同恐怖分子对话。”

这样，即使莫罗遇害，也等于意大利人民精神的胜利。”

与此同时，安娜和她的同伙们对关在密室里失去自由的莫罗，轮番进行“心理战”，进行心理折磨。密室设备不差，澡堂、厕所、电视机、电冰箱，一应俱全。还有很多书籍，不过那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被“红色旅”称为“革命文学”的书籍。

“红色旅”在密室建立了“人民法庭”，几乎每天都要对他进行审判。莫罗起初觉得这一切像是小孩子开玩笑一样荒唐、无聊，但他不得不聆听安娜等人对他的“指控”。他根本不把这出闹剧当回事。莫罗从政30年，最大的本领就是忍耐力极强。他可以滴水不沾唇，发表好几个小时的谈话，他可以连续举行十几个小时的会议，这种“审判”算得了什么！同时，一个信念在支持着他：他最终还是可以从这里走出去的。

莫罗知道政府一再拒绝同“红色旅”对话以后，开始变得不安起来。他的忍耐力也受到影响。除了“审判”，“红色旅”还要对他进行所谓的“疲劳轰炸”，强迫他阅读“红色旅”的文件、大事记、公告等等。还专门找来攻击他的书籍让他看。这一切，渐渐变成了对他的精神折磨。精神折磨起了效果。从第10天起，莫罗每晚都做恶梦。但他仍在抵抗，支持他的还是那一线微弱的生机。

当政府拒绝谈判时，“红色旅”要求莫罗给政府写信，重复他们的要求。莫罗想拒绝，但求生的欲望很强烈。他只好写了，同时，一个念头从心头掠过：政府会不会为了国家法制的尊严而抛弃我呢？他自己的想法有些自私。如果为了法制的尊严而抛弃他，也无可非议，国家的法制正是他用了毕生的心血来建立的啊。

莫罗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封封遭到拒绝。政府官员发表演说回答他的信，他在电视里可以看到。有时他很体谅他们的处境和苦衷，有时却想不通：他们都是我的亲密朋友和同事，为什么竟如此狠心，置我的生死于不顾呢？但接下来的依然是拒绝。政府决心不和恐怖分子谈判。

莫罗感到伤心已极。他觉得政治是那樣的自私自利，而且没有人性，妻子依列娜也常常这么说呀。但当年踏入政坛时为什么没意识到？30年，太久了，今日醒悟，为时已晚！当莫罗言词恳切，凄哀万分的第80封信遭到拒绝时，他彻底绝望了。他开始等待死亡的来临。

这是莫罗遭绑架的第55天。下午1点，安娜带着几个人来了。他们向莫罗宣读了“人民法庭”的判决：对前总理、资产阶级的代表莫罗的一切指控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一刻，莫罗心里平静极了，他注视着安娜。她那张有着惊人美丽的面孔上出现神圣、庄严的表情。莫罗觉得这样漂亮的姑娘是应该有同情心的，可她恰恰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莫罗想起了她端着冲锋枪向汽车内扫射的情景。

安娜问莫罗还有什么要求？莫罗想了想，问她：可不可以请一个神父为他做祈祷？安娜同意了他的要求。不一会，一个蒙着眼睛的神父被领到这里，为莫罗做临终的祈祷。

莫罗换上被绑架时穿的衣服：白底蓝条衬衣，瑞士毛衣和浅蓝色的外套，并结上那条白色图案的领带。这衣服又令他想起妻子。离家那天，衣服是妻子为他挑选的。他不可抑制地想念妻子，他力图不那样想，可是办不到。他终于认识到，自己一生致力于政治，却并没有练就一副铁石心肠，在这个最

后的时刻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意志。

“最后的晚餐”之后，安娜问莫罗：“给你服一点镇静剂吧？”莫罗不假思索地说：“不，不需要！”他早已把今天看成是折磨的结束。

“行刑”时间到了，安娜把莫罗押出密室。

外面停着一辆雷诺轿车，安娜命令莫罗侧卧在后座的地板上，莫罗顺从地把身子蜷曲起来。安娜举起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对着莫罗的胸膛，连发10枪，但故意不打心脏。

10分钟之后，莫罗死去。

莫罗的尸体是在罗马市中心距基督教民主党总部只有几公尺远的地方被发现的。当罗马电视台新闻广播员呜咽着宣读特别公告时，意大利全国一片哭声。

内政部长、莫罗的好朋友科西嘉泪流满面地说：“‘红色旅’想制造内战。但是，我们将取胜，民主将取胜。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失败的。”他的话没有错。“红色旅”杀害了一个莫罗，却失去了一切。

那些天，无数意大利人自发举行示威游行，表达他们对“红色旅”的憎恨和愤怒。示威的盛况可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人欢呼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垮台相比。

“红色旅”过去的一些支持者们纷纷改变立场。“红色旅”内部也出现分歧和混乱。

是的，莫罗的血没有白流。虽然他的生命被恐怖分子过早地划上了句号，但他的遇害，只能使意大利人民更加看清了“红色旅”的本质，更加激励着人们同恐怖分子与恐怖活动作坚决的斗争。

教堂里挤满了人，为莫罗祈祷的意大利人民，他们都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祈求莫罗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安娜等“红色旅”一伙凶手，惶惶不可终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绑架杀害前总理莫罗一案终于被侦破，安娜等人被押上了被告席，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竟文）

霹靂行劫

1988年12月1日，原苏联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首都奥尔忠尼启则市北风凛冽，雪花飞舞。市印刷厂门前行人稀少，马路上来往车辆寥寥，偶尔有一辆汽车在风雪中呼啸而过。

下午3点30分左右，一群小学生欢蹦乱跳地拥出市印刷厂厂门。他们是第四十一小学四(4)班的31名10岁左右的学生，在班主任叶菲莫娃带领下，刚刚参观了这家印刷厂。同学们整好队，准备步行回家。正在这时，从厂门对面停着的一辆大客车上，跳下来一个戴大皮帽的男人。他横过马路，走到叶菲莫娃面前，讨好地笑了笑，说：“我是校外辅导站的，我们的头儿要我用车送你们回学校。”

事情来得太突然。叶菲莫娃不由得愣了一下，心里说：事先没这个安排呀，以前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啊。她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中年男子，又看了看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们，便答应了：“好吧。孩子们，上车去吧！”小学生们一窝蜂似地挤上了客车。一股刺鼻的汽油味扑面而来，叶菲莫娃一看，车内紧挨着座位，放着七八个大小不等的汽油桶。她连忙要求大皮帽将汽油桶搬到驾驶室，以免发生危险。大皮帽却奸笑一声，说：“不用搬，等一下会有用的。”

叶菲莫娃等车开了，才注意到车厢里还有3个男人。小学生莎娃认出其中一个她是她的邻居穆拉维廖夫，便亲切地问：“叔叔，您怎么也坐这辆车呀？”穆拉维廖夫冷笑一声，说：“我是来护送你们的。”说完，动手将车内的窗帘拉了起来。

叶菲莫娃不禁疑窦丛生。过了一会，她偷偷地掀开窗帘一角，发现汽车正朝着与学校相反的方向行驶。她见事不妙，喊道：“司机，快停车！让孩子们下车！”但就在这时，她看到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男人正用匕首抵住司机的腰眼。

大皮帽呼地一下站起来，掏出手枪，凶神恶煞地吼道：“不许动！你们现在都是人质了！我只要朝汽油桶开一枪，汽车就会爆炸，你们就会统统完蛋！”

原来，这伙人是绑匪！但他们是何许人？为什么要绑架小学生呢？

那戴大皮帽的是绑匪的头子，名川亚克西扬茨。这是个“五毒俱全”的家伙，两年前因酗酒、赌搏，欠了赌友扎法罗夫一万多卢布。老婆塔玛拉劝他几句，他非但不听，反而拳打脚踢。为还债，他又开始偷厂里的东西。结果东窗事发，被关进了监狱。塔玛拉实在无法与他生活下去，就跟他离了婚。

亚克西扬茨出狱后，并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不仅照样聚赌酗酒，而且仇视周围的一切，向往到西方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于是做起了“出国梦”。

在一次聚赌时，亚克西扬茨流露出想出国的念头，没料到与赌友们一拍即合。他的三个赌友阿纳斯诺索夫、穆拉维廖夫、维什尼亚科夫也都有此想法。于是，他们便多次在一起合谋出国的勾当。偷越国境肯定不行，即使跑出去也会被遣送回国，因为周边国家不会因此而得罪苏联的。劫机似乎是个好办法，但这段时间在苏联连续发生几起劫机事件，机场防范极严，很难将凶器带上飞机。怎么办，亚克西扬茨猛然想起，最近放映的一部外国影片里，有一段恐怖分子通过绑架人质而获取飞机，逃出国境的情节，他便提议：“我

们何不先绑架个人质，再以此要挟政府提供飞机，把我们送出国？”三个同伙认为这个方案可以一试。

从此，他们时常在一起密谋，并开始付诸行动。要绑架人质，首先得有武器，亚克西扬茨通过昔日债主扎法罗夫，从黑社会组织那里弄到一支小手枪。接下来是物色绑架对象，这可使他们伤透了脑筋。几个月前，一支“家庭爵士乐队”，全家11口人劫持了一架图—134客机，押有60多个人质，满以为能一举圆了“出国梦”。但这吓唬不了克格勃，他们一边谈判，一边就冲上飞机，毫不顾及那些普通人质的死活。结果，劫持人质者全部成了阶下囚。可见绑架一般人质无济于事。要说劫持真正有影响的大人物吧，人家警卫一大堆，还没等你沾边，你就成了枪下鬼了。他们议论来议论去，总没有个结果。

1988年11月30日晚上，4个歹徒又在一起聚会，依旧为绑架对象问题争论不休。穆拉维廖夫眼珠子一转，突然想起隔壁邻居家小孩，听说她所在的那个班级明天要去参观市印刷厂，何不利用这天赐良机呢？他把桌子一拍，喜滋滋地说：“我们绑架不大人物，就绑架一批小学生吧。他们人虽多，却没有反抗能力，好下手，好看管。人多反而能增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砝码’。何况人们对幼小儿童有一种天然的怜爱，政府和克格勃肯定不敢贸然动手，否则会引起众怒。”话一出口，同伙们都齐声叫好，认定这是最佳的方案。虽然时间仓促一些，但机不可失，必须连夜作准备。

经过一番策划，他们兵分两路。亚克西扬茨和穆拉维廖夫窜到马路上，见一辆大客车开过来，就拦在路中，要求搭一段车。刚上车，他们就掏出手枪，逼迫司机把客车开到穆拉维廖夫家。阿纳斯诺索夫和维什尼亚科夫则设法弄来七八个汽油桶，把它们放在车上。这是他们罪恶计划的第一步。

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他们又迫使司机将大客车开到市印刷厂大门口，等待小学生们出来。从而实施罪恶计划的第二步。

被骗上车的孩子们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顿时吓懵了。有的甚至哭了起来。班主任叶菲莫娃为稳住学生们的情绪，轻声细语地安慰着惊恐不安的孩子们，给他们讲童话故事，并领他们唱起了队歌。

嘹亮的队歌，使亚克西扬茨十分害怕。他挥舞起手枪，怒声吼道：“不准唱！不准唱！”随后，他又挤出一点笑容，说：“孩子们，你们谁愿意解下红领巾，我就放谁下车！”解下红领巾，就能脱离这恐怖的地方。但孩子们望了望班主任老师那威严的目光，想起老师平日讲的有关红领巾的故事，谁都没有动手。他们都明白，红领巾所蕴含的意义，它比生命都宝贵。

穆拉维廖夫见孩子们都不理睬，就动手去解莎娃的红领巾。

可他刚碰到那鲜红的领结，手上就被莎娃狠狠地咬了一口。穆拉维廖夫大叫一声，疼得捂着手在车内乱跳，孩子们见绑匪这副丑态，不禁高兴得拍起手来。

这时，大客车开到了州党委大楼前的广场上。为引起人们的注意，亚克西扬茨拿出一张著名歌星肖像的宣传画，强迫叶菲莫娃在反面写上：“快救救我们！车上有人质—31个小学生。不要开枪，车内有汽油桶，会爆炸！赶快送一部对讲机来！”

亚克西扬茨把这张纸挂在车窗外。

但是，此刻天还下着大雪，广场上行人稀少，没人注意到这辆大客车。亚克西扬茨急了，将一只10公升的汽油桶扔出窗外，证明车上确有汽油，可

还是没引起过路人的注意。过了一会，有一辆小轿车开进广场，他便掏出手枪，对准小轿车就是一枪，玻璃被打碎，司机受了伤。

枪声惊动了行人，他们朝大客车车窗一望，不禁大惊失色，赶紧向警方报告。

下午4点30分，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的内务部副部长巴塔戈夫上校，率领一个行动小组赶到了现场。

巴培戈夫上校打开了对讲机，向匪徒喊话，表示同意他们的要求，同时也安慰车上的师生，相信政府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一事件。几分钟后，民警少校胡阿多诺夫只身一人走近客车，双手高举一部对讲机，从窗户送进大客车，然后又在绑匪的监督下离去。

恐怖分子立刻用对讲机与当局谈判。阿克西扬茨沙哑着嗓子威胁道：“你们听着，我们手里有32名人质，除一名老师外，其余都是孩子！我们要求你们把我们送出国。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就把这些孩子全炸死。我可不怕死的，更不怕坐牢，我才从你们的监狱里放出来。”

上校强按住心中的怒火，平静地答道：“我很清楚，车上有儿童。只要你们释放全部人质，我们就答应你们的一切要求。你们的条件是什么？”

匪首得意地狞笑一声，说：“我们要一架飞机和几名机组人员，还要一些急救药品。用飞机把我们送到国外去。”

“这些要求我们都可以满足，但你们不得伤害孩子。”接着，上校问道：“你们要到哪个国家？”

阿克西扬茨没想到谈判进展得如此顺利，一时也想不出该去哪个国家，便与其他几个绑匪商量了一阵，才说：“我们要去以色列。”

上校见对方迟迟才答复，知道这几名绑匪并不是精于策划的职业恐怖分子，便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下来：“行，我负责让你们去以色列。我可以提供一架伊尔—76T型运输机，不过，这里的机场大小，飞机无法起落。这样吧，你们可以到矿泉城去乘飞机。怎么样？现在，我希望你们先把车上的女孩子放出来。”

阿克西扬茨不答应。他坚持先兑现一部分条件，再释放一批人质。

绑架31名小学生的消息，通过电波迅即传遍了整个苏联和全世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立即责成克格勃官员研究处理这一突发的恐怖事件，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波诺马廖夫担任这次反恐行动的总指挥。他会同有关方面的官员，很快制定了名为“霹雳行动”的反恐怖计划。并将与车上绑匪有关的人也召集到指挥中心，其中包括阿克西扬茨的前妻塔玛拉。

傍晚时分，载有人质和恐怖分子的大客车，前有交通警车开路，后有克格勃3辆警车护送，一路上浩浩荡荡地向矿泉城机场驶去。天还下着雪，道路很滑，坑坑洼洼的，汽车晃来晃去，缓缓而行，足足爬了8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抵达矿泉城机场。

在途中，巴塔戈夫上校不时用对讲机与恐怖分子谈判，以稳住他们。与上校同车的阿克西扬茨的前妻塔玛拉也通过对讲机与前夫对话，希望他悬崖勒马，释放人质、放弃罪恶计划。

等车队到达机场，阿克西扬茨看到机场确实停着一架伊尔—76型运输机，这才答应释放了一名身体最虚弱的小女孩。

依照“霹雳行动”计划，苏联当局已调来一支反恐怖部队埋伏在运输机

的周围，并从附近几个城市调集大批民警到机场，以防不测。波诺马廖夫亲自坐镇，现场指挥。

大客车刚在运输机旁停下来，一个赤手空拳、身着便衣的人走到离客车十来米的地方，他就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国家安全局的谢列梅捷夫上校。他拿起对讲机继续与绑匪谈判，苦口婆心地劝说恐怖分子回头是岸。但绑匪依旧一意孤行，并进一步要求当局提供防弹背心、手枪、自动步枪、手铐、毒品等。此外还要 10 万美元，这伙视财如命的赌徒，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们要到那个花花世界去，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

谢列梅捷夫一一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表示，只要不流血，释放全部人质，所有的要求都可以满足。

从清晨开始，当局每隔一、二个小时，就送一批绑匪所需物品，恐怖分子也对应地释放几个孩子。亚克西扬茨原打算先把叶菲莫娃打发走，但女教师坚决不走，她说：“我是班主任，只要这里还有一名学生，我就不会离开。”最后，客车上只剩下女老师和 11 名小学生。

下午 3 点 50 分，恐怖分子要求登机。他们每个人抓住一个孩子作掩护，押着女教师和其他孩子，一起上了飞机。

他们仔细地搜索了整个飞机，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然后把住机舱门口，对上机的 4 名机组人员逐一检查，并给飞行员们戴上了手铐。

谢列梅捷夫要求绑匪放掉所有的孩子。亚克西扬茨狡猾地答道：“先把塔玛拉带上来，我有话对她说，她不上来我不放人。”

塔玛拉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她明知有危险，但为了救孩子，便勇敢地登上了飞机。

可绑匪又提出了条件。亚克西扬茨要求谢列梅捷夫赶紧把 10 万美元送上飞机。

上校沉着地答道，“外汇过一会儿就到。这样吧，你们先把孩子们和教师都放了，我愿意做人质。”

匪首觉得带这么多人质走，确实难以控制，况且他认为谢列梅捷夫上校也够得上是“大人物”了，当局会考虑他的份量，不会轻举妄动。于是，他与其他绑匪商量一阵，同意了。

谢列梅捷夫按照绑匪的要求，扔掉武器，双手抱头，走上飞机。两个绑匪立即给他铐上手铐，并搜查全身。余下的 11 名孩子和女教师含着热泪，注视着这位可亲可敬的勇士，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走下了飞机。女教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这个 26 岁的共青团员，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忠实地履行了她的职责，保护了全班学生。等待在机场上的学生家长纷纷围上来，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

大约半个小时后，一只装有美元的皮箱送到舱门外。

绑匪留下两人监视驾驶员，准备开动发动机。亚克西扬茨带一个绑匪押着谢列梅捷夫上校来到舱门口。匪首打开皮箱，见到那一捆捆花花绿绿的美钞惊喜万分，贪婪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与另一个绑匪忙不迭地俯身数起钱来。就在匪徒疏忽的一瞬间，谢列梅捷夫敏捷地跃身跳出舱门，就地连打几个滚，然后爬起来就跑。

这时，“嗡嗡”的发动机声已经响了起来。绑匪也顾不上朝上校开枪了，反正机上还有 4 名机组人员和塔玛拉做人质，谅克格勃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于是，亚克西扬茨命令立刻起飞。

飞机呼啸着飞上天空。经苏呼米出境，飞越土耳其、塞浦路斯，于莫斯科时间当晚6点45分飞抵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上空。

绑匪们一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出国梦终于实现了。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早在飞机从矿泉城机场起飞之前，苏联外交部即打电话给苏联驻特拉维夫的领事马尔基罗索夫，指令他就此事与以色列当局接触。

实际上，在劫机事件发生前，苏以双方就彼此在对方的财产归属问题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谈判。这次巧遇劫机事件，苏方有求，以方岂能不利用这个机会，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来呢？

不久，以色列外交部代理总干事，打电话给马尔基罗索夫，称以色列当局同意接收飞机，表示愿意将劫机犯引渡苏联。

当被劫运输机飞抵以色列领空时，以色列空军迅速出动喷气式战斗机前往护航。以国防部长拉宾和武装部队参谋长达恩·肖姆龙也亲自作出安排。伊尔—76型运输机刚一降落到本古里安机场跑道，大批以色列军警便荷枪实弹，把飞机重重包围。恐怖分子以为此举不过是以当局为遮世人耳目而演出的“假戏”，便表示“投降”。

10分钟后，4名动机犯走出机舱，交出枪支。以军警扑上来，给他们戴上冰冷的手铐，并将一皮箱美元也悉数收缴。这时，这伙歹徒才大梦初醒，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了。一辆警车开来，他们被押往特拉维夫附近的阿本·卡比尔监狱。

当天晚上，苏联克格勃的特别安全小组一行19人，乘一架图—154客机神秘地飞抵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

以色列当局根据事先与苏方达成的协议，将4名恐怖分子交给了克格勃。这4名绑匪只在国外过了一天囚犯的生活，在12月3日夜里就被分别带进那两架苏联飞机，连夜押回莫斯科。这次反恐怖的“霹雳行动”终于胜利地结束了。一个月后，在法庭上，女教师叶菲莫娃和31名小学生站在证人席前，诉说了4个绑架、劫机犯的滔天罪行。最后，俄罗斯最高法院判处首犯亚克西扬茨15年徒刑，绑匪穆拉维廖夫、维什尼亚科夫、阿纳斯诺索夫各判14年徒刑。为绑匪提供枪支的扎法罗夫也难逃法网，被判3年徒刑。至此，一场震惊世界的绑架小学生劫机案终于划上了句号。

（陈济众）

联合国秘书长之死

非洲的刚果是一个矿产丰富的国家，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比利时殖民者的控制下。由于部族领袖之间不团结，内讧不已，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在著名的反殖民主义战士帕特里斯·卢蒙巴为首的民族运动党努力争取下，终于于1960年6月宣告独立。卢蒙巴组成了联合政府并担任总理。约瑟夫·卡萨武布当选为刚果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当时，刚果军队里的军官几乎还完全由比利时人担任。由于担任总司令的比利时将军埃米尔·恩森斯赤裸裸地反对刚果独立，发表“白人主子”腔调的侮辱性声明，激起刚果黑人士兵的强烈反感，在加蒂营军事基地便发生了驱逐比利时军官的事件。消息传开后，在兰斯道夫和利奥波尔军事基地，士兵们也逮捕了比利时军官，要求政府把他们从刚果军队中清除出去。

卢蒙巴支持刚果士兵的这一要求。1960年7月9日，他决定解雇恩森斯将军和所有的比利时军官，只有少数技术顾问继续留在刚果军队中。

事件发生后，西方社会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一些担心财产得不到保障的外国老板关闭了企业，纷纷离开刚果。比利时政府宣布将向刚果派遣军队。英、美、法等国立表示支持。

就在第二天，比利时空军向伊丽莎白维尔市空投了一批伞兵，他们残忍地向和平居民开了火，在大街上留下上百具尸体。然后，他们控制了这座城市。

卢蒙巴坚决要求联合国干预这一事件，并迫使比利时撤军。他宣布断绝与比利时的外交关系，并声明，如果比利时军队三天之内不离开刚果，他将请求苏联帮助。

7月24日，他出人意料地飞往美国纽约，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会见了。但会谈都没有结果。

当卢蒙巴归国途中在摩洛哥停留时，得到总统卡萨武布表示对他“不信任”的消息。而且，刚果一个最富饶的大省加丹加在前不久宣布“独立”。因此，他回国后立即命令军队进驻加丹加省，并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这时，国内外的反对势力已经联合起来，9月5日，卡萨武布总统宣布卢蒙巴已被推翻，并宣布任命了新总理。

但刚果议会却支持卢蒙巴，议会举行会议，授与卢蒙巴以无限的权力。然而好景不长，9月24日，陆军参谋长蒙博托上校在国内外反对派的支持下发动了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把卢蒙巴软禁起来。同时被囚禁的还有两名支持卢蒙巴的政治家：穆波洛和奥基塔。

囚禁期间，他们曾经一度逃了出来。蒙博托上校命令搜捕，说如果不能抓到活的，就打死他们。

12月2日，卢蒙巴等人终于被抓住了。蒙博托没有杀他们，却把他们送到加丹加省，交给那个以残暴著名的自封为“总统”的冲伯，借他们的手来杀害卢蒙巴等人。

在用飞机将他们三人送往加丹加途中，几名身强力壮的巴卢巴族士兵在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扎基的怂恿下，残酷地毒打这三位被捆绑着的囚犯。直到下了飞机，当着机场人员和联合国部队的面，这种野蛮的凌辱仍在继续。

卢蒙巴和穆波洛、奥基塔三人都戴着手铐，嘴里塞着布条，已经气息奄奄了。他们的脸上和身上布满伤痕，变得面目全非。为了避免卢蒙巴被机场

上的人认出来，卡扎基命令剃掉他下巴上的胡子，摘掉他的眼镜。

冲伯事先并没有参与，只是当卡萨武布总统打来电话，押送卢蒙巴等人的飞机已经在机场上空盘旋时，冲伯才意识到他手中有个机会，可以除掉自己的冤家对头。于是，他把这事交给他的内务部长穆农戈，叫他立即把这三个人干掉。

穆农戈把三名政治家交给两个比利时军官，一个叫哈特，是武装警察上尉；另一个是雇佣军尤格上校。穆农戈给他们一大笔赏金。

卢蒙巴等三人在夜里被处死。冲伯命令把他们的尸体再抬上飞机送回去。然而航空公司却拒绝运送尸体。

穆农戈命令在尸体上浇上大量硫酸，毁尸灭迹。然后草草地埋在机场内离一个旅馆不远的地方。

卢蒙巴的失踪引起了世界舆论极大的关注。由于当时机场上有许多目击者，因此卢蒙巴等人遇害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穆农戈部长害怕了，万一追查起来，掘墓验尸，其结果对他和冲伯都是极其不利的。于是，他又命令掘出尸体，由警方派车运送到比利时“联合矿业公司”所属的矿区，把三具无法辨认面目的尸体扔到一个 200 多米深的已废弃的矿井里。

为了搪塞舆论，穆农戈一伙向报界宣称，卢蒙巴等三人的确曾经关在监狱里。可是后来在一个雷雨之夜，他们利用看守的疏忽，凿开牢房的围墙逃跑了。为了把谎言编得更加真实，穆农戈还下令悬赏缉拿逃犯：抓住卢蒙巴发给奖金 30 万法郎，抓住其他两人各发给 5 万法郎。

世界舆论对刚果局势的发展极度不安，大家都知道，非洲各部族正在刚果丛林中进行着火并，一片混乱。全世界各报刊都在报道刚果事件，要求联合国就卢蒙巴等人的下落作出正式答复，因为，在刚果还驻扎着 1.6 万名联合国武装部队士兵。

1961 年 2 月 10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讨论刚果局势。同时，给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递交了一封信，对卢蒙巴的命运表示担心。其他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也向秘书长递交了类似的信件。

紧接着，穆农戈部长宣布，在加丹加的一个偏僻乡村里发现了三名逃亡者的尸体。凶手下落不明。尸体经正式辨认后确定为卢蒙巴、奥基塔和穆波洛，并将尸体埋葬在一个由于安全原因不宜宣布的地方。村庄的名称也未宣布。

卢蒙巴的死，使得刚果更加四分五裂，原政府总理在斯坦利维尔组成了新政府。但加丹加省的“总统”冲伯和南开省的土皇帝卡隆吉等人又各自占山为王，自行其是。

新政府为了恢复刚果的统一，肃清加丹加等地的分裂主义势力，于 1961 年 9 月请求联合国提供军事援助，以实现收复加丹加。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为了解决矛盾，只好亲自到刚果去与冲伯面谈，劝他接受新政府的法令，实现统一。

这个消息立刻在电台广播了，并引起一些权威人士的不安。他们认为，秘书长此行等于去摸老虎屁股！会晤地点在罗得西亚的恩多拉市，那里归冲伯的朋友罗伊·韦连斯基爵士统治。

哈马舍尔德先来到刚果。然而。他到了机场才发现，这里除了一架四引擎的“道格拉斯”飞机外，没有别的飞机可乘。而这架飞机两天前曾在伊丽

莎白维尔遭机枪射击，受到损伤。但瑞典机长佩尔·加伦维斯特同机械师们检查以后证实：子弹仅打穿了一个喷嘴的外壳。另一部发动机边缘部分稍有损伤，其它部分一切完好，不会妨碍飞行。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刚果的联合国部队竟没有能力保障联合国秘书长的飞行安全。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联合国部队的确没有可供护航的歼击机。因此，联合国秘书长除了多带几名随身保镖外，他的飞行安全实际上毫无保障。

机组人员都是瑞典人，他们全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但是，机长加伦维斯特在起飞前说，飞机将途经卢卢阿堡；但实际上，他们飞的却是另一条航线——绕道坦噶尼喀湖，沿一条弧线飞往恩多拉。

随同秘书长前往的还有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和两名美国顾问韦索夫和法布里。此外还有哈马舍尔德的秘书，以及几名保卫人员。

机组准备工作就绪，乘客陆续登上饰有联合国蓝色标志的飞机。刚果时间大约下午 5 时，飞机离开机场跑道。

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次死亡飞行。

哈马舍尔德会晤冲伯是一次绝密行动，因此在起飞前机场既没有外交官，也没有记者。但新闻界还是很快知道了这次行动的消息。飞机起飞 20 分钟后，广播电台就报道了秘书长的行动计划。

经过 6 个小时飞行，飞机已经接近恩多拉机场，并与机场调度员取得了联系。调度员肯贝尔·马丁在飞机降落前 10 分钟，通知飞机驾驶员，把飞机下降到 1800 米高度。他听到机长回答：“我们在恩多拉上空。我们看到了你们的灯光。正在降低高度……”

可就在这时，飞机不知为什么，却偏离了方向，撞到了海拔 1290 米的恩多拉山上，爆炸并燃烧起来。机上的人除了一名叫哈罗德·朱奈恩的上士还有一口气，其余人全部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遗体被抛到一边，虽然已经烧焦。但因他手臂上戴着一只银手镯，所以很容易辨认出来。

尽管飞机坠落地点离恩多拉机场不过 15 公里左右，因为在夜间，搞不清飞机失事准确地点，救援工作在灾难发生八个小时以后才开始。在发现飞机残骸 35 分钟后，一个救援队赶到了那里。

那位叫朱奈恩的上士最终还是没活下来。在他临终前，有几分钟他恢复了知觉。英国警官询问飞机迟迟不着陆的原因。朱奈恩回答：“秘书长先生说，我们飞回去。”沉默了一会，他问，“我这是在哪里？”

“在北罗得西亚。”警官说，“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你们呼叫声时，你们在恩多拉机场上空。”

朱奈恩轻轻地说：“发生了爆炸……”

“在哪里？在降落区域内吗？”

“是的。”

“后来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我们飞得很快，后来发生了相撞。到处都是爆炸声，我抓住了安全阀门上的把柄，跳出来了。”“其他的人呢？”警官又问。

朱奈恩声音微弱地说：“他们没来得及。秘书长先生说：飞回去……”

朱奈恩上士说到这里又失去知觉，而且后来就一直没醒过来。

全世界都在关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仅仅是一次意外事故吗？是驾驶员的过失造成的吗？还是因为其它阴谋？

机长加伦维斯特是第一流的飞行员，他的总飞行时间为 7841 小时；另外两名飞行员也是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他们不可能同时犯同样的错误。

地面人员的可靠性也是不容怀疑的。

这就是说，这有可能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冲伯同伙的地盘上发生的。

恩多拉位于铜矿地区中心地带。恩多拉机场是一个拥有先进设备的现代化机场。这天是星期天，机场从早晨起就十分繁忙。大约中午时分，机场人员就接到通知：准备夜里迎接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但英属罗得西亚歼击机中队的马瑟少校却在头一天就把他的机群停到了恩多拉机场上，莫非他早在 24 小时之前就知道这件事了？

另外，还有三架美制“达科他”型飞机不知根据谁的命令，也等待在机场，开动着马达停在跑道上。后来有消息说，这三架飞机上的电台是同美国当局保持无线电联系用的。美国将军们希望从现场了解第一手情报。

傍晚前，冲伯乘坐的专机已在几架歼击机保护下，准时降落在恩多拉机场。冲伯被前呼后拥地送进候机大厅的贵宾休息室。在那里安顿下来。

夜里，就在整个机场都在等待秘书长的飞机降落时，飞机忽然消失了音讯。十多分钟过去了，也不见飞机的影子。那些在机场上恭候的人们认为，想必是哈马舍尔德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取消这次毫无意义的会晤？可是要知道，飞机已经飞了 6 个小时，怎么可能不休息一下就折回头呢？如果从另一方面想，它不回头，也就不会撞到恩多拉山上。上士临死前的话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机长显然已经准备降落，他遵照地面的指示，已经降低了飞机的高度。如果秘书长临时改变了主意，也应该通知地面的！

显然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

这个谜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开。

1962 年，也就是在那之后的第二年，有个名叫林斯特尔的瑞典记者揭露说：“有一个绑架联合国秘书长的计划，但结果却意外地因飞机失事而没有付诸实施。”据这位记者说，向他提供这一情报的就是加丹加军事副国务秘书雅克·社斯曼，计划就是他亲手制定的。这项计划原定由加丹加情报中心的特工、比利时中尉罗伯特·海泽来执行。

计划过程很简单：海泽将搞一套联合国部队中士的制服及必要证件，并在方便的时候混到陪同哈马舍尔德的人群中去。然后跟他们上飞机。飞机起飞后，他将用自动步枪迫使驾驶员把飞机飞到冲伯的领地上，在加丹加的科尔维奇基地降落。

乍看起来，这个计划似乎可行。而实际上，海泽要想混上飞机谈何容易！这位瑞典记者的揭露并没有旁证，谁又能说是，或者不是呢？

总之，谜并没有解开。

（华炳）

伦敦地铁大火灾

地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据统计，地铁所发生的事故仅为地面交通工具的百分之一。伦敦地铁，作为全世界最古老的地铁，在它长达 120 多年的历史里，除 1975 年 2 月发生意外撞车事故，造成 43 人死亡、74 人受伤外，只有 14 人死于其他事故，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地铁。可是，1986 年的一场特大火灾，却给伦敦地铁的“安全”打上了问号。

1986 年 11 月 18 日黄昏时分，伦敦城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中。在英格兰银行供职的 19 岁的德比·伍兰妮小姐，由于接待了一位难缠客商，使她下班时间推迟了半小时。她迈出银行大楼，疾步奔向街头杂乱的人流中，她的父母正等着她回家呢。

伍兰妮小姐无心观赏伦敦都市的夜景，径直奔进国王十字地铁站。这个地铁站是伦敦地铁最大最繁忙的车站，又是通往英国东北部、苏格兰和约克郡的 5 条主要地铁干线的交通枢纽，它每天接送 30 多万乘客，缩短了伦敦与周围城镇的距离。

德比·伍兰妮小姐随着人流向站内北部线——维多利亚线和比加地利线的共用进出口处走去。当她踏上金斯克鲁斯中央大厅木制自动扶手电梯时，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时针正指向 19 点 30 分。这古老的木制电梯，极为陈旧，据说已有 46 年历史，但眼下还像展示老古董一样，依旧让其运行。电梯载着她朝售票厅方向升去，在那里，她将转乘郊区地铁回伦敦北郊的家。此刻正是下班高峰时间，地铁站来去匆匆的乘客达 4 万之众，他们蜂集于此，又分乘不同方向的 5 条地铁线路而去。

突然，伍兰妮小姐感到脚下热乎乎的，并嗅到一股异样的烟味。她低头一看，发现木电梯底下闪现出红光，似乎还隐隐约约看见一片烟雾。她心中一惊，本能地猛推身前的人群，尖叫道：“救命啊！电梯失火啦！”

周围乘客都为这位金发姑娘的失态而惊诧，但紧接着，他们也嗅到一股异常的气味，便急速地将这一情况报告正在值班的地铁工作人员。过了一会，地铁站内响起了刺耳的报警声。

实际上，在此前一小时，已有一位乘客向工作人员报告说，有一种令人生疑的糊味在散发。但是，在这拥挤、混乱、废物成堆的巨大地铁车站里，仅有一股异样气味并不足以引起工作人员的警惕，因为政府预算的减少，地铁工作人员削减，他们的工作本来已够紧张了。就在这一小时中，火焰在人们难以觉察中蔓延着。等到伍兰妮小姐发现呼救时，已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大火了。

警报响后不久，伦敦苏豪区消防局便接到 999 火警电话，它立刻通知离国王十字地铁站最近的尤斯顿消防站。当时，这个消防站正忙于扑灭一家医院的火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医院在数小时后，却成了地铁大火伤亡者的主要收容地。消防站长官克拉克接到电话，立刻命令消防车从医院撤出，开往国王十字地铁站。

惊慌失措的伍兰妮小姐一俟电梯升到售票大厅，就赶紧排队买票，准备乘郊区地铁回家。然而已经晚了，她已陷于此次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她买到票，自动扶手电梯已燃起大火。顷刻间，整个大厅被烟火吞噬，刺鼻的浓烟翻滚着，从四面八方向人群袭来。人们被熏得睁不开眼，泪如泉涌。即使强睁开眼，在烟雾中咫尺难辨，到处都是滚烫的，似乎到处都吐着火舌。一股

强烈的橡胶烧焦的气味直刺到喉咙，大家都在猛烈地咳嗽，年老体衰者甚至咳出血来。伍兰妮小姐更加恐慌，随身带的雨伞早已不知弃在何处，一头金发散乱开来，像被烤成火鸡一样。她泪痕满面也顾不上揩擦。突然，她听到一个老太太在呻吟着：“救命啊！我挺不住了！”她顺声摸过去，试图将被推倒在地的老太太搀扶起来，但后面拥来的乘客实在太多，她自己也被推倒。一个壮汉猛地踩到她的脚上，又跌坐到她的背上，幸好她用力往旁边抽身而出，机灵地拼命抱住左边一根花岗石柱，才重新爬了起来。就是这根柱子救了她的命。而壮汉却被混乱的人群压在下面，他气得破口大骂。那个不知名的老太太则被压在地板上，渐渐地停止了呻吟。

19点46分，4辆消防车率先冲到地铁站。但这时蔓延在站内各处的暗火已“轰”的一声全面燃烧。升腾的烟气笼罩着整个地铁站，站内惊恐的叫喊声和“噼里啪啦”的燃烧声混杂成一片。到20点15分，赶到现场的消防车已增到20辆。救护车也开来10辆，不断地将救出的伤员送往附近那家才扑灭火灾的医院。

32岁的政府职员霍尔特，起火时刚从比加地利和维多利亚线路上的一列地铁中走下车来。他踏上通往地铁站出口的自动扶手电梯时，就闻到一股异样的烟味。当升到一半时，一阵浓烟扑面而来，他抬头看见扶手电梯顶部闪现着橙红色火光，一片燃烧着的碎片从上面飞落下来。他大叫一声：“不好！”立即机敏地调转方向，凭着年轻力壮，拨开涌动的乘客，硬挤回电梯底部。而当时的大多数乘客却被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搞晕了头，加上下面拥来的人流向上推挤，难以掉头逃跑，结果随着扶手电梯升到大厅，进入火海之中。果断掉头逃跑的霍尔特，正好赶上—列驶来的地铁，便挤了上去，安然脱离险境。

后面的乘客终于发觉木质扶手电梯是死亡的陷阱了，他们在烟雾弥漫中，摸索着退回站台。惊魂未定的人群在站台等待列车时，站内的广播响了：“乘客们，请不要惊慌！因垃圾着火，发生了一场小火灾，消防队正在扑救，请大家不要惊慌！”这番未说明真情的广播，使站台上的乘客稍稍稳定了情绪。然而，当—列驶来的地铁没有停站便疾驶而去时，人们又开始恐慌了。一位大腹便便的老头冲着列车驶去的方向，狠狠地啐了一口。妇女们唧唧喳喳地骂起来。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挥舞着拳头叫喊着，说—已记下这班列车的号码，事后一定要找那个混账司机算账！

在中央售票大厅下面的地铁站台，也是一片混乱。来自伯明翰的计算机专家梅汉德，刚从地铁车厢里迈出来就看到站内烟雾缭绕。他感到不妙，本想再返回车中，可车门已关闭，接着又隆隆地开走了。他想找工作人员讯问，但眼前尽是混乱奔突的人群，根本无法打听。他只好迈步登上楼梯。一阵呛人的浓烟迎面袭来，人们咳嗽、流泪，都陷入无比恐惧之中。他与许多人—样，存在着或许这不过是杞人忧天的侥幸心理，还是顶着烟雾向上走。可刚到上面大厅，便与逃过来的人迎面相撞。

那些人大声呼喊：“失火啦！”其中有的已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

一个中年人浑身衣服都着了火，像个火人儿似地边跑边惨叫着。几个消防队员冲过去，用二氧化碳灭火泡沫劈头盖脸地朝他喷去，火灭了，那人从头到脚都是白色泡沫，俨然成了个“雪人”。人们像惊弓之鸟—样夺路而逃，警察、消防队员堵住了一些危险的出口，以防止吓懵的人群自投火海。人们无路可逃，被阻塞在走道、站台上足有半小时。正当大家垂头丧气，坐以待

毙时，一辆地铁列车开了过来，大家顿时欢腾雀跃，纷纷挤上车厢。列车启动了，狼狈不堪的梅汉德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时，车站内火焰燃烧声和人们绝望的呼叫声还不绝于耳。

处于重灾区的中央售票大厅，情况远比其他地方严重。数百名乘客被大火困在厅内。人们试图冲出去，都被挡了回来。一个男青年发疯似地惨叫着奔过来，他的肩膀、背部在冒火，头发眉毛全都烧光了。人们冲上去，把他着火的衣服扯掉，发现他的脊背和臂膀都烧红了。大厅地上横七竖八躺着被踩死和窒息而死的人，伍兰妮小姐目睹这一切，不禁浑身颤抖，她知道死亡在威胁着她。她沮丧地想，大概这里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了。突然，父母的形象浮现在她的脑海中，“一定要活下去，与亲人团聚”。生的欲望使她重新振作起来。她记起自己的外衣是阻燃面料制做的，说不定可以抵挡一阵，便脱下来裹住自己的脸，鼓起勇气往外冲。

往哪里冲呢？数以百计的乘客在售票大厅中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几乎把所有的通道都堵塞了。伍兰妮小姐漫无目标地随波逐流，冲了几次都没冲出去。忽然，她的手臂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抓住，一个膀大腰粗的男人用粗重的口音说：“你们快跟我走！”伍兰妮一看，原来是一个警察，他一脸络腮胡子，两只大眼闪烁着犀利的光。在他身后，有十几个人手拉着手，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往外冲的队伍。事后，伍兰妮才知道，这位危难中的救命恩人名叫贝鲁克，在这之前，他已数次出入火海，把几名昏倒的乘客送上了救护车。

此刻，大厅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形势越来越紧急。火焰在天花板上蔓延，厅内温度急剧上升。一块燃烧着的天花板“哗”的一声砸了下来，贝鲁克大喊一声：“闪开！”一个箭步把伍兰妮推开，使她幸免于难。贝鲁克又转身告诫大家，要贴着墙壁走，这样不易烧伤，并叮嘱大家手牵着手跟着他走，因为他对站内的路径很熟，他能带领大家逃出去。就这样，一行20余人在他的带领下，沿墙急步前进，转过两道弯，又拐进一个通道，墙上有一扇通气窗。

贝鲁克大步抢上前，用力搬动窗户的把手，但由于通气窗多年不用，把手早已锈死，任他如何用力也纹丝不动。他后退一步，运足气力，冲上去用脚把窗玻璃踢破。玻璃碎了，但由于用力过猛，他的腿被划伤，淌出了血。伍兰妮尖叫一声，扑上去要替贝鲁克包扎，却被他挡住。他催促大家：“赶快逃命要紧！”于是，在他的帮助下，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弯身屈腿，钻出了通气窗。贝鲁克瘸着腿，又带着大家穿过两道小门，终于来到通往地面的台阶上。

逃离了地狱般的死亡火海，人们不禁欢呼起来，并对贝鲁克深表谢意。贝鲁克幽默地笑了笑说：“你们得感谢我的妻子和我的3个孩子，这阵子我脑子里尽想着他们，为了他们，我不能死，说什么也要想办法冲出去！”这时，伍兰妮小姐又想起那个讨厌的客商，因为他的纠缠耗去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使自己差点罹难，否则，她早已回家与父母一起吃过晚餐了。

在救火过程中，尤斯顿消防站出动了150名消防队员，他们个个奋勇顽强，一次次地冲入火海，把死伤的乘客背出来。但因为烟气过甚，队员们又没携带防毒面具，抢救工作一度受挫。消防站长官为驱散地铁站内呛人的烟气，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拿起话筒，要求地铁列车加速在国王十字地铁站行驶，以图形成强大气流，吸走木材、橡胶、塑料燃烧时冒出的刺鼻浓烟。可

是，事与愿违，列车急驶产生的气流却把隧道变成了巨大的通风口，反而使大火燃得更旺。克拉克惊呼道，这是他始料不及的。接着又赶紧要求停止这帮倒忙的行动。

直到 20 点 40 分，扶手电梯上的人才被英勇的消防队员控制住；22 点时，主要火源被扑灭。等到火头全部熄灭，已是次日凌晨 1 点 45 分了。消防队员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人负伤，两人受重伤，45 岁的消防队员汤尼利以身殉职，献出了自己的耿耿忠心。

这场严重火灾，造成 32 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死亡者大都是因为大量吸入化工制品燃烧所产生的毒气窒息致死。在中央售票大厅和检票口附近死者最多。由于死亡人太多，警方把车站附近的一个停车场。改为临时停尸处。有些人本来是可以死里逃生的，后来却因为偶然因素，而遭此灭顶之灾。

23 岁的印度人雷·辛格，为探望他住院的亲戚，特地与同事换了工作时间，结果葬身于售票大厅之中。

27 岁的小学女教师丽兹·贝耶，原来是骑摩托车回家的，却因陪两个学生而改坐地铁，结果三人都死于烟火中。一位 21 岁的意大利学生马可·利贝拉齐，为庆祝朋友的生日，从波伦亚赶来而丧身火海。……

然而，有相当一部分人却在火海中戏剧般地活了下来。消防队员在中央售票大厅一侧的洗手间和厕所里，发现歪七竖八地躺着 90 余名乘客，个个昏迷不醒，但都没有停止呼吸，他们一个个被救了出去，结果全都救活。据分析，是紧闭着的房门挽救了他们的性命。事后，这些人如梦初醒，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躲进洗手间和厕所里的。

国王十字地铁站特大火灾发生后，英国运输大臣保罗·简连夜赶往火灾现场，并着手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这一灾难深表震惊，首相撒切尔夫人亲赴事故现场察看，并前往医院探望伤员，对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

大火是从自动扶手电梯下面的机房开始烧起的。但是大火的起因却莫衷一是，警方认为是堆积在电梯下的垃圾，被电梯发动机所打出的火点燃而引起的；伦敦地铁公司主席认为，起因可能是一只被丢弃的烟头；而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则说，在事件发生之前，曾接获一个恐吓电话，声称要破坏地铁……不管大火的真正起因是什么，这场灾难都给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投下阴影，导致一场政治危机。

英国地铁工会领袖发表演说，火灾是英国政府减少对该地铁资助的结果，削减经费使得该站的清洁工由 14 人减为 2 人。

英国反对党工党就此向首相撒切尔夫人发难，说大火纯系政府削减开支造成的。一些反对党议员在议会里慷慨陈词，有的到街头演讲，有的到住满伤员的医院去蛊惑游说，矛头直指撒切尔夫人。伤员和死者家属怨声载道，一度准备举行打倒撒切尔夫人的示威游行。

然而，撒切尔夫人毕竟是以强硬而出名的。她迅即在唐宁街 10 号的首相官邸向电视观众发表讲话，驳斥反对党的责难，她以坚定的语气断言：“伦敦交通当局每年用于卫生和安全的费用高达 890 万美元，年总投资已从 1984 年的 2.4 亿美元上升到 1986 年的 3.4 亿美元，怎么能把大火归罪于经费问题呢！”她反驳得十分有力，才使这场轩然大波有所平息。

火灾过后，伦敦地区运输署作出决定，禁止在地铁车站吸烟，甚至不准张贴香烟广告海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地铁管理部门也迅即作出反应，加强

地铁的消防工作。

人们痛定思痛，作出了有关地铁安全的种种举措，这无疑对地铁这一现代化城市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的健康发展，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陈基中）

韩国客机被击毁真相

在前苏联军事档案馆的保险柜里，有两个斑驳陆离、落满灰尘的铁盒子，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近 10 年之久。这就是 1983 年 9 月 1 日被苏军击落的韩国 007 客机上的“黑匣子”。在那次举世震惊的惨案中，269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但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却显得扑朔迷离，当事国苏联、韩国和美国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几乎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直到近 10 年之后，俄罗斯政府将事件的关键证据——坠毁客机上的“黑匣子”送交国际民航组织破译，才使事件的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

黑匣子，其实外表并非黑色，而是桔黄色，涂上这种显亮颜色，便于在事故发生后寻找。但因为这种装置主要是为飞机失事后留下飞行证据，而黑色往往代表灾难，所以称作“黑匣子”。在波音 737 和波音 747 这类巨型民航客机上，有两个黑匣子：一个叫驾驶舱声音记录仪，它录下最后 30 分钟内机组成员所有的通话内容；另一个叫飞行数据记录仪，它录有整个飞行期间的飞机航行和控制系统的 10 多个不同的参数。这无疑是分析飞机失事原因的最有力的证据。

在韩国客机被苏军击落后的几周内。苏联海军在库页岛西海岸的国标水域线到了黑匣子及其他残片，但苏联军方阅读了专家们破译黑匣子的报告后，大为震惊，决心永远隐匿这危险的证据，便秘而不宣，即使以公开性著称的戈尔巴乔夫，也言之凿凿地发誓说黑匣子没有找到。事发几年后，苏联军方的一份报告甚至自诩说：“我们将把这些不利的证据，深藏在我们的后代也永远不能找到的地方。”

幸运的是，这份报告在 1992 年初落到了叶利钦的俄罗斯政府的官员手中。他们追根寻源，终于在前苏联军事档案馆内找到了封存多年的黑匣子，以及国防部对此所作的秘密报告。1992 年 10 月，叶利钦公布了这些材料，并于 1993 年 1 月将黑匣子送交联合国设在蒙特利尔的国际民航组织的特别小组破译。6 月 14 日，该小组公布了最终的调查报告，被掩盖近 10 年的悲剧真相终于重见天日。

1983 年 8 月 30 日深夜 11 点 50 分，一架波音 747 - 200B 型宽体客机，慢慢地驶离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第 15 号登机门，滑向起飞线。在机场灯光照耀下，这架翼展约 60 米、机长超过 70 米的巨型飞机银光闪闪，高大的垂直尾翼上，漆着韩国航空公司的标志：圆圈内一只大雁在飞翔。但在夜色中最醒目的，还是这架飞机前机身上部凸起的大鼓包。原来这种世界上最大的客机在机身内有两层座舱。下面是主舱，主舱上面的凸起部分为飞行舱，飞行舱的前半部是驾驶舱，后半部本来是休息室，而韩国航空公司把它改为特等舱，安排了 12 个宽大舒适的座位。主舱与飞行舱之间有一个螺旋形扶梯相通。这种前机身上凸的巧妙设计，是当今世界大型军民机种中独一无二的，因此即便在夜空中，也不难识别。

这就是韩国航空公司从纽约飞往汉城的 007 次航班。机上现有旅客 244 名、还空有近百个座位。飞机呼啸着飞上夜空。它中途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科雷奇机场停留加油。经过 7 个多小时的飞行，007 航班安抵安科雷奇，由于时差的关系，当地时间还是午夜 2 点 30 分，飞机要在这里停留 1 个半小时，睡眼惺忪的旅客们纷纷走下飞机，到候机大楼休息。

机场地勤人员开来加油车，给这架客机加油。与此同时，以机长郑炳寅

为首的新机组进行接班，其中有3名驾驶员，20名乘务人员。他们在检修合格证上签了字后，替换下从纽约飞来的机组。旅客中有一家4口人幸运地留在安科雷奇不走了，其余240名旅客又回到飞机上。旅客中有85名朝鲜人，42名中国台湾和香港居民，27名日本人，21名美国人，2名泰国人，以及其他欧亚地区的乘客51名。快起飞时，有6名休假的空中乘务员上了飞机，他们是顺路搭机回家的。

美国乘客中有一位“大人物”，是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劳伦斯·麦克唐纳。他是到韩国出席一个会议的。他的同伴乘坐同一天从美国洛杉矶飞往汉城的韩国航空公司015次航班。就在007次航班在安科雷奇降落后20分钟，015次航班也抵达同一机场加油。同伴们曾在候机大楼休息厅到处寻找麦克唐纳，打算拉他改乘015次航班一起飞往汉城。没想到麦克唐纳是个瞌睡虫，根本就没下飞机，一直在机舱里呼呼大睡。同伴们找不到他，也就没能救他一命。

当地时间凌晨4点，即北京时间8月31日晚上10点，007次航班从安科雷奇起飞前往汉城。这段航线长达6114公里，需要飞行近9个小时。

机长郑炳寅具有丰富的驾驶经验，是韩国民航最优秀的驾驶员，韩国前总统全斗焕1980年访问美国、1981年访问东南亚乘的专机都是由郑炳寅驾驶的。现在，他先沿着“501号喷气机航路”飞行，飞了500多公里后，开始进入“20号红色走廊”的航路，简称R20航路。R20航路是美洲飞往亚洲的5条航路中最靠北，也是距离最短的一条。由于它能节省燃料，每年有上万架次民航机沿着它飞来飞去。但这条航路离苏联领空最近处，还不到30公里，加上那一带是苏联军事上的敏感地区，如果误入这些地区，有可能未得到警告就遭到射击，或受到无线电干扰而导致飞行危险，因此，郑炳寅每次飞这条航路都是提心吊胆的。

由于在安科雷奇和东京之间长达数千公里的航路上，没有通常使用的无线电导航，飞机不能得到地面民用管制中心雷达的指挥和引导，郑炳寅跟往常一样采取了磁航向模式，利用罗盘把方位固定在245度的位置，以便飞机能自动地朝阿拉斯加西海岸飞去。而一旦飞抵太平洋北部，按事先计划应启动惯性导航系统，自动地引导飞机沿预定航路飞抵目的地。

这架波音747上装有3套独立工作的惯性导航系统，不可能同时出故障，因而只要按规定到时启用，是能确保航向正确的。但是，当007航班越过阿拉斯加西海岸后，郑炳寅并没有启动惯性导航系统，飞机继续依照磁航向模式飞行，这要么是郑炳寅和两位副驾驶忘记了及时更动导航系统，要么是他们发觉偏离航线后，使用了手动惯性导航系统，希望能够自动加以修正。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惯性导航系统的电脑实际上并不能自动修正航向，而只能继续朝原来的罗盘航向前进。这时所发生的问题只在一个很小的仪表盘上显示出来，很容易被人忽视，这样的驾驶失误以往也发生过许多次，但这一次却酿成了机毁人亡的大灾难。

从007航班的一个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仪里录下的飞行参数，可以看出客机在起飞4分钟后直到被击落，自动驾驶仪的方向一直由磁航向模式控制着。根据航空驾驶员守则，驾驶员应该反复检查核对航线是否正确，可事实上这种错误却常常发生。在007航班被击落后不久，又有一架波音747客机，在两个小时内偏离航线60海里后才发觉。一年后，又有一架飞越北极的西南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飞向欧洲的途中偏离航线近1000英里，待到驾驶

员发现问题，飞机深入苏联领空，已收不到任何无线电导航的信号了。但由于有这次惨重的教训，苏军没有出动飞机将它击落。

不管怎么说，韩国 007 航班在离开安科雷奇不到 4 个小时，便偏离了正常航线。起先只是几度之差，以后飞机往斜刺里猛冲，竟远离 R20 航路 500 公里，进入苏联境内，先飞越堪察加半岛，后又飞经鄂霍次克海的库页岛。

9 月 1 日东京时间零点 51 分，苏联堪察加半岛上的警戒雷达，就捕捉到穿过白令海朝苏联领空飞来的这架来历不明的飞机。防空指挥所认为它是一架侦察机，立即命令岛上基地的 8 架米格—23 和苏霍伊 SU—15 战斗机升空拦截。但此时苏防空雷达系统突然发生故障，地面人员无法正常指挥，3 组苏联最先进的战斗机在茫茫夜空中未能找到“入侵者”。于是，驻堪察加的苏军便向库页岛发出警报。

18 分钟后，库页岛上的雷达发现了这架飞机。从该岛南端萨哈斯克机场上再次紧急起飞 6 架米格—23 和苏霍伊 SU—15 战斗机。雷达兵发现这架飞机似乎毫无觉察，依旧没有改变航向，如果不加拦截，那么它将会很快穿过库页岛，直飞苏联本土海参威，那里是拥有 820 艘舰艇的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苏联防空部队指挥所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因为这架偏离航向的韩国客机飞越的地区，都是苏联军事上高度保密的地区。堪察加半岛拥有苏联战略导弹试验设施，也是“逆火”式战略轰炸机的基地。半岛东岸还是苏联核潜艇的重要基地，有 90 艘核潜艇在此出入。另外，苏联将在 9 月份试验旨在与美国抗衡的 SSX24、PL5 两种新导弹，而堪察加半岛周围是导弹溅落地点。因此，美国装有高分辨摄影设备与雷达的 RC—135 侦察机频频闯入这一地区上空，企图监测苏联的导弹试验。

就在 007 航班深入苏联领空的同时，堪察加的苏军雷达正在追踪附近一架 RC—135 侦察机，他们起先把 007 客机看作是它的加油机，后来见它往南直飞而去，便认定它是另一架 RC—135 侦察机。这时，真正的 RC—135 侦察机与它相距 150 公里。

当地面雷达将连续跟踪这架来历不明飞机的情况，报告防空指挥所时，指挥官们也覺得纳闷，该机大摇大摆长驱直入苏联领空达两个多小时，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他们只是草草地询问了苏联民航交通管制局，答复是此刻没有民航机在此地飞行，他们也就不再追问了。

东京时间 3 点零 5 分，苏军中校奥西波维奇驾驶的苏霍伊 SU—15 战斗机最先发现“入侵”的飞机，他向地面指挥所报告：“我发现了目标。”随后的几分钟，奥西波维奇一直紧跟在韩国客机后面跟踪观察。他向地面报告：“目标的标志灯和闪光灯是亮着的。我正跟在它后面。怎么办？”

一般而言，“入侵者”肯定熄灯潜行，但中校却报告说目标灯火通明，颇有点招摇过市的模样。地面指挥员不禁有些吃惊但又不以为然，他命令奥西波维奇用识别敌我的无线电应答器与这架飞机联系。只有苏联飞机才能对战斗机发出信号有所反应，韩国民航机显然不可能携带应答设备，更不可能回答信号。于是，奥西波维奇又报告：“目标对敌我识别器毫无反应。”地面指挥官似乎下了决心：“目标已侵犯我领空，消灭它！”

奥西波维奇接着报告：“一切准备就绪！我已打开导弹发射系统开关！”他刚要开火，耳机里忽又传来新的命令：“先发射警告弹！”中校飞行员感到很为难，机上装的都是穿甲弹，没有曳光弹，黑暗中有谁能看见它们呢？

无奈，他只好连续射出4梭子，约200余发穿甲子弹，这显然毫无用处。

可怜无辜旅客对于即将飞来的横祸一无所知。这时候，客舱里的14名空中小姐已经开始为醒来的旅客送早点了。郑炳寅机长也不知道大难临头。他似乎感到飞机要晚点，便在3点15分呼叫东京控制塔，请求稍稍爬高到35000英尺再继续飞行。3点22分，东京控制塔同意了他的请求。与此同时，日本的雷达已经测到这架韩国客机的位置，是在北海道以南185公里，而不是像郑炳寅机长这时向东京报告的那样位于北海道以北185公里。东京控制塔开始意识到这架韩国客机有点偏离航向了，可是，已经晚了。

007航班为准备升高，将速度放慢到每小时400公里，使得一直跟踪的苏霍伊SU-15战斗机突然超前。奥西波维奇便认定“入侵者”已经看到他的飞机，并开始采取狡猾的规避动作，企图甩掉他的跟踪。这使地面指挥官更坚决地发出“消灭目标”的命令。

在007航班飞行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客机和它的追踪者都出现在日本军用电子监听站的雷达屏幕上，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场空中截击演习。而且监听站也截录了苏联这架战斗机与地面指挥所的俄语无线电通讯。

这时，007客机已经飞越库页岛西岸，朝西南方向飞去，重新进入国际空域。苏联防空指挥所觉得马上要错失良机。尽管他们一直未能证实这架飞机负有侦察使命，但时间已变成最重要的因素，机不可失，必须抢在目标逃离苏联领空前把它击落，以示惩罚。于是最后下达了摧毁“入侵者”的命令。

3点25分46秒，苏霍伊SU-15飞行员报告：“导弹发射准备已就绪。”接着，在3点26分20秒，他又报告：“导弹已经发射！”两枚AA-3型“阿纳布”空对空导弹，从SU-15战斗机的机翼下闪电般地射出，直奔8公里外的007客机。第一枚导弹击中了客机的尾部，腾起一阵黄色火焰。第二枚导弹击中左翼发动机，摧毁了左翼的一半，飞机上的灯火全部熄灭。

3点26分21秒，奥西波维奇以例行公事般冷淡的声调向地面报告：“目标已被摧毁。”

3点27分，东京控制塔收到遇难客机发出的最后呼叫，“我是韩国007航班，舱内急速减压，飞机降至1万英尺高度……”接下来就是一片噪音，什么也听不见了。

日本雷达跟踪到这架被击毁客机的最后坠落过程。3点35分，飞机从35000英尺下跌到5000英尺；3点38分，飞机飘落到1000英尺。客机的亮点从雷达荧光屏上消失了。这时离导弹击中已有12分钟。

正在库页岛以西48公里的莫涅龙岛附近海面作业的日本渔民，目睹了客机坠落海面的惨景。日本渔船“千岛丸”号船长早矢康和6名船员，突然听到高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声，伴随着明亮的桔红色闪光，巨大的机身横空坠落，笔直窜入东南方海面，一时间火光耀眼，接着是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飞机坠落地地点在莫涅龙岛以北17海里处的国际水域。

苏联防空指挥所得知目标已摧毁的报告后，反而显得有些慌乱，又急忙命令奥西波维奇继续追踪正在下降的那架飞机。苏霍伊SU-15战斗机在低空盘旋了几分钟，怎么也没找到中弹的飞机，这时燃油又快用完，只好飞回基地了。

韩国007航班被苏军导弹击落事件，顿时在国际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由于悲剧发生在世界上最敏感，同时也是监视最严密的地区，设在阿拉斯加南部和日本北部一线的美国监听站，以及日本北海道最北端稚内市雷达情报

站等日本 27 个雷达电子监听站,都监听并且录下了苏联战斗机飞行员在跟踪和击落韩国客机过程中,同地面指挥所的通话,甚至还截获了伯力苏军防空司令部和莫斯科国防部的通话。因此,在韩国客机被击落 3 个小时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就把空难经过的资料全部整理好,呈报美国政府。

美国东部时间 9 月 1 日 10 点 45 分,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国务院召开记者招待会,愤怒谴责苏军击落韩国客机的恐怖罪行。美国总统里根在第二天也提前结束在西海岸的度假,返回华盛顿,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研究对苏制裁措施。

直到莫斯科时间 9 月 1 日 21 点 15 分,苏联才打破沉默,由塔斯社发表了一个措词含糊的简短声明,说一架所属不明的飞机粗暴地侵犯了苏联的领空。苏联空军战斗机进行警告性射击后,它就朝日本海方向飞去,机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根本就不承认击毁韩国客机的事情。

为逼迫莫斯科承认事实,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在 9 月 6 日几乎同时召开记者招待会,将苏军战斗机与地面指挥部通话录音这一确凿证据公之于众。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也播放了事件经过的图像和录音。在美国接二连三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苏联政府在 9 月 6 日 21 时才被迫承认击毁韩国客机,尽管表达方式极其暧昧。

直到 9 月 9 日,克里姆林宫才匆匆忙忙展开反击。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举行记者招待会,把这场悲剧的责任完全推到美国头上。他声称,韩国 007 客机侵犯苏联领空,是一次有预谋的侦察飞行,目的是让苏联暴露远东防空方面的重要情报。为此,007 航班故意离开原来的航线,并与一架 RC-135 侦察机一前一后潜入苏联重要军事设施上空;当苏联截击机向它发出警告,试图迫降它时,它还躲躲闪闪,继续入侵行动。至此,有关方面才决定将它击毁。就这样,苏方间接承认了击落客机的事情,却不愿作出谢罪表示,反而提出了“侦察飞行说”,把责任转嫁美国。

随后,克格勃不断制造谎言来混淆视听,进一步强化“侦察飞行说”,将悲剧归咎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时间怪论四起,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有的说韩国客机曾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安装了特殊的间谍设备;有的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预订了该机的机票,但是受到秘密的劝阻而更改;还有的说韩国驾驶员郑炳寅曾向朋友炫耀过飞机上特制的间谍设备,还私下向妻子透露过这次飞行的危险使命,等等。总之一句话,韩国 007 航班是一架间谍飞机。这使得原来就扑朔迷离的悲惨事件,更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就在两个超级大国唇枪舌剑、相互攻讦时,在离鞑靼海峡不远的碧海蓝天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打捞争夺战”。因为找到客机残骸和黑匣子,事件真相便昭然若揭了。

苏联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赶到出事现场。空难发生不久,苏联船只和飞机立刻封锁了这片国际海域。他们在旗舰“彼得保罗斯克”号巡洋舰上设立专门的指挥部,并从天然气工业部调来一艘海上钻井采油船“米·米尔钦克”号。天上有十来架直升飞机来回巡视,海面上有几十艘苏联渔船反复搜索,海底有一百多名优秀的潜水员一次又一次打捞,形成一个严密的立体搜寻网。

苏联渔船一字形排开,撒下拖网,一寸一寸地仔细搜寻。六七天后终于找到了飞机残骸坠落地点。“米·米尔钦克”号钻井船立刻开到那里停住,

苏联渔船将这个地点团团围住，装出一副捕鱼的架势，不许外国船只靠近。

美国、日本的船只也聚集到这里，他们想方设法，却无法冲入“包围圈”。为迷惑对方，苏联海军还将一只假黑匣子扔到远离“作业区”的海底，让它在那里发出信号，以便把美国船只引开。

1983年9月底，苏联潜水员在距莫涅龙岛以北17海里处的174米深的海底找到了飞机残骸。机身在坠水时已炸成碎片，最大的残片也只有1米多。机上的乘客更是炸得支离破碎，血肉横飞。潜水员只发现过一段烧焦的手臂，一个女性的残缺的头颅以及一截戴着手套的手掌，其他的尸体不是随海水漂走，就是葬身鱼腹。此外，还打捞出一些乘客的物件，如钱夹、提包、计算器、衣服等。至于所谓的间谍设备，根本就没发现。黑匣子也被苏联科学院一只潜水艇发现，但刚打捞上来，就被军方代表带走。到10月底，打捞工作全部结束。打捞情况高度保密，所有参与搜索和打捞的人员全都向有关部门递交保守秘密的书面保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界对苏联是否找到残骸都一无所知。直到1991年2月，苏联《消息报》刊登长篇调查报告，才披露了当年打捞残骸的详情。

黑匣子被专人送到莫斯科后，军方立即组织专家破译，但结果令军方大失所望。两只黑匣子录下的通话内容和数据，与当时苏联军方一口咬定007航班是间谍飞机的结论大相径庭。飞机数据记录仪的磁带证实，韩国这架客机偏离航向确系驾驶员驾驶失误所致，而非蓄意闯入苏联领空。驾驶舱声音记录仪的磁带，也显示出最后30分钟的驾驶舱内完全是正常、宽松的气氛，机组成员还在互相开玩笑，有人说空中航行很枯燥等等，丝毫没有迹象表明机组成员知道他们正在苏联领空航行，并且有苏军战斗机在跟踪他们。在被导弹击中后，可以听到机长通知乘客系好安全带，戴上氧气面罩的警告，他还呼叫东京方面。客机正在迅速减压，降到1万英尺高空，以便乘客能呼吸到氧气等。根本没有克格勃所杜撰的有机组人员尖叫：“这下肯定要流血了，”“保持飞机往正北方向”等话语。于是，苏联军方决定对发现黑匣子一事高度保密，对其分析结果守口如瓶，并将黑匣子密藏在军事档案馆的保险柜里。

近10年后，俄罗斯政府终于让这两个铁的“证人”出来说话了，苏军击落韩国客机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269个冤魂可以在茫茫大海中安息了。

（陈中）

安第斯山悲剧

1972年10月12日清晨，一架名叫“费恰尔得”号的F—227型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从乌拉圭的蒙德维的亚省卡拉斯科机场起飞。机上除9名机组人员外，还有40名年轻人。他们不是普通的乘客，而是乌拉圭一流橄榄球队的全体成员及其支持者。这支被球迷昵称为“老克利斯琴”的球队，在1968年、1970年连续两次获得乌拉圭全国冠军。他们在阿根廷比赛多场，成绩斐然。

1971年，他们又出征智利，打了两场球，同样大获全胜，并与智利队商定，第二年再次对垒。此行便是他们依约前往智利圣地亚哥，参加一场众人翘首以待的橄榄球赛。这次智利之行，球员们还带着一些亲朋好友，把这架小型飞机的25个加座都坐满了。

对于像“费恰尔得”号这种类型的飞机来说，要飞越安第斯山脉，无异于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因为这种飞机飞不到安第斯山脉最高峰的海拔高度，只能取道在山峰间穿梭航行，而这种航道由于气流变化莫测，弄不好就机毁人亡，危险极大。就在几周前，一架四引擎运输机便毁于群山之中。

这天的气候实在不理想，一贯小心谨慎的飞机驾驶员考尔·弗拉岱斯，决定在阿根廷门多萨机场临时降落，待天气转好后再起飞。第二天，即10月13日，气候依然不佳，高空气流过急，但年轻气盛的橄榄球队员却等得不耐烦了，埋怨驾驶员胆小，甚至嘴里骂骂咧咧的。两位飞行员拗不过，只好冒险飞行。那天下午2点18分，飞机飞离门多萨机场。

为避开高空气流，飞机一直在云层上飞行，看不清地面情况。3点24分，副驾驶员兰圭拉勒向圣地亚哥机场发报说，他们已飞临智利库里科城上空，即将转变航向，北飞圣地亚哥。

但是当飞机降低高度，穿出云层时，弗拉岱斯赫然发现飞机依旧在安第斯山脉之间转悠。很明显，飞机迷航了。突然，一座陡峭的山峰迎头挡住了去路。弗拉岱斯赶紧把飞机拉高，可已经迟了，飞机的右翼撞在坚硬的岩石上，轰地一声断了。刹那间飞机失去平衡，往下栽去。紧接着尾翼和左翼也被撞落，机身翻滚着，朝冰雪覆盖的一个峡谷坠下去……

圣地亚哥机场左等右等，不见“费恰尔得”号踪影，情知凶多吉少，立即派出几架飞机，去库里科地区搜寻。由于飞机失踪地点处于海拔500多米的雪山迷宫，地势险峻，救援飞机不敢贸然作低空飞行，更谈不上查看事故现场、寻找幸存者了。结果一无所获地飞回地面。智利警方汇同自愿救助人员，也尝试登山步行寻找，但终因高山上白雪皑皑，无路可攀，只好无功而返。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寻找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即便有人幸存，谁又能在既无食物又无草木的情况下，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中生存下来呢？于是，到了10月21日，即飞机失事8天后，各种搜索救援行动均告终止。

世界各地主要报纸和电台都报道了救援失败的消息：一架载有乌拉圭一流橄榄球运动员的飞机，于8天前在安第斯山失踪，由于山高雪深，难以营救，多方搜寻。均无结果，估计机上45人全部丧生，航空公司、遇难者家属和广大球迷们开始料理他们的后事。

到了12月份，人们渐渐对那场悲剧淡忘了，开始筹办起美洲人最盛大的节日——圣诞节。然而，就在12月21日那天，却传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

的消息：两个多月前遇难的乌拉圭橄榄球员中，居然至今还有人活着，而且为数不少，达 16 人之多！

原来，那架遇难飞机坠落在阿根廷境内一条海拔 11000 英尺的峡谷中，气温低，积雪厚，加上机身坚固，飞机一头扎进雪堆中，竟没有完全破损，也没起火燃烧。机上 17 人当场身亡，32 人幸免于难。其中一些尚能走动的轻伤员，冒着危险，把重伤员从舱里救了出来。不久，夜幕降临，气温骤降。幸存者将机上所有的御寒衣服都裹在身上，挤作一团。机上报务员已摔死，无法与外界联系，但活下去的信念却强烈地激励着大家与死神作斗争。他们坚信，救援人员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这是个寒冷的一夜。他们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却发现 4 个人已停止了呼吸，很可能是因伤势过重或经不住寒冷而冻死。其中有副驾驶兰奎拉勒，他临死前已处于昏迷状态，嘴里说着胡话。“我们快到圣地亚哥了……”闻者潸然泪下。他的同事、正驾驶员弗拉岱斯则在飞机坠落时撞死了。

白天在焦虑不安的期待中过去了。夜幕再次降临。到了第三天，困在峡谷中的幸存者对外界救援的希望逐渐破灭，便在“老克利斯琴”队队长马斯罗·佩雷兹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决心同舟共济渡难关。由于所剩食物很少，佩雷兹决定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制度。

幸存者们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他们靠不多的巧克力、葡萄酒、果酱和融化的雪水维持着生命。昔日身强力壮的橄榄球队员变得垂头耷脑，有气无力。没有几天，所有的食品全吃光了。在这冰天雪地里，既无猎物可捕，又无野菜杂草可采，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咽下肚了。怎么办？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他们相互偎依着，一动也不动，尽量减少身体的消耗。一天，两天，三天……他们除了大把大把地吞咽积雪，没有吃任何食物。

医学院大学生罗伯特·卡内隆实在饥饿难忍，绝望中他猛然想起在学校上尸体解剖课的情景，要活下去的欲望驱使他向空难中的死尸爬去。他用一根冰棱制成一把冰刀，在一具尸体上动手割下肉来，闭着眼睛吞下去。接着，他又割下几片肉。并打开尸体的腹腔，用刀割下肝脏，拿回去鼓励同伴们吞下这“人肝维他命”。起初两天，只有几个人硬着头皮吃了一点，大多数人实在不忍咽下去。因为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他们虽然身陷绝境，却仍旧怀着一丝希望，相信再坚持几天，救援人员就会来到。他们利用一部在空难中没有损坏的收音机，一直在收听智利电台的广播。10 月 22 日，他们从收音机中听到智利方面已终止救援搜寻行动，才最终意识到，要想离开峡谷，脱离险境，只有靠他们自己了。既然如此，别无选择余地，必须靠吃尸肉才能坚持下去，才能有体力跑出去求援。因此，原先坚持不食用同伴尸肉的人也强迫自己吞咽了。最后一位开始吃尸肉的，是幸存者中唯一的妇女尼莲娜·梅瑟尔，数日来她一直拒食尸肉，直到饿得奄奄一息，才勉强吃了一点儿。

人们靠食尸肉，坚持到了 10 月 29 日。又一场灭顶之灾向幸存者袭来。在南半球，10 月份尚处于春季，山上时常发生雪崩。就在这一天夜里，人们像往常一样睡在飞机机身的残骸中。突然，随着一阵雷鸣般的巨响，山上大片的积雪滚滚而下，刹那间把飞机残骸埋没了。

“雪崩！”睡在机舱口的人惊呼起来，他们拼命扒开积雪，冲了出去。接着，又冲回来救其他人。就这样，几次进出硬是有 19 个人钻出雪堆。而其他 9 人，包括马斯罗·佩雷兹队长和尼莲娜·梅瑟尔女士，都来不及抢救，

活生生地闷死在机舱内。

这真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再次幸存下来的人们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意识到继续这样坐等下去，只会死路一条。要想死里逃生，就必须派人下山求援。一等雪崩停止，他们就推选出三个身体比较强壮，意志又非常坚定的年轻人，即费尔南多·帕拉多、罗伯尔特·卡内隆和安东尼奥·维兹金，要他们千方百计，战胜艰难险阻，翻山越岭，去智利境内请求救援。

11月17日，这三个经过一段时间“养精蓄锐”的年轻人，带着全体幸存者的希望，离开飞机失事地点，开始朝东北方向艰难跋涉。他们沿峡谷蜿蜒而行，走了两天后，依旧没有走出峡谷。他们意识到，肯定是走错了路，便沮丧地往回走。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们这两天的劲没有白费，在返回途中，竟意外地发现“费恰尔得”号撞落的机尾。他们钻进去一看，机尾内存放的行李、食品和备用电池等物品依然还在。这令他们惊喜万分，他们立即从中取出一些目前最急需的食品和衣服，还找到几包香烟。他们满载而归，但毕竟没有完成求援任务，所以，一直在苦苦等待着好消息的人们并不显得高兴。雪崩发生以来，又有两个伤病员死亡；三人求援小组未能走出峡谷，求援希望更为渺茫。浓重的阴影笼罩在幸存者的心头。

将三人小组带回来的食品和衣物分配完毕后，大家认为，至关重要的还是尽早与外界取得联系。于是，稍懂一点无线电知识的洛伊·哈雷与三人求援小组一起，再次找到机尾，取出备用电池，装入无线电发报机试着发报，可是没有成功。但他们却意外地接到发自家乡蒙德维的亚省的声音，得知他们的亲友已说服乌拉圭空军，再一次出动飞机寻找他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大伙儿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帕拉多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把所有的手提箱从行李舱里取出来，在雪地上堆放一个巨大而醒目的“十”字，以便让几千米高空的救援飞机的驾驶员能够看到。

获救的希望重又在人们心中燃起。他们决定暂停派人走出峡谷求援，静候救援飞机的到来。几天过去了，飞机并没有出现。到12月11日，又一位同伴因饥寒而死亡。大家感到再也不能坐等死神的降临了，必须恢复实施主动寻找生路的计划。

说干就干，12月12日清晨，三人求援小组以原班人马再次出发。这一回，他们决定改从峡谷西面向上攀登山峰。两天过去了，终于在第三天爬上山顶。三个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放眼远眺，又十分沮丧：四周不见一块农田、一片树林，甚至连一点绿色也看不到。白茫茫的荒山崇岭重重叠叠，一眼望不到边。显然，这次求援的行程远比预想的要长得多，随身携带的食物远不够三个人用这么长时间。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让维兹金一人从原路返回，把情况报告等候在峡谷中的难友们，而帕拉多和卡内隆则继续前行。

可是，该往哪里去呢？他俩望见远处有一座山，山上似乎没有积雪，便决定从山顶下到另一条峡谷，再攀上那座山。

山势极其险峻，下山远比上山难得多。这时卡内隆突然想起一句名言：“世上有艰险，但没有不可逾越的艰险。”他立即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把随身带的坐垫拿出来作为雪橇，很快就滑下了山坡。然后又将坐垫绑在脚底，像雪地靴一样在积雪上行走，而不致于陷进雪中。

进入那条峡谷后，他俩发现有一条小溪，溪边长着一些青青的野草。这使他们欣喜若狂，因为自从飞机失事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植物。绿色令他们信心陡增，继续沿山溪行走。不一会儿，他们又看到了飞鸟和其他小

动物，积雪也渐渐消失了。8天过去了，他们终于发现了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一只盛汤用的空瓦罐，一堆燃烧过的牛粪，以及树上用斧头砍过的痕迹。不过，还是没见到人影。

到了第9天，他们随身带的食品已所剩无几了。正当他们绝望之际，突然在一条河边看见对岸有几个骑马的智利牧民在放牛。帕拉多和卡内隆如同遇到救星一样，激动得浑身颤抖，大声呼叫着，向牧民招手。然而，由于流水声哗哗作响，牧民们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或许压根儿就听不懂他们的话，很快就骑马离开了。幸好，第二天牧民们又来到这里。帕拉多急中生智，迅速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裹上一块石头扔到河对岸。那几个牧民拾起纸头，看了半天，才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就在12月21日这天晚上，牧民们把他俩带进了自己的帐篷里。他们终于与外界联系上了。10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吃上美味佳肴，也是第一次舒舒服服地睡在床上。

第二天，牧民们把情况报告了当地的警察局。警方立即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12月22日下午，智利救援中心派出两架直升飞机，在帕拉多、卡内隆的引导下，飞往飞机失事现场。由于那条峡谷周围的山峰大多高达13000英尺，一般直升飞机难以飞到如此高度，但飞行员们认为救人要紧，破例冒险飞越了那几座山峰。

直升飞机飞临峡谷上空时，留候在那里的难友们早已做好准备，收拾出一大块空地，以供飞机着陆。原来，他们已经通过收音机的新闻节目，得知两个年轻人已大功告成，与外界联系上了。此刻，他们纵然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却尽量把自己打扮整洁一点，用积雪擦去满身污垢，有的甚至系上了领带。当然，他们并未忘记另一件重要的事。雪地上食用过的尸体横七竖八，他们自己是看惯了，如果外界人来了，一定会惨不忍睹。于是，他们硬撑着已经极其虚弱的身体，尽量把尸体摆放好，并用积雪掩盖起来。这一番大动作，累得他们筋疲力尽，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尸体还暴露在外。

直升飞机安全降落了。帕拉多和卡内隆抢先跳下来，向留候的难友们奔去。他俩的胜利归来和最终盼来援救人员的喜悦，立即使所有幸存者欢呼雀跃，热泪盈眶，进而激动得互相拥抱。两架直升飞机一次只能载8人，余下的只有等到第二天。到12月23日晚，全部幸存者共16人都安全救出。

从10月13日飞机失事到12月23日获救，这16名年轻的橄榄球队员，在海拔11000英尺的雪山上度过了漫长的71个日日夜夜后，他们终于在圣诞节前重返“人间”。这一“安第斯山奇迹”震撼了整个世界。一批又一批新闻记者从圣地亚哥蜂拥而来，采访这些传奇般的人物。幸存者们回想起困在雪山的那些恶梦般的日子，为了活下去，竟然以同伴尸体维系生命的可悲情景，如今更感到内疚和不安。因此，在采访中谁也没有勇气提及这件可怕的事，只是以机舱内贮存有食物搪塞过去。时近圣诞节，为了不冲淡节日的欢乐气氛，记者们也没过细追问，只当是“上帝”保佑的结果。

然而，这场“安第斯山悲剧”并没有就此落幕。圣诞节一过，人们在狂喜之后，不禁提出了疑问：在那冰封世界中，寸草不生，绝无任何天然食物可以充饥，这十几个大活人，仅凭飞机上那么一点食品，能熬过漫长的71天吗？

参加救援的专家，尤其是那些无缝不钻的记者们，开始问及这个问题。幸存者无一例外地立刻沉默不语。敏感的记者从他们低垂的脑袋、回避的

目光及躲闪的只言片语里，觉察出其中必定有难言的隐情，便进行新闻追踪，很快从处理失事现场的有关人员那里探明真相：这 16 名年轻人在安第斯雪山上生活 71 天的主要食物，竟是死去同伴的尸体。这一耸人听闻的消息立刻引起轰动。有几家报纸甚至登出了雪山上残缺尸体的照片。善良的读者看了无不流下辛酸的眼泪。顷刻间，这个无奈而又无情的事实，几乎改变了幸存者们的形象。在许多人眼里，他们不再是在史无前例的恶劣环境中创造奇迹的英雄，而是生吞人肉的“食人生番”。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和热爱，顿时化作疑虑和恐惧。

幸存者中没有也无法否认这个事实，他们仅仅拒绝说出任何有关细节。为此，幸存者中的发言人潘乔·德尔加多在记者招待会上竭力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解释：“这一痛苦而又可悲的决定，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们尊敬我们死去的朋友们，然而我们也同样尊敬我们的父母，他们给了我们生命，而我们的朋友们则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为了对自己做过的事进行补偿，他们中不少人决定死后捐赠自己的器官。

在医务人员及亲人们的精心护理下，他们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然而，靠尸肉生存下来的悲惨经历却成了他们的一块心病，在精神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

不久，16 名年轻人回到家乡。那是一座名叫卡拉斯戈的村镇，离蒙德维的亚省省会约 20 公里。“老克利斯琴”队的大多数队员都是在这里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如今回到这里，仅剩 16 人了。这些患难与共的幸存者，很自然地结成了一个团体，名为“安第斯山部落”。山上发生的事是这个部落的核心机密，他们相约绝不向外透露。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幸存者们在街上都低着头，生怕撞见遭受丧子之痛的母亲们。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名叫波比·弗朗西斯的小伙子，前往他那死去的好朋友家，企图向他的父母解释山上发生的事。他告诉他们，自己在这次空难中可谓九死一生。空难发生时，他坐在机舱后部，幸免于难。在绝望中，他走到燃料箱旁抽烟，险些把汽油箱引爆。幸亏一个难友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来把他拉到一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们虽然身陷绝境，但只要有可能，是会毫不犹豫地去救助另一个处境更险恶的人的。

朋友的父母一声不吭地听他讲述着故事。未了，却冷冷地对他说，他们不想再见到他，只有当他死时他们才会得到安宁。这种仇恨是无法缓解的，他们的儿子死了，而这些小子却还活着，而且是吃了不知是谁的儿子的血肉才活下来的！在这些不理智的父母眼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原谅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噩梦般的记忆也逐渐淡忘了。卡拉斯戈镇也趋于平静。镇上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忘却那件悲惨的事。直到 1991 年的一天，小镇上来了个美国人，他想见见 19 年前的幸存者，这才使小镇重掀波澜。

这个美国人叫马歇尔，是伍尔特·迪斯尼电影制片公司的导演。当年的幸存者如今都是 40 几岁的中年人，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马歇尔的到来，使这些已为人父的中年人又重温了当年安第斯山上的悲剧。

马歇尔导演的来意十分明确，他要把这出史诗般的悲剧搬上银幕，为这些幸存者“正名”。经过努力，他终于说服了“安第斯山部落”的成员和他们的父母，拿到了幸存者的父亲们十几年前与一位英国作家签下的图书出版

合同，为取得这本书的改编权铺平了道路。原来，当年在这 16 名年轻人从雪山回到小镇后，这些做父亲的既为儿子们的行为感到羞愧，又为他们不公正地背负“食人生番”的罪名而愤愤不平，为洗刷儿子们蒙受的耻辱，以正视听，16 个做父亲的联合起来，与英国作家皮尔斯·保罗·里德签约，于 1974 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活下去》的书，通过里德的笔，向世人公开了这段充满血泪的悲剧。

“安第斯山部落”中 42 岁的律师莫乔·隆维亚被选派作为代表，与迪斯尼电影公司进行谈判，签定合同并监督制片。迪斯尼公司决定仍用原书名作为片名，并保证忠实于“部落”在雪山上的历史。现年 43 岁的费尔南多·帕拉多，已经拥有一家电视公司，并且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乌拉圭的代理。由于职业的缘故，他被聘为这部电影的拍摄顾问。

《活下去》是在加拿大一座雪山上拍摄的。大部分幸存者应邀去观看了拍摄现场。1992 年 12 月，电影剪辑完毕以后，电影公司特地把样片送到乌拉圭蒙德维亚，在私人影院里为他们放了专场。

1993 年初，《活下去》在世界各地上映。莫乔·隆维亚、费尔南多·帕拉多和罗伯尔特·卡内隆等幸存者为影片的上映到各地作宣传，从好莱坞到西班牙，从欧洲到美洲，所到之处，他们都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并以各种方式向他们表达爱心与同情。

在好莱坞的影片首映式上，莫乔律师对他和他的同伴们多年来受到的指责十分不平，他向观众们诉说了他们重返人间后，备尝冷暖的遭遇，并尖锐地指出：“有时我很想对那些硬把我们纳入‘食人生番’的人说：‘我们吃的是死人，而你们吃的却是活人’。”他的这番话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这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了公众对他们为绝处求生而被迫干下可悲之事的莫大理解；化解了他们郁积多年、饱受煎熬的心病，从而使他们更加坦然地面对命运安排的多舛人生；同时，也宣告了这场摄人魂魄的“安第斯山悲剧”的结束。

（陈继中）

总统在政变中殉职

智利总统阿连德，自 1970 年 9 月上台至 1973 年 9 月在政变中殉职，当了 3 年的总统。他在执政期间，搞了 3 年的“社会主义”，被世人称之为“阿连德社会主义”。这件事似乎有些离奇：阿连德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智利没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怎么会搞起社会主义呢？智利社会主义都搞些什么呢？它的寿命又因何那样短暂呢？答案要从历史的根源中去寻找。

早在智利争取独立时期，即 19 世纪初期，智利与整个拉丁美洲，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在这一时期，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已经传到了拉丁美洲，包括智利在内。所以，智利共产党曾经有很大的发展，1946 年，这个党曾经支持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取得大选胜利，并参加了联合政府。但是，智利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中国模式。它完全是智利的土特产，因为它是智利国情的反映。

1970 年 9 月，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10 月 24 日，他正式上任。阿连德走马上任后向人民表示，他的政府将是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政府。但他同时又强调，他的政府既不是“古巴式”的，也不是“中国式”的，而要遵循“具有自己特点”的智利道路。他说，“我的政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而是一个民族的、人民的、正义的和革命的政府，这个政府将走向社会主义。”

1971 年 5 月，阿连德在议会全体会议上进一步重申，要使智利成为“第一个按民主的多党制的自由的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阿连德为首的人民联盟提出了“结束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地主寡头的统治，并在智利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阿连德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工业企业国有化政策。

1971 年 7 月 11 日，阿连德政府把全国矿山收归国有的宪法修正案经议会表决通过，阿连德总统签了字并付诸实施。智利的经济命脉是铜矿，在这以前，铜矿一直控制在美国等垄断资本家手里。这一重大决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智利人民还把这一天定为“民族尊严日”，作为纪念。

接着，阿连德又把私人银行，包括影响巨大的美资美洲银行、英资伦敦南美银行等，统统收归国有。政府接管了 70 多个垄断企业，重工业基本上已为智利政府所控制。

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改革还包括土地改革。社会福利措施改革以及对外政策的变化等等。阿连德政府规定私人拥有的土地不得超过 40 公顷，并扩大了征地范围。截止 1971 年 11 月，阿连德政府接管了 1328 个庄园或大地产，共计二百五十多万英亩土地。阿连德下令把这些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并组成农业合作社，进行社会主义式的生产。

阿连德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他将一般工人工资提高了 35%~47%。此外，阿连德还实行公费医疗、免费基础教育、为贫民兴建大批简易房屋……等等，在外交方面，阿连德宣布，智利的外交原则是“尊重自决权和不干涉原则”，主张“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他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认为它是“我们的死敌”。阿连德积极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他就职 10 天就同古巴恢复了外

交关系。两个月后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71年9月，智利加入了不结盟国家组织。

那么，阿连德的这些社会主义措施，有没有理论根据呢？其目的又是什么呢？用阿连德自己的话讲，他是一个“议会斗争”主义者，他说，“我主张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实现并非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实现的東西。”

阿连德在智利搞了3年社会主义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以来一贯思想的结晶和奋斗目标。

阿连德1908年7月26日生于智利瓦尔帕来索城，其父是个自由职业者。他的祖父曾因创办智利第一家世俗学校，而获得“红色阿连德”的称号。他的父辈们几乎都是激进党的党员。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其母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家庭妇女。阿连德从小就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由主义思想的环境中熏陶，从而奠定了他后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

阿连德16岁那年完成中等教育，不久就去军队服役，后来又在陆军预备队任军官。1926年，18岁的阿连德服役期满，退伍后考入了智利大学医学院。在大学里，阿连德以学习成绩优异和具有动人的演说才能而闻名。他成为学生会的副主席。他思想活跃，博览群书；在大学学习期间，是他世界观形成时期，同时也是他步入社会、参加政治斗争的开始。

1932年6月，阿连德以学生领袖身份参加集会演讲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监狱，后经多方营救出狱。

1932年暑期，阿连德大学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一边从医，一边从事政治活动。

1933年4月，阿连德成为统一的智利社会党创始人之一，还在党内担任过总书记和主席职务。从此，阿连德的社会活动日益增多，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威信也日益提高，作为瓦尔帕来索的社会主义者，他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阿连德进入上层政界后，于1938年当上了卫生部长。他连续4次参加总统竞选，每次都有上乘表演，提出重大改革主张，并在1970年的竞选中获胜。

阿连德于1970年10月24日正式就任智利总统。他上台后，便开始推行他的社会主义改革措施，一心想在智利创造出一条新的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阿连德反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和孤立的地位，处于激烈的政治和经济斗争漩涡之中。

阿连德所遇到的头等麻烦来自美国。早在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时，美国国际电话公司就伙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提供了100万美元的经费，力图阻止阿连德上台。因为通过竞选纲领和演说，美国人已经清楚地看到，如果阿连德当选为总统，智利很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美国的“后院”，一个卡斯特罗领导的社会主义古巴，已使美国非常头疼了；再冒出个社会主义的智利来，不但将直接威胁美国有产者在智利的经济利益，而且更会影响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前景。

阿连德在执政前，就对美国等国家在智利的垄断资本和政治地位表示不满，再加上竞选中美国人又极力帮助阿连德的对手，结果使阿连德的反美情绪大增。正如前面提到的，他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而与古巴、中国等美国当局所不喜欢的社会主义国家友善，这都不能不使美国人恼火。特别是阿连德政府的国有化政策，使美国人受到极大损失。所以，阿连德政府成立以后，美国就对智利实行经济封锁，并对国际信贷机构施加压力，停止向智利提供一切贷款；但美国同时却对智利军队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因为在美国人心目

中，这支军队将来说不定会成为结束阿连德统治的力量。

阿连德在国内的政敌数量太多。在竞选总统过程中，许多持保守观点的政党和组织，对阿连德的过激言行十分反感。阿连德政府成立之后，又采取了激进的“国有化”等措施，更使许多受到侵害的有产者对阿连德及其政府恨之入骨。所以，反对派便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活动。他们不但在议会中攻击和破坏阿连德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而且勾结法西斯组织“祖国与自由”，多次进行暗杀政府高级官员的恐怖活动。1970年10月22日，就在阿连德就任总统前两天，支持阿连德的原陆军总司令施奈德被暗杀；1971年6月8日，原内政部长佩雷斯又被暗杀。反阿连德势力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阿连德本人了。

人们不禁要问：阿连德当政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智利广大人民群众是有好处的，那么为什么他的政府却面临重大危机，而且最后也没有摆脱这个危机呢？为什么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阿连德政权呢？问题就出在阿连德的改革措施，超出了智利人民和传统势力所能接受的范围。阿连德的经济改革措施也目光短浅，只考虑眼前一时的效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特别是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比如说吧，为了追求福利主义，阿连德大幅度提高工资，但却没有生产出相应的物质财富。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钱不值钱，反而使受益者对政府不满。阿连德政府只考虑给那些生活贫苦者生活补贴，给孕妇、育婴妇女和15岁以下儿童每天免费发给半公升牛奶等等；但是却侵害了广大非贫困人民和有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农村的土地改革又犯了扩大化错误，使中农的利益受到损害。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局面不稳的严重后果。

就在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政府发生财政危机的情况下，阿连德并没有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而是一意孤行。他改组内阁，增加内阁部长中军人的比例，试图以此维持自己的统治。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政治突变的事件屡有发生。1973年6月29日，一个装甲兵团举行了暴动；8月份，议会又宣布政府为非法，要求阿连德辞职。

1973年9月11日，是智利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这里是南半球，正是寒冷的季节，首都圣地亚哥上空乌云密布。清早上街的人们，发现街上的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要道旁停着一辆辆坦克；全副武装的军人或乘军用卡车或列队在繁华大街往来巡逻；武装直升飞机在头顶上飞来飞去……

“现在播发军政府委员会第一号通告……”装着高音大喇叭的吉普车，在架着机关枪的装甲车护卫下。开始播放军政府“告智利人民书”。

“啊！政变啦……”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惊恐万分。

“……阿连德的政府从现在起已不复存在，阿连德本人和全体内阁成员，必须无条件辞职，军政府将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军政府委员会主席、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1973年9月11日签署。”

大批武装警察开始在街头巡逻，他们是奉警察首脑的命令，参与军事政变的。在政变的恐怖气氛下，商店纷纷关了门；街上的行人纷纷躲避起来。人们大部分都呆在家里，吓得不知所措。远处传来乒乒乓乓的枪声，人们估计是忠于阿连德总统的部队和政变部队交了火。

有人拧开了收音机。阿连德总统正在发表广播演说：“……女士们先生们。全体公民们：我，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是经过全体公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总统；我的内阁政府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法政府。本总统执政三年

来，为智利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皮诺切特指挥的政变部队，开始攻打国家电台、报社等要害部门。电台播音曾一度中断。忠于阿连德总统的卫队拼死抵抗，但是，他们哪是训练有素的野战部队的对手呢？而且寡不敌众，只好边打边撤退。电台工作人员就在政变部队接管这座大楼的前几分钟，还在播放阿连德总统的声明：“……所有参加政变的军人，立刻回到你们的军营里去，不要服从极少数阴谋家的命令……”

最后，阿连德总统只剩下莫内达宫（总统府）这个据点了。阿连德总统戴上钢盔，手握冲锋枪，沉着镇定地指挥战斗。炮弹一发又一发地在总统府院内爆炸，有的墙壁被击穿一个大洞。花草树木被弹片抛向半空，嘎嘎嘎嘎……啾啾啾……的机枪声震耳欲聋。

枪炮声突然停止了。胳膊绑着绷带的一名卫士跑了过来，给总统一个敬礼，请他接电话。阿连德抓起话筒，原来是皮诺切特将军亲自打来的，皮诺切特将军说：“尊敬的总统先生阁下：我和军政府委员会，希望阁下能体面地辞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愿意保证您和您的家属的安全，并且将提供你们流亡国外的飞机。”

阿连德总统义正辞严地说：“我决不离开莫内达宫，也决不会投降。你们从这里搬出去的将是我的尸体！”说完便挂掉了电话。他吻了吻身旁面色苍白、泪流满面的妻子和女儿，要她们去地下室躲避。这时，枪炮声更加激烈了！阿连德总统将总统府里剩下的 23 名人员集合到一起，声泪俱下地说：“为了智利人民，为了我们共和国神圣的事业，我们将流尽最后一滴血！”23 位战士当着总统的面宣誓，与总统府共存亡。

政变部队向总统府发起了总攻。由于阿连德总统亲率 23 名战士奋勇抵抗，逐屋据守，政变部队伤亡较重。这些职业军人们没料到，阿连德身边的人除约半数是总统卫士外，其余的都是文职官员和医生、司机等，他们的战斗力竟是如此之强。一直激战了三个多小时，总统府里的枪声才平息。

阿连德和 23 名战士，除少数几个负伤的，全部壮烈牺牲！政变军人在总统办公室的窗口下，找到了以身殉职的阿连德总统的尸体。阿连德总统身上多处中弹，鲜血渗透了衣裤。一名政变军官望着遗体说：“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位勇敢的智利人。”

当阿连德总统夫人和女儿从地下室里出来，得知丈夫已经牺牲的消息，母女俩相抱痛哭，泣不成声。皮诺切特将军没有食言，他派了一架飞机，将阿连德的亲属送到了国外。

（贺文）

